

张春桥

1949 及其后

郑重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目 录

《张春桥：1949及其后》

郑重著

© 香港中文大学 2017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 978-962-996-697-3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本社已尽力确保书内图片获得转载权。倘有遗漏，
欢迎有关人士与本社接洽，提供图片来源。

Zhang Chunqiao in PRC China (in Chinese)

By Zheng Zho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697-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copyright holders of the illustrations in this book.
If any have been inadvertently overlooked, we will be pleased to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Printed in Hong Kong

自序	vii
第一章 重返大上海	1
第二章 执掌《解放日报》	27
第三章 走近毛泽东	59
第四章 特殊历史时期的序幕	107
第五章 批判《海瑞罢官》	143
第六章 毛泽东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183
第七章 安亭事件	225
第八章 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	261
第九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	297
第十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下）：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343
第十一章 夺权之后	383

第十二章	大批判：思想领域的夺权.....	419
第十三章	“四·一二炮打”和秋后算账.....	457
第十四章	九大前后.....	497
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529
第十六章	对垒周恩来.....	561
第十七章	管好自家的后院.....	595
第十八章	最大的野心：写一部《毛泽东传》.....	645
第十九章	毛泽东战略调整：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673
第二十章	邓小平下课及四五运动.....	707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741
第二十二章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777
代 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萧木	813

自序

2008年完成《毛泽东与文汇报》的写作，感到言犹未尽，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未能用上，浪费了可惜，我就想写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作组的一些人和《文汇报》多少还有些关系。在整理写作组资料时，无论怎样都绕不开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写作组的灵魂人物。要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无法离开写作组。张、姚和《文汇报》的关系更密切、也更深入一些，我对他们也有些感性印象。这样，我就改变了写作的初衷，写起张春桥传来了。

按照过去一边倒的历史，张春桥已经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人物了。什么“篡党夺权”、“武装动乱”、“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他简直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但一边倒只能带来历史偏见，历史偏见又必然会把人带入误区。张春桥案距今已有四十年，张春桥和与之利害相关的人物都已去世，随着政治风云的淡化和一些历史真情的显现，人们看待以往事件的视角也在逐渐多元化，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张春桥。凝固的看法打破了，张春桥成了有着颇多争论的历史人物。这些都为走近张春桥创造了条件。

我无法看到和张春桥有关的文献档案，只能穿行在官方已经公布的文献和已出版的书籍、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找张春桥。但这些文献不完整，而且多是向他问罪的，这些都无助于全面地认识张春桥，也没有打动我想去做深入的探究。直到我了解到在北京元老派的眼里，张春桥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小人物，人家哪里把我放在眼里”，我才觉着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可以说我寻找得很苦。张春桥给人的印象，在大会上讲话出口成章，洋洋万言；在小会上，他常常是后发制人，出语尖刻；平时沉默寡言，高深莫测，给人留下“阴谋家”的印象。张春桥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交往，知心朋友也少，使人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还有当年在工作的地方听到他的一些讲话，看到他的一些批示，都还残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

张春桥曾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十七岁就带着“俺们山东人”的豪情来到上海滩。他受到左联影响，追求进步，奔向延安，进了抗大，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还没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开始了报人生涯。他从延安带走的是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写了《毛泽东之歌》。可能是由于革命的火候不到，对毛泽东理解得不深，《毛泽东之歌》受到批评，说他用小资产阶级情调写伟大的革命领袖。从此，他努力锤炼革命精神，带着这种精神去理解毛泽东。1949年之后，张春桥作为掌管意识形态的地方官员，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一直在理解毛泽东的精神上下功夫。

张春桥所走的道路，是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经历，有着普遍意义。在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上，每当列车急转弯时，有许多人被甩了下来，变成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张春桥则不同，随着列车的颠簸、变速或急转弯，他调整自己的姿态，始终没有被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甩出去。随着对毛泽东理解的加深，张春桥和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取得了毛泽东的欢喜、信任和重用。张春桥所以能做到这样，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歌颂，而是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他目不旁视，坚定地跟着毛泽东，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

一个个被淘汰出局，毛却和张春桥相始终。毛对张有着知遇之恩，视其为知音。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写张春桥传记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伟大，张春桥的影响还存在；如果说毛泽东渺小，张春桥也只好尘飞烟灭。离开毛泽东，张春桥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就可能是另一种下法。探讨张春桥的错误，也只能从毛泽东那里找根源，我没有能力在这方面作出合理的评论，只能记述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棋盘上走了哪几步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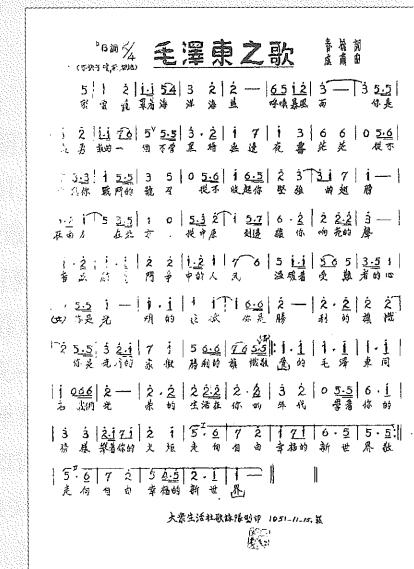
张春桥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女儿维维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这句话极为重要，是张春桥的内心世界。他还当着众人之面说：“要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张春桥的这个理想和他给自己的定位很吻合。他只能充当一个摇笔杆子的人。从林彪开始，那些功臣宿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毛泽东借古人的话“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不只是说给许世友听，也是针对张春桥的，他就是当代的随何、陆贾，毛泽东虽然让他穿上军装，置诸高位，但在军队里没人听他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庇护，他根本不是功臣宿将的对手，所以，他以疏远、警惕、批判的态度对待元勋们，把军队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张春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当然也就成不了什么“野心家”。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

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接受我访谈的人，对我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还有书稿评审专家和我的几位朋友，都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编辑们更是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叶敏磊小姐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精致的编辑风格，助成此书。画家徐唯辛教授慷慨提供封面图片，影像收藏家周铁男先生也提供了若干幅珍贵的插图。在这里向那些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一一表示谢忱。我是一个极为普通的

人，“诗赋自惭称作者”，正是我此时的心境。也许有人读后会说我在为张春桥翻案，其实我毕竟是年藉八十的老翁，既没有为张春桥开脱翻案的精力，更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我不研治历史，只是一个吃新闻饭的人，多年的新闻生涯养成了遇事探真求实、捕捉细节的习惯，对同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的经历，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整理编辑的工作罢了，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里听到我真诚的心声，能对我提供的资料有着鉴证的兴趣，此愿足矣。

郑重
2016年7月

第一章



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

第一章

重返大上海

新旧交替时期的选择揭开1949年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两个有关新年的话题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蒋介石发表的《元旦文告》，承认对共产党“戡战”失败，为自己下野作舆论准备；另一个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胸有成竹地宣布中国人民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他拒绝了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建议，坚决要打到南京去，统一全中国。

蒋介石、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选择，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都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并对个人前途作出自己的选择。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自己家中召开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讲了清华大学南迁的事宜，散会后，他对冯友兰说：“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¹言下之意，以后的命运要各自选择了。梅贻琦去了台湾，创办了国立清华大学。冯友兰没有走，留在了北京的清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去留问题，会影响到该校乃至社会上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选择，虽然有人告诉胡适，延安电台的广播劝他不要走，说将来仍然要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²但胡适还是去了台湾。北京大学的大部分教授并没有跟着他走，选择留下来。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一家和胡适一家在中南海勤政殿前一同上车，并同机飞往南京，但陈寅恪在南京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乘火车到上海，再乘轮船下了广州。³

最为选择受煎熬的还是那些“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1947年，“自由思想”代表人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开展了“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许多知识分子卷了进去，随着讨论的深入，提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在讨论中，他们尽可能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明自己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向国共两党任何一方，他们希望通过“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1948年中期。与此同时，中国民盟内部和《大公报》也开展了这类主题的讨论。

“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和“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批判现实，一方面在探索中国的出路。但在国共交战、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要说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也不能容忍。1947年5月20日，《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在舆论上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5月25日三报被上海市政府查封，自由报人徐铸成和赵超构只好绕道台湾，去了香港。⁴在三报被查封时，《大公报》的态度很暧昧，遭到《观察》及社会舆论的挟击。在工人运动兴起时，《大公报》的态度大转变，6月初发表支持工潮的报道和文章，受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自由报人王芸生预感报纸早晚要被国民党查封，便去了香港。⁵1948年《观察》周刊刊登了国民党的军队将失败，国民党将领在内战中身亡等报道，被国民党以“泄密罪”查封。储安平几经周转也到了香港。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人物，觉得在“蒋管区”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受到威胁，纷纷离开南京或上海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停留，只是权且之计，何去何从一时无法作出选择，只能暂时持观望的态度。毛泽东曾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就“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及“第三条道路”者中，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批评与揭露”，同时又说“‘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要同有这些主张的分子合作”，以此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之门是向他们敞开的。⁶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去向作了一次选择，实际上是为新中国的首都所作的选择。毛泽东对古都西安和南京的兴趣不大，他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23日离开与石家庄相去不远的西柏坡，移师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

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并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⁷从1948年底开始，流落在香港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及“第三条道路”者似乎看到历史潮流发展的大趋势，按照毛泽东的意愿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纷纷离港，前往解放区或北平。1949年2月28日，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等一批知名人士乔装打扮，身着唐装，有的扮作船员，有的扮作账房先生，有的扮作年迈商人，登上挂有外国旗的专轮“华中号”，离港北上。

当然，并不是每个“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都选择北上。徐铸成离开香港之前，曾任上海《文汇报》副主笔、此前和他一起筹办香港《文汇报》的马季良突然宣布辞职，说要赴美办报，然后去巴黎结婚。徐铸成说：“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马季良苦笑道：“我自有不能回国的原因。”第二天徐铸成见到潘汉年谈及此事，潘汉年说既然马季良决心要走，就不必挽留了。马季良笔名唐纳，是江青的前夫，两人曾于1935年结婚，两年后即分手。或许徐铸成不知唐纳有这段历史，潘汉年应是一清二楚。马季良恐怕是避之犹恐不及，故要远走他乡，真所谓“如入饮水，冷暖自知”也。⁸

当时这些选择北上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满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希望，殊不知，以后几十年中，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及所受到的冲击，可能是当年作出选择时，根本就没有意料到的。

文学青年张春桥的选择

在这个进行思考、进行选择的时代，有一位32岁的年轻人，他就是张春桥。1949年初，在已经解放一年半的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收到山东新海连特区特委书记谷牧的信，希望他回老家山东工作。⁹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出生于山东巨野，14岁时随父来到省城济南。在济南读初中时，他就发表过文学作品，像许多青春期的少年一

样，多愁善感，曾在文中感叹春风秋雨、朝霞星空、花开花落，也在功课之余穿上破衣烂衫，去车站、码头，与苦力、流浪儿混在一起，体验他们的感受。他曾为被迫出卖青春的少女呼唤公平，为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发出呐喊，也曾为“为国捐躯”的勇士们唱过赞歌。¹⁰济南不只留下他美好的青春记忆，在这里他也播种了理想。1935年5月12日，18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没有向父母告别，只留下一封书信，从一家报馆领了微薄的稿酬，就乘上火车，带着“俺们山东人”的豪情，¹¹从济南奔向上海。在上海谋生的岁月里，他心中还是一直怀着缕缕乡愁。¹²

初到上海的张春桥在陈白尘家落脚，白天做事，晚上写稿。¹³一个月后，他的第一篇文章《行立端》在6月6日的《大晚报》上刊登，文章记述了他告别济南来到上海的情景，字里行间怀有歉意，他写道“就这样仓促地走出来，我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但是“自己向外的心生长起来”，使他“要到社会上作一个人”，“我要带着勇敢，用手执着唐吉诃德的矛，向社会刺去”。从此他文思喷发，在《大晚报》、《时事新报》及其他一些报纸上连续发表新作，如《土枪射手》、《我控诉》、《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乡愁》、《晚秋》等。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上，人们能够看到张春桥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带有战斗性的时政文章，一类是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抒情散文。俗话说，文如其人，可能这也是张春桥性格中的两面。

张春桥1930年代弄潮上海，不能不提到他以狄克为笔名所写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1936年3月15日）。该文评论的是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中写道：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着你们底批评！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

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战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判！¹⁴

《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东北地区的抗日军队东北义勇军，鲁迅为之作序：“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民众，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是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在序中借题发挥，以这本关于东三省被占事件的小说抒发胸中义愤，他写道：“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中国民族的心，早给“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特别是“南方”封锁义勇军的消息，而且用“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等来“耸动大家的耳目”。

狄克的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全面否定鲁迅赞扬的《八月的乡村》，但还是引起鲁迅的注意，于4月16日写出《三月的租界》，由胡风交给左联的方之中，发表在其编辑的《夜莺》月刊一卷三期上：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

如今，我们再细读鲁迅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留在租界上”几个字。当时上海的文艺界，包括左联的一些人，都带着“亭子间”习气，在那里摇动笔杆写“亭子间文学”，脱离实际、脱离大众，还评东说西、指手划脚。张春桥当时正是一个生活在亭子间的文人。鲁迅不一定知道

狄克这个人，更不会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恰好代表了鲁迅所深恶痛绝的亭子间文人的那种精神状态，所以鲁迅进行了反批评。鲁迅这样有思想的作家，常会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反复大做文章。在《三月的租界》里，鲁迅是抓着狄克，对上海作家的亭子间文风进行批判。

张春桥深知惹恼了鲁迅，他仍以“狄克”为笔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释了他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说“我是有爱心的”。¹⁵至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遭鲁迅尖锐批评的话，他坚持“这句话我并不盲从，是有理由的”。张春桥并不认为自己对《八月的乡村》的评论是错误的。但是下一封信还没有写出，鲁迅就病逝了。张春桥加入了为鲁迅送行的队伍，回来后写了《鲁迅先生片断：我的悼念》，表达了对鲁迅的哀悼。¹⁶

是否曾用“狄克”这个笔名与鲁迅进行笔战，是张春桥的一个硬伤。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曾在会上和大字报里，追问张春桥狄克一事，他一直没有进行直接的回答。1967年“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时，狄克成为向张春桥发起进攻的重型炮弹。其长女张维维曾就此事问过他，张春桥回答说他自己的文章都是用真名写的，但为了吃饭，他也为别人捉过刀，别人用什么名字发表他就知道了。后来病重的时候，他也讲过这个话，他承认为了吃饭，别人叫他帮忙写东西，他是写过的。¹⁷

以狄克署名的文章是不是都出自张春桥之手，笔者是存疑的。在1930年代的报刊上，署名为狄克的文章很多。如《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一文，总结了当年中国文艺杂志的发展状况，涉及近二十种文艺刊物，对33位文化名人作了评论，指责鲁迅是《萌芽》的后台老板，自此狄克与鲁迅的矛盾公开化。从笔锋可以看出狄克是当年文坛上的一名宿将，而此年张春桥只有13岁，肯定不是该文作者。1937年12月20日，张春桥到达延安，此后狄克的名字仍然频繁地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杂志上。狄克于1938年7月16日发表了战地通讯《论安徽》，该文后面有“1938.7.15于武昌”，张春桥此时在延安，这个“狄克”应该也不是张春桥。1939年，重庆的《战时教育》第3卷第12期上刊载狄克

撰写的通讯《教育的荒地和野草》，透露了在抗战期间狄克活跃在重庆的踪影。以狄克为笔名撰写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星期文坛》上，笔者从崔万秋的经历判断，“狄克”可能原本是崔的笔名。或是张春桥借用崔万秋的笔名“狄克”，或是崔万秋为张春桥的文章署名“狄克”，因为狄克曾不止一次批评鲁迅，这次借张春桥的唐吉诃德长矛向鲁迅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

狄克曾写过一篇《由笔名抄到印象记》，文章说：“文坛盛行作家笔名抄，无意有意地作了告密工作，更有些文坛的密探，专以‘作家笔名抄’为能事，并将笔名的来源详加分析，好像大功全在此举。”¹⁸这里的“狄克”是不是张春桥，一时还无法确认，但可以看出这个“狄克”对查作者笔名是反感的。张春桥写文章不大喜欢用笔名倒是真的。

在上海文化界弄潮几年，几经波折，张春桥总算有了小文人的身份，他写的文章也逐渐有了读者市场，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上海不久也沦陷了。书店关门、杂志停刊，报纸不是停刊就是缩小了篇幅，文化人士纷纷离开上海，有的去了内地，有的投奔解放区。既没有朋友又缺少社会关系的张春桥，走投无路，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上海，回济南去。1938年1月，他带着二弟张秋桥一起从济南投奔延安。1940年又赴晋察冀解放区，十年间，他历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等职。

面对谷牧的邀约，张春桥面临着选择，如果带着温暖的乡情回济南，当然是衣锦还乡；但此时，即将解放的上海，更加吸引着张春桥。在张春桥心中，上海虽然给他留下种种苦涩，但上海的文化氛围和各种意识形态碰撞并存的环境，给张春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感到上海更适合他。他用“到上海去”回答了谷牧的盛情，而组织上也同意了他去上海工作的要求。¹⁹当年他是作为一个失败者离开上海，如今他要以成功者的身姿回到上海。这对张春桥来说比衣锦还乡更富有诗意。个人奋斗的失意者，在革命事业的胜利中得享成功的喜悦，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现象，革命大道亦是个人奋斗的坦途。

私营报纸的命运(上)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标示着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时代的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南京被占领后，上海也指日可下，大批解放军部队向南进发。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回家心切，纷纷要求随军南下。4月24日，善解人意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对接管上海的工作和即将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做了较为详尽的谈话，其中谈到报纸工作，周恩来说：

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为此，要请你们几位办报有经验的人给我们出主意，提意见。按照解放前那样办报当然也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不会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还有一个民办报纸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²⁰

周恩来有关民营报纸的谈话，使徐铸成、王芸生、赵超构等为之一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营报纸的命运。《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本来都是民营报纸，在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前夕，他们曾经聚在一起讨论过“新中国新闻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新中国是否还允许私人或民间办报。按照历史上传统的小报理念，民办报纸和官办报纸的新闻观念是对立的，用最简单的表述方法，民办报纸是独立的、自由的、公正的，官办报纸当然是代表政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御用报纸”。周恩来的一番谈话，使他们感到如同吃了定心丸，民办报纸还是要存在、要发展，他们还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周恩来还宣布：“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定命名为《新华日报》。毛主席已允写报头，即可带来，在带到前可暂沿用旧报头。”²¹

在几位民主报人从北平南下的同时，张春桥和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也离开了石家庄。柯庆施要到南京市去就任副市长，张春桥则随着队伍

直奔上海，途经江苏丹阳，与南下的各路新闻队伍汇合，准备进入上海。在这里除了有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还有从华北调来的范长江、魏克明和恽逸群，以及从山东新民主报社、潍坊报社调来的一批新闻工作者。²² 上海地下党为这支新闻接管队伍提供了一本《上海情况》，此书包括对新闻界的详细调查资料，其中有被称为“上海活字典”的恽逸群的介绍，使他们对上海新闻界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5月6日，饶漱石在《关于接管上海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报纸接触群众是多方面的，在目前条件下，它比广播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要求现在就预先编好半个月的报纸（只留下新闻的位子临时补上去），以便一进入上海就出报，通过报纸来表明态度，宣布政策。”²³ 范长江、恽逸群和张春桥都投入到《解放日报》的筹办工作。在上海，夏衍、姚臻、陈虞孙等新闻界地下党人出版了报纸《上海人民》，迎接上海解放。²⁴

5月26日，解放上海的炮声尚未散去，这些接管上海新闻系统的干部，乘坐一列火车，抵达上海郊区南翔小站，火车无法进城了。当晚，在地下党组织带领下，他们冒着滂沱大雨，乘坐汽车进入市区。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下辖政务、财经、文教、军事等四个接管委员会，根据各个系统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接管方式。5月28日，军管会接管上海市政府，在市长办公室举行接管仪式，军管会主任陈毅、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相对而坐，陈毅宣布接管旧市政府的仪式，由赵祖康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交给陈毅。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接收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在上海的营房、医院、机场、军工厂和仓库等。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副主任曹漫之的接管对象都属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需要拆散打乱。原社会局、调查处、统计处予以撤销。原法院、检察院、监狱在组织上进行彻底改造。成立人民法院，废弃民国“六法全书”。对于行政管理职能的旧机构，不作巨大变动，基本执行原来的职能。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执行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政策，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沪的银行、工

厂以及财贸、商业、交通、邮电等企业。在上述单位服务的旧职工仍然保留原来的工作不变。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有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白韬。这个系统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出版等多个系统。文教系统的入城干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干部会师，按照文化、教育、新闻系统分工。按当时的接管政策，凡私立大学、中小学和私营文艺单位，一律不接管，也不实行军管。但新闻方面情况特别复杂，所以接管工作也特别慎重细致。

一开始，张春桥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副处长，以后又被政务院正式任命为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新闻学院副院长，虽然头衔前都贯有一个“副”字，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他参与起草了《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无线电台登记及管制暂行办法》、《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和《关于加强宣传工作纪律的指示》，同时他又分管了私营新闻媒体的整顿工作。

数十年后，张春桥在秦城监狱中给女儿写信，带着温馨的回忆说：

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²⁵

庆丰大楼靠近外滩，张春桥闯荡上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他来到上海之后，白天做事，晚上写稿，只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第一篇文章《行之端》就在6月6日的《大晚报》刊登了出来，从此他文思喷发，在《大晚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他的新作。当时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都在这幢大楼里，他经常来和编辑们见面，毛遂自荐，进出频繁，这幢大楼的角角落落里曾留下他心绪彷徨的脚印。如今，他作为胜利者归来，虽然工作很累，每天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忙得很，常常深夜还不能回家。但是内心一定充满了喜悦。

上海是中国新闻媒体的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前，上海有报纸七十多家、通讯社八十多家、广播电台五十多家。解放军进城之后，即下令将为旧政权服务的公营新闻机构全部停办，没收财产，其中包括三家通讯社、两家新闻处、18家电台和26家报纸，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东南日报》、《大晚报》都属于这一类。民间的私营小报有的停办，有的合并，如《铁报》、《飞报》、《罗宾汉》、《诚报》、《辛报》，虽然没让其停刊，也很快就自行倒闭了。英文报纸《密勒民评论报》因其主持人鲍威尔和地下党有关系，照常出版；英文《大陆报》因有着孔祥熙的背景，则报请军管会批准，6月初即予没收。

大多数老的私营报消失了，不过又出现了新的私营报。上海刚解放，经新闻出版处批准，成立了两家私营报纸，一张是由冯亦代、陈蝶衣主持的《大报》，另一张是龚之方、唐大郎(云旌)主持的《亦报》，这两家报纸都在新闻处张春桥主管的范围内。成立这两家私营报纸的目的，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宣传教育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虽然是小报，为其副刊写文章的却都是上海文坛的名家，其中有张爱玲、张慧剑、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陶亢德(和林语堂一起办过《宇宙风》)、冯凤三、沈苇窗，还有北京的周作人等。两家报纸都是私人发行，开始时销路还好。

然而解放伊始，无论中央到地方，对民办私营报纸都一直采取限制政策。上海解放才一个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发布了张春桥参与起草的有关私营报纸及报纸宣传纪律的一些指示性的文件，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指示》说：“进城后，各机关的报纸通讯员所写的稿子，应经该机关领导人审查后，送党报《解放日报》审查发表，不得将工作经验、工作动态、会议消息文告等，直送给私营的、非党的报刊随意发表。”²⁶这样的规定给民办私营报纸的采访带来极大的不便。《亦报》和《大报》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新闻要到《解放日报》去讨，稿件要经过《解放日报》审查，有名家的支持，副刊虽然办得很好，但曲高和寡，适应不了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何况报人还面临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紧迫形势，最终这两家报纸自行停刊，并入《新民报》。张爱玲、陈蝶衣、沈苇窗去了香港，冯亦代去了北京，唐大郎进了《新民报》，龚之方去

北京参加《新观察》杂志社工作。上海一批私营小报的消失，和报刊处主管私营报刊的张春桥疏于管理，以冷淡的态度对之，固然有着关系，但党对私营报纸采取的限制、不支持的政策还是起了主导作用。

私营报纸的命运（下）

这样，上海的报纸除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一家独尊外，民办私营报纸《大公报》迁往天津，剩下的只有复刊的《文汇报》、《新民报》以及由金仲华接管的《新闻报》，《新民报》后改名为《新民晚报》，《新闻报》改名为《新闻日报》。²⁷《文汇报》的处境也陷入困难之中。当时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对民办私营报纸不太信任，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市里开会，民办私营报纸拿不到领导人讲话稿。党报和民办私营报纸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的，有时各报记者同赴一个单位采访，党报记者常常取走所有的资料，使其他报社记者空手而归，无法写稿。《文汇报》女记者李立坤回报社大哭一场，交出记者证，不愿再当记者了。类似这种情况在其他民办私营报纸中也时有发生。

新闻采访是如此，言论写作更为艰辛。当时对民办私营报纸规定：“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²⁸“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和政策”。²⁹《文汇报》两次违反了这样的规定。一次是刊登恩施解放的消息，采用了香港《文汇报》发来的专电，比新华社稿要早，此时港、沪两地《文汇报》还是一家。另一次是刊登长沙解放的消息，也是《文汇报》要闻部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遂记录下来，在新华社消息还没有发出前便见诸报端。华东新闻出版局对《文汇报》提出了批评，其理由是：《文汇报》违反了关于军事消息均须新华社统一发稿的规定，并指责说这是抢新闻。为此，总编辑徐铸成作了检讨。这也是他办报以来第一次听到“统一发稿”这样的名词。他万分困惑，如果报纸都刊登新华社统发稿，报纸特色安在？向来以“独家新闻”著称的《文汇报》如何生存？他感到新闻自由被剥夺了。

其次，令报纸编辑最为苦恼的，就是新华社的改稿或撤稿。某天深

夜，《文汇报》报纸版面的大样已经看过，正准备付印，主持夜班的副总编辑郭根完成编辑工作，回去睡觉了。新华社突然来了撤稿的通知，电话叫醒已经入梦的郭根，他不以为然，断然回答了三个字“开天窗！”柯灵十分吃惊，这是什么时代了，开天窗在旧社会是新闻界经常用来对抗反动政府新闻检查的手段，现在怎么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人民政府呢？³⁰郭根既然不愿意更换稿件，柯灵只得自己动手，从备用稿件中寻找出合适的稿件补上了，好在没有耽误正常发报时间。³¹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新华社电讯发表了。徐铸成把电讯稿交给主编第一版的郑心永，嘱咐要精心编排版面。³²郑心永把《论人民民主专政》全文读了一遍，开始精心编排，每段都作了提要，以小标题的字号作醒目的标注。他以为这样的编排即使不读全文，也知道大意。7月1日报纸出来以后，徐铸成看了版面也甚为赞赏。不料新闻出版局很快即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文章，你们怎么好编得支离破碎？徐铸成哑口无言。郑心永不服气，接过电话说：“那样长的文章，不作提要，让读者怎么看下去？”新闻出版局的人回答：“你怎么知道毛主席的文章哪里重要，哪里不重要？”郑心永说：“我们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删一个字，只作了提要。”新闻出版局强调，《论人民民主专政》是纲领性的文件，字字重要。郑心永不再申辩了。结果又是徐铸成作了检讨。多年后，郑心永向笔者谈了当时的情况，说：我听得出来那个电话是张春桥打来的。³³

民办私营报纸看不到文件，没有上级指示精神，用报人的行话来说，无法“吃透两头”，是无法办报的。上海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就组织了一个每周一次的通气会，也叫座谈会，召集《解放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日报的经理、总编辑、主笔参加，通过这个会议传达一些上级指示，统一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保持公营报纸和民办私营报纸之间的联系，以及共同解决业务上的困难。《文汇报》复刊时遇到一些困难，新闻出版局没有见死不救，给予了纸张、印刷方面的资助，《解放日报》也伸手相援，借给大量纸张、油墨等，并协助解决工作厂房、机器方面的困难。

在上海市军管会召集新闻出版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文化教育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范长江谈到报纸的宣传问题，以及公营报纸与民办私营报纸的沟通问题。他说：“关于民营这一观点，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单位，是曾在不同的程度上代表人民，应该称为‘民营’或‘民间’的。”但后来，他直接对徐铸成说：“在人民政权下，政权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营之分，不再是‘官方’与‘民间’的关系。”³⁴ 私营意味着什么？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在崇尚公有制的社会中，私营不就意味着改造和消亡吗？徐铸成此时心灰意冷，等待着私营的《文汇报》的消亡。

和范长江“民间报纸消亡论”的观点不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对民间报纸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1950年5月5日，他特地到《文汇报》社，对私营报纸当前遇到的困难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文汇报》的出路问题作了详细剖析，提出了明确意见。他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了文汇报的方向，³⁵ 今后应特别注意两点：一在普及中求提高。应面向广大青年群众，多谈青年本身的问题。要照顾到后进的读者，这方面应向邹韬奋学习。二是根据报纸的对象，作重点报道，要有总的方针，不可面面俱到，否则反而面面不讨好。”³⁶

在对待民办私营报纸及如何办报的问题上，夏衍虽为上海新闻宣传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却也有着极端的困惑，如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或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能不闭塞？对报纸不登天气预报、没有广告、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社论，他也百思不得其解。他曾不止一次和范长江、恽逸群谈论过这些问题，恽逸群对《解放日报》每天只出一张报有些不满，范长江则似乎怪恽逸群多事，认为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发外国通讯社电讯，那是军管会的命令。夏衍认为报纸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能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

张春桥当时只是副职，比范、夏及恽的级别低，还没有资格参加他们这样谈心式的议论，但怎样看待新闻及私营报纸，其理念和范长江比较接近，因此与新闻出版局局长恽逸群的意见不合。实际上，华东局、

上海市委，包括做更具体工作的张春桥，对旧的新闻机构的整顿及对私营报纸所采取的方针，都是以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为依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毛泽东对新闻事业做了多次指示，以党报为核心的多种人民报业并存的结构，在清理整顿中，要做到：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各种新闻传播工具实行封闭和没收。对私人经营的各种新闻传播媒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不同处置：对民主人士主办的进步的新闻传播媒体帮助其继续出版；对中间性新闻传播媒体允许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对坚持其反对立场的新闻传播媒体则令其停办。³⁷

张春桥虽然代表新闻出版局主管几家私营报纸，但实际上一开始他并不把这几家私营报纸的事放在心上。他主张私营报纸不能存在，要早早进行发行合并，所以新闻出版局讨论报纸的业务时，张春桥未把私营报纸的事提到会上讨论。³⁸ 由于他放松了对私营报纸的领导，使得在一段时期内，私营报纸的老报人们还是沿着旧的办报方法，以“自由精神”办报，不但没有配合中心工作的观念，有时还会和中心工作背道而驰。对公有的企业事业出现的问题，自行其是，以客观的立场进行批评，一时使政府工作处于被动局面，用当时的语言来描述，私营报纸的行为就是“向党进攻”。这当然要张春桥承担责任，要把私营报纸管起来。于是他执笔起草了社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向私营报纸提出严厉过火的批评。后来张春桥在三反中做检讨时说：“我在起草解放日报社论时，就曾不只一次地表现过火，不是攻心斗智，而是不策略地‘骂倒’。”由于他认为私营报纸的观念不对，对私营报社中某些民主人士如王芸生、徐铸成等，也有“看不惯”、“看不起”的左倾情绪，张春桥也为此作了检讨。³⁹

除了各种副职之外，张春桥还担任华东局军管会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这才是他担任的实质性工作。军管会的许多新的政策、法令、公告首先是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外公布的。这样，张春桥需要了解制订这些政策、法令的背景，还要到实际工作部门的委、办、局去了解材料，工作量很大，他要花很多力气才能做好这件事。

老歌曲，新批评

正当张春桥繁忙工作之时，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他十年前的一首歌曲旧作，这首旧作就是《毛泽东之歌》。1938年，张春桥来到延安后，见到了毛泽东，听了毛泽东几次报告，终其一生都视之为最幸福的事。几十年后，张春桥在秦城监狱铁窗之内给女儿的信中说：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38年初的一个晚上。后来，像很多延安人一样，能够有机会听他做报告。第一次谈话，却是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状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⁴⁰

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张春桥展开晋察冀生产的粗质稿纸，几乎不假思索地写下21行的《毛泽东之歌》，由音乐家卢肃谱曲之后，先是在张春桥生活战斗着的晋察冀边区唱开，随后在各个解放区广为流行。后来在解放战争进军南下的路上，许许多多人都在哼唱这首歌，其中当然也包括张春桥本人。歌中写道：

密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
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
在北方，
从中原，
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

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
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你是光明的象征，
你是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张春桥写《毛泽东之歌》不是偶然的。他本来对大海就有着情结，接受了高尔基的影响，自己即使没有资格做一只在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但也羡慕海燕式的英雄人物。还是在上海生活期间， he去吴淞口看海，登上吴淞炮台，放眼望去，烟波浩荡，天水相连，有一群海燕在水面飞翔。他很激动，回到住地之后，写了一篇以《海燕》为题的小说，小说的结尾他模仿高尔基写了一首《海燕》的诗，歌颂抗日英雄。他这篇小说在《文学界》发表了。

显然，以海燕的形象歌颂英雄，在张春桥心中已酝酿了多年，在那样的时代里，即使不用海燕来歌颂毛泽东，也会用来歌颂其他英雄人物。从小说《海燕》到《毛泽东之歌》，张春桥的感情并没有特殊的升华，歌词表明，在张春桥心中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而且是“旗帜”、“火炬”式的英雄，是人民可以学习的“榜样”，是“毛泽东同志”。他并没有追随别人把毛泽东看作是“英明领袖”，而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表现了他在那个时段对毛泽东的认识水平。随着人们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喊出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自己也咏叹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篇，此时再看张春桥笔下的毛泽东，显然就与毛泽东的地位功业不相称了，和人们心目中的毛泽东相差甚远。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扬臂挥手，成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应该说这首歌已经无法再唱下去了。

1951年2月11日，音乐家周巍峙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毛泽

东之歌》提出了批评，说“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都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⁴¹“像一只挽歌，……一点没有热情歌颂的味道”。⁴²两个月后，在上海音乐家协会研究部组织的音乐家座谈会上，也有人批评说这首歌“是以个人的、陈旧的、轻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乐观的、健康的人民情绪”。⁴³

周巍峙同时也是主管文化的高官。张春桥受到他的批评之后，即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周巍峙“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⁴⁴看来，周巍峙的意见是迟到的批评。张春桥的信不能说没有诚意，但是也有着言外之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天的周巍峙还用张春桥十年前检讨过的事情来批评他，还有什么意义呢？随着形势发展和变化，对《毛泽东之歌》即使不批评，它也会从歌坛上自行消失，历史上的很多颂歌或赞美诗不都是这样昙花一现吗？但即便如此，从文艺发展的历史观来看，《毛泽东之歌》即使受到批评，人们不再传唱，但在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史上还是会记上一笔，给它留下一席之位。这或许也正是张春桥所想看到的。

反观张春桥从上海到晋察冀边区的心路历程，他18岁初到上海时，正是上海的摩登时代。他作为乡间文学青年，投身于这样的大海之中，不仅是批判，还是多方面的吸收，其中当然包括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就是到了延安，去了晋察冀边区，他的这个情调在他的性格中不肯轻易地放弃，不时地“顽强”地表现出来，屡屡受到批评。由此看来，他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一味“极左”。而1940年代的张春桥所受到的批评不仅仅是《毛泽东之歌》，还有更为严重的，那就是他的文艺思想。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滞。因为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来到抗日根据地，各种观点的争论也无法避免。1942年5月20日到5月23日，有一百多位作家，可以说是代表了在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在中央会议室举行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作了几次讲话，经胡乔木整理成文，即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了知识分子带到延安的各种思潮。张春桥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时，边区文艺工作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不少读者认为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斗争，许多人反映“看不懂”诗歌，甚至有人宣布自己不读诗，要求报纸不登诗。

身为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常委的张春桥，对这场争论当然不会置之度外，而是立即投身其中，在毛泽东发表讲话10个月后，写了一篇长文《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张春桥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观念。文章面面俱到，既批评了文学作品存在的问题，也肯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成绩，更强调贯彻整风精神，作家要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表现抗日根据地的生活：

有的读者甚至提出偏激意见，要求报纸上不登诗。同时，我也听到不少的文艺工作者感到苦闷，深感生活贫乏，深感作品在读者中不满反映的严重性，感到不知如何下手写作。而所有这些意见并不是个别人的，相当多的读者或作者都有这种意见。

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提到我们文艺界和各界同志面前，作冷静严肃地讨论，打破读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之间的隔膜，求得意见一致。敌我斗争的形势越紧张，越需要我们这样做。⁴⁵

耐人寻味的是，张春桥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毛泽东《讲话》精神有不一致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作家的不适应，作家与读者的矛盾以及作家的苦闷心情，但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两人的观念有所不同。张春桥提出要采用“沟通”的方法，提倡“作家与读者互相尊重的风气，提倡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聚会、座谈、通讯、直接晤谈”，以此来“打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阂”。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提出，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成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还作了论断，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改造，

“自己的作品才能为大众所欢迎”。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大众欢迎的人”，而不是像张春桥所说的坐下来“沟通”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张春桥还讲了普及提高的问题、文学批评以及作家与工农大众谁适应谁的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逐步提高他们，但不是迁就他们”。他是要工农兵朝着知识分子方向提高作品，要由“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的方向提高。这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完全相左，毛泽东分析了普及与提高的阶级基础，“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群众还在那里唱“下里巴人”，你不去提高它，只顾自己唱“阳春白雪”，“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的清高，群众不会批准的”。

张春桥在文中多次提到“战前左翼文艺家”如何如何，他说：“战前的左翼文艺作家与今天大后方的作家对文艺运动都建立了光辉的劳绩，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继承了和继承着左翼文艺运动底好的传统”。与此相反，毛泽东在《讲话》的引言中却对左翼作家的思想和到延安以后的表现作了批评，他说：“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些扩大但基本上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隔绝了。”从上海去延安的“左翼作家”，在整风中都以毛泽东的《讲话》为镜子，对照自己在上海时形成的思想观念、生活作风，做了深刻的检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张春桥已经离开延安，在边区办华北联大，自然是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但是，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内容于1943年3月1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而张春桥的文章是1943年3月24日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他写作此文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他是否一点都不知道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呢？从张春桥的政治追求来看，他如读到毛泽东的《讲话》，是断然不敢提出和毛泽东不一致的看法的。但也不排除他此时的思想还停留在他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状态，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顽强地表现出来。

张春桥《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发表的十几天后的4月，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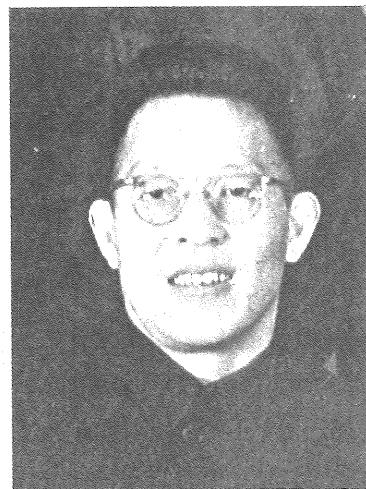
察冀边区开展了一场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批判。张春桥所受到的批评或批判已不再局限于他个人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及文艺思想。和大多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过整风运动，他不再强调“个人品质”，骄狂自负也有所收敛。这种在整风运动中形成的“自我批判”意识，后来成了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大上海的张春桥的法宝之一。经过解放战争，上海成了人民的上海，但相比二三十年前，还是萧条了许多。尽管如此，张春桥仍能感到他所熟悉的摩登时代流传下来的遗风，故而他时刻保持着一种批判的、不受沾染的意识，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而且教育子女乃至孙辈。即使在狱中，他也仍不忘毛泽东的《八连颂》中“拒腐蚀，永不沾”的诗句。⁴⁶

注释

- 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第129页。冯友兰，哲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 2 蔡德贵：《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 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 4 徐铸成，时任《文汇报》总编辑；赵超构，时任《新民报》总编辑。
- 5 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辑。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35页。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
- 8 另有说法指出，马季良系中共秘密特工，此番赴美系为潘汉年派遣，从事海外情报工作。
- 9 谷牧，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10 张春桥：《为国捐躯》，《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廊》，1932年5月15日。
- 11 张春桥：《俺们山东人》，《漫画漫话》（上海），1935年5月，第一卷第二期。
- 12 张春桥：《乡愁》，《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9月24日。
- 13 陈白尘，剧作家。
- 14 田军为作家萧军的另一笔名。

- 15 狄克致鲁迅的信原件现藏北京鲁迅纪念馆。
- 16 张春桥：《鲁迅先生片断：我的悼念》，《大晚报》，1936年11月9日。
- 17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18 狄克：《由笔名抄到印象记》，《礼拜六》，1936年第63期。
- 19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20 夏衍：《懒存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5页。
- 21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解放日报社，1999年版，第1页。
- 22 范长江，抗日战争期间任《大公报》记者，著有《中国西北》，1949年后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再后调往北京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魏克明，后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 23 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
- 24 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家。姚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虞孙，1957年任《文汇报》总编辑。
- 25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
- 26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解放日报社，1999年版，第4页。
- 27 金仲华，曾任《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市副市长。
- 28 王中：《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情况》，文汇报史研究室编《文汇报史略》，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 29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文汇报史研究室编《文汇报史略》，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 30 柯灵，《文汇报》开创人之一、副总编辑、作家。
- 31 笔者访问柯灵笔记，1984年8月9日。
- 32 郑心永是《文汇报》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员，中共上海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和张春桥是新闻界的两位代表。
- 33 笔者采访郑心永笔记，1985年8月23日。
- 34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1938—1998）》（征求意见稿），2001年版，第210页。
- 35 1950年3月下旬，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上海四大报纸的分工：《解放日报》面向政府和党的干部，《新闻日报》面向工商界，《大公报》侧重商界和高级知识分子，《文汇报》则面向青年知识分子。
- 36 《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 37 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 38 张春桥：《我在“三反”中交待的问题》，1952年6月1日。
- 39 张春桥：《我在三反中交待的问题》，1952年6月1日。
- 40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26页。
- 41 周巍峙：《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周巍峙，音乐家。
- 42 上海音乐家协会研究部组织的音乐家座谈会纪要《我们对〈毛泽东之歌〉的意见》，1951年4月20日。
- 43 吕骥：《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谈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4年3月28日。
- 44 《人民日报》编者把张春桥的信加上标题《〈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复》，于3月11日发表。
- 45 张春桥：《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4日。
- 46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第二章



张春桥

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的照片与签名

第二章

执掌《解放日报》

升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恽逸群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委任，以驻《申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对《申报》实行军事管理。《申报》原工作人员中除个别人吸收任用外，绝大部分人员另行安置。随恽逸群南下的济南新民主报社、新华社济南分社、山东潍坊报社以及范长江、恽逸群任校长的华东新闻学校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员等一百多人，组成了《解放日报》编辑采访队伍，《解放日报》于5月28日创刊出版发行。创刊号为八版，发行十多万份。当年10月，《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范长江调往北京，其职位由恽逸群接任。此时，恽逸群还兼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张春桥为副社长、副局长。

1951年9月3日，毛泽东、斯大林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互致贺电，《解放日报》漏登斯大林致毛泽东贺电。《解放日报》漏登了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恽逸群的命运发生了大转变。9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关于本报漏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其中有一段讲述了事件经过：“9月3日，新华社于凌晨12时40分截稿，3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胜利日稿件，这时，编辑部同志都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

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的政治错误。”¹ 检讨的署名为“社长恽逸群”。

同日，恽逸群主持召开社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今后防止漏登重要消息的措施，决定每晚由魏克明等七位领导同志轮流值班。9月8日，召开全报社大会，动员检查工作，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到会，他在讲话中强调了建立和健全审稿制度、请示制度、检查制度、奖惩制度和整顿组织等问题。根据舒同的指示，给造成漏发贺电经手人记过一次的处分。9月19日，恽逸群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报告，并自请处分。

10月8日，社务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张春桥第一次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报社第四季度的中心工作口号是“为没有错误的《解放日报》而奋斗”。10月9日，恽逸群、张春桥联合签署通告，称：中共中央华东局10月3日通知，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决定调原《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至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其职务由张春桥接替。恽逸群只担任华东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局长，漏登斯大林至毛泽东贺电的善后及人事的处理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张春桥和恽逸群的关系以及张春桥如何接替恽掌管《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记录得比较客观，交待得也很清楚。从中看不到张春桥对恽逸群投井下石、并对其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或行为。

1952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² 人们把这一运动简称为三反。为了适应三反运动这一新的形势，1月4日，党报委员会进行了调整，有舒同、匡亚明、恽逸群、张春桥、姚溱和魏克明，舒同任书记。³

张春桥来到《解放日报》，正是三反运动高潮开始的时候。1月7日，报社领导“带头下水”，先行在报社内部开展三反运动，成立了“《解放日报》打虎队”，张春桥担任“打虎”队长。在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中，另一个更为严酷的打击落到恽逸群的头上。报社有人揭发，有一笔款项涉及恽逸群任职期间的事，经调查属实，张春桥和陈虞孙向华东增产节

约委员会并华东局宣传部写了情况报告，其中有一段内容说恽逸群“决定动用供应股款项给一个商人去恢复煤矿，亏空殆尽，至今仍有1.5亿元（旧币）未收回。”

原来，资本家吴半农是恽逸群的“盟弟”，他们是办实业的旧友。1949年8月，吴半农来报社找恽逸群，说他在南京城外有个小煤矿，被国民党励志社强占，经军管会查明后发还，但无资金恢复生产，希望得到支持和援助。恽逸群想，把供应股闲置的资金用来恢复生产是件好事，而且当时报社用煤十分紧张，煤矿恢复生产出煤后可以要他们优先并优惠供应报社，所以先后两次借款给吴半农。结果因开采失败，借款未能如数收回。

2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全市干部紧急会议上，撤销了15个本身有贪污行为或领导反贪污斗争不力的负责干部的职务。并于2月29日、3月10日，分别召开上海市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和华东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宣布了对恽逸群在内的14人的党内外处分决定。

3月15日，《解放日报》奉命报道了这几次会议的决定：“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肩题），“华东局宣布处分七个党员”（主题），“开除李剑华、恽逸群、李国斌、周力行的党籍”（副题）；张春桥写了社论《扫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纯洁党的队伍》，社论和新闻报道同时见报。在新闻报道中都一一记述了这些干部所犯的错误。

按照新闻工作的常规，报道中所列举的被处理干部所犯的错误以及上级机关对这些干部的处理结果，既不是写报道的记者无中生有，也不是总编辑张春桥从中添枝加叶，而是从领导机关对这些干部的定案材料中抄录的。从报纸的宣传角度，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不会再炒剩饭了。但报纸却对其中的曹漫之、恽逸群作了连续报道。曹漫之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民政局对上海市委给予曹漫之的处理有些不满情绪，《解放日报》对民政局提出了批评，这不是《解放日报》擅自决定，而是奉上级的指示精神办事。但是对恽逸群的连续报道就有些不同了。现将《解放日报》副刊《党的生活》专版上发表的有关恽逸群的报道排列如下：

- 3月10日《解放日报》一版报道《新闻出版局长、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以敌为友、假公济私：挪用公款两亿五千万元投资牟利，包庇地主家庭，完全丧失党员立场》；
- 3月17日《解放日报》“党的生活”专版发表了两篇文章《剥去“好人”外衣：本报党员批判恽逸群的恶劣行为》、《从恽逸群怎样领导新闻日报，更证明他成为政治害虫的包庇者》；
- 3月26日发表武进县坂上镇一位土改工作队队员的文章《恽逸群怎样敌视农民的正义斗争》；
- 3月27日发表文章《恽逸群家乡武进坂上镇广大农民，知道恽逸群被开除党籍高兴万分》；
- 4月1日发表新闻出版局党支部的文章《从批判恽逸群的恶劣行为，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危害性》。

对《解放日报》这样宣传报道恽逸群的问题，有几本书写到张春桥和这件事的关系时，都是这样写道：在报纸上展开对恽逸群的揭发与批判，并不是奉上级的指示行事，而是张春桥施以心计，把恽逸群彻底打下去，解除自己未来仕途上的后顾之忧。这样的分析，只是揣测。恽已彻底倒台，张春桥的作法，更像是顺势而为。恽是报社的原社长、总编辑，报社是他活动较多，人员比较了解他的地方，作为报纸总编辑的张春桥对社内社外的三反运动非常重视，对比较熟悉的恽多揭批一些，似也是工作范围内的事，说是私欲使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恐非主要因素。更何况此时恽逸群已经调离解放日报社，并且降了级，不存在阻碍张春桥的升官之路，而恽又确实把报社的钱款借给他的盟弟做生意，到期无法归还，符合三反打击对象的条件。

此时，担任“党的生活”专版主编的丁柯，在张春桥倒台之后曾揭发，张春桥命令他们组编揭发恽逸群的文章，由于他觉得事实不符，落笔难，张春桥就“痛斥”他“党性不强”，还讲了阶级斗争等问题。丁柯讲的事或许存在，但从报纸的工作情况来看，总编辑对宣传报道会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但不可能对某一个专版管得那样具体，一般都是专版的编辑出点子、出题目，拼好版面再送给分管的总编辑审定签发付印。

如果说追究责任的话，作为专版主编的丁柯也脱不了干系。

还有一种说法：张春桥之所以如此，是受当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的指使。因为恽逸群对饶漱石的作派有些看不惯，曾经在一些问题上与饶持不同见解，当面顶撞过饶。饶漱石出事后，张春桥在工作检查中，也曾检讨过自己对饶漱石的崇拜。所以张春桥为取悦饶漱石，得到其指令或暗示，对恽逸群投井下石。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可能，但是饶漱石是如何向张春桥下达指示搞垮恽逸群的，还没有看到确切的材料。而恽逸群和饶漱石的确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在这里就不作叙述了。

1955年“高饶事件”后饶漱石下台，⁴恽逸群曾提出申诉，要求平反。但因他又被卷进了“潘杨事件”，⁵不但没有申诉成功，反而被捕入狱，关押十年后才被释放，安排在苏北的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直至其去世六年后的1984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恽逸群曾写过一份经历，叙述他受劫难的经过，其中很少提到张春桥对他的迫害。可以说，恽逸群是上海市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上）

三反运动的发端是1951年11月1日，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向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其中列举了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这一报告批转中央各局和各级党政军机关。他在批语中说：“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开展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⁶

随后，中央各局陆续呈送了发现大量贪污的报告。毛泽东阅后，感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制止住贪污浪费之风。他决心通

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的腐败现象。三反运动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进行。同时，在全国工商业界也开展了五反运动。

一张报纸的风格总是体现出总编辑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总编辑就会办出什么样的报纸。张春桥主持的《解放日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为了表示得风气之先，总是要提出一些新的说法或新的口号。1952年1月，五反运动刚开始，《解放日报》就连续进行报道，根据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于1月15日在一版发表社论《开展工商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的斗争》，这是中共中央及中央一级的报纸所没有使用过的新提法。《解放日报》率先提出的“四反”虽涵盖不够准确，后来还是为中共中央所采纳。在部署运动时，正式提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物、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说法。

在运动中，张春桥很注意发挥报纸的社论作用，他不但亲自带领《解放日报》评论员写社论，还约请社外作者如王芸生、魏克明、王力、匡亚明、钦本立等写社论或重要文章。⁷通过社论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口号，如“打虎”要“搜山围剿”，随着运动的深入，又陆续提出“打虎”要“外面跑”、“内部找”、“敌方缴”等等口号，这些提法无疑给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身为“打虎队长”的张春桥，把《解放日报》社内部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在运动进行阶段性的小结时，报社总结了六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要把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到底，就要打“思想老虎”。所谓“思想老虎”就是“右倾思想”的代名词，形象而别致。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把这六条经验加以补充、修改，形成九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严厉批判与坚决克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是开展打虎运动的首要环节。”华东局将直属机关党委的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读了这份报告，于2月12日批示转发给全国，并写了批语：“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华东局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干净的。”⁸“思想老虎”的提法即出自张春桥的笔下。

2月19日，《解放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发表社论《肃清右倾的“思

想老虎”争取打虎战斗的彻底胜利》。从此开始批判“思想老虎”，如民政局对其局长曹漫之被打成“老虎”有抵触情绪，批判不力，《解放日报》就组文批判该局其他领导人为“思想老虎”，还动员曹漫之的妻子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揭发其丈夫的“老虎”行为。后来，三反运动又发展到文教系统，把上海市文管会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打成“字画老虎”，并发表社论，批判文化系统认为其是“清水衙门无老虎”的右倾思想。

翻读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解放日报》报道，可谓日有社论，周周有典型，抓住典型连续报道，其势如破竹，有声有色。在《解放日报》所报道的典型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压制批评的批评报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梅芳庭事件”。梅芳庭是上海公交公司的职员，由于批评揭发了公司领导的官僚主义，遭到打击报复，被非法扣押104天。除了把这件事揭露于报端，张春桥还执笔写了社论《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坚决肃清官僚主义作风》，社论指出：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人民政府对于“梅芳庭事件”做了严肃处理，并通过这一事件，有领导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符合党章和党中央有关规定精神的。之后，又连续报道了华东各地处理干部侵犯人权、压制批评的重大案件，如报道淮北盐场工人伤亡事故严重，华东盐场管理局局长等失职人员受到纪律处分，并发表社论《接受淮北盐场事件的教训》，希望工人群众“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的工作人员，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得以贯彻执行”。

《解放日报》还经常发表述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其他省市报纸进行评论，如在“本报述评”中，认为华东各地报纸中《浙江日报》“做得较好”，《大众日报》“虽然有成绩，但显得力度不足”；认为各报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重要缺点是“还不善于选择不同类型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有始有终地宣传透、宣传得彻底”；而《安徽日报》和《青岛日报》则是“做得不好或者很不好的报纸”。述评甚至还做出再不好好检讨，“就要公开点名了”这样很严厉的标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都要坚守两条原则，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办报。《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张春桥任社长、总编辑，受党的领导自然就不用说了，对群众办报，他是

作了充分的发展。他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组建了读者来信组，制订读者来信组的各种规章制度，如《读者来信组工作任务》、《信件处理原则》、《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处理程序》等，为了在三反运动中发挥群众来信的作用，《解放日报》在一版显要地位刊登华东局军政委员会《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与接见人民工作的指示》，“梅芳庭事件”就是群众来信中发现的一个例子，有的“老虎”也是群众来信揭发出来的。当然也有群众来信所揭发的人和事是不对的，读者来信专栏曾发现一位读者来信，说煤建公司无锡市公司领导对批评者公然打击报复，报纸发表这封来信时加了编者按，认为这封来信是抓住了一个活“老虎”，本来要把宣传报道做大，后来查明写信者不是一个好人，也就只好草草收兵。《浙江日报》因没有处理好读者来信而作了检查，《解放日报》作了报道，还配发了短评，向读者提出“揭发批判编辑部工作人员在处理读者来信来稿来访中的官僚主义态度与不负责任的恶劣作风”。

为了提高报纸的监督作用，除了加强社论、评论的写作，《解放日报》于1953年2月又成立了小品文组，负责组织小品文及杂文。小品文和杂文，与社论、评论相比，是报纸的轻骑兵，可放可收，运用自如。张春桥此时要发挥杂文的匕首和投枪的犀利作用，似乎不应该忘记3年前由《文汇报》发表黄裳的《杂文复兴》所引起的一场风波。⁹

1950年4月4日，《文汇报》副刊《磁力》发表了黄裳的《杂文复兴》，这篇千字文主旨很明确：“为了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最重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曾经运用很久，向鲁迅学习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掌管上海意识形态的长官夏衍看了之后，认为这篇杂文的说法不合时宜，担心会引起祸端，要唐弢立即打电话给黄裳，设法补救。¹⁰黄裳虽然作了解释，但也无用，各种声讨之声涌上门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讨论要不要杂文及杂文如何运用讽刺的问题。有的认为新社会也不能没有杂文，有的则认为杂文已经过时了。

在讨论的过程中，正在写《回忆鲁迅》的作家冯雪峰写了长篇论文《谈杂文》，在电台广播及多家报刊发表。冯雪峰认为：杂文由于不能跟时代前进，而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隔离，“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

想在作最后的挣扎”，“这是有害的形式主义的偏见，是一种反人民的态度”。冯雪峰当时是上海文协主席，左派权威文学评论家，而且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给《文汇报》和黄裳定性，宣布鲁迅式杂文的死刑。从此报刊对写杂文噤若寒蝉，这种文体在报上消失了。当时张春桥是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他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因为他也是写杂文的里手，所以才让报社成立小品文组，在报上开辟杂文小品文专栏呢？杂文不但没有死，反而复生了！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毕竟是冒风险的。

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下）

通讯员是报纸工作中一支重要的为通讯报道提供线索、反映情况的信息报道队伍。张春桥到《解放日报》后，通过办通讯员学习班，培养通讯员队伍，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部正、副主任，都要给通讯员上课，讲课内容有：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党报业务方针和通讯员的任务、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写作方法等。《解放日报》编辑部专门向通讯员发了《重要通知》，号召他们以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勇敢地检举和揭发任何一级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中掩盖错误和缺点，甚至捏造事实、假报成绩的行为，党和政府将坚决予以保护和支持。

重视发挥通讯员在报纸工作中的作用，是张春桥早期在上海闯荡期间学习到并确立起来的观念。1936年，上海发起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由邹韬奋倡议，茅盾任主编。¹¹当时来稿有3,000篇，作者上至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涵盖社会各阶层，最后选了490篇，编成80万字的大书。¹²张春桥当时还是一个小人物，受到这次征文启发，写了《论通讯员运动》。¹³文章写道：“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证明了集体力量的伟大。”但是大众“还没有完全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民族革命战争不是有了大都市里的觉醒大众就可以得到最后胜利的，我们需要全民总动员，因而，对于农民大众的教

育和组织工作绝不能放弃。”这样就必须发动通讯员，“把推动救亡运动，发动民族革命战争这责任放在他们的肩上，我想：是可能而必须的。”他还引用茅盾的话，通讯员是“民族的潜蓄的天才”，接着讲了通讯员对报纸、刊物及文化团体的作用，说他们是“推动救亡运动，新文化运动，变革这个社会的积极的力量”。

到了《晋察冀日报》，张春桥得以实践在上海形成的办报观念，此后又带着这个观念到上海。早在入主《解放日报》半年多之前，他就写了一篇题为《目前华东报纸通讯工作的三个问题》八千多字的长文。¹⁴文章讲他检查了华东各报的通讯员和群众读报组工作，讲了新报纸和旧报纸的区别就是报纸的群众性，要做好通讯员及处理好读者来信的工作，批评了不重视通讯员及读报组的几种错误思想，发挥通讯员的作用，走群众办报的路。在文章中，他还为提高编辑记者的新闻素质提了一些要求。他为开门办报，呼吸新鲜空气，着实花了不少力气，也比较完整地、系统地反映出他对报纸工作的理念。

1952年4月5日，《解放日报》编辑部出版了《读报参考资料》，报道基层单位开展读报活动，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以及群众读报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报纸还为基层单位及街道里弄编印黑板报的资料。这样，报纸就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起到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其实，张春桥的这些做法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创造。他青年时期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就到杨浦工人群众中组织读报组、识字班及夜校，教工人识字学文化，以后到晋察冀边区办报，不只是他所在的《晋察冀日报》，边区的报社建立读报组也较为普遍，张春桥只是继续沿用了这些办报方法。

张春桥入主《解放日报》才一个多月时，就提出了要坚持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相互增进的想法，在之后三反、五反的宣传报道中，《解放日报》在许多报道中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想法。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后来就发展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张春桥所贯彻和坚持的报纸“两性”，也是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而长期争论的问题。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对三反、五反的宣传、报道中，张春桥主持下的《解放日报》大胆发挥了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之所以如此，除了三反运动是毛泽东直接领

导的“天助”外，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关。

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两百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了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专门文件。在夺取政权以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有两件最为历史学家所称道事，一是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军进北京城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以致很快失败的事要“引以为戒”。¹⁵另一件就是和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¹⁶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说了一段名言，“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国家才不会人亡政息。”¹⁷

1950年初，中共中央由刘少奇直接领导《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工作。¹⁸经刘少奇作了认真修改后，4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决定》。¹⁹4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并配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论述。次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同时刊发了题为《坚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两篇社论。

刘少奇领导起草的这一《决定》，提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含义是什么？《决定》的第一段文字对这种以报刊为载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界定：“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上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此话说得很清楚，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的现象进行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并且指明这种批评是在“报纸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形式。

此外，《决定》还特别强调了“凡是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就是说，报纸和刊物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须经过党委、政府及其他部门审定，也无须与被批评者见

面，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当然这种独立、自由的决定权，看来是自由，但记者和编辑是要承担责任的，两者是统一的。如果批评违背了事实，就要承担责任，在报上作自我批评。新闻自由民主的空气甚为浓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党的文件中，规定报刊开展批评或新闻舆论监督，应由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亦即报纸的编辑部独立负责。然而在中共的新闻史上，这个黄金时期就像流星般一闪而过了。自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刊工作的决议》下发后，中共党的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类规定。

频频检讨的1953年

在取得了很大成果之后，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宣布结束。然而紧接着，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当时称之为“新三反”。这个“新三反”仍然针对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干部而发。应当说共产党已执政三年，干部中的不良作风和各种思想都表现出来了，党中央还能敏锐地发现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及时进行治理，搞了一次三反不能解决问题，接着又搞了一个“新三反”。

1月13日报道了“反对本位主义”。这时，张春桥感到自己处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夹缝中，过去听华东局的指示较多，听上海市委的意见较少，在《解放日报》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一个报告中，张春桥挑明了《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关系紧张，初步检查了自己对上海市委不够尊重，对上海工作报道得较少。《解放日报》在上海初创时期，既是华东局的机关报，也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虽是受双重领导，但主要是华东局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春桥来《解放日报》后，华东局决定要加强对上海的报道。张春桥的《报告》认为对这个决定，三反、五反期间执行得较好，但对上海市的工作情况，“没有认真地系统地进行”经常性的分析研究，对请示报告的规定“执行得比较差”。上海市委批复并报华东局，表示同意上述报告，并认为“过去市委对《解放日报》的联

系不够密切，对《解放日报》领导帮助不够，也是市委领导及市委宣传部今后应注意之点”，彼此都很客气。

1月20日，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在华东行政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动员讲话，此后，上海市召开了各级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新三反”运动。因为中央指示运动要从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入手。作为华东局、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又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宣传报道的任务。同天，张春桥传达了华东局的会议精神和布置《解放日报》的任务：一、对华东一级、上海市一级及各省市重大事件的批评、检查和督促，指导运动的开展；二、将有关中央一级的材料转《人民日报》处理或递交谭震林。张春桥还向华东局提出：请华东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同志到报社来共同处理读者来信。报社内部则明确各组分工，对信稿中的情况，各组必须在24小时内摘报总编办公室。²⁰

张春桥同时给中宣部写信，提出如何改变目前宣传上“没有路线”的状态，希望中宣部多发指示并加强新闻干部的培养。张春桥的意思是应该把宣传工作提高到“路线斗争”上来。中宣部答复称：你们讨论改变目前宣传“没有路线”的状态，是非常必要的。最近你们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改变，请把你们讨论的结果和最近反官僚主义宣传的经验写来。²¹同时希望《解放日报》和中宣部及《人民日报》多联系，使报纸宣传互相呼应。

1月22日，《解放日报》召开通讯员大会，为了提高会议的权威性，张春桥把华东局组织部负责人请来讲话，动员通讯员“大胆揭发坏人坏事”，“充分揭发党内、政府内不忠诚老实、压制批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等问题。“新三反”的宣传报道一开始，华东局给了张春桥很大权力，张春桥也作了充分准备。在这期间，《解放日报》报道了几件大事，如批评中央某些部门在沪机构的“本位主义”、批评猪业运输公司的“猪仔事件”、批评中国蚕丝公司“干茧霉烂事件”，批评上海市教育局“反对官僚主义停滞不前”、批评“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等。

其中批评“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是这一时期《解放日报》比较重要的专题，从1953年1月19日至31日进行了连续报道。黄逸峰，经济学家，时任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19日一版整版报道黄逸峰压制批

评事件，刊登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的处分决定》。毛泽东知道后作了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后续报道了华东局给黄逸峰定性为“反党分子”，开除其党籍及职务的决定，并发表社论《严惩压制民主，欺骗组织的坏蛋分子，为提高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战斗力而斗争》。20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撤销中共华东局交通部党组的决定》，华东局还在报上发了《关于黄逸峰事件的通知》。“黄逸峰事件”公布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解放日报》收到读者来信来稿六千多件，较平时增加一倍。这一事件的报道持续至4月份才告结束。

张春桥仍然用宣传报道三反、五反的经验来处理“新三反”运动中的问题，但他忽略了“新三反”的侧重点有了变化，是以整顿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为主的。《解放日报》连续、频繁地发表批评报道，使一些护短的领导人吃不消了，便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提意见。这时已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谷牧召集上海各报总编辑开会打招呼，对报界不断升温的批评报道提出了批评，要求各报严格掌握政策和宣传口径。张春桥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阴阳怪气地提些这样或那样的难题。²²

2月13日，一版报道华东局召开汇报会，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在会上，谭震林表示：《解放日报》已公布的事件必须宣传透彻，有始有终。解放日报社应当和华东地区的其他报社保持密切联系并加以指导，充分运用全区的记者、通讯网的力量。重大事件应和当事人开会谈话，以提高办事效率。陈毅也参加了会议，他表示：只要不是盲目乱斗，党和人民一定会给报社撑腰，支持报社的工作。²³

在“新三反”的宣传报道中，报纸得到读者的好评，《解放日报》的发行量迅速上升，达到16.3万余份，超过发行计划。当时的新闻纸多从国外进口，每家报纸的用纸都定量限制，供不应求，报纸的发行量不能超过用纸计划，因此华东新闻出版局就此下文，指出《解放日报》的印数超过用纸计划是错误行为。这次作检讨的不是发行科长，而是总编辑张春桥写了书面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报纸刊登的一些群众来信没有经过实地调查核实，由于不准确、不真实带来许多矛盾，甚至使一

些单位的内部矛盾激化，上海市委对此意见颇大。

3月5日，正当《解放日报》宣传“新三反”热得无法自控的时候，陈毅、谭震林、舒同召集报社正副总编辑和全体编委会成员，就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宣传作了指示。谭震林认为，不能把反官僚主义斗争当作孤立的运动，要择其主要的和可以解决的问题加以揭露，否则效果不好。上海已经发表的猪仔等事件，这么大的资金量，企业的能力有限，工作中出现差池也是难免的。公开报道要慎重，编发内部情况也要慎重。陈毅指出，报社的同志就像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即要小心谨慎地割去腐败的疮疖，又不能伤了健康的肌肉。

4月10日，张春桥就《解放日报》在开展“新三反”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向华东局作了报告。华东局宣传部及上海市委认为该报的工作“主要是报纸上的宣传缺乏明确的路线”，“对应当拥护的或应当反对的，缺乏明确的态度和坚持到底的精神”。²⁴

4月25日，华东局举行扩大会议，总结“新三反”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陈丕显终于沉不住气而变脸了，在会上对《解放日报》提出严厉批评：一、把党委和干部的自我检讨写成报纸揭发；二、记者认为党委修改了稿子就是不深刻；三、报纸的内部参考打了一批好人好干部；四、报纸与市委关系不正常；五、批评市教育局的稿子没有首先通过市委。公布黄逸峰事件，报纸受到表扬，张春桥小资产阶级情绪冲昏头脑。

4月29日，谭震林作会议总结，批评张春桥违背中央指示和华东局规定精神，在所谓揭发“官僚主义”的报道中，不调查、不核实、不请示，指出：表扬好的，批评坏的，都必须与党的步调一致，决不允许乱来。²⁵张春桥虽然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但在谭震林、陈丕显眼里，他还是资历很浅的小人物，带着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知识分子。

5月4日，《解放日报》社举行社委扩大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华东局扩大会议对报纸工作的意见。决定将报社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计划及内部报道计划同时作了调整。6月9日，将调整后的计划上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拟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澄清左的情绪，以便正确贯彻“新三反”的报道；二、彻底纠正不尊重党委、与各部门关系不正常的现象及各种

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本着“边反边建”的方针修改若干旧有的制度，以保证领导作风的改进，提高报社工作水平。

报社领导首先是张春桥作了检查，然后编辑部各组都作了小结，着重检查左倾情绪，以及与党委的关系、群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期间，舒同主持了报社党委会议，讨论华东局扩大会议后，报社和党委还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张春桥汇报说：目前发现的问题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要多。扩大会议后，好的方面是发表文章慎重了，但不足的方面是消极情绪增长了，主动建议批评某项工作的没有了。舒同则认为，扩大会议后，报社思想上尚未彻底解决问题。本质上和上海市委的关系更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个时期后会更坏，应该严重注意这个问题。²⁶

《解放日报》开始“降调”并做自我检查。张春桥检讨的重点是在1953年初《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评稿件，存在许多左的错误：在抓“大牛”的思想支配下，不讲政策，不讲道理，对干部所犯错误缺乏调查研究和周密的分析，没有区别错误的性质和程度，这样就伤害了一部分好同志，打击了一部分错误不是那样严重的同志。张春桥的检讨应当是触及到了当时报纸的实际情况的。

对在“新三反”运动宣传中的狂热性和主观片面性，张春桥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骄傲情绪引发的。这里，一个不变的、程式化的张春桥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他的这种情绪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坚持左的路线没有变，左倾的思想根源没有变，写检讨的方式也没有变。当年他主持《晋察冀日报》宣传土地改革中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思想、在他主持《新石榴日报》宣传“讨债复仇”的极左的路线，以及主持《解放日报》在“新三反”运动中“抓大牛”、“打活老虎”的左倾做法，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变化。在这三次宣传工作中他都为其左倾做法写了检讨，他写的三个检讨都有“骄傲自大”、“不尊重领导的意见”的自我表现，检查思想根源都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观性和狂热片面性”的“个人主义情绪”。这时的张春桥还是愿意写检讨的，而且像小学生一样，说受到批评，“变得老实些了”。

新闻界有一句行话：不作检讨的总编辑，不是好的总编辑。这是因为报纸总编辑和政府官员不同，对同一事件，由于双方的出发点不同，政府官员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报纸总编辑会从新闻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许更能接近实际一些。这种不同看法的结局，总是以报社总编辑作检讨而告终。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新三反”运动中，特别是对反对官僚主义的宣传及发表大量的群众来信，使陈毅、谭震林甚为不满。领导干部一变脸，报纸总编就检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办党委机关报的常规。这次也以张春桥作检讨而告终。这时结下的恩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又一次爆发出来，张春桥抓住陈毅、陈丕显不放，结果发生了以谭震林、陈毅为主将的元老派大闹怀仁堂事件。

这一年，张春桥还做过一次检讨，原因是《解放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0月1日国庆社论出现了问题。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目标而奋斗》的社论。9月30日晚，新华社发出这篇社论通稿后，马上又发来稿签告知全国各报，《人民日报》社论有修改。然而，10月1日的《解放日报》已经印好运出，刊载的是《人民日报》的未修改稿的社论，发往全市、全国、全世界……于是，《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出现了两个版本。事后，经华东局宣传部几次查问督促，张春桥作了检讨。

处理新华社稿，对报纸来说是件很头痛的事。新华社常把电讯发出后，报纸已经采用、编排，待要出报的时候，领导人的主意变了，新华社也要跟着变，会突然发出改稿的稿签，使报纸已经拼好的版面拆掉重拼。有时改稿签发出得较早，改稿又不来，报纸只好等在那里，除了副刊，其他新闻版面都不敢拼，因此延迟出报时间，本市读者在出门上班前就不能及时看到报纸，发行到外地的报纸赶不上火车，往往要第二天才能看到。所以新华社改稿是报纸最头疼的事情。新华社与报纸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个别现象。

苏联之行

1954年1月，以邓拓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张春桥和代表团15位成员随同前往。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1月5日、6日分两批从北京出发，3月3日回到北京，前后将近两个月。他们在苏联访问期间，主要任务是学习《真理报》的工作经验。同时，他们还访问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个报纸和新闻机关，也访问了工厂、农庄、博物馆和大学。会见了苏联作家，看了艺术表演，还两次拜谒了列宁、斯大林墓。张春桥用笔一向勤奋，所到之处都要记笔记。

做客《真理报》，他就感到像在自己的报社那样，尤为亲切，和那里的编辑、记者在一起，就如同兄弟。记者中有知识广博的学者，有夏伯阳师的英雄战士，有普通农民出身的农业专家和牧童出身的工业专家，有各方面的熟练工作者。特别是和来自夏伯阳师的英雄战士记者接触，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1930年代在上海读苏联文学所接受的影响。他那时读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夏伯阳》，不只是想做夏伯阳师的一名战士，更想做夏伯阳师政委克雷奇科夫式的人物，那时年轻，是在幻想中生活。

《真理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也成为他们交谈心得的重要话题。回到上海后，张春桥在5月5日写下了《工人报刊的榜样》长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他为《真理报》唱赞歌，称《真理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真理报》的名字“像我们工人阶级本身一样，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一样，是那样鲜明、坚定、忠诚、朴实。它像一团烈火似的给人民以温暖和力量，而给敌人的则是冷酷和毁灭”。

他们还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专访了波列伏依，和作家们谈报纸与文学、作家和报纸的关系等问题。波列伏依是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写过《真正的人》、《斯大林时代的人》和《论特写》等著作。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中国新闻记者都产生了影响。张春桥说，波列伏依是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人：一见到他就感到像一个老朋友似的亲切；像见到他的作品就不能不读下去一样，你绝不会感到疲倦。²⁷

他们和波列伏依讨论的重点是特写的真实性问题。波列伏依以写人物特写见长，在所作的特写中写了许多细节，富有文学色彩，因之使人怀疑作品有虚构的成分，中国的新闻记者，一般不采用他的那种写法。波列伏依谈到他的作品《我们是苏维埃人》和《斯大林时代的人》，前者有16篇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方；后者有26篇写的是真人真事，有的还有画像。有些地方，为尊重主人公，才把人的名字改了。就特定的真实性问题，波列伏依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写真人，就不能扯谎，无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我的同行说：如果把一个人写好一点不要紧，写坏了就倒霉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是个整体，你如果把一个写得太好了，也会受指责。”波列伏依讲话中的这个道理，张春桥是亲耳所听，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

在张春桥写的《访苏见闻札记》中，有一篇《人——骄傲的称号》。他说他在访问莫斯科大学时，忽然想到了高尔基的这句话：“人，确实是一个骄傲的称号。”苏联的高尔基就是中国的鲁迅，都是文化圣人。张春桥给予“人”的概念：第一是热爱劳动。他在文章中写了苏联人用劳动建设了莫斯科大学，用劳动建设了强大的农业和工业，用劳动发展了科学技术。这种劳动创造，“是资产阶级想也不敢想的”，“在中国，资本家也重复着他们先辈的活，说什么如果废除了私有制度，人们就要懒惰起来”。张春桥当时还无法看到：公有制的确是要出懒汉的。不但出懒汉，而且养活懒汉；第二是人可以享受读书看报、穿着打扮的权利。他看到苏联人有读书看报的习惯，而且上班穿着和下班的穿着判若两人；第三是人要富裕。张春桥在文章中认为富裕也是人的权利。但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贫困，而是集体的富裕，共同的富裕。张春桥看到苏联人买东西排成长长的队伍，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排队并不是坏事，在旧社会，越排队越贫困，所以排队是坏事；今天，有时我们也要排队，但是我们越排队越是富裕起来了，所以排队是好事，多排几年队，就排出社会主义来了。”概括起来，张春桥所说的“人”要具备三条：劳动、自由、富裕。

张春桥发出这样的感想，即使在当今的认识条件下，也会令人感到奇怪：排队购物能是富裕的表现吗？排队能排出社会主义吗？“排队购

物”是很容易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清楚的，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群众在心理上产生了恐慌感，恰是所谓社会主义的一种病态，带了病的社会主义，当然无法生存下去。

在苏联两个月，给张春桥最难忘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告别酒会。2月27日晚上6点30分，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像中国一样，正值下班高峰期，平日宽广的高尔基大街，好像突然变成了小胡同，排满了汽车，车速很慢，像缓缓的流水。直到7点15分，他们才到达克里姆林宫。进去时宴会已经开始了。长长的台子两边坐满了人，主人安排他们坐下来。平时感情不大外露的张春桥，内心里在喊着：“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²⁸

回国后，张春桥在报社介绍了访苏见闻，着重谈了如何学习苏联《真理报》经验的问题，发了一通感慨，说新闻事业要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作家要敢于揭露社会阴暗，作家们要去与提篮桥监狱里关着的人，与三教九流交朋友，要多一些民主自由。

接着他写了一篇《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4月22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出。张春桥在文章中介绍《真理报》的经验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报纸工作的一个不可破坏的原则，这是苏联共产党为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消除资本主义的残余，为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没有限制的，涉及到生活各个领域，在苏联已成了生活习惯。苏联报人常说：“没有讽刺小品，怎么办报？”张春桥在文中着重介绍了苏联《真理报》的这个经验。用论文、通讯、记者来信、漫画等多种形式进行讽刺，它的特点是一定要有笑；笑有微笑、嘲笑、愤怒的笑，根据讽刺对象不同选择不同的笑。张春桥还介绍了《真理报》与党的关系：一方面要在党委领导下独立负责地正确开展批评，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不能堵塞言论，要欢迎、接受和支持报纸的批评。

新中国诞生之后，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新闻事业也不例外，苏联只有一个通讯社——塔斯社，中国也只有一个通讯社——新华社；苏共中央有关机关报——《真理报》，中共中央有关机关报——《人民日报》，其他如新闻审查制度、审稿制度、报道阴暗面问题、报纸讽刺问

题，以及报纸没有社论，缺少小品文等问题，苏联和中国都相差无几，连苏联文学圣人高尔基都感到与苏联新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没有思想自由，曾一度移居国外。而张春桥到苏联只作了几天的访问，居然用别样的眼光看到了苏联的新闻自由，和苏联新闻工作者讨论小品文问题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是不是他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官僚主义反而受到批评，却在苏联寻到了心灵的感应？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写对苏联新闻界的观感，表达自己对新闻自由的渴望？

马达曾对笔者说：“张春桥介绍《真理报》经验是很有心计的，他对别的问题语焉不详，要宣扬报纸开展批评的问题，对于当时在城市办报缺乏经验的报界来说，起着有害的误导作用。”马达说：“张春桥到处宣扬：《真理报》是苏共中央报，它的权威性，就是在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可以批评一切。说在《真理报》受批评的人，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出公开检讨，不公开检讨就要受党纪处分。还说，如果《真理报》批评错了，也不需要更正。因为《真理报》是代表苏共中央的。”马达说：“他还鼓吹奥维希金的特写，这些特写都是批评性的，文字很俏皮，批评的真假难辨，因为夹杂着很多有夸张成分的文艺描写，事实中又有虚构情节和作者的议论。这种批评性的特写，把对人对事的严肃批评，或与经过剪裁的形象的文艺作品，造成许多混乱。”²⁹

张春桥访问苏联的时候，马达担任《劳动报》总编辑，《劳动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工人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办报宗旨主要是歌颂光明主旋律，对工人进行正面教育。再说马达是生活在解放区，从报纸通讯员、记者到一个行业报纸的总编辑，办报的视野不像张春桥那样广阔，更没有张春桥在上海奋斗的那种经历。他认为张春桥主张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是“起着一种误导作用”，“造成许多混乱”，是代表了官方的一种观点。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著名记者，在写作上都借用波列伏依、奥维希金的写作方法，写出了许多特写名篇，对改变当时所谓革命传统通讯的写作方法，推动记者深入采访，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读者欢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马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期间，办报观念和1950年代完全不同了，有时还能和主流舆论保持距离，把《文汇报》办得有声有色。

张春桥访问苏联回来不久，9月7日编委会就传达了华东局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后报道方向以“上海为主兼顾华东”，党的领导和组织关系也从华东局转给上海市委。张春桥以报社编辑部的名义向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了报告：今后各项宣传工作主要应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出发，更多的组织上海作者写稿，逐步增加上海报道的分量，减少对华东的宣传。从此，总编辑张春桥也结束了双重领导下生活在夹缝中左右为难的苦恼。

说实在的，张春桥青年时期在上海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那个“自由世界”对他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他根深蒂固的思维意识，就是被别人屡屡批评的，他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使到了延安，他还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革命根据地的一切，虽然在党的培养下有所改变，可一旦环境适宜，那种旧有的意识又很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晋察冀发表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评论，表现出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留恋，发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同的声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新闻自由”，对他的影响尤深，这时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忽左忽右，还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在报纸工作中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导致了推行极左的宣传路线。而张春桥主张报纸要独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排除有左倾思想，但更主要的还是在发挥报纸舆论监督的社会作用，和报纸是“党的工具”、“政府的喉舌”的传统办报思想有些背道而驰。这并不奇怪，这是他坐在报纸总编的位子上所具有的想法。

研究张春桥人生和思想的历程，在《解放日报》工作的阶段是不可忽视的，且看他的思想以后是变还是不变？如果变又朝着哪个方向变？经历了“新三反”运动，张春桥受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批评，写了检讨，他是带着满腹心事去苏联访问的。从莫斯科回北京的途中，他向邓拓谈了在上海报社工作的苦恼，希望取得邓拓的帮助，把他调往北京。邓拓为了照顾这位《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应允为他想办法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三反、五反运动中，张春桥和中宣部有几次工作上的沟通，中宣部的领导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很快就下了调令，华东局也答应放他去北京。

张维维向笔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的行李都捆好了，因为北京天气比上海冷，妈妈还为我们做了到北京过冬天的衣服。到要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托运时，爸爸突然又不走了。后来听说是陈毅向潘汉年打了招呼，说张春桥还是留在上海吧，不然北京会说我们小气，容纳不了从华北来的八路军干部。当时上海主要是三野新四军的干部为多，北京是晋察冀八路军的干部多。爸爸虽然留下来了，陈毅、谭震林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在三反运动中，《解放日报》报道的阴暗面太多了。

批胡风，初识姚文元

从山东到上海，从上海回到山东；从山东到了延安，去了晋察冀，又从晋察冀到了上海；这样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谁是张春桥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又和谁成为了知己？即使让他自己掰着指头数数，恐怕也说不出来。张春桥留了下来，继续主持《解放日报》工作，接下来就是开展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张春桥发现了姚文元。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由此结下了师友加同志之谊，荣枯与共相始终。

胡风原名张光人，作家、文艺理论家，1930年代，曾在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与鲁迅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内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建国后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的理论批评，主要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1952年，文化部长周扬组织文章，对其进行尖锐批评，而他们的矛盾则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上海时期。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因长达三十万言，故又称“三十万言书”。在报告中，他批评了“少数几个文化官员”，认为他们歪曲了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这份报告是胡风对此前所受批评的回击，但在当时，毛泽东正信任、重用周扬，倚仗他协助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而胡风计不及此，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

向了毛泽东，自然不会被毛泽东所容忍。12月，毛泽东在周扬提交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上，批准了对胡风展开批判。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2月11日，新华社报道了这次会议。北京文艺界开了批判胡风的会议，上海文艺界也积极行动起来，在文艺会堂举行大会，批判胡风的思想。当时年仅24岁的姚文元在会上发言，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1931年生。他的父亲姚蓬子是1930年代小有名气的作家，担任过左联执委，姚文元刚刚周岁的时候就曾被他带去看望鲁迅。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一次被捕后叛变。在父亲的熏陶下，姚文元很小就善于舞文弄墨。他于1948年入党，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党委做宣传工作。由于父亲的关系，姚文元是认识胡风的。他读过胡风的著作和杂志上的文章，对《论现实主义的道路》特别有兴趣，对这位“文艺理论大师”有着几分尊敬。1954年，他开始写一部名为《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稿，对其大加赞颂。然而不久，风向大变，胡风受到批判，姚文元的书稿幸亏还没有公开，经过一番大增大删，他竟然将本来歌颂胡风的书稿改头露面，一变而成了批判胡风的文章。从这件事上，已经能初步看出他善于见风使舵的本领。在经过改组的《文艺报》1955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姚文元发表了这篇名为《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胡风“已经站到反党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胡风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刘雪苇以及编辑耿庸、罗洛、张禹、张中晓、何满子都是胡风的朋友，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新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元化在1950年代和胡风的关系就不错。³⁰ 1951年，彭柏山还提议胡风担任华东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遭到婉拒。胡风写“三十万言书”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贾植芳和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又积极提供材料。

可能是由于这多种原因，上海文艺界对胡风的批判处于温吞水的状态。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他们大多不以为然。

即使迫于形势，写了批胡的文章，也是避重就轻。如在《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的王元化《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彭柏山《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两篇文章不只是标题几乎一致，就连内容也大同小异，只从学术的角度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作了批判。³¹ 3月29日，《人民日报》把王元化的文章作了摘要，把标题改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后来，彭柏山、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分子”时，这几篇文章也就成了他们的罪名，被说成是相互配合，掩护胡风的假批判。

张春桥于2月17日举行了《解放日报》编委会会议，讨论对胡风的批判问题，但进展也是缓慢的。张春桥想打破报纸上对批判胡风宣传的冷清局面，想起了在文艺会堂批判胡风大会上发言的那个年轻人，认为可以予以利用，于是就把姚文元请到报社一谈，提出把他的发言，稍作整理，在《解放日报》发表。

这也是二人的第一次合作。一开始，姚文元告诉张春桥，批判胡风的会刚散，发言稿就被《文艺月报》要去了。张春桥没有让姚文元为难，只是要姚文元拿回发言稿排印出来的小样，他看了以后，决定另起炉灶，像老师教学生那样，告诉姚文元如何把文章中的观点生发开来，采用上海老派文人“一鸡多吃”的写作方法，把一篇文章化成或写成几篇文章。姚文元虽然写过不少文章，但都是篇幅不大的豆腐干，还不知道如何把一篇文章生发变成多篇文章。

但姚文元在做文章上是聪明的，很快就学会了张春桥教的“一鸡多吃”法，所写的文章也就一生二，二生三了。张春桥对培养姚文元是舍得花心血的，他常和姚文元讨论文章的立意、要点及每一篇文章承载的内容。这种传承方式后来一直延续了下去，他们在文革小组讨论文章也是这种情形。据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向笔者介绍，张姚每参加会议讲话，两人都要相对而谈，先讨论张讲什么，姚讲什么，各人在纸上记下论点，写出提纲式的讲稿，然后再相互交换看过、讨论、再修改，最后写成的发言稿就有十几张稿纸。胡鼎钧还说，他们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写，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³¹

经张春桥的指点，姚文元茅塞顿开，回到机关，废寝忘食地写起了文章，从3月15日到6月3日，姚文元写了批判胡风的六篇长文，

一篇一篇地出现在《解放日报》的版面上：《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主要论点》（3月15日）、《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一》（5月7日）、《胡风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二》（5月9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三》（5月11日）、《给胡风两面手腕以十倍还击》（5月17日）和《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6月3日，原载《人民日报》）。此外，姚文元在文艺会堂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以《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为题，刊载于1955年3月号的《文艺月报》。

5月11日，毛泽东为周扬呈送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撰写《编者按语》，亲自将胡风及其同伴定为“反党集团”，并对周扬说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此后，胡风本人及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们纷纷被捕。彭柏山也在其列，成为卷入胡风集团案中地位最高的干部。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将毛泽东写的那篇《编者按语》以《人民日报》编者名义发表。对胡风的批判，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提高到了“反党集团”（自6月10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已经不再是姚文元所说的“反党立场”了。

从6月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被逮捕、隔离审查，停职反省的有200多人。胡风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文革中，已出狱的他再度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出狱。因之受到牵连的人们，也遭遇了和他相似的命运。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务，1985年6月逝世。

在批判胡风运动中，由张春桥所作的精心策划、报纸版面的精心安排及发表时间的精心选择，不只是使《解放日报》有得风气之先的气势，改变了原来的冷清局面，姚文元也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成为一个“批判明星”，同时给《解放日报》总编辑张春桥争足了面子。如果说

张春桥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意图，观察政治变化的气候和风向，最早应该是从这次运动中在心灵上得到的领悟，也由此尝到了甜头。

而《文汇报》却是到了“还债”的时刻。由于在批判《武训传》时胡风的一些朋友以《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为阵地，向文化界领导人提出批评，那么到了批判胡风已经不再是文艺思想问题，而是发展为反革命的“胡风集团”的时候，《文艺界》的主编梅林也成了“胡风分子”，所欠的“债”当然要徐铸成来还了。³²徐铸成到处作揖，请《文汇报》的老朋友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帮助《文汇报》“还债”，在“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通栏标题下，先后发表了巴金、靳以、周予同等十几位文化界名人的文章。³³即使这样，《文汇报》的“债”还是无法还清，徐铸成又组织人写本报编辑部文章《揭发胡风集团分子在本报〈文艺界〉周刊所犯的罪恶活动》，同时徐铸成本人也作了检讨和自我批判。

批判“胡风集团”结束，徐铸成民主报人思想的一抹斜阳也已退去，他感到步履维艰的《文汇报》无法生存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文汇报》都因跟不上政治步伐而受打压，发表知识分子独立见解的文章被视之为异类，而在批判“胡风集团”时作检讨，则使报纸威信扫地。另一个原因是《文汇报》只有一名共产党员郑心永，他在办报思想上是《文汇报》的追随者，和徐铸成的关系还算融洽，此时来了中共党员张树人，张树人本来只是沪西区教育工会宣传部长，到了报社就认为《文汇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纸，扬言现在的历史任务就是使《文汇报》早日消亡。这使徐铸成为报纸的前途担忧，就向北京找出路。他先和共青团中央谈联合办报问题，未能谈成，又去和教育部谈。本来中央就规定《文汇报》的任务是面向中小学教师，徐铸成和教育部洽谈成功，将《文汇报》改名为《教师报》。他们商定由教育部向中宣部写报告，经中宣部同意，最后由周恩来作决定。这样，1956年4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终刊词》，全部成员迁往北京办《教师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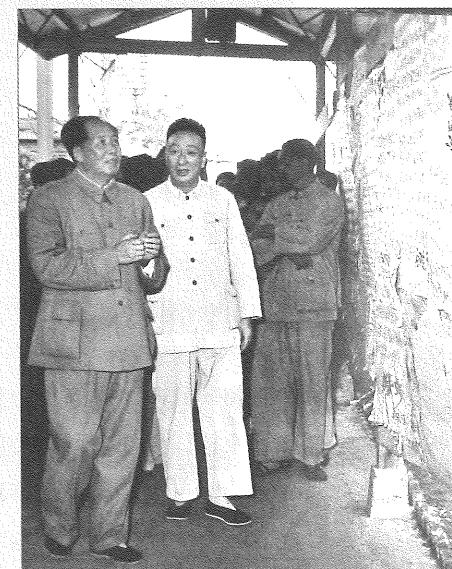
《文汇报》为什么就这样从上海消失了呢？有的回忆文章说是柯庆施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了，因而取消了《文汇报》。笔者为此曾向徐铸成求证，他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心灰意冷，无可奈何！

注释

- 1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解放日报社，1999年版，第49页。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 3 姚溱，记者、编辑，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宣部处长等职。匡亚明，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 4 中共党史称，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6月至8月间进行宗派活动，公开向党要权要官。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1954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
- 5 即潘汉年和杨帆案。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5年两人因“高饶事件”受到牵连，先后被逮捕审查。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 7 王力，时任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后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钦本立，1956至1957年任《文汇报》副总编辑。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 9 黄裳，作家、记者，曾任《文汇报》主笔、编委。
- 10 唐弢，作家、文艺理论家。
- 11 邹韬奋，出版家、三联书店创始人。茅盾，原名沈雁冰，作家、评论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 12 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年。
- 13 张春桥：《论通讯员运动》，《时论》，1936年11月，第一卷第二期。
- 14 张春桥：《目前华东报纸通讯工作的三个问题》，《解放日报》，1951年3月3日。
- 15 郭沫若，作家、学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 16 黄炎培，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曾任中央政府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 18 刘少奇，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7页。
- 20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解放日报社，1999年版，第73页。
- 21 同上，第71页。
- 22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 23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解放日报社，1999年版，第73页。
- 24 同上，第78页。
- 25 同上，第78页。
- 26 同上，第79页。
- 27 张春桥：《访苏见闻杂记》，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
- 28 同上，第80页。
- 29 根据1993年夏马达和笔者谈话记录。马达，曾任《劳动报》总编辑、《解放日报》总编辑、《文汇报》总编辑。
- 30 彭柏山，左联成员，曾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曾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被批评为“胡风分子的老巢”。
- 31 姚文元秘书胡鼎钧和笔者谈话，2013年6月7日。
- 32 《武训传》是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影片，讲述清末山东一位艺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毛泽东认为其宣传反动思想，从195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这部影片的大批判。
- 33 巴金，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主席。靳以，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周予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三章



1957年9月18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
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第三章

走近毛泽东

柯老拉着他朝前走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共事的那些领导，虽然与毛泽东的距离很近，有的可谓朝夕相处，但他们对毛泽东总是有着高处不胜寒的心态。毛泽东对他们也常是居高临下，缺少同志朋友间的那种亲和感。唯独对柯庆施有些例外，很少见到毛泽东批评或训斥柯庆施的资料，而且较早地称柯庆施为“柯老”了。在党内被毛泽东以“老”相称的人不多，有徐老特立、谢老觉哉、董老必武，他们不只是年高，而且资格也老，有的在清朝就取得功名，有的是同盟会的成员，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同这些老同志相比，柯庆施此时年龄并不大，之所以被称作“柯老”，一是因为他入党较早，二是因为他见过列宁，在党内资格也算老。毛泽东称柯庆施“柯老”，柯庆施则是处处以毛泽东为榜样，紧跟毛泽东，甘当毛泽东的“小学生”，在高层领导人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把“小学生”改为“好学生”。把“好学生”的称呼送给柯庆施，含意颇为复杂，不知是赞扬还是讽刺。

毛泽东对柯庆施有着救命之恩，柯庆施心存感激，这倒是历史事实。柯庆施1922年入党，19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战期间到了延安，1943年在整风时遭受突然袭击并被关押，新婚妻子因此自

杀，是毛泽东救了他。1949年柯庆施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又任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53岁的柯庆施被调到上海，他一开始做调查研究工作，直到1955年陈毅调往北京，到6月份他才以继任市委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马达曾评论说：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马达还回忆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副秘书长时所了解的柯庆施：

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那些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与之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¹

1955年8月，张春桥被调离《解放日报》，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任部长。由柯庆施从南京带来的杨永直接替他任社长和总编辑。上海从来都占有中国文艺界半壁江山的地位，但有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在那里管着，新成立的文艺工作部，张春桥一时也插不上手。所以当上文艺工作部部长的张春桥，比当《解放日报》总编辑时要空闲得多，一本

《今朝集》留下了他在这一时段中写的文章。²这些文章分两类，一类是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一类是他写的杂文。无论是讲话或杂文，都充分表现出他前后的变化，不说太远，即使和他任《解放日报》总编时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些不同。前者是一个报人，思考问题还带着报人特色，后者是党的一级领导干部，身为官员，说话作文都带有执政者的特色。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张春桥把作家当朋友，而身居文艺工作部部长的位子时，他对作家的批评却是很严厉的，用他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作家们要过五关，即要过“写了一本书就心满意足”的关，要过“名誉、地位、享受”的关，要过“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工农兵群众”的关，要过“分清是非，辨别敌人和朋友”的关。在《今朝集》中，他把《在新的高潮面前》、《新年的期望》、《把文化艺术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这些文章编为一组，有着为官的特点。

《在新的高潮面前》写于1955年11月，还有一个副题《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五十周年》，这篇文章是为了配合《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高潮》的序言而写的。在文章中，他除了无条件地肯定了列宁的“党的文学事业应当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论断，还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这种提法在张春桥以前的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研究张春桥思想的发展，他的《在新高潮面前》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和1943年他在晋察冀边区时写的《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有很大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那时他还提出要尊重作家的人格及作品的风格，这篇文章的立场则完全站在左倾一边，对作家进行鞭挞了。

而时隔一个月，为迎接1956年元旦作的《新年的期望》，文章的口气要温和了许多，指出当时新书出的少，孩子们的读物也不多，剧场剧目不丰富，总是《梁祝》、《白蛇传》、《西厢》，新的电影也不多，画展及音乐会的次数很有限，特别是适合工厂、农村、部队的剧本、歌曲作品就更少，他写了这些，感到“心里很沉重，我们不能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

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又简称“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一次会议上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³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文稿，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陆定一的这篇文章，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公布了“双百方针”。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是1956年8月9日张春桥在上海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也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张春桥在报告中认为上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成绩的。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画的问题：比如作画，有人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判定中国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判定中国画的山水、花鸟、草虫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一文不值，一概排斥。张春桥在讲话中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上海中国画院的成立，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并为画家们创造了更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张春桥还提出要解决“观众叫没戏看，剧团叫有戏没人看”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作家不要“坐在宝山喊穷困”。他认为不是“只有描写‘除四害’的东西才有现实教育意义，描写别的生活，描写旧上海、旧社会，描写历史就没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张春桥所说的成绩，还有他在1956年批准为青年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上海作家协会创办了青年文学月刊《萌芽》。

张春桥写的《要像鲁迅那样生活》，和姚文元写于同时期的一篇文章《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的精神》的角度不同，姚文元强调的是批判教条主义，张春桥则强调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寻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对鲁迅精神，他们见仁见智，是由于他们的地位不同，感受也不同。从文章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看，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是存在着差异，两人的水平也不同，姚文元还处于传声阶段，不时摇来摆去，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撰文的精神，张春桥则有自己的定见，不再摇摆，而是紧紧追随毛泽东，按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做事了。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呢？他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1957年4月，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专职常委。此时市委文艺工作部取消了，张春桥部长的职务也自行消失，成为柯庆施的高级秘书。很明显，这是柯庆施拉着张春桥跟着他朝前走。当初柯庆施担任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他们有过较多的接触，彼此比较了解。柯庆施认为张春桥是善于出主意的，就让他担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从那时候开始，柯庆施和张春桥就有着默契的配合。到了上海，比起其他人，他用起张春桥来当然更为得力顺手。

这年年底，姚文元由原来工作的《萌芽》编辑部调到《文艺月报》编辑部，任编辑和理论组组长。柯庆施、张春桥政治地位的提高，为造就他们所理想的姚文元提供了机会。柯庆施的职位高了，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了，听到的事情也多了，这样就形成了柯庆施影响张春桥，张春桥影响姚文元，姚文元影响了自己手中的笔。说得简单明了一些，就是：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一条得政治风气之先的链条，成为上海政治思想及文化战线上的风景线。

电影问题的讨论

为了宣传“双百”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⁵起初让徐铸成去担任总编辑，但徐铸成不肯就位，后改请储安平任总编辑。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文汇报》，他和周恩来等谈及宣传“双百”方针时，说：“这件事，就让《文汇报》、《光明日报》多侧重一些吧。”⁶中宣部决定《文汇报》复刊。徐铸成提出《文汇报》在北京复刊，并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以不直接领导一张报纸为由，拒绝了徐铸成的要求。这时石西民恰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就由姚溱陪同来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他一进门就说：“我来接你们回上海了。”

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⁷这使张春桥、姚文元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们的文章又多了一个发表的重要渠道。应该说姚文元得益更多更大，因为毛泽东在《文汇报》上读了他的几篇文章，对他留下了印象。可以说毛泽东在《文汇报》上发现了姚文元。

1957年2月16日上午，中央在中南海熙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王蒙、李希凡和姚文元，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⁸还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片面性较少。”⁹毛泽东所说的姚文元写的一篇文章，即是2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¹⁰毛泽东赞扬姚文元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很重视，张春桥更是特别高兴，向柯庆施详细地汇报了姚文元的情况。

自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上海市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人士一代名流徐铸成、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吴永刚、石挥等人前往开会，其中就有徐铸成所说的“小八拉子”姚文元。

会议期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与会的部分新闻界代表。他握着徐铸成的手说：“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其他报纸。”徐铸成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办？”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们同意不同意？”徐铸成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¹¹

徐铸成讲到的《文汇报》电影讨论“在上海却遭到围攻”，指的是先是张春桥，后是柯庆施对电影问题讨论的干预和批评。对徐铸成主持的

《文汇报》来说，争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文汇报》诞生之日起，徐铸成就很注意在报上开展讨论和座谈，通过这两种形式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政治的，有学术的，也有生活的，通过讨论把各种意见见诸报端，把知识分子团结在报纸的周围。只不过那时还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也没有这样的自觉。《文汇报》第三次复刊后，发扬了自身的传统，在报纸上开展了许多讨论，如“麻雀是害鸟还是益鸟”的讨论，马寅初发起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关于遗传学”的讨论，还有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等等。

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在报纸版面挂了一条通栏横幅：“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经过一次次批判运动，作家不敢写小说，演员不敢演传统戏，搞电影的也不敢拍电影。《文汇报》开展讨论以后，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讨论中，老舍在题为《救救电影》的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都说说心腹话，想想好主意，救救电影吧。”讨论一段时间之后，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该文对《文汇报》已经发表的24篇文章作了综合性的评述。因此，这场影响很大的讨论，被人们称之为“电影锣鼓”。

讨论开展了一阵之后，时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的张春桥，把《文汇报》副总编辑唐海找去谈话，他认为用“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作为讨论题目，就是不要人家谈电影的成就，只能谈缺点。张春桥接着便提出题目要更换，否则就要把讨论停下来。《文汇报》没办法，只得把讨论题目改成“电影问题讨论”，讨论才得继续进行下去。

其实，“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还是受张春桥8月9日的讲话《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在讲话中批评文艺创作“少种少样、一种一样、千篇一律”，使“书上、舞台上、银幕上描写的东西越来越单调”，结果是“观众越来越不欢迎，上座率越来越低，形成了不能忍受的恶性循环”。从这次讲话，到《文汇报》的电影问题的讨论，时间相距只有三个月，张春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张春桥找《文汇报》负责人唐海谈话之后，《文汇报》又发表电影《武训传》导演孙瑜的文章《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文章认为，电影中常采用会意、暗示、假借、衬托等方法使观众得到政治性的启示。继之又发表了司马瑞的《是前进还是倒退？》，认为孙瑜的文章是倒退，倒退是行不通的。钟惦棐则以朱煮竹为笔名写了《为了前进》，支持孙瑜的观点，批评了司马瑞。这本来是学术之争。可是，张春桥读了司马瑞和朱煮竹的文章后提出：争论可以，但不要一边倒，要组织正面文章。于是《文汇报》就根据张春桥的意见，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又组织文章赞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成就。

后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柯庆施突然向代表《文汇报》参加会议的唐海发问：“你们挂起牌子来天天骂我们，什么意思？”¹² 唐海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文汇报》的讨论进行不下去，准备收场。张春桥得知后说，这场讨论不能结束，《文汇报》要给电影恢复名誉。这样，《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关于《文汇报》的电影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接见徐铸成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实际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¹³

毛泽东说了这番话后的三个月，形势大变，他翻脸不认人，本来被他捧上七宝楼台的《文汇报》变成了右派报纸，总编辑徐铸成被打成右派，组织这场讨论的编辑记者姚芳藻等也被打成右派。

在反右斗争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一时间，党内外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对此，毛泽东一开始是积极支持、鼓励的，但随着运动的逐渐展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非常激烈、尖锐，有些甚至触及中共的执政地位层面，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深疑虑。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第一次审阅时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将署名改为毛泽东，并在“内部文件，注意保存”之后加写了一段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到半年以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¹⁴

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提到右派分子，他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说：“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现象。”¹⁵ 毛泽东的这句话，无疑是一个重要政治信号。这时，毛泽东比较关注上海两家还带有民间性质的报纸——《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由于提倡“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宗旨，很快作了检讨，毛泽东认为《新民晚报》虽然软了些，但没有“黄色”东西，决定放他一马。

赵超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给张春桥留下深刻印象，念念不忘，直到反右派运动已过去四十年，他由秦城监狱转到了江阴，仍然记得这件事。他在家信中说：

说起《新民晚报》，我这里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看到。因为有几十个版，总有一两条可看的。1957年大鸣大放，赵超构放的是报纸要“软些，软些，再软些！”他要的办报自由，就是如此。看看

最近这些天的《新民晚报》，应当承认，确实接近赵超构的方针了，和港台报纸有些相似了。赵公九泉之下应当开心了。

不过，这“软些”也只是说说而已。鸡毛蒜皮，街头巷尾，狗咬人、人咬狗，闹闹轰轰，就算“软”了吗？不说政治新闻，就拿人们称作“报屁股”的副刊来说，确有一些软的，更多的却是软中带硬，或者干脆就是硬梆梆的长文章。比方，这几天登的《金融大风暴》、《世界核风云》之类，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硬问题。¹⁶

毛泽东决定放过《新民晚报》，而《文汇报》就成了靶子。恰恰在这个时刻，《文汇报》发生了一件事情。5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了讲话，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这条电讯导语报道参加这次会见的中央领导人名单，共88个字，毛泽东讲话是155个字（连标点符号）。《文汇报》夜班编辑把这条新闻放在“要闻简报”栏目里。这件事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借题发挥，抡起“金棍子”向《文汇报》打来，于6月6日写了一篇《录以备考——读报有感》，亲自送到《文汇报》。文章说：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钦本立看到姚文元的稿子，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立即发表。

6月13日，毛泽东把他亲自撰写并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交给吴冷西，要《人民日报》于第二天见报。6月14日，该文见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有感》。为了引起各家报纸的重视和刊载，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电讯稿写了按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毛泽东在“本报编辑部”文章中说：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明我们的观点，以供参考。

有几篇写《文汇报》反右派的文章中，涉及到这个情节时都说，张春桥得到内部指示后，打电话给姚文元，告诉姚反击即将开始，上海的目标是《文汇报》，姚文元随即写了《录以备考》向《文汇报》开炮。张春桥有没有把当时中共中央绝密指示告诉姚文元？为了核实姚文元写《录以备考》发表的背景，笔者访问了陆平、黄立文、钦本立和徐铸成。陆平是《文汇报》亲自编辑这条新闻的工作人员，他认为把新闻放在“要闻简报”里，是《文汇报》的一贯做法，而且这条新闻是放在“要闻简报”的第一条，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没有不妥。黄立文是夜班编辑部主任，据他回忆，那天晚上新华社播发这条新闻，后来又重播，其中有毛泽东的讲话。但时间已经很晚，一版已经拼好，大家看了这条新闻，感到不过如此，共青团开会期间，天天有新闻，都放在一版位置。因为黄立文、陆平是当事人，敏锐地感觉到姚文元的文章是冲着《文汇报》来的，对姚文元的文章特别注意，他们记得姚文元的文章写于6月6日。徐铸成、钦本立都回忆说收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引起注意，放了几天没有发表，还是姚文元自己打电话来询问，徐铸成和几位副总编钦本立、刘火子、唐海商量，为了表示《文汇报》的气度，把已经拼好的6月10日《笔会》版面拆了，把姚文元批评《文汇报》的文章放了上去。

可见，姚文元的文章写作时间绝不是在6月8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发表之后，而是在此之前。而且姚文元在文章后面标明写作时间是6月6日。

此时的张春桥也没有闲着，他身居领导地位，除了注意观察“早春天气”气候的一些变化动向，他也在写文章。从1957年3月12日，即从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继续阐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大鸣大放”，到6月10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对右派分子进行还击期间，张春桥主要是对作家讲了一些话，写了几篇文章，内容无非是要作家们深入生活，把根扎下去。

在早春天气的日子里，张春桥写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把根扎深一些》。当时，上海有一批作家、文艺工作者要去内地，张春桥以这种书信的方式为他们壮行，写得委婉动人。他以把根扎在上海还是扎在新生活开始的地方为主题，说了他写这封信的宗旨：“我所说的话，可能都是你们知道的，甚至你有比我更深刻的感受。但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是向你祝贺，二来是表示今天没有到车站送行的遗憾，三来是把我们没有谈完的话继续下去。”接下来他讲了一段“我们都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体会，这就有弦外之音了。上海的作家、画家们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一旦被送往安徽、宁夏等地，肯定不情愿，而且会有怨言，张春桥在这里用毛泽东的话给他们打预防针。

仔细品味张春桥这时期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有的放矢，针对当时知识分子鸣放出来的意见的，他明显不同意那些鸣放意见，只不过他是隐喻的，不是直接的；是婉转的，不是粗暴的；是说理的，不是不讲道理的。5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他的《放下架子》，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人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似乎还在鼓励鸣放，但从6月8日毛泽东发出“向右派还击”的号召开始，张春桥便明确表明立场，和姚文元并肩作战，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斗整体了。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张春桥用各种笔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部分文章作一番排列：《论“雅量”》（6月15日）、《从“借东风”说起》

（6月22日）、《“今天天气……”》（6月25日）、《“乌鸦”新证》（6月25日）、《陈仁炳“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6月28日）、¹⁷《质问彭文应》（7月19日）、¹⁸《从盛夏想到锄草》（7月28日）、《杂谈帽子》（7月30日）。这些文章大都是千字文，也有的长达数千字，都是对右派进行还击，痛斥右派言论的。此外，他还执笔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论算旧账》，6月14日刊出，也是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

《论“雅量”》是针对《文汇报》的一句话而写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评论；隔日，《文汇报》用一则消息的小标题说：“发言的人难免有过火之处，相信党中央是有雅量的。”张春桥抓住这句话，在文章中从蒋介石讲到葛佩琦、陈仁炳、王造时，又从宇宙本体讲到人类社会，旁征博引，嬉笑怒骂，在尖刻中又稍带一些俏皮，行文落笔似有毛泽东的文风。¹⁹这不由使人想起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九天九地”之争。²⁰在当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认为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两者有九天九地之差，形成了较大的城乡矛盾。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二人在会场上争论起来，梁漱溟希望毛泽东能有些雅量，毛泽东反唇相讥，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梁被剥夺了继续争论的权利，遭到批判，被迫认错。时间相隔四年，情景如出一辙。

《从“借东风”说起》一文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攻曹营的故事，批评右派分子到处“放火”，右派分子只要“放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光”，但右派分子不是诸葛亮，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日子，“把火烧到右派分子身上了”。

《“今天天气……”》批评了一些报纸，“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今天天气……’的兴趣高涨起来了”。批评报纸“几乎成了天气预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还处于“钓鱼”阶段，敏感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早春天气”，对这种摸不透的政治气候，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是“春寒”，是“乍暖还寒时候”、“乍暖还寒晴复雨”、“春寒料峭”等等，张春桥在文章中对知识分子的感受进行了鞭挞。

《“乌鸦”新证》虽然只有千字，也是张春桥的重点文章，是批评《文汇报》发表徐仲年《乌昼啼》一文的，是一篇挖苦、讽刺的典型文章。²¹

他给徐仲年的考证作了一点自认为粗浅不堪的注释：“‘乌鸦’徐仲年，系政治动物；在台湾‘四大家族’的屋檐下，华尔街老板的花园里……均有‘益鸟’之誉；‘鸟’昼‘啼’者，向主子们报喜也。然后，张春桥把徐仲年和葛佩琦联系起来，说‘少将’葛佩琦去‘杀人’，‘乌鸦’徐仲年来‘啃尸’，并在文章最后开骂，‘乌鸦’，就是这样无耻，这样恶毒的动物。

《陈仁炳“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是张春桥这组文章中的重点文章，全文长达6,097字，把陈仁炳的“另一条道路”归结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把陈仁炳的言论概括为“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即打击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火烧基层”论（即到基层单位去放火），“大病重治”论（即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太严重，要采用重治的方法）。

张春桥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或者说上海右派分子的言论惊动了毛泽东。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点了上海右派分子的名：“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²²接着又不指名地说：“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鸟‘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嘛。”²³毛泽东点名的右派分子名单中，陈仁炳、彭文应、徐仲年，都是张春桥写了专文批判过的。在文革之后的右派分子改正中，陈仁炳、彭文应均列名没有被改正的中央级五名右派分子之中。这就表明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张春桥对陈仁炳、彭文应的批判并没有错。

张春桥说自己不喜欢用笔名写文章，也不尽然，这些以各种笔名写的反右文章，不用再做猜谜笔名考，他都收集在1958年出版的《今朝集》中。张春桥为什么把这本集子题名为《今朝集》？他在《序》中写道：

正因为右派分子叫喊“今不如昔”，他们愈是这样叫，我们愈是喜欢他们痛恨的这个“今”，痛恨他们喜欢的那个“昔”。我才喜欢“今朝”这个名字。至于说到我不想向读者掩饰自己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内心多么不安；面对着我们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事

业，面对着我们伟大的成就和灿烂的未来，我所写的是这样一些粗浅的杂感。²⁴

上海的反右派斗争是在市委书记柯庆施直接主持下进行的，他的两位助手，一位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一位就是张春桥。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名，像上海这样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共划出右派分子15,419名，占不到全国总数的3%。在这些右派中，有一大批是优秀人才，但也有一些人被所在单位定为右派报到市委请求批准时，市委投了否决票。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一位是翻译家傅雷，在讨论要不要把他划为右派时，石西民认为傅雷在国内外都是有影响的翻译家，不应把他划为右派，但柯庆施坚持要把他定为右派。按他当时的表现还真不应该被划为右派。3月间，傅雷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很动情地写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还收录在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官方对傅雷家书还是认可的，认为傅雷对共产党还是赤诚的。²⁵

巴金也是上海市委讨论的是否要划为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柯庆施认为巴金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在报上写杂文，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应打成右派。陈丕显则表示可划可不划，石西民持坚决不同意的态度，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时表现亦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庆施才作罢。

《劳动报》总编辑马达，上海市总工会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和副总编辑唐海，《文汇报》党组织认为许多反动文章都是经他们两人签发登报的，他们应该是右派；还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冯岗也被定为右派上报，石西民替他们几位作了解释，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
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²⁶

为他们作解释的不只是石西民，还有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倒台之后，陈臻对好友江南说：“张春桥还是做了好事，1957年反右派时，

保护了马达。”1957年，陈臻是全国总工会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上海总工会下属的《劳动报》总编辑马达属于他们领导，上海总工会整理了马达的右派言论先报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陈臻受委派来定马达为右派。他和张春桥曾是《新石门日报》的同事，到上海后，他先去拜访了张春桥，说明来意。张春桥赞扬了一句：“马达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也勤勤恳恳工作。”并邀请陈臻参加上海市委对马达的定性会议。开会时，张春桥没有明确表态。柯庆施说：“我看马达就不要划为右派了，如果把他划为右派，他后面有一批人都要倒下。”陈臻对江南说：“马达没有划为右派，其他几个人也就过关了。”²⁷

很显然，如果不是柯庆施一句话，石西民、张春桥对这几个人是保不下来的。据当时在市委工作的知情的领导干部回忆，当年上海反右派斗争时，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同时，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也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他颇为诧异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同样

没有划一名右派。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虽然如此，杨西光在复旦大学还是把一些人划为右派。上述几例足以说明，柯庆施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是手下留情的。

上海内定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20多人，不到3%。毛泽东看了以后不满意，于7月9日指示：“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事实，也应组织反击。”²⁸和毛泽东的要求相比，柯庆施等还是保守了一些。

“让大字报流芳百世”

时间进入1957年9月，天凉好个秋，反右派的风雨渐弱，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上海。9月18日会见了《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安慰了一番，然后就去上海国棉一厂看“反右倾、鼓干劲”的大字报，并到22车间转了一圈，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就离开了。

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对他的这次特殊行动，媒体都作为重要新闻进行了报道，并刊发柯庆施陪他看大字报的照片。毛泽东去工厂看大字报，肯定在思考酝酿着新的战略部署，不再是反右派的问题了。党的高层干部都想解释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密码”。

张春桥也是如此，他不再沉默。9月29日，他写了《看大字报有感》，认为大字报吸引人，大字报成了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题目。张春桥在文章中强调大字报的特点：一是大字报简便，随时有意见，随时可以写，随时可以贴，长短不拘，形式多样，只要会写字，或者有人代笔，人人可写；二是大字报是可以普遍使用的，各个单位、每个人随时都可以使用；三是大字报“是一团烈火”，可以烧掉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四是特别强调了大字报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当然是指阶级斗争的工具。

张春桥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仍觉言犹未尽，可能是感到第一篇文章讲得不完整，如果大家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一个单位岂不乱了套？于9月30日一天之中又写了两篇文章，即《看大字报有感》之二和之三，以补前文漏洞。张春桥这时已不再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了，他要补充的是“我们并不提倡轻举妄动，更不承认陈企霞所鼓吹的‘抗上是美德’的谬论”，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把各种大字报上的意见辩出个“是非”来。²⁹他还说，写大字报，写不写，如何写，这里有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这就是张春桥所要补的“漏洞”，对群众写大字报作了限制。

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社会上没有太多的反应。到了1958年3月6日，他又写了《让大字报流芳百世》。他认为写大字报的意义实在重大，那些想写上海历史的人，不论是政治运动史，还是写经济史、文化史、报刊史，只要写到1958年，都应当大写特写，如果遗漏了或少写了，都是一种罪过，应当贴他一千张大字报。张春桥提议，各个单位应把那些写得好的大字报挑选出来，报刊、出版社编辑部门以及作家们，大家齐动手，进行整理，编辑出版，让这些不败的花朵流芳百世！

张春桥感到只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还不够，于是指示上海文化出版社把出版《大字报选》列入出版计划，他还写了序言，歌颂1958年大跃进，说：“1958年的春天，是自己单位发展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样，张春桥不但从理论上说明大字报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从实践中为大字报的兴起和发展推波助澜。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几大秘书，对毛泽东去工厂看大字报的密码，都没有作出破解，只有张春桥体会到毛泽东此行乃是非凡之举，便连续作文，对大字报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作出评论和解释，显现出他对毛泽东看大字报这件事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称为“四大自由”，也简称为“四大”。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除了赞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之外，他自己还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直接向刘少奇发动进攻。³⁰可见用大字报这一武器，发动和指挥群众运动，打倒或惩治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是运用自如。走过了这样严峻的历史阶段，再回过头来看张春桥为大字报所作的推波助澜，不能不承认他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破解了毛泽东的密码。

“你们支持我呵”

1956年，周恩来根据当时经济发展有些盲动的现象，提出经济战线要注意克服保守情绪，也要防止急躁冒进情绪。《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于6月20日发表了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在发表之前，经刘少奇审定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批：“不看了。”实际上，毛泽东是看了这篇社论的，他对内容不满意，又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随手写了这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三个字。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耿耿于怀，一直在寻找反击的机会。但接下来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毛泽东一时无暇顾及此事。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对乘风破浪这句口号特别欣赏，经过他的提倡宣传，大力反“反冒进”，使这个口号成为1958年大跃进浪潮的潮头。乘风破浪是借用南朝宋人宗悫的话“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个口号是怎样诞生的？

熟悉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滨海城市，自她诞生以来，一直是世界列强争夺的地盘，谁都想在上海插一足。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上海的形势有了变化，被视为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1955年以前，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在内迁和维持利用之间徘徊，工业总产值负增长2.8%。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提出“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内地工业”。毛泽东的这一想法，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会后，毛泽东派陈云到上海传达了这一指导思想。³¹柯庆施根据这

一精神，和上海市委一班人，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并分别经过1956年7月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同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从此扭转了上海工业低速增长的局面，步入持续调整增长的轨道。1956年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上一年增长34.25%，高于全国增长28.29%的幅度。1957年又是继续增长的好势头。

上海市委决定，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召开市党代会。柯庆施要在会上作政治报告，组织了报告起草班子，由张春桥牵头。为了写好这篇报告，张春桥作了许多调查，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作了分析，和参加起草的其他人一起，经过多次修改，写下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社会上传说乘风破浪是毛泽东“钦定”的题目，与史实不符。报告定稿后，柯庆施即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要胡乔木、田家英对报告作修改，然后召上海的张春桥、浙江省的陈冰参加修改工作。³²

张春桥在给大女儿的信中，谈到他几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他说：

第二次谈话，却是1958年了。相距将近20年，中间多次见到过，也知道他对我的某些文章的评论，却没有谈过话。³³ 58年初，正在开上海市党代表大会。正月初二，突然要柯到杭州，并且指定要政治报告起草人一道来。在杭州刘庄，他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拿着的就是那份报告草稿。落坐以后，他的第一句话说是：“你们支持我呵！”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奇怪：他怎么提出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当时，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询问起我的家乡、工作，当得知我只是一名市委委员没有具体职务时，脱口说：“白衣尚书”，封了我一个“官”。接着开了几天的会。每天都能见到他，并且边吃饭边谈问题。大家的情绪很高，当总理报告决心15年内修好三峡大坝时，他扳着指头数：“80岁！好，到时候去游泳！”当然谁也没料到出现那么多的曲折，三峡至今还没有出平湖。

从杭州回来，开市党代会。之后就是大跃进了。我是直到10月

才外出看看。刚走到南京，就被叫到北京，从此，就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武汉，亲眼看到他怎样把狂热的空气压缩下来。我常常想，那些嘲笑大跃进的英雄好汉们，是根本不理解1958年的。顺便说一下，你们姐妹都见过毛主席，只有毛弟没见过，可是，他未出生就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了。就是那次杭州之行，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陈丕显指指我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此“一个”就是毛弟。³⁴

报告中说明，上海的经济能得到飞速发展，得益于市委制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对此，毛泽东作了充分肯定，对报告中提出的“鼓足干劲，乘风破浪”的发展前景，毛泽东更为赞赏。报告的结尾写道：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古话，叫做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定能够加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一定能够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赞赏地说：你们这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³⁵

柯庆施在延安受审查时，周恩来曾经为他作过开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无论是从上海经济发展在全国所占的地位，还是与柯的个人关系，周恩来都对上海这次党代会特别关心。他专程来沪参加上海党代会。柯庆施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上海！》的报告送给周恩来审阅。12月20日，周恩来在上海党代会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向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黎明农业社的温室蘑菇养殖场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浪浜小学的师生。中午两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和下乡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庆施在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1958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是经过刘少奇、周恩来审定后发表的。

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并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到《人民日报》的社论《乘风破浪》，他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³⁶接下来，毛泽东对《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作了八处修改，写了批示：“即送乔木：有些修改，请即与柯酌定。今天印发各人。”³⁷

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再次加以称赞，说：“这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³⁸

毛泽东分析张春桥主持起草的这篇报告的环境背景是有道理的。这样的报告为什么不产生在北京，也不产生在其他省市，而是产生在上海？它并不是张春桥拍拍脑子就能想出来的，除了上海的历史背景，还有当时上海经济发展迅速的趋势，它的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指标的许多倍，是这样迅猛的发展趋势，才会使上海人的胸中有一股乘风破浪的豪情，才会有“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迫切愿望。这些都是张春桥在实际调查中得到的，如果他关门写报告，肯定不会感受到当时上海那种春潮涌动的气氛，也写不出被毛泽东称赞的乘风破浪这样的好文章。

但是，柯庆施和张春桥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王牌，用它来反“反冒进”。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³⁹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据说当时毛泽东就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做国务院总理的想法，虽后来未成事实，却也可见对周恩来的不满和对柯庆施的器重。

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并加了编者按：

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和问题的性质，特别是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重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于1956年工作的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编者按所说的《报告》第一部分，是胡乔木修改的，改动比较大，加了两大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也再一次肯定了大字报的作用，并要求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变成一种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

编者按所说的《报告》第四部分，针对上海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三点措施：第一，必须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所有的党员和干部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体同志必须经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的锻炼，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二，要使全党所有干部，密切同基层群众的联系，密切同斗争实际的联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到农村、工厂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工作，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三，要使广大干部做到“又红又专”，成为红色专

家。做到政治和业务的对立统一。既要必须批判不同政治的倾向，使所有业务干部不做迷失方向的专家，同时也必须批判不学习业务的倾向，使所有干部努力钻研业务，成为业务上的内行。

乘风破浪可谓是点中了毛泽东的心意，继南宁会议之后，紧接着3月份召开了成都会议，4月份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广州会议，依然是乘风破浪，宣扬鼓足干劲，严厉批评“反冒进”。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的主题仍然是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胡乔木为刘少奇起草报告稿，思路仍然是按毛泽东自南宁会议以来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

迫于形势，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人都作了检讨，有的检讨甚至是经毛泽东定调子并亲自修改，这种检讨当然是违心的。⁴⁰ 其他的人检讨的检讨，奉承的奉承，随波逐流。国家高级领导层出现了集体性的头脑发热，什么“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什么“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速度”、“赶美超英”等等，大跃进进入高潮，“高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压倒一切，整个中国都陷入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之“理想国”的乌托邦。

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乘风破浪的报告在南宁会议上成为毛泽东的王牌，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概，为推动大跃进的开展扫除了障碍。柯庆施和张春桥真的做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你们支持我呵！”，上海也就成了大跃进的开路先锋。

“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南宁会议之后，3月成都会议，4月武昌会议，毛泽东像老和尚敲木鱼一样以“反冒进”敲打周恩来、陈云等人。5月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以“跃进”代替“冒进”，即提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反

冒进论者就闭口无言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⁴¹ 把反冒进的声音压下去之后，毛泽东便把精力投入到建立人民公社的事情中。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这次会议重点是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而人民公社最能代表他的社会理想，一大二公，全民所有制，吃饭不要钱，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把人民公社提高到权力机构，替代了现行的政权。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吃饭不要钱的理论根据，而是向汉代道教领袖张鲁求助，让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读《张鲁传》，还兴奋地在指导党的干部学习的按语中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⁴²

真是语不疯狂死不休，既然毛泽东唱着进入共产主义理想曲，全国都跟着唱，恨不得一天就进入共产主义。整个中国进入不了共产主义，那一个县能不能先进入共产主义？为此展开了大讨论，那些以县为单位组成人民公社的地方，则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各取所需”，一个县可以先做到“各取所需”，现在的县人民公社，已经可以说是全民所有制的共产主义了。

由于要建立人民公社，谈论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成了重要话题。8月19日，毛泽东指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⁴³ 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⁴⁴ 8月24日、8月30日的会上，毛泽东又多次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

参加了会议的柯庆施回到上海后，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的情况作了传达，张春桥当然也会听到，他于是就按照自己

的理解，于9月10日夜，写出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此文刊登在1958年9月15日《解放》杂志第六期上。其要点是：

一、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人人平等，没有等级制。文章说：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二、人们怀念供给制。

在上海（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

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核心是等级制。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不可取。他们轻视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上海的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帐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

供给制的帐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四、人们攻击供给制的理由。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我们上海某些经济学家所片面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最高的劳动积极性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立刻买到手的。

五、为什么攻击供给制。

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可能性。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1958年6月1日，毛泽东题刊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出版，陈伯达任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田家英任常务编辑，邓力群任编辑。⁴⁵柯庆施效仿《红旗》杂志，中共上海市委也办起了机关刊物《解放》，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任副总编辑，周原冰任编辑部主任，后来又由周任总编辑，把到了右派边缘而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但被罢了官的马达、冯苗、钦本立、唐海等都调到这里任编辑。姚文元也被点名调了过来，任编辑部文教组组长。

由于柯庆施的吩咐，《解放》杂志每期出版后都直接寄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快看到这篇文章。毛泽东看了文章之后大喜过望，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的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考虑加一个编者按，希望能说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复信吴冷西，并把他修改的“编者按”随信附上：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⁴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要位置发表。毛泽东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内容，各地都有传达，因之评论的文章也多篇，不只是张春桥一人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的文章毛泽东也看过。10月1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文章的第五天，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谈谈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读得很认真，而且写了批语。⁴⁷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并不因为毛泽东赞赏，就没有不同意见了。1959年7月，《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撒仁兴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一文，认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说明白”。⁴⁸文章质疑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整个社会范围内，而是在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生活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加上受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对供给制不合理的一部分加以调整，坚持其合理的部分。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这篇文章。如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还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要看几遍，以便研究这个问题。⁴⁹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这几篇文章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这里特意提到张春桥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此文的重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私有制财产的体系，而毛泽东提出的、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在当时是为推动人民公社的发展服务的，是1958年那个阶段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对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路线推行起了加剧作用。由于人民公社的成立，国家财产已经实行公有制，不存在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毛泽东要破除的只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诸如“等级森严”、“以工资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等，这些也是张春桥在文章中所阐述的重要部分。

后来，毛泽东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张春桥也就跟着作进一步阐述，成为“防修反修”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也是造就一个“纯粹”、“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

参加人民公社调查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河南郑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分赴各地作调查研究。张春桥奉毛泽东之召，和陈伯达去河南卫星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工作。在《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之后的第六天，10月19日，毛泽东即给陈伯达写信：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⁵⁰ 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至十天，为郑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⁵¹ 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⁵²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⁵³

过了半小时，毛泽东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一星期即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公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半⁵⁴

毛泽东还指示陈伯达做完卫星公社的调查，到遂平县开几次座谈会，此后还可去附近某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他还派吴冷西、田家英分赴修武和七里营做调查。张春桥奉召到了郑州，据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回忆：“在郑州开会期间，有人把我爸爸介绍给刘少奇，说这是写资产阶级法权文章的张春桥，连‘破除’两个字也说漏了。刘少奇听了，对我爸爸睬也不睬，就从他面前走过去了。我爸爸一直认为是小人物，是做具体工作的，他觉得高层领导人瞧不起他。”⁵⁵ 确实，在刘少奇等国家最高领导层眼里，小记者出身的张春桥算得了什么呢？张春桥对这次赴河南调查，没有留下什么文字，陈伯达有着这样的记述：

1958年10月，毛主席给我写信，要我与张春桥一起到河南省琅琊山卫星人民公社去看一看。我跟张春桥并不熟，但既然毛主席要他和我同行。我只好按照毛主席的安排，与张等一起到了河南。

到琅琊山后，才知道去那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一块麦地，据说特别高产，麦子早已收光了，有些热心的参观者在那块地里挖一把土，带回去做纪念，或是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刚到时也弄不清其中奥妙。过了几天，有一个老头子悄悄告诉说，那块麦地

是有人在夜里把其他田地的麦子搬来堆成的。麦子已经收割光了，事情涉及的人又多，我们初来乍到，要把情况搞清楚还需要些时间。当地干部看出我不高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一时还说不出什么，先批评了他们在伙食上对我们的特别招待。不久，毛主席来电话说不要呆太久，要我们去郑州开会。我们一行人几天后就匆匆离开了。⁵⁶

郑州会议还未结束时，毛泽东于11月6日再次要求陈伯达与张春桥一起“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毛泽东这次发令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传动态》第134期上刊载了一篇《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此文引起了他的注意。

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内容有：“农业生产万斤化”，“水利要实现河田化”。报告还用了顺口溜来表达：“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产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得。”这一报告还说：“丰衣足食。到1960年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他们把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先给文学化了。

这样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典型的空想加吹牛的报告，却令毛泽东大为感动，虽觉得有夸大之处，但仍颇为欣赏。于1958年11月6日写下批语：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⁵⁷

城市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也是郑州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在去郑州开会之前，柯庆施要张春桥就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作了调查，并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11月15日的会议上，柯庆施根据张春桥调查的材料，作了详细的发言，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如怕占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毛泽东听后就指示柯庆施，现在搞一个小组，研究城市如何搞人民公社，现在没有章程，天下大乱。资产阶级和教授等生活资料一概不动，待遇也不降低。⁵⁸郑州会议结束，张春桥即组织人员作了一番调查。不知是否因为张春桥的调查报告起了作用，中央决定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西安八大城市应当放缓。以后城市人民公社也没有搞起来，只搞了几个居民食堂，不久也就解散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把郑州会议称之为“纠左”会议，说毛泽东发现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的地方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混淆了。他在会上批评说：大跃进搞得人民思想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他还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而且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但在即将下发执行的前夕，毛泽东却突然改变主意，要邓小平“还是稍等一下，带到武昌会议再谈一下”。⁵⁹联系到他要陈伯达、张春桥到夸口三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山东范县去看看，这说明他并没有下定决心纠偏，对左的倾向还是有着许多留恋。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范县这样的典型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宣传，陈伯达、张春桥经过调查后向毛汇报，毛也感到范县吹牛太大，遂取消了宣传推广的打算。

毛泽东排除一切阻力建立人民公社，企图在中国创建一个新型社会，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对毛作了支持。当然，毛泽东寻求理论上支持的不仅是张春桥的这篇文章，还有他让陈伯达等编选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要广大干部读这两本书，对后者还组织人和他一起读，并写了读书笔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搞共产主义，并没有完整而认真地读马克思的典籍，而是把普及读物中的一些

知识变成自己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在批注中就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关心的是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要不要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既有现实的建立人民公社的实践，又找到了理论支柱，毛泽东却仍不满足，还要寻找历史渊源，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并写了如前所述的长篇批语。毛泽东理想中的新型社会就是虚幻的乌托邦。

可悲的是毛泽东把他的“乌托邦”理想自认为是真理，而且施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以推行，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而且要全国人民都接受他的理想，为实现他的理想作奋斗，作贡献，作牺牲。真正的理想是不需要用权力去推广的。毛泽东的理想和权力的结合，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从此时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苦难连绵，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大悲剧。一位法国哲学家研究独裁者的心灵，把独裁者比作大艺术家：他确实想画最美最好的伟大作品，独裁者的理想以及所掌握的权力和群众，就是他的画笔、颜料和画布。毛泽东就是一位带有诗人情怀的集权者，他要以权力当画笔，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

也就是从1958年大跃进年代开始，张春桥便以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的形象，生活在毛泽东的幻想中，难怪张春桥后来对批评大跃进错误的学者有些不屑一顾，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大跃进！

“红专规划”和“拔白旗”

就像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那样，1958年的农村公社化、大跃进之风也吹到了城市，除了推动城市工业大跃进，也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大跃进，诸如思想改造的大跃进、科学家研究工作大跃进、作家创作的大跃进、文艺界写戏演戏的大跃进等，

突出地显现了上海大跃进的特点。

1958年2月22日，上海有17位科学家写了一份倡议书《尽快把自己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倡议书提出五点：一、拥护党的领导；二、坚定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三、逐步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矛盾；五、努力学习政治。这17位科学家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都是领军人物，又全都是留学欧美，1949年以后从国外回国的。他们把倡议书送到《文汇报》发表，也不能说他们是违心的行为，不过受形势所迫倒是真的。

这份倡议书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波及到北京。3月16日，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表示：要以最大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早把自己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会后，还在长安街举行了游行。

随之而来的就是“向党交心”。上海的口号是“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快马加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急起直追，改造成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巴金制订了“一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规划，虽然没有做到。他晚年时回忆说：我当时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大业，摘去知识分子小帽！

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处境，正是形势逼人的那个“逼”字。赵超构是“午夜彷徨，把心一狠”，狠什么？就是把心交出来，给自己安上一顶帽子。1958年知识分子交心运动中，有一个右派补课运动，有些知识分子把心交出来了，却成了右派定性的根据，反而成为右派了。

知识分子订的“跃进规划”又称为“红专规划”，红就是政治上的进步，专就是学者专攻，红是统帅，是灵魂。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是中国翻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一人，他1958年3月25日制订出个人“红专规划”，列出多条细则，突出了一个“红”字，以避重业务之嫌。因病住在医院里的画家、翻译家丰子恺，跃进之风吹进病房，他无心静养，写了一副“努力改造自己，永远效忠人民”的对联，贴在病床边。后来他又写了决心书，要完成翻译作品60万言，创作新画80幅。同济大学

的王兴在《有信心，有决心，追上时代》的规划中，还提到柯庆施在《乘风破浪》一文中“所提出的五项要求，作为自己改造的标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次向党交心，订红专跃进规划，都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的，这时的《文汇报》报把大字报搬到报纸版面上来，3月10日，还发表了张春桥推波助澜的那篇《让大字报流芳百世》。翻开1958年的《文汇报》，上面一边登着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决心书、红专规划，表达一年内写多少万字的文章、画几千张画、演几百场戏的决心；一边登着亩产5千斤、1万斤、3万斤粮食的消息，真可谓书香、稻香汇集在一起。不过一个来自知识分子的案头，一个来自农民生产的田头，这是多么值得玩味的情景啊！有“红”就有“白”，有“红专”就有“白专”。这是毛泽东的两点论。

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讲话，提出：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旗子拔掉，换上无产阶级旗子。5月20日，毛泽东就插红旗，辨方向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⁶⁰不知是张春桥得风气之先，还是有预感，和毛泽东心灵相通，就在毛泽东讲破除迷信之前一个月的4月5日，他就写了一篇名为《破除这种迷信》的文章。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之后，就像给左倾火箭加了助推剂，从左走向更左，这就成了反右派运动之后的另一场大规模整肃无辜者的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订红专规划等插红旗的活动迅速地转变成“拔白旗”。《文汇报》奉中共上海市委之命，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拔了四名医学专家的“白旗”，连续发表批判他们的文章。如批判心理学家张耀翔的心理学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假面具”，批判儿科病毒专家高镜朗是冒牌专家，批判妇产科专家孙克基的“洋奴教条”早已破产。

特别是对流行病学家苏德隆的批判。苏德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

卫生系主任，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1949年，解放上海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感染血吸虫，苏德隆向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提出建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兵团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任他为副秘书长。帮助战士们摆脱血吸虫的威胁后，他又全力投入更大规模的血吸虫防治工作。毛泽东到长江大河游泳，唯独没有在黄浦江游泳，就是因为听了苏德隆的建议。苏德隆经过长期研究，使用提取人尿灭螺方法，获得成功，在江南水乡普遍推广，对被毛泽东称为“送瘟神”的控制血吸虫病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学者，上海卫生系统也要拔他的“白旗”，而且批判持续了两个月。在被“拔白旗”的过程中，苏德隆用科学事实进行反批判，始终不认输。

“拔白旗”声势浩大，在上海除了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这四位医学教授外，其他各界都有“白旗”代表人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在音乐史论上的研究多有贡献，因研究作曲家黄自，被拔了“白旗”。黄自留学美国，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奠基人，贺绿汀是他的学生。⁶¹电影《上海姑娘》、《护士日记》、周谷城《中国通史》等许多学者的著作也都被插上“白旗”。⁶²

插“白旗”的政治风浪不只笼罩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并且波及到工业和农业领域。在工业界坚持技术规程和管理制度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行政管理人员被当作“白旗”受批判，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还亲自到鞍山钢铁公司指挥拔“白旗”。山东省从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到地、县、公社及大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4万多人。据全国统计，被当“白旗”拔掉或批判的干部有百万上下。“拔白旗”运动和历次运动一样，使许多好人挨整，无辜蒙冤。张闻天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说：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掉了，现在证明是红旗。⁶³

本来，中国知识分子还守着知识这条底线，以知识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以有知识而自尊。如今把拥有知识看作是“白专”，以“拔白旗”的方式置其于另类，把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也给冲垮了。

庐山会议：从纠左走向更左

由于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狂热，使中国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是红旗猎猎，高歌猛进，一方面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其实毛泽东也发现前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忧心忡忡，多次提出要施以“压缩空气”，对大跃进，他批评说“搞得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⁶⁴“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起一菩萨，然后向他跪拜”，⁶⁵对造假还唱着狂想曲，他批评说：“‘巢湖端起当水瓢’，这是诗，巢湖怎么端得起来？”这里“有些是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⁶⁶但是他只是口头讲讲，没有政策法规，没有可操作性，所以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都是为了纠左，结果走得更远，左倾更为严重。

1958年7月2日，正是热风吹雨洒江天的时刻，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开幕，目的也是纠左。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同时取得“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共识。会议开始时，《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讲“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发展速度太快”，的确表现了纠左的架势，柯庆施、李井泉等人感到有压力，因为他们是被认为左倾比较严重的。⁶⁷

7月14日下午，毛泽东收到彭德怀当天给他写的一封信。⁶⁸陈伯达当天也看到了这封信，他问毛泽东此信是否彭德怀自己写的？毛泽东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陈伯达觉得彭的信文字写得不错，问题讲得也清楚。对陈伯达的夸奖，毛泽东没有说什么。

7月1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给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信分为“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如何总结工作中的教训”两个部分，他在信中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了在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主要的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7月20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主要讲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张闻天认为彭德怀的信“本意很好”，但彭在信中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

个问题不说更好”。张闻天和毛泽东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毛泽东的心态，他认为彭的这句话刺痛了毛泽东。

7月23日上午8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话语中带着一股子气，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河南人民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⁶⁹这次会议本来计划8月1日结束，这时已接近尾声，与会人员以为毛泽东的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就结束了，但突然发生了变故，毛泽东抓着彭德怀不放了。

会议期间，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等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议论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⁷⁰警卫战士把这些情况作了记录。罗瑞卿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看了记录觉得奇怪，就亲自去察看。李锐有些敏感，以为事情被罗瑞卿发现，吓坏了，就一个人连夜到毛泽东那里，把一起聚会时说的话都交待了出来。⁷¹

毛泽东找了几个参与的人问了情况，他们都作了检讨。8月1日晚，毛泽东致信周小舟：“‘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话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张绣割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⁷²

毛泽东不会仅在会议上作了批评就让彭德怀过关，他提出：“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⁷³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都作了检讨，四人最终被定为“反党集团”，职务均被撤销。8月6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公报》时，加写了“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⁷⁴除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惹恼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在处理中苏之间某些问题时，彭德怀态度有时不够鲜明。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在一些讲话中赞扬彭德怀。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

集中在里通外国之事上。1962年，在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给反右倾时受批判的干部平反，刘少奇就以彭德怀里通外国为由，不同意给他平反。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把正确的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把左的错误说成是正确的，颠倒是非，在左倾路线上走得更远，陷得更深，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经常重复的现象。

中共上海市委是紧跟毛泽东的，8月25日，举行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情况及毛泽东讲话。传达后做了分三个阶段进行反右倾运动的部署：认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逐步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上海市委将扩大会议的情况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说：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此时，张春桥虽然已升为市委常委，但还是没有资格上庐山参加中央会议，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也是他的意见，支持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他扶植起来的文章伙伴姚文元，在1958年写了歌颂共产主义、大炼钢铁的文章，很是活跃，此时却沉默起来，没有动笔。究其原因，是姚文元曾写过一本评论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的小书，歌颂大将军彭德怀。姚文元深知此事干系重大，就在大伏天蛰居起来，静观事态的发展有半年之久。直到7年之后，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彭德怀，心中余悸才算消失。庐山会议，还埋下了一个日后的重要伏笔，即“海瑞问题”。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不敢讲话了。继之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热潮，好大喜功、歌功颂德之风盛行，不只是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失言无语，就连党政干部也在反右倾、拔白旗的气氛笼罩下，不敢讲话了。要讲就是吹牛、浮夸的假话。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就大力提倡海瑞精神，鼓动干部要向海瑞学习。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泽东看了湖南省湘剧团演出的《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⁷⁵他让柯庆施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毛泽东在会议上盛赞海瑞，说海瑞敢于批评皇帝，共产党员要向海瑞学习，发扬“五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

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⁷⁶他在会上还很生动地讲了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故事。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接着就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的最后一天，4月5日，毛泽东又讲了海瑞，说海瑞给皇帝写的那封信，那么尖锐，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我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同时也欢迎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回答：看了。⁷⁷会议之后，彭德怀在去欧洲访问前，花了一半月的时间，专门读了有关海瑞事迹的文章。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经常放在案头。⁷⁸不知在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民请命，上书毛泽东，是否受了海瑞精神的影响？

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之后，8月15日，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讲了一大段海瑞，指着周小舟说：“现在听说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要搬家了。明朝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有一半是有的。海瑞变成右派海瑞，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跟这种海瑞作斗争。”⁷⁹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可是中共党内真的出现了海瑞式的彭德怀，他又不愿见到，这段话表现出他之前提倡海瑞精神的后悔心情。

《明史》专家吴晗，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看了《生死牌》并提倡海瑞精神的事情，就很快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通俗的文章，同时还写了学术论文《论海瑞》。胡乔木参加庐山会议回到北京后，吴晗把《论海瑞》送给他审读。胡乔木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假冒海瑞向党进攻的文字，对全文来说，这段文字是毫无关系的画蛇添足，但吴晗还是一字不改的接受了。9月之后，京剧名家马连良找吴晗写海瑞的戏。吴晗虽然不懂京剧，可还是数易其稿，写出了京剧《海瑞》剧本，他的老同学植物学家蔡希陶看了之后，把剧本名改为《海瑞罢官》。1960年底彩排时，正式把戏名改为《海瑞罢官》。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请马连良到家中吃饭，又听了马连良的几个唱段，称赞剧本文字写得不错。

毛泽东在上海提倡海瑞精神，上海市委可谓近水楼台，市委宣传部于6月5日即组织创作力量，为海派京剧名家周信芳编一出海瑞戏，由刘厚生、许言创作剧本，定名为《海瑞上疏》。该剧创排完成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在上海演出。1961年，马连良演出《海瑞罢官》之后，周信芳才去北京演出了《海瑞上疏》。历史的巧合不是人们的有意安排，毛泽东在上海提倡海瑞精神，在他改变了赞扬海瑞的态度之后，又是在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注释

- 1 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世纪》杂志，2011年第1期。
- 2 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 3 陆定一，曾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页。
- 5 《光明日报》本是民盟的中央机关报。
- 6 笔者访石西民笔记，1982年8月20日。
- 7 《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创刊，曾停刊三次，1956年10月1日的复刊，报史称之为“《文汇报》第三次复刊”。
- 8 王蒙，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希凡，文艺评论家。
- 9 中国作家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战斗队编：《文艺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1967年。
- 10 作家姚雪垠于1957年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创作问题杂谈》，列举了文艺创作中七种错误偏向。
- 11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1998年版，第399—401页。
- 12 唐海：《引起毛主席关注的一场讨论》，见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 13 同上，第245—246页。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 15 同上，第470—471页。
- 16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 17 陈仁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 18 彭文应，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及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
- 19 葛佩琦，学者、社会活动家，人民大学教授。王造时，学者、社会活动家，复旦大学教授。
- 20 梁漱溟，哲学家、教育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 21 徐仲年，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
- 22 陆诒，时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吴茵，著名电影演员。
- 23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6页。
- 24 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 25 逄先知，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 26 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见《党史纵览》，2003年，第九期。
- 27 江南和笔者的谈话记录，2013年4月。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37—538页。
- 29 陈企霞，曾任《文艺报》主编，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页。聂元梓是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
- 31 陈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 32 胡乔木，1941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田家英，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陈冰，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
- 33 据张春桥自己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38年在延安。
- 34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126—127页。
- 35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 37 同上，第279页。
- 38 同上，第283页。
- 39 同上，第283页。
- 40 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61页。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628页。
-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14页。
- 44 同上，第417页。
- 45 陈伯达，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胡绳，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邓力群，理论家，曾任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页。
- 47 郑季翘，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历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等职。
- 48 撒仁兴，“三人行”的谐音，为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个人的笔名。
-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94页。
- 50 刘子厚，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省长。
- 51 李友九，时任《红旗》杂志社编辑。
- 52 叶子龙，1935至1962年任毛泽东的秘书。
-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463页。
- 54 同上，第463—464页。
- 55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56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162—163页。
- 57 同上，第167页。
-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91页。
- 59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55页。
- 61 贺绿汀，音乐家、教育家，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 62 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63 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遵义会议后一度担任党的总负责，延安时期逐渐淡出领导核心，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 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02页。
-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7页。
- 67 李井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 68 彭德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112页。
- 70 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时任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李锐，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其《庐山会议实录》是揭示庐山会议内幕的较早的一本书，研究庐山会议的学者多以此书为基础。陈伯达评论说：这本书确实记录了不少重要材料，披露了一些重要情况。但也应该看到这本书有个别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之处。
- 71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罗瑞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127页。丘迟是南朝梁人。梁北伐，丘迟写信劝北魏陈伯之归梁。朱鲔，东汉人，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史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张绣是三国时期董卓的部将，后降曹操。汉主指光武帝刘秀，魏君指曹操。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后期才被召上山，在批彭局势已明朗的情况下，仍然对其表示支持。
-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144页。
- 74 同上，第135页。
- 75 《生死牌》，讲述的即是海瑞微服私访、平反冤案的故事。
- 76 1957年6月，吴冷西在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前，毛泽东向他提出，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后来这“五不怕”被广泛引用。
- 7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1—9481页。
- 7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 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152页。

第四章



张春桥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合影

第四章

特殊历史时期的序幕

“笔写的，剑也砍不掉”

1959年及以后的两年时间，张春桥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除了和原来一样担负为柯庆施作高参的任务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上了。他接待国际文化名人的新闻频频出现在报纸上，照片摄影又多是《文汇报》摄影记者徐大刚。担负了实际职务，工作虽然忙了一些，但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经常为报纸写点杂文散记。他在《攀登新的高峰》一文中写道：

攀登高山同地平线上走路不同，当你登上一座高峰，擦一擦脸上汗水，迎着清风，回首看一看走过的路，你就会发现，路是很艰难的，可是我们已经走得这么高了。

有意思的是，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提及“黑线”和“红线”问题了。他写道：

这里有两条鲜明的线，一条黑线，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下降；一线是红线，它显示出社会主义力量上升。通过这两条线的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十年的巨大变化，我们所得的成就，为攀登第二个十年的高峰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十年的路程才走了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时，张春桥提出了十七年是黑线统治还是红线统治的问题。他认为解放后十七年是“黑线统治”。这样他本来认为是“红线”的变成了“黑线”，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这倒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张春桥也学会了根据政治需要改变自己的说法和观点。

张春桥也关心文艺界的事，有时也参与文艺作品创作的讨论，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他写的《踏上新行程》就是为文艺界而写的。对文学创作，他的着眼点仍是现实，故在文章中说：“如果你写当代生活，就更不能绕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能不告诉读者，是赞成呢，还是反对？是热烈赞成，还是又赞成又不赞成？这难道不是世界观问题吗？”他对工人的创作表现了特别的热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工人的语言》，书中收录的都是1958年大跃进中工人说的话，类似谚语，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说读了《工人的语言》这本书，“可以感觉到最初说这话的人，在怎样呼吸，在怎样一边擦头上的汗珠，一边向人们说出自己的心愿。”另外他还写了关于现代剧目的文章，主张戏剧要演现代题材，还掰着指头说《芦荡火种》、《枯木逢春》等都是大跃进的成果。

他去北京，看到北京西郊绿树成荫，颇有感慨，回来后写了一篇《“绿树成荫”议》，在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上海也栽了很多很多的树。上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多的树。但是，我总感到遗憾：树是多了，就是不成荫，不能乘凉。中午时分，在车站上等公共汽车或电车，你如果想找一棵树保护一下脑袋，免去日晒的痛苦，是很困难的。不是没有树，而且有的树干已经很粗了，但是，它同样也几乎是光着脑袋，只有几根稀稀幼小的枝条，自顾不暇，哪里来得及保护你呢？”他讲了上海不能绿树成荫的困难，并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上海有台风，“树长大了吃不消”；上海的树修整得很美，“所以要剪枝”。文章说：“我没有听到有说服力的道理。这些议论，倒使我不能不问一问：几十年来，上海所形成的一套保养树木的办法，到底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老是这样下去，到底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呢？”这话说得有些偏激。但

是经他这样一问，上海园林局读了他的文章，对行道树的保养办法倒是真的动起脑筋来了。如今上海有不少街道“绿树成荫”，和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恐怕不无关系。

1959年的除夕，张春桥把两年来写的40篇文章整理编成《龙华集》，他在作《序》时说：

题名《龙华集》，是因为长期以来对龙华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龙华，在那些“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年月，是以监狱和刑场闻名于世的。

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有多少人民的英雄儿女在这儿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点精力，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鲜血！

最近，我们在龙华人民公社附近住了一年多。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新事物在这儿飞快地成长，看到人民的飞机在这儿升降，轮船和火车在这儿驶过，看到孩子们在龙华公园里高声歌唱，我们不能不想到那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的同志们。

为了防止市委机关干部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在大跃进时期，柯庆施曾把市委机关干部都赶到地处南郊的东安新村去住，这里是工人新村，是普通工人居住的地方，隔路相望就是农村的龙华人民公社。张春桥继续写道：

读者会看到，这两年我写得既不算多，又不算好。有些文章还有明显的缺点。《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按语中所正确指出的，这是一篇“有一些片面性”的文章。《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发起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提高了我的认识，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现在，把它留在这儿，当作一个有益的纪念。记得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曾经嘲笑过那些“悔其少作”的“好作家”……这篇文章连同收集在这里的其他文章，都是属于“少作”之类。没有写好文章，愧是有的，也是应

当的，悔却没有什么用处。“笔写的，剑也砍不掉”，还是让它们刺目地留存在这儿，对自己继续起一种“精神刺激”作用吧。

在这里，张春桥引用了“笔写的，剑也砍不掉”，涵义是多重的。一方面，他写的文章是白纸黑字，是好是坏，都无法改变了。另一方面，他特别看重的还是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可能是他自己认为此文是经典之作，别人无法改变或推翻！

砍不掉的三年饥荒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真正需要大书特书的是大跃进、公社化所带来的饥荒，使几千万农民饿死的事情。不过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中很少提到，即使提也是略略几笔，野史中倒是有很多记录。可即使是野史中的那点东西，有些人还一直想把它砍掉。中国农民饿死的征兆在1958年就出现了。如果从这时候的饥荒开始，到1960年恰好是三年，故可称之为“三年饥荒史”。

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案头放着一封匿名信，反映安徽省灵璧县三个乡的灾情，饿死人、干部打人的情况。毛泽东批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到那里去查一下，酌置处理。”¹安徽省派出检查组进行调查。情况属实，并作了处理。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谭震林、廖鲁言兴修水利的计划进行了批评，²他说：“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毛泽东动之以情，把话说得声色俱厉。可是他又对在场的曾希圣说：“你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³可见曾希圣之所以胆子那样大，置农民的生死于不顾，浮夸之风吹破了天，饿死了那样多的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曾希圣被毛泽东认为是“好心办坏事”，只是调动了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安徽省是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淮北宿县、阜阳两地区的灾难又是重中之重。笔者家乡就在宿县地区的一个农村，和最早发现饿死人的灵璧县只有一路之隔。1960年，笔者正在复旦大学就读，没有亲身经历那场灾难，但后来的耳闻和目睹，还是给笔者的心灵以强烈震撼。1959年，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笔者的妻子）从山东来信，说她在教书的那个中学以“小豆腐”充饥，已经出现了浮肿病。所谓“小豆腐”即以山竽叶或梗掺一些黄豆糁子。以后她又来信，说安徽老家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同学姜万云告诉笔者，他的家乡鲁西南地区也有饿死人的事。有的干部回乡看到真实的情况，回到机关如实讲述，有的被批判为右倾，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61年，笔者大学毕业后回了趟老家，才知道父亲差一点就饿死了。

笔者家乡饿死人的事情，从1959年冬天就开始了，1960年春天达到高潮。农民不但吃野草、榆叶，连能吃的树皮都剥光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21户人家，有5户全家都饿死了，其他还有一家饿死一人、二人、三人的。笔者的一位小学同学被饿得要妻子把儿子杀了给他吃，最后饿死了。如今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饿死的陈尸沟壑，无人去埋，因为人人得了浮肿病，有的甚至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死了，都无力气再去掩埋死者。屋前屋后的蒿草长得很深，野兔、黄鼠狼出没其间，但人们没有力气去捉来杀了吃。后来每次笔者回老家，人们回忆起饿死人的日子，都说：真怪，饥荒来了，仓库里是有粮食的，为什么就不敢去动呢？别的地方笔者不知道，我们那里饿死人不是天灾，是人祸。大跃进放卫星，开始时还是有粮食的，由于谎报粮食高产，把收成的粮食全部上缴也不够干部上报的数字。农民家中虽然存有一点余粮，但干部们为了凑够上缴的粮食，逼着农民把这些自存的口粮交出来，不交就到家里去翻。

为了迎接1960年，张春桥写了一篇名为《祝开门红》的文章，他很高兴地写道：“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为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找到了这样一条持续跃进的道路，找到了一条开门红、全年红、年年红的总路线”而祝福。他的祝福不只是对上海，而是对在天空、在海防前线、对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对葱绿的海南岛、对西藏高原，对克

拉玛依等地方工人的祝福，却唯独忘记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祝福。也许他生活在上海，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更不知道一些农民开门面对的不是红色的幸福美景，而是死亡。

柯庆施也打破了往年的惯例，在“开门红”时召开各界座谈会，发表大好形势和前途光明的讲话。原来他一方面跟着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边在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的召开。1月6日，会议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开门红”，其内容是解决原料供应、机械维修、添置一些大型设备、落实协作关系，为1960年第一季度的开门红作些准备。还花了许多时间和与会者读苏联的那本书，似乎要从那本书中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教科书说“使患病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这句话旁，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⁴其他如人民公社、军事、国际形势、经济理论等，毛泽东认为“题目太多，只是谈一谈”，过去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少谈的“过日子”问题，毛泽东把它列入会议日程，说：“学会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不患寡而患不会安排。”⁵为了“过日子”，会议还讨论了养猪问题，粮食分配问题。会议讨论农村干部刮“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时，毛泽东说：“今后‘共产风’可能少，后二风容易刮，可能还会刮的。”⁶

文艺是对政治气候最敏感的领域，也许受这次会议的影响，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对文化艺术要宽松些。本来宣传部长石西民为《文汇报》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其目的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使文化艺术界宽松起来。几个月过去了，石西民看到《文汇报》及知识分子对他的文章没有反应，就直接找到陈虞孙谈话，要《文汇报》搞些学术讨论，让知识分子说话、写文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也给陈虞孙打气，说《文汇报》齐放多，争鸣不多，要敢于争鸣。石西民看到陈虞孙不动，又一次找他谈话，说：“你们贯彻双百方针不要怕闯祸，有本事，就闹出几个乱子来给我看。”⁷

在上海市召开的报纸宣传务虚会上，张春桥表示支持石西民的意见，对陈虞孙说：你们《文汇报》要不怕闹天宫嘛，不要自己往头上套金箍咒，把手脚束缚起来。⁸这和他在“开门红”文章中的调子有所不同。

虽然有石西民、夏衍、张春桥先后支持《文汇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讨论，给知识分子营造一个敢于讲话的宽松环境，但陈虞孙还是迟迟没有动作。笔者在写《风雨文汇》时，曾和他谈论过：1959年《文汇报》开展过曹操、武则天及历史人物讨论，报纸的版面很活跃，这时石西民、夏衍、张春桥都支持报纸组织学术讨论，你为什么又不动了？陈虞孙说：看来，你还没有弄懂《文汇报》，上头不来关心，还可以做点事情，一旦上头表示对它关心，我们就静下来看一看，否则随着轧闹猛，最后还是要吃苦头的。

毛泽东的意见传达到《文汇报》后，陈虞孙组织编辑记者作了一个时期的调查，提出“三十二字原则”，即各展所长，各抒己见，登门拜访，礼贤下士，以文会友，门当户对，保护少数，对等原则。这“三十二字原则”的核心是“对等原则”，即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陈虞孙要理论部主任郑心永作了讨论计划。

经过这样一番准备，1960年11月15日，《文汇报》学术讨论正式展开。理论部主任郑心永组织学术讨论班子，副总编辑陆灏亲主其事。学术版刊出一个多月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学术动态》发表《〈文汇报〉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很快就被中宣部编印的《宣传动态》转载。过了一段时间，即1961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将此文作为正式文件下达。中共中央批示意见认为过去“在学术和文艺领域中，简单粗暴，片面性的现象有增加”，《文汇报》的学术讨论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宣部的表扬，石西民、张春桥都很高兴，见到陈虞孙时都称赞《文汇报》考了状元。

物质生活匮乏时，就要从精神生活找出路，先从精神上解禁，让群众宽松一下，缓和社会矛盾。历朝历代治国之术都逃不脱这个路子。不过只靠报纸开展学术讨论，还是无法让群众的精神轻松起来，上海市委于是动员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各界，要求都要宽松，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市委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书记石西民和及市委常委张春桥也忙碌起来，有些事情在当时正读初中一年级的女儿张维维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些记忆。她说：

我们家在东安新村住了一年多的时间，1960年就搬回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宿舍了。我们家住在二楼，因有底层，实际是三楼，每个楼面有两套房子。我家楼上是石西民住，楼下是马天水住，他们都是书记，住了两套。我爸爸那时还不是书记，只住一套，隔壁一套房子空着。1960年上海没有饿死人，其他省市饿死人的事，在我们家也反映出来。当时听说山东也有饿死人的地方，济南没有东西吃，我们就把爷爷奶奶从济南接到上海，和我们一起住。因为我家房子不够住，我爸爸就在四楼借了一套房子。

困难的时候，我们家的布票、肉票、油票都上缴了，家中没有肉吃，也没有油，我爸爸妈妈的工资都不低，爸爸还有稿费，家中的钱是有的，有时就买些不要肉票粮票的高档食品，如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店的蛋糕、面包、酥糖、巧克力，没有布票就买出口转内销的布和衣服。所以那时我穿着都很时髦。还有就是买不要票的的确凉。那时的确凉质量不高，穿的时候不长就破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爸爸经常谈粮食问题。那时四川、安徽都有灾难，没有粮食调往上海，上海就决定扩大种粮面积，还有蔬菜、养猪等，自那时起，上海种粮的土地面积就有一条红线，不能减少。我们在学校也到龙华机场打猪草，给学校养猪，猪肉留给教师改善生活。

谈到张春桥的工作情况，张维维说：

当时大院里还住有分管农业的领导干部，他们家有大米、蔬菜及各种副食品。我就问爸爸，他们家有东西吃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爸爸回答说，我们家书多，有精神食粮。的确，我们家的书真的是很多，每天有新书，还有许多杂志，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两天就看完了。我的印象里那时出版的还有《鲁迅全集》、《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书。可能是作家来不及写，有许多是重版书。我还看了不少话剧剧本、电影剧本，电影分镜剧本我都能看到。这些都是送来让我爸爸审查的。

谈到她所读的书，张春桥有没有指导她分清作品表现的左、中、右思想倾向？张维维说：

没有，当时看了许多戏，都是在现在改名为“兰心大剧院”看的。一般都送来两张票，妈妈不看戏，她有时要到农村去，大多数是爸爸带我去。当时看《风雪夜归人》，开场情景很可怕，《祝福》也看过，还看过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和电影，像《第十二夜》、《一仆二主》、《王子复仇记》。我自小在家就养成了说话无禁忌，脑子里没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忌讳。有的新戏，爸爸看完戏后还要和编剧、导演、演员谈话，我听不懂，有时在旁边就睡着了。在家读书生活，主要是初中时期。读高中时就住校了，没有这么多读书机会了。那时，总感到爸爸很忙。

那时，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电影系统的，就是石西民和张春桥，张维维说“他们两个人关系不错，工作上配合得也很和谐”。

短暂的春天

1962年，中国的形势处在历史交叉口上。

1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委员到地、县一级的书记，共有七千人，所以又称之为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让大家敢于讲话，是一次“出气会议”。

七千人大会民主气氛还是很浓的。刘少奇提出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错误主要由中央负责。他还提出中央要为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刘少奇所说“中央负责”，毛泽东心中清楚就是要他负责，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彭真甚至指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

恶劣影响。”⁹对毛泽东公开提出质疑，此前还从未有过先例。还是林彪为毛泽东解围，他说这些困难的出现，“恰恰是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¹⁰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再谈笑风生说古论今，也几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他都不懂，中央的错误他首先负责。毛泽东没有发脾气，而是忍字当头，但实际上他心中盘结着郁闷之气。会上，谭震林、曾希圣都是惹人注意的人物，他们的浮夸吹牛之风广受批评。

北京的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3月2日至26日，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与此同时，聂荣臻也率领一批知名科学家在广州举行座谈会。会议期间，作家代表和科学家代表汇集在一起，听了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以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不是以世界观为依据，强调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革命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周恩来还强调，他于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所讲知识分子问题时，承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话还是有效的。

3月6日，陈毅作了3个小时的讲话，中心是如何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他称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科学家、无产阶级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陈毅的“脱帽加冕”报告之后，代表们回到宾馆酒吧，争购茅台酒，举杯庆贺，为“脱帽加冕”干杯。

但由于北京对广州会议精神产生了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心领神会的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也没有召开全市性的会议传达，只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分系统地作了传达，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在瑞金剧场向文化界作了传达，新闻界由《文汇报》记者周明初传达。其他就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广州会议之后，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乘着从南方吹来的和煦春风，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5月9日，巴金在会上作了震惊四座的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个人发言，他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着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到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他们“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就会怒火

升高，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声势很大，……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巴金在会上对那些对着作家“高举棍棒”、“来个迎头痛击”的评论家进行了批评，无所畏惧地呼吁作家们行动起来和“棍子”现象作斗争。¹¹巴金的发言虽未指名道姓，但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听就明白，那个拿着“棍子”的评论家就是姚文元。

在巴金的带领下，丰子恺、黄佐临、瞿白音、魏金枝等与会者也纷纷发言，一抒久被压制的心情。¹²坐在主席台上的张春桥，脸色十分难看，坐了一会儿便愤然起身，离席而去。开幕式那天，柯庆施在北京，没有出席。闭幕式时他已回到上海，会议原定的议程他要参加，但听了张春桥的汇报后，他和石西民、张春桥等要员都突然通知不来参加大会了。

然而知识分子的春天气息很短，就见水流花谢了。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次会议的精神，为柯庆施、张春桥提供了向知识分子有力的反击武器。

1963年1月，上海市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张春桥主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并为柯庆施写出了讲话稿。这个讲话稿贯彻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提问题的方式讲了上海思想界的状况：上海文教、新闻、出版队伍有14万人，在队伍上、政治上、组织上是否可靠？组织领导核心是否健全？这些思想阵地是否全都被共产党占领了？我们的宣传内容是不是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还是有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这两年来，资产阶级思想比前几年有所抬头，我们的武器钝得很，有史以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最丰富，应该用各种方式把它反映出来。参加会议的人把这次会议称之为“洗脑子”，并把会议的主题概括为反“四股黑风”——单干风、翻案风、漆黑一团风、民主自由风。

柯庆施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巴金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在1956年写的讽刺食物匮乏的《有啥吃啥》，同时还批评了《文

汇报》发表的三篇文章，即骆漠的《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若涵的《小火表赞》和沈志远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的情况是这样的：1962年5月6日，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应《文汇报》副刊《笔会》编辑之约，以“骆漠”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文章有感而发，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编辑的一些甘苦。表达了编辑工作“不被重视”，有着“为他人作嫁衣的凄凉感”，“今天既然可以有名教授、名科学家、名演员、名记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希望有响当当的名编呢”。当时上海正好开第三次文化会议，这篇文章成为热门话题，在北京的夏衍也认为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7月7日，《笔会》上发表作家王若望以若涵为笔名写的杂文《小火表赞》，指出上海老居民区采取多户“共用一个自来水表，按每户人口多少公摊办法收费，不如用电的‘小火表’，每户用多少，付多少，毫不含糊。”作者由水费“按人收费”的公摊法，批评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思想，提倡“一户一表”制，可以“个人负责，落实到户”。

8月30日，《文汇报》发表沈志远《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本来《文汇报》理论部打算在报上开展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编了一本毛泽东有关讲话及一些这方面论述的资料。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未获批准，于是就在报上发表了已组织来的几篇文章，其中有沈志远的这篇文章，还有8月1日刊登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撰写的《怎样认识按劳分配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都对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此前，《杂家》已经被姚文元写文指责为“埋怨社会主义制度”，张春桥批评《小火表赞》是鼓吹单干风，这次，三篇文章又一起被指责为“黑风”。因为沈志远是1957年被划的右派，柯庆施在会上还当众责问陈虞孙：“为什么发表右派分子的文章？”“让右派翘尾巴？”并责令报纸组织文章进行批判。

因为这三篇文章都发表在《文汇报》上，所以《文汇报》也受到牵连，被勒令限期“还债”。陈虞孙认为，这次与1957年反右时“还债”是相同的。于是，陈虞孙既要去思想工作会议上作检查，又要在编辑部内部

作检查，反反复复地检查，上纲上线，力求“过关”。编委会和各部门同样要查版面，查思想，挖根子。他幽默而又不乏凄凉地说：“为了一篇《杂家》，屁股挨板子，都给打烂了。”《文汇报》对这三篇文章都作了还债，称之为“三大事件”。《文汇报》是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晴雨表，版面萧索无味，不只总编辑怕打屁股，巴金等知识分子也不愿再挨棍子了，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新的整肃。

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常委副市长陈其五遭到了一系列的批判，直至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在一些材料中，都称是张春桥迫害了他，起因除二人平时在工作中的矛盾外，主要是因为陈其五违背柯庆施、张春桥的意愿对广州会议精神的传达，以及对巴金讲话的支持，令张春桥极为不满，故借上述批判、整肃之机，把陈打了下去。但据笔者的了解，陈其五冤案固然与当时政治大背景有关，但与张春桥关系不大，而是另有缘由。对此，荆位祜有一段回忆：

起因主要是在1962年，他曾对当时的形势、困难发表过一些言论。……这类言论，尽管有些是事实，尽管有些在事后看起来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正确的，但是这都和当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不合拍。1963年初，市委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认为上海思想战线上存在嗅觉不灵、武器太钝、立场模糊的问题，而在这些战线的司令部内部也存在问题，于是陈其五在上海宣传系统的干部会上，被揭发批判。有许多批判发言上纲上线，是过头的。还有人缺乏根据地揭发他攻击“三面红旗”。在当时的氛围下，陈本人3月份向市委作了书面检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看了他的检查后，在上面批示：“按此报告在小范围内检讨，听取意见，再作补充检查好了。”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陈的批判检查会并与陈个别谈话的，一般都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他一会儿说：“你不愿意和我们团结，我们从此分手。”意即要将陈开除出党；一会儿又要陈去看反修的绝密文件，说“你可以放下包袱了”，反反复复。到了1964年秋，要对陈的问题进行处理了，给什么处分呢？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基本意见是留在党内，市委领导层

内部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开除出党，一种留在党内。为此，市委主管宣传文教系统工作的书记石西民，专门去北戴河，向已于1964年春患肺癌手术离开工作岗位并于7月去那里养病的柯庆施汇报，并听取意见。石西民带去的意见是：留在党内，作留党察看处分。柯对此没有异议。石西民回上海以后，市委宣传部有关党支部就此于10月下旬召开党支部大会，陈其五参加，作出了给陈“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陈在会上除表示别人揭发他的攻击“三面红旗”的话自己并未讲过外，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4年12月中旬，市委宣传部突然接到市委通知，说陈因“态度不好”，应重开支部大会，开除他党籍。其原因是说陈“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作为重要依据之一；¹³还把早先陈曾为彭柏山、王元化等的批判处理说过一些同情的话上纲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宣传部有关党支部的许多党员对于已经决定的事又180度反复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好奉命行事。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张春桥亲自出席讲话，宣布陈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的决定。陈其五同志对此非常痛苦，曾放声痛哭。1965年初，陈其五再次写信给市委并转柯庆施，要求留在党内。但此时已经转到广东疗养的柯庆施已难以改变已被更改的处分决定。3月，华东局监察小组组长郑平同志转告陈其五：你写的信，柯老已看过。柯老指示，事已如此，再改变决定，影响不好。好好改造，过两年再回来。陈其五还拟再写信给柯，而柯不幸于4月9日逝世。6月，市委将陈的处分决定以正式文件下发，陈被撤职、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¹⁴

笔者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也曾谈过陈其五的事，她说：

我们家和陈其五家，都住在海格大楼，而且是门对门。我的印象中，爸爸和陈其五的关系很好，他对陈其五很欣赏也很尊重。他们家的家具陈设比我们家好，他的夫人冯阿姨在家中穿着白纱衣裙，很潇洒，也很漂亮，我们有些羡慕。爸爸说我们和他们不同，他（陈其五）是蒙古的小王爷，阿姨是格格，小王爷、格格都不当

了，投身革命，很不容易。我们家的书很多，连沙发都没有，他们家的孩子或其他小朋友来我们家看小人书，就坐在地板上。后来听说陈其五出事了，又受到处理，我就对爸爸说：你们对他的处理太重了。爸爸说了些对陈其五这样处理的道理。爸爸说：没有办法，他要落在刘少奇的手里就更麻烦了。爸爸没有明说，陈其五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刘少奇。¹⁵

“写十三年”的提出

1963年1月1日，柯庆施出席上海文艺界联欢会，在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问题，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大写解放后的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死人、古人，只有写十三年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着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参加联欢会的《文汇报》记者写了新闻稿，送到市委去审查。柯庆施的讲话有些口语化，经张春桥的修改，提炼成书面语的新闻稿。送审稿返回时，张春桥连标题都做好了，突出“写十三年”前加了一个“大”字，以示醒目，报纸的标题就变成“大写十三年”。1月6日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同时刊登出来。

柯庆施别出心裁，一语惊人，但“写十三年”的提出，首先遭到北京文化界领导人物的反对。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林默涵、邵荃麟等对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的口号提出不同意见。¹⁶在北京区文学组讨论时，邵荃麟不点名地点名说：提倡“大写十三年”的人，“不懂文艺”，“简单化”，“挫伤了作家积极性”。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写四十年（指五四以来）”，“写一百零九年”，“写自己熟悉的”，“不要太狭窄，要多样化”。16日，邵荃麟又在大会上发言，支持周扬的观点，认为周扬说的表现时代精神是比较广泛的概念，不是只写十三年，也绝

不意味着排斥革命历史题材或其他题材，邵荃麟在会上宣扬反“题材决定”论，赞成写生活各方面的题材，“因为世界是多样性的”。

张春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当场驳斥了邵荃麟的意见，并列举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强调写十三年的重要性。直到三年后的1966年，张春桥还念念不忘地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起这件事，他说：

63年元旦，柯老提到写十三年，即不要再写封建的东西了。上海的问题很多，2月5日开始开会，开了半年，揭了大量的材料，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总理、陈老总也与上海文艺界作了报告，提倡写新人新事。左派很震动，情况有很大变化。

63年4月，中宣部开文艺工作会议，又接着开文联会，前者我参加了，后者没参加，一个小组集中都批评写十三年，虽未指名，听得出来是批评谁。有意见不奇怪，问题是主持人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都未引导反驳这些观点，直到大会发言最后一日，邵荃麟反对题材革命，反对写社会主义，发言一个上午。这时上海同志忍不住，才起来反驳。我们很注意宣传部的意见。但周扬、林默涵讲话都未提到邵荃麟的名，开完会后，周扬问我有什么意见。

这些都说明对主席思想，逆流很强。回到上海，我们未传达邵的意见。许多地方传达了邵的意见，但未传达上海的反驳意见。接着就是华东话剧会演，田汉去泼冷水，同时宣传三十年代，还在《文汇报》上写了诗（1963年12月）。会演在全国有震动，各省市拿出一些好东西，这些我们增加了信心。主席批给彭真、刘仁的信就是在这个时候。¹⁷

这以后，全国看到好的现象，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杨献珍，京剧会演。¹⁸ 这时对文艺工作的批示也有了（即十五年文艺未执行中央指示的指示）。¹⁹

柯庆施不但提出“写十三年”，而且在文艺创作中付诸实施，从轻便着手，先抓讲故事及评弹创作演出。1963年春天，上海郊区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宣传阵地”。柯庆施

提出，农村茶馆是阶级斗争第一线，要故事员以讲故事的方法，占领农村茶馆阵地。

《文汇报》对此作了重点报道，派三名记者专门跑农村茶馆，花了不少时间，写了不少报道，报纸也用了许多版面刊出。工作了一段时间，《文汇报》就为此写了故事会报道的专题小结上报上海市委宣传部，经宣传部徐景贤改编后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后转载于中宣部文艺处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标题改为《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²⁰ 12月12日，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写了一大段批语：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²¹

“写十三年”提出后，柯庆施和张春桥抓了故事会、评弹新剧目的创作，占领农村茶馆阵地，又写了专题小结，恰好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使他写出这种石破天惊的批示。

实际上在半年前，上海就已经在《文汇报》上批判“有鬼无害论”和被称为鬼戏的《李慧娘》了。而这其中又有着曲折复杂的政治背景。1959年冬天，作家孟超受北方昆剧院的邀请，将传统鬼戏《红梅阁》改编成《李慧娘》。他们这样做是根据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舞台上上演牛鬼蛇神“有一点也可以”。²² 1960年，孟超完成了剧本写作，1961年刊于《剧本》7、8两期。这年的夏秋之间，《李慧娘》由北方昆剧院在北京公演，一时好评如潮，其中就有廖沫沙以繁星笔名写的《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于8月31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²³

孟超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人，而且沾亲带故，比较熟识。²⁴康生不但看了孟超写的剧本，还看了彩排，提过些意见，看完戏后，他还走上台和演员合影，并把该戏推荐给周恩来。周恩来、董必武也观看了演出。²⁵据穆欣披露，康生和江青是演鬼戏的支持者。²⁶1960年末，他们到杭州看了多出禁演的旧戏或鬼戏，如《十八扯》、《辛安驿》、《盗魂铃》、《大劈棺》、《大五花洞》，都是地道的鬼戏。

1962年11月22日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求报告》，在《请求报告》中提到：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为了配合文化部的《请求报告》，1963年《文艺报》第四期发表了《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针对繁星的文章，但未点名。

1963年5月6日、7日两天，《文汇报》以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文章的题目虽然是抄袭繁星，但把有鬼无害四字上加引号，构思颇巧。文章来势非凡，点了孟超和繁星的名。读者包括《文汇报》编辑部的人都在猜：梁璧辉是谁？文章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送交《文汇报》的。总编辑陈虞孙把文章交给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只说了作者是何人。唐振常看了一遍，交给编辑拼版发表。编辑一字不改，全文照发。

俞铭璜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国学根基厚实，有马克思主义水平，又精通文艺理论，是党内的秀才，为人也平易近人。虽为官，尚不脱文人的本色，喜欢写文章，且文必有所见，绝无时下杂文的陈词滥调，谈古论今，广征博引，文笔流畅，议论风生，不落俗套。1961年以后的几年里，他以“于十一”为笔名为《文汇报》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一篇《江郎才尽》，颇为新鲜。唐振常感到这篇《“有鬼无害”论》和“于十一”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截然相反，对鬼戏一棍子打死，全然不讲道理。后来才知道，给该文修改定稿的是张春桥。文章写好后，为作者的名字颇费心思，还是柯庆施为他们起了个笔名“两笔挥”，后来用其谐音即成“梁璧辉”了。

其实《文汇报》发表梁璧辉《“有鬼无害”论》背后有江青的支持。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大会上说这是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她在军委扩大会上又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²⁷这是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的第一次合作，也可以说，是他们后来搞“样板戏”及批判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的一次预演。

1964年6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他说：“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情作过交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²⁸

《文汇报》发表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虽然不是率先批判鬼戏《李慧娘》和繁星，但是影响很大，加之后来毛泽东的重视，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使得孟超和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劫受难。文革一开始，康生为了开脱自己曾经支持孟超改编《李慧娘》的责任，以抄家为名，把他与导演、演员及孟超在一起合影的照片拿走，他还扭住孟超和《李慧娘》不放，说：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他的这一言论，导致对孟超的批斗逐步升级，孟超最终被迫害至死。这是为了一出戏害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命最为典型的事件。

掌控市委写作班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组）的发展，分几个历史阶段，在这里先说写作组成立的第一阶段。

1960年代初，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破裂，在意识形态方面大论战，中共中央组织了几十人，前后写了九篇论战的文章，一般称之为“九评”。写文章的这个小组称之为写作组，或称“九评小组”，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写作组”一时成为时尚，一些地方就纷纷效仿。上海最早出现

的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罗思鼎小组。他们一开始写文章时，用教研室几个人的名字组合起来，笔名“陈嘉铮”、“龙德瑜”，陈是陈守实，嘉是朱永嘉，铮是朱维铮，龙是赵成龙，德是李祖德，瑜是王春瑜。后来毛泽东提倡学雷锋，他们小组才以学习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用了罗思鼎的笔名。罗思鼎小组只有搞古代史的朱维铮和朱永嘉、搞近代史的王知常、搞现代史的吴瑞武四人，这样的组合，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碰到一点，各人都可以发挥一点自己的长处。他们1964年3月开始撰文，以罗思鼎为笔名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论乾嘉学派及其影响》，发表在上海《学术月刊》上。

这个小组成立之初，并不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正在筹备办一个内部刊物《未定文稿》，该刊编辑部于1964年5月1日在丁香花园悄然成立。《未定文稿》的编辑部称“内刊编辑部”，也就习惯地把这个刊物称作《内刊》了。《内刊》是效仿北京成立的。这时“九评”文章发表过半，中共中央要求理论战线全面、深入开展反修斗争，并部署中央宣传系统和各大行政区的宣传系统要成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各种修正主义的刊物。因而中央宣传系统成立了一个名为《内部未定稿》的刊物，主编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编辑人员多数来自《红旗》杂志编辑部，公开称《红旗》第八组。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合办的《内刊》，主编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石西民，副主编周原冰（原市委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编辑主任庞季云（曾任胡乔木秘书，后任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主任有：钦本立、姚文元、沈竹、金冲及、李宝恒等6人。10月，罗思鼎小组发表题为《理论工作必须战斗》的文章，沈竹将此文及罗思鼎小组推荐给石西民，于是石西民就要罗思鼎小组写一篇批判苏联历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的文章。齐是中国近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专家，主张中国疆土以长城为界。罗思鼎小组写文章，指明中国边界不是以长城为界，大漠以北早就是中国领土了。罗思鼎小组为了写这一篇文章，住进了丁香花园。但文章写好以后就让他们留了下来，不再回复旦大学。《内刊》分设五个编辑部组：政治组（组长林学渊）、经济组（组长钦本立）、哲学组（组长沈竹）、历史组（组长金冲及，本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

此时任石西民的秘书）、文艺组（组长姚文元）。《内刊》成立不久，即开始组织写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

1964年8月，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中宣部下达文件批判的电影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逆风千里》、《林家铺子》等，这些电影有不少都是上海生产的，因此上海的批判任务很重。这时的文艺组只有李子云、胡锡涛两人，石西民准备加强文艺组，从上海作协调了一批人马进入丁香花园。其中有：高云、戴厚英、吴立昌、高章彩、吴胜惜。此外还有上海师范学院的徐辑熙、华东师范大学王绍玺、南京师范学院汤大民，以及电影系统的刘景清、赵志强等。《内刊》文艺组队伍扩大到二十多人。石西民委派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叶以群、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徐景贤共同负责这个文艺组，主要任务是批判电影《早春二月》。罗思鼎这一笔名当时还属于《内刊》的历史组，相同情况的还有文学组的笔名“丁学雷”。

1964年冬天，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对文化部进行全面改组，同意沈雁冰辞去文化部长职务，免去周扬等六人副部长职务，由中宣部陆定一任文化部部长，把石西民从上海调去任副部长。12月31日下午3时整，石西民在丁香花园中楼会议厅召开《内刊》工作人员和写作班人员大会，当众宣布：他将赴京工作，《内刊》将由张春桥和夏征农共同负责。²⁹他还强调一句：“他们两人肯定比我干得好。”当时，张、夏坐在石西民的左右两侧，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各自翻阅画报。所谓“共同负责”，可能是石西民根据柯庆施的意愿而言，实际上，夏征农从不过问《内刊》，遑论“负责”。

金冲及随石西民进京，朱永嘉接任历史组组长。石西民离开上海，张春桥干脆把写作组这支队伍和《内刊》脱离，与华东局不再有干系，原来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命名的写作班，变成了由他自己领导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从这时开始，上海市委写作班便成为张春桥的嫡系部队。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看中了丁香花园，要用作华东局机关办

公的地方，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就由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2号。³⁰石西民时代的写作班，实际上只看重文艺批判，只有一个文学组，而此时把朱永嘉任组长的历史组从《内刊》调到写作班，后来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自然辩证法组从社科院调来纪树立。写作班成立了党支部，由徐景贤担任支部书记，郭仁杰任副书记，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党总支。

协助江青大搞京剧革命（上）

1963年2月下旬，江青带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上海，住进锦江饭店。柯庆施带着张春桥前往拜望。这是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住进中南海之后，张春桥第一次见到她。1930年代，作为电影演员的蓝苹和张春桥都生活在上海，又都是在左派文艺的圈子里，所以也是见过面的，但两人谁也没有注意谁。或许蓝苹曾在“小人物”张春桥的脑海里留下印象，而在电影明星蓝苹的脑子里就根本没有张春桥这个人。江青对当年和她同时生活在上海的熟人，常常是既防又忌，但对张春桥却绝不会放在心上。张春桥是个聪明人，也绝对不会说当年在上海滩见过，更绝口不提三十年前的往事。

柯庆施介绍了一下，江青淡淡地和张春桥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江青与人谈话，总喜欢开门见山，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表示支持。江青和柯庆施在漫无边际地交谈着。坐在一旁静听的张春桥，用笔迅速地记录着他们的谈话。江青此行是要把沪剧《红灯记》移植到北京去改编成京剧。正当张春桥盘点上海戏剧家底时，江青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提出也要把这个戏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

江青拿走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后，上海有些沉不住气了，把戏曲改革放在了重要日程上来。上海的现代戏创作演出本来就有基础。195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性的戏剧界座谈会，提出戏剧艺术第二次革新的号召。上海京剧院闻风而动，率先排演了根据曲波小说《林

海雪原》改编的大型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后又上演过《赵一曼》、《白毛女》。踏入六十年代，上海接连有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淮剧《海港的早晨》，以及京剧小戏《审椅子》、《追肥记》、《柜台》等问世。1959年，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上海又编出了由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和北京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成为海派和京派的南北双美。

张春桥奉柯庆施之命，从剧本和音乐抓起。4月4日，张春桥召集上海文化局几位局长、国家剧院（团）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柯庆施在会上提出要迅速采取措施，积极组织当代戏曲题材创作，使具有革命内容的戏剧、曲艺占领所有的宣传阵地，以新的逐步代替旧的，多创作、多演出现代戏。所以来柯庆施对江青说：配合你搞现代戏，春桥同志是做了一些基本功的。

从1963年12月25日到1964年1月22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参加演出的华东地区各省市和部队的19个话剧团共演出了在1963年内创作的13个多幕剧和7个独幕剧，其中有《激流勇进》、《一家人》、《龙江颂》、《丰收之后》、《第一与第二》、《母子会》、《柜台》、《年青的一代》和《小足球队》等。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年青的一代》是张春桥直接扶植的剧目。

江青关注着华东话剧观摩演出，这次演出不但在政治上支持了她正在酝酿中的京剧革命，也为她选择适合于改编为京剧的剧目提供了条件。张春桥的收益就更大了，他找到了源头活水，看中了福建话剧团演出的《龙江颂》和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的《南海长城》，组织人将这两出话剧改编成京剧。

1964年初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张春桥把她请到上海京剧院，诚恳地请她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江青的印象还不错，说这个戏有基础，有潜力，要集中力量修改加工。张春桥马上调集人马，把剧本在1958年出版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改动。江青却对修改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越改越坏，曾一度要抛开张春桥和夏征农合作。但夏征农以不懂京剧而婉拒，江青只得仍然和张春桥合作了下去，慢慢发现最能理解她意图的还是张春桥，也是她很好的合作伙伴。

6月初，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海地区也

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携带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及小戏《战海浪》、《审椅子》、《送肥记》、《柜台》赴京。毛泽东观看了演出中的好几出戏，并对《芦荡火种》具体指出了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他对《红灯记》作了高度赞扬，还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8月10日和1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奇袭白虎团》和《红嫂》在北戴河中直礼堂演出，毛泽东观看演出。过了两天，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主席说，《奇袭白虎团》没有陈词滥调，要达到声情并茂；《红嫂》要达到玲珑剔透。”江青把《奇袭白虎团》抓在手里，决定放在上海修改，由张春桥抓修改工作。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后，上海市委与文化局领导，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成立戏改领导小组，由张春桥任组长，确定以《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龙江颂》、《南海长城》四出戏为主攻目标，兼管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江青委托上海代管的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并决定《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和《南海长城》由上海京剧院具体负责，《龙江颂》的改编由新华京剧团负责承担。张春桥既管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又兼管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人们戏称他为“两只老虎”的“司令”。

对上海，江青情有独钟，不请自来。1964年秋冬，她又到上海，召集石西民、张春桥、孟波等人，说：《智取威虎山》的“戏”还不错，就是音乐太蹩脚，用老腔老调不行，要在音乐上花些工夫。张春桥等认为江青的话有道理，马上在上海戏曲界与音乐界物色符合这三个标准的人选。在物色戏改音乐设计人员中，文化局长孟波、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萧挺，以及剧协、音协的一些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于会泳这个名字。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一户农家。最早在家乡当小学教师，后参加胶东文工团，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经贺绿汀挑选，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结业后就留在音乐学院任教。当时颇为流行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女社员之歌》，都是由他作曲的。在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也颇有建树，他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都是音乐教育的教材。有这样出众的音乐才华，于会泳被选中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作唱腔设计，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时还不叫样板戏剧组，《文汇报》文艺部有记者专门联系戏改剧组，称之为京剧革命样板团。《文汇报》派有专门驻样板团的记者，所以对京剧革命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文汇报》来，如江青、张春桥有什么指示，就写成内部参考，供报社领导掌握宣传口径；对创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写成向上送的《文汇报情况》。这使《文汇报》的领导对京剧革命的情况都有较多的了解。上海京剧改革的重头戏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早晨》，两出戏的排练在《文汇报情况》上都有反应。

江青在上海看了两次《海港的早晨》演出，很有兴趣，还发表了不少意见。1964年5月10日，江青第一次观看了京剧《海港的早晨》的彩排后，不知为何她原先对这出戏的热情突然消失了。装在闷葫芦里的张春桥，采用了曲线的办法，以征求江青及兄弟省同行的意见的名义，将《海港的早晨》剧组送到北京演出。但江青始终没有前去观看。

江青对这出戏的冷淡，使张春桥惴惴不安。通过多方探询，他终于知道了，关键在于江青对主要演员童芷苓异常不满。童芷苓是著名的京剧演员，解放前就走红于上海，江青是知道她的。此时的张春桥对江青的颐指气使、随心所欲的脾气已经不陌生了，自然也就识相地在江青面前不再提《海港的早晨》之事，他同时还在想办法救活它。

1965年2月2日，《海港的早晨》剧组又一次去码头体验生活，并将剧本修改后在人民大舞台和延安剧场作了公演，只是张春桥苦于没有适合的旦角能担当主角，故仍由童芷苓主演。在演出的那天，童芷苓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我演〈海港的早晨〉深入生活琐记》，表达了拜工人为师，努力使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感受。《海港的早晨》改编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时，张春桥秉承江青的意旨，下决心改组剧组，正式指出童芷苓担任主角不合适，从上海京昆剧团中挑选了蔡瑶铣继任女主角，同时罢免杨村彬的导演职务。于会泳也于此时参加唱腔设计工作。

1965年6月7日，江青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在人民艺术剧场观看了蔡瑶铣主演的《海港的早晨》彩排。演出进行中，江青由着好发议论的秉性，在座位上不时发表着即兴式的意见，旁边的张春桥则不但恭谨地听着，还要在剧场微弱昏暗的灯光下，密密匝匝地将这些指示记录在他的小本子上。张春桥对这位咋咋呼呼的“客人”更加谨慎，对她所有的

意见，任何有关音乐、布景、演员，乃至一个动作、服装上的一块补丁、一件道具、一个发式的议论，他都是有言必录，照办不误。每一次陪江青看戏，都是将她喋喋不休的意见记录下来，回到家后重新整理，向剧组传达。

张春桥也是高居要位的人，他深知协助江青搞京剧革命，只是俯首听命地顺从远远不够，还必须要起到参谋作用，能发表出一些真知灼见来，而京剧确实又是他的弱项。但对京剧革命又不能象征性地应付，他必须钻进去，才能当好江青的助手，协助她搞好京剧革命。他必须好好学习京剧知识，于是他叫人为他找来京剧书籍及名伶唱片、录音带，守在电唱机、录音机边，也像老票友一样，闭着眼睛拍着腿听、学、哼着。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他这样搞了一阵子，居然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唱腔流派也能应付两句，只要胡琴一响，他也能听出什么是西皮、二黄、高拨子等曲调来。

要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对于京剧本来外行。自1964年他接管了那几出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任务后，才开始与京剧结缘，不但紧张，而且感到疲劳不堪。他的女儿张维维回忆当年情景，说：“爸爸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对理论有兴趣，平时不看电影，不看戏。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时，他的生活就改变了，要看剧本，要听戏，回家虽然很累了，还要听录音唱片。”³¹

张春桥发现，江青对于会泳青眼有加，于是竭力为于会泳在江青面前显露才华创造机会，他也想法逐渐提升于会泳在“戏改”工作中的地位，发挥他的作用。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音乐学院却提出要求，把于会泳调回学校，而且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早早就把于会泳揪出来批斗了。

1966年10月2日，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原《海港的早晨》)两个剧组赴京公演。当张春桥知道于会泳被写了大字报，没能随剧组来北京，就以江青的名义，坚持要于会泳来北京搞京剧音乐创作。

张春桥一再坚持，于会泳终于被红卫兵押送北京。于会泳之所以被批斗，是因为他解放前的一桩旧事。1947年4月，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向

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于会泳所在的文工团指示各小队疏散隐蔽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为了行动方便，又规定各人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物就地埋藏起来。于会泳在埋自己东西的时候，顺手写了一张纸条，意思是：蒋军官兵弟兄们，我家只有一位老母亲，如果你们拿到这些东西，请寄到我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同时他还留了一张照片，在纸条上又加了一句：如果把东西拿走了，请把我的照片寄回家中。他还把家中的地址写在照片背后。因此，于会沪被看成是逃兵，材料一直放在档案中，文革初期即受到批判。张春桥听了沉思片刻，说：这也算不得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以后就别再提了。此后在文革中，于会泳果真再也未因此事受到影响。

协助江青大搞京剧革命（下）

在搞样板戏的过程中，从政治领导的高层到具体创作人员，对戏的主题、具体情节，都在不断地争论着。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两个芭蕾舞剧时，争论尤为激烈，前者甚至被批评者斥为“大毒草”。张春桥对江青在北京搞的《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是南北呼应，热情支持。他跑到上海芭蕾舞学校鼓吹江青精神，要用江青搞《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模式来改编芭蕾舞剧《白毛女》。《白毛女》是在延安诞生的歌剧，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就有三家大型沪剧团演出这个解放区的名剧。1960年成立的上海舞蹈学校，首排芭蕾舞剧《白毛女》，胡蓉蓉作编导，仍然保留了歌剧中喜儿、杨白劳、大春、黄世仁的人物关系，只是把剧情作了浓缩，也突出了喜儿和大春爱情的这根线，1964年首次演出。

1967年4月22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舞蹈学校，接见了部分师生并讲了话，他说：“《白毛女》舞剧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可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都否定了。”“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修改没有问题，闹翻天也可以。”张春桥还要《白毛女》剧组向《红色娘子军》学

习，他说：“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张春桥提出了对《白毛女》修改的宗旨：“把大春和喜儿的爱情关系削弱，加强阶级斗争，要让喜儿在阶级斗争中提高。”“通过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劳。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要通过大春的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的形象突出。”在谈话中，张春桥还批评了电影《白毛女》，他说：“电影结束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舞剧）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³²

4月25日，江青接见了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全体人员，作了谈话，说：过去，有关《白毛女》的戏里杨白劳是喝盐卤死的，喜儿是一个人上山的，喜儿和大春有爱情关系。要修改成杨白劳是被地主打死的，喜儿和几个姐妹一起上山，削弱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关系。至此，在一片争论不休声中，最后还是由江青一锤定音。

1967年上海市夺权之后，张春桥把于会泳叫到兴国路招待所，指示于会泳说：“我这次来上海之前，江青同志在百忙中特地找了我，托我向你问好，还谈了上海那几出戏的情况，让我考虑一下以后如何搞。但是，你也知道，我和文元不可能常回上海，所以，我已提议了，由你把那个戏抓起来。对于上海的样板戏怎么搞，必须明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样板戏，只能搞一言堂。最后由江青做主。³³

于会泳常对人说：“没有江青、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于会泳！”他带着这种感情，对江青有关“样板戏”的一言一语都有所收集，又有着经营两部“样板戏”的实践经验，加上得到善于分析、总结、提高的张春桥的具体指导，他终于写出《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刊载于1968年5月23日的《文汇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于会泳提出“首要任务论”和“三突出论”这两个以前文艺理论中没有的名词，引人注目。文章中写道：

我们根据江青同志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

于会泳首创“三个突出”，使江青、张春桥都极为欣赏。从此以后，“三突出”作为“样板戏”的共生物，在文革期间也就成了中国文艺的经典性理论，成了文艺创作的丝毫违背不得的金科玉律。江青搞京剧革命，经过移植改编，成了“革命样板戏”，其他剧种再移植时，就严格规定“不准走样”，比如《红灯记》中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的大小，补在什么地方，各个剧团、各个剧种的铁梅必须完全一样。至于唱词、念白，更规定一个字都不能改。

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北京一次与文艺界座谈会讲话中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认为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随即向徐景贤传达江青讲话精神，要他搞调查，抓典型。

12月15日，复旦大学教学实践队在上海县北桥公社灯塔大队的工作进入总结阶段，该校生物系在北桥公社办的“九二〇”培训班也正值结业，他们就把塘湾公社共和大队故事员洪富江请来讲《智取威虎山》。洪富江为了使故事好听，讲述时以当地口语做些添枝加叶，插科打诨，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此时正在上海县梅龙公社蹲点的徐景贤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报社记者去了解情况，并写了一个报告送到张春桥那里。12月23日，张春桥在简报上批示：“请五办（市革会农村组）阅，并请将上海县情况查明，报市革会。”三天后，上海县革命委员会将《关于旧艺人洪富江借讲革命故事为名，丑化杨子荣形象的情况报告》呈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感到不具体，次日再次要记者将“这件事调查清楚，写一报告”。并要求将调查清楚的报告“批转各单位（包括公社、大队）”，同时要“对这些所谓艺人，特别是支持者要进行狠批”。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1970年1月20日，一份《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调查》完成。这份调查报告对故事员洪富江讲《智取威虎山》故事的表演写得比较具体，体现了张春桥的要求，他亲笔起草了一份文件，1月23日他将文稿传送给上海市革委会的同时，又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作为市革会文件下发，同时以“编者按”形式刊登在《支部生活》或《工人造反报》上。

1970年1月25日，张春桥审定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70]5号文件》

发布。《文件》转发了这份《调查情况》，张春桥起草的文件变成编者按语，强调说：“我们所以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并不是小题大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三年多了。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歇一歇了，至少可以少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了。保卫革命样板戏，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那是文艺界的事，同我没有多少关系。³⁴果然是这样吗？洪富江、施春年来给我们上课了。³⁵这一堂课……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你想歇一歇，人家可不歇；你不管文艺，文艺来管你；你不批判四条汉子，四条汉子就跑到你家门口大肆放毒，而你居然还兴高采烈地替他叫好，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的革命同志好好想一想吗？这类事，不是发生一件，也不只是上海县、金山县，别的县也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³⁶

洪富江成为破坏样板戏的典型后，被押到全县各乡镇和市区一些单位批斗。这年的除夕，洪富江被批斗到深夜11点，到年初一早上6点又继续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其长子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当教师的女儿下放劳动，亲戚朋友断绝了来往。有关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县革委会一律写检查报告，一百多名干部受到牵连。

上海县新泾公社有农民业余作家将《白毛女》改编成沪剧，便被以破坏革命样板戏论处，改编执笔者被判了4年徒刑。以讲故事、演戏剧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案例，在全市工厂、街道和农村曾被揪出多起。1970年4月25日，在全市公判大会上，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静安区谈元泉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10个区和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170多处，演唱活动280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1.6万人次。谈元泉本人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中五人被判处死缓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张春桥、江青的这种所谓“保卫样板戏”的做法，毛泽东批评说：

《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四次电视，一次电影。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农民创作了

一部好戏。现在结尾不好。《海港》太平，矛盾不突出，玻璃纤维吃了能有生命危险，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女演员太过分了。《红灯记》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沙家浜》里阿庆嫂比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智取威虎山》没有戏，只有一场“打虎上山”有戏，还是学的“林冲夜奔”，其实都是过场戏，特别是“定计”就是过场戏，大段唱腔搞得那么长。杨子荣上山孤军作战，八大金刚一个也没有分化过来，杨子荣孤立得很。后来李平跑上山，差点把他搞掉，为什么“定计”那一场不让少剑波审他而让杨子荣审他，结果又跑上山，人为地紧张。

毛泽东又说：

以前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我说不要那么讲，允许人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脸上不抹白鼻梁就行了。样板戏能有几个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龙江颂》拍成电影就好了，广大农民就可看到了。³⁷

其实，江青搞京剧革命，抓出几个样板戏，还是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毛曾多次观看样板戏，对其中一些还提出修改意见或者赞扬。1967年6月16日，他看了《智取威虎山》，把其中的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同志们整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装飞速前进”。在张春桥的政治生涯中，追随江青搞京剧革命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令他颇有成就感。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他回忆搞样板戏的历程时，曾带着一点豪情地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是江青培育了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³⁸

今天，我们对京剧革命，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客观评价。一方面，江青搞京剧革命，推行了文化专制主义，一花独放，文革中，除了几个革命样板戏，戏曲的其他艺术形式都被打入冷宫，萎谢凋零。但是另一

方面，江青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还是不应当否定的，而且她对京剧改革确实也作出了成绩。今天所说的看戏，过去人们称之为听戏，就是听演员的唱腔与道白。革命样板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无疑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们带着这样鲜明的政治目的，但并没有完全用政治代替艺术，无论唱腔或道白等，都有着创新与发展。

唱腔方面，几个样板戏在唱腔上都吸收了歌剧唱腔的专用特点，把歌剧音乐擅长于人物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吸收融入，创造了新的唱腔，但是唱腔的革新中还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韵味，如几大京剧流派的唱腔，在样板戏的唱腔中无时不隐时现。再如把小生及花脸的唱腔融入旦角的唱腔中，以及真假嗓的并用，西洋乐器的配乐等，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道白方面，许多念白既保留了传统京剧里的韵白所具有的韵律性、节奏性和起伏性的长处，又创造了富有音乐性的特色，使白话做到了押韵、精炼而又富有诗意的美感。除此之外，如舞美、灯光设计等，和传统京剧相比，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

1976年8月，张维维出差去北京，顺便去看望她的爸爸张春桥。此时张春桥正因毛泽东病重而忧心忡忡，张维维问：“今后，你还有什么能留得下来吗？”张春桥沉思了一阵说：“恐怕只有几个样板戏了。”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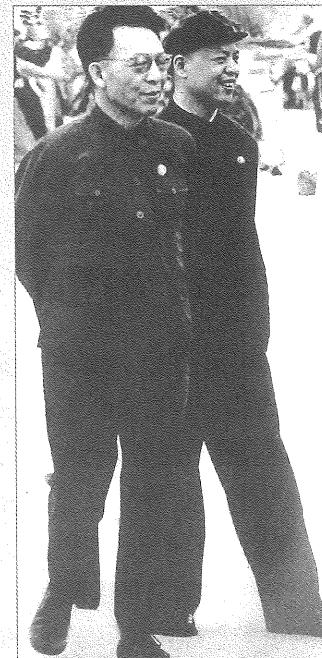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页。
- 2 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部长。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2页。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15页。
- 5 同上，第303页。
- 6 同上，第305页。
- 7 《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第337页。
- 8 《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和笔者谈话，1994年6月。
- 9 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 10 林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
- 11 巴金的发言，经删改后刊于《上海文学》，1962年5月号。二十年后，1982年，贾植芳根据原稿编入江苏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
- 12 黄佐临，戏曲、电影艺术家。瞿白音，戏剧、电影艺术家、评论家。魏金枝，作家。
- 13 “中央领导同志”指的是刘少奇。
- 14 荆位祜：《陈其五的坎坷经历》，《世纪》，2010年第5期。
- 15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16 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
- 17 田汉，剧作家、评论家，曾任中国剧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刘仁，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 18 1963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引用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为一”解释“对立的统一”，和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说法不同，毛泽东说他们用“合二为一”反对我。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率先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
- 19 张春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6日。
- 20 徐景贤，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288页。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
- 23 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 24 康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 25 董必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 26 穆欣，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 27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文革期间《文汇报》印的内部学习资料。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64页。
- 29 夏征农，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继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 30 魏文伯，书法家、诗人，著有《松下诗选》。
- 31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32 张春桥：《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1967年4月22日。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257页。

- 34 阳翰笙，戏剧艺术家、作家。“四条汉子”原为抗战前夕作家鲁迅在文章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的称呼，当时双方对左翼文学的口号问题进行论争。文革时期，这一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四人以及其他与鲁迅的论争者都遭受到了政治迫害。
- 35 施春年，上海曲艺演员，由于他当时在讲《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加了一些噱头，被定为“破坏革命样板戏”，遭到批斗和关押。
-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2日发表揭发张春桥的文章中曾引用过张春桥的这几句话。
- 3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43—444页。
- 38 吴孟庆：《40年前的所谓“破坏革命样板戏”事件》，《世纪》杂志，2010年第1期。
- 39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第五章



张春桥（左）与姚文元（右）

第五章

批判《海瑞罢官》

农村包产到户之争

1961年2月，已经调离安徽去山东任职的曾希圣，戴着立功赎罪的心情又回到安徽。在全省干部会议上，他听到宿县农民刘庆兰单干不穷，单干没有死的事，为之动容，经过调查和酝酿，他决心在全省试行推广这位农民单干的经验。1961年7月8日，毛泽东在南下途中到了蚌埠，曾希圣向他汇报了试行责任田制五个月来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¹

责任田是“救命田”，农民从内心里发出呼声！为了能更明确表达农民的愿望，责任田变成了包产到户，当时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才能挽救中国困难的农村和饥饿的农民。从1960年冬天到1962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风起云涌。出于权宜之计的毛泽东也出现了软化的态度。这一时期，刘少奇在湖南长沙的天华大队蹲点，陈云到上海郊区青浦县调查。所以，全国上下的各级领导干部、许多研究农业体制问题的专家都认为这一发展的前景很是乐观，包产到户有合法的可能。

1962年2月25日，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毛泽东要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了解农业生产恢复的情况。毛泽东指定了调查

的四个点，分别是他的家乡韶山和外祖家湘乡唐家坨，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和蹲点的长沙天华大队。毛泽东指定的这四个点颇可玩味，可能是他以为自己家乡的农民会听他的话，跟他走，不会赞成包产到户，想以此和刘少奇的家乡及蹲点的地方作个对比。但是，田家英调查下来，四个点的农民都不愿再吃大锅饭而忍饥挨饿，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

田家英不主张包产到户。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向毛泽东转送了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并附了一封信，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可是时隔一年，经过湖南的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当时调查组的人不同意包产到户的思想占了上风，但田家英还是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人继续进行研究。

田家英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准备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在去上海之前，他先把炭子冲大队的调查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认为很好。田家英到上海时，恰巧陈云也在上海，他便把几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陈云，陈云看后称赞说：观点鲜明。这时杨尚昆也打电话给田家英，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可不可把农村私有制部分放宽一些？²田家英立即表示赞同。毛泽东态度却很冷淡，只是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在公社高潮时期，开口闭口都是群众，或群众路线，因为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为群众所接受。而农民经过挨饿、死亡后，不大相信他的共产主义了，所以他也就不要群众了。帝王文化都是把民众当作统治者头上的帽子、脚上的鞋子，需要的时候就把帽子戴在头上，鞋子穿在脚上，不需要时则以破帽蔽履弃之。

田家英又回到韶山，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而是继续搞调查研究。他以后又派人到安徽的一些县作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对于解救已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而可行的，但他还是留有余地，认为将来农业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受到限制。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先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说：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接着就提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田家英问：少奇同志的意见可不可以向主

席汇报？刘说：可以。接着田家英又向邓小平汇报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文件，其中就有“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一项。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赞成。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十大政策》的文章能不能按原来的计划起草，中央究竟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一个关键关口，那就是看毛泽东是否同意。7月6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汇报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汇报结束，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无法回答。毛泽东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³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就分田到户问题，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交换过意见，大家看法大体一致。陈云见到毛泽东之后，阐述了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很生气。7月8日，毛泽东召开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批评了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明确表示了他自己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⁴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在围绕分田到户问题发生争论的同时，1962年6月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封长达8万字的信。在信中，彭德怀就庐山会议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组对这些问题逐一调查。庐山会议之后的现实情况证明，彭德怀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因此，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主张给当初错划右倾的人平反，当然也包括彭德怀在内。1962年7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承认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而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在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就提出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全民公社所有制，一大二公，作为他的乌托邦理想强制推行。而三年“大饥荒”的灾难，表明了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七千人大会讨论中国农

村经济体制时，主张从全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及人民公社三级所有，毛泽东感到这虽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相比后退了一大步，但还不是私有化，仍然在集体经济范畴内，所以他还是很不情愿地作了让步。如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的底线冲破了，中国农村经济走向了私有化，他无法再忍耐，再让步，他要进行反击。从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讲，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实行集体化，要提高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看出阶级分化的厉害。到了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全面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批判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批右倾翻案风就交织在一起，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批判《海瑞罢官》

对于包产到户的实行，除了林彪没有表态，其他中央领导都予以支持，应当说此时的毛泽东显然感到孤立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虽然讲了一番阶级斗争，但心中很清楚，那是会议上的讲话，到底有多少人听他的？要真正做到峰回路转，必须从具体的事情着手，制造舆论，动员群众。有谁能帮助他实现这样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看看身边的几大笔杆子，不安于现状的陈伯达本来就不大讨他喜欢；胡乔木在政治上左顾右盼，也不十分可靠；最贴心的本来要数田家英，但此时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闹得和他有些疏远，同样不能完全依靠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启用自己的妻子江青了。于是长期称病的江青，这时突然行动起来，寻找可以批判的对象，帮助毛泽东突围。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出手不凡，抓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对几部电影的批判，又搞了京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毛泽东对突破重围的选择，但是在党内外虽然有所震动，却无法带动全局，一时兴不起波澜。特别是党内，以为毛泽东针对的是文艺界的事情，也跟着毛泽东对文艺界进行整肃。

1962年的7月，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认为这出戏讲海瑞上疏、退田、平冤狱有问题。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她就去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希望他们采取措施，批判《海瑞罢官》，但她的意见没有被理睬。江青很恼火，于是去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大权的康生。康生表示支持江青的意见，但他认为时机不成熟，要耐心等待。

1964年，康生大概是发现时机已到，于是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再者，京剧《海瑞罢官》中又写有海瑞退田，恰和当时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分田相联系，前可以批彭德怀，后可以批单干风。批判《海瑞罢官》可以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江青也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时，原来肯定和欣赏《海瑞罢官》的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表示同意康生、江青的看法。

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1964年9月，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表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但不要点名批评。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受到批评，他认为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对他的一次围攻，胸中盘结的郁愤之气驱之不去。这样，毛泽东要突破的就不只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所受的包围，还要出七千人大会所受的气。他说：“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我们现在不注意，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⁵毛泽东在其他地方也说过“看出问题”之类的话，即是指看出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旨，物色作者。1964年10月，她在北京找到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虽然没有推托，但是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纯粹的学术文章，要在文章中与吴晗讨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他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和1962年单干风联系起来，有些勉强。既然李希凡不愿意按江青的安排接这个写作任务，江青就在北京找其他人，找了几个人，都不愿意写，原因是他们认

为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碰不得。后来才在上海找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及江青后来不止一次谈到在北京组织批判《海瑞罢官》受到阻力，这不是夸大其辞，而是确有其事。林默涵提到：江青曾对我说，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中宣部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⁶可见，毛泽东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一开始就是公开的，她想通过中宣部这样的中共中央权威机构开展批判，没有受到理睬，所以江青痛恨中宣部，及至毛泽东对中宣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评海瑞罢官》是姚文元1965年写的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简称，一般都把此文称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或者说是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1967年4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在谈到《评海瑞罢官》时说：“柯庆施是支持的。”由此一些搞文革史的人推出一个结论：柯庆施如果不死，就成了“五人帮”了。

是柯庆施把张春桥、姚文元借给江青写《评海瑞罢官》的吗？先看江青到上海组织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间。江青要开展京剧革命，“为人民立新功”，自1963年2月来上海移植《红灯记》、《芦荡火种》之后，就成了上海的常客。搞样板戏时，张春桥已经成为她得心应手的合作者。但是这次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向上海提出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没有明确日期。江青自己说“保密了七八个月”，《评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以此往前推算，如果是七个月，应是这年的4月，如果是八个月，应该是3月。了解内情的胡锡涛有一个说法是，石西民前脚走，江青后脚就到了上海。⁷石西民调往北京文化部任职，他向《内刊》辞行的时间是1964年12月30日。他于1965年春节之后离沪赴京，时间当在1965年

的2月，江青到上海也应该是这个时间。江青没有与石西民相遇。石西民离任，他原来分管的宣传文化工作，即由中共上海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分管。

1965年2月，柯庆施在什么地方？他正在广州养病。查查柯庆施的日程表就可以知道：在江青来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那一年，即1964年3月28日，柯庆施开始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经医生检查患了肺癌。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庆施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庆施做肺癌切除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庆施的手术前会诊。4月20日上午，医生为柯庆施做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当时，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庆施。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来沪访问，又赶往医院看望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庆施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⁸9月18日，柯庆施离开北戴河在北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柯庆施应陶铸之邀由北京去广州养病。⁹1965年1月19日，柯庆施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庆施应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之邀离开广州去成都。4月5日，李井泉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养病的柯庆施。¹⁰柯庆施特别好喝酒，这顿酒席从晚6点钟吃到9点钟，临睡前，他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立即从北京和上海派出由两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赴成都，配合四川医疗小组进行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在4月9日下午去世。

从以上日程来看，江青为批《海瑞罢官》初到上海时，柯庆施已离开上海去外地养病了，而且就没有再回来过，在养病期间，不再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也没有和江青见过面。所以江青说在搞《评海瑞罢官》时，得到柯庆施的支持，是子虚乌有。

据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¹¹陈丕显的意思是在柯庆施去世后，江青才和他取得联系，虽然和柯庆施去世的时间对不起来，但是他承认

江青向上海市委“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是通过陈丕显，而不是柯庆施。一些文革研究者把柯庆施说成是《评海瑞罢官》的支持者，这是从柯庆施是极左这个思路来的，是要把柯庆施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把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感到对这次运动不理解，就请示周恩来，周说：说批判《海瑞罢官》是在上海市委领导下进行的，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南下攻击上海市委时，副市长宋季文接见红卫兵，就用了周恩来的话回答。红卫兵不相信，就与北京核实。周恩来却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并找到张春桥，说上海市委怎么搞的？红卫兵就说宋季文伪造总理指示，对他进行批判。张春桥可能是一方面要维护周恩来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上海市委抢功，所以他很不高兴地说：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上海市委一点力也没有出，这是主席的功劳，当时江青也在上海。从一稿至六稿是我与姚文元同志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件事和市委根本没有关系。”¹²粉碎“四人帮”后，陈丕显也说批判《海瑞罢官》和上海市委没有关系。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两个人说话时的环境不同，陈丕显的话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说的，此时参与批判《海瑞罢官》被视作是极大的耻辱，甚至是犯罪，陈丕显当然要作洗刷。张春桥讲话时是安亭事件之后，那时批判《海瑞罢官》被当作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有着举旗的光荣。客观地讲，江青、张春桥当初要避开上海市委的领导，其实是不可能的。首先，江青南下是向上海求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瞒着中央的刘少奇，但不可能瞒着上海的陈丕显。再说张春桥当时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虽然在搞京剧革命时和江青有过合作，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是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没有陈丕显的同意，即使他有这样的胆量，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也不允许他轻举妄动。

张春桥说“这件事和市委根本没有关系”的动机是怕市委“抢旗子”。在上海宣布夺权得到毛泽东支持后，张春桥在讲话中又提到批判《海瑞罢官》一事，说得就更为明确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

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路线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¹³上海市委要举批判《海瑞罢官》这面大旗，张春桥是绝不会允许的。

毛泽东是什么时间知道江青搞批判《海瑞罢官》的，也有着类似情况。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说：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如果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¹⁴

然而三个月后，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¹⁵

前面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但是三个月后又说“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批判《海瑞罢官》”，两次的说法完全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在这三个月中，毛泽东的心境是有变化的。

第一次谈话时间是在1967年2月3日，继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接着就是全国性的全面夺权，由于权力再分配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动乱，局势的发展使毛泽东也感到无法控制。在接见卡博·巴卢库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有一次谈话，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带着老婆孩子去延安劳动，毛对刘的辞职请求没有表态，只是安慰刘：“读一点书吧。”此时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局势还未完全明朗化，留有余地，所以才说出“我不知道”这样推诿的话。

而第二次谈话时间是在1967年5月，当时毛泽东还谈了许多话，其中有“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了。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¹⁶从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胜利在握的愉快心情，当决战进入关键阶段，戏的“主题、正题”已经揭示了出来，这场戏的总导演也就登台亮相了，说“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批判《海瑞罢官》”，这才是不作掩饰的真话。

《评海瑞罢官》是怎样写出来的

张春桥从自己的经历中早已感到“江青很难侍候”，这次又接到协助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但他对江青也不敢完全相信，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海瑞精神”是主席提倡的，海瑞戏是主席喜欢的，主席是否真的要批判《海瑞罢官》？为了摸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底细，张春桥到北京去了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个面摸摸底。但当时康生没有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却回答说，（回上海的）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¹⁷张春桥之所以前恭后倨，是因为他已摸到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有恃无恐了。后来他谈起时，回避了康生不见的事，只是说：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我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叫彭德怀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做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¹⁸

毛泽东对能不能批判《海瑞罢官》不作明确回答，只说他仅仅是谈到过海瑞，而不曾提倡过“海瑞精神”，使张春桥壮了胆，为他协助“难侍候”的江青搞批判《海瑞罢官》打消了顾虑。张春桥还介绍说：究竟

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

张春桥这个谈话，有许多模糊的地方，似乎一开始对到底是批北京的《海瑞罢官》还是上海的《海瑞上疏》，举棋不定，是经过他们几个人商量以后决定的，似乎不是江青带着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从北京到上海找作者。笔者认为这是张春桥在有意搞模糊的障眼法。因为他做出上述谈话的这次会议，时间是1966年5月，主持人是刘少奇，而毛泽东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的目的，谁都心中无数。江青带着毛泽东的任务到上海来求助的事情，在当时还是机密，不能打草惊蛇，天机不可泄露，张春桥当然也不好明说。当然，这时张春桥也不一定知道毛泽东的意图——这次斗争的目标就是刘少奇。

姚文元当时是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文艺组组长。张春桥把写作班先安排到武康路18号，后又搬进武康路2号，《内刊》编辑部就搬到高安路12号去了，姚文元在文艺组的唯一的一个兵胡锡涛，和姚文元在一间办公室里。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胡锡涛有一段回忆：

我在《内刊》，属文艺组，是姚文元旗下的唯一成员。他不上班，不审稿，参加几次编辑会议，自6月开始，他就住院治疗肝炎，至11月出院。江青来上海组织写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文章，姚文元出院不久，闲着无事，遇此重任，当然顺势而上。

《内刊》在丁香花园里，我住在过道小楼，一人独居一间，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受任何约束。可是，《内刊》搬到宛平路11号，情况完全变了。编辑部为了照顾姚文元，文艺组办公室竟达40平方米，比我原来住的那个小屋大八倍。总务组把我原来用的小床小书桌搬来之外，同时放了两张大书桌，两个书橱和两张沙发，称“文元同志要来办公，是为他配备的”。他一来，我很不自由，首先早晨必须在8点钟起床，有几次我睡到8点钟，被他撞见，弄得我很尴尬。其次午休时我的那张小床只能给他用。他在宛平路写作，林文渊说在打字室偶然发现打字员翁佩珍打的稿子是姚文元批判

《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和大家都以为此稿和姚平时写的批判稿一样平常，都不惊奇。因为大家都不知其背景，都蒙在鼓里，所以姚不担心泄密。我真盼望他快点结束这篇文章写作，快点离开，我就有自由了。可偏偏这篇大作进展很慢，停停改改，改了又改，足足花了半年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写得最慢的一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少人推断此文是朱永嘉所写。他们的理由是姚文元只是高中毕业生，不是行家，不可能引用那么多《明史》材料。此说不确，姚确实是此文的执笔者，张春桥也参加讨论并执笔修改，朱永嘉只是帮他查了一些《明史》资料，并未参加初稿或改稿。¹⁹

朱永嘉本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专攻明史，进上海市写作组后组织关系都是在复旦大学，工资也在复旦大学领取。1956年，笔者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朱永嘉是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因此相识。文化大革命期间，笔者在《文汇报》任记者，和写作组因稿件事也多少有些接触，现在又是隔路相望，常在小菜场相遇，笔者也不时去他家谈天，曾问过他有关帮助姚文元查资料的情况，他说：

姚文元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要我帮助找资料。当时不知道后面的背景，只以为他是批评一个剧本，是个学术问题，我就给他找了《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海瑞的有关资料都编了进去，此书重新出版时，吴晗在前写了序言。还有就是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当时我将吴晗的文章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此外还找了苏松地区的地方志，和海瑞同时代相关人物的文集，如高拱、徐阶的文集和传记。我是研究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的，海瑞是嘉靖时代，要早一些。姚文元写到第八稿时，把稿子拿给我看了，才知道是批吴晗的，这时已无话可说，更不要说打招呼了。我主要是帮助核对资料，如退田、投献、平冤狱、修吴淞江，帮他注明引文出处。我看他那样写法，我就说：“你把吴晗批得那样凶，上纲到政治问题。”姚文元说：“这你就不要管了，帮我把资料搞准确。”²⁰

从3月搜集海瑞的资料开始，到6月中旬，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江青又以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名，特地从北京来到上海，审查稿件。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有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修改。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修改意见。之后，姚文元对稿件作了多次修改，张春桥也多次把修改稿和现代京剧的录音带一起放在航空袋中运往北京，送给江青审阅。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陈丕显、魏文伯也去了。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给陈丕显带给北京的江青。陈丕显谈及此事时说：“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经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判《海瑞罢官》的稿子。”²¹

《评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讨论定稿会议的情景，朱永嘉有一段记载，他写道：

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3、4或者5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²²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的问题总还得问我。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坐，一会儿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些意见。所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当然最后发表的时间是毛泽东定的。²³

《评海瑞罢官》是经中共上海市委讨论定稿之后才送给毛泽东的，并不是张春桥的个人行为。而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避了这次市委讨论定稿的事，只是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

他”，“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生病死成都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²⁴并表示在批判《海瑞罢官》期间，他只是起了信使的作用，这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而文章发表前，要不要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招呼，上海市委也有过讨论。陈丕显、曹荻秋都主张打个招呼，张春桥却不同意。²⁵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到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彭真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²⁶对此，1966年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介绍说：

还有一个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没有必要送了，主席9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北京）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²⁷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毫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²⁸

不过张春桥说，他自己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打过了招呼。邓拓是他的老领导，在1949年前的《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是编辑部主任。后来，张春桥对朱永嘉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但据说，张春桥打电话过去，邓拓不在办公室，没有直接联系上。²⁹

1955年批判“胡风集团”时，张春桥初识姚文元，为姚文元筹划把一篇文章化开成多篇长文，又不惜报纸版面，对姚文元的文章作了突出的处理，使姚文元名声大振。但姚文元毕竟不如张春桥阅世丰富，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发表了几篇和右派言论近似的文章，足以划为右派，但在转风调向的关头，张春桥对他拉了一把，不但使他脱离险境，而且成为批判明星。姚文元从此就以大批判为武器，成为文化战场上常胜不败

之将。人们说姚文元就是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他指向哪里，姚文元就打向哪里。其实也不尽然，他们之间还是有着文化契机，情谊在师友之间，无论是张春桥的女儿或是姚文元的女儿，都认为张春桥爱惜姚文元，姚文元敬重张春桥，两人情谊甚笃。以往张春桥通过姚文元的笔，表述传递他心中想要说的话，但很少听到他动手修改姚文元的文章的事。而姚文元这次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不仅为文章作筹划、立提纲，而且还亲自动手作了修改。《评海瑞罢官》之后，他们不但写文章合而为一，连出席会议的讲话提纲，也都充分地交换意见。

张维维把张春桥、姚文元合作写文章比喻为共同画一幅画。她说：

我爸爸很欢喜姚文元，姚文元对我爸爸的感情也很深，他很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章和我爸爸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就比较好看。他们相得益彰。在写文章时，姚文元是起润色彩绘作用，而我爸爸写的东西是干巴巴的。就像作画，我爸爸先打一个很粗的草稿，画几笔硬枝条，姚文元是著色、发墨、晕染，甚至离开了原来的草稿，他的才情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爸爸然后就带着欣赏的目光，品评姚文元的手笔，然后在局部地方再点两笔，颜色深的地方再强调一下，有的地方再作一点勾勒，就成为一张很好的画。所以这样的文章很好读。我爸爸和姚文元配合得很默契。³⁰

熟悉姚文元的人，特别是市委写作班的人，谈起姚文元，都会说他不讲究衣着，更不讲究饮食，不只是吃饭速度很快，有时端着碗站着吃，有时在食堂里买了馒头捧在手里走着吃。张维维对此也有介绍：

我们家吃饭时规矩很大，嘴里不能发出响声，不准用筷子在菜碗里翻来捡去，饭粒或菜汁不能丢在桌子上，不然我爸爸就要批评，即使不批评，也会用筷子在桌子上敲敲，提醒我们注意。姚文元吃饭是唏哩哗啦，我看到他吃饭，我无法把饭咽下去，但是我爸爸受得了，能容忍他吃饭的弱点。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吃饭，爸爸可以不看他，不看也就忍了。爸爸说，姚文元和一般人不同，吃饭时也在用脑子，不在饭上，他思索问题，构思文章，所以他放下饭碗

就能写文章。姚文元的太太金英精致漂亮，她爱姚文元，也能容忍他的弱点。姚文元笔下的东西的确很美。姚文元的可爱也就在这里。³¹

这是张维维的感受。而受过姚文元批判的人，读了他的文章，恐怕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了。

文章发表前后学者们的态度

《评海瑞罢官》基本定稿之后，中共上海市委没有选择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张春桥把文稿交给《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并委托陈虞孙出面以《文汇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史学界座谈会。当时并没有明确要在《文汇报》上发表，只是在文章发表之前听听意见而已。《评海瑞罢官》的核心问题还是退田、平冤狱。姚文元写道：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

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

1965年11月4日，上海史学界座谈会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举行，由陈虞孙主持。参加座谈会的学者，人手一份《评海瑞罢官》。大家一看文章是指名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这已经使到会的学者震惊。再读文章，文章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更是觉得莫名其妙。

发言一开始，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过于盛气凌人，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在给吴晗下判决书。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斗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和政治问题硬扯在一起，岂不是陷罪于人？

在座的史学家们对《评海瑞罢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特别是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他们认为姚文元把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中明朝嘉靖年代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焦点”，还说《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是株毒草等，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与会者普遍认为，这种把政治问题扯到学术问题上，陷罪于人的做法，是在制造新的文字狱。会上一致要求，姚文元要做大的修改才能发表。

陈虞孙把学者们对《评海瑞罢官》提出的修改意见整理后送给张春桥。张春桥对座谈会的意见没有做任何反应。11月9日下午，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精白纸大字本定稿交给陈虞孙，并要求“全文照发”。晚上陈虞孙回到报社，把稿子往夜班的桌子上一摔，甚为得意地说：“这一次《文汇报》要翻身了！”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在《文汇报》上刊登了。

1966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把陈虞孙当作“牛鬼蛇神”抛出，接受批判，要他交待是如何篡改毛泽东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指示的。谈到接到任务时的心情，陈虞孙说：“市委指示以《文汇报》为主战场以后，我认为，这是《文汇报》可以大显它的特色，党报固不在我的眼里，连市委宣传部亦不参与这个工作，这是对《文汇报》的特殊待遇。那时我想，我原打算不久以后，要让位退休了，能在让位之前，立下一功，树立《文汇报》新的形象、新的地位，这也算我对《文汇报》的后人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³²应该说，陈虞孙的这个想法是真实的。虽然张春桥对交下来的任务没有言明毛泽东这个大背景，但像陈虞孙这样久经风雨、历尽沧桑的老文化人，凭他的经验，仍有高深莫测之感。

张春桥还要《文汇报》立即办好三件事：一是严格按照他的部署，组织文章和版面；二是及时听取各方面的反应，编印内部参考，由他决定分送范围；三是编印供组稿用的参考资料。张春桥还严格规定保密制度和送审制度，并要《文汇报》专门建立第二排字车间（保密车间），所有送审稿、情况反映和内部参考资料，全部用四号仿宋字印精白纸大字本。这样的本子当然是送给毛泽东看的。

当时令《文汇报》费解的是，姚文元的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而在被毛泽东批评为带有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上发表？现在看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文汇报》作为民间报纸，本来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为一些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它和知识界是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毛泽东深知《文汇报》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他要玩知识分子于股掌之间，首先要把《文汇报》玩于股掌之间，要实践他的心事，非《文汇报》莫属。

文章发表后，参加11月4日座谈会的史学家们顿时清醒了许多，叫苦不迭。本来陈虞孙主持座谈会时有言在先，各位发言不在报端发表，只是听取意见而已，所以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看到文章的要害部分只字未改，才恍然大悟：这次又被钓上钩了。当时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的钓鱼行动。其实，一般人哪里知道，此时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反右派的知识分子，而是在酝酿着更大的政治行

动，对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

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评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记者纷纷出动，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地，或者当面采访，或者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对文章的反映。从11月11日开始，《文汇情况》以《关于评〈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为题，连续出了多期。接受访问或参加座谈的专家学者有吴晗、翦伯赞、周予同等130多位。

在《文汇报》记者访问的这一百多人中，对这次批判的态度各有不同。周予同算是一种类型，他始终不相信吴晗会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不认为《海瑞罢官》是“毒草”。周予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改得不多，只是材料多加了几条，如《国榷》里徐阶退田的亩数都是新加的。我们在谈笑话，恐怕这些资料是朱永嘉给加上去的，因为从中确可看出，翻过了一些怪书，如《国榷》、《廿二史札记》等。姚不搞历史，也不懂历史，是不会去找的，这显然是人家帮的忙。”周予同还说：“姚文元把《海瑞罢官》搞成政治问题了，这就不能争鸣了。我的意见还是把问题引导到学术争鸣上去，后面部分不要这样写。既然发表了，也不好再往这方面讨论了。我相信，如果把这个问题当作学术讨论，那么吴晗是会争辩的。”

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又是一个类型。他的学生多，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前，他在全国巡回演讲，影响很大。当时，张春桥特别要《文汇报》驻北京记者注意翦伯赞的态度。但是当记者去采访他时，他表现得不动声色，说：“我还没有看过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见到报纸之后，误认为是武汉大学姚文元教授所写，我心想这个老头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鼓励。后来才知道是姚文元所作。”“我没看过文章，不过听别人告诉我，姚文元的文章是提得很高的，怎么个高呢？说，不得了，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的文章，提到政治上去了。超过了学术，进到了政治领域了。”

在记者接触到的一百多位专家中，尽管谈话时对《评海瑞罢官》提出了严厉批评，却没有一人愿意站出来写文章和姚文元辩论。只有上海市文化局蒋星煜，还是《文汇报》记者三顾茅庐，他才答应写，结果写来的是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因何而罢官》，只是用资料组

成，根本不提吴晗与姚文元谁是谁非问题。文章虽然排成了小样，送给张春桥审查，但他没有同意发表。

做出惊人之举的是上海市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组长杨兆麟。他在批判《海瑞罢官》座谈会上，发表了《擂鼓赞姚文，海剧争论乱弹》诗十首，当时被视之为“反动诗词”，惊动上海。其中第七首写道：

自作诤臣美海公，一人耿耿众昏庸；
领导变成嘉靖帝，干部尽是应声虫。

这显然是把毛泽东比做昏庸的嘉靖皇帝了。此诗被《文汇报》记者拿来刊登在《文汇情况》上。此后在文革中，杨兆麟被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

毛泽东一夜无眠，张春桥披挂上阵

11月14日，《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去拜访吴晗，请他谈谈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吴晗对记者说：“你们谈了，我才谈；你们不谈，我也不谈。平等对待。”记者说：“这是学术讨论，特地来听你的意见，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可以谈的。”“姚文元的文章前面部分都是学术问题，后面部分则是政治问题。”谈到政治问题，吴晗气呼呼地翻着书，书中不少地方划了杠杠，可见这两天他已翻过有关的书籍，在书上查找反驳的资料和论据。

吴晗研究海瑞，是1959年、1960年两年间的事，他把所写文章根据写作时间作了排序：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146—168；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四、《海瑞》1960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228—237；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1960年11月13日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月间加上一篇序，出版了单行本。

谈到写作目的，吴晗说：“写《论海瑞》，目的为了反右倾。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开会，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三面红旗，但他自命为‘反对派’。所以我在9月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专在人民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为此，我写了《论海瑞》，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吴晗理直气壮地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出，姚文元说《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是不对的。据胡锡涛的回忆，姚文元写文章时也并非对此不了解，但他根本不当回事。由于时间的错位，文章失去了立足之地，也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吴晗抓着这个硬伤进行自卫，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不怕。”并表示要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

11月12日，《评海瑞罢官》发表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历时一个星期。一路上，他找了地方领导人谈话，作调查研究，了解工农业生产、军队情况，也谈了计划生育、避孕药等问题，但是没有评《海瑞罢官》的话题。对他胸中酝酿的这场严酷的斗争只字未提，不动声色。他于11月17日晚上到达上海，住了几天就到了杭州。在以后数月的时间里，他就游居于杭州和上海两地间。³³

在途中，毛泽东读到了《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应》，内容和《文汇情况》刊登的一样，同是吴晗在11月14日对记者的谈话（可能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记者同时采访）的内容。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注：“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³⁴一夜无眠，大概是为姚文元文章的硬伤所触动所致。

2007年10月20日，朱永嘉和戚本禹见面，交谈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得失，其中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在他们的《谈话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戚本禹：海瑞罢官没选好。海瑞其实很好，没选好。一开始就不利，初战不利，没办法说，勉强地给姚文元打补丁，主席讲的，也是给姚文元打补丁。

朱永嘉：第八稿送上去以后，主席给彭真打了声招呼，然后到正式发表改了几稿，但是文章没什么大的改动。

戚本禹：这个责任在姚，张春桥、江青不是搞历史的，你参加批判文章应该讲，搞什么样的突破口更有利。

朱永嘉：选“海罢”再作突破口恐怕是失策，不一定选这样一个口子发起攻击。

戚本禹：哪怕三家村都比“海罢”好，批评三家村的文章还可以。可以找的东西很多，《海瑞罢官》实在找不了多少东西，这可是一个失策啊！³⁵

同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民间也没有得到什么积极响应，反而有点越批越香。这是因为经过各种批判斗争洗礼的中国平民百姓，逐渐形成了逆反心理，其实他们心中并没有明确要反对谁，只是有种好奇心：报纸上不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吗，他们就偏偏要看海瑞和吴晗的有关文章到底写的什么，结果后者反倒更热起来了。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之后，坐落在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所存的《海瑞集》、《海刚峰集》很快就卖完了，有关海瑞的公案小说《海公案》及其他公案小说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也被抢购。吴晗的著作，不但《灯下集》等销售一空，刊登过吴晗著作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如《北京文艺》、《新观察》、《历史教学》、《人民文学》有关各期，读者也纷纷争购，购买不到的，就向亲戚朋友借着看。

但是《文汇报》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来信来稿却是门庭冷落，《评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一个星期，只收到三篇来稿，其中有一篇还是反对姚文元的。陈虞孙的日子不好过，张春桥的日子更不好过。被读者冷落，这在《文汇报》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张春桥一心要炒起讨论的热潮，

他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有关专栏。11月29日，《文汇报》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为通栏标题，刊登上海戏剧学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人写来的4封来信。不言而喻，这些信都是被授意写的，是制造出来的民意。来信前面，用醒目字体，加框刊登编者按：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十一月十日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单位已进行几次讨论，有的正在展开讨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讨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

这则编者按是张春桥亲手拟定的，并指令《文汇报》把这个按语连续刊登六天，实则是在玩钓鱼的把戏。

前面说的“三篇来稿中有一篇是反对姚文元的”，这篇来稿的作者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马以鑫，他以“马捷”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也谈海瑞罢官》，对《评海瑞罢官》提出不同意见，表现出一个中学生敢于对权威怀疑的勇气。马以鑫在投递文章的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说明了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并署上了他的真名和真实身份。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应该对这个孩子加以保护。但是《文汇报》没有这样，而是马上派记者对他的背景作了调查，于11月24日把马以鑫的信连同以马捷笔名写的《也谈海瑞罢官》在《文汇情况〔增刊〕》上发表。

作者在信中明确表示是“密信”，“不要给予公布”，报纸居然不尊

重作者的意见给予公布了，还要对作者的政治背景加以了解，这种“审查作者”的作法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产，不但对马以鑫是如此，对许多作者都是如此，这堪称是一大发明，在全世界报刊史上都是罕见的。顺便说明一下，随着形势发展的严峻，《文汇报》又出了“增刊”，“增刊”机密性更高，发送的范围很小，这是因批评《海瑞罢官》应运而生的。

以后，陈虞孙又按照张春桥的旨意，从来稿中找到几篇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稿件。燕人（忻元锡）的《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几点看法——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1965年12月3日发表。³⁶同一天发表的还有虹口中学教师林丙义的《海瑞和〈海瑞罢官〉》的文章。不管怎样，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总算在《文汇报》上展开了。但是，到12月15日，《文汇报》就发表姚文元化名劲松的《欢迎破门而出》一文，对以上不同意见的文章进行反击。

张春桥毕竟是报人出身，知道如何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原来自《评海瑞罢官》发表之后的18天时间里，《文汇报》只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7篇。自11月29日开辟专栏发表读者来信后的4天时间里，就收到来信来稿119件，其中赞成姚文元文章的64件，持有不同意见的13件，明确反对的14件。来信来稿的特点是专家少，群众多，老年少，青年多。其实这只是为了造成一种热闹现象，和问题讨论的本质没有关系。

“步步紧逼”和“第二战场”

正当张春桥在《文汇报》上“钓鱼”时，坐镇上海，筹划指挥的老钓翁毛泽东所关注的则是北京的动静：北京的报纸迟迟不转载，市委书记彭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评海瑞罢官》发表后的第三天，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来电询问文章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北京也就不对上海的文章作回应，两地赌气了。11月17日，毛泽东到了上海，见北京不转载，就指示在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但北京最初就是不订，这表

明北京对批判《海瑞罢官》采取了对立态度。毛泽东是借此进一步观察北京对这次讨论的态度。北京不订，毛泽东也动气了，所以文章的是非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这种僵持的状况延续了半个月，而外界对此都不了解。11月25日，罗瑞卿路过上海，陈丕显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他，并托他把以上情况转告周恩来。不了解内情的周恩来早就关心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大约在1963年5、6月份，周恩来就对吴晗说：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了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恩来要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³⁷周恩来则让《人民日报》转载。

此时，毛泽东得不到北京的信息。张春桥忙指示《文汇报》紧急行动，加强《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力量，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调一批记者、机要人员赴北京办事处，明确要求他们的工作是情况第一，要主动上门摸情况。再就是加强《文汇报》资料研究工作，关注外地报纸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动向。《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发回《北京发行姚文元单行本情况》的报告，据北京新华书店反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书，是11月29日收到的，30日下午王府井、西单商场等一些主要街道门市部开始发售。截至12月3日，王府井门市部已售出三百余本，西单商场门市部售出一百余本，其他门市大都卖出几十本、一百本不等。买书的人，大都是干部、解放军、学生。党委宣传部门、历史、文艺单位、高等院校等通过新华书店机关服务部主动供应了，也有的是机关系统到门市部购买的，如全国剧协一个单位就买了一百多本。

对北京的按兵不动，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67年2月3日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他还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³⁸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吴晗的态度，而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了。

其实，北京并没有按兵不动。《评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当

天，《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去找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郑天翔主管新闻，同时又主管工业，因他忙于工业，对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注意，他和范瑾商量时还以为：人家批了我们的人，我们转载就是了，准备第二天就转载。但是邓拓不同意，所以第二天就没有转载。而且彭真曾和邓拓商量，不转载《评海瑞罢官》，同时让邓拓、李琪分别写文章，把吴晗的问题限定到学术的范围，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向阳生”和“李东石”的两篇文章。³⁹但此时形势逼人，北京不得不低头。为了讨论北京的报纸如何转载的问题，彭真找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的结果，彭真同意转载，但要有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还是很慎重，要把按语给周恩来看。

11月29日至12月2日，北京的四大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评海瑞罢官》，并均加了“编者按”。《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该按语由周恩来审定，其中还加了一句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自定的，其中写道：“《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观点与上述两报大体一致。却唯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旗帜鲜明，气势逼人地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周恩来、彭真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审定，旨在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但《文汇报》转载时，张春桥特意指定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放在前面。

北京四家报纸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的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邓拓对彭真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

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怕，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转载了《评海瑞罢官》之后，又连续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商榷》，李琪以“李东石”笔名写的《评吴晗的历史观》，周扬主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每篇文章发表之后，《文汇报》都用最快速度排印成大字本往上送。这几篇文章的编者按，讲的是学术批判，很合总编辑陈虞孙的胃口。新华社播出“编者按”后，陈虞孙把“编者按”排了出来，并上报给张春桥说《文汇报》准备发表，张春桥对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原来，毛泽东认为这几篇文章是“假批判”。

彭真让吴晗作自我批评。12月24日，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刚脱稿，《文汇报》记者就从《北京日报》得到《自我批评》的样稿，迅速送到上海，张春桥看后，马上指示《文汇报》开座谈会，可谓迫不及待，步步紧逼。《北京日报》准备12月27日把《自我批评》见报，但在此之前，《文汇报》已把《自我批评》送到了参加座谈会的学者手中。12月30日，座谈会仍然在政协俱乐部举行，仍然是由陈虞孙主持，请来的与会者也仍然是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原班人物，但整个气氛比第一次座谈会沉闷得多了，不过大家以为仍旧是在内部谈谈，不见报，所以发言时还是比较随意。他们的发言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是反话正说，只有极个别的真心拥护姚文元而批评吴晗的。但座谈会临近结束时，陈虞孙宣布这次的发言要登报，学者们感到意外，都表示不同意见。后来，陈虞孙告诉大家，报社先把各位的发言整理出来，寄给本人，由本人核对校正后再寄回报社。1966年1月7日，座谈会的发言在《文汇报》刊登出来，但内容和现场时稍有不同了。

朱永嘉领导的罗思鼎写作组与一般的历史学家则不一样。吴晗在《自我批评》中仍然坚持认为姚文元文章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使他无法屈服，朱永嘉就赶快组织文章，为姚文元补漏洞。姚文元在文章中批判吴晗时，认为吴晗美化海瑞，海瑞退田并没有把田退还给农民，退的只是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的投献的土地。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回应说，海瑞退田不是针对“投献”，而是针对“白夺”农民土地。于是写作班就以罗思鼎的笔名写了《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找了史料证

明“投献”与“白夺”是一回事，刊于1966年2月1日的《文汇报》。据朱永嘉说，这篇文章由他起草，后由王知常或吴瑞武改定。他们还写了《论“告状”》，刊登于1966年4月1日《文汇报》，也主要是从学术上为姚文元补漏洞。

但大部分历史学家们不配合，仍使批判《海瑞罢官》遇到阻力，张春桥意识到硬攻不行，便立即向陈虞孙交待“在批判《海瑞罢官》的主战场之外，再开辟第二战场，任务是‘围城打援’”。对如何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找朱永嘉商量，朱永嘉提出了几个可以讨论的题目。这样《文汇报》就开展了让步政策和“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从清官问题上击退同情吴晗的“援军”。1966年1月，《文汇报》又开辟了专版，发表了《揭开迷雾看清官》和《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清官“贪官”》两篇文章。这个讨论一直到4月28日才结束。

毛泽东：要害是“罢官”

在张春桥双管齐下，把批判《海瑞罢官》沿着学术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前几天，毛泽东已经从更高层面上将《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时候甚至连吴晗的《自我批评》都还没有脱稿。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人。⁴⁰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⁴¹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⁴²

毛泽东“罢官论”一语既出，可谓是石破天惊，既扭转了《评海瑞罢官》批判“分田到户”、“三自一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题，也算是对吴晗的回答，补了《评海瑞罢官》时间错位的漏洞，把濒临失去生命力的文章救活了。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要害是罢官”的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田家英的意见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

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还是纠缠不休，非要把这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告了密，田家英又被加上一条罪名。⁴³

这个加上去的“要害”，姚文元之前也不知道。徐景贤曾经问过他：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回答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即使是张春桥，似乎也不知道这个“要害”，不知毛的意图，当时也没有想到触动社会如此之深，当然也没想到彭真会那样发怒。张春桥说，那时我们理解也很浅，也未准备大搞，只想发表姚文以后，吴晗会反驳，那我们写几篇文章就完了。

张春桥此说与陈丕显的回忆有所不同，陈丕显说，张春桥在一个小会上讲：“这个‘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陈丕显引用了张春桥这段话，又加了一句“他的居心是何等的阴恶”。⁴⁴笔者则认为，即使陈丕显的回忆属实，张春桥的这番话，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我标榜。如果在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时，就已意识到要害是“罢官”，为了立功，他们不会不写进去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彭真，明确向他摊牌：要害是“罢官”。彭真当即明确表态：“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什么关系。”⁴⁵在这里，毛泽东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对彭真的坚持，他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做结论。”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正值毛泽东生日，彭真请几位上海市委领导人吃螃蟹，地点在锦江饭店南楼的14楼，参加者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和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也在被邀请之列。大家为毛泽东生日祝酒，张春桥回忆说：

彭真回到上海，恰是主席生日（12月26日），吃饭时为主席祝酒，他说他早就要批吴晗，叫周扬、范瑾、邓拓写文章，写得不

好，你们上海写了嘛，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但又说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我说向阳生也有问题。彭真还没等我说什么问题，就打断我的话，说那是我叫他写的。又谈了主席说了要放，政治问题以后再谈，刘仁、邓拓是左派。就是叫我们放，我们已经放了好多嘛。他谈再钓几条大鱼，你到北京，我请你吃烤鸭。我们还建议彭真抓一下，他说要抓。我们也建议有什么情况可联系，他也指定联系人。这样反而把我们的手脚束缚起来了。⁴⁶

此时，《文汇报》正在版面上开展清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的肯定了清官的作用，也有的认为清官是麻痹人民的麻醉剂，正反两个方面的争论看起来很热闹，对《评海瑞罢官》的讨论也在正常进行，实际上这时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力及斗争方向已经向深层次发展了。

毛泽东的斗争目标原本是刘少奇，但现在彭真成为第一位人物了。彭真阻止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第一个回合虽然失败，但他没有退却或投降的意思，他还在和毛泽东较劲。彭真回到北京后，于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起草一份文件向政治局汇报《海瑞罢官》讨论以来的情况。⁴⁷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上，彭真说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文件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认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陆定一认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列席会议的许立群谈到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判。康生则持反对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两种力量的交锋已经针锋相对了。

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⁴⁸《汇报提纲》中体现了彭真和陆定一的讲话精神，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要允许和欢

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汇报提纲》交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向这时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2月8日晨，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人乘坐专机到达武汉，王任重来机场迎接他们，并通知彭真等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⁴⁹当彭真见到毛泽东，汇报说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可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的事他做不了主。但毛泽东还牢牢记得另外一个“两个月以后做结论”，即关于吴晗的事，他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则仍然坚持两个月之前的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的文章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说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场的康生忙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即使是康生的发明权，毛泽东采纳了康生的谎言，也变成毛泽东的东西了。中国历史上，谎言祸国，这是屡见不鲜的。那些向皇帝进谎言的佞臣固然可恶，而将谎言变成灾难的仍然是皇帝。彭真、许立群又提出应该批判关锋及整左派风的问题，毛泽东却说：“这个问题三年后再谈。”但后来他对关锋等左派明确表态支持，彭真也无可奈何。毛泽东听完彭真的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但也没在文件上划圈。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的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但此时，他已经在暗中准备反击的武器，在帮助他的人中，就有张春桥的身影。

山雨欲来风满楼

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在《二月提纲》起草的同时，2月2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总政分管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地方上请张春桥参加。他们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座谈会由有关人员整理写成会议记录，后由张春桥执笔修改，完成了座谈会《纪要》初稿。张春桥那几天对上海的同志说，他好几夜没睡觉，就是搞这个文件，累得要死。这篇《纪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修改了三遍。《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后增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就显示这个纪要非同一般，表明了江青和林彪的关系。再有毛泽东对《纪要》作了18处修改，其中有人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可谓《纪要》的点睛之笔，军队要支持文化大革命。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写信，称《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还专门用了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代表了文艺的新方向。这样就奠定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旗手地位。《纪要》最后由陈伯达改定成文，于4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

张春桥在修改《纪要》时，加了这样一段话：“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条重要理论根据，并兼及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此后毛泽东多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加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

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⁵⁰这个《纪要》也成了江青“出山”担任要职的宣言书，是张春桥和江青结成政治联盟，进一步走近毛泽东的纽带。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存在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势。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部署已在他的头脑里酝酿成熟。从张春桥写成原稿的那几段话，到毛泽东加写的那几段话，我们更可以明确：张春桥已经走进毛泽东的心里，和毛泽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不像别人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还东张西望地看风向，看气候，而是铁了心地跟着毛泽东。

彭真等人结束了武汉之行，2月12日第二次到了上海。张春桥后来谈了这次和彭真见面的情况：

这时他(指彭真)有文件了，就是那个《提纲》，我们找他谈，他说问题已解决了，你们看文件就行了。我当晚同时看两个(文件)，就是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自我批评的文件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晚上与田家英、吴冷西同桌吃饭。田家英和彭真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问题解决了。我们认为问题没有解决，我说还要谈谈。次日胡绳与我谈，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说主席曾两次问吴晗是否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提纲》提到演坏戏的演员不要检讨，是有所指的。因为《文汇报》曾登谭元寿的文章，批判吴晗说写海瑞不对。⁵¹这是好事。报上还登过马连良的文章，这是捧吴晗的文章，说吴晗文章有现实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些，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纲》却不让登他们的文章，如按《提纲》，还有多少人可参加战斗？⁵²

张春桥虽然预感到“问题还没有解决”，但面对底气十足的彭真，又感到还没有完全吃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摸清《汇报提纲》的底细，

3月初，张春桥以上海市委书记处名义，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北京了解情况。让杨永直去，是因为杨与许立群延安时期是同事。杨永直到北京后，根据张春桥要求，反复询问许立群《提纲》中的“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请示彭真后，打电话对杨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即向陈丕显和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问杨永直是否听错了，杨说没有听错。张春桥于是断定：

所谓学阀恐怕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因为他知道主席说过叫批判吴晗。《提纲》草案里没有“武断”二字，正式文件加上“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吴晗的政治问题，说主席武断，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势压人。⁵³

张春桥则根据杨永直的汇报向江青写了一个报告。康生显然从江青那里得知了这消息，于是向毛泽东报告了彭真的思想状况。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先后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⁵⁴他尖锐地指出：“中宣部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许立群在电话中传达彭真指责上海市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的事，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⁵⁵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⁵⁶

此前，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许多话，谈到他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借题发挥，讲司马懿的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党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并不理解，顾虑多端，所以毛泽东讲古比今，巧妙地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而张春桥，则明显听懂了毛泽东讲话的弦外之音。

胡乔木这时也在杭州。但他接到的通知不是邀他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是要他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在回北京之前，胡乔木想见毛泽东，但毛泽东迟迟不给答复。胡乔木黯然神伤地整理行装北上，在抵达上海时，杭州方面突然打来电话，说毛泽东要见他。胡乔木赶紧调转方向，返回杭州，终于见到毛泽东。胡乔木从1941年来到毛泽东身边，如今整整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和毛泽东见一面竟然有这么困难。路上就想好，见到毛泽东什么都不说了，还是向毛泽东汇报并检查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的思想。但当他握住毛泽东的手，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毛泽东依然是那样谆谆教诲般地嘱咐：“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胡乔木失宠了，这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最早找吴晗写海瑞，并曾替吴晗精心修改过《论海瑞》，恐怕是他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 1 陈大斌：《离离原上草：责任田的起源》，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 2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 3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 4 “六十条”，又称“农村工作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0年代初由田家英建议并参与起草，毛泽东亲自主持，对纠正大跃进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 6 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 7 1962年，胡锡涛撰写的论文《略谈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刊于《新

- 建设》。该文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分析论证文学体裁的产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读了此文之后，评价说：“难能可贵。”石西民专门把胡找到市委谈了一次话，并于1964年4月将其调入华东局《未定文稿》编辑室当编辑，成为姚文元的部下。
- 8 钱信忠，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 9 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区第一书记。
 - 10 朱德，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贺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
 - 11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 12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及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2月23日。
 - 13 《张春桥在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2日。
 - 14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7页。
 - 15 陈青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 16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86页。
 - 17 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第274页。
 - 18 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5月6日。
 - 19 胡锡涛：《写作班·内刊·红旗杂志——往事琐记》，未刊稿。
 - 20 朱永嘉和笔者的谈话，2006年2月。
 - 21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第729页。
 - 22 王少庸，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
 - 23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历史史实的回忆》，大风出版社，2014年版。
 - 24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第29页。
 - 25 《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年5月。
 - 26 《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上海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编：《红卫战报》，第16期，1967年11月8日。
 - 27 1960年代初，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了各界的激烈讨论，前后延续两年之久。

- 28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6日。
- 2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2001年。
- 30 张维维接受恺蒂采访时的谈话，2015年11月12日。
- 31 同上。
- 32 陈虞孙1966年8月24日的交待材料。
- 3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35—541页。
- 34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9页。
- 35 金光耀记录整理的未刊稿。
- 36 忻元锡，曾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普陀区委、黄浦区委第二书记等职。
- 37 刘志坚，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 38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9页。
- 39 李琪，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 40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大众哲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与王力、戚本禹一起失势被捕，并被开除党籍。
- 41 指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1965年12月发表于《红旗》杂志第13期，该文以不点名的方式给历史学家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
- 42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1页。
- 43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81页。
- 44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第40页。
- 4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1页。
- 46 《张春桥1966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1966年5月6日。
- 47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指1964年7月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提名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
- 48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简称《汇报提纲》，因写于1966年2月，固又称《二月提纲》。
- 49 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 50 1966年3月毛泽东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加写的话，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3—1404页。
- 51 谭元寿，京剧演员。

- 52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6日。
- 53 同上。
- 54 赵毅敏，时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
- 55 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6页。
- 56 同上，第1406页。

第六章



文革时期的张春桥

第六章

毛泽东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批判翦伯赞

《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发表后，12月8日，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事本身就说明了该文的政治分量。这篇文章以“造反有理”为核心，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为经典，大量引用了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论述，还引用了恩格斯、列宁有关农民战争的语句，批判了历史主义。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内，都知道是这在批判翦伯赞。

同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的问题。除说了如前章所述“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那一番话的同时，他还说道：“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孙达人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在《评海罢》发表之前曾写了学术论文《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9月22日刊于《光明日报》，对一些历史著作中有关让步政策的观点作了综述，指出让步政策似乎成了解

释中国古代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一张万灵膏。不过他并没有指明哪些观点是翦伯赞的而进行批判。

翦伯赞读了孙达人的文章，还是有感触的，但他认为让步政策论不是他的发明，他早已知道此论在中国共产党高级理论队伍中久已行用。1939年至1941年期间，陈伯达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让步政策，他所谓“让步”或“让步政策”，就是“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陈伯达最早称之为“让步”，即后来学术界所说的让步政策。当时在延安认为陈伯达的让步政策论是“最新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翦伯赞了解让步政策论的来龙去脉，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所以认为批判让步政策不是什么大问题。

毛泽东讲话之后，张春桥即指示陈虞孙由《文汇报》出面，把孙达人请来上海写有关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孙达人到上海后即住进《文汇报》宿舍，和我们的宿舍仅一壁之隔，所以笔者有时就过去和他闲聊。时间过了五十年，当笔者知道孙达人退休后移居杭州，遂于2016年5月18日前往拜访。当初我们都还是黑发青年，如今都是鬓发斑白的老人了，谈起五十年前的如烟往事，心中有着无限的感慨。

1966年春天，孙达人即写出了《应该怎样评价让步政策》这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修改，即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了。¹他不知道运动何时能结束，下乡前即把文章投给《光明日报》，直到9月才发表。这年年底，四清工作总团通知他到上海参加学术讨论。到了上海火车站，《文汇报》派了四人迎接，一位是办公室主任，一位是后勤安排生活的，一位护士，还有一位司机。护士还问及他的身体状况。孙达人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高礼遇。”到了报社，陈虞孙接待了他，要他既来之则安之，把文章写好。

孙达人说：陈虞孙多次找我谈话，但他口风很严，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春节到了，我要回西安过节，行前张春桥在家中找我谈话，谈了许多，我都忘了，只记得几个要点：你回去，陕西省委对你会很重视的；上海的条件也不错；他可以和彭真直接通话；李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主席对北大历史系的情况是了解的。²张春桥既不谈批判《海瑞罢官》，也不谈批判翦伯赞，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我写的文章的事，

他没有谈，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毛泽东有这样的讲话。张春桥谈话是在启发我，但我当时不理解他谈话的意思。从西安回来之后，我就搬到市委写作组去了，关在一个小房里写文章。那时就认识了朱永嘉，和罗思鼎小组的人接触较多。这次和笔者同行的朱永嘉说：我们也接到张春桥的指示，要帮助你写好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

孙达人写作班呆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把文章写出来，张春桥要他回去找几位助手。孙达人从西安带了两位助手回到《文汇报》，文章还是没有写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斗争的方向已经转移，孙达人写文章的事也只好作罢。就这段经历，孙达人说：“我写不出姚文元那样的批判文章。”孙达人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最近他把自己过去写的论文集编成一册《农民中国论——孙达人文存》，尚未出版。

就在孙达人写《文汇报》写文章的同时，张春桥又要《文汇报》想法把关锋、戚本禹接来上海，此事还要瞒着中宣部。时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艾玲后来告诉笔者：一天，副总编辑陆灏打电话给她，要她秘密把关锋、戚本禹送来上海。艾玲和关、戚联系后，关锋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为他们买好飞机票，艾玲不敢用报社的轿车，便向丈夫借用部队的车送他们到机场。春节期间，关、戚到了上海，陆灏安排他们住进锦江饭店。江青、张春桥向他们交底，海瑞罢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对彭德怀翻案，要他们写批判文章。艾玲后来向戚本禹透露，批《海瑞罢官》江青是支持的，张春桥是具体组织者，并向戚组稿在《文汇报》上发表。

关锋和戚本禹回到北京即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此外戚本禹还和林杰、阎长贵联名写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文章，3月24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文章说：“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吴晗是一个挂帅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文中认为翦伯赞的六篇文章有严重问题。从此开始，翦伯赞遭到批判。

4月，戚本禹等又来到上海，为《红旗》杂志组稿，准备召开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抵达上海的那天，曹荻秋、魏文伯请他们吃饭，给他留下好的印象。这样一来，戚本禹不但和张春桥关系好，而且和上海市

委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戚本禹能代他们几位领导写检讨发言稿。戚本禹这次来上海，在张春桥的帮助下，完成了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几篇文章的任务。正准备回北京时，张春桥通过秘书何秀文转告他，说陈伯达、吴冷西、王力都将来上海开会，毛主席指示他们一起写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戚本禹就留了下来，搬进了锦江饭店规格更高的南楼。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来上海，都是住在这里。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有一次见到戚本禹时，又谈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得出来的。这是我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了出来。³后来，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时，多次引用了这句话，使之成为造反派的行动纲领。

御封“起草小组秘书长”

3月31日，康生带着毛泽东对北京市、中宣部的批评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要解散五人小组的意见。4月9日至12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对《二月提纲》的批评意见，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通知，撤销这个提纲。

毛泽东在上海住了几天，又回杭州。离开上海时，让张春桥把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写出来。4月4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3月28日至30日的那些讲话，并提出自己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已经同康生说过，但应当以上市委名义正式提意见。曹荻秋不赞成以书面形式，说要提就是口头谈。张春桥当然不会听曹荻秋的意见，还是写了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呈交毛泽东，毛说“很好，需要彻底的攻”，并通过康生转告张春桥“不要有无穷的忧虑”。可以说到了这种时刻，毛泽东已经看准了张春桥；张春桥也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在以后的行为中就有恃无恐了。

4月，撤销《汇报提纲》的《通知》在北京完稿，送到杭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陈伯达起草的《通知》，认为不行，另外成立起草小组，放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穆欣，戚本禹被张春桥留下，也是小组成员。⁴毛泽东封张春桥为“起草小组秘书长”，要他让小组成员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张春桥除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心招待外，毛泽东有什么新的指示，也都是通过他向起草小组的秀才们传达，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张春桥的地位在向上升。

毛泽东对稿子每天都有修改，再每天从杭州送到上海交张春桥，由张春桥再交起草小组的人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由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想法。后来《通知》排字稿上的那些黑体字，都是毛泽东亲笔加的，有些虽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毛泽东加的。这时中央也正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但在毛泽东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开常委会重要。

《通知》开头的第二段是张春桥写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给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但通过张春桥的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目的是要给曾参加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起草工作的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剥笋政策，这次剥到彭真。

毛泽东对这个文件作了许多修改，增写了一些重要段落和不同寻常的提法，其中说：“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⁵毛泽东还加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⁶这是毛泽东的画龙点睛之笔，都是用黑体字标出的。各级党委都在猜测，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常委会结束，刘少奇等从杭州回到北京。5月4日至25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撤销彭真主持写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并集中批判彭真以及同样受到政治打击的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重点是讲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如何遇到彭真的阻力，他又是如何与彭真作斗争的。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刘少奇高调批评彭真是“搞政变”外，另一个对彭真高调批判的就是张春桥了，他直接点明了彭真和毛泽东对立，《汇报提纲》的矛头是针对毛泽东的。张春桥的发言，把批判《海瑞罢官》的全过程以及和彭真的较量全盘托出，有些事即使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不一定知道，这个发言是不是毛泽东授意的，现在还无从考证。而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意，张春桥会有如此胆量吗？

5月7日，毛泽东阅读林彪于5月6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写了一段批语，称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的批语还推及其他各行业，工厂、农村、学校、商业及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⁷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杨成武、⁸陈伯达、戚本禹，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人类社会应该有个远景规划，这才是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经验，就

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⁹经陈伯达、戚本禹的撰写，毛泽东的讲话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出，这就是后来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表明，毛泽东设想了要通过文革构建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毛泽东这样超越人类社会自身发展规律，规划历史、规划未来、规划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人为地加以操作推广，必须依仗权力。而用权力推动的社会发展，最后会蜕变为残酷的暴力行为。

5月16日上午9时，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审阅的《中共中央通知》。因是5月16日通过，所以又称《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了话，由康生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内容。《通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¹⁰直接、具体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讨论时，大家都赞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为实现毛泽东的理想而产生的《通知》，也是毛泽东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革职审查，合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四人原本都是身居要职、位高权重的党政军领导，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毛泽东对他们权力的剥夺，等于将他们先前控制的首都、军警、宣传等大权由他自己掌握，有利于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同时削弱原为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彭真是刘少奇当年主持华北局工作时的老部下，在中央又一直站在刘少奇一边，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更是明确、坚定地支持刘少奇。但在批判彭真时，刘少奇并没有念旧情而手软，而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彭真定性为搞政变。

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通“政变经”。他说：“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李雪峰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讲什么。”¹¹

刘少奇大概是要彻底撇清与彭真的关系，他不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调批判彭真，6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就彭、陆、罗、杨事件对民主党派讲话时，他还提醒民主党派要提高警惕，如果彭真他们搞政变成功了，民主党派怎么办。因为他们扯起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实则是修正主义。他还劝民主党派不要上当。也许刘少奇以为，毛泽东所指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彭真，把彭真揪了出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到底了。因此他觉得对民主党派作这样的训话，继续高调批判彭真，已经充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但毛泽东并不领他的情，因为毛斗争他的决心已下，不可能因为他“痛斩大将”的让步之举而产生丝毫的怜悯和动摇。

最早的祭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攻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5月8日，由江青的写作班子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关锋署名何明写的文章《擦亮眼睛，识别真假》，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及署名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实际上是从外围配合政治局扩大会议，借批判彭真的部下，仍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彭真。

三家村是三位作者：“南”为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笔名马南村；“星”即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笔名繁星；“吴”即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三人虽然身居高官，但都曾是文人，虽经革命的洗礼，但是文人的本性难改，舍不了对文字的爱好。1960年代，他们在《北京晚报》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上，发表了许多杂文，都是在“神仙会”前后写的文章。¹²既然把自己看作是神仙，就什么话都敢讲，难免有些气话和牢骚。

此时，身在上海的姚文元也没有闲着，他已经搬进武康路2号的一间小屋，专心写作。5月初，他写了一篇《评吴晗政治立场》的文章，文章提出“挖根子”，陈丕显看了认为发表此文会使北京市委被动，没

有同意发表。以后，姚文元又在此文的基础上，改成批评整个三家村的文章。曾经帮助姚文元搜集三家村资料的朱永嘉曾和笔者谈到：姚文元很明确地告诉他，是市委要他写的文章。至于姚文元要写成什么样的东西，朱永嘉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仅仅是给姚找到邓拓的文章和《燕山夜话》，因为姚文元要重点批邓拓，又帮他找了一本邓拓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

姚文元把文章修改后将题目改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为三家村定性，说《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海瑞罢官》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文章末段的小标题为“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清算三家村的流毒”，这一节中有一段文字说：“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¹³

上海市委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曹荻秋、杨西光都不同意挖根子的提法，认为这是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彭真，太直接了，不能这样写，他们极力主张把这句话删去。张春桥当时在北京，他回到上海后他看了姚文元的文章，认为挖根子是本文的核心，不能删掉。彼此争持不下，最后都同意送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审查。5月9日，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文章，说：文章看了，很好，题目改一改，问一下作者有无意见，并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毛泽东审阅之后，将原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数字删去，这样文章的题目就成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新闻、教育、学术、文化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文章发表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立即通过《文汇报》的航空袋运送北京，发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手一份。5月11日又在全国报纸转载。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同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上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

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点出“邓拓是叛徒”，这个提法是康生提出来的，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穆欣一起讨论时，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戚本禹的文章定稿后，为了引起审稿者注意，他在“邓拓是叛徒”几个字下面划了红线，由陈伯达签字，然后直接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刘、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没有提出异议，都在清样上画了圆圈。但文章没有送给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邓拓一直是不满意的。1957年，由于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时对宣传双百方针不力，毛泽东批评他是“死人办报”，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当场向毛泽东提出辞职的请求。

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一周后，5月18日，邓拓含冤自杀身亡。张春桥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意外，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沉思着，说：“对不起邓拓，如果我事先给他透露一点风，让他思想做点准备，也许就不会自杀了。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为什么要走自杀这条路呢？”¹⁴ 也就在邓拓自杀绝命的这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见越南劳动党领袖胡志明时，说：“彭真……反对毛主席，他是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问题已经解决了。”¹⁵

姚文元、戚本禹的两篇文章发表，北京市委就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此向毛泽东提议改组北京市委，毛泽东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改组完成，彭真、刘仁被撤职。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邓小平又向毛泽东提议调陶铸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并接管中宣部。

5月23日，田家英含冤自缢于中南海办公室中。田家英从1948年26岁正当年时任毛泽东秘书，到他逝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工作了18个年头。毛泽东一生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和他可谓是亲密无间，没有隔膜。然而由于他同情农民，主张包产到户，并向刘少奇、陈云汇报，代农民讲话，而在政见上逐渐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更使毛泽东不满的是中央领导都在抓田家英为他们服务，他也感叹自己成了“公共汽车”，谁都可以搭乘。在毛泽东看来，田家英在中央领导人中东张西望，对他不够

专一。田家英也很苦恼，对同僚说：“主公的心思摸不透。”说明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田家英自比汉朝的贾谊，向朋友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主席对我有知遇之恩，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但是田家英没有想到，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和毛泽东分手。

田家英之死，对张春桥亦有震动，他知道历史上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大臣们有“伴君如伴虎”的格言，在毛泽东身边不可有半点犹豫，更不可东张西望，所以他到北京工作之后不和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走近，更不相往来，而是目不旁顾地跟着毛泽东走。

张春桥在家人面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主席不让我说的话不说，主席不让我动就不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从简报上看到戚本禹的发言，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也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言下之意军队有些不可靠。¹⁶ 毛泽东要江青告诉戚本禹：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你看张春桥，从来就不乱说话。¹⁷ 这也可能是毛泽东看重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邓拓、田家英的自杀，表面上是孤立而不相干的两件事，而实际上都是在当时高度集权政治的高压下的牺牲品。他们死在文革大幕拉开之际，成为文革祭坛上最早的祭品，相对于在文革中无辜横死的众多生命来说，这还仅仅是开始。他们以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而同是卷入政治激流的文人，张春桥从此却青云直上。升天与入地，境遇之别是如此的分明。

走上中央政治舞台

5月28日，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这一职务，陈伯达是很不情愿担任的。他说：“当时，周总理找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总理说康生不合适，说在中央里面我的文化高，要我

当。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我考虑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可先列上毛主席在起草文件时用的人，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员，写成名单交给总理。”“这个名单后来有增加，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我提出增加陶铸当顾问。各中央局也都推荐了一两个人，中南局的王任重，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刘志坚和华东局推荐的张春桥都列为副组长。小组的名单是经过中央常委同意后确定的。”“不久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又向毛主席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¹⁸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组长就像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¹⁹

陈伯达不愿意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着另外的想法。他深知江青是个非常难伺候的女人，虽然是个副组长，但她会爬到他头上指挥，他感到将来无法应付。再者他也怕犯错误，曾对戚本禹说，我们中央文革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将来要犯错误的。戚本禹安慰他说，有毛主席领导，怎么会犯错误。陈伯达说，主席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要犯错误。这应该是陈伯达不愿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真实的注脚。

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通知陶铸任中央文革顾问”，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郑季翹（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周恩来、江青提出来的，陈伯达、康生认为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历史问题严重，表示反对，张春桥沉默没有表态。毛泽东支持，说我们干部中有许多人都是出身不好，参加了革命，重在表现。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中国第一夫人江青从幕后走上前台，打破了“夫人不参政”的规则。其实夫人由幕后走上前台参政的不只是江青，中国另一位第一夫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工作中，创造了“桃园经验”，得到毛泽东认可，同意她到处作报告，传授她的四清经验。中央文革副组长中还有一位张春桥。在四位副组长中，张春桥的资历最浅，政治地位也最低，表面看他是从夹缝中蹦出来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58年他写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到以后的批判“有鬼无害”论，帮助江青搞样板戏、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直到批判《海瑞罢官》，参与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已经把他引为知音了。张春桥是毛泽东选中的棋子，把他放在棋盘上使用了。组员中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都是毛泽东笔杆子中的新秀。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虽然不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但还是满意的，没有提出异议，更没大笔一挥推倒重来。

由一个地方官吏登上中央政治舞台，这是做官的人梦寐以求的事，张春桥也不例外。何况从此他更能接近、了解毛泽东，让毛泽东对他也有更多的理解。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可以说又向毛泽东走近一步，他的内心应该是充满喜悦的。但是他当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所以一开始凡事他都以谨慎、低调的态度应对。在以后红卫兵运动高潮兴起的日子里，张春桥随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似乎总是处于陪衬的地位，远不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表现得活跃。接见红卫兵时他很少讲话，即使讲话也都是很短，没有什么独特的内容和见解。据王力回忆，在他的印象里，张春桥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发言也不多。

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在组长陈伯达和两位副组长江青、张春桥之间是表现得最明显的。陈伯达和江青开始还能和平相处，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两人的关系闹得越来越紧张。在陈伯达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的办事机构，有什么事都要请示中央；而在江青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党中央的最高的办事机构，只服从毛泽东。有时陈伯达要派中央

文革成员去处理一些事情或参加一些会议，没有江青的点头谁也不敢去。戚本禹甚至对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说：你和陈伯达说，我不去，他要去他自己去，他只代表他自己，不要代表中央文革。没有江青的同意，即使周恩来同意了也没有用。文革之初，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老秘书，还可以随时去毛那里讨论一些问题。回来后，江青就逼着问谈了一些什么，陈伯达认为谈的一些问题不成熟，毛泽东没有让他传达，江青就认为他封锁毛泽东的指示，以后不准再到毛那里去啰嗦。这样陈伯达就不敢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评他：你现在官做了，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自己写文章了。江青的专横搞得陈伯达很沮丧，说江青找他谈话是“三娘训子”，自己“是刘盆子，是傀儡”。²⁰

陈伯达是看不起张春桥的，认为张春桥是个小文人、小记者，这一点张春桥也知道。张春桥虽然和江青的关系密切，遇事总是站在江青一边的，但初到北京，凡夹在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中时，他和姚文元都保持中立。有时江青和陈伯达对一些事情有了分歧，发生争执，张、姚都不发表意见。有一次，江青和陈伯达发生争执之后，理屈辞穷，回到住处就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训斥他们：“你们俩，我在陈伯达那儿辩论，你们俩一声不吭，什么意思？没有是非观念？”所谓没有是非观就是没有给她帮助。²¹文革开始阶段，张春桥对陈伯达还是尊重的，但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逐渐地也对他怠慢起来。陈伯达后来“上了林彪的贼船”，除了彼此政治见解的相近之外，在江青、张春桥那里经常受气而得不到尊重，也是原因之一。

不仅是陈伯达，田家英也看不起张春桥。1958年，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在毛泽东身边的陈伯达、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还去查了张春桥三十年代以狄克笔名和鲁迅的笔墨之争，说张是反对鲁迅的。张春桥和王力、关锋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太好，他们彼此有些看不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张春桥除了和江青、姚文元相处比较融洽，还有就是和戚本禹相处不错。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1965年，戚本禹来上海，张春桥把他请到家中交谈，并说自己的孩子读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也想见见他。²²在戚本禹的印象里，张春桥住的房子虽然不错，但摆设很差，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在文化大

革命中，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也说：我也找不到多少理解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²³

呈送批示，推波助澜

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张春桥，仍然和在上海的时候一样，除了开会，平时就索居独处，不和别人交往。但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并细致地研究北京的情况，观察高层领导人的动态，决定自己的行动。

5月25日上午，刘少奇主持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告一段落，下午，在北京大学就贴出了由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

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前，5月14日，康生派妻子曹轶欧带领一个调查组进入北京大学。康生曾对调查组作过明确指示，这次调查重点是从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彭佩云”，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曹轶欧进入北大后，把聂元梓等找到西颐宾馆谈话，动员他们“要揭陆平盖子”，“要往上揭”。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康生即将大字报底稿报给还在杭州的毛泽东。²⁴

5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提议，经毛泽东同意，派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报纸即日起由工作组领导，实际上就是接管了报纸工作。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过这篇社论并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而是把群众运动引向地富反坏右及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专家学者。所以同一天，在杭州的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并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²⁵

在毛泽东看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突破口，可以打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康生欣喜若狂，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²⁶文革派心心相通，江青马上把这张大字报的背景及毛泽东的意图告诉张春桥，并希望上海有所行动。张春桥向上海市委传达了江青告诉他的一些背景情况，但上海市委没有照张春桥的话布置工作，曹荻秋、杨西光强调要加强领导，掌握政策，内部材料要控制，大字报不提倡，不反对，并决定全市各机关要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6月2日，上海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张春桥任组长，副组长杨西光，组员为杨永直、常溪萍、孟波、李家齐、马达、姚文元、吴云溥等。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常驻北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6月4日，陈丕显在医院召集曹荻秋、杨西光等人，研究决定在全市报刊上点名批判李平心、贺绿汀、瞿白音、王西彦、周予同、周谷城、周信芳、李俊民等八个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²⁷6月1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公开点了这八个人的名，接下来就在报上展开了批判。《解放日报》发表由马达执笔写的社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在这篇社论中，点了以上八人的名。

张春桥向上海市传达了江青放手发动群众的意见，但上海市委不接受，张春桥于是就此回到北京，坐镇中央文革小组，不再管上海的事情，也就落得一身超脱。此时，刘少奇似乎仍没有领会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意图，他仍然沿着1957年毛泽东

反右派的思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或是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中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从1966年5月到8月的三四个月内，以中央的名义批转或颁发了十个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刘少奇批准了各地党委批斗数百名中央和地方文艺、教育系统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不少是省部级高级干部，批判他们是“资产阶级人物”或“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更为严重的是他把斗争的矛头向下，要把青年学子打成右派分子。这和毛泽东当年反右派的极左路线完全一致，可以说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谁知这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加快了毛泽东向他摊牌的速度。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向大、中、小学派工作组的决定，与会者纷纷提出要求，派工作组一定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并将此事电告毛泽东。6月5日起，北京即先后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王光美也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进驻清华大学，参与对该校运动的领导工作。后根据北京市文教系统文革大学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就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²⁸

各校学生在校园里横扫牛鬼蛇神，刮起了一股“斗鬼风”，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分析其原因也很复杂，但不可否认，这与工作组初进校时对学生的支持不无关系。但是，一旦事情闹大了，工作组害怕了，又反过来对学生进行压制，又造成学生的反感，组织起来要把工作组赶出学校。这就导致工作组和学生的矛盾有些激化。本来支持向学校派工作组的毛泽东态度变得微妙了。6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去汇报运动情况，毛泽东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他并没有明确反对派工作组。

为工作组去留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开常委会进行讨论，陈伯达根据江青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一个书面建议，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此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始，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把中央文革当一回事。邓小平不但没有把陈伯达的建议拿到会上

讨论，还把他批评了一顿。会后，陈伯达回到住所哭了一场，并说：“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²⁹

6月18日，北京大学“斗鬼风”出现一个高潮，北京大学各系集中在“斗鬼台”批斗了56人，其中有多名党团干部、教师，甚至学生被斗，工作组闻讯立即前去加以制止。当时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指出上午的批斗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错误事件。张承先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新秩序”，命令北京大学五个校门关闭，控制闲杂人员的进出，并加强了门岗守卫，派遣纠察队夜间巡逻。

文革史上称北京大学事件为“六·一八事件”，对这个事件，张春桥后来有个解释：

从6月1日开始广播聂元梓大字报起，北京大学在6月18日发生了一件事，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件呢？因工作组进来以后，……运动不是斗陆平，连个斗争计划都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例如：班组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六·一八事件”，打了那批黑帮分子，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是反革命事件。6月18日以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自6月18日以后，却转变为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³⁰

6月20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关于此事的《六·一八简报》。同一天，刘少奇决定将该简报转发全国，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批示说：“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个批示被称作《六·二〇批示》。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波及社会，刮起“斗鬼风”，资反路线时期给被斗争的对象实行群众专政，罚站、罚跪、戴高帽子游街、喷气式、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等，就是继承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刘少奇树立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做法，是两者的综合

与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高压。一批知识分子为了保持自我人格尊严不受屈辱，走上了自绝之路，名人中就有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夫妇等等许多人。

这期间，毛泽东仍在南方巡视。6月15日，他离开杭州，经南昌到了长沙，16日回到故乡韶山滴水洞，面壁11天，思考酝酿文化大革命下一步战略部署。³¹ 28日离开韶山到了武汉。7月8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对林彪“政变经”讲话表示不满外，还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信中还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³² 这是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得出的重要结论，为了实行他的战略部署，他不怕乱，他需要大乱。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游程近30华里，以显示他这位73岁的老人还身心健康，还可以带领大家进行文化大革命。

7月18日，毛泽东刚回到离开半年的北京，张春桥就向他呈送了刘少奇的《六·二〇批示》。几周前毛泽东在外地知道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但他认为这是革命事件；凭什么说群众脱离工作组就是反革命？而并不知道有刘少奇《六·二〇批示》，所以看了这个文件就发火了，大骂刘少奇，说刘到处镇压群众，北京运动所以这样冷冷清清，就是因为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张春桥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进京后，向毛泽东献的一个大礼。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由理论之争发展到权力之争，由外围发展到集权的核心，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要把刘少奇拉下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在外云游，就是在观察动静、寻找契机。他采用的是上下结合的

方法，先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然后是自下而上的行动。对下是放手发动群众，即“以下对上”的方法搞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兼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的《六·二〇批示》却把运动的矛头对准了下面，这或许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行动有意采取的政治策略，或许是并未参透毛的真实目的而无意为之，但无疑和毛泽东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背道而驰，不但影响、甚至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对毛隐而未宣的意图，张春桥当时未必全部领会，但心机深沉的他，或许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所以才会把刘少奇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7月22日起，毛泽东四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同学和教师见面，转达毛泽东对学生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一再表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两个司令部的摊牌

刘少奇5月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抛出了彭真，改组了北京市委，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时，恐怕全党绝大多数党员都由此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批判《海瑞罢官》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刘少奇的一切行动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没有新的把柄，没有新的突破口，毛泽东又能对刘少奇怎样？但是毛泽东又抓住了刘少奇在工作组上的问题，并以此大做文章。

从刘少奇的《六·二〇批示》下发，到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内，对《六·二〇批示》提出异议。还是张春桥将其转递给了毛泽东，才使毛泽东发现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原先的轰轰烈烈变成现在冷冷清清的局面，其根源就是来自刘少奇的这一批示，他苦心经营的《五·一六通知》就像高升在空中的爆竹，一响了之，以下对上的群

众运动也就会由此夭折。同时毛泽东也从中看到，和刘少奇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要尽快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上向刘少奇摊牌，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为了加快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进程，毛泽东在解决工作组问题的同时，修改为全会准备的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本来是由陈伯达牵头，与王力、关锋、尹达、穆欣等做起草工作。那时毛泽东在上海，经常对北京的工作提些不同意见。意见里贯穿了毛泽东提倡的巴黎公社精神，“这是问题的核心”。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看了《十六条》初稿，说大体可以，但太长，他要换人修改。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接手了修改工作，林彪和叶群也参加了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和审定，“出力最多的是（张）春桥和王力”。³³

毛泽东在修改稿中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则，即：“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并考虑着用什么新机器代替旧机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仍然是抓住派工作组问题不放，提出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嘲讽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又说：“讲客气一点已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³⁴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面对面针锋相对的辩论，看到了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也有不肯示弱的一面。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刊有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边缘上，写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以发人深省的吗？³⁵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为标题，8月7日发给中央全会。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很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

文革派紧密配合毛泽东，陈伯达写了《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姚文元写了《永远跟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都发了言，其中江青点明了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张春桥则说：“他（指刘少奇）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不适用了。我在六四年看了记录，……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³⁶张春桥的发言虽然不长，但紧扣主题，不忘记把矛头直指刘少奇，而且把刘少奇和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联系起来，无疑是点明了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后来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到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发言，对刘少奇进行批判，他说：“我不晓得同志们怎么个经验，我对刘少奇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64年，我开始对刘少奇怀疑，这个话我当面对他讲过了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我当着他的面讲的，我对你以前毫无怀疑，我觉得你很好，但64年你怎么讲出了一个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呢？我不是对你一句话，我是对你根本的动摇了。赫鲁晓夫是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他才起来反对的，而你竟然敢于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出来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这就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根本。”³⁷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的第二天，即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称：“在当前，我们

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刘少奇的排名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接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后不久，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也叫生活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江青发言认为刘少奇没有什么，一篇大字报就打倒了，最危险的是邓小平。张春桥因为对邓小平不熟悉，所以虽然在会前和江青一起找过王任重、王力谈话，动员批判邓小平，但他自己却没怎么发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除了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外，中央文革还分批地接见北京市或外地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张春桥也参加接见，发表讲话，但还是收敛的，似乎仍把自己放在陪衬地位。

在北京接见群众组织时，张春桥很少单独接见或主持会议。他有时也回答问题，但还是离不开地方官员的身份，表白自己和大家一样，是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对北京情况不大了解，还在学习和调查中。1966年9月中旬，江青要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北京高校的四大学校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

大宾等都参加了。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指使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并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按王力和研究者高文谦的说法，张春桥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表态，只是说我们如实向中央汇报。江青听取了他的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做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呈阅毛泽东，并由王力、关锋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³⁸

张春桥在此一时期的谨慎低调，从他对女儿张维维赴京上天安门的事情上也表现出来。当时，正在复旦附中就读的张维维参加了上海红卫兵总部，编红卫兵小报，红卫兵还推选她当政委。张维维在复旦附中的表现传到北京，张春桥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家对女儿说，你去打人了？你要写检讨，你退出来。维维听了他的话，退出红卫兵组织。有人问她为什么退出，她说：是爸爸要我退出的。³⁹后来，张维维和东海舰队陶勇的儿子坐了一架小飞机，飞到北京南苑。⁴⁰开始她到海军大院看到贴了苏振华的许多大字报，然后又去天安门问中央文革在哪里，没有人搭理她。⁴¹她又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在那里读书的杨永直的女儿，她们找到京西宾馆，然后才找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张春桥见到女儿就问：你怎么来了？维维告诉他是乘坐小飞机来的。张春桥说：“以后不准和部队的孩子搞在一起。”并关照她不要到处乱跑，过几天赶快回去。谢富治来了，把维维接到他家去住。⁴²谢富治要带维维去天安门，并要她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张春桥知道了，就不准维维写发言稿，说：“写了也不准讲，哪里轮到你讲，你算什么东西！我可以带你去天安门。”但张春桥并没有带维维去天安门，还是谢富治带她去了。⁴³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100万红卫兵。他特别提出要警卫部队为他准备一套军装。周恩来闻风而动，要求陪同毛泽东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这样毛泽东就以身着军装，臂戴红卫兵字样红袖章的形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自此，毛泽东成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林彪、周恩来等陪同接见的国家领导人，除了绿军装、红袖章，

手中还摇晃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张春桥也以同样的装扮陪同接见。8月31日，谢富治把张维维带上天安门城楼，她和毛泽东握手，还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这时她看到了张春桥，张春桥也看到了她，但父女俩没有说话。张维维回忆当时的情景，对笔者说：“我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哪里是什么中央领导，就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跑来跑去，忙着照顾那些老人。”⁴⁴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共计1100多万人次。“造反有理”的思潮涌动，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推向北京朝拜，毛泽东把手一挥，朝拜者更加狂热，就如同中国古代的狂泉之国，对狂泉“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⁴⁵潮起潮落，如同醉酒与酒醒的过程一般。对红卫兵来说，这种日神的理想与酒神的狂热的结合，其结果就是悲剧。对毛泽东来说，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在狂热中不失理智。他身边的人看到他很累而又坚持接见红卫兵，有所不解，劝他不要再接见了，他以自己青年时期见到孙中山的心情为例，回答说：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的。⁴⁶

红卫兵“不会忘记我的”，这才是毛泽东最想得到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十六条》发表了，刘少奇、邓小平也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并不满意，感到阻力重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大干部本来对文化大革命感到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然存在，加上红卫兵的造反、横扫和炮打，引起了干部抵制，再加上各级干部在原来的“路线”下对付群众能得心应手，如今仍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作惯性滑行。这条路线说是“刘邓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路线，当下已成为这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是否也表明，要按照老办

法，在党内的高层内部，像解决高岗、彭德怀、彭真那样，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已经有所不能？素来“毛家天下刘家党”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实际的表现。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百万人参加的游行，刚刚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要登上天安门发表讲话，毛泽东要通过林彪的讲话，把批判刘少奇的火点起来。再一般性地谈什么批判“刘邓路线”无法打中要害，必须把他们的路线加以概括，上升到纲领性的高度，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

王力回忆说：“（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至9月），整个运动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认为要在国庆节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毛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看烟火（笔者注：一说是在天安门城楼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⁴⁷

戚本禹对此的回忆基本一致，他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会议的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就引起过很大的震动。不过会议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开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好。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江青就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信，主席作了批示，并且写了他的意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具有根本意义的，就是使文革运动的方向更加清楚了。⁴⁸

《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原来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毛泽

东决定了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一槌子定音，也只得改了过来，号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专门写了一段：“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据说这段话是针对周恩来的，认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折衷主义”。《红旗》第13期社论的写作张春桥没有参加，是陈伯达、关锋、王力起草的。周恩来读了这篇社论，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提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语回答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动路线）”。⁴⁹

林彪国庆讲话起草工作本是由陈伯达、张春桥两人承担，因陈伯达生病，后就由张春桥一人执笔，从“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张春桥是用过心思的。从资反路线提出的变化过程来看，给刘少奇定下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只是毛泽东等在那里拍脑袋，为了打倒刘少奇，随便给他加一个罪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区别在何处？从1960年前中苏关系破裂，以毛泽东为首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发起组织中苏论战，到1962年的重提阶级斗争，到连续几年的四清运动，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和毛泽东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在总体路线上没有什么区别，至少在表面上一直追随着毛泽东。直到196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时，虽然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提议修改，但刘少奇还是采用了高压的方法，制造了获得一致通过的假象。毛泽东为了自圆其说，把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限定在6、7月间五十天内所犯的错误。在这五十天内毛、刘两条路线的不同处在于：毛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刘是压制群众。毛的斗争矛头向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把斗争矛头向下，整群众，重复着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的极左做法。不过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五十天里，也揪出了如乌兰夫、周扬、夏衍等数百名走资派，他的斗争矛头也不是完全向下。⁵⁰如果说刘少奇有错误，那就是

或者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毛泽东已经把他当作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把他打倒；或者意识到了，而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自保。但即使刘少奇没有《六·二〇批示》，毛也要把他送上祭台，只不过是晚几天的事情。刘的悲剧在于自己多年造神，最后为自己所造出来的神所埋葬。

中国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等研究这段历史后提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个伪命题。此说是有道理的。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如果是针对党内的，那是从上而下，高岗、彭德怀、彭陆罗杨也是；如果是针对党外的，那是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反右斗争皆是。针对党内高层，而又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进行，文革是唯一例外，破局的恰恰是“批判资反路线”，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伪命题却起了实实在在的真作用。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及《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后，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就如同烈火，在全国燃烧起来了。

指使蒯大富点刘少奇的名

早在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的时候，1966年6月13日，以李雪峰为首的中共北京新市委派人到清华大学，宣布工作组代替清华大学党委。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住在清华。他们的本意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用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室的党政干部，包括学生政治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凡是干部全部靠边站。工作组不让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成天关在屋子里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校里出现了“游行一大串，斗争一大片，劳改一大队”的现象，干部被冠以黑帮分子、黑线人物、黑爪牙的帽子。⁵¹

6月21日，工作组通知说王光美要参加学生座谈会，学生很高兴，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王光美。开会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没作自我介绍，

学生们以为她就是王光美，于是向她提了很多对工作组的意见。结果座谈会结束，那个女人临走时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同学们感到受了骗，化工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后来就为王光美来不来参加会议展开了辩论。这本来是辩论工作组作风问题，后来就转化为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问题，蒯大富不服，继续就这个问题辩论，并贴了大字报。王光美在工作组，刘少奇的女儿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所以消息就很快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表示：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民主。7月3日，蒯大富就失去了自由，他以绝食相抗。后来等到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7月20日又把蒯大富放了，一共关了18天。

工作组撤走之后，7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到清华大学单独找蒯大富谈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两天，周恩来带着江渭清、谭启龙在人民大会堂又找了蒯大富等三位清华学生谈话，主题都是询问王光美和工作组是怎样整他们的，怎样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⁵² 蒯大富认为，这两次谈话中，周恩来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公正地听他们陈述。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蒯大富体会到：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是觉得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搜集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

张春桥和蒯大富相识于1966年9月。9月17日到20日，中央文革让蒯大富专门找红卫兵造反组织中有受工作组迫害背景的学生，在中宣部小礼堂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等人，并给他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学仍然受压制，对他们表示支持和同情。

随着刘少奇被批判，自然也不会放掉坐镇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王光美。10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王光美的检查问题，大致经过如下：座谈中，周恩来的意见是王光美住在中南海，正准备检查，同时也要经过中央讨论。周恩来说到这里，轻轻地点了一下，说：“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

也不能多讲。”这话的意思很清楚，王光美如何检查，要中央说了算，中央文革小组也不能多插手。张春桥应该能听懂周恩来这话的含义，但他还是接了一句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而周恩来仍然坚持，王光美去不去检查，如何检查，由中央讨论。

接下来，周恩来提出王光美可作书面检查。对王光美的检查同学们可以讨论，可以提意见，没有通过的话，王光美可以再检查。这时张春桥也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见状，也就不再多说，让张春桥和学生们展开了对话。不让王光美到会检查，学生有些不情愿，认为背对背的批判没有效果。张春桥认为，王光美不在场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时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能达到效果。批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们代表一个阶级。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放在观点上。对王光美也是一样，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但同学们提出要点刘少奇、王光美的名。张春桥认为不点名也能一样发挥批判作用。点不点刘少奇的名，什么时候点名，周恩来、张春桥都做不了主，因为时机未到，得听毛泽东的。⁵³

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红卫兵造反组织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10月6日开大会的时候，张春桥把蒯大富介绍给江青。

12月18日，张春桥通知蒯大富到中南海，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了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提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只有一两个人，蒯大富一听就明白，这“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张春桥明确表示，要他把刘少奇的事公开化。所谓“公开化”就是在社会上点刘少奇的名，蒯大富对此心领神会。

12月25日，也就是张春桥和蒯大富单独谈话后的一个星期，清华大学组织了5,000人上街。他们事先还开了动员大会，蒯大富在会上作动员说，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们先到天安门集合，然后兵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

这些北京的繁华地区游行宣传。他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和传单，到处刷大标语。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了全北京城。这就是按照张春桥的意思，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化了。

三十多年后，蒯大富回忆这段过程说：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主席的意思。⁵⁴张春桥找蒯大富谈话是不是毛泽东授意，恐怕史家也无从考证。除非这个秘密仍藏在毛泽东的档案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点刘少奇名这件事肯定要发生。所以无论张春桥此举是奉命而为，还是自作主张，都是符合此时的大趋势，符合毛泽东意愿的。

不回上海当挡箭牌

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变化多端。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发生了“八·三一”、“九·四”冲击上海市委的事件，上海市委组织了红卫兵以保卫市委，但为毛泽东制造的造反气势所逼，上海红卫兵也要起来造市委的反，来势之猛，使上海市委难以抵挡。对待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中共上海市委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曹荻秋处在第一线，正因病住院的市委书记陈丕显还在不断听汇报，下达指示，对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接待，以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及邻省发电报，要他们动员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回去，要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干部顶住。街头大字报揭发陈丕显把搜集来反对红卫兵的对联锁在保险柜里，如“名串联，实反党，令人发指；既恶毒，又下流，臭名昭彰”，横联“反动透顶”；“借串联，结狐群，反党反人民；用辱骂，要流氓，进行反革命”，横联“遗臭万年”；“假串联，真破坏，千里奔跑；想变天，搞颠覆，到处放毒”，横联“臭名远扬”；“实指望，这次南下，能捞到一点油水；又谁知，到处碰壁，没捞到一根稻

草”，横联“可恶可悲”。这些反红卫兵的对联，应该说代表着当时上海市领导的思想状况，而这和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陈丕显明知红卫兵运动起源于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他还是想利用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信息，并可以向毛泽东反映上海面临的困局。陈丕显还认为此时追随毛泽东为红卫兵运动推波助澜的张春桥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上海市委支持，于是给张春桥打电话，想让他同上海通通气，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同时希望张春桥能回来看看。但是陈丕显这几次和张春桥通电话，都很不愉快。他对人说：“我都懒得和张春桥通电话。”“张春桥是我们推荐给江青同志的，现在他得到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啦。”“春桥同志不愿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参加大会，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住的地方什么人又不敢去。”⁵⁵

张春桥为什么不回上海呢？他曾对人说：他们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图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干。⁵⁶以后，陈丕显再打电话给张春桥询问北京的信息，他干脆不予答复。在上海，张春桥也是当权派，有人对他1930年代在上海时的历史存有疑问，还有他的妻子文静的历史问题。⁵⁷姚文元则不只是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就是他写的那些文章也经不起分析，就凭这些，群众运动的烈火还不把他烧焦？即使有了《评海罢》、《评三家村》这几篇文章，也救不了他们，更无法替陈丕显、曹荻秋当挡箭牌。应当说，从这时候起，张春桥就在考虑如何和上海市委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了，怎么还会回答陈丕显的问题呢？

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采取保护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做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⁵⁸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一开始，上海市委还感到底气很足，因为江青的京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及批三家村都是从上海开始的，曹荻秋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这些成绩。更使上海市委感到腰杆硬的是有周恩来的支持，据陈丕显的回忆：“此时，周总理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给北京的学生。”⁵⁹曹荻秋还多次对红卫兵们

说：“总理打电话给我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从中央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周恩来为此事作些铺垫，完全有可能是这样说的。但是，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升级后，红卫兵的传单中说周恩来对此事的回答：“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宋季文歪曲我的意思，你们可以驳他。”周恩来当时说的是：“上海过去是革命的，现在也是要革命的。”显然，周恩来改了口。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的做法十分生气，他批评宋季文不应该以《评海罢》为由说上海市是有功的，他说：我和姚文元听了都气死了！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有错误与宋季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他有什么可吹的？

上海市委以周恩来的话保自己，效果适得其反，周恩来改口不承认，又被张春桥批评了一番，曹荻秋只能被迫检讨：“总理来了电话，讲了一些话，我作为上海市委负责人是不便讲的，宋季文讲了，是错误的，不对。”在那个怀疑一切的疯狂岁月里，除了毛泽东，谁说的话都不算数。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和上海市委领导一样，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大谈苦经。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说：“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⁶⁰10月16日的会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报告，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自然是合理的，并说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认为这次阻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会议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参加会议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也作了检讨。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计划是开十七天，由于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会期又延长了一个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主要是要求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讲了一线、二线的教训。他当初退居二线，结果却是让刘少奇、邓小平闹了独立王

国。在修改林彪的讲话时，毛泽东提到共产主义理想，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要创造“一个新型国家”。后来在接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提出要清算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他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⁶¹毛泽东的话已经表明，他此时已经明确中共党内有另一个阶级存在，这个阶级即是走向理想社会的障碍，所以在后来他对上海一月革命的评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是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他们三人在第三小组联合发言，开始要姚文元为他们写发言稿，姚文元推托不写，后来由戚本禹代笔，检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可以说陈丕显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有一个特殊过程。当时，陈丕显因鼻腔肿瘤治疗，准备去浙江休养。此时林彪夫人叶群打电话给他，热情地要他赴京参加会议，并表示要派飞机来接他。经过考虑，陈丕显还是由夫人谢志成陪同去了北京。到了北京第二天，江青就请陈丕显、谢志成夫妇到她中南海住处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江青对陈丕显说，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的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如何，陈丕显是很关键的人物，叶群、江青都在争取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到陈丕显的住处，公开表示对曹荻秋、魏文伯不满，说：“上海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来看，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两人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陈丕显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⁶²看来，无论是江青，或是张春桥，这时都是真诚希望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并没有要打倒他的意思。

在会议结束离开北京之前，陈毅、张茜夫妇也请陈丕显、谢志成夫妇，以及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人吃饭。⁶³他们都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没有请曹荻秋。这位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推到第一线的上海党政领导人，在上海受到群众炮轰，在北京又被中央文革几位大员批

评，是一位被抛弃的人，此时真是五味杂陈，独自一人在京西宾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席间，陈毅一方面希望陈丕显好好养病，一方面鼓励陈丕显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陈毅和张春桥都要陈丕显坚持原则。陈毅要坚持的是革命元老派的原则，张春桥要坚持的是新兴的文革派的原则。这两股力量同时在陈丕显身上发力，使他陷于矛盾之中。

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开得那么长，就是因为来自各省市及部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在会上不得不像陈丕显一样，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私下里都在纷纷倒苦水，吐怨气，谈忧虑。陈丕显有曹荻秋挡在前面，此时还没有吃什么苦头，而其他人则大摆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各级干部被揪，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戴高帽，被拉到台上批斗游街等情况。这样就形成了台上开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作些言不及义的检讨；台下是口吐真言的诉苦会。为了打通这些各路诸侯及封疆大吏的思想，所以会议时间一延再延。毛泽东早已觉察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只是自上而下打通那些干部的思想，只能是阻力重重。国庆之夜在天安城楼上同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他语惊四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⁶⁴

毛泽东这话有些破釜沉舟的悲壮。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棋盘上张春桥这粒棋子，使他增加了冲锋陷阵的底气，他准备挨“千刀万剐”，提着脑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释

- 1 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指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 2 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 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 4 尹达，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页。
- 6 同上，第579页。
- 7 同上，第585页。
- 8 杨成武，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 9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10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 11 同上。
- 12 1961年，人们度过了困难时期，知识分子可以聚在一起抒发内心的愤懑，像神仙一样无拘无束，故称“神仙会”。当时毛泽东讽刺“神仙会”是“有气出气，有屁放屁”。在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之后，“神仙会”的言论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13 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版，第29页。
- 14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15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 16 热月政变，指法国大革命中于1794年7月推翻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政变。
- 17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18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268页。
- 19 黎元洪，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为清军协统（相当于旅长），原本并非革命党人，也未参与起义，因素有威望，起义成功后被胁迫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后历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
- 20 王保春、王文耀：《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炎黄春秋》，2013年，第五期。王保春、王文耀是陈伯达的秘书，参加谈话的还有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和第二任秘书杨银录。“三娘训子”，指戏曲剧目《三娘教子》，表现孀居的寡妇三娘严厉教导顽劣儿子的故事。刘盆子，西汉末人，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后裔，被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立为皇帝，当时只有十五岁，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
- 21 王保春、王文耀：《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炎黄春秋》，2013年，第五期。
- 22 《评李秀成》，应为《评〈李秀成自述〉》。李秀成，太平天国忠王，其被清军俘虏后写有《李秀成自述》。1960年代，史学界曾就如何评价李秀成及《李



- 秀成自述》展开了争论。戚本禹的文章认为李秀成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忠王不忠”，此一论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戚本禹后来说，他写该文的目的是影射彭德怀“晚节不终”。
- 2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24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百年潮》，2001年，第九期。
 - 2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4页。
 - 26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页。
 - 27 李平心，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瞿白音，电影评论家。王西彦，作家。周信芳，京剧艺术家。李俊民，出版家。
 - 28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技校八一六兵团印。
 - 29 穆欣：《关于工作组存留问题》，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 30 《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的谈话》，1968年8月6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31 滴水洞：韶山的风景区，1962年湖南省委在这里为毛泽东建造了别墅。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9页。
 - 3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34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记录》，1966年8月4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8页。
 - 35 见《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 36 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第688—689页。
 - 37 《张春桥同志在复旦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下），第749页；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2）》。
 - 3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 39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40 陶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 41 苏振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
- 42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
- 43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44 同上。
- 45 《宋书》(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31页。
- 46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47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46页。
- 48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页。
- 50 乌兰夫，蒙古族，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 51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6、7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1976年第5期，1967年3月31日。
- 52 江渭清，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53 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0月9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54 舒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炎黄春秋》，2013年第三期。
- 55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揭发材料（一）》，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3月25日。
- 56 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工总司和红革会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2月23日，载于“交大反到底”编《反到底》，1967年1月8日。
- 57 文静，原名李若文，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边区做宣传工作，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俘变节，参加反共宣传。1947年与张春桥结婚。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 58 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3日。
- 59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 60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47页。
-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3页。
- 62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80页。
- 63 叶飞，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
- 64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1966年国庆之夜，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第七章



张春桥标准像

第七章

安亭事件

冷遇：“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

1966年11月9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海报，称当天中午12点钟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¹又称会上将彻底批判上海市委镇压工人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此时正在《文汇报》做记者，闻讯即前往看个究竟。

笔者到了会场已是下午2时，只见会场人头攒动，乱哄哄一片，会议还未开始。见到《解放日报》记者夏华乙，《新民晚报》记者何公心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女记者，她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录音箱。他们告诉笔者，造反派在等曹荻秋，他还没有到场。

正在这时，一位臂带红卫兵标志的青年骑着摩托车冲到会场，高声说，曹老头还是坚持三不，不来参加会议了。会场的气氛顿时乱了起来。原来，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筹备时，曾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勒令：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参加该造反组织的工人在所在单位不受打击；市长曹荻秋必须作公开检查。11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向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电话请示，陶铸的回答是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因此市委紧急会议决定对

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不承认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这个组织的活动。

正当会场闹哄哄之时，一个面孔圆圆的小青年走到麦克风前，用清亮的声音大声要求大家安静！但喧闹的人群还是安静不下来。夏华乙告诉笔者，此人叫潘国平。²这时，一个青年女工冲上台去，抢过话筒喊着：潘国平是政治扒手，我们不能让一个政治扒手主持工总司成立大会！接着又有几个人跳上主席台抢话筒，还没有说几句，又被另一个人抢走了话筒。杂乱的发言大意是要揭发潘国平，还有人要揭发王洪文。³主席台一乱，会场的秩序就更乱了，更多的人涌上主席台抢着发言。突然一个大个子抢过话筒，高喊：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了共同目标，我们要把会开好。又有人抢过话筒，用沉着的语调要求介绍主席团成员，会场里响起一片赞同声。后来不知是谁抬出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大会主席团成员王洪文等六人的情况介绍，会场的混乱才渐渐平息。

曹荻秋不来参加大会，就是工总司的成立不被市委承认，大家都有些担心。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既然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又希望得到当权派的承认，这种混乱的逻辑思维说明此时造反派的心理还是很脆弱的。

接着是参加会议代表发言，大多是控诉工厂的当权派是如何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又是如何受到迫害的。其中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青年，一边挥舞着手里沾着血污的白衬衣，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喊着“我控诉”。他叫谢鹏飞，是上海铁路局江湾装卸机械厂工人。他说因他和北京来的红卫兵有联系，带着他们去中学和华东局串联，而遭到华东局机关干部毒打和关押。和谢鹏飞相识之后，笔者曾问他，那件血衣是真的吗？他说在大庭广众面前怎能说假话。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小将们似乎对控诉不感兴趣，不再上台发言，而是三五成群地自行展开辩论。时约六七点钟，人群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会场，场内空座位渐渐多了，原先吵吵闹闹的会场也安静了一些。时至晚八时左右，主席团经过商量，不得不宣布工总司成立大会“胜利结束”。但仍有许多人留在会场，人们涌向主席台，嚷着：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市委不承认，我们也回不去呀！他们认为得到市委的承认，才能表明这次行动的合法性。

正当工总司的头头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北京的一位红卫兵说：“队伍不能散，到市委请愿去！”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说此话的就是包炮。⁴ 经过商量，王洪文代表工总司站了出来，举起双手对还没有离开的人大声说：“走，我们一起到市委请愿去！”

晚八时半左右，这支还有三四千人的队伍离开文化广场，浩浩荡荡到市委门前请愿去了。天下起大雨，本来在文化广场中狂躁的人群，此时却沉闷无声地冒雨走在马路上。队伍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在雨中等待曹荻秋接见，却被告知，市委接见的地点安排在友谊电影院，几千人又向友谊电影院涌去。笔者等几个新闻记者为了解事情的结果，一直跟着队伍，得知市委接见的地点改了，知道今天不会有结果，便各自回家了。事后得知，在友谊电影院出来接见的不是市长曹荻秋，而是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王洪文等人这时才明白，要市委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造反组织根本不可能。

“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回到单位不是死路一条吗？只有将“革命造反”进行到底！人群中有人提出摆脱眼前困境的方案：向中央发电，派代表到北京去！王洪文拦过话茬，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到北京去！几个头头商量最后决定：由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徐美英、蒋周法等带队伍赴京控告。⁵

半夜过后，这支已经难以控制的队伍呼喊着、奔跑着，冲向上海北火车站。此时车站月台上恰好停靠着一列赴京的红卫兵列车，戴祖祥、王秀珍等抢先率领一千多人冲了上去，顷刻间将列车挤满，潘国平、王洪文则率领另外一千多人挤上了旁边的602次列车。⁶清晨5时，红卫兵列车启动离站，于当天中午抵达江苏南京。但602次车要到当晚23点才能发车，造反队员便包围了列车长，要求提前发车，列车长被迫将情况上报，层层请示到上海市委，终于得到通知，602列车当天上午7时整准时发车。

10日上午7时整，602次列车准点开动，工人造反队员们无不兴高采烈。8时许，列车到了安亭车站，却不再继续往北开，而是被停在了离车站三公里的一片荒野中。⁷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火车开到这里停住，将车上的造反派们全部截留下来。不久之后，又从南京火

车站传来消息说：那趟红卫兵列车驶入南京车站之后，也同样被截留了。

造反派们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决定以卧轨等方式，强行拦阻过路的列车。第一次，他们拦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希望602次列车能加挂在后面北上，列车长不允许，他们也没强硬扣留，列车就开走了。

安亭，不安宁

工人造反队第二次拦住的是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而该快车的列车长同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造反派们这次急了，拦住列车不让走。因安亭段的铁路是单轨，14次特别快车被拦，使得后面的列车也无法行驶通过，都堵在了车站附近，铁路交通顿时中断。这个小小的火车站虽名曰安亭，此时却并不安宁，史称的安亭事件正式开场了。

消息惊动了北京，周恩来立即召集副总理李富春和陶铸、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致意见是：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不承认卧轨拦车、中断交通是对的。并据此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由陈伯达致电韩哲一；二是由陈伯达发电报给工人，直接做说服工作；三是派出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到现场去当面处理问题。⁸

1966年11月11日，张春桥接受使命，从北京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行前，王力问张春桥是否要带助手，张回答说不要，我在上海有班子。当晚9时，张春桥带着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奎林，由王力安排，乘坐空军专派的小飞机抵达上海。

历史决定命运。张春桥受命处理安亭事件，应该是他前半生遇到过的所有难题中最为棘手的了，对他来说是一次关系到其政治生命的抉择。但也留下许多疑点和问题，人们几乎对他当时的每一个行动都持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使文革史研究学者不断进行考证和思考。

从他此行的开始，研究者就存在着几个疑问：

一、是谁派张春桥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陈伯达发出的电报中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派的”，这是公开的电报公文，只能说。事实上

还应该有更高的权威对张春桥作具体的派遣交待。对此，文革史学者说法不一，一是陈伯达在1979年11月29日被讯问时说的，是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的；一是王力说的，是李富春代表常委派张春桥去上海的；一是张春桥自己说的，“陶铸给的话，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⁹但他没有明确说清楚陶铸的话是在会议上说的，还是在临行前单独向他交待的。有的作者依据张春桥的这一说法，认为是陶铸派张春桥赴上海安亭的。

二、在处理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的个人目的是什么？有研究者认为，张春桥是想借工总司的力量冲击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那上海就是他张春桥的天下，他想对陈丕显、曹荻秋取而代之；另有作者认为，张春桥如果按照中央的意见去处理安亭问题，这就意味着上海市委的胜利，这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张春桥极其不愿意的。这位作者也是认为此时的张春桥有对上海市委“取而代之”的想法。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恐怕不符合张春桥当时实际的思想状况。

不可否认，张春桥对陈丕显应该是有取而代之的欲望，但不是在这个时候。从张春桥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取而代之的契机还未到。应当说他此时想得最多的还应该是如何和中央保持一致，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使命，即“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不认为卧轨拦车、中断交通是对的”，还要考虑如何让滞留在安亭的工人回厂。张春桥刚到安亭的最初几个小时，其做法和中央及至上海市委是一致的，要求工人无条件地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再说，张春桥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受命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在上海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当权派，没有一个当权派有好日子过。这种时刻跑到上海，不是自寻麻烦吗？要是没有中央交付的使命，他何必跑到上海去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三、张春桥一下飞机做了些什么？这也有很多种说法：一是陈丕显说：照道理讲，张春桥应该先跟市委同志见个面，至少应该通一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可是张春桥都不，刚下飞机，便一头扎到造反派堆里了！¹⁰还有研究者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张春桥阴沉着脸走进机场休息室，没有理睬工作人员如何安排与上海市委领导人见面的请示，却先把上海最有势力的几个红卫兵头头找来，询问了情况，然后径直驱车前往安亭。

而另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却与以上说法不同。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处理安亭事件的韩哲一在《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中说：张春桥和他们在机场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沟通安亭情况。张春桥当时也持和他们一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¹¹沟通情况后，韩哲一就和副市长李干成回了家。和韩哲一一起去机场接张春桥的杨恺在文革中也对人说，张春桥“下飞机时还说要顶住”。¹²

从韩哲一、杨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张春桥并不像陈丕显所说的，不向市委“了解一下情况”。韩哲一与张春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估计会谈到他先前接陈伯达的电话后曾即赴安亭做说服工作，却无功而返的经过。

四、张春桥是乘谁的车去安亭的？这个问题，各种写安亭事件的材料有着一致的说法：机场停着好几辆来接张春桥的车子，有来自华东局的韩哲一、杨恺，有上海市的李干成，还有来自安亭的“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代表姜涛。张春桥最后选择的是，坐进红卫兵的吉普车去了安亭。韩哲一、李干成回家了，张春桥不会坐他们的车，陪张春桥去安亭的只有杨恺和北京来的红卫兵。张春桥乘红卫兵的车完全是有可能的。张春桥作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写这段历史的有关作者对张春桥都持以批评态度，把此事作为张春桥避开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个罪证。

陈伯达受审时交待，张春桥乘坐的军用专机在上海大场机场降落后的第一个电话，问：“是先到上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他回答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¹³“到群众中去”，这样可以避免惹出和市委“穿一条裤子”的嫌疑。此前，陈伯达解决安亭问题的电报，不是发给上海市委陈丕显或曹荻秋，而是发给华东局的韩哲一，也是要避免这个矛盾，说明他们已经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了。安亭事件的焦点是中共上海市委和工人造反派的矛盾，他们双方是矛盾的主体，中央文革派张春桥来上海，应该是作为“第三方”，其首要任务是劝说工总司的队伍撤回上海，张春桥别无选择。何况他和韩哲一在机场的沟通中已经取得一致性的意见，还需要

再到市委去见陈丕显和曹荻秋吗？他只能先去安亭做动员工人群众回厂的工作，这样才能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使命。

11日午后，张春桥在北京还没有起程时，陈伯达发给“工人同志们”的急电就到了上海。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组织”，故电报的开头用了笼统的称呼“工人同志们”。直到晚上7时左右，有两个穿黑色雨衣的人来到安亭车站，恰巧遇到徐美英，他们告知自己是市委机要处的，有份北京来的重要电报需要签收。徐美英和丁德发带着他们找到潘国平。¹⁴徐美英按着手电筒照亮，潘国平签收。

送电报的人一转身，宣传车就开动起来，大把大把地撒出了《陈伯达同志发来急电》的传单，四周高音喇叭也一齐响了起来。¹⁵陈伯达在电报中使用了已经成为习惯的语言“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声称“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广播还在继续。乘火车去北京告状的工人，在列车上下，有辩论的，有争吵的，乱成一片。

十几分钟后，在王洪文所在的车厢里，召开了有各厂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紧急会议，潘国平扬着手中印有陈伯达电报的传单，说：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回去不回去都是一样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会场顿时沉默下来，只听见车厢外哗哗的雨声。这时王洪文把手中的电报扬了扬，说：我现在向同志们宣布，这份电报是假的。闻之，各厂的头头们才回过神来，回去传达王洪文的这个谎言去了。

王洪文总算暂时稳住了军心。但是谎言是短命的，连王洪文也不知道这句谎言能维持多久。在一筹莫展中，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陈伯达电报中最后一句话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当面商量。”这句话可信吗？即使可信，张春桥来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吗？

陈伯达在后来受审讯时交待和张春桥通电话，其中还有一句“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张春桥到上海时，工总司拦车事件已经解决，上海市委也答应了送工总司赴京上访的要求，但要派出代表赴京，并准备好了火车车皮。上海市委很乐意这样做，以便把矛盾转移到北京去。但中央文革很害怕，所以张春桥临行前陈伯达给他下达了死命令，在上海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

“不解决问题，决不会回北京”

到了安亭火车站，经红卫兵介绍，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说了这样一句话：“噢，你就是王洪文。”他说罢再环顾四周，造反派们有的眼神带着怀疑不信任，有的紧绷着脸，有的甚至怒形于色。特别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潘国平不同于一般，不仅会说话，而且反应敏捷，此人也正是今天和他谈判的主要对手。谈判的地点安排在火车站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食堂里。

谈判开始，张春桥首先讲话，谈到中央文革发给上海工人造反派两个电报的事，第一份电报是他和陈伯达起草的，第二份电报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两份电报党中央都看过，“请示过毛主席”，他这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毛主席是知道的”。张春桥拿出陈伯达亲笔写下的“不解决问题不要回北京”的条子以示证明。张春桥遵照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意见，说，你们阻拦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做是犯罪，要杀头的。今天是商量回不回去的问题，其他问题回到上海再谈。

张春桥话锋一转，锋芒直指潘国平，说：“你们干的事，是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谁都知道拦火车是要杀头的，你小潘有几个脑袋可以杀呀？”参加谈判的谢鹏飞后来回忆时说：“张春桥开头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训，讲得可凶啦，把潘国平都训哭了。”¹⁶

张春桥心里应该很清楚，此行要做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这些工人尽快返回上海市区，这是解决问题的头等重要的前提。只有先做到这

一点，才可讨论其他问题。也只有实现了这一条，他才能回京复命。张春桥劈头盖脑的训斥，并没有使造反派谈判代表感到恐慌，更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谈判是唇枪舌剑式的，在艰难中行进，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争吵。谈判代表的要求是：必须先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被迫赴京”为“革命运动”，他们才可以回市区。造反派也很清楚，现在队伍不散，还有谈判的资本，要是听了张春桥的话，就这么回市区，队伍一散，进了厂门，是死路一条。

但这两条，恰恰是张春桥在谈判中必须坚守的，不管造反派代表怎样要求，他就是不松这个口。上级给他的任务是说服拦截火车的工人必须无条件地返回工厂，他预定的目标也一定是：返回工厂应该是无条件的。如果用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被迫赴京”为“革命运动”为条件去换得他们返回市区，这就是拿原则做交易，就是有辱使命，他就无法回京交这个差。

在谈判的过程中，造反派工人代表虽然有些对立情绪，但他们对张春桥还是尊重的，毕竟他头上戴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光环，还没有完全不信任他。有的代表哭诉着说，我们受到上海资反路线的迫害，要到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华东局和市委先是同意我们上车，但车到安亭就不开了，骗了我们。陈伯达的电报也指责我们，上海市委利用这个电报，对我们施加压力。

张春桥开始一支又一支的抽烟，既不回答，也不作辩解，只是仍然坚持要求工人先回上海，什么事都到上海再谈。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光环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受到挑战而迅速黯淡下去，称呼也由“春桥同志”变为“张春桥”，甚至点着鼻子骂起粗话来了：“别忘了，他是上海市委书记，跟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要骗我们回去，是一个大阴谋，我们不能相信他的那一套。”¹⁷

后来张春桥对工人造反派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不过我当时是沉着的，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¹⁸ 在高度紧张的激烈争论中，谁也没有觉得时间在流逝。直到晨曦的微光照射到窗口，天已大亮。经过6个小时的谈判，结果如何呢？

谈判现场目击者甄文君，是中央文革联络员，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常驻上海，把了解的情况向北京汇报。他在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向周恩来汇报的电话记录中说：“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议。”¹⁹在三个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的人中，有一个就是王洪文。

此时窗外吵吵嚷嚷地又聚集了好些人，说着“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被出卖了”之类的话。更多的人在喊着：“走！我们不做阿斗，我们自己步行到北京去！”²⁰这时谢鹏飞站了出来，高喊：“我们不听张春桥的，要上北京告状的跟我走！”张春桥知道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说：“既然你们说不通，那我就直接去和大家说。”²¹

潘国平马上从谈判所在的工厂找了辆大卡车，装上高音喇叭，开到火车停留的煤栈。此时已是11月12日上午8时左右。张春桥一人与全体安亭事件参加者面对面谈判。卡车就是一个谈判台，谁想发言，开始是递条子，后来也就管不了那么多，跳上去就说。清晨时还有一缕阳光，这时绵绵细雨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市委办公厅临时派来的警卫员大老李找来了一把伞，为正站在卡车上的张春桥撑着。“拿掉！”“伞拿掉！”——许多人怒吼了起来。

张春桥赶紧把伞推开。他对着话筒说：同志们，刚才的事，请大家原谅。毛主席一直教育我们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可有时一不注意就忘了。我希望你们，最好能给我这样一个荣誉，就是我可以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的第一个任务完成了。请中央报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你们都回去了！……

张春桥的现场发言，打出“听毛主席的话”的旗子，说得很动情，但是仍然没有人响应，没有人“听毛主席的话”。就在这时，谢鹏飞又跳上卡车，抢过话筒，说：我们凭什么相信张春桥？他以前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现在还兼着市委书记，他是跟市委穿一条裤子的。谢鹏飞又质问张春桥，你说你一定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处理问题，你说了一大堆空话，没有一句提到实质性的东西，这叫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吗？人群哄了起来：对，给我们说句实质性的话——工总司是不是革

命组织？被迫赴京是不是革命行动？更多的人冲上卡车发言。把张春桥挤到了一边。这期间，王洪文曾说过两三次话，有点附和张春桥“先回市区，再解决问题”的意思，也被场上怒斥声轰了下去。

大会继续进行。说是谈判会，实际上是控诉会、诉苦会。工人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卡车，诉说他们是如何被资反路线迫害的，有的被围攻批斗，有的被关压毒打，有的还被定为各种“分子”。有个工人边哭边说，昏倒在地上。还有一个说到激愤处，从卡车上掉了下来……从早上8时到下午4时的8个小时里，雨时断时续地下着，张春桥一直站在卡车上，只是中午端着饭盒扒过几口饭。他一直在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听着他们的控诉，即使被点着鼻子骂，也不作任何辩解。

工人们激烈的发言渐渐平息后，张春桥在卡车上发表了讲话，他坦承，刚到这里时，对事情的经过、事情的性质及工人的情况不了解。听了十几个小时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后，心中有数了。既然中央派他来，他就是要认真负责解决好问题的。他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回到上海，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向大家保证：不解决问题，我决不回北京！张春桥的讲话打动了在场的大多数工人。他讲完以后，王洪文、潘国平当即表示，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

雨终于停了，夕阳下，天空出现一道彩虹。有人说，这也许是个好兆头。王洪文与潘国平带着三四百人先回上海了，由黄金海带着其余队员随后返回。²²黄金海是个有头脑的人，他虽然把两千五六百人带回上海，但是想到谈判还没有结果，队伍不能解散，否则就失去了和张春桥谈判的资本，于是他把队伍带到文化广场安营扎寨后，再一次向大家强调：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接着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把队伍中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起来，分配他们做纠察；二是把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做后勤保障工作，到市委接待站弄点面包来给大家充饥。然后宣布：其他队员在长凳上睡觉休息。

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的当天，上海市委以为安亭事件已经解决，于11月12日下午向全市发了《通知》，说：“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到安亭，说服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市委《通知》要求工人回厂以后，一要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二要工厂对他们的行

为不指责，不辩论，不扣帽子；三是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照发。

造反派们并不相信市委的《通知》。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过多少次既往不咎的承诺，不但很少有兑现，反而常常是变本加厉地搞秋后算账。今后会不会为参加安亭事件而受到秋后算账？上海市委哪里知道，黄金海带领的数千工人在文化广场安营扎寨，等着张春桥“不解决问题，决不回北京”的许诺。

“阴一套，阳一套”

这天下午5点多钟，张春桥才离开安亭回到家中。几千工人返回上海，预定必须“无条件返回”的这一条已经完成。但来日依然艰难，说“无条件”其实是“有条件”，那就是他当着近万人做出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决不回北京。”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还没解决，他当然不能食言；但要实现这个承诺，真是雄关漫漫，还要他一关一关地去突破。

半夜刚过，康平路大院里又热闹起来，把疲惫不堪而刚刚熟睡的张春桥吵醒，一问才知道，同济大学一个叫东方红的红卫兵组织要求张春桥接见。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红卫兵有好几百人，接见就安排在离康平路大院不远的风雨操场。

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十六个小时的激烈谈判，四五个小时的接见，再加上长时间的淋雨，从风雨操场回到家，张春桥感冒发烧了。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又起来，坐在沙发上，一脸倦容，不停地咳嗽。他找出药片，正在服药，行为机敏的徐景贤来了，说是黄金海托信给张春桥，他们在文化广场等着他接见，希望他实现承诺。张春桥认为那不是什么接见，是谈判，恐怕又是一场很激烈的谈判。

正说着，电话响了，是曹荻秋打来的，要张春桥去参加市委常委会。张春桥自然不难猜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安亭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他不能不参加，就请徐景贤转告在文化广场的工人，谈判的事安排在下午两点钟。

曹荻秋为什么选择张春桥要去文化广场与工人谈判的时刻，突然要

开市委常委会，并要张春桥参加呢？原来是市委办公室把张春桥在安亭与工人谈判的情况发了《简报》，报道了工人离开安亭回上海，张春桥表态“不解决问题，我决不回北京”，并报道了张春桥将在文化广场继续与工人谈判。本来以为安亭事件已经解决的曹荻秋，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决定临时召开常委会，赶在张春桥去文化广场之前，再次强调和统一“三不”口径，防止张在谈判会上随意表态，给市委带来麻烦。

常委会由曹荻秋主持，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径完全一致：都认为要顶住，不能承认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不能承认赴京控告、拦截列车是革命行动。还一致认为“工人造反派是一小撮社会渣滓”。到会的都表态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张春桥。他抽着烟，时不时有点咳嗽，却不作任何表示。

这让曹荻秋很不放心。他当场拨通了北京陶铸的电话，汇报了常委处理安亭事件的一致意见，陶铸表示同意。曹荻秋请陶铸直接与张春桥通话，征得同意后，曹荻秋把电话筒给了张春桥。陶铸又把他同意市委处理方针的话说了一遍，要张春桥执行市委决定。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照陶铸和市委意见办，可是离开会场，他搞的完全是另一套了。”²³

时人评论张春桥有点“阴”，可能也是这次会议引起的。几十年后，陈丕显在其《回忆录》中指责张春桥搞“阴一套，阳一套”。“阳一套”大概指张春桥已表示照陶铸的意见办；“阴一套”则指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和工人造反派谈判时，却在“五项要求”上签字，搞的完全是另一套。

那么张春桥在接陶铸电话时，心里是否已有“另一套”了呢？在安亭事件的日子里，笔者所在的《文汇报》社和其他报社都有记者前去观察，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进行报道，因此这件事在报纸上没有发任何新闻消息。11月13日，《文汇报》新闻班学员陈培源告诉笔者，张春桥要在文化广场和工人造反派谈判，希望笔者和他一起去看看。

这天天气很冷，我们下午1点到了文化广场。广场周围的马路上，来来往往行人不断，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穿着蓝色工作服或蓝色棉大衣，戴着工作帽，臂上有红袖章，和工总司成立大会的情景完全不同了，一

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凭着记者证，我们从永嘉路大门顺利地进去了。陈培源对那些造反派的头头很熟，和他们打着招呼。笔者看见何公心跟在徐景贤后面，向我们招招手，又用手指指徐景贤，意思是徐景贤那里有新闻。但张春桥还没有到。

两点整，张春桥带着秘书何秀文到了。但工人造反派头头只有黄金海一人，他急得团团转，先把张春桥、何秀文、徐景贤安排在后台的一个小休息室休息，再派人去找王洪文、潘国平等人。

这天下雨，潘国平等人到来时，裤脚和鞋子都是湿的。谈判开始是在后台小休息室里进行。潘国平仍然是首席谈判代表。而抢先发言的仍然是红卫兵，指责张春桥不应该把去安亭的工人劝回上海，应该支持工人去北京告状，还说陈伯达的电报打击了造反派。还有一个红卫兵发言更为激烈，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你出卖工人利益，背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张春桥很能沉得住气，心平气和地和大家交谈。

会上又有人质疑陈伯达电报的真伪，张春桥证实电报是陈伯达亲笔写的，说着从口袋里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原稿，一个红卫兵接过电报，和电报稿核对，我们也凑过去看，电报原稿是用铅笔写的，字很大，有十多张稿纸。

张春桥继续就陈伯达的电报一事说：昨天晚上，我跟陈伯达通话，都认为话可能说得重了些，你们对电报有意见，完全可以提。我跟陈伯达同志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到他真是最热忱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同志，我们听到一些地方的学生、工人遭到围攻、镇压，陈伯达同志难过得很。

张春桥在谈话时透露出，他离开北京后和陈伯达通了第一次电话，他没有谈及电话内容，笔者猜想谈话的内容也应该是他到安亭之后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张春桥有没有和陈伯达谈下一步如何解决工总司提出的问题？他在回答红卫兵提的问题中也没有谈到。

听张春桥与谈判代表一番闲谈，仍没有接触到工总司在安亭提出的实质性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组和他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法和组织形式。此次上海之行，应该推动了他作更深入的思考，是否能从上海安亭事件中打开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呢？

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谈话中，我们感觉到张春桥对处理安亭事件已经有所决断，并下了同工人造反派签字的决心。这可能就是陈丕显所说张春桥的“阴一套”，因为张春桥在市委会上没有向他们摊牌，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当时的局势很清楚，如果在市委会上他说出自己的决定，肯定又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他的一些想法也肯定要遭到市委的反对，他如何面对在文化广场的数千工人造反派！

谈判还在进行中，越来越多的人涌到那间休息室，室内拥挤不堪。此时，王洪文也赶到了。潘国平提议换一个房间，于是谈判地点转移到化妆室，众人都去了大一点的化妆室，只有张春桥还留在休息室里。我们几个人在室外，注意力还是在关注张春桥会有何举动上。

此时的张春桥似乎有些焦急，在室内走来走去，不时扶扶下滑的眼镜，有几次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每次回来，面色都有些失望和着急。我们猜想他是在向北京打电话，是打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还是江青，无人知道，但每次电话都没通。我们在私下分析，找周恩来或陶铸？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找陈伯达或江青。电话没有打通，他就干脆不打了。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这个墙角踱到另一个墙角，又从另一个墙角踱到这个墙角，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就像我们看的战争片中的场景，在决战前片刻，司令员在思考如何作战。最后他站在屋子中央，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定了定神，向那间谈判室走去，在桌子尽头坐下，徐景贤坐在他的身后。

谈判再次开始了。

最后的决心：签字

工总司一方谈判的主角仍是潘国平，谈判的主题仍然是要市委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被迫北上告状是“革命行动”。潘国平说，我们相信中央文革，相信陈伯达和张春桥同志，但不相信市委。他提出张春桥给他们签一个书面的东西。王洪文虽然来了，但说话不多，几次发言都引起张春桥的注意。

“我同意你们的要求！”张春桥说得很慢，但语气沉着坚定，似乎不允许别人怀疑。张春桥答应得这样爽快，全室的人都感到意外，激动地站了起来。潘国平连忙和几位红卫兵商议，将原来先由江必雄起草的书面要求，作了些修改，重抄一遍时没有纸，徐美英就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由红卫兵抄好送给张春桥。后来笔者才知道，江必雄是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徐美英是有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把家中的缝纫机搬到巨鹿路工总司的办公处，连夜缝制工总司的大旗和袖章。

张春桥仔细看了一遍，说：其他几条都可以，就是关于“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动”这一条，我建议后面加上一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下不为例”，你们看如何？工总司和红卫兵都表示同意。于是张春桥接过江必雄手中的笔，在第二条末加括号做了个注，然后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张春桥签字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就这样形成了。内容为：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诉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先派少数代表上北京，下不为例）；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徐景贤走到话筒前，大呼小叫的文化广场突然安静下来，由徐美英高声读着《五项要求》，每读完一条，场子里就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了讲话，对他签署的《五项要求》逐条作了解释，他说：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

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如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同在工业上一样。²⁴

张春桥讲话后，又应黄金海要求，很高兴地与造反派们在主席台的后台一起照相留影。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在《毛主席语录》上题词“11月9日上海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好得很”。刚赶到文化广场的叶昌明，也让张春桥在自己的《毛主席语录》上题词：“工人造反好得很”。²⁵大个子张宝林把有张春桥签

名的《毛主席语录》一直保留着，还临摹张春桥的签名，把自己名字前的那个“张”写得像张春桥的笔迹。²⁶

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既不符合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规定，也违背了他来上海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可谓冒犯“天规”，他哪里来的那样大的胆量？这也是文革史学者持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在张春桥签字之前，打电话向江青请示过，是经江青同意了的。11月12日，张春桥从安亭回来后，迫不及待地首先挂电话和江青取得了联系，张对江青说陈伯达的电报行不通，表示他要承认工总司，和工总司一起造反，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核心的上海市委，得到了江青的肯定和同意。²⁷

红鸥说：张春桥12日晚上和江青通电话，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革舞台的标志，他要支持工人造反派。²⁸江青同意他的看法，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将这些新情况向主席报告。²⁹

但戚本禹、王力的回忆都否定了这一点。在回答研究者李逊的求证时，戚本禹回答说，张春桥没有得到江青的支持。³⁰王力也说，据他所知，张春桥去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接到他任何报告。陈伯达、江青都没接到过报告，张自己就处理了。³¹

还有比较多的说法是“揣摩说”，一些文革史学者谈到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认为是他揣摩毛泽东的意图行事。笔者认为“揣摩说”是符合张春桥实际情况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有谁不在揣摩毛的意图？揣摩圣意是中国帝制文化的产物，在帝王集权专制史中，是身为臣子，特别是辅佐大臣的一种常态，也是关系到他们升沉荣辱的一项基本功。文化有着顽强的传递本能，并没有因为封建王朝的灭亡，揣摩圣意就此绝种，也没有因为1949年政权的更替而消失，只不过是变种了，圣上变成伟大领袖，揣摩变成了领会。领会上意也好，揣摩圣意也罢，不只是张春桥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一段历史时期的悲哀。在处理安亭事件上，张春桥揣摩到一些什么呢？

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不止一次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

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废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搞工矿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就搞不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搞不掉。他还说：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具体讲工矿企业及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所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主持制定的有关文件还是停留在八小时以外业余时间搞革命，工人不能成立跨行业全市性的组织上。如果说张春桥善于揣摩，他已经揣摩到了毛泽东的心思。11月8日，也就是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几天，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五名红卫兵时就说过：“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正在打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至于你们怎么样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³²

一貫谨慎的张春桥，把揣摩到的毛泽东的想法，变成自己的血液，他要寻找机会挥洒，恰巧这时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又把处理此事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所以他要在处理安亭事件上放出一滴血来，搞成了就是立了大功，搞不成就会坐牢杀头，于是押上一宝，孤注一掷！

“张春桥的处理是对的”

张春桥终于挣脱了拥挤的人群，匆匆离开文化广场，背后仍然响着欢呼声。赶回康办大院已是傍晚时分，来不及用晚餐，就挂北京钓鱼台16号楼的电话，找到陈伯达。

他向陈伯达报告了他在安亭看到的情况，也谈了他对这一事件性质的判断，认为这字不签不行。工人不回上海，铁路不通车，问题会越闹越大。我们不能同工人闹对立，如果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早和群众见面，早一点到群众中去，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情。他在电话中还补了一句，这事来不及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陈伯达在电话中没有表示态度，只是说要向上报告。他放下电话，对在身旁的王力说，我们一起去找江青吧。两人还没有出门，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王力拿起听筒，这回是陈丕显打来的。原来张春桥还在文化广场向

工人造反派讲话时，康办跑情况的快手，已经把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谈判及签字的情况写出《简报》，报给市委领导。曹荻秋和魏文伯商量后，一起驱车急驶西郊宾馆，找到在那里休养的陈丕显。陈丕显听后，立即拿起保密电话，找陈伯达。

王力把电话交给陈伯达。二陈是福建老乡，在电话中对话可以说毫不困难。陈丕显简单地陈述了安亭事件的经过，接着便提出了一连串责问：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种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现在怎么转而承认了？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权力，他竟然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协定？张春桥这样做，究竟还要不要国家法律？

张春桥放出去的箭不可能再回头了。这对上海市委来说，不只是不高兴，而是愤怒了！陈伯达则劝陈丕显冷静点，字既然已签了，此事关系重大，中央再研究吧。放下电话，陈伯达就带着王力急步赶到钓鱼台11号楼找江青。江青一听就说：得马上找主席。还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³³

在上海，曹荻秋从西郊宾馆回到康平路，找书记处几个书记商量，都感到事情严重，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于是曹荻秋打电话给陶铸，认为张春桥个人没有权利违反中央精神，改变市委决定，也没有资格要市委做公开检查。陶铸的答复是具体事宜研究后再给回复。

当天下午5时，陶铸办公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语意有些含糊，对张春桥的签字有保留，但也不敢说是错的，希望上海准备材料，供中央研究。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上述指示，当即通过电话，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向各部、区、局，作了传达。

上海市委在这个口头通知中，仍然坚持不允许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但他们心中也清楚，他们与陶铸始终坚持的这个底线，正是文革要突破的障碍。他们已经一再退步，这是他们的最后防线。

11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如何看待张春桥签字一事。针对陈丕显提出究竟要不要国家法律的质问，毛泽东念了随身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说：“工人有没有结社的自由？《宪法》

你们看不看？”毛泽东从来不把《宪法》当一回事。1957年他曾写信给周恩来等，指示中学政治课中“取消宪治（法）课”，³⁴但有时需要反对不同意见，维护自己的权力时，他却又会拿《宪法》说事。

讨论中，陶铸认为张春桥是“先斩后奏”。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以先斩后奏。”最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作出了一言九鼎的结论：上海问题，张春桥的处理是对的。总要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事情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其他常委也不敢再发表什么意见，而陶铸只好检讨。会后，王力马上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裁决告诉在上海的张春桥，张春桥又立即告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说毛主席支持他签字。³⁵

经过三四个昼夜吉凶难卜的大辩论，独立自主地处理安亭事件，在《五项要求》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张春桥是赢家，赢得了他个人历史上的空前胜利！直到这时，张春桥的心才算定下来，他对妻子文静说：“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我是提着骷髅（髅）头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要坐班房，但想不到主席以后肯定了。”³⁶

不知张春桥是否意识到，当他作为安亭事件博弈的最大赢家时，他也就从此开始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24小时，决心下得还不慢吧”

先前滞留在安亭的工人造反派们，当时并没有全都接受张春桥的动员回上海。谢鹏飞等人当场就闹了起来，大骂王洪文、潘国平是右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可信，带头喊出了“坚持步行上北京”的口号，获得了不少人响应，他们很快组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由谢鹏飞带领，扛起造反队的旗帜，唱着“造反有理”战歌，沿着铁路线向西北方向走去。

这支队伍分成三个大队，耿金章、周宝林和程琳，分别是三个大队的大队长。³⁷当晚他们步行到昆山境内的天通庵休息，第二天继续步行。这时，制造运载火箭的上海新新机器厂派人赶来传话：厂里接到新派的重要生产任务，要他们立即回厂上班生产。这样新新厂的三百多工人就

半途折返回上海了。其他人13日下午步行到昆山，在昆山中学休整了一天一夜，又有工人陆续离开队伍回上海了。11月14日早上，这支队伍还剩三百多人。

此时队伍中已经有人在传，三个总带队谢鹏飞、周国庭和陆云龙，曾被华东局干部到厂宣布为反革命，大家骚动起来：怎能让反革命带队呢？³⁸尽管三个人解释说，反革命是华东局强加的，众人还是不愿意跟他们三个人走。大家商议另推领导。有人建议应由共产党员带队。耿金章是共产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民兵连长。就这样，耿金章站了出来，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导。

重选领导之后，队伍继续步行。即将到达苏州时，黄金海赶到。他告诉耿金章，张春桥已经在上海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劝耿金章带领队伍回沪。但是耿金章不肯，说黄金海动摇军心，把他扣押在一家澡堂里。耿金章把队伍集中起来，安排在苏州铁路中学。正当他们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时，苏州市委派人来通知他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晚上在市委招待所接见他们，要他们派两个代表。耿金章等人推测中央领导同志可能就是张春桥，肯定是来劝他们回上海的。他们于是就参照文化广场《五项要求》，撰写了又一个《五项要求》，推耿金章、周宝林为谈判代表。

往苏州劝说工人回上海的正是张春桥，还有曹荻秋和韩哲一。他们在苏州南国宾馆会客室商量如何与工人谈判，要不要在工人提出的新《五项要求》上签字。张春桥和曹荻秋激烈地争论了两个小时，曹荻秋就是不同意签字。他认为这次来苏州就是要动员工人回上海，不是来签字的，况且市委也没有授权于自己。后来曹荻秋说：“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押去北京的。”张春桥说，既然来了就是要谈判的，既然谈判就是要签字的。曹荻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不再坚持。

谈判开始，耿金章拿出了新拟订的《五项要求》，张春桥听后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在上海已经签订了五条，现在又一个五条，无非是“双五条”吧。张春桥说罢当即签字。曹荻秋、韩哲一也在新《五项要求》上签了字。签字后，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都讲了话。张春桥说：

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忙着出发，到了上海机场，就急忙向安亭去了。

……

我带着这种（焦虑）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見，慢慢懂了，这个电报（指陈伯达的）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发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

……

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了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我这次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我用了24小时，我这个决心下的还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的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³⁹

这是张春桥很机智的讲话。他不只是对工人造反派讲话，而且是向上海市委表明态度，是当着曹荻秋、韩哲一的面作了检讨，他的本意并没有想避开市委、华东局。张春桥这个讲话，不能说他没有诚意。耿金章把滞留在苏州的工人带回上海，以后就发展为工总司二兵团。

还有被截留在南京的戴祖祥、王秀珍等一千多名队员，因受南京市委的拦阻，辗转于南京、浦口、六合之间。他们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路军”，举旗北上。张春桥派王洪

文、潘国平、陈阿大三人赶往南京，向他们报告了张春桥在上海签字的情况，动员他们回上海。11月18日，这支队伍从六合到南京，等候来接他们的车辆。11月21日凌晨4时，他们终于返回上海。从离开上海算起，前后经历了12天。

当天上午，在红都大戏院，张春桥接见了他们。曹荻秋、韩哲一也一同出席。张春桥在会上讲话，谈到“保皇派”的问题。⁴⁰他说，对中间群众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刚才喊的口号里边，有一个口号我也跟着喊了，我也举了手了，就是“打倒保皇派”这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我应该对同志们说，中央是不同意的，这个口号是容易伤害群众的，为什么呢？现在被称为“保皇派”的，不是那些保当权派的人，而是两派工人之间。⁴¹

至此，在安亭事件中北上的工人造反派们，除了少数人外，全部返回上海，安亭事件终于结束。

张春桥完成使命，要回北京去了。返京前一天，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张春桥参加会议，讨论中心仍然集中于安亭事件，常委们纷纷批评指责张春桥。既然毛泽东肯定张春桥签字的事，上海市委为什么还对张春桥作那样多的指责批评？这是因为陈丕显没有让曹荻秋及时对市委其他领导成员传达，更不用说向基层干部和群众传达了。连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还是到12月初，他去北京参加工业交通座谈会，才打听到实情。曹荻秋后来自己也说：“仅告诉了书记处和常委一部分同志。”⁴²

安亭事件虽然结束了，但上海空前大乱，华东地区也热闹起来。先是近邻的无锡、南京、嘉兴、杭州，接着是华东六省以至全国各省、市的工人造反派，纷纷涌向上海，或来串联“取经”，或来要求支持，甚至还有来搞游行、请愿、静坐、示威的。12月下旬，华东各省造反派在上海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于是上海街头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所拥塞，墙壁也被五花八门的标语、大字报所覆盖。旌旗蔽日，锣鼓喧天，口号声与语录声混成一片。

这种混乱、热闹的景象，预示着文革正在突破中央原来的一些规定，酝酿着空前的大剧变！

赤卫队的诞生

安亭事件以后，上海工人分成两大派，工总司是一派，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订的“双五条”表示不满的则是另一派。当时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先斩后奏”还没有作出裁决，即使在裁决之后，曹荻秋也没有传达。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工厂工人纷纷贴出反对张春桥签字的大字报，当时在上海街头可以看到“重炮猛轰张春桥！”“张春桥拿原则做交易！”“张春桥出卖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的根本利益！”等大标语。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的形成，也是极为有趣的历史现象。凡是有造反派的地方，都会有另一派站出来反对造反派，哪里的造反派势力越强大，反对派对他们的还击也越激烈，当时称这一派为保守派，其实他们不一定是保守派。开始造反的时候，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有另一派马骥；陈阿大所在的良工阀门厂，有与之相对立的金瑞章；潘国平所在的玻璃机械厂，有潘月法；黄金海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有李剑钰；谢鹏飞所在的上海铁路分局，有王玉玺、陈阿春；叶昌明所在的合成纤维研究所，有高根才。

而且这两派的关系还不错。如果深入研究下去，上海工人运动初起时，并没有出现坚定的保卫上海市委的一派，而是随着安亭事件的发展，造反队伍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另一派，中共上海市委认为这一派可以利用，并加以支持，才发展成为赤卫队。赤卫队组织的发起人大多是原来造反起家的工人。推动他们走向社会的正是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二十多家工厂的工人代表组成了安亭事件联合调查组，赴安亭进行现场调查研究。这些代表中就有金瑞章、潘月法、李剑钰等人，他们与上海铁路局“二七战斗队”联合行动，写出传单《拆穿西洋镜》，对工总司制造安亭事件提出了批评。这一派也就成了保守派。

1966年11月18日，上海五十多个单位的四百多位工人代表，聚集在友谊电影院，要求张春桥接见。在咖啡厅，张春桥同这批工人从早上9点钟一直谈到下午5点。工人们质问张春桥为什么要签订“双五条”，抗议他向工总司这一派出卖原则。张春桥寸步不让，说自己签字符合宪法。工人指责工总司成立不符合中央精神，张春桥说：你们也可以组织

起来嘛！辩论进行六个小时，毫无结果。但张春桥的话启发了他们，会后，这些工人也酝酿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对抗。

第二天，11月19日，七百多名反对“双五条”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市少年宫，抗议张春桥签字的“双五条”，要求上海市委接见。等曹荻秋赶到少年宫，已经是20日凌晨2时左右，曹荻秋回答说：你们都是党员、团员、老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要依靠你们的。

曹荻秋当时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老工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当多数派（保守派）要成立组织时，曹荻秋心中欣喜，市委对付不了的造反派，可由多数派去对付了。保守派工人代表要发一份反对“双五条”的《抗议书》，曹荻秋马上答应负责转交中央。曹荻秋用电报将《抗议书》发给中央，还加了一些市委的说明，希望中央决策层听到另一种声音，也就是利用工人的电报告了张春桥一状。

11月23日，保守派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成立组织的事宜。会上决定借用良工阀门厂已成立的“工人赤卫队”的名称，大家认为这个名称符合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决定成立“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以下简称赤卫队）。会上还决定起草成立宣言和控告张春桥的电报。

11月24日，赤卫队在上海市少年宫开会，要求张春桥、曹荻秋和韩哲一接见。张春桥回答说没空接见。但是赤卫队并不放过张春桥，隔日他们又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之名，向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发了加急电报，提出不仅要罢张春桥的官，还要收回和工总司签订的“双五条”。此外还宣布工总司是反革命组织，并发布通缉令，通缉王洪文。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领导人的意见，主动邀请赤卫队总部到总工会办公大楼103室办公。

赤卫队刚成立，队伍就得到迅速发展。12月6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时，有三十万赤卫队员到会，与赤卫队持同一观点的“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参加大会助阵。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到会致辞。在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赤卫队已经发展到80万人，远远超过工总司的人数。

赤卫队自诞生之后，一直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他们凭借这股力量来制约工总司。但形势的发展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上海市委处于危机之中，赤卫队的政治态度终于发生了转变。为了表明和上海市委脱离关系，他们12月2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曹荻秋、韩哲一、李干成等市委领导到会接受批判。这个大会与其说是批判大会，不如说是赤卫队的一次表演，宣布自己和市委决裂了。他们还向工总司发出和解的信号，请他们派代表来参加会议，表示自己已经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工总司不睬他们。这时赤卫队总部又提出《七项要求》，要求曹荻秋在上面签字，其中有两条是明显针对造反派的。

一开始，曹荻秋不愿签字，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直拖到半夜12点钟，会场秩序越来越乱，台下的人冲上主席台，玻璃门被砸碎，照明电源被切断，曹荻秋几次被挤得昏了过去。最后，曹荻秋提出再增加一条“彻底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共八条，才签了字。⁴³

赤卫队以为争得了市委的签字，就有了生存权，立刻将曹荻秋签字的“八条”送去印刷厂，赶印八万份。但这些传单还没有来得及贴出去，事态便急转直下。曹荻秋签字是在12月23日深夜。第二天清早，陈丕显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着急，上午立刻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曹荻秋对赤卫队的签字。陈丕显说：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签字是政治错误，这件事要由曹荻秋负责。陈丕显还提出：要同赤卫队商量，让赤卫队主动取消签字；如果商量不通，最好由曹荻秋自己声明作废。他还要曹荻秋为自己的签字检讨。⁴⁴

上海市委书记们在讨论如何处理曹荻秋签字的事情时，有书记提出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声明曹荻秋的签字不能代表市委。这样或许可能使曹荻秋得到一些解脱，但陈丕显却认为“曹荻秋本人发表声明签字无效”。曹荻秋开始还为赤卫队辩护，但在大家围攻下，最后被迫答应声明签字无效。

上海市委不打算再继续支持赤卫队，造反派也不给赤卫队生存空间。12月25日下午，工总司等八个造反派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为夺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誓师大会”。这个大会完全针对12月23日赤卫队的那个大会。会上，曹荻秋对两天前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一事，作了检讨，声明他的签字作废。

失去了上海市委的支持，赤卫队不能再失去中央的支持，最后一线的希望就是赴京控告。这群失去支持的工人，他们不知道曹荻秋态度的转变来自北京最高圣殿，也忘记了工总司赴京控告的队伍曾经被甩在安亭车站，他们很快组成1,300人的“赴京控告团”，由赤卫队总部常委金瑞章带队前往火车站。

工人造反派有自己的舆论

1966年12月，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其始末如下：10月12日，红革会成立，确定出版《红卫战报》，陈丕显签字同意《红卫战报》出版，编辑部设在《文汇报》，出版由《解放日报》承担。⁴⁵此前的11月25日，红革会等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红革会提出要印大会特刊，版面对开套红，上海市委同意了。在出版的前一天，《红卫战报》代表到邮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第九期战报随《解放日报》夹送。报刊发行处请示上海市委后，予以拒绝。红革会便采取行动，于11月29日，派了三百多人来到《解放日报》社，除了要求夹送战报外，还要求《解放日报》转载《红卫战报》文章《〈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不同意。凌晨一时左右，红革会即进入《解放日报》社，声称如果报社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准《解放日报》发行。红革会的行动得到工总司的支持，报社工作被迫停止。

12月3日下午，赤卫队散发传单，要求上海市委不能向红革会让步。12月6日，赤卫队总部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十几万赤卫队员排着队，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在《解放日报》社门前示威。这样，从上海到北京，围绕《解放日报》与《红卫战报》的矛盾展开了斗争。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及周恩来都下达指示：《红卫战报》可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12月9日凌晨，滞留在《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全部撤出，《解放日报》事件才结束。这个事件表明了中共上海市委对文革态度的转变，对文革派的让步，也是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转折的关头。

张春桥毕竟是办报老手，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他鼓励红卫兵办《红卫战报》，说：我当义务传递员，把《红卫战报》转给毛主席。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我可以替你们转达、介绍。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张春桥并没有直接下过什么指示，但他一直在关心事件的进展。

事件之后，张春桥告诫工人造反派，他们的宣传策略不够，没有加强舆论宣传。张春桥可谓一语中的。红红火火的安亭事件，他们连传单也没有印发。在《解放日报》事件过程中，都是靠打字油印的传单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传单还是送到一家打字誊印社打字油印的，印数有限，速度慢，影响力小。张春桥的话提醒了王洪文，诺大的工总司光靠写传单不行，还应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1966年12月，工总司的代表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他们办报纸的想法和筹备情况，张春桥、姚文元表示支持。张春桥还引用宪法：“宪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一切工作舆论在先，这些工作我们需要注意。”⁴⁶

1966年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大会结束，王洪文向到会的曹荻秋提出办报的要求，曹荻秋签了“同意办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先例，当权者签字同意造反者办一张打倒自己的报纸，造反者办报要由被打倒的当权者同意，而且经费由被打倒的一方出资。

《工人造反报》创刊词写好以后，发往北京，经聂元梓交《红旗》杂志林杰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姚文元审定。修改稿回到王洪文手中，有了很大变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明确指出《工人造反报》是工总司的机关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要“万炮齐轰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还加了“攻击中央文革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王洪文要求张春桥为报纸题字，张春桥没有答应，最后他们集了毛泽东体的“工人造反报”作为报头字。

1966年12月28日，作为工总司机关报的《工人造反报》出版了，第一期发行28万份。张春桥十分重视《工人造反报》，对王洪文说：报纸的方向是对的，今后可以通过报纸发号施令。张春桥表示他可以为《工人造反报》当义务发行员，报纸每出一份，给他送20份，由他转给其他中央首长看。

对《工人造反报》的办报方针，张春桥作过许多指示。1968年2月，王洪文到《工人造反报》，专门传达张春桥的指示：造反报火力还可以强点，不然要这张报干什么？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别人不敢讲的造反报要大胆讲。大报已经登了的文章，造反报不要重复登，腾出版面登一些新的东西。造反报社论太长，人家没有时间看。

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建议，拟调一些工人作家去充实《工人造反报》，其中有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都是在文革前就小有名气的作家。但由于《工人造反报》负责人王成龙的反对，这几位工人作家没有进去。

《工人造反报》和其他造反小报有着明显不同，刊登内容基本都是记者采写，不登首长讲话、参考消息等小道新闻，在版面的编排上尽量向《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靠拢。不过张春桥对《造反报》追求正规报纸风格的办报方针不以为然，他主张群众报纸应该有自己的特色。1968年3月，他曾对此有所批评：现在造反报跟着文汇、解放后面转，向正规化发展……如果这样，造反报不必要了。⁴⁷

随着工总司地位的巩固，王洪文等人的地位提高，《工人造反报》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并列，合称上海“三报一刊”，上海凡发表重要文章，都以“三报一刊”联合署名。

注释

- 1 上海文化广场，旧上海时的逸园所在地，是跑狗、赌博的地方，称之为跑狗场。1949年后，上海对跑狗场和跑马场进行改建，前者为文化广场，后者为人民广场。
- 2 潘国平，工总司成立大会筹备人之一，时为上海玻璃机械厂模具车间木工。
- 3 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
- 4 包炮，时为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负责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 5 陈阿大，时为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徐美英，时为上海741服装厂女工。蒋周法，时为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

- 6 戴祖祥，时为上海第三钢铁厂第二薄板车间工会宣传干部、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王秀珍，女，当时是上海国棉三十厂技术员、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工总司委员。
- 7 安亭，即当时的上海嘉定县安亭镇，位于上海市区以西约三十公里。
- 8 韩哲一，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 9 张春桥：《1967年4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10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 11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第319页。
- 12 杨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 13 《陈伯达1979年11月29日审讯记录》，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2002年第二期。
- 14 丁德发，时为上海五一电机厂工人。
- 15 《陈伯达同志发来急电》全文：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的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搞不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1966年11月11日12时

陈伯达

16 谢鹏飞和笔者的谈话，2014年2月23日。

17 同上。

18 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干部会上的讲话》。

19 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党史资料研究》，2002年第二期。

20 阿斗，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的小名，以软弱无能著称。

21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

22 黄金海，时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车工。

23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94页。

24 张春桥：《1966年11月13日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5 叶昌明，当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人，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26 张宝林，时为上海建工局工人。

2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打印稿，1994年，第174页。

28 红鸥，原名侯美度，时为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中女生，著名的造反英雄。

29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第343页。

30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第342页，注释107。

31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3—654页。

32 《北航红旗五名战士与张春桥、戚本禹同志谈话纪要》，1966年11月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3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654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35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654—655页。

36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74页。

37 耿金章，时为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工人。周宝林，时为上海市仪表局职工。程琳，时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

38 周国庭、陆云龙，均为上海铁路局江湾装卸机械厂工人。

39 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部分工人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 保皇派的本意是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张勋搞了个进京勤王的复辟活动，原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拥立溥仪重登皇位，被称之为保皇派。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基层的党政干部，群众持有“支持”与“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随后“保皇派”一词被广泛引用。毛泽东不赞成使用这一名称，在8月29日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后来，周恩来建议改保皇派为保守派。从人数来说，保守派占绝对优势，所以又被称多数派，造反派被称为少数派。在民间保守派被长时间的使用，保守派又常简称为“老保”。

41 张春桥：《1966年11月21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2 王洪文：《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王洪文发言引用的资料来源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

43 曹荻秋签字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八项要求》：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向华东局、上海市委所贯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市委必须为其抓革命，促生产和日常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

三、上海市委必须深刻地向全市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

四、上海市委所属各级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也必须向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公开检查，并且在接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会议通知时必须准时出席，听取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涉及到各群众性的重大关系问题，市委必须与有关革命组织取得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任何单方面无原则的签字都无效。

六、上海市委十一月廿日所颁布的严禁私设公堂，和私自抓人、绑架、拷打等的重要通知，必须坚决执行，如发现违法者，应立即由司法机关严肃处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和其他革命组织有权对违反党纪国法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为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七、“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队员参加该组织的一切活动，应按“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尽量少占用生产时间，如有必要的集会、游行等应按假日处理。十一月九日至今扣发的工资必须如数补发，不得刁难。

八、凡属“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所批准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人事调动酌情办理，不得借故刁难。

以上八项要求由上海市委签字，限令在十二月廿四日十八时发至各级党政机关执行，并向广大群众宣读。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意

曹荻秋
十二月廿三日十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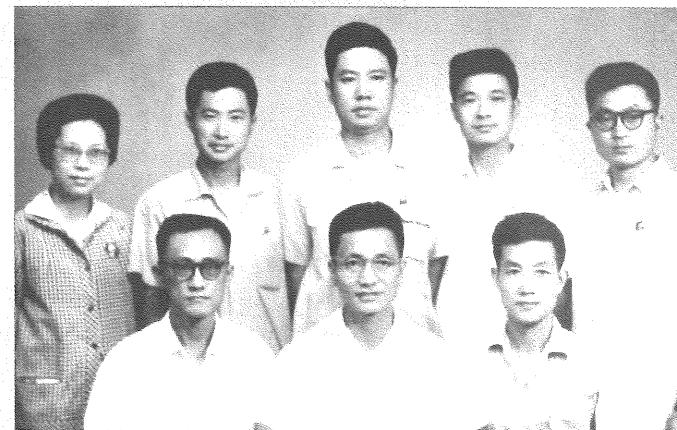
4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9年1月。

45 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

46 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载上海市总工会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编：《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1978年4月14日。

47 工总司1968年3月常委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1966—1976》，未刊稿。

第八章



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王知常、吴瑞武、萧木；
后排左起：陈冀德、吴文虎、朱永嘉、朱惠民、王绍玺)

第八章

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

赴京坐探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张春桥任小组副组长，姚文元任组员，此后他们就去了北京，也就无暇顾及上海市委写作班。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写作班不再处于政治运动中心，基本在运动外围，是无事可干。徐景贤本来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经常被市委拉去做一些应急的事。朱永嘉也清闲起来。

但是复旦大学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历史系有几位教师提出，大家都在学校里参加运动，为什么罗思鼎小组却老是在外面，不回来参加学校的运动？还说罗思鼎的几个人是最典型的“三脱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运动，关在丁香花园里写文章，但又不批判周谷城、周予同这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说，罗思鼎发表在《文汇报》的那两篇文章，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是想把政治批判引导到学术上去。朱永嘉心中很笃定，认为自己去市委写作班是原党委书记杨西光派的，此时杨仍担任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写作班的工作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管的，自己回不复工复大，应该由党委说了算。

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还是保护朱永嘉的。6月8日至9日，党总支连开两天扩大会议，指出批评罗思鼎的教师是打横炮，是

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左派。朱永嘉的态度也很硬，说：我在前线作战，你们在后面放冷箭，这算什么。会上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批周谷城、周予同，朱永嘉说：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怎么能得罪老师呢？朱永嘉还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不能看着历史系先乱起来吧。朱永嘉当时是历史系党总支统战委员，大小也算是个当权派，这种说法也很符合他的身份。

对历史系党总支的保护，朱永嘉是很感激的，他认为这是复旦大学党委对自己的态度。朱永嘉是个知恩必报的人，他给历史系青年教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向大家介绍了市委的情况，说上海市委是紧跟党中央的，和北京市委不一样；复旦大学是杨西光的点，是紧跟市委的；历史系党总支是紧跟复旦党委的。所以大家不要把矛头对准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这时的朱永嘉还不是造反派，还在遵从上海市委的指示，到处救火。后来，朱永嘉这番逻辑推理的说词成为他“保复旦党委”、“推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据。

复旦大学斗鬼风蔓延时，朱永嘉对那种残酷斗争教授的做法不赞成，认为学校党委应该出面制止。但校党委不敢出面反对。他的导师陈守实被斗得吃不消时，派自己的儿子来找他，希望他能向历史系党总支打个招呼。陈守实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此时造反派还没有兴起，当权派手中还有权，斗谁不斗谁还是“当权者”说了算。但朱永嘉只是告诉老师，不管怎样不要自杀，而始终没有去跟学校党委打招呼，没有对老师进行保护。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班后，立即投入保护市委的活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冲击市委机关时，他和市委写作班的人就站在市委机关门口拦着，尽量不让红卫兵冲击大楼。第二批红卫兵到达上海市时，他和写作班的人写大字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强调文斗者，都被视作是保守派。朱永嘉对北京红卫兵有看法，源于自己的经历：他父亲的家也在这时被抄。他父亲原是做玻璃生意的资本家，住在武夷路上一座小洋房里，北京红卫兵一来，父亲的住房被抢。父亲肝硬化，腹水，躺在床上起不来，红卫兵却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要他扫街。朱永嘉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每天代爷爷去扫街，将父亲送到姨妈家养病。

在市委写作班里，以徐景贤为组长的文艺组，以朱永嘉为组长的历

史组，最听市委的话，他们替市委到处救火；徐景贤还列席市委常委会，代曹荻秋起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群众作的检查。1966年10月，上海市委又派朱永嘉以《文汇报》记者的名义去北京摸气候。他到北京时，正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哪里，所以没有去找他们，而是持着《文汇报》记者证在北京四处为上海市委搜集情况。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他也拥到了金水桥，看到了城楼上的张春桥，张春桥也看到他，并向他招招手。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特地来看望朱永嘉，估计是在京开会的陈丕显将地址告诉他们的。他们问及上海的情况，姚文元特地问到写作班的情况。朱永嘉回答说最近不写文章了，写作班的人都无事可干，听市委的，市委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张春桥问他来北京的目的，朱永嘉说是陈丕显派他来的，任务是搜集中央首长讲话，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和传单，给上海市委作形势分析参考。

到北京摸中央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事，《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反右派时期全军覆没的教训太深刻了，张春桥对此是最清楚的。所以他对朱永嘉说：这有什么意思，中央有什么精神我们会告诉市委的，而且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还是回去好。

朱永嘉回答说，是市领导派我来的，总不能没有上面的通知就自己回上海。张春桥不再提这个话题，说你们不要在上面机关里闲荡，你们要到群众中去，要到少数派中去，支持群众，这是中央全会的精神。张春桥说的“少数派”也就是当时的造反派。朱永嘉感觉到张春桥不要他们为市委办事，虽然张碍于和市委的关系还未破裂，没有把话说得很明，但要他多了解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送走张春桥和姚文元，朱永嘉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告之张、姚与他的谈话，还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打电话，要余“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去”。

张春桥要朱永嘉回上海，但朱永嘉没有回去，仍然留在北京，每天去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看大字报，给上海打电话，寄传单，通过徐景贤向市委汇报北京的情况。安亭事件时，部分工人造反派到了北京，

朱永嘉还去劝说他们回上海。在上海的徐景贤等人也是一样，随着局势的发展，加上朱永嘉转告张、姚的谈话精神，他们思想开始转向。但是怎么造反，大家都心中无数，仍然不敢贸然行动。

朱永嘉：“我要造反”

如何让朱永嘉回上海？徐景贤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朱永嘉自己也没有想过，还是写作班哲学组负责人郭仁杰想到了这个问题。郭仁杰是写作班独一无二的造反派，他想方设法要让写作班集体造反，认为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影响。而写作班要造反，朱永嘉是个关键人物。如果朱永嘉所在的历史组和他所在的哲学组一起造反，写作班的造反也就成功大半。他向红革会提出，以红革会的名义把朱永嘉叫回复旦大学，接受批判，逼朱永嘉造反。

郭仁杰学历不如徐景贤和朱永嘉，但资格比他们老得多，年龄也比他们大几岁，是抗日时期的干部，建国后在复旦大学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为他业务不行，又爱摆老资格，和党委及系总支干部搞不好关系。朱永嘉说，郭仁杰在1959年反右倾时挨了批，从此干脆不管事，在学校荡来荡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别人拿他也无可奈何。1964年，他被调到华东政法学院任哲学系主任。以后又调到华东局《内刊》，再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

郭仁杰的家就住在复旦大学附近，他没事就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认识了红革会的负责人，进而参加了红革会。1966年10月12日，红革会成立的那天，郭仁杰也去参加了。此时正值朱永嘉接到市委的安排准备去北京，郭仁杰带着几分酒意找到朱永嘉，说今天红革会成立，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还说：你们这帮子人木讷，就知道关起门写文章，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群众，不关心国家大事。朱永嘉以为是酒后之言，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11月23日，经过郭仁杰的策划，两条大标语刷在历史系楼前：“朱永嘉必须回来参加运动”、“朱永嘉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是历史

系红革会刷的。社会潮流无法阻挡，复旦大学马上向市委汇报。红卫兵要揪斗朱永嘉，陈丕显只好让他回来。11月24日，徐景贤打电话给朱永嘉，通知他回上海参加运动。朱永嘉知道回上海无非是挨批斗，但还是当天就飞回了上海，第二天便回到学校参加运动。

弄假成真，朱永嘉真的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了。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从中央到市委一边倒地支持造反派。多数派“乘风破浪战斗组”抢在少数派前面，马上对朱永嘉进行批判。乘风破浪的主要成员是六位教师，大都是学生指导员，他们想以批判朱永嘉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组织造反了。原先朱永嘉说的那些保上海市委、保复旦大学党委的话，此时也都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的文章都是根据彭真的《二月提纲》的精神写的，批评他把政治学术化，并要追根子、查后台，“该追到哪一级就追到哪一级，绝不手软”。与此同时，少数派组织也对朱永嘉进行批判。多数派和少数派，两边都在批判朱永嘉，朱永嘉不想被两面夹击，决定造反。11月28日，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

问题是红革会之后的行动犯了忌。在召开批判朱永嘉大会的同时，11月27日晚，复旦大学红革会抄了朱永嘉的家，什么都没有抄出。红革会下属的红旗突击队又去康平路抄朱永嘉在写作班的办公室。他们知道市委写作班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在朱永嘉的办公室拿走了罗思鼎的一些文稿，其中包括评《海瑞罢官》的有关资料。朱永嘉的写作班历史组组长也被勒令撤销，由吴瑞武任组长。红革会虽然只抄了朱永嘉一个人的办公室，但震动了整个写作班。当时在场的徐景贤劝他们不能拿走这些资料，但红卫兵根本不买账。第二天，徐景贤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姚文元立刻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又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张、姚与王力、关锋、戚本禹讨论后，决定干预。

红革会仍然坚持对朱永嘉进行批判。朱永嘉和王知常曾合写过一篇题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发表在1966年8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红革会认为这篇文章是朱永嘉的要害，就写了《〈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工具》一文，对其进行批判。朱永嘉托人给红革会打招呼，说文章是张春桥同

意写的，你们要追后台，就追到张春桥头上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找到红革会的负责人，劝他们在文章中不要有批判罗思鼎文章的内容。但11月29日出版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还是发表了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罗思鼎，这就引发生了前章所述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28日，乘风破浪战斗组再一次批判朱永嘉，在复旦大学中央食堂举行批判会，把朱永嘉《我要造反》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高音喇叭反复广播这张大字报。批判会的规模也更大了。正在此时，写作班历史组的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赶到了会场。他们上台抢了话筒，质问乘风破浪矛头对着哪里，接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也上台批驳乘风破浪的举动大方向不对。¹批判会开得不了了之。

11月29日，姚文元和徐景贤通电话。徐景贤在笔记本上记录这次通电话的内容：姚文元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要进一步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们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还说：关锋、戚本禹听到复旦揪斗朱永嘉，都很生气，准备送大字报到复旦去。徐景贤当即向郭仁杰等传达了姚文元的讲话精神。姚文元打过电话还不放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要他以丁学雷的名义，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直接转告复旦两派：写作班在前一时期是受张春桥领导的。罗思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做了许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的，和姚文元合作得很好。²

乘风破浪不甘心前一天批斗会的结局，12月29日晚上再次召开批判会。然而在会上，写作班的吴瑞武宣读了姚文元电话记录全文，一下子扭转了会议气氛。复旦大学局势也因此大变，少数派声势大震，占了绝对上风，多数派成员纷纷倒戈，无形解散，朱永嘉也就此解脱。整个文革十年，正像毛泽东不准任何人动张春桥那样，张春桥也不准任何人动上海市委写作班。至此，少数派就成了造反派，多数派就成了保守派，阵线分明。

对张春桥出面保自己，朱永嘉很感恩。他说：因为张、姚的话帮我度过保守派批斗这一关，所以我对张、姚是感恩戴德的，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能这样保我很不容易。离开复旦回到写作班，朱永嘉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徐景贤谈谈。他已造反了，但这时徐景贤还没

有，今后如何相处？他和徐景贤应该作些沟通。再说，他从北京回来，一直被困在复旦大学，还没有来得及和徐景贤详谈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造反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旦大学“六指导员事件”成为“四人帮”迫害革命教师的典型事件，除了开大会批判，还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整版的文章，对张春桥、姚文元及朱永嘉进行控诉。“六指导员”是指担任学生指导员的六位老师：鲍怀崇、邹万春、吴维国、汪瑞祥、刘其奎和李华兴，他们都是党员干部。1966年6月8日，他们六人向历史系党总支提出：以朱永嘉为头的罗思鼎小组的几个成员，有的出身资产阶级，有的有历史问题，有的思想作风不正派，且长期脱离学校，不参加开门办学的各种活动，在教师和学生、党内和党外、校内和校外的校友中，对他们有抵制、有议论、有义愤，认为这几个人不宜在市委写作组，应调回复旦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11月29日，他们六人发起召开历史系批判旧党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揭发朱永嘉来历史系游说，压制群众造反的事实。之后，他们六个人又贴出《炮打朱永嘉》的大字报，提出追罗思鼎的根子，并在答辩时公开提出“张春桥有错误也可以批判”！朱永嘉对他们说：你们这是对我“背后一刀”。

朱永嘉已经表示要造反了，但还是被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红卫兵揪回审查。1968年5月中旬，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教师程显道派六指导员之一的吴维国去浙江调查罗思鼎小组一名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件事被张春桥知道后，说：“最近有个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要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贡献的人，他们又在搞朱永嘉、罗思鼎了。”还说：“搞写作组就是搞我张春桥！”但张春桥并没有要求追查。工宣队进校后，经过清队、整党，根据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以及他们几个人的工作表现，邹万春作为革命三结合干部被选为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李华兴被选为历史系大批判组副组长，刘其奎被指派清理阶级队伍小组成员。这使朱永嘉感到他在历史系大权旁落了。

1970年1月31日，王秀珍到复旦大学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为什么朱永嘉的意见在复旦很难贯彻下去？要查一查什么人反他。”“要打击

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炮打问题可以查下去，把炮打分子挖掉，‘六指导员’要立案，当大事搞。”1970年春节刚过，把“六指导员”当作反革命集团严惩了。³

徐景贤：“我不再为市委效劳了”

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这点对徐景贤来说，比朱永嘉的包袱要沉重得多。他从18岁走进上海市委机关的大门，由于灵活、聪明、遇事反应快，深得领导的看重。而在市委机关的环境里，徐景贤本来就得察言观色，谨慎从事，无论大事小事都不敢贸然行事，何况现在要他带头造市委的反。朱永嘉、郭仁杰找徐景贤谈话后，他不知所从。据朱永嘉的观察和猜测，此时的徐景贤是心乱如麻，左右为难。他是写作班的负责人，除了自己，还得对下属负责。上面没有有人说市委写作班解散，他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别人造反不成可以杀回原单位，他是绝不会主动回市委宣传部的。他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现在正受重用，宣传部的那些领导，谁见到他都会拍着他的肩，鼓励他：“小徐，好好干。”此时他起来造反，对原来的领导能批斗吗？作为一介书生，他没有这个胆，看不透当时的风云，也不能适应文革发展的形势。

有因《解放日报》事件而声名大震的红革会作后盾，郭仁杰对造反很有信心。12月12日，郭仁杰在市委写作班敦促徐景贤造反，态度很硬，但徐景贤还是很犹豫。郭仁杰便约他到复旦大学去看大字报。复旦校园里，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郭仁杰等陪同徐景贤的人都鼓励他造反。徐景贤又去参加了红卫兵的一个大会，在会上作了充满激情的发言，称郭仁杰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博得了红卫兵的掌声。中午，他在朱维铮家里简单吃了午饭，然后与王知常、郭仁杰等人一起讨论要不要造反。徐景贤思想上有了一些转机，说此事要与写作班全体成员一起讨论。

被人们称之为徐景贤在写作组的管家婆陈冀德回忆：朱永嘉上山了，当然罗思鼎小组成员全部跟进。接着，就是罗思鼎小组与郭仁杰结成一股力量，逼宫徐景贤了。

此时此刻的徐景贤，也是焦头烂额，背了个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虚名儿，做的是“消防队员”的工作。替市长曹荻秋写检查，替市委书记陈丕显挨群众批斗。尽管如此，以徐景贤的性格，如果不是罗思鼎小组和郭仁杰的敦促，未必会造反。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徐景贤一开始还认为不大可能，以为是红卫兵借题发挥，以讹传讹，还要陈冀德写个情况汇报，向市委报告。从复旦大学参观回来的路上，徐景贤显得很兴奋，对陈冀德说，看来，再不造反是不行了。春桥、文元可能回上海领导运动，也总要有落脚点。从徐景贤的话中，陈冀德知道他已经与张春桥、姚文元有过联系了。

从复旦大学取得造反经回到写作班，徐景贤立即召集写作班全体人员会议，讨论究竟何去何从。从第一天的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会议重点是传达张春桥、姚文元对写作班造反的指示，这也是写作班当时行动的最高纲领。朱永嘉反复强调：春桥、文元要我们到群众中去，不要关门写作，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再不采取行动，写作班势必成为市委对付造反派的工具，怎么对得起春桥、文元。

郭仁杰说：“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市委机关正需要一个冲出来的旗帜。”有人认为，张春桥、姚文元叫我们造反，现在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说，要保留写作班这个堡垒、战壕，可以通过不少单位，串连他们一起造反。也有人分析机关的有利条件，可以“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⁴会上，王知常跺着双脚，指着徐景贤的鼻子把他骂了一通。徐景贤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写作班也不是铁板一块。文艺组的吴立昌、刘景清持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是文人，写作是本分。再说，写大批判文章不也是革命吗，还是本分点好，造什么反呀！准确地说，是不愿意“投笔造反”，不赞成走出写作班，走向社会。⁵刘景清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此时的书生徐景贤，还在一味推脱、退让，一会儿说支持郭仁杰他们在复旦起来造反，他也会跟作协的造反派一起造反；一会儿说他的造反立场不够坚决，负不起这个责任，还是由郭仁杰当头头为好。经过反复的拖延、推让、争论，徐景贤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无可奈何地宣布带领写作班一块起来造反。此时，窗外已初现曙光。

朱永嘉动之以情，王知常晓以利害，郭仁杰步步紧逼，徐景贤虽然作了检讨，但直到散会他都没有要造反的明确表示。其实，徐景贤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已经是为造反走出了第一步。写作班造反后他曾经对人说：当时市委第一次检查被红卫兵推翻了，让我起草市委第二次检查，还让我列席了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正在这时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再起草，自己要陷进去了，还不造反。我听了春桥同志的电话才准备造反。

徐景贤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碰到朱永嘉，第一句话说是：“想想过去市委对我也没有什么，下决心造反了！”这样，徐景贤喊出了红卫兵送给他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张春桥是写作班的灵魂，催发着他们造反的激情，和一般工人群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不同，他们是奉了张春桥、姚文元的命令造反，创造了一个奉命造反的典型，在市委心脏引发了爆炸。

徐景贤决定造反后，当天晚上他给姚文元打电话，作请示汇报。姚文元要徐景贤把主要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开市委缺口，造反派在《解放日报》事件策略上考虑不够，没有舆论准备，要吸取经验教训，加强舆论工作。姚文元还说，马天水在北京经过春桥做工作，已决心造反，要徐景贤去找马天水。

马天水：“这次是死了心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说说张春桥是如何动员马天水的。11月16日，马天水去北京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国家计委每年要召开一次计划会议，这是从1950年代就形成了的一个惯例。时间大都安排在11月前后。这一年又到了筹备计划会议的时候，因碰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连，加上工人造反的兴起，工矿企业的生产和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计委副主任余秋里经过请示获得同意，决定在计划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先座谈一下当前工矿企业在文革中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才有了“工交座谈会”这个特别的名称。参加座谈会的，有治

金、化工、水电、机械、铁道等五个部门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等七市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会期定为五天。马天水是上海分管工业的书记，所以他带着秘书去了北京。

临行前，陈丕显就打电话到北京，向国家计委负责人谷牧询问这次会议的气候，知道开这个会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反映文革和生产存在的问题，以便向毛泽东汇报，所以他回头对马天水作了一番嘱咐：到会上要大胆提意见，多带一些文革破坏生产的材料，多讲些文革对工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反映得越多越好。他还告诫马天水说，宁可现在犯错误，不要将来犯错误。陈丕显的这番嘱咐很能代表他的心态。此时，正是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五项要求》，使上海市委处于被动的时刻。从马天水的角度来说，他很乐意接受陈丕显的嘱咐。作为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对文革已严重影响生产的情况，自然了解得比陈丕显更多，也更着急。应该说，这个时候不仅陈、马，包括国家计委一些负责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当然，陈丕显的嘱咐对马天水起了激励作用，他也更加来劲，用他以后作检讨时的话来说，他是带着“炮弹”上飞机的，准备在会上“放炮”。

工交座谈会由谷牧主持，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讨论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简称《十二条》）。不料讨论中，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多位部长以及各地来参加会议的多数负责人，几乎全部对《十二条》持否定态度，认为照此施行，只会把工厂搞得更乱，工业生产更加无法保证。对这样一个《十二条》，工厂的工人造反派也不满意，他们认为《十二条》对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有许多限制。张春桥解释说：《十二条》要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

《十二条》是10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起草的，其间还曾在北京地区开过几次座谈会，参加者除了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国家计委的余秋里、谷牧等。这说明在开头一段时间，中央文革的几位大员和国务院几位经济大臣之间有所沟通，而且有着共识，他们都在考虑生产吃饭的问题，双方采取的是合作态度。

11月14日，也就是计委工交座谈会开幕的前两天，下午3时，毛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上海工总司及安亭事件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上海问题张春桥的处理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要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紧接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最能理解毛泽东新意图的陈伯达、张春桥对《十二条》作了修改。在第八条中出现了很明显源于毛泽东对工总司和安亭事件权威表态的一段文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化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修改后的《十二条》总的精神，就是要乘胜推进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突破此前某些限制，促使工人造反派接替红卫兵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由于参加座谈会的干部没有听到毛泽东有关安亭事件的谈话，所以在座谈会上多数负责人认为，工矿企业的文革只能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在业余时间进行。他们还反映了不少工厂因搞大民主、大串连而严重影响了生产，有的甚至出现了濒临停产等情况，坚决主张工厂不能成立造反组织，已经成立的应当立即解散。在陶铸主持下，谷牧、余秋里等人还组织起草了与《十二条》相对立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于是一边是《十二条》，一边是《十五条》；一边是紧跟毛泽东要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突破前期限制的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几位大员，一边是仍然希望停留在第一阶段的谷牧等国务院几位经济大臣和各部、各省的支持者。双方展开了激烈、持久的大论战。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座谈会将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基本上是否定”的。⁶

正是在这段时间的论战中，马天水成了一名著名“炮手”。他分管工业多年，情况熟悉，经验丰富，上海又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参与文革运动方兴未艾，争论颇多，会议中他几次打电话回上海，索要安亭事件和工总司成立后引起两派冲突的新材料。这还不够，后来又让上海临时找了两个厂的党委书记来北京列席会议，任务就是提供“炮弹”。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处理完了安亭事件的一些善后事宜，11月25日晚上张春桥回到了北京，听说马天水在会上“放炮”，就赶到会场，有意几次拦住马天水的话头，意在提醒他不要再讲。处理安亭事件，张

春桥在上海是孤立的，尤其是和陈丕显、曹荻秋的关系形成僵局，他想趁马天水在北京开会的机会，争取马天水的合作。生性耿直的马天水毫不理会张春桥的阻拦，继续接连“放炮”，甚至还提出中央对“跨行业组织”不能松口，上海已成立的工总司应该取消，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不满。此话一出，好些人大为吃惊。张春桥则说马天水糊涂。恰好林彪也来参加会议，当面点了马天水的名，予以严厉批评。马天水这才感到问题严重，赶紧刹车。

这里有一个问题，早在工交座谈会召开前两天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对上海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问题作了明确表态，这次座谈会因何发生这样大的争论？马天水之所以无所顾忌地公然与毛泽东唱对台戏，的确是因为他没有听到过曹荻秋的传达。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红卫兵及工人代表时说：

主席说的“先斩后奏”就是针对陈丕显说的，主席的意见，中央开会的情况，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市委开始没有传达，一直到(11月)24日也没有传达。那天，我第一次参加市委常委会，提出为什么不传达？我把主席的意见、中央指示讲给他们听，曹荻秋还公开表示想不通，我们叫他们给中央打电报，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事我过去一直没讲过，你们不是说没有炮弹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炮弹。中央已经同意了，他们还敢反对。

陶铸是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讲话，难道陶铸也没有向谷牧等打招呼？后来毛泽东的《生日讲话》有一段说到陶铸曾“抵制工人农民搞文革”的话：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泽东还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

工交座谈会开到后半期，毛泽东直接作了干预。他在听取汇报时，否定了谷牧、余秋里等组织起草的《十五条》。会议后期的几天，马天水的情绪有些郁闷。他离开北京前夕，张春桥还是不放弃和他合作的愿望，又和他作了一次长谈。参加了惊涛骇浪的座谈会和张春桥的这次谈

话，马天水的思想有了转变，回上海时他给张春桥留下一句话：这次我是死了心了！这很可能就是他后来转变立场，站到文革派这边来的关键。在张春桥看来，马天水这次态度还好，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态度很不好，批评他之后，他表示要改正，和他有了合作的基础。

“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及“全面内战”

现在把话题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的事件上来。《支部生活》编辑部的编辑王承龙听到市委写作班要造反的消息，第二天就去了写作班，自我介绍是党刊编辑部的联络员。他一进门就喊：“写作班造反好！市委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后两句话后来成为写作班造反口号。

市委写作班决定造反后，他们联络了市委党校、社科院及市委宣传部有造反意向的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王承龙等为联络站的头头。随着队伍的扩大，联络站俨然成为集市委、市府权力于一身的造反组织，武康路2号写作班再也容纳不下了。一天，市委书记陈丕显带着秘书来到武康路2号，说是顺便来看看。看到这里办公室拥挤，人员繁杂，陈丕显指示秘书要给他们调配一所大点的房子，改善办公条件。他又提出上海不能有两个指挥中心，为了便于沟通，是否可以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再调拨一辆小轿车，供头头们使用。这是陈丕显向市委机关造反派表示友好，但遭到拒绝。

12月18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

在亮出造反组织大旗的前一天，徐景贤以替市委领导人写检查为名，向市委办公厅要求给写作班办公室装一部红机子。红机子即红颜色的电话机，是专用保密电话。有了这部红机子，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通电话，而不用担心被窃听。徐景贤指派写作班的陈冀德日夜守着红机子，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报告。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以后，和工总司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

联合起来，继续向基本已经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发动进攻。12月16日，机关造反派在武康路2号召开批判大会筹备会议，参加者有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王绍玺、朱维铮、谢宗范、王承龙、朱玉珮等。⁷会上，根据姚文元“先批资反路线”的指示，将大会定名为“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根据郭仁杰的建议，大会口号定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到开大会之前，又加上“砸烂常溪萍”。⁸

徐景贤要在大会上以“造反才知主席亲”为题发言，这话是从红卫兵那里借用过来的。对徐景贤的发言提纲，大家认为火力不足，没有重磅炸弹。大家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内外有别”，认为必须打破限制。“内外有别”即内部和外部有区别，是共产党的一贯纪律。一些内部讨论或决策过程，出了机关不准随便议论，更不准泄露，这是组织原则，否则以违纪处理。筹备会议之后，徐景贤又向姚文元通电话汇报，姚文元说：“你们起来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姚文元的“我们”，当然包括张春桥在内。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正式亮出造反旗帜。徐景贤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打破了内外有别的限制，把他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到的内情揭发了出来。

大会主席台两边张贴巨幅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四个口号，写作班当时只是考虑到从修辞上避免重复，用了“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要区别对待这四个人。

写作班提出要“砸烂”的常溪萍，是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这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委员会书记。四清时，常溪萍被派到北京大学搞四清，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党委副书记。聂元梓造反后，认为常溪萍在四清中包庇陆平，要把常溪萍揪回北大斗争。1966年7月下旬，聂元梓写了一张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张春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把这张大字报交给曹荻秋，并写了一张条子，认为常溪萍同北大的陆平分不开。北大已贴了常溪萍的大字报，江青向毛泽东请求过，要把常溪萍揪回北大斗争。张

春桥要曹荻秋回去跟常委讨论一下，不然会被动。但曹荻秋态度犹豫，他请示中央领导，是否不把常溪萍揪回去，大字报也不一定贴。但后来上海市委还是贴了大字报。张春桥虽然再三对上海市委说不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会被动，但他是否赞成聂元梓在常溪萍问题上打开上海市的缺口？王力认为当时没有，因为张春桥对聂元梓很反感，不赞成她的做法。

12月18日，陈丕显第一次作为批斗对象站到了群众面前。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大会发言还印成会刊，标题是“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会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印发10万份。张春桥在上海市委后院点的火，终于熊熊地燃烧起来。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他让江青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毛泽东没有请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显示这次他的生日聚会不同寻常。饭菜很简单，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和玉米。席间毛泽东向大家谈了自己的文革思想，并评价了上海文革运动，对上海市委写作班那四句口号非常欣赏，认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对毛泽东73岁生日宴会的情景，张春桥在给女儿的信中回忆道：

再过几天，又是他的生日了。想了想，我只同毛主席一起度过一次生日。那是1966年12月25日。⁹当我走进他的住所的时候，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谈话。¹⁰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呵！”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谈，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了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是主观唯心论，他（陈伯达）认为是唯物论，我认为是客观唯心论，统一不起来。——在当时那样繁忙的时候，

他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恐怕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¹¹

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讲了许多话，有几个版本，除了张春桥给女儿的信中所谈的这个版本外，还有王力、戚本禹回忆的版本。几个版本关于祝酒辞的说法也有细微的差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说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王力反思录》说姚文元当时向徐景贤传达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则把“全面内战”改为“全面阶级斗争”；1967年，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传达毛泽东祝酒词“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还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祝新的一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无论哪个版本，都有“全面内战”的意思。可能是因为内战这个词太敏感，故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官方版本中，都代之以阶级斗争，多少起到些掩饰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却盼望着全面内战，并为之如此兴奋，令人匪夷所思。但这符合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斗争哲学：当初在军事上全面内战，是和国民党争夺政权，如今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又要重开内战，是要和党内的敌人争夺政权。从毛的角度看，这两次内战，应该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后来，他在病重时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他这一生的主要事迹，就是打了这两场内战。两场内战的目的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毛的祝酒词，无疑也是为张春桥等造反派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此后，他们果真就高扬着这一面毛泽东亲手授予的旗帜，在内战的“战场”上更加奋勇地冲杀了。

“抄家”引发康平路武斗

就在毛泽东73岁生日的第二天，12月27日上午，赤卫队调集一支队伍涌入上海市委书记处所在地康平路168号大院。此时，康平路大院已经人去楼空。市委书记们早已不在这里办公，都转移到不易找到的地方。办公厅一级干部也都躲了起来，用电话保持联系。守在这里的只是办公厅的一些普通工作人员，文件档案也早转移一空。住在大院里的书记和家属已陆续搬走，只剩下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未搬。柯庆施已去世，其妻子和孩子一直住在这里；张春桥在北京，其妻文静带着孩子住在大院。这两家形影相吊，好不孤独寂寞。

赤卫队到上海市委办公厅，找到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要她打电话给张春桥，要张春桥下令禁止工总司采取极端的行动，否则赤卫队将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后果谁来负责？杜淑贞带着两名赤卫队员去外事办公室，爬窗进去，找到一部能够接通中央的红机子，接通了中央办公厅，希望值班人员马上向张春桥报告上海的紧急情况。28日，杜淑贞交给赤卫队代表一张纸条，赤卫队按纸条上的地址在陕西北路一座花园洋房里找到马天水。他们将马天水带往康平路谈判。谈判中，赤卫队代表要马天水打电话给张春桥反映情况。马天水便在张春桥家，借用他家的红机子打了电话。由于身边有赤卫队员，马天水不便把话讲得十分明显，只说赤卫队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他们要打倒市委和曹荻秋；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是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市委重新承认“八条”有效。张春桥从马天水的电话中，猜测出康平路大院的情况。

就在当晚，传出了赤卫队员抄了柯庆施、张春桥两家的惊人消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在家，据她后来的回忆：家里忽然进来几位赤卫队的人，其中一位30来岁的瘦瘦高高的女子，发现了钢琴上的照片，轻声叫了声“柯老！”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照片。不知是谁带头摘下头上的棉帽，男人们都跟着脱下了帽子。没有人说话，大家自发地向爸爸照片鞠躬行礼，然后安静地退出小饭厅，从阳台走了下去，从小庭院离去。……第二天早上，发现家门外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这是柯老的家”。¹²

至于张春桥的家，12月28日晚上，有几个赤卫队员曾经进去过。当时大院里人挤得满满的，连站立都很困难。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回忆，那天下午5时左右，他曾去张春桥家看望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对他说：“赤卫队有几个人进到家里，但看到是住家，很快就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上了，以后再没有进屋。”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当时也在家，她后来证实：

赤卫队进来以后，秩序比较好，他们住满了大院的原办公室和其他已经搬走的人家里。我家也有一些人进来。晚上，他们坐在走廊里，也有人叫我烧些水喝，这时没有发生过抄家打人的情况。¹³

而当时造反派单方面的传单，虽说赤卫队对张春桥家态度很不好，但也说很快退了出去。身在北京的张春桥得知后，打电话回家，向妻子文静询问当天发生的事情。听了情况介绍，张春桥要文静想办法转告造反派，赤卫队现在提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请上海各造反派注意，不能置之不理，不能让胜利果实被赤卫队夺去。文静打电话给徐景贤，转告了张春桥的意见。

徐景贤接到电话马上派人去工总司找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但一个也没有找到，他只好先向联络站的负责人传达张春桥的指示。根据参加者朱维铮回忆，徐景贤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如果曹荻秋投降，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这个指示的中心思想就是不能让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不能让赤卫队再存在下去，要趁此机会把这个保守组织打掉。

徐景贤于29日清晨召集会议，传达张春桥电话指示，要大家做好宣传攻势，对赤卫队进行分化瓦解。他们马上起草讲话稿和大字报，在紧挨康平路大院边上的《支部生活》编辑部楼上和康平路周围马路上装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赤卫队是老保”，“赤卫队大方向就是错了”，“赤卫队立即滚出康平路”，“赤卫队必须投降，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口号声此起彼伏，赤卫队四面楚歌。

此前，虽身在北京，张春桥并没有放松对赤卫队发展情况的观察和

分析。12月6日，他在北京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时，还谈到赤卫队的事情。工人反映赤卫队派人到北京来告状，张春桥说，他们来了，没来找我？张春桥认为，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应该要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法要有策略，要争取多数，中间状态的人不要当坏人，赤卫队中间的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¹⁴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时，又一次谈到劳模和中间派的问题，他认为虽然现在有劳动模范支持保守派，但从劳模蔡祖泉转变过来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们是能够转变的。¹⁵张春桥还希望他们集中力量攻市委，这样才能争取中间派，取得一些胜利后，中间派就会跟过来。

从张春桥的这两次谈话中，他还是想争取赤卫队中的一部分人，用政治思想工作来瓦解赤卫队。但由于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张春桥对赤卫队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他打电话提醒造反派对赤卫队进驻康平路不要掉以轻心；在具体行动上，他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北京的工总司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说上海情况紧急，要耿立刻回上海。

12月29日，耿金章回到上海，马上召集二兵团的常委开会，会上耿金章向赤卫队宣战：“有造反派就没有赤卫队，有赤卫队就没有造反派。”以“保护张春桥和柯庆施家”为由，调集了两万工人的队伍，把进驻康平路大院的赤卫队包围起来，宣称：天亮前，赤卫队如果还不撤离康平路大院，就冲进去把他们赶出来。

要做到师出有名，工人造反派宣称“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这一消息当时震动上海，市民也都翘首以待真实的消息。“抄家”一时成为上海的核心事件，但云里雾里，不知所然。

为了证实是否属实，很多人都去张春桥家询问，文静都让女儿张维维出面回答“没有”。后来几个与张维维认识的干部子女，干脆将张维维的话刻成油印传单印发。张维维自己不久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立即被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造谣派破产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是到我家来过的，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他们没有进卧室，当他们发现了柯老家，有些人就在柯老像片前静默了三分钟，并写了纸条贴在门口，说明是柯老的家，请大家不要进去。有人（赤卫队员）自动做保护工作。柯老家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很好，请大家放心，革命群众应该团结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力开火！

张维维（签字）

记录者：徐黄平 史美任

（上海电器机修厂）

1966年12月31日上午11时¹⁶

针对张维维的大字报，工总司与炮司、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9个组织在1967年1月3日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将抄家一词改为“闯进”。¹⁷这份传单还说张维维是铁杆保皇派，“和她父亲张春桥不是一路人”。

张维维的一纸声明，抄家事件似乎可以清楚了，也可告一段落了。但是12月29日，工总司仍然组织了反赤卫队的队伍，对康办大院来了一个大包围，一场武斗即将开始。这时，赤卫队总部电话不断，赤卫队各区联络站也纷纷来电，要求总部集中队伍，对造反派进行反包围，许多联络站已经集结队伍准备出发。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王玉玺考虑再三，没有同意。他担心大规模正面冲突，会造成流血事件。但这场武斗终于未能避免，发生了流血的康平路事件。大批赤卫队员不仅遭到工总司的殴打，在最后被迫接受的“投降仪式”上，还受到了每人必须手拿一根稻草举在头上，才准走出大院这样的羞辱，赤卫队岂肯罢休！

拦截、围剿赤卫队

12月30日中午，康平路武斗结束不到半小时，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询问武斗情况，徐景贤一一汇报。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最后，他又特地关照：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¹⁸张春桥可能已经意识到“抄家”背后有文章。

1967年1月3日晚上8点，张春桥在北京接见王洪文等人的谈话，又提到了抄家事件。他认为应把抄家的事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看。难道非得砸烂了才叫抄家？为什么要进入人家？还喊打倒张春桥？并表示对家里被“砸烂”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后来，张春桥要维维写一个声明，改变原来的说法，但张维维最终没有写，她当时观点趋向保守派。1月3日，文静只好自己按张春桥意思写了一份支持造反派的声明，改口说：

连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也把赤卫队闯进我家的问题作了简单的说明。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戴袖章的赤卫队员长时期的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决战中，革命的同志们要谨防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捣乱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救命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的。

最后，希望同志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家属文静

1967年1月3日

抄家本来就是造反派攻打赤卫队的借口，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和女儿都作了证明，赤卫队抄家不是事实，而且张春桥又曾明确向徐景贤下达指示，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家的事了，可是这次谈话为什么又提抄家的事？而且迫使文静改口，而张维维又坚持不改变原来的说法？2011年9月6日，笔者与张维维于文新大厦见面，谈到四十五年前这件“抄家”之事。她神态淡淡地说：

我串联回来，出了火车站，看到天目路大楼上两条标语，说魏文伯如何如何，张春桥如何如何，我就赶快回家。回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就看到赤卫队在大院里，当时只有几十个人。住在大院里的人都没有了，曹荻秋、杨西光、马天水都搬走了。赤卫队起来的时候，我妈就被斗，被拉到江南造船厂去批斗。我爷爷、奶奶都在家。我就问了，他们都是老保，我自己是老保，看到老保很起劲。他们一家家去敲门，家家都没有人。柯庆施家有人，我劝他们不要进去。他们到我家找水喝，我就问他们，是曹荻秋约他们下午3点钟来谈判的，但曹荻秋不在。

第二天，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妈妈也回来了。他们要我妈妈写大字报，来了一个人也叫我写，要写张春桥的家没有被抄。我们无法知道外面的情况，就如实地写了，只是进来人，不能算抄家。从我家后面看到造反派进来了，两派就打了起来，把椅子腿拆开打，赤卫队吃了亏，吓得把红袖章也拿掉了。我爸爸打电话来说，怎么能利用小孩子说没有抄家，是曹荻秋操纵的事情。后来，红三司的人叫我在阳台讲“没有抄家”，劝工人回去搞生产，不是张春桥把他们赶出去的。我被他们围困起来，不能外出。半夜里，警备区来人把我们转走，先在音乐学院附近，后到永福路52号。从1966年，我就是这样写的，是实情，从不改口。

我写的条子给同学油印出去。我的条子是帮助赤卫队的。他们是站在市委一边的，也要我站在那边。我爸爸说我站错了队，要我写检查，我和爸爸争论起来，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冲市委？你们批判《海瑞罢官》，他们是支持的，为什么错了？爸爸说：他们后来站队站错了。¹⁹

拂去政治的烟尘，对历史就能看得比较清楚。所谓康平路武斗事件的起因是赤卫队应曹荻秋之约，赴康平路谈判，因曹荻秋不在而“误入白虎堂”。²⁰造反派以赤卫队抄家为由，包围康平路大院，由此发生了流血武斗。

12月30日，闯入康平路的队伍在武斗中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赤卫队总部，总部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集会抗议造反派的罪行。以和平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正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的行为特点。他们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反对文革中的武斗行为。他们要求曹荻秋签字、后来又被曹荻秋声明作废的《八项要求》中，就有“严禁私设公堂和私自抓人、绑架、拷打”的内容，现在他们自己遇此遭遇，也没有以牙还牙。正是这样的忍让，使上海避免了更大规模甚至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但是，他们决定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声讨工总司，当然不可能被造反派放过。

十二三万赤卫队员，分四路向人民广场集中。王洪文已布置了造反派在人民广场附近道路拦截。在外白渡桥、火车北站，不时发生造反派与赤卫队的磨擦。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武斗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避免流血冲突，王玉玺头脑还比较清醒理智，避开造反派的锋芒，将集合地点改在火车北站，决定北上告状，表明他们是一贯忠于和效力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认为上万人进京控告，肯定会引起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上万人进京控告，肯定会引起市委重视，要他们坐下来谈判。但这只是他们在彻底覆灭前的美好幻想！

12月30日下午5时45分，一万多名赤卫队员在王玉玺的带领下，冒着霏霏细雨，徒步向北进发。12月31日下午抵达昆山。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已经冷静起来，他们开会商议是否还要继续北上。但是，时间已经不容他们再举棋不定。他们被拦在桥头，桥这一头是赤卫队员手挽着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桥那一头，造反派挥舞着拳头和棍棒涌来。

张春桥得知这一消息，指示上海要说服工总司不再增派人员去昆山，以免延续冲突。张春桥还提出要多派些学生和机关干部去昆山做说服工作，这才使昆山武斗没有再持续下去。1967年1月3日，马天水、李干成和周璧，赶到昆山与赤卫队谈判，劝他们回上海。²¹赤卫队回到

上海，市委没有和他们谈判。因造反派和保守派对立，中间派感到无法工作，就离开工作岗位，上海铁路再次全线瘫痪，罪名就落在赤卫队头上。赤卫队的骨干和负责人纷纷被抓。

自下而上的“奉召造反”

解剖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和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文人造反，对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研究他们的造反动机、组织发起、造反章程、口号、造反方法和途径，以及张春桥在这两个造反组织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指导调节作用，有可能会对1960年代中期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生发出超越性的认识。这需要文革史学者作专题性的研究才能说得清楚，笔者只在这里试谈一二。

造反固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但在人们的意识中总是一个不吉祥的字眼。1975年，笔者请上海绘画名家唐云刻一方闲章，印文为“大泽乡人”。因为笔者的故乡即是两千年前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安徽宿县大泽乡。唐云听到要刻这样的印文，脱口而出：怎么，你要造反啊，造反是要杀头的啊！是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造反是要杀头的。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带着几百名去咸阳的徒众，来到大泽乡，因大雨的拦阻无法行进，眼看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依秦法当杀头，两人谋划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然误期是死，把队伍散了逃亡也是死，造反最多也是一死，何不索性造反？——便揭竿而起反秦。陈胜、吴广的揭竿反秦，和西方的奴隶起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身的解放，推翻最高统治者，由起义领袖“取而代之”。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除了帝王与农民的矛盾，还有君臣之间的矛盾。历史证明，农民起义大多无法动摇高度集权的帝制，最后多以失败告终。即便有的农民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垮台了。君臣相争的场面，自然不计其数，多属臣子造反。如臣强君弱，往往有君王暗写衣带诏，搬请忠心的

大臣出兵清君侧、诛权臣；如果君弱臣强，则可以用君权、王权，将对手碾碎。无论是农民造反还是臣子造反，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发造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但它毕竟是诞生在高度集权的帝制文化的土壤中，有着双重的继承性，领导集团继承着享有特权、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平民百姓则继承着要求平等的反抗精神。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使社会处于平衡状态。谁来掌握这个使社会取得平衡的“调节器”呢？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掌握这个“调节器”的只能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也就不会出现以群众性自下而上“自发造反”的方式改变国家社会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外和党内有三次造反斗争。第一次即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可以看作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向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发展到后来被认为是造反。右派一代知识分子，既受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熏陶，又承接五四的启蒙思想，很多人曾留学国外，对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有着直观和学理上的双重认识。1957年的鸣放，原本是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发起的，毛泽东明确地说，整风就是整共产党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通过整风来缓解和调整共产党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²²实际上这其中已经有造反夺权的影子，全党对付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因之，在运动中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虽曰整风，党内发表意见的却很少，当时《文汇报》记者姚芳藻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在5月3日《文汇报》上发表的《北京书简》提出了“党员为什么守口如瓶”，“在鸣放会上，更听不到党员的声音”。只是这时党内矛盾还没有上升到后来那样的尖锐程度，毛泽东对利用何种力量、何种名义来进行这一事业，也还没有考虑得非常成熟。

然而这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提的意见，很快已经激烈到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希望鸣放、整风所达到的效果和限度。如章伯钧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抨击“党天下”等。²³他陡然惊觉，并提醒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

小平、彭真说：“你们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²⁴“这是天下大事”，“不能不管”。²⁵于是鸣放戛然而止，转而全党一致，对付右派分子，把广大知识分子打下去，给他们的是两条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第二次造反运动是领导集团内部提意见，即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上书毛泽东提出了批评意见。这场君臣之争，可谓“自下而上”的造反，毛泽东利用自己的集权力量，一下子就把彭德怀打下去了。批评者都称彭德怀有“反骨”，可见也被认为是造反。

第三次造反运动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以“三分成绩七分缺点”的事实，向毛泽东“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即“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言论造反。彭真提出毛泽东有错误也应检讨，毛泽东的权威出现了危机，此时握有军权的林彪临场救驾，使毛泽东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危机。第二、三次造反运动是共产党内部造反，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向党的最高领导提意见，完全是合法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造反。但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造反，都不会有好结局。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最高统治者鼓励群众造反的现象。这在古今中外的造反史上，恐怕都是少见的。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号召群众，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起来造“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兴起。这造反，正是出于毛泽东自上而下的号召，群众起来，则是自下而上的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反的对象，当然不是像古今中外的造反那样，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或整个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为此，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²⁶毛泽东所说的“他”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共内部的斗争，斗争的对象很明确，就是刘少奇、

邓小平、彭真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支持者。由此，造反者的造反口号、目的、对象以至策略等等，都源于自上而下号召的“奉召造反”，而非历史上基于自己的生存要求而提出来的“自发造反”。

刘少奇是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时任国家主席，毛自己则任党主席，他对外宾说过：“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但实际上，毛是不那么甘心交权的，特别是交给他眼里已经和自己渐行渐远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表面上退居二线，把一线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少奇、邓小平，自己声称要“静下心来研究些理论问题”。但实际上，他研究的“理论”不是哲学理论，不是建设理论，而是夺权理论，即怎样把失去的权力再夺回来。

林彪曾大谈“政变经”。如果是对付个别政敌，大可采取军事斩首或政变的方式，后来“小舰队”发动未遂的“571工程”，以及华国锋、叶剑英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就都带有这样的色彩。军队的控制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他当时如果要行此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毛泽东要打倒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整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眼里，在这条反动路线上的各级党政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盘根错节，已经形成了极其可观的势力，仅仅在中央进行“斩首”行动，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毛泽东利用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威望，进行了全民总动员，由群众起来自下而上造这些当权派的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打倒旧的当权派，砸烂旧的机构，把政权掌握在造反派，即张春桥这样理解并忠实执行毛的战略、路线的人手里，最初完成夺权大业。

对于毛泽东的心态，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

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²⁷

不了解毛泽东及其造反思想，就不可能了解张春桥；相反，了解了毛泽东及其造反的真实目的与心态，张春桥其人，他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都能看得比较清楚了。比起去世的柯庆施，“毛泽东的好学生”这个称号，更适合张春桥，他是毛泽东的棋子、先锋，得心应手、如臂使指的工具。

在毛泽东的号召、张春桥等的推波助澜下，上海工总司和市委写作组响应造反，则体现了专政集权和国民盲从之间的相互激荡。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经过规模空前、持续不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宣传洗脑，古老的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尊尊思想，已经被淡化或者彻底打破，政治斗争的弦越收越紧，产生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的社会心态。这样，国民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年青一代，都把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并争取有所表现，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或培养，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要追求，而这种“趋附心理”在有知识有文化的造反派中特别突出。“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就是趋附心理具有代表性的语言。

集权政治视不同政见为天敌，更不容许出现有不同政见形成的派别。但人群中不同利益、不同需求的存在，又使得不同政见和政治派别都会有一批追随者。在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站在哪一边，就成了你死我活的较量，两派一旦卷进这个政治斗争漩涡中去，这一派也不就允许另一派的存在，必灭之而后快，因此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派战”。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各自分析一下工总司和写作班的具体情况。1957年反右派，开始是党的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事，他们对党的干部提意见，和工人没有什么相干。但鸣放深入以后，知识分子意见尖锐得使干部们无法忍受了，要进行反击，但要以干部的名义进行还击有些背信弃义，会引起非议，最高领袖便把第三方面的代表——工人推了出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一篇名为《工人说话了》的评论，似乎是以第三方面客观立场，利用工人，表示工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事看不下去了，所以站出来说话了。但实际上，这

只是拿工人做幌子，并不能证明工人对反右运动的深层介入。

到196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集权政治与国民政治热情相结合的时代。民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工农兵成为舆论的主导者。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干部的特殊化激发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毛泽东把握并利用了这样的有利时机，把群众的各种怨气和自己的郁闷结合在一起，喊出了“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集权者带头造反，又有着巨大政治热情和诉求的广大群众立即奋起响应，特别是工人，在这场革命中，真正走上了政治舞台，而其中又以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人首当其冲，工总司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如前所述，文革时期的造反和中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奴隶造反有本质的不同，工人造反不是无底线的，它的底线就是“造反”前的限定词“革命”二字。当然这个革命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什么时候反，什么时候不反，反什么，不反什么，都得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最高统帅的号令。上海工总司在举起造反的旗帜时，在造反前加上了革命两字，这个明智之举，是从社会经验教训中得到的。文革初始，国家最高领袖毛泽东成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是红卫兵造反最权威的支持者和领导者。那时虽然无所顾忌，也曾流行过“怀疑一切”的口号，但怀疑到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口号就成为反动的了。这就是造反的底线。但夺权之后，部分红卫兵继续造反，红司令发出警告“小将要犯错误了”。当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遭到红卫兵一派的武力抵制，发生流血事件，毛泽东从周恩来那里听到这一消息时，颇为震惊地脱口而出了一句话：“造反派，真的反了？”“真的反了？”这个问句含义微妙。它至少说明：文革中的造反不是群众自发的，而且是不能超过界限的，一旦越界，就有演变成“真的反了”的危险，那是绝不允许的。

工总司最早造反，是为了让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反对的也只是一部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期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承认、支持他们。他们虽然喊着“造反有理”，这个“有理”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最大的特色是他们对官方的依附心理。否则就是无理造反，真的要被杀头，他们还是害怕的。

而当工总司受到市委压制，酿成安亭事件之后，奉命到上海全权处

理的张春桥，他一到上海，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就对工人造反派说拦阻火车是要杀头的，工人造反队必须无条件地回上海。后来，他了解到工人受资反路线的迫害，态度变了。在当时毛泽东意向不明的情况下，竟然就敢于违逆主管领导政治局常委陶铸、以及直接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的指令，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由于目前没有张春桥此前曾受到毛泽东耳提面命的任何证据，我们只能猜想，他之所以作出如此惊天之举，是他对毛泽东造反思想及其个人心态的细致揣摩，而表现出其惊人的政治敏感度。张春桥一开始难免有“先斩后奏”的意味，但由于此后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张春桥的处理是对的！”竟然请来了真正的“尚方宝剑”，工总司赫然获得了更强大的倚仗，成为奉召造反，造反的目标更是直接指向了他们此前还在拼命想获得其支持、承认的上海市委。最后在张春桥的带领下，在一月革命中，一举将上海市委打倒。张春桥强力支持工总司，工总司也从此成为张春桥坚决的拥护者，成为此后十年上海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力量，直至“四人帮”的覆灭，文革的结束。

至于市委写作组，由于是“秀才造反”，所以和工总司的工人造反，在大方向相同的基础上，还有着一些差异。徐景贤、朱永嘉等写作组成员，上海解放之时，只有二十岁左右，他们在解放后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真正是在旗下成长起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深深打下了革命的烙印。从思想传承上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上帝，张春桥是他们的导师，姚文元是他们的大师兄，所走的正是徐景贤总结出来的“姚文元的道路”，忠心耿耿地作御用的螺丝钉。

文革期间，右派分子被划为社会渣滓，不准造反。文革之初的造反者，在资反路线时被视作右派或反革命，也属被管制的另类。而以徐景贤为代表的市委机关联络站如以朱永嘉为代表的市委写作班，他们当时都是市委的宠儿，是走红的人物，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没有起来向市委造反的心理准备。由于远离中央，又没有张春桥那样丰富的政治经验，无法把握到最高领袖的想法，同时又人微言轻，所以写作组在文革一开始，还是紧跟着当权派上海市委走的，对造反派们心存疑虑，保持着距离，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11月14日，毛泽东已经肯定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先暂后奏”是对的，12月18日徐景贤才公开打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旗帜，公开造反。他们的造反上有毛泽东的号召，下有张春桥的紧逼，是典型的“奉召造反”，这样的造反是安全的，没有任何风险，对陈丕显、曹荻秋没有依附心理，而且一造反就站在上海市委之上。他们带有优势的造反，和工人造反派站到了同一战线上，沿着毛泽东的方向，在张春桥、姚文元等的指挥下，用他们手中的笔作武器，向着当权派猛烈开火，进行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捍卫着革命造反的成果。而市委机关联络站的核心徐景贤，则更是循着与张春桥相似的道路，进一步介入了政治之中，成为了后来上海市委的头号领导，文革的风云人物。

这些参加了造反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前辈们，到了晚年，有的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被称为“两头真”式的人物，即造反是真诚的，反省也是真诚的；有的则像张春桥一样，至死不悔，仍然坚持着自己当初的理想和信念，尽管这些理想和信念，已经是那样的不合时宜。

注释

- 1 这个红三司不是北京的红三司，而是“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的简称。
- 2 徐景贤1979年10月19日交待。
- 3 刘其奎：《“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世纪》杂志，2013年，第2期。
- 4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辑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95页。
- 5 此段根据陈冀德：《生正逢时》。
- 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 7 王绍玺，时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写作班文艺组成员。朱玉珮，时为《支部生活》工作人员。
- 8 常溪萍，时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 9 原文如此。
- 10 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李实，即毛泽东之侄毛远新，

李实是他参加四清运动时用的化名。

- 11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128页。
- 12 柯六六：《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安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淮文史》，2004年，第五期。
- 13 张维维1978年8月19日证词。
- 14 《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的谈话》，1966年12月6日。
- 15 蔡祖泉，自学成才的电光源研究专家，历任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
- 16 张维维为笔者提供。
- 17 炮司，即“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简称。
- 18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0页。
- 19 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2011年9月6日。
- 20 误入白虎堂，原指小说《水浒传》中太尉高俅引诱林冲携刀进入军机要地白虎堂，以此诬陷林冲暗杀朝廷大员而将其捉拿的故事。这里借用这个故事，表现赤卫队误闯柯、张家中而给了造反派以武斗的理由。
- 21 周壁，时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
- 2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0页。
- 23 章伯钧，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 24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 25 同上，第173页。
- 26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
- 2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第九章



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武康路2号

第九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

“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

历史进入1967年1月，上海局势处于矛盾交织之中，最大的造反组织工总司虽然被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自感根基不牢，心中发虚。赤卫队在康平路武斗失败后，一支队伍奔向火车站，要上京告状，乘车未成，数千人被困昆山车站，要搞成第二次安亭事件，铁路交通因此中断；留在市区的赤卫队在酝酿搞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事件，想为自己所在组织的生存制造最大影响。赤卫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工总司，加上队伍中有许多劳动模范及先进人物，本来可以成为工总司的强大对手，即使在当时所谓“大方向错了”的情况下，也还可以和工总司一较长短。但是由于这个组织的头头一次次决策的失误，特别是提出“三停”的建议，虽说是会议上的一番议论，并没有付诸行动，更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可是让工总司抓住了把柄，进行了夸大的舆论宣传，惊动了在北京的周恩来，他明确表态要制止赤卫队制造“三停”的举动。工总司乘机向赤卫队发动进攻。再加上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使机关失控，这样，上海开始乱了起来。

上海市委挡在第一线的曹荻秋被造反派斗得落花流水，没有招架之力。幕后策划者陈丕显主张“在经济上放宽一些”，下面的干部有据可

依，纷纷批条子，群众像潮水般地向银行取款，再加上临时工、返城工合理的经济要求，刮起了经济风。上海的经济亮起警戒灯：囤粮和囤煤只够用一周，经济风再刮下去，不要三天，银行存款就会被取空。上海经济形势危急！端坐在中南海里的毛泽东，遥望数千里之外黄浦江畔这一派群雄纷争的乱世，揆情度理，运筹帷幄。同时，各种角色也登上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政治舞台。

从1967年1月1日开始，北京和上海处在互动中。1月1日子夜零时，周恩来主持了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张、姚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上海最新形势并作出了决定：鉴于曹荻秋已很难应付局面，因病休息的陈丕显即日出来工作。要陈丕显从幕后走到前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王玉玺抓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把王玉玺抓起来，一是点明赤卫队问题是解决上海目前危机的关键；二是说明上海市委还在工作；另一方面对陈丕显也是一个保护，增加工人造反派对他的信任。陈丕显应该能体会到周恩来的良苦用心。

周恩来准备自己打电话给陈丕显，但他还是策略地先让张春桥通知陈丕显。智慧人物周恩来，对这样小的细节都有着精心的考虑。他让张春桥向陈丕显传达中央让他出来的决定，有着言外之意，一是说明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中央是一致的，而周对张也是信任的；二是考虑到毛泽东已经决定张将以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希望张和陈能搞好团结，稳定上海局势；更为重要的是，安亭事件后，周恩来已经感到张春桥的能量和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不可等闲视之。

这时，张春桥恐怕也没有忘记安亭事件时，陈丕显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告状的事情，这次回上海，陈丕显无疑又要成为他的对手了。零时五分，张春桥打电话通知陈丕显：总理将宣布中央决定，一是请你出来工作，支持造反派，搞好革命和生产；二是立即把王玉玺抓起来。这时北上告状的赤卫队还被堵在昆山，这支队伍真的到了北京，陈丕显如何向中央交待！陈丕显接到张春桥电话后，立即派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周壁，去昆山劝说赤卫队回上海；他又吩咐市委办公厅值班人员通知造反派到东湖招待所开会；然后

他自己去了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安排抓王玉玺。

据陈丕显当年秘书于宝年回忆，是张春桥让陈丕显去找造反派的：

陈丕显同志对我说：“张春桥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我出来工作，解决铁路瘫痪问题。我当时问他，现在市委和机关都瘫痪了，我出来怎么能工作呢？张春桥说，你找造反组织，他们有办法。”说完之后，陈丕显同志说你现在通知市级各造反组织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请他们晚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研究怎么办。

当时，我用电话通知了红革会，并请他们通知市一级各大造反组织。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我电话通知徐景贤的，并约好时间，他在瑞华公寓门口等我一起乘车去东湖招待所。¹

零时十分，张春桥打电话给市委机关联络站徐景贤。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上海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们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上海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丕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样把上海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精神，做做工作……”²

从徐景贤回忆张春桥指示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体会，张春桥用“陈丕显说话不灵了”为他打倒陈丕显埋下了伏笔。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张春桥在电话中还对徐景贤说：“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又说：“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让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以后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³但张春桥的这段话只见于陈丕显的回忆，徐景贤《十年一梦》以及于宝年的回忆中均未提到。凌晨3时，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转达中央的决定和要求，特别强调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交通一定不能中断。陈丕显向周恩来汇报了下令逮捕王玉玺的经过。

上海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和北京等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代表，接到于宝年的通知，已齐集于东湖招待所餐厅。他们是工总司的王洪文，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朱永嘉。王洪文来得较晚，他正在感冒发烧，一脸病容。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最后一个到会。他刚从昆山回来，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统皮靴，咋咋呼呼地说他已经把二兵团的队伍调了过去，把赤卫队堵在了昆山城里。

凌晨5时，穿着一身军装的陈丕显从铁路局赶来，他用福建口音向大家传达中央精神，并说已遵照总理指示，将破坏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王玉玺扣押起来；接着讲了因相继发生的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而导致目前上海工业生产停滞，特别是交通运输瘫痪的严峻形势，“最严重的，就是上海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他要求大家一起努力，尽快恢复铁路运输和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

这是陈丕显第一次出场和上海造反组织的代表相见，又穿着一身军装，病容全消，显得格外精神。他的精神支柱是有中央指示，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再一个就是抓捕了赤卫队的头头王玉玺，作为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见面礼，而且是一份分量颇重的见面礼。这既是市委、市政府对赤卫队采取的断然措施，对陈丕显个人来说，也是他与这个保守组织最后彻底决裂的明确表示。这一步他走得毅然决然，破釜沉舟，从此再无退路。

但是，红卫兵不相信中央会让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杨小兵把陈丕显的传达记录整理成文，和于宝年一起向周恩来办公室核对，证实准确无误。虽然如此，王洪文还是不相信，认为陈丕显伪造周恩来指示，说陈丕显召开这个会是个大阴谋，恢复铁路运输是扭转斗争大方向，包庇赤卫队过关。

徐景贤遵从张春桥“不要给陈丕显表现的机会”的电话指示，牢牢掌握着会议主动权。他质问陈丕显：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

徐景贤不给陈丕显有讲话的机会，他又紧接着说：“陈丕显！你不

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听总理的，不是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⁴接着，徐景贤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他的电话，将大家注意力集中到他那里；炮司红卫兵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徐景贤顺势建议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大家都赞成他的建议。徐景贤又逼问陈丕显：“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陈丕显表示同意。于是，由杨小兵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等人，在华山路922号起草传单。

陈丕显的回忆和徐景贤的说法有异，他说发传单的提议及传单的主要观点是他提出的：

这张传单是1月1日凌晨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开讨论会时，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⁵

耿金章介绍昆山情况后说，还有许多赤卫队员滞留昆山，希望大家一起去把他们劝回来。陈丕显提出自己亲自去昆山解决问题，耿金章也主张陈丕显一起去。但绝大多数造反组织坚决不同意陈丕显到昆山去。陈丕显只好给张春桥打电话征求意见，张春桥同意红卫兵们的意见，让陈丕显负责交通和食品供应。陈丕显只得留下。实际上，陈丕显下令抓了赤卫队的头头王玉玺，即使他到了昆山，赤卫队能听他的指挥吗？张春桥阻止陈丕显去昆山，他也就真的不去了。这说明此时的陈丕显对张春桥还是相信的，否则他可以直接向周恩来报告去昆山解决问题的要求。

1月1日上午10时，会议一结束，一部分人去了昆山，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人起草文件。杨小兵执笔写初稿，并与留在东湖招待所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代表讨论修改。王洪文则一觉醒来，病容仍未消，只说了一句：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名堂。随即离去。在传单上签名的共11个造反组

织，工总司名列第一。机关联络站没有在传单上签名，因为会议结束后，徐景贤他们都去了昆山。

后来，徐景贤在让人撰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解释道：3号晚上，在最后通过并签字时，机关联络站、二兵团、红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4个组织由于未通知而漏掉了。徐景贤的话表明，当时主要矛盾集中在昆山，要把赤卫队队员劝回来，及时恢复铁路交通。大家都沒有把这张传单当回事，仅当作一张给赤卫队队员讲政策的普通传单，签名不签名也就无所谓了。

文革小组调查员到上海

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赴上海观察、了解运动情况。同时决定，在此期间，由王力负责中央与张、姚之间的联系。为此，王力特意设置了与张、姚的直线电话，并加了抗干扰器，以防任何窃听。

1月2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在《解放军报》的一个会议室里接待了王洪文等人，向他们询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王洪文表示对让陈丕显出来工作不理解。原来王洪文仍然不相信周恩来会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认为陈丕显伪造了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带着陈阿大、廖祖康来北京找张春桥问个究竟。⁶张春桥对王洪文等人说：这件事情还是应当让他到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陈阿大说陈丕显解决不了“三停问题”，我们去解决。张春桥回答：你们的任务是监督，不要具体去管“三停问题”，你们还是要抓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张春桥又一再强调：上海的桃子就要熟了，不能让陈丕显摘去。此前在解决赤卫队的问题时，张春桥就提醒过造反派：不要让桃子被别人摘去。张春桥还向王洪文他们建议，工总司搬到市总工会的大楼去。

张春桥并没有告诉王洪文，毛泽东派他和姚文元回上海的事。毛泽东没有要求张、姚去领导上海运动，给张春桥的任务很简单，是作为文

革小组的调查员，把上海情况及时地、准确地汇报毛泽东。没有叫他们掌握上海局面，也不是去改变上海领导班子。

1月3日下午，张春桥特地让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了解武康路2号写作班原来的办公处现在的用途，并说张春桥和他想要用这个地方，徐景贤连忙应承下来。但姚也没有告诉说第二天他们将回上海。

晚上8时，陈丕显在东湖招待所主持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杨小兵起草并修改了的文件，这时决定文件的题目是《急告全市人民书》。《急告全市人民书》首先高举迎接“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这面旗帜，指责走资派在运动初期以抓生产来压革命，现在则以抓革命来压生产，“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员借口北上控告”，离开生产岗位，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来破坏革命。接着对正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一小撮反动家伙”——实际是赤卫队头头发出警告，“对这样一批反动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最后提出“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同时“热情欢迎工人赤卫队广大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到会者一致通过《急告全市人民书》，陈丕显此时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签字同意付印：

文汇报社：即印二十万份 不得延误。——陈丕显

陈丕显还让秘书于宝年通知《文汇报》立即排印。1月3日晚，也就是陈丕显和造反组织代表讨论通过《急告全市人民书》时，《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报社食堂召开全报社大会，宣布对《文汇报》实行接管。参加会议的报社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支持星火燎原总部对报纸的接管。

报社职工对造反派接管报纸之所以能热情支持，使造反派的接管那么顺利，是因为这时文汇报社的编辑小组正在酝酿《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合并。当时《文汇报》纸张紧张，每星期一休刊。1967年1月2日正好是星期一，《文汇报》休刊。临时获知2日要发表毛泽东和郭沫若的

《满江红》词手稿，编辑工作小组决定与《解放日报》商议出联合版。过去，《文汇报》虽然有过和《解放日报》出联合版的做法，但没有危及《文汇报》的生存；但此时是非常时期，出联合版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意味着《文汇报》不复存在了。不管造反派、保守派或中间派都不希望《文汇报》消亡，这是星火燎原总部能顺利夺权，得到大家的支持的思想基础。

1月4日，正当接管后的《文汇报》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到了上海。《文汇报》这天一版上方重新发表毛泽东撰写的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下方则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署名的《告读者书》，宣称“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告读者书》没有讲到夺权，只是讲接管；另外，通篇没有提到上海市委，没有说打倒上海市委，更没有说和市委一刀两断。这里还是有分寸的不同，在当时来看，只能称得上是温情造反。

北京当天就可以看到《文汇报》。在中央文革，对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文汇报》，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王力。他感到《文汇报》面目一新，有了生气，但也存在着很大疑问：报纸究竟由谁管？谁来领导？谁来判断报纸刊登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整个市委权力都由革命力量掌握了那还好，可以由市委来领导报纸，现在报社造反派是不是合适掌握报纸？

4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带着毛泽东的使命，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到了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又和他们作了一次长谈。上午11时，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说他和张春桥已经到上海了。说他们第一步想找一些机关的左派了解情况，人数不要太多。他还要徐景贤对他们来到上海之事，暂时保密两三天。⁷

当天下午两点半，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到武康路2号。张春桥、姚文元先与徐景贤单独谈话，了解机关联络站人员情况。然后，张春桥让徐

景贤把机关联络站成员郭仁杰、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陈冀德、王承龙、朱玉珮等13人找来开个小会。这些人中除了王承龙和朱玉珮，都是原来写作班的人员。张春桥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生日讲话，说毛泽东对他们的造反评价很高。张春桥说：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向你们传达了。所以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站在你们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⁸

徐景贤和郭仁杰汇报他们正在筹备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当徐景贤汇报到王洪文发言内容，是揭发安亭事件后上海市委围攻张春桥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现出很大兴趣，问：“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徐景贤说他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从市委常委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接着，徐景贤又汇报了1月6日举行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情况，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委员们都要到场接受批判，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请张春桥决定。张春桥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还没有什么意见，照你们的安排开。”

按此时张春桥和造反派的表现来看，应该说，对自己和市委的关系，张春桥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也还没有形成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想法。造反派对上海市委也只是停留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概念。

在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的最初阶段，写作班是他们的秘书班子和对外的工作班子，通知开会、起草文件等等事务性工作，都由写作班打

理，甚至开会地点都在写作班工作点。写作班的武康路2号，也成为张春桥经常接见群众组织的地点。武康路2号，就这样成为上海的一月夺权时期各个造反组织集中处，成为上海一月夺权的中心。

张春桥对《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是什么态度呢？那天，徐景贤拿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后出版的第一张报纸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汇报，张对接管感到意外，脱口说了一句：“这事我们事先不知道呀！”他有些不高兴，态度很冷淡，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当然也没有说反对。姚文元认为这件事要向中央请示汇报。⁹据当时在场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维铮在1976年12月23日回忆：

对于重新刊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他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五七年反右时写的，那时批判的对象和任务，同现在都不一样。他针对报社造反派发表的《告读者书》说：“《文汇报》早就造反了，批判海瑞罢官就是造刘、邓的反，现在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资产阶级方向，就是自己否定自己。”他又说，《文汇报》假如要表示替造反派说话，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社论，题目就叫《永远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¹⁰

没几天，张春桥又对朱锡琪说：“我这次来上海，本来考虑《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合并问题，没想到你们接管了。”¹¹言语中也有些不高兴的样子。总之，星火燎原造反派没有和他打招呼就接管《文汇报》，出乎张春桥的意外。

4日上午，杨小兵把陈丕显签了字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送到被造反派接管的《文汇报》社，与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商量，能否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¹²朱锡琪也认为只印传单影响不大，如果在《文汇报》上发表，可以影响全国，于是对杨小兵的提议表示了坚决赞同。

但是，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造反组织的传单当时尚无先例。《文汇报》虽然不是市委机关报，但也是官办的报纸，在全国的报纸中也是

举足轻重的。造反派虽然接管，但对此还是很慎重的。他们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想通过他们将传单送给刚刚回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审阅。姚文元听了汇报后，就说：我们刚回来，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也没法发表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¹³姚文元这种态度是看张春桥脸色行事的。

张春桥、姚文元虽然不表态，但《文汇报》当晚不但印了20万份传单在全市散发张贴，还准备把这张传单在报上公开发表。夜班编辑们在编辑上也花了工夫，为《急告全市人民书》加了肩题《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¹⁴1月5日在《文汇报》一版用通栏标题刊登出来，以此来表明《文汇报》被接管后的态度。周国荣回忆说：

我们也觉得这张大字报很重要，但并不十分理解，更不知道是个十分重要的文件。

我们只知道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发言，是真正造反派的声音，我们的报纸必须让他们发言。

这个文件我们是4日晚上拿到的，我们立刻决定利用！但当时的《解放日报》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着，当权的是马达、王树人。¹⁵我们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送给他们，直到凌晨4点，他们还不能决定到底用不用。他们对我们说什么这中间牵涉到上海市委啰，还胡说什么要引起群众斗群众啰。他们说，登不登你们自己考虑吧。¹⁶

《文汇报》这个突破常规的举动，当天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陈丕显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几日后他签发的《紧急通告》，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转折，这一点搞上海一月革命的历史研究者都是不会忽视的。但在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打倒上海市委

此时的张春桥仍然陶醉在他处理安亭事件胜利的喜悦中，既对陈丕显参与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视而不见，对造反派接管《文汇报》之事态度冷漠，也不向造反派传达毛泽东不要把陈丕显“烧焦了”的指示，而是铁了心要打倒陈丕显，表明此时他还没有领会到毛泽东对文革的全局思想，缺少前瞻性的眼光。

1月5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决定在武康路2号接见上海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耿金章、范佐栋、叶昌明、蒋周法都来了。¹⁷陈阿大一进门就问：“开什么会？”徐景贤只是笑而不答。他恪守张春桥要他暂时保守秘密的要求。当张春桥、姚文元走进会场时，王洪文等很惊讶。两天前，他和陈阿大在北京还受到张春桥接见。张春桥微笑着说，你们到北京来，我们不好告诉你们。

张春桥首先向大家划清自己与上海市委的关系，他说：“我们这一次来的身份，是中央文革的调查员，同时也和市委划清界线，我们两个人都不参加市委工作。你们应该要求市委、部、局解决问题，还是去找他们。他们也希望把什么都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中心任务就是帮助左派发展。”¹⁸

这时，张春桥从“打倒上海市委”文件袋中，取出王洪文的发言稿《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一边看一边修改，不时地和大家谈话。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找到的市委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和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¹⁹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²⁰

造反派邀请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和群众见面。张春桥挥着手说：不去了！你们开会，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对工总司汇报说赤卫队提出打倒张春桥，他们要抓赤卫队负责人，张春桥表示不赞成，他说：你们人抓得太多了，第一要少抓，抓的人要审查一下。如果我们树敌太多，可能使很多人受蒙蔽，对瓦解他们不利。张春桥又说：我下飞机时，马天水对我说，昆山车站有大批赤卫队员要我接见，我一口回绝了。他们一面要打倒我，一面要见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他们想再搞一个安亭事件，那就让他们搞吧，我才不理呢！

对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提醒工总司：不要眼睛老盯着黑材料，材料烧了，还是可以搞出来的。不要放掉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把走资派揪出来打倒。张春桥还提醒王洪文，工人造反派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全局。上海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的操纵。

接见之后，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预告了上海造反派要举行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信息，他写道：“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姚文元向中央发的《简报》和张春桥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而且是用了心思的。否则，中央领导会怀疑：1月1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要陈丕显出来工作，怎么才几天就要打倒呢？而姚文元在《简报》中表述的是造反派把口号升级了，说明打倒陈丕显是自下而上由造反派提出来的。

本来，毛泽东在他73岁生日宴会上，对上海机关干部造反口号中的“火烧陈丕显”，还特别强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意思很明显，对陈丕显的批判不要搞过头了，多少还有保护陈丕显的意思。从12月26日到1月6日仅仅相距10天，在这期间，陈丕显还主动到上海市委机关造反组织联络站去探望；周恩来叫他出来工作，他马上就离开医院，坐镇上海铁路公安局指挥抓捕赤卫队头头王玉玺；然后又去东湖招待所和各个造反组织一起研究稳定上海局势，参加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又要亲自去昆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在当时省、市级党委高级干部中，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支持造反派的了。按理

说，上海市的造反组织对他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可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对他的口号由“火烧”升级为“打倒”。工人造反派不说，像徐景贤这样聪明的机关干部造反派，难道不理解毛泽东对陈丕显的保护态度？后来才揭穿其中的秘密：姚文元在向徐景贤等造反派传达毛泽东生日讲话时，把毛泽东对陈丕显说的“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吃掉了，没有传达。这不应该是忘记了，而肯定是有意为之。这个有意为之也不是姚文元敢擅自决定的，应该和张春桥有着共谋。他们的这种作为，虽还不能判断张春桥此时就想对陈丕显取而代之，但起码可以说是张春桥在向陈丕显报在安亭事件时向陈伯达告自己状的一箭之仇。

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报社记者也纷纷出动前往参加采访。这天，天气阴沉沉的，马路和屋顶上还堆积着灰色残雪。一大早，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卡车，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广场周围主要街道，全都安装了新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各个造反派的旗帜和各种颜色的彩旗，在寒风中飘荡，如同起伏的波涛，一眼望不到边，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还把本单位的走资派押来陪斗。

上午10时，在寒风和口号声中，陈丕显被造反派勒令不准穿军装，只穿一件灰色棉袄，曹荻秋满头白发被寒风吹得乱蓬蓬的，他们被造反的警卫人员押上露天主席台，站在事先搭好的乒乓球桌子上。市委、华东局其他领导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也被押上主席台，站在陈、曹两侧。²¹每个人胸前都挂着用硬纸做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姓名，姓名上用红笔打了叉。主席台上毛泽东巨像下，一百多位部、委、局以上的干部，一字排开，站着陪斗。

王洪文作了最后压场发言，这篇题为《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主要内容就是揭发那次批评张春桥在工总司《五项要求》上签字的市委常委扩大会，也即所谓“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这篇稿子是由写作班的吴瑞武根据市委办公厅造反派提供的原始档案起草的，文中引用了不少那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揭露发言记录。张春桥对这篇发言稿似乎特别重视，不仅仔细修改，还加上了当时针锋相

对地反驳别人的三段话。也就是说，这个有20万人参加，近百万人收听的大会上，张春桥借王洪文之口，直接对以陈、曹为首的上海市委进行批判。张春桥增加之处，如有位常委认为，承认工总司就会大乱，张说：“今天上海之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是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的。”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已有规定的问题，而是对这个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在当时的语境下，陈独秀就是错误路线的代名词。

大会高潮是宣读和通过三项通令：第一号通令是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号通令要陈丕显坦白交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第三号通令是“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²²这三个通令是由“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郭仁杰主持，与戴厚英、高玉蓉一起起草的。²³《通令》中没有提到夺权的事，但是张春桥看后说：“上海三个通令，是全国省市第一个夺权文件。”

张春桥虽宣称自己不参与上海的工作，而实际从1967年1月6日这一天起，上海党、政、财、文大权，已经落在张春桥、姚文元和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几个造反组织的手中。大会结束时，曹荻秋已经站不稳，躺在担架上，盖着白被子，被抬出会场。

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张春桥很谨慎，这样重大的行动，没有毛泽东点头，他不会轻易作过多的介入。但是，他还是时时在关键时刻对造反派加以点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第二天，徐景贤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去见张春桥，本来以为他会对此事赞扬几句，不料张春桥问徐景贤：“你们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徐景贤一下子被问住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不就代表中央了吗？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由他们造反派自己报送中央，他还以为张春桥、姚文元知道了，还能不向北京汇报吗？张春桥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但他还是扶了扶眼镜，很悠闲地说：

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

是，你们又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中央。²⁴

张春桥这么一说，徐景贤紧张得脑门上直冒汗。他向张春桥请示，该怎么上报，张春桥建议他用大会几个发起群众组织的名义报送，一式十五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到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

姚文元也向中央写了《简报》，他没有忘记他和张春桥都是调查员，所以只以调查员的身份作了客观的报告，说：

上海开了10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韩均到会。会后又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²⁵

无论是姚文元写的简报，或是徐景贤以造反组织为名写的报告，都明确向中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上海市委瘫痪了，上海造反派要打倒陈丕显。张春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全市批判陈丕显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修改王洪文在批斗陈丕显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称赞三个通令是“全国第一个夺权文件”，而对《急告全市人民书》则视而不见。张春桥以为批判陈丕显是放了全国省市夺权的第一枪， he以为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应该会有一个态度。他和造反派都在等待期盼中。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表态，没有让《人民日报》刊登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消息。看来，毛泽东对1月6日大会的三个通令有保留意见。因为他在关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刻在注意抓住某一个契机，把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所以他想抓住的恰恰是《急告全市人民书》，要在这个文件上做大文章。这是张春桥没有想到的。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三个通令，虽然提出要罢免曹荻秋的职务，但没有提到夺权问题。姚文元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只是说“上海市委可以

说完全垮台了”，也没有明确提出夺权问题。但此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张春桥却说：1月6日的大会上海就夺了权了。张春桥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是在抢头功，怕夺权这一口号的发明权被别的省市夺去。他们起初没用这个口号，是后来山西等地先用的。

不过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之后，上海经济风不但没有煞住，反而刮得更厉害，来银行提款的人愈来愈多，企业单位用各种名义发钱，银库有被提空的危险。

两个紧急通告

1月7日，王洪文通过市委机关联络站向张春桥汇报全市经济风愈演愈烈的情况。张春桥建议工总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所谓经济风是由补发风而引起的取款风、抢购风、抢占房子风的连锁反应。补发风即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工资紧缩而对职工的各种福利补助的欠债。此时工交系统大多数干部都在批斗中，为求自保、过关，他们迫于职工的要求，选择了签字同意。干部们也不是妄自为之，是陈丕显、马天水分别作了指示：“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²⁶随着补发风与临时工要求转正、1960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要求回城二风合在一起，又很快引起生活用品抢购风和空置房屋抢占风。因为这股风违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当时称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造反派工总司把刮经济风的帽子扣在保守派赤卫队头上，实在是有些冤枉。经济风的风源是从陈丕显那里吹来的。

1月8日，工总司总部在国棉三十一厂召开会议，讨论工总司对经济风应该有个态度。王洪文提出要发一个通令，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当晚以工总司的名义发出一个《紧急通告》，要求工总司所属各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大批人员脱离生产岗位”、“不准私自占领国家房屋”、“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等四项规定，并指出：“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针对上海市委、华东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为

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掌握，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否则一切暂时的、眼前的利益都是空的。”

应该说，工总司的《紧急通告》的最后一段话，是与张春桥多次点拨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这一《紧急通告》发出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在工总司的《紧急通告》这张传单印发的同时，另一部分造反派也在行动，他们是耿金章等人。耿金章在接到经济形势紧张的信息后，与二兵团总部几个负责人商量，决定立即召集造反派组织会议。此时耿金章还不知道工总司已经发了一个《紧急通告》。

1月8日，耿金章先给张春桥打电话，希望张春桥能参加会议，得到的答复是张春桥安排了其他会议，分不开身。耿金章再打电话给王洪文，王洪文也说下午有别的会议。耿金章又去找陈丕显，陈不但答应自己参加会议，还将把各部、局的领导也叫来。

下午在衡山饭店，全市造反组织与上海各局负责人联席会议召开，到会群众组织30多个，耿金章、陈丕显坐在前排。徐景贤派代表朱永嘉参加会议。陈丕显让朱永嘉坐到自己身边，请他记录到会代表发言。

到会的其他组织针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议论出许多条意见。陈丕显建议再写一个传单。对于失去领导权的他来说，只能把传单看成一道符咒，可以镇住造反派和刮经济风的人。陈丕显的意见得到采纳，决定由红革会、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红卫兵和朱永嘉负责起草，不约而同，也定名为《紧急通告》，有十条内容：一、坚守岗位；二、外出串联的回来完成生产计划；三、停发串联费；四、控制单位流动资金；五、把工资福利遇到的问题推到运动后期解决；六、八、九三条是要各造反组织反对经济主义，并进行宣传；十、责令市公安局照此执行，违反者以破坏革命论处。其中第七条是针对抢房风，是朱永嘉提出来的，他说：“这条我感触最深，因为我的资本家父亲，全家被扫地出门，房子被占，父母只能居住在亲戚家，而且有病在床，生活上颠簸，弄得我头痛，所以就专门写上这一条。”²⁷

《紧急通告》写成后，当场宣读，有的造反组织不承认经济风，不肯签字，被赶出会场。以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签名，二兵团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签名在工总司之后，朱永嘉代表市委机关联络站签名。²⁸

当晚，由陈丕显签字，将《紧急通告》用电报发给中共中央。同时，《紧急通告》底稿由朱永嘉交给徐景贤，送《文汇报》发表。

1月8日下午，在陈丕显和耿金章等在开会撰写《紧急通告》的同时，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也在开会商讨如何应对上海生产和交通困境。张春桥召集市委机关造反派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开会。这个会，即上午他推辞耿金章的邀请而要另外参加的那个会议，徐景贤和王洪文等都到会。张春桥要求造反派首先将力量放在港口、发电厂、自来水厂、电报局、电台、邮局、煤气公司、铁路局、工交公司等要害部门。他认为乱一下没有关系，而且乱一下还可以改革和精简机关科室。他说：

既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准备生产都停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我们精神上要振作，要看清主流和支流，正像北京运动一样。我们要好好开展工作，不要被吓住……我们不要太急，运动有它正常的发展规律，刚刚起来，乱一下没有关系。

.....

去年三月主席在上海谈话，取消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都做到了。就是部改科，还没有实现。将来不要部好不好。实际上是科长干事，部局长做老爷。我们不要求恢复秩序，因为现在机关破坏得不够。²⁹

这个思路和毛泽东是不一致的，张春桥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想法已经变了，向前发展了。

举步皆错，连失先手

1月8日晚上的北京，毛泽东临时召集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和胡痴开会，议论上海运动的最新形势。³⁰会上，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接管和报上发表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署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作了高度评价：“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发红卫兵报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我们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³¹“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³²

毛泽东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立即转载这张传单，又让王力将会上的这些信息打电话告知在上海的张春桥。接过电话的张春桥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首先当然是很高兴，很兴奋；但是从后来对应的一些行动举措来看，恐怕他同时还感到很意外、很吃惊，也很紧张。因为他对《文汇报》夺权态度冷淡，《急告全市人民书》又是在陈丕显主持下搞成的，这两者显然都是他的心病。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刊登的那篇《急告全市人民书》，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配上《编者按》。这篇《编者按》由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执笔，其实几乎等于毛泽东口述。毛泽东看了之后，说：“就这样，马上广播。”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编者按：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9日的《文汇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第二版刊登由陈丕显主持写成而且签了字的《紧急通告》，然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看到报纸刊登《紧急通告》，有些不大高兴，认为接二连三地发号召，没有人去执行去做事。张春桥批评机关联络站不应派人参加那个会，更不应在《紧急通告》上签字。当徐景贤向他汇报《紧急通告》起草经过时，张春桥批评说：刚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主席的肯定，又来个《紧急通告》，乱套了。张春桥对徐景贤的指责，表现出他的心情焦躁了。因落后而不安，因不安而焦躁。他要急于赶上这落下的一步，重新拥有领先地位。

陈丕显看了9日的报纸，特地打电话给张春桥。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作了记录：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我最近没做什么事，就是搞了这两份东西。那个《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人参加，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共同搞出来的。陈丕显不会想到，这话更是触动了张春桥的心病。

1月9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文汇报》社，说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还讲了一通话。他在讲话中故意表白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有些思想，我们在北京时曾经讲过，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打下去。”³³在这里，张春桥并没有提到《紧急通告》。张春桥的这番表白不是没有根据的，元旦凌晨，中央对上海危机作出决定时，的确说到赤卫队的问题、三停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这个会张春桥是参加了的。但他这个时候，在这种场合特别强调这一点，却分明有了弦外之音，就是要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有些思想挂在他的名下，淡化甚至抹杀这张传单与陈丕显的关系。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紧急通告》，甚为重视，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³⁴（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

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³⁵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陈伯达、唐平铸、胡痴起草的贺电，署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西大厅，审阅了贺电稿后说：署名还要加一个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就把本来是办事机构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提升到权力机构。王力看到贺电署名中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他认为文革小组是常委会的参谋秘书机构，是做具体工作的，不能同中央并列。就问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毛泽东笑而不答，这个笑而不答着实耐人寻味。

深夜，王力给张春桥打来电话，通报了中央文革小组地位提升的消息，这令张春桥很是兴奋，但另一个消息则令他感到意外：毛泽东对《紧急通告》也作了很高评价，还指示要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贺电，贺电文稿中央已通过。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张春桥落下了一步；他和工总司先搞了一个《紧急通告》，以为以此能扳回一局，但没有见报，因之也就没有产生波澜。而陈丕显搞的《紧急通告》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评价如此之高，使他又落后了一步。在毛泽东此时的棋盘上可以说张春桥举步皆错，心中的焦急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毛泽东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不但没有解决旧体制的弊病，反而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从1966年到1967年初，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状态如何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了领导班子，机构没变，只是领导班子的成员变了，中央常委共11人，其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似乎都不参加常委的工作和会议了。陶铸原本受到毛泽东重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度成为中共第四号领导人物，执掌领导文革大权。但他因为力图限制造反浪潮，并与中央文革小组频频产生分歧，从而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被江青、康生打倒。陶铸被打倒以后，书记处也瘫痪不存在了，留在常委工作的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

个人。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书记处，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本来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中央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而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周恩来的主持下，它无形之中取代了书记处，又架空了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重大事项的参谋策划和决策本来是两个系统，这时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不只是助长了毛泽东的专制，中央文革小组也横空出世，独断专行。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就曾表示，自1966年6月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是独立王国，自己专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毛泽东虽然这样说，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制约，反而是放纵的。

摘走了一月革命的果子

1月11日中午，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春桥打来电话：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给工总司等上海造反组织发一个贺电，高度评价《紧急通告》。³⁶贺电已送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已拟就，当天晚上广播，第二天见报。

下午，这个贺电发到上海，上海立即印刷大红号外在全市张贴散发，整个上海沸腾，造反派更是欣喜若狂，立即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盛大庆祝会，会后还要游行。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准备出席这次大会，并向中央作了请示报告。要不要让陈丕显出席这个大会？可不可以让他在如此盛大的公众场合亮相？这个应该向中央报告请示的问题，张春桥却没有提出来。

晚上11时，张春桥、姚文元在市委党校召开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工总司等四十多个组织出席。张春桥传达中央贺电，他说：我和姚文元到上海来才一个星期，上海的形势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两次肯定了上海的形势。他又说：以中央四个组织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发贺电，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除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外，此后就再也没有发过贺电。³⁷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把徐景贤叫到兴国宾馆，告诉徐景贤：去年12月主席生日的时候，提到上海写作班造反时的口号“火烧陈丕显”，主席很风趣，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徐景贤一听，头皮发麻，有些发呆地坐在那里想：主席说“不要烧焦了”，可是现在经过你们同意，大会也开过了，通令也发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了。³⁸对陈丕显的事，张春桥可谓瞒天过海：他不向造反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支持造反派把陈丕显送上审判台。

张春桥还告诉徐景贤：“这次来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还能出来工作，所以我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和群众见面之前，先找你谈谈。我把中央的意见告诉他。陈丕显听了以后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然后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我看，他现在也确实难以出来工作。”³⁹

《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两个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文件，是在陈丕显参与下和几个造反组织一起搞出来的。按理说这件事情主角之一的人物陈丕显应该出席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但张春桥直到这时才把毛泽东对陈丕显“烧一烧可以，不过不要烧焦”的话说出来，并以陈丕显自认为出来工作有困难为由，把陈丕显在庆祝大会亮相的路全部堵死，而为自己出席庆祝大会做好充分的铺垫准备。

在上海庆祝大会亮相之前，张春桥仍然像祥林嫂一样，念念叨叨地表明自己是以调查员身份来上海的。1月11日，他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的人员说：

我们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不是消极了吗？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一些帮助。⁴⁰

也是1月11日这天，张春桥和上海造反派见面时又说：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回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大家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⁴¹

1月11日，是上海造反派最为兴奋的一天，也在为12日召开庆祝大会作着准备。张春桥也是准备出席12日大会，公开亮相的。但是这种重要的时刻，张春桥一天之内连续召开两次座谈会，在会上，对上海《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两大兴奋点只是简单地、淡淡地谈了几句，而大谈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应该说这反映了他当时落后几步的被动心情，是在要人们知道，他几步都没有踩到毛泽东的锣鼓点子上，是由于他的调查员的特殊身份造成的。但是他又不甘心输此一步，他对上海造反派谈到《紧急通告》签名时，说：“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一下，来不及了。”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似乎他又参与了《紧急通告》出笼的一些过程。以后，他对朱永嘉的暗示及到《文汇报》讲话时说：《紧急通告》的有些意见，他们在北京曾经商量过。张春桥陷入了自我矛盾中，表现了无可奈何而又难以自拔的心情，也表现了他这位幕后推手的“阴”。

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中央贺电，转载《紧急通告》，并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中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⁴²

下午2时，“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张春桥、姚文元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发

表长篇讲话。这是他1月4日回上海后，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露面。张春桥说：大家都记得，这一场文化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走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无耻的。

张春桥接着又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的新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胜利的进军号角。照此说来，两张传单的起草不仅与陈丕显毫无关系，它们还成了向他和曹荻秋发起新进攻的进军号，这种是非颠倒真是莫大的滑稽。

姚文元在会上也讲了话，说：这里我要指出，上海市委曹荻秋、陈丕显之流，过去曾经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在自己的账上，贪天之功，为己之功，他们当中的人，竟然要把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创造的伟大成绩算在自己名下，这种做法真是厚颜无耻。

不难看出，张春桥、姚文元的发言都谈到批判《海瑞罢官》，确实有着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来表述他们在那场斗争中创下了伟大成绩的意图，他们都口口声声地说陈丕显无耻。实际情况是：批判《海》剧和三家村，市委陈、曹都是积极主持的，还曾经多次开会讨论过；两张传单更是在陈主持、讨论下起草的。但姚文元一闹就变脸，平时被认为很老实的他，变得不老实起来，出于政治需要，抹杀了这些基本事实。陈丕显出席了这个大会，但却是站在台下被批判的位子上。在几十万人的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居然这样混淆视听，据他人之功为已有，才是厚颜无耻。

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后在群众大会上第一次亮相，作了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讲话，把陈丕显彻底否定了。从这时开始，张春桥就由被动转

向主动，虽然还没有脱去调查员的身份，但已经开始直接控制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了。

张春桥这次来上海，和陈丕显之间曾经有过一次谈话。但这次谈话，是张主动提出，还是陈主动提出，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1月4日，张春桥来上海时，陈丕显派秘书于宝年去机场迎接。于宝年赶到机场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已经不在了。于宝年又赶到他们下榻的兴国宾馆，请张春桥约个时间见面。张春桥表示，待定了再电话通知。⁴³

但张与陈的这次谈话，《陈丕显回忆录》中没有谈到，而是说张春桥令秘书何秀文打电话试探过他的态度，但二人没有面对面的谈话。不过，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张春桥和陈丕显谈过话。那天谈话，除张、陈两人外，还有一位不出场的旁听者，就是张春桥的大女儿张维维，由此可以证明这次谈话是有的。谈话的内容，她不完全清楚。我们可以分析，在谈话中，如果陈丕显表示愿意出来工作，而张春桥当面阻止他出来工作，结果被推到被打倒的地步，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会忽略，因为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如果是张让他出来工作，他自己不愿出来工作，这样在回忆录中就不便写了。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说：

我爸爸和陈丕显的关系很好，平常他们会在康平路大院里散步聊天。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错。我是1966年入党，陈丕显召开了住在康平路周围的干部子女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会场的。陈丕显说：这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现在已经是学生党员，你们要坚持革命，作革命接班人。

1月6日开大会之前，我爸爸在家里找过陈丕显，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要陈丕显站出来工作。我在文革中做过“老保”，我参加的是持保守观点的“上红总部”，还被推选为指导员。我们保上海市委，保陈丕显，也保曹荻秋。所以那次爸爸找陈丕显去出席大会的谈话，我特关心，偷偷在旁听，从感情上说是希望他去的，希望他能站出来工作，因为我们要保他呀。谈话结束，我问爸爸谈的怎样，爸爸说有些困难。

后来，爸爸从监狱出来，读了《陈丕显回忆录》，对何秀文说：“个人回忆录好这样写的！”他又说：“你看，有总理和陶铸在

背后支持他们，要他们那样做的，叫陈丕显坚持住，我们原来都不知道，我们都拼命做他的工作，怪不得他不出来工作。”

爸爸和陈丕显产生分歧应该是在安亭事件，对市委的态度，爸爸很有意见，只听他说：怎么，用枪杆子对着工人，那不是段祺瑞吗！⁴⁴

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两张传单的较量中，陈丕显占据了主动地位，是煞住经济风、稳定上海生产局面的功臣；而张春桥则没有摸到毛泽东的脉搏，步步落伍，错失良机。和处理安亭事件赢得光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胸怀坦荡的政治家，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承认自己的认识没有跟上，当即向中央报告，两张传单是陈丕显主持起草的，由此也证明中央让陈丕显出来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陈丕显即有可能会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个被造反派接受的革命干部。如果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还可以把毛泽东对传单的评价告知陈丕显，使这位正在艰难而又努力一步步跟上形势的市委第一书记得到一点鼓舞。很可惜，张春桥不但没有这样做，而是做了相反的事。

关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即使中央发了贺电，开了庆祝大会，把陈丕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但对张春桥来说，仍然放心不下。因为执笔起草《紧急通告》的朱永嘉，是知道内情的。一次张春桥见到朱永嘉，就说：“陈丕显打电话给何秀文，说这几天他搞了个《紧急通告》，这不是笑话吗？怎么是陈丕显搞了个《紧急通告》呢？”朱永嘉从监狱出来之后告诉笔者：“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是要堵我的嘴。以后关于起草《紧急通告》的问题，我在张面前绝口不提。”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堵”住朱永嘉的嘴就此结束。1969年1月，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由上海市委写作班脱胎而来）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加了一句这样的话：“《紧急通告》发表前，张春桥、姚文元审阅。”载入史册，漏洞彻底“堵”上。张春桥也不是寡情薄义，由此就青睐朱永嘉，对他特别信任和重用。

到此，张春桥在《急告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两个传单事上的落后被动完全改观，而且名垂上海一月革命的史册。这种历史的不真

实性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当然，陈丕显的政治命运，最终还要取决于毛泽东。张春桥也知道，只要毛泽东无意抛弃陈丕显，他就无法对陈“取而代之”。

正是因为张春桥把陈丕显起草签字《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真相压下没有报告，所以周恩来蒙在鼓里：我叫你陈丕显出来工作，为什么不出来呢？毛泽东也是如此：已经用“不要烧焦了”给你陈丕显传递了信号，你怎么还端着架子不站到造反派这边来？所以就用了“不要以为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的话来教训陈丕显。此时的陈丕显是欣喜和不安的心情交织着，他听到自己主持并签发的传单被毛泽东称之为“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直到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对此事也还沾沾自喜，视之为莫大光荣。但面对毛泽东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他在心中就暗自掂量着，造反派算是什么阶级呢？自己本来是无产阶级，现在又算什么阶级呢？更使他不安的是死了的“张屠夫”，又是指谁呢？除了他和曹荻秋，还能是谁？

事情发展到此时，张春桥、陈丕显由两张传单引起的较量，使张春桥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似乎以张春桥的胜利而告终。一月革命的第一幕演出到此，大幕急速落下，作为这出戏主角之一的陈丕显退出了舞台。但失败与胜利常常互为因果，彼此转换。张春桥很快陷入了不同势力交织起来的火力网中，尽管他的政治地位有提升，但他在政治上的创造活力已从鼎盛期走向低落，这当然主要是由文革的总体大势造成的。若就张春桥个人而言，他在处理陈丕显问题上的失当和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权力真空的时刻

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之后，上海市委的权力机构一时处于真空状态。上海局势更加混乱，各级干部被揪斗，上海党政机关陷于瘫痪。陈丕显被揪到国棉十七厂批斗，他向王洪文提出，希望搬来和造反派联合办公，只要给他装两部电话机，一部红的，一部黑的就可以了。王洪文并

没有接受。几天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诫造反派们不要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不要上当！

再说；从市委权力中心造反出来的机关联络站，此时还没有胆量当出头鸟，总揽上海市委的大权。联络站的负责人徐景贤对造反有一个表述：当时在他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他们在通告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销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当时，徐景贤还和联络站的另一位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讨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在他们的理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夺权自由任命的。

那么张春桥是否想过罢陈不显的官，由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支撑起上海的天下呢？笔者猜测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要再看看，主要原因是不想把文革以来酿成的上海这个烂摊子揽过来。张春桥不但自己这时不想揽下这个烂摊子，他也不希望造反派揽下来，所以他告诫王洪文：不要把火往自己身上引。

从1月4日到上海至1月12日庆贺大会前后，张春桥始终强调自己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地说：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调查员顾名思义就是作调查的，搞搞调查，开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市委权力机构成为真空之后，造反派提议要张春桥当市委书记，他表示暂不接受，说：“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对象。”⁴⁵这一段话，张春桥有故作姿态的可能，也不失真实心态的流露，所以他要看一看，等待时机，时机不到，他就会做出谦逊的姿态。

张春桥的这种表现，是以他对这次来上海的使命的理解为基础的，也就是如何解决上海的危机，将文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从他到上海的一些活动和讲话概括出这样几条：一是支持造反派掀起批判市委资反路线高潮，召开带有标志性的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二是通过铁路、海港、邮电、交通、长航、海运等要害部门的造反派，抓一抓全市有关恢复生产和陆地交通运输的事。三是维持全市日常生产、生活的

事，包括解决“三停”问题，都仍由市委、市府系统干部去做，不能让他们太惬意，要叫他们“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造反派则对旧的权力机构实行监督、促进。四是待到表演充分，真假分明，即所谓“桃子已熟”，便联合全市各个造反组织，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实施改组。这最后一条，大体就反映在经他仔细修改定稿的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的三项通令上，通令的第三项就是“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也就是说，张春桥设想的方案是自上而下的改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夺权。张春桥的这种认识，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是一致的，不矛盾的，他们对文革发展阶段的认识都处于同一水平上。只是改组是有先例的，夺权则直到1967年元旦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单位作过这样尝试。他们对毛泽东高度赞扬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两个传单的认识，也都停留在维持正常秩序，解决交通、三停及经济风的认识上。

上海的接管是从《文汇报》开始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时的目的很明确，既不是改组报社的领导班子，也不需要上级派什么总编辑，权力归星火燎原总部，造反派办一张为造反派说话的报纸。本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几位负责人都是报社的业务骨干，没有外面的力量介入，又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接管，报社的职工也相信他们。

在一连串的接管事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三司对上海市公安局的接管。红三司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及《紧急通告》上，都没有签名，在打倒市委大会上也没有发言亮相，他们是憋着一肚子气，为了亮旗子抢头功，才搞了一个接管公安局的大动作。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行动果然产生了效果，惊动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赶到公安局政保三处，表示了对接管公安局的态度。张春桥建议，光靠红三司力量不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工人、学生应该抽一些人进入公安局。

上海造反派夺权是从1967年1月15日开始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造反派对上海市委的三次接管。其中发生在1月15日的第一次，是赵全国的上三司、耿金章的二兵团，还有另外几个造反组织，抢占了市委办公的几处房子，发布了一、二、三、四号接管上海市委四个通令。⁴⁶他们还把《接管上海市委第二号通令》用电报发给毛泽东，提名由张春桥

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副市长，请求毛泽东批准。

工总司、二兵团还在上海主要马路上贴了大标语：“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坚决拥护姚文元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张春桥对耿金章等搞的接管甚为恼火，他批评耿金章：占领这么多的房子干什么？没有房子市委领导可以照样办公。不能占，马上撤。你们十一个组织联合夺权是想把市委的烂摊子压在我身上，使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二兵团听了张春桥的话，从市委撤出，上三司的接管行动也随之流产。

张春桥对造反派的接管表现得不大热心，这和周恩来、陈伯达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接管或“监管”都要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具体工作还要原来的干部去做，造反派不要陷到业务中去，而是要高举革命旗帜，监督干部抓好工作，不要让干部们躲在后面，看造反派的笑话。

毛泽东也在考虑夺权的问题，他要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为《红旗》杂志撰写一篇关于夺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刊登在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上，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度评价上海的运动：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文章还认为，上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不只是张春桥，连周恩来都是这样，猛抬头，发现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和决策发生了飞跃式的突进，自己已落后了一大步！

为了夺权的事，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说：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

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⁴⁷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推进的思考正是从《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开始的。毛泽东看到，正处于危机关头的上海，提出解决难题的不是某位大人物，而是一些普通小人物；不是官方机构，而是那些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造反组织。不难想见，毛泽东这位一贯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运动”的大师，此时该有怎样的惊喜！当时一般主事者，也包括今天的一些文史工作者，都把毛泽东重视这两个传单看作只是为了要解决生产、交通问题和经济风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对毛泽东来说，道理既明白又简单：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生产、交通、经济风问题，不搞文革就行了，文革前生产、交通正常，经济风也无从刮起来呀！生产、交通、经济风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但不是停止文革，而是必须在推进文革的前提下解决。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两张传单，就因为从中看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一个将文革推进到实现他多年梦想——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的契机。

从四清开始，毛泽东就有了面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思想。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布《关于夺权问题的指示》。文革初期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也分别提到要彻底批判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要撤换那些走资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以上所说的夺权，大都是在工作队或党组织的领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也许在他看来，那样还只是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眼前的这两张传单，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开启了他的理想之阀，使他立刻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凭这两张传单，创造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夺权新形式来，从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里的“另一个阶级”是以“特权阶级”为核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向“官僚主义者阶级”夺权，现在似乎已经不难，只要把这两张来自底层的传单提升为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就行。

1月16日凌晨，也就是在耿金章的二兵团从上海市委机关撤出之后，张春桥打电话给耿金章，让他去兴国路招待所。耿金章赶到那里，

见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徐景贤也在。张春桥对耿金章说：现在告诉你，毛主席看了你们发去的电报，很赞成这种自下而上的提名谁当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法，还要我和文元考虑一份委员的名单。因为你是这几个夺权组织中的最主要的组织，所以我向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希望你找其他几个组织谈一下。张春桥拿出一份电话记录给耿金章看，这个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打来的，说：毛主席要张春桥告诉第二兵团等群众组织，赞成他们推选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两个人我们知道，还应当有一个更多人的名单。也同意春桥的意见，暂不宣布，做一做工作，多搞几个回合，再宣布。⁴⁸

耿金章看了电话记录，非常高兴，建议马上成立联合夺权委员会，让张春桥和姚文元任主任、副主任。张春桥认为时机还没成熟，上海的文革运动刚开始，还不够深入，马上成立这个机构还过早。耿金章不解：中央已经同意了，为啥还要拖？张春桥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时机不成熟。何时成立，我再对你们讲。⁴⁹

但张春桥却肯定了耿金章的这次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提的建议也是好的。⁵⁰ 耿金章虽然是草包司令，但他善于窥视别人的心理，他为张春桥想到了受其所器重的王洪文没有想到的事，为张春桥说出了王洪文没有说到的事，而且直通到最高统帅毛泽东那里，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平时不和别人应酬的张春桥此时却请耿金章和耿的随员留下来吃夜餐，厨师下了几碗肉丝面条。张春桥所说的时机不成熟，是因为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示抛弃陈丕显，他这时虽然有对陈丕显取而代之的欲望，而且他取代陈丕显也已成定局，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但他决不愿主动提前跨出这一步。

1月22日，上三司宣布联合了50个组织对上海市委、华东局再次夺权。在夺权会上，上三司负责人赵全国宣布周恩来有关夺权的四点指示，并公开表示对张春桥的不满。上三司再次夺权的消息传到张春桥处，他一面要秘书打电话核实从赵全国那里传来的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一面要人通知赵全国参加会议。会上，张春桥指出赵全国传达的周总理四点指示是伪造的，说罢即和姚文元离开。赵全国马上成为众矢之的，

有人指责赵全国伪造总理指示，还炮打张春桥，不容分辩，就将他扭送公安局。

1月24日，红革会联合60多个群众组织，对上海市委、华东局进行第三次夺权。红革会希望工总司领头。这次夺权以抢公章为特色，工总司到市委办公厅收缴公章，与此同时，红革会总部的几位常委，奔赴二十多个机关收缴公章。张春桥批评他们：拿了印就是夺权吗？要立即上缴收来的公章。他们夺来的那些印章，随即被警备区派人取走了。

记者们为了掌握情况，经常和造反派混在一起，目睹造反派夺权的某些过程。各个造反派激烈争吵，都高昂地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老造反。开始还不一定有权力的欲望，但是随着毛泽东的支持，他们声势壮大，站稳了脚跟，渐渐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而是为自己的小团体或个人争取权位或排座位、占房子、抢大印、发表接管或夺权宣言。在这乱哄哄的现象背后，公权正在向私权演变着，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家天下的传统派生出来的权力与高官厚禄的那些极其落后的思想。这种不动枪刀的接管或夺权，实际上也充满着失去理智的暴力。无论是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或是市委写作班文人造反派，从他们的眼神或话语中都表现出来“我是老造反”，“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等革命特权、专制暴力的色彩，他们内心的独白也是“打天下的人当然要坐天下”，于是出现了你争我夺的现象。

无论是历史或现实，都告诉我们，权力不能夺，而应当是由它的主人，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授予的。夺权，无论是用枪杆子，还是用拳头或棍棒，都必然会产生出两种贻害无穷的思想观念：被夺者的仇恨，和夺得者视权力为私有。二者必然会结下深仇大恨。这从《陈丕显回忆录》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都可看到：夺权者成为新贵族，而被夺权者对这些新贵又充满仇恨，准备秋后算账。被夺权者再度掌权，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结下新的恩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危机，这在文革结束后看得更清楚了。

新权力机构火线指挥部

毛泽东派张春桥来上海，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这个抓革命是空头政治，任务是虚的。作为管家人的周恩来在张春桥行前，有过具体交待，要张春桥到上海以后，一方面是搞运动，另一方面生产一定要恢复起来，特别是交通要恢复起来。

作为国际城市的上海，铁路、港口、发电是它的生命线，对其生产动向，周恩来都要了如指掌，随时掌握。上海的铁路一停，铁道部马上要向国务院报告；港口码头一停，交通部也要马上上报，而且牵涉到外轮问题。交通恢复了，上海的局面就控制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还要保证老百姓用水、用电。解决交通、水、电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硬任务。毛泽东关心的是运动，是务虚；周恩来关心的是水、电甚至老百姓用来煮饭烧开水的煤球，是实实在在的过硬的务实。因此张春桥到上海，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既要让毛泽东高兴，也要让周恩来放心。

旧的权力机构瘫痪了，新的权力机构还未建成，由谁来承担当前的工作？所以，张春桥、姚文元1月4日到上海，1月5日下午就召集工总司下属交通及公用事业部门的造反组织开会，讨论解决三停问题。1月8日下午，张春桥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三停问题。当天晚上，工总司所属海港、邮电、长航、交运、海运、铁路六个局的造反队的指挥部联合成立了六局指挥部。工总司派了王明龙来召集，王明龙就成了负责人。⁵¹后来，这六个局指挥部改名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简称为火线指挥部。1月9日，王明龙到武康路2号向张春桥汇报这件事，要求机关联络站支援，徐景贤派朱永嘉去看看。火线指挥部设在福州路上上海市高等法院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朱永嘉来了以后就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下来。火线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谢鹏飞负责。

火线指挥部的成员有三十多人，主要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华东师大红卫兵领袖人物霍达也在那里，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龚松林也随朱永嘉来到火线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有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把各局，特别是海港、铁路两局的情况上报市委机关联络站，再由王知常进行综合整理，通过张春桥、姚文元上报周恩来。

谢鹏飞和笔者谈到火线指挥部时，还是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之中，他说：1月9日那天，我们精选了12名业务尖子，冲到101调度室，宣布：“愿意留下来干的，就负责到底，不愿干的请走路，我们造反派自己干。”他们接管后，开往北京的14次列车准时发车，准点到达北京。周恩来接见了全体乘务员。开这趟列车的司机张生堂在九大时成为主席团成员，就坐在毛泽东后面。开幕式结束时，张生堂抢前一步，把毛泽东用过的一个茶杯、一条毛巾和一支铅笔抢到手，带回上海，把铅笔送给了谢鹏飞。

除了要管交通运输，还要管市场。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海南市区一家阁楼塌了，压死了一位老太太，检查原因是阁楼上堆了许多煤球，把阁楼压塌了。这时正是市民心理紧张的时期，市面上出现了抢购煤球的风潮。火线指挥部把事情汇报到了张春桥那里，张春桥下令：把用煤多的大厂关掉几家，保证市民用煤。两天之后，抢购煤球的风潮就制止住了。

快到春节了，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的造反派，说：我们干革命，可以不过春节，但老百姓不能不过春节吧。张春桥一声令下，火线指挥部马上组织供销到外地采购，渔业公司出海打鱼，这年春节，老百姓的饭桌上的菜还是蛮丰富的。

谈到得意之处，谢鹏飞说：“四人帮”倒台后，法庭审判时，宣布我犯有反革命罪，我冲上去抓着法官的衣领，质问：什么？我犯反革命罪？要不是我，那年春节你连饭也没得吃。本来判我7年，因为闹法庭，后来改判为8年……

张春桥本来设想，制止三停后，恢复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事，应该推给陈丕显去做，造反派不做具体管理工作，而是批判干部，让干部们去解决矛盾。这样就出现了既要干部出来工作，又要造反派批判干部，不给干部放手工作的必要的权威的尴尬局面。这样的局面很难维持下去，且无法操作，革命和生产只能由造反派一肩挑了。在这种情形下，接管那些已经瘫痪的单位就在所难免了。这时要组建新政权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情有独钟，他认为这就是经济苏维埃，是政权的新形式，将来可以代替市政府的作用。火线指挥部当时是一个时髦的

名称，是解决一些紧迫问题的临时机构，不仅上海有，其他地方也有。《人民日报》内参介绍过北京郊区怀柔县，为了抓春耕生产，在县里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在公社建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有秩序地开展春耕生产。毛泽东读后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朱永嘉对笔者说：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的青睐，大概也有迎合毛的心意这层考虑。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过打破旧机构，建立新机构的想法。笔者认为朱永嘉这种分析是成立的。张春桥要将火线指挥部作为新的权力机构，希望能创造出为毛泽东肯定的上海经验。火线指挥部1月7日成立，1月9日张春桥就上报中央。不但如此，张春桥还要火线指挥部、铁路、港务等指挥部向中央写报告，说火线指挥部今后可能代替原来的市政府的机构。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回应。看来，张春桥急于改变《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带来的不平衡心态，他想自己把火线指挥部变成权力机构，以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借以扳回一局。

1月19日晚上，张春桥在余庆路接见火线指挥部及一些系统单位的造反派，他再次强调建立造反联络站之事，并明确地指出，夺权必须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还向到会者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上海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就是夺权。

在会上，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大加表扬，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种新政权的形式”。同时表扬朱永嘉，在火线指挥部和工大学生相处得不错，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错。朱永嘉是怎样想的呢？他对笔者说：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表扬，当时的直接感觉就只是高兴。但我知道，这是用两张传单的真实情况封了我的口，张春桥对我的回报，所以我也就没有真当一回事。我毕竟是一个读书人，没有实际管理工作经验。火线指挥部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性处理各项紧急事务的机构，它不可能担当日常性的经济管理工作，今后如何发展，一切听其自然。

张春桥讲话的当天，各个造反组织即在上海市委党校开会，但讨论的不是火线指挥部，而是如何建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参加会议者推选工总司、机关联络站、新革会三个组织为召集人。接着讨论

联络站的名字。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联络站，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霍达说，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叫巴黎公社，这个组织名字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建议一出，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红卫兵提议加一个新字，于是就定名为新上海公社。⁵²讨论到如何为当前这场夺权斗争定个恰当的名字时，有人建议不妨参照苏联十月革命，称“一月革命”，又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新上海公社”和一月革命这两个名称，都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同意和赞赏。后来，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第一次将一月革命这一概念推向全国。文中称：“这个革命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就没有实行过，只是一个鼓动人心的口号、红卫兵的梦想。在后来元老派大闹怀仁堂时，叶剑英还质问张春桥：什么叫巴黎公社原则？

张春桥想把火线指挥部变为“权力机构”的设想未能变为现实，但火线指挥部还是扩大建制，设立了工业组、交通组、市政组、科研组、卫生组、接待组等等，人员也扩展到一百多。各组人马下去既“抓革命，促生产”，又“抓夺权”，似乎成了没有名份的权力机构了。

张春桥的设想遭到市政府各局及其所属公司科室人员的抵制。在火线指挥部动作的同时，这些干部也都纷纷造反，参加了机关联络站。他们对自己所属领域的生产本来就很熟悉，这时都投入到组织指挥疏通工作中去，而不服从火线指挥部的指挥。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王承龙也派人搜集王明龙、谢鹏飞等工总司人员的资料，通过《简报》、《情况》送给张春桥、姚文元。

1967年2月5日，“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后，在讨论公社建制和人员安排时，由张春桥拍板决定，火线指挥部作为公社领导下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火线指挥部”，迁往市政府大楼。随着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工交组，火线指挥部被合并到其中。1967年4月5日，火线指挥部被撤销。

张春桥构想的“新权力机构”也就自行破产了。

注释

- 1 于宝年：《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前后情况》，1978年11月23日。
- 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页。
- 3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 4 于宝年：《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前后情况》，1978年11月23日。
- 5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123页。
- 6 廖祖康，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后一直为王洪文的秘书。
- 7 徐景贤1967年1月4日《工作笔记》。
- 8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5—26页。
- 9 徐景贤：《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凤凰周刊》（香港）2007年1月25日版。
- 10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56页。
- 11 朱锡琪，当时是《文汇报》教卫部体育记者。
- 12 邵传烈，当时是《文汇报》评论员。周国荣，当时是《文汇报》教卫部记者。
- 13 原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员朱维铮1976年12月23日回忆。
- 14 标志着上海一月革命造反派发出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文汇报》在发表时，编辑做了肩题《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之成为完整的标题《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后《人民日报》转载时，将“急告全市人民书”改成“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 15 王树人，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 16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代表周国荣1967年1月16日在各地报刊来访同志座谈会发言。
- 17 范佐栋，当时是上海保温瓶二厂油漆喷花工人，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 18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5日接见工总司代表时的讲话》，朱永嘉原始记录。
- 19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第一任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因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销职务，后被开除出党。
- 20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3页。
- 21 梁国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

22 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造反报》刊载的三个通令：

第一号通令

- (一)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 (二) 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 (三) 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 (四) 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

- (一)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待。
- (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 (三) 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

- (一) 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 (二) 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待，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待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 (三) 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待，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 (四) 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 (五) 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 23 戴厚英和高玉蓉当时都是上海作家协会理论部研究人员、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成员。
- 24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44页。
- 2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 26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9年1月。
- 27 金光耀访谈：《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2011年。
- 28 《紧急通告》摘录如下：

全市的革命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联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联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

- 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 29 徐景贤1967年1月8日《工作笔记》。
- 30 唐平铸，时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胡痴，时任《解放军报》代总编辑。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 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5页。
- 33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页。
- 34 另一件是新华通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 3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6页。
- 3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37 张春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46页。

39 同上，第45—46页。

40 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1967年1月11日。

41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

42 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43 于宝年：《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前后概况》，1978年11月23日。

44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45 《张春桥1967年1月上旬对造反派的一次谈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6 赵全国，时为上海戏剧学院学生。

47 《毛泽东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1967年1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8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67年1月16日电话记录。

49 耿金章1979年11月27日陈述，1979年3月12日陈述。

50 徐景贤1978年4月17日交待材料。

51 王明龙，当时是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部秘书，中共党员。

52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载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

第十章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
张春桥（右）与姚文元（中）

第十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下): 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在张春桥准备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红革会、红三司、炮司这三个在上海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却掀起了炮打的风浪，炮口对准的正是张春桥。因为事情发生在1967年的1月28日，所以称之为“一·二八炮打事件”。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炮打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词，有时甚至是一种罪名。炮打一词源于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原指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二八”炮打的目标却是张春桥，而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按照当时的逻辑，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甚至进一步还可理解为“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大的罪名啊！

红卫兵为什么会对张春桥不满意呢？起因在对蔡祖泉的评价上。蔡祖泉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程师，老牌劳动模范，在杨西光主政复旦大学期间，在教师的支持下，他研发出十多种新光源，由工人成为

工程师。1966年文革兴起，红卫兵起来向复旦大学党委及杨西光造反，蔡祖泉站出来反对，成为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受到红卫兵批评。

1966年12月，朱永嘉造反后，蔡祖泉也反戈一击，起来造反，站在红革会一边，引起红三司的不满，对他进行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的记者把蔡祖泉造反的事情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毛泽东看到后说：蔡祖泉造反，代表了一个阶层，因为他是工人中的标兵，这样的人起来了，说明上海市委原来的基础动摇了。

但是，蔡祖泉造反三天后，12月6日，他在赤卫队成立大会上发言祝贺，并受聘当了赤卫队的顾问。红三司因此认为他是假造反。向来不和的红革会与红三司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打起了派仗，相互指责。就在这两派唇枪舌剑之际，复旦大学的炮司也卷了进来，站在红三司一边，对红革会提出了批评。这三个组织在复旦校园里派仗打得难解难分。正在这个时候，即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接见造反派，传达了毛泽东对蔡祖泉的评论，并批评红三司这样对待蔡祖泉是不对的。张春桥的批评，引起红三司的强烈不满，1967年1月10日，复旦红三司所属的“反复辟”战斗队贴出了大字报《复旦大学必须第二次大乱》，向蔡祖泉提出二十个问题，对他出尔反尔的造反提出了批评。接着，红三司所属的杀阎王战斗队还贴出了《分歧由何而来》的大字报，直接点出蔡祖泉是假造反，对毛泽东评论蔡祖泉的话产生了怀疑，由此暗示着张春桥不可信了。这样，在复旦校园里围绕着蔡祖泉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红革会的劳元一、红三司的安文江、孙悟空的胡守钧都直接到会参与辩论。¹

事实上，复旦红卫兵三派组织在进行大辩论的过程中，发现了彼此都对张春桥心存不满。1月14日至15日，炮司在分析上海形势时，已经知道张春桥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与鲁迅笔战之事。早在文革之前，上海图书馆葛正慧从旧报刊中发现，鲁迅批评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此事在1930年代并不是什么秘密，是文化界都知道的平常事件。但经过了历史烟尘的熏染，却变得神秘兮兮，而随着鲁迅圣人地位的确立，这也就变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另外，张春桥的妻子文静的历史曾经有过结论，说她有“变节自首行为”。这两件事都是张春桥的要害。他们还收集了二十多页有关张春桥的材料，这个材料又很快被红革会搞走，使联

手反对张春桥有了共同的基础。炮打张春桥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而展开。

1月21日，复旦孙悟空和红三司的反复辟两个战斗组在江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蔡祖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贴着“揪住蔡祖泉，直追黑后台”的标语，散发《蔡祖泉是什么人？》和《蔡祖泉的后台是谁？》的传单。在后一份传单中直接追问“在上海市委内是谁主张树立这个假标兵的？后台是谁？”文革前，张春桥已经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这些标语和传单的矛头都直指张春桥。1月22日，“孙悟空战斗组”和“反复辟战斗组”在复旦校园内也贴出《蔡祖泉后台是谁？》的大字报，提出“在蔡祖泉的问题上欺骗毛主席没有好下场！”“打在蔡祖泉身上，痛在谁的心上？”反张之风在复旦校园又进一步升温。

1月22日上午，红三司联合了五十多个组织，再次接管上海市委。赵全国对参加接管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的几点接管措施说成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还表示了对张春桥和工总司的不满，说：不要看他们接管了，他们是大老爷下台了，小老爷上来了。当晚，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各造反组织，张春桥在讲话中，说赵全国所说的“周总理四点指示”经核对是伪造的。张春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夺权的看法，以及毛对耿金章要求张春桥为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姚文元为副书记、副市长这一提议的称赞。会议结束，工总司把赵全国扭送至上海市公安局。23日凌晨，胡守钧在复旦大学疾呼：“张春桥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今晚是张春桥面目大暴露”。

1月23日，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负责人池东明去北京要求将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揪来上海批判，没揪到人。又去西安。据说，池东明在西安交通大学牛棚里，找到被造反派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但据笔者调查，霍士廉与张春桥没有任何的历史瓜葛，而他是否说过这句话，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详情后文有述。

1月24日清晨，“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谁在蔡祖泉的问题上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等等的大标语、大字报，被复旦大学红卫兵贴到上海街头。

1月25日凌晨3时，三个组织的头头胡守钧、周谷声、安文江、劳元一等四人去机关造反联络站，要求张春桥接见，试探他的态度。但张春桥未露面，徐景贤出面，质问说：你们已经在外滩和南京路等地方贴出炮打张春桥的标语了，还谈什么请示？

1月25日，孙悟空又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上三司也以赵全国事件为由，在全市贴出标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揪出围攻上三司的后台老板！”矛头都是针对张春桥的。

1月26日，红革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张春桥的问题。在会上，红革会负责人之一赵基会宣读了《二十问张春桥》的大字报，进行逐条讨论补充，北京还传来消息，说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江青、陈伯达、姚文元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无张春桥的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凑成了“三十个为什么”。还在他们讨论意见不一致，犹豫不决的时候，复旦校园贴出了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十个为什么”。²从第一个到第三个“为什么”都在问：上海市委的盖子为什么没有彻底揭开？第四个“为什么”问：为什么现在有人匆匆忙忙贴出“成立以张春桥同志为首的新市委”的大标语？这股妖风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第七个“为什么”问：为什么一篇报道特别强调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文汇报》高举起了批判大旗，果真如此吗？这些问题的矛头都直指张春桥。这张大字报很有分量，后来被称为“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宣言书”。

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认为，炮司、红三司已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字，红革会要抢在前头集中搞徐景贤。³当晚，红革会勤务组开会，决定先对市委机关联络站采取行动，把徐景贤、朱永嘉揪到复旦来“火力侦察”，看看张春桥的反应。徐景贤和张春桥的关系密切，揪到他就可挖出张春桥的材料。

1月27日晚，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各系负责人开会，继续讨论张春桥的问题，并将问题逐渐集中到市委写作班，认为以市委写作班为主组成机关联络站，大权独揽，实际上成为没有书记的书记处，徐景贤则象一个宣传部长。因为写作班和张春桥的特殊关系，要搞张春桥必须先从

搞市委写作班开始。本来他们还想准备材料，举行一个揭发批判写作班的大会，但有人感到这样做太慢，提出将徐景贤抓来复旦交待问题。

当天深夜，复旦大学红卫兵到上海市委党校，一见徐景贤就蜂拥而上，把他强行拖走，从三楼拖到二楼时，写作组成员王知常扑了上去，拼命抱着徐景贤不让带走，结果被红卫兵一并拖到楼下，把他们塞进他们开来的吉普车，凌晨三点多钟被带到复旦，隔离在学生宿舍，此即所谓“绑架徐景贤事件”。此前，写作班的朱永嘉也被带到复旦。

红卫兵抓走徐景贤后，机关联络站的朱维铮立即打电话向张春桥报告了此事。张春桥要秘书打电话给红革会常委、上海师院的缪才生，要他们立即放人，红革会未予理睬。得到张春桥同意后，王承龙以机关联络站的名义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4天前转发全国的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请求派部队保护被绑架的机关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的人身安全。

警备区不敢轻易出兵，向张春桥提出：是全副武装还是徒手？就是部队要不要带武器。张春桥答：“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要带武器，不带武器，还算什么兵？”⁴最后警备区还是下令派上海武警部队师政委徐海涛和一位参谋，带领驻在人民广场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赶到复旦大学。刚到校门，就被早有准备的红卫兵拦挡，质问军队：“你们把枪口对准谁？”“谁派你们来的？”徐海涛很谨慎，避而不答，随即向红卫兵要求去看看徐景贤，红卫兵带他去了。他看到被单独关押在文件阅览室内的徐景贤安然无恙，便决定部队撤离。

当天晚上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红旗刷出了“打倒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但很快就被覆盖了。是谁覆盖的？为什么覆盖？当时是个谜，但大家都认为是和他们有矛盾的同校造反派红纵干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围绕着邱会作进行，红旗是保邱会作的，红纵是反邱会作的。⁵张春桥支持红纵进京造反，又把红纵头头钱信莎介绍给江青。江青接见了钱信莎，她们二人还抱头痛哭了一场，江青支持红纵造邱会作的反。他们到总后大院之后，对邱会作进行了批判斗争。邱会作和红旗从此便对张春桥结下了怨恨。这次红卫兵围攻张春桥，红旗便乘机添上了一把火，红纵则企图帮着张春桥把火浇熄。

复旦大学的几个红卫兵组织虽然在张春桥的问题上有了一致的意见，但他们之间的派性并没有消除，到具体采取行动时又产生了分歧。红革会的赵基会、劳元一商量在反张的问题上要慎重：这一步要是走错，就会身败名裂。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改变了立场，拟出了“张春桥、姚文元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红革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36条口号，红革会这样做，其目的是以支持张春桥来反对炮司。在张春桥向复旦派出军队的高压下，本来要分裂的红卫兵组织这时又统一起来。

1月28日早上，听说上海警备区派军队去复旦镇压学生，笔者就赶往复旦。那时去复旦大学方便，出了报社大门，转个弯过了苏州河，就可以乘3路有轨电车直到复旦门前。走进校园，笔者就看到红革会总部散发出《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还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幅标语：“谁派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揪出调动军队镇压复旦红革会的后台老板！”“打倒罪魁祸首张春桥！”还有针对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传单，说写作班是修正主义黑窝。

在复旦红革会总部，笔者见到赵基会，他很忙，只是站着和笔者说了几句：我们原来对张春桥有意见，所以发起炮打；后来考虑把张春桥扳倒了，赤卫队会翻案，上海的文革形势就会发生变化。为了这样的大局，我们决定炮打降温，正准备到群众中传达这个决定时，张春桥就派兵来镇压我们了，这样张春桥就输了，逼着我们只好和他干到底。在复旦红卫兵领袖中，除了赵基会、劳元一，笔者还认识胡守钧战斗队的邱励欧，较熟悉的是谭启泰和欧阳靖，他们二人思想敏锐，而且会写文章，有时组织他们为《文汇报》写稿。

1月28日下午，红革会各校负责人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开会，讨论何时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的大会。此时张春桥打来电话，说他要和姚文元一起来见红革会负责人。晚上7时半，张、姚与红卫兵会面开始。张春桥就对派军队的事情作了解释，只是含糊地说：当时不了解情况，担心弄清楚情况后再出动部队，就晚了。后来情况搞清楚了，部队就撤了。张春桥还表示：理解红卫兵对部队的愤慨，也不否认他同意派部队。张春桥还告诉红卫兵，事情经过已经用电话向中央文革报告，中央文革回电同意他们的看法。显然，张春桥是极力想向红卫兵表明派部队只是

情况不明下的误会，并且还拉上中央文革为自己压阵，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已经被出动军队对付学生做法激怒的红卫兵并不听他的那一套，还是不断对张春桥发出质问：希望张春桥能“襟怀坦白一些”回答问题，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说出来；解放军用刺刀对着我们，会不会开枪？要张春桥会面就要先放徐景贤，为什么要有条件？为什么还没有向红革会调查，就单方面向中央文革汇报？会上越辩论越激烈，红卫兵更加激动，有的跳到凳上，有的挥舞拳头，不断高叫“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口号，甚至还有人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是要揪张春桥！有的人还写了“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牌子，要给张春桥挂在脖子上。有的红卫兵提问：狄克是谁？你在三十年代干了些什么？红卫兵和张春桥的辩论，主要问题就是抓住“为什么派军队镇压学生”不放，会见中，红革会又提出那十个“为什么”，要张春桥回答。这些问题都打中了张春桥的要害。一向能说善辩的他，此时虽然有口也难以辩论，在红卫兵质问下流露出了窘态。这是张春桥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败下阵来。

《特急电报》救驾及时

红卫兵和张春桥、姚文元整整谈了六个小时，29日凌晨1时，他俩才得脱身。回到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马上打电话给王力，报告了徐景贤被红卫兵绑架，张春桥和他遭围攻的事。

王力要上海用机关联络站名义写个报告给中央文革小组，好让中央表态。张春桥将任务交给王承龙。王承龙火速赶写出电报文稿并送到市委办公厅机要处。谁知船迟又遇顶头风，驻市委办公厅的红革会一位负责人和市委办公厅的一位造反派，看到电报文稿，认为内容不合事实，把电报稿扣押不发了。张春桥得知消息虽然着急，但也无可奈何。

周围的人听了都很着急。王承龙很快又组成了吴瑞武、朱维铮、萧

木三人起草小组重写。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在市委党校五楼找了一间较为隐蔽的小房间，后来又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简略讨论了一下几个段落内容，题目定为《一·二八绑架事件经过真相》。苦战了一夜，到天亮时电报稿写出来了。接受了上一次电报没有发出的教训，这回直接送到电报局，用明码电报发给中央文革小组。

当吴瑞武他们三人走出小楼，迎着清晨温暖的阳光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从他们面前驶过，反复广播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组就“一·二八事件”发给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并转“复旦大学同学们”的《特急电报》。⁷上海的电报才刚刚写好，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就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⁸

且说北京那头，毛泽东得知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消息后，29日那天的白天没按往常的习惯睡觉，而是坐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随时掌握上海动态，等待汇报。他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给上海发电报。他给电报稿定了基调，亲自口述，由王力记录、整理成文。电报稿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和通过，毛泽东阅后说：很好，有革命气魄。很是得意。

机关联络站的电报一开始发不出去，毛泽东是从什么渠道不断获得上海消息的呢？当时就有人分析，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姚文元。上文已经提到，29日凌晨1点多，姚文元从会见地点回到兴国路招待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王力通电话，通报了“一·二八事件”的详细经过。王力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建议赶快由机关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以便中央文革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

另一条渠道，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解放军报记者甄文君。甄文君名义上是军报记者，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特派联络员，专门为中央文革搜集情报。甄文君也常来《文汇报》。此人50来岁，矮敦、内敛、沉静，脸上表情始终是中性的。他来《文汇报》不但找造反派聊，还到资料室从一些骨干编辑、记者的借书卡上看他们读哪些书，从中了解《文汇报》的工作动向。在红革会绑架徐景贤这天晚上，甄文君也在市委党校，他站在二楼阳台，静观着事态的发展，掌握了事件的全过程。他也参加了红卫兵和张春桥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的辩论。对事件的全面情况都有了解，所以他能及时向北京提供情报。

由毛泽东口述的中央文革给上海的电报已经定稿通过，但迟迟不见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王力很着急，他向康生、江青、陈伯达请示后，于29日深夜打电话给张春桥，将准备以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形式发出的内容逐字逐句地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记录了下来。他放下王力的电话后，立即派人将记录誊清，并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让秘书何秀文联系印刷。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接到上海机关联络站的电报后，再将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用明码电报发给上海时，已经是30日了。而由张春桥头天晚上所作的电话记录稿印刷的传单是29日，这样张春桥签署印刷的电报拿不出电报收文记录稿，所以当时就有许多人怀疑是张春桥自己伪造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直接点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名，指出复旦红革会的某些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反路线和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被“无理绑架的机关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此时的上海街头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宣传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响彻大街小巷，锣鼓喧天，一批新的大标语又糊在墙上，形势就是这样魔幻般地变化着。

红革会几位头头接到《特急电报》时，怎么也不相信这个电报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的，文革小组是他们革命理想的象征，却竟会指责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错误的，还发动全上海的红卫兵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甚至说出了“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电报中还表示“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样严厉的话。

红卫兵还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被他们极为崇拜的，怎么能发出这样的电报呢？而且张春桥指使印刷的传单和明码电报之间，在时间上的确存在破绽，他们由此推论：电报是假的，是张春桥伪造的。但是上海人民都在欢呼《特急电报》，极少有人相信他们的“伪造”说。校园里一种愤懑和委屈的情绪在四处散溢着。

1月30日，参加炮打的红卫兵们派出二十多位代表，组成北上告状团去北京，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2月3日，告状的人从北京回到上海，

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事实：中央不支持他们。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电报是他们伟大的红司令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归根结底，是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张春桥。

革命小将毕竟是小将，他们认为革命总是神圣的、单纯的、干净的，他们以为在炮打中揭发出张春桥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张春桥扳倒了。他们就没有想想哪一个问题的真实可靠。就算这些都是事实，是否就严重到可以把张春桥打倒的程度？再说，即使到了打倒的程度，也得等到这个战役结束再处理。在两个司令部决战的紧要关头，张春桥是毛泽东这盘棋上的战将，正是毛泽东要用他的时候，哪一个有策略头脑的统帅，会干出在两军鏖战正酣的时刻，轻易撤换前线指挥员的行为？何况是毛泽东！

即使革会领袖们曾一度要给炮打降温，但是张春桥不会放过他们。2月3日，他应部分革会的红卫兵要求，发表三点意见：一、欢迎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是少数革会的负责人。⁹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大方向的问题。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负责人对这次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张春桥的强硬态度，来自毛泽东。张春桥后来对人说：“毛主席说过，炮打张、姚是反革命。”¹⁰在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回忆中，她爸爸这时的精神状态相当正常：

第一次炮打，我在上港七区劳动。从白莲泾坐船到南码头，乘65路公共汽车到南京路，顺着南京路走，看到许多大字报，说我爸爸是叛徒，那时真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一路看大字报，一路收到许多传单。到兴国路，看到我爸爸正坐在桌前看文件。我说了炮打的事。爸爸说知道了。我说：你是不是叛徒？爸爸说：我连牢都没坐过，怎么是叛徒？¹¹

炮打张春桥，开始还是停留在喊口号、写大标语的舆论状态，由舆论发展到“一·二八”实际的炮打行动，主要原因是张春桥派兵去复旦

大学营救徐景贤，激怒了红卫兵。他们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奋起炮打张春桥的，而不是在冷静地思索之后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行动。毛泽东处理这件事情，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只是文攻，让中央文革小组发一份特急电报，就把事态平息下去了。这件事情，从整个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来看，不仅是上海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也是全国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时候起，红卫兵运动开始由高潮转向低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逐渐被边缘化了。毛泽东把红卫兵抛弃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角。

革会炮打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1967年3月，本来是革会顾问的写作班成员郭仁杰把自己编写的《以革会某些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和由吴瑞武编辑的关于“一·二八炮打”的传单收集在一起，编辑成一本小册子，最后再由徐景贤、郭仁杰修改定稿。据吴瑞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发交待：“徐景贤将小样送给张春桥。张春桥看了很感兴趣，哈哈大笑，还用红笔在上面改了两处。”可以看出，张春桥心中充满了一个胜利者的快感。更为严重的是，在以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张春桥秋后算账，参加炮打的红卫兵头头都遭到张春桥严酷的清算。

张春桥最大的“胜利成果”是毛泽东对陈丕显的态度的转变。这时毛泽东对陈丕显不再持“不要烧焦了”的态度，也不是对批判陈丕显不表态、批判陈丕显的新闻不登报，而是点了陈丕显的名，并把他抛了出来。从此，张春桥不再是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而是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留在上海全面地领导运动。在炮打事件之前，耿金章曾提出由张春桥当市委书记，张春桥认为时机不成熟，而现在时机成熟了，实现了他对陈丕显取而代之的欲望，由此也巩固了他这个小文人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他的政治地位。

两个上海人民公社之争

2月2日，炮打事件已经过去三天，上海夺权筹备委员会各项事宜又继续启动进行。一直关心上海夺权的毛泽东，这时又提出上海要建立

临时权力机构，并说不能将群众组织或机关造反派组织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通过王力向张春桥转达了他的意见。上海夺权之后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但是这个新的机构叫什么名字，一时还无法确定。王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用上海公社的名义，并要张春桥、姚文元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参加这个新的权力机构。

本来，张春桥把火线指挥部变成权力机构的设想破产后，就不太敢自作主张了。如今，有了毛泽东设想的框架，他在上海夺权有了方向。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把夺权斗争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社论再次重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红旗》杂志1月31日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及毛泽东对新权力机构的设想，毛泽东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19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社论说：“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权力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应当说，上海夺权成立上海公社，并非张春桥自作主张。

张春桥向造反派建议，将“新上海公社”改称为上海人民公社。造反派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开了一天的会，讨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第一号通令，以及给毛主席致敬电。会上还审议了公社组成名单，以工总司为首的38个单位组成，其中没有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因为红革会是炮打张春桥的主力军。

这次会议内容：一、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的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二、发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定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¹²三、发表上海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宣布剥夺旧市委、旧市人委的一切职权，宣布旧市委、旧市人委死刑，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四、定于2月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就在上海人民公社紧锣密鼓地宣告成立时，毛泽东从黑龙江“三

结合”夺权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所谓“三结合”就是在新的权力机构中要有群众、干部和军队的代表。

2月2日深夜，张春桥召集王洪文、王明龙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张春桥提出要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三结合”精神，组建上海新的权力机构，不仅要有造反派，还要有革命干部及驻沪海、陆、空三军代表参加。张春桥认为，公社的宣言、大会的发言稿，及机构核心成员的名单确定都需要时间做充分准备；既然他和姚文元参加公社，就应该为公社做点事，并主动承担了修改公社宣言和一号通令的工作。最后决定成立大会延期改为2月5日召开。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即，不料平地又起风波，以耿金章为召集人的十四个组织组成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宣布成立了“第二人民公社”，公开与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对着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组织在酝酿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一直瞒着二兵团的耿金章。一天，耿金章偶然发现工总司的行动，火冒三丈，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接电话的是秘书何秀文。耿金章在电话中问：你和张春桥同志是否知道王洪文成立人民公社的事？何秀文答：我知道。耿金章说：你为啥不告诉我？还把那么多组织排斥在外？何秀文解释说：我们事先找过你，但没有找到你，所以没跟你商量。耿金章说：好！你们成立人民公社，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权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耿金章说罢，气乎乎地扔下了话筒。¹³何秀文回答耿金章说是找不到他，明显是托词。耿金章把何秀文的电话回答告诉了其他几个造反组织，大家听了很气愤，他们在市委党校开会，决定成立夺权机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

2月2日晚上，就在工总司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开会商量夺权的同时，以耿金章二兵团为主力，包括其他被排斥在外的造反派组织也在上海大厦通宵开会。他们除了起草宣言和通令以及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也要张春桥、姚文元当负责人。他们还草拟了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控告工总司单方面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搞分裂，是排斥老造反。

2月3日，张春桥得知耿金章另立山头，成立公社的消息，认为耿的行为会搞乱上海夺权大局，他立即派人找到耿金章。张春桥态度平和

中带些威严，明确告诉耿金章：成立人民公社是中央同意的，毛主席批准的，你们的做法是向中央施加压力，与中央唱对台戏！耿金章一听是毛主席批准的，此话又出自张春桥之口，他不得不信，只好服从。张春桥看到耿金章的态度有所转变，便向他许诺，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时，让他也上主席台，将来担任公社的常委。谈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耿金章终于答应回去解散大联委，不另立公社。

2月3日下午，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工作会议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上主要讨论公社体制，也通知耿金章参加。张春桥亲自主持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决定他和姚文元参加上海公社临时委员会领导工作。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又在武康路2号召开会议，仔细讨论公社成立宣言、夺权通令和《向毛主席致敬电》。张春桥说：宣言要始终突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思想，这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¹⁴《新上海公社宣言》执笔起草者朱维铮说：

在讨论《新上海公社宣言》时，张春桥开了所谓务虚会，他极力鼓吹上海新的权力机构要以公社命名，并说将来全国成立公社，毛泽东是全国公社社长。当时起草《新上海公社宣言》由徐景贤主持，写作班有我和吴瑞武参加，吴瑞武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当然要去的。开始由北京来的红卫兵起草，写了几稿都不行，我再接着起草。我在武康路关了三天三夜，把草稿写出来，经徐景贤修改。我在执笔起草时，根据大家意见，把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提出的1871年3月法国巴黎公社原则，写进上海夺权宣言：“彻底砸烂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等等。徐景贤改定稿送给张春桥，他将这些全都删去，只留下公社委员的选举产生。¹⁵

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将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回徐景贤，将原来的题目《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让在后面署上38个公社组成单位的名字，送《文汇报》排印。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召开在即，但这时在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马路上，却刷满了“热烈欢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标语，这些标语与这些天刚刷出去的上海人民公社标语一模一样，只是前面多了个“新”字。这些都是耿金章带领着二兵团的人干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已被工总司称之为老头子的张春桥不是找耿金章谈过话，以“毛主席批准”施压，又以允诺“上主席台”及作为“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为诱饵，把《沙家浜》中胡司令式的耿金章驯服了吗？现在，耿金章怎么又把二兵团队伍拉出来了？

原来，张春桥找耿金章谈话后，耿金章答应解散大联委，不再搞上海第二人民公社，但当他回到上海大厦后，和参加大联委的一些造反组织讲了和张春桥的谈话，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愤怒起来，指责耿金章：“你是个大叛徒！”“耿金章出卖了我们！”有的人还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耿司令就这样不值钱，张春桥让你上主席台，就把你收买了！”也有的骂：“张春桥太阴险狡诈了！”耿金章也知道参加大联委的造反组织虽然为数不少，但都是榜上无名的小组织，撑不起这片天下的。这时他的二兵团如果抽身而去，大联委就群龙无首，势必瓦解。耿金章也自认为是一身仗义，如果就这样抽身而去，真有些对不起其他造反组织。

正当耿金章犹豫不决的时候，大联委搞到了送到《文汇报》排印的参加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38个造反组织名单，其中唯独没有耿金章的二兵团，更没有大联委。这下耿金章火了，他大骂张春桥无情无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大联委改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

其实耿金章敢于这样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张春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留了一个心眼：怀疑张春桥能不能兑现他说的话。如果张春桥说话不算数，他还是要拉出自己的二兵团。耿金章虽然是草莽司令，但是对毛泽东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及报纸的社论，他还真的认真研究了。在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点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名字之前，他一直把陈丕显控制在手里。没有耿金章的控制，陈丕显要吃更多的苦头，也不可能签署《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这两份重要文件。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不少描述。耿金章把他“秘密转移了许多地方，诸如新城饭店、衡山饭店等等”。耿金章去看他时，

还是“一口一个‘陈书记’、一口一个‘陈政委’，还讨好似地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¹⁶陈丕显认为，耿金章对他的保护是“心怀鬼胎”，是为了“争取我，利用我，要我支持他”。后来，耿金章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是红小鬼，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威信高，希望你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耿金章觉得，现在正是让陈丕显发挥作用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新的权力机构要实行三结合吗？新上海人民公社正好可以把陈丕显作为老干部结合进来。在陈丕显、曹荻秋的结合问题上，他比张春桥想的还要周到。这不仅使王洪文恼火，也使张春桥头疼，万一他抬出一个陈丕显来怎么办？

2月4日晚，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即，最后一次筹备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举行。会前，张春桥不得不再次找耿金章谈话，要他立刻解散大联委。张春桥态度强硬地表示：如果你们执意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那我和姚文元、驻沪三军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看大家拥护哪个公社。耿金章沉默了许久。张春桥又说，你们搞第二人民公社，我和姚文元预先声明，我们不参加，我们不支持。我想，你那个第二人民公社毛主席也不会支持、不会承认的。

耿金章怎么是张春桥的对手，何况张春桥抬出毛泽东来压制他。耿金章终于答应不再对抗，并答应去说服其他组织；但他要求公社成立那天，让二兵团单独打着大旗参加成立大会。张春桥答应了。¹⁷张春桥又告诉耿金章，他正在考虑将公社的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这样，以后其他群众组织也可以逐步加入公社。耿金章回到上海大厦召开会议，宣布二兵团退出大联委。二兵团是大联委中最有实力的组织，二兵团退出，大联委群龙无首，无形解散。

2月4日晚上10点，张春桥和姚文元通知徐景贤，马上将38个组织负责人集中，然后转送至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开会，但先不要宣布开会地点。徐景贤马上通知正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和王承龙。他们立即让各组织负责人分批乘上大客车，在市区转了几个地方，确定没有人跟踪，再秘密地开往咖啡厅。

张春桥、姚文元在深夜11点来到咖啡厅。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记者都出动了，驻沪三军领导们，也坐在

主席台第一排位置上。张春桥主持会议。这时，张春桥真的把耿金章二兵团的事放在心上了，如果采取强硬方式砸压反对组织，会引出更大矛盾。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核心就是他和耿金章的那次谈话：一、将38个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使其他组织今后也逐步加入公社，避免他们因被排斥在外而与公社对立；二、发起单位一律不登报、不署名，避免排名次争座位闹纠纷；三、开公社成立大会时，不是发起单位的代表也可以上主席台。

张春桥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到会的人都心领神会，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徐景贤带头鼓掌。这样棘手的难题被张春桥攻克，化解了一场看来没法避免的因权力再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分裂和内斗危机，上海的权力总算基本平稳地从原来的干部手中转移到造反派手中。

公社易名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有近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正如张春桥应允耿金章的，参加大会的每个组织都打着自己组织的大旗。驻沪空军出动两架飞机，撒下彩色传单，大街小巷贴满了《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宣传画。在热烈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全体成员，伴随着挂着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的彩车，从人民广场经南京路，来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报社的记者们抢占了最好的位子，目睹了现场：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摘下旧权力机构的大牌子，造反派抡起大铁锤把这块牌子砸破，再点上一把火，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烧，烧掉它！顿时一呼百应：好，烧，烧掉它！一簇葬送中国共产党的旧权力机构的火，在具有上海代表形象的黄浦江畔的外滩燃起。然后挂上象征新政权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那几个鲜红的大字特别耀眼。《文汇报》、《解放日报》破例地出了号外，套红的通栏大标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如一轮

旭日在东方升起》。文革夺权后上海造反派的权力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把公社成立的经过、《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等相关文件向中央作了报告，就等着中央批准。在此之前，黑龙江等几个省市比上海更早成立临时权力机构时，《人民日报》都迅速作了报道，有的还发表了社论。所以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中央是不是批准，就看《人民日报》有没有刊发报道。

但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北京方面在沉默，迟迟没有表态。自文革以来，上海有重大行动，毛泽东都会迅速作出反应，并高度评价。而这一次“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重大行动，事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却不见毛泽东反应。

张春桥、姚文元在焦急地等待着。造反派不但焦急，而且在怀疑中等待着。徐景贤急得更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引起不测变化。一直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看到《人民日报》对上海成立公社作出报道。于是有人猜测，有人着急，也有人反而高兴，等着看好戏。这也难怪。因为即使在造反派中，也有人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而对公社不满，更何况还有人数众多的被冲击的保守派，和刚刚被镇压下去的那些参加过“一·二八炮打事件”的红卫兵小将。

上海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原来都是一个基调：欢庆公社的成立。这时却冒出了另一种声音：《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最多的出现过十二问，都是战斗檄文，激昂慷慨，气薄云天。外滩那座挂着用红色彩球装饰起来的上海人民公社标牌的大楼前，从清晨到深夜，东一堆、西一簇，议论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公社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但公社领导班子中，“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都是齐全的，怎能说没有“三结合”呢？于是就有人说：没有陈丕显、曹荻秋参加，张春桥、姚文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算数。有人问：为什么不批准？有人答：这还用问吗，总是有问题呗！……显然，照此发展下去，不出十天半月，上海就会出现第二次炮打，而其规模肯定会比

“一·二八”更大。还没有完全摆脱上一次炮打阴影的张春桥，自然会有这种更可怕的预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原来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毛泽东在从理论上或实践中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逐步变化着的。毛泽东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评价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毛泽东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要用公社这种新的形式代替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旧机器。这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理论。

张春桥在一月革命中领会到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所以在上海夺权时，他提出“要搞一个巴黎公社，彻底砸烂旧机器”，把党政机关称为“旧衙门”，把机关干部称为“旧人员”。他把自己的想法概括成“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¹⁸

但是在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材料报了上去后，毛泽东却迟迟不给《人民日报》发表。因为他原来的想法变了。直至2月10日晚，张春桥终于接到王力转达毛泽东指示的电话，命他和姚文元12日回京。这是因为毛泽东对自己新的想法已经考虑得成熟了。

2月11日，张春桥把徐景贤叫到了兴国路招待所，只说他和姚文元要回京汇报，请示一些事情，没有说应毛之召。张严肃地对徐说：“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¹⁹

徐景贤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巧妙。在张、姚离开的七八天里，他每天晚上往兴国路招待所跑，通过保密电话，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情况，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姚的指示，有意做得好像他们两人还在上海一样。徐景贤把他的这种做法叫唱《空城计》。2月12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带着吉凶未卜的心情离沪去京。

上海建立夺权机构，是毛泽东提议的，而且公社这个名字也是毛泽东定的，张春桥又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的，但他不知道一向多变的毛泽东，此时又改变了主张。张春桥虽然事事要跟上毛泽东的思考，

处处要体现毛泽东的意图，而对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情上，他的脑子少转了一道弯，没有再进一步去想：毛泽东虽然让他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但究竟什么时候成立？怎样成立？毛泽东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是否还只是考虑中的事情？可能由于耿金章二兵团的行动使上海形势催人，张春桥来不及作这样多的考虑，就这样做了。

毛泽东之所以扣压上海人民公社的新闻，不在报上发表，又召张春桥来京，原来不是对张春桥不满，而是对陈伯达不满。张春桥在接到毛泽东要他成立上海夺权机构的指示后，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宣言、形式以及成立时间，所有具体事宜都直接向陈伯达汇报请示。可能张春桥以为，既然是毛泽东让成立的，就不用再直接请示了。如此大事，陈伯达没有再向毛泽东请示。而就在这几天，毛泽东对公社的想法又改变了，可是上海的公社已经成立了。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不请示不汇报，对江青也有意见。《毛泽东年谱》记：1967年2月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批评陈伯达、江青：“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²⁰毛泽东说中央文革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说话随便，要陈伯达检讨。他要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就是给陈伯达、江青开民主生活会。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他们已经离开了39天的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南海。毛泽东穿着睡衣等着他们俩。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毛觉得如果上海叫公社，《人民日报》一登，各省市都要跟着叫公社，那国家也得改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改称中华人民公社，这就牵涉到改变政体、国体、要换大使，以及要各国承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毛在和张、姚的谈话过程中，对上海夺权作了高度评价，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也充分肯定。还不时引经据典，说古道今，似乎心情极好。他反复阐明一个道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说如果上海人民很喜欢公社这个名字，也

可暂时不改。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回去好好商量。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估计张、姚会有沐浴春风之感，这些日子以来的焦虑不安一扫而空。他们也当场做了检讨，说自己考虑欠周到妥当，还是主席高瞻远瞩。

就在毛泽东召见张、姚的前一天，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就上海人民公社问题，提出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²¹叶剑英的质问，显示了中央高层反对将国家政体改为公社。

无论是上海市民，抑或是中南海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上海人民公社提出的质疑，对张春桥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毛泽东的一番谈话破解了危机，使张春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徐景贤的空城计唱了一个礼拜，张春桥忽然打电话给他。张春桥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用。”²²徐景贤从张春桥电话里的语气中，感到他轻松了许多。

元老派大闹怀仁堂

参加完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2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本来要回上海，处理上海人民公社的改名问题，但又接到通知，要他们参加政治局碰头会议。这次碰头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作为工业城市的上海，不能没有人参加。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就留了下来，参加16日在怀仁堂举行的政治局碰头会议。

毛泽东的召见，虽然不同意张春桥在上海搞的上海人民公社，但并没有批评他，反而谆谆善诱，给他讲了许多改名会带来种种不利的道理，一个还是“革命委员会好”，把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16日这天，张春桥应该是带着一种宽慰轻松的心情，拾阶而上走进怀仁堂的，却想不到有一颗积聚已久的愤怒的炸弹，因他的到来而引爆。

2月16日下午，参加碰头会议的大员们，先后来到怀仁堂，通常，相互见面少不得寒暄几句，只是这一天多了一点火药味。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还没有来北京？”语气中明显带有不满。在此之前，毛泽东有过指示，可以考虑把一些省市主要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据此开了名单，其中就有毛泽东说“烧一下可以，但不要烧焦了”的陈丕显。经毛泽东批准后，即安排飞机分别把他们接来北京。接陈丕显的飞机是1月28日到上海的，但当时上海恰巧发生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陈丕显被怀疑是这次“炮打事件”的黑后台，紧接着是中央文革发出的《特急电报》点了陈丕显的名，这样，怎能让陈丕显来北京避风头呢？

张春桥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吧，看群众答应不答应。”张春桥这话带有一些应付。张春桥当时哪里会想到和群众商量呢？事实上，他回到上海后也没有就是否让陈丕显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事与上海群众商量过，上海的群众压根就知道这件事。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现在不管用了。如果说张春桥前面的回答还只是一些应付，而这句回答就带着一些傲慢了，这话本不应出自张春桥之口，但因为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为他作了解脱，所以他的腰杆子硬了起来。

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听后勃然大怒，说：“什么群众，你们老是群众，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意欲拂袖而去。周恩来一拍桌子，说：“回来！”²³

谭震林在会上还谈到捕鱼问题，他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²⁴ 所谓捕鱼问题，还是由张春桥引发出来的。一月革命期间，张春桥在上海，发现上海市的居民吃不到鱼，他把渔业

公司的人找来问：现在为什么吃不到鱼？回答说：现在渔船都不出海。张问：为什么不出海？回答：上面不让出海。张问：谁不让出？回答：谭震林副总理。张说：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管谁说的都要批判。渔船要出海，要保证今年春节全市的人都能吃到鱼。

谭震林把这件事也摆到桌面上，说明了他对张春桥的不满不仅仅只是由上海人民公社而来，这种不满，甚至可以追溯到当年新三反运动时期。那时，张春桥因为在揭发官僚主义时自作主张，大量报道，受到了大为恼火的谭震林等人的严厉批评，不得不低头。如今，他已经是这些老领导们旗鼓相当的政治对手，而不再是那个老老实实挨批评，动不动就得做检讨的总编辑了。

紧接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相继或怒斥，或击案而起，痛快淋漓地说出了各自对文革的积愤已久的种种不满。陈毅还带出了对延安整风的宿怨，激昂慷慨地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更起劲！”²⁵ 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²⁶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文革小组成员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国务院有：余秋里、谷牧。周恩来没有宣布正式开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钟，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²⁷

在这次怀仁堂碰头会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使张春桥感到双重孤立。他不仅形单影只，而且在资历与政绩上，特别是在1949年后中国政界被看作至关紧要的战功上，更无法与这些老帅和副总理们相比。他显然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牢固的政治同盟，因而除了开头与谭震林有几次对答外，整个会议他没有开过一声口。及至两天后他回到上海，和家人谈起在怀仁堂的这次遭遇战，还有些胆战心惊，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是一次突发事件。”²⁸

有惊无险再次过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开国元勋们大闹怀仁堂并不是突发事件。在此之前，这些老帅们和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有过几次碰撞，只不过张春桥没有参加，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一次发生在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碰头会上，围绕着军队要不要搞四大的问题，意欲稳定军队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冲突。大闹怀仁堂的抗争，应该说是从军队开始的。自1966年10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军队院校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联，冲击上海军事领导机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这就打破了原来军队只搞正面教育的规定，使军队日益卷入文革狂澜之中。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斥异己，不想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连自己的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批斗。²⁹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认为，内忧必然要引起外患，因此力保军队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等按兵不动，与中央文革小组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正面交锋。京西宾馆的交锋可以说是进入白热化状态。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会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一状，报告了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双方另一次对垒是在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们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小组，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

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这时康生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无地自容了！”最后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讨论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会后，陈毅小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³⁰

大闹京西宾馆可以说是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而11日怀仁堂的这场冲突，则是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这两次交锋，张春桥都没有参加，即使听到一些也只是传闻。在老帅中，叶剑英毕竟是棋高一着，始终抓着张春桥搞上海公社的要害不放，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要害。叶帅心中也应该清楚，没有毛泽东的示意，张春桥是不敢改变政治体制，搞什么上海公社的。他不敢批评毛泽东，张春桥就成了批判的靶子。

2月16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应该是感到事情闹得有些出格，肯定会让中央文革小组一干人抓住把柄，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期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³¹会后，周恩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泽东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这样处理也恰恰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处事准则。

但张春桥则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受了老兵头的气，甚至受到了威胁，更深一层地说，陈毅的话是延安的旧话重提，肯定触到了毛泽东的伤疤，作为以捍卫毛泽东为己任的他，不能不向上报告。散会后，他把王力、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把各自的会议笔记对了一遍后，三人就去见江青，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地作口述汇报。为了逃避批评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到对方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都要去。

晚上10时，江青带领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三人到了毛泽东那里，

张春桥把当天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笑而不言。但当讲到陈毅发言的时候，毛泽东的脸色变了，不再笑了。不过当场并没有发作。

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王力还没有来得及向林彪报告，谭震林的告状信已经到了林彪的手边。谭震林在信中谈了自己所受的委屈和他的愤怒，还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林彪将此信转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谭震林给林彪写信，意在向林彪和军队求助；林彪转信，意在表示和谭震林等元老派划清界线，同时也想通过谭的信告诉毛泽东元老们对文革派的意见很大。但毛泽东不作明确表态，通过周恩来把这只皮球又踢还给林彪。他们彼此的心态都很微妙。³²

毛泽东看了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中，有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的话，就对江青说：你哪有武则天的本事，你有武则天一半，我就高兴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江青听后满怀委屈。毛泽东此时正在用江青在前面冲杀，肯定了她的政治敏感，但又感到江青的政治能力有所不足。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领导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毛泽东早已深知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心存抵触，对中央文革小组意见也很大，所以2月10日，他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这是毛泽东对元老派们的让步。在毛泽东看来，这已经给老兵头们很大的面子了。可元老派不但没有领情，反而大闹怀仁堂，怎么还要得寸进尺，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放过中央文革小组那几个人。名为批中央文革小组，实则是冲着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来。

2月19日，毛泽东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他在会上表示：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在场的人无一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来的话震慑着，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为了缓和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

场，主动承担责任，为几个老帅解了围。在毛泽东的威严和直接干预下，元老派的阵势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停职检查，对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称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由此也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同时，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也从此被中央文革小组代替。

元老派大闹怀仁堂，可以说是张春桥未能正确处理陈丕显的问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在这一问题上，表明张春桥缺乏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他只是孤立地看待陈丕显，而没有看到陈丕显在高层领导中深厚的人脉基础和关系。陈毅、谭震林与陈丕显，他们三人有着数十年的战斗友谊，都是在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战斗的，后来又都成为新四军上下级领导。1949年后，他们在华东局、上海市共事。文革中，他们三人又都承受着造反派的冲击，因而很自然地会把新近“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的张春桥视为他们共同的政敌。此例很典型地说明了文革所呈现的矛盾不仅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是现实与历史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总展示。

大闹怀仁堂事件，无论是元老派或是毛泽东的发言、讲话，都是在极端情绪化的情况下发生的。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元老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在委屈的情绪下发了一些牢骚，还是可以理解的。而毛泽东说了一些更为严重的话：“叶群（代表林彪出席会议）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还说：“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³³你陈毅要翻延安的案，全党不答应！”³⁴即使到今天，我们重读毛泽东的这番话，仍能感到他那情绪失控的样子。

奇怪的是，元老派的话是由张春桥引起，是冲着张春桥来的，但毛泽东只点到陈伯达、江青、康生，而没有点到张春桥，他是否有意不让张春桥处在与元老派相对立的地位，对他进行保护呢？张春桥也很能沉

得住气，避开元老派的锋芒。从表面上看，张春桥是冷静的。

在处理元老派大闹怀仁堂的事件上，周恩来和张春桥两人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元老派们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头面人物，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周恩来不只是了解中共党的历史，也了解他们每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他们每个人在毛泽东心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而且他们所发的牢骚有的也代表了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所以在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能善待陈丕显进而大发牢骚时，周恩来不但没有制止，反而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会议闹到不欢而散的时候，他又息事宁人，并没有打算向毛泽东报告会议的情况。而张春桥则相反，在江青的支持下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使毛泽东大怒，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元老派不利的政治后果，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如果说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来了一个先斩后奏，引起周恩来的注意，那么大闹怀仁堂事件，张春桥采取了和周恩来不同的做法，恐怕会使他更加意识到对张春桥不能等闲视之。

从处理安亭事件开始，张春桥政治生涯跌宕，一路风险，都是毛泽东把他从严重困境中解救出来。在不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张春桥已有过三次解救：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张春桥违背中央的决定，和工总司签字，轻则罢官，重则坐牢，是毛泽东“可以先斩后奏”一句话救了他；“一二·八炮打”，红卫兵揪着他派军队去复旦大学和他的历史问题不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对他无疑是灭顶之灾，又是毛泽东口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救了他；上海人民公社名称问题，张春桥处于风口浪尖上，成为高层领导的众矢之的。他急于抢头功在上海搞人民公社，这是关系到国家体制的大事。此举虽然来自毛泽东的原始想法，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以宪法可治其为“颠覆国家”的罪名，张春桥要上断头台，毛泽东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而毛泽东用“革命委员会好”这样一句话，不但为自己解了围，也救了张春桥。这一次大闹怀仁堂，可以说是第四次了。这一次又是毛泽东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张春桥摆脱了困境，否则，张春桥就没有退路，很难迈过这道坎。

大闹怀仁堂虽然在毛泽东的圣尊权威及盛怒之下平息了，但让张春桥领教了元老派的强大，而且是那种盘根错节而又根深蒂固的潜在力

量，展示在他面前的未来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这次，张春桥虽然带着胜利的心情回到上海，但却不像处理安亭事件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

上海人民公社一岁

2月18日，张春桥、姚文元一回到上海，就找几个起草人到康办二楼小会议室，讨论决议草案。张春桥抽着烟，一边迅速地翻阅着那些总结和统计资料，一边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但是革命期间生产力有时下落也是常有的事。今年一月，就是增长一块钱，也是一个伟大胜利。说着，手指轻击了一下桌面，颇有些神采飞扬。

2月24日，文化广场举行万人大会，会议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为主题，作了长篇讲话。张春桥讲话，重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一些说法：

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个好一点呢？看起来

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像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个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叫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另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

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³⁵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主席还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

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想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在讲话中也承担了责任，他说：

毛主席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呢，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还问：“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

成立公社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张春桥这番讲话，听起来是他自己的检讨，他在承担责任，实际上他是在为毛泽东开脱，他讲话的主要内容也会传到毛泽东的耳边，毛听了张春桥这番话，也能心领神会。此时，张春桥胆壮气粗，他说：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

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从北京回来，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几次传达，一次是2月19日，先在造反派骨干中传达，之后又扩大到人民公社筹委会范围内传达，再一次是2月24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传达。历次传达有详有略，内容不尽相同，不知道哪些是毛泽东的话，哪些是张春桥的话，这也就引起人们的怀疑，认为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挟带私货，不可相信。有的地方还贴出了大标语，公开表示对他的不信任。张春桥的传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他篡改了毛泽东的指示！

会上，徐景贤宣读一项决议，是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不再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而是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样，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改名，但却是事实上的改名，可以说是一种巧妙的掩饰。会后，又是一辆彩车开到外滩，将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换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次，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随车前往外滩。巴黎公社精神已经悄然褪色，再也没有出现上海人民公社挂牌时的那种大火点燃的狂躁与激情，人们似乎冷静了许多。此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造反派们一个多星期前满街贴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的大标语，现在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万岁覆盖，而在未来得及覆盖的大标语上，被人用“一”字覆盖了“万”字，标语就成了“上海人民公社一岁！”后经记者了解，干这事的是松江二中的两位初中学生，他们后来被关押。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委书记，同时兼任上海市委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迟迟没法确定，一直到1968年9、10月间，名单才正式报中央。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谁成为领导成员，谁从领导成员的位子退下去，完全由张春桥一个人说了算，革命委员会成了张春桥的一言堂了。

每次讨论市革委会委员名单，都是内部协商，而不是选举。张春桥对选举也不热心。他多次对人说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重要的不

是选举，而是及时撤换。他们所倡导的公社委员会由群众直接推选这一巴黎公社原则，一月革命再也不被提起，反而遭到批判，全民选举的主张被否定，转而认为迷信选举也是一种保守思想。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行动”产生的。所谓的群众行动就是拳打脚踢，你争我抢的软暴力行动，公社的梦想就这样悄悄地被群众行动置换了。巴黎公社是短命的。短命的巴黎公社精神自然也救不了上海人民公社，且存在的时间还不如巴黎公社，只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以闹剧结束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月革命运动已经落下帷幕。但是一月革命精神已经成了造反派的精神支柱，不只是上海，在当时整个中国，在造反的潮流中，都可看到一月革命精神所产生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

蓦然回首，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由于笔者的特殊职业，又在为一张颇为特殊的报纸工作，有机会看到一些场面、经历了一些事件、认识了一些人，这一切并没有成为落花流水，一了百了，那个时代的多面的、斑驳的色泽，仍然留在笔者的印象中。如果要给这个时代下评语，可以说：它是一个少数人赞美、向往，多数人诅咒、痛恨的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开篇写有一段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描述的是1798年的法国大革命，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用自身感受，或许能理解狄更斯的话。一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着相似，又有着不同。法国大革命是以巴黎人民攻占象征着君主制度的巴士底狱为标志的群众性的自发运动，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富有民主自由的色彩。一月革命则是由当政者自己发动，从表面上看是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而实际上是受上面操纵的群众运动，群众成了牺牲品。人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历史表象，而应该是实质。

注释

- 1 孙悟空是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胡守钧为首、专为炮打张春桥而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 2 复旦大学红革会：《将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1月26日，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第522—523页。
- 3 新复旦红革会造反联络站编：《红革会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载《反逆流特刊》，1967年2月20日，原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 4 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揭发材料，上海文学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268页。
- 5 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 6 萧木，当时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后成为辅导王洪文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教师。
- 7 上海市机关联络站的特急电报，一种说法是通过空四军的系统发给中央文革小组的；萧木是直接经办人，他在《尘土与大地》中说是经过邮政局发过去的。
- 8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如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 (一) 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 (二) 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 (三) 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 (四) 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 (五) 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 9 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第533页。
- 10 这可能是毛泽东与张春桥的个别谈话，张春桥没有公开传达过，是从徐景贤口中传出来的，或许张春桥告诉了徐景贤？人们怀疑毛泽东此话的真实性。《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记得更具体，说：“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红革会搞游行、扣军队、围攻张、姚是反革命！”此话的可疑性更大，毛泽东不大可能这样讲。笔者以为倒有点像张春桥的语气。
- 11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2 徐景贤：《十年一梦》所记原题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第71页。
- 13 根据《何秀文自述》，1978年6月15日。
- 14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9年1月。
- 15 2011年夏天朱维铮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6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 17 《何秀文陈述》，1978年6月15日。
- 1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329页。
- 19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84页。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7—48页。
-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 22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85页。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 2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8页。
- 25 文革前夕，薄一波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三人在1936年与其他因党组织遭破坏被捕的共六十一人被囚“北平军人反省院”，因日军即将侵占华北，这些狱中人员处境危险，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指示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日后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这批人执行了指示而出狱，后大多担任了重要职务。文革中，他们又因江青、康生罗织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倒。文革后平反。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 27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有不同版本，即便是被认为是权威的官方著作中，引文也各不相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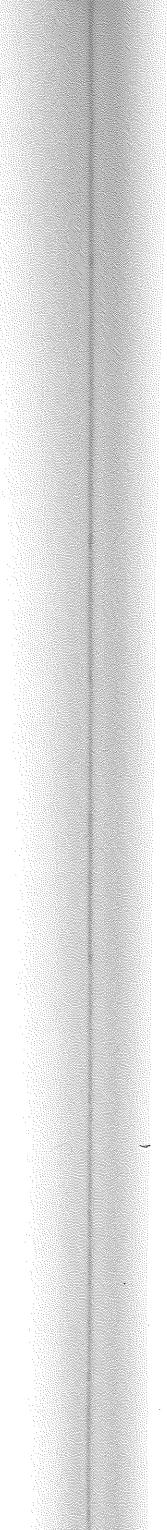
版社1985年）第408页“二月逆流”条目中说：“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此后许多著作如《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谭震林传奇：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元帅聂荣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四人帮”兴亡》等，都采用类似说法。笔者采用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对了笔记，向江青作了‘口述汇报’”这一与上述不同的说法。《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54页说：“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有没有当晚把怀仁堂会议的发言整理成文字记录，毛泽东的批语到底有没有？即使有，又批在哪个记录稿上，存疑的地方颇多。阎长贵《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若干问题》（《记忆》第109期）一文指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档案中可查到，是周恩来让王力整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他还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便2月25日到3月18日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之用。这样的会议记录当天晚上能整理得出来吗？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王广宇是唯一见证人。据他说，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不可能是2月16日当晚整理的。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他说：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张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姚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我看这份记录稿是经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记录稿后署名：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 28 2012年12月11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29 李作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 3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 31 汪东兴谈“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1980年8月13日，引自中央两案材料，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汪东兴，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9页。
- 33 王明，原名陈绍禹，中共早期领导人，1930年代在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1956年开始一直留居苏联。
- 34 赵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227页。
- 35 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一种多神教，1950年作为危害严重的反动会道门组织被铲除取缔。

第十一章



1966年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左起：萧华、刘志坚、叶剑英、张春桥、王任重)



第十一章 夺权之后

没有立起来的纪念碑

张春桥回北京听了毛泽东的谈话，经历了有惊无险的大闹怀仁堂事件，于2月18日返回上海。毛泽东的接见和支持，使他有些春风得意，马上让徐景贤组织班子写《一月革命小结》。《支部生活》编辑部中层干部萧木，此前被当作小小走资派，逃离单位投奔已经造了反的徐景贤，感到没有什么立功表现，这时就主动向徐景贤提出参加小结的写作。本来，他到徐景贤这里就是为了体验生活，为将来写小说做准备，已经跑了不少单位，也了解到不少情况，他自认有资格参加这项工作。

张春桥急于搞上海《一月革命小结》，应该有两重意思：一是现实的，就是要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提出的种种责难，作出系统的、有理有据的回答，即含有回击二月逆流之意。二是历史的，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说明：一月革命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为国际共运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和萧木同时参加写作小结的还有朱惠民和吴文虎，他们都是市委机关干部。机关联络站成立后，他们参加了吴瑞武负责的调查组，在一月风暴中，几乎跑遍了上海每个角落，积累了不少材料。因此，材料的准

备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成为问题，最重要的是理论上的准备，他们阅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时刻用马克思的一些名言激励自己，他们认为上海一月革命和法国的巴黎公社同样伟大，同样神圣。

起初，他们写的不是小结，而是《一月革命大事记》。大概做历史研究的都是这样，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写正文会更顺手些。大约一个星期，《大事记》完稿，接着就切入正题写小结，题目是《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对这个题目，他们是情有独钟，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就用这个题目写了社论在报上发表。上海人民公社仅仅只存世几天，“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这几个字似乎有些反讽，但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希望“一月革命精神”万岁永存，所以写《一月革命小结》时仍然延用了这个题目。小结全文约一万余字。写到第二稿时，徐景贤送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春桥认为基本可以，题目也由“小结”改成“总结”。

既然要对一月革命树碑立传，总要在理论上有一些突破。在一次谈《一月革命总结》时，张春桥还要这个写作班子学习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篇文章都对革命成熟的条件作了反复论述。张春桥还引用列宁后一篇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制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张春桥还特别强调了其中“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这一句，以此用来说明上海一月革命中，不是别人，正是市委一些领导人自己把自己弄到了“再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地步的。他说，列宁把统治阶级的“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称为“政府危机”，这种危机把广大群众都卷到政治漩涡中心，革命胜利才成为可能。¹

显然，张春桥是要通过《一月革命总结》为他们的夺权找到理论根据，他是在担心当革命退潮时，人民会找他们算账，不承认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历史上的夺权者都是如此。商汤夺了夏桀的权，因心中有愧，所以用“奉天讨逆”的话来安慰自己，以后的儒家又编了一套君权天授

的谎言，从理论上说明汤夺权的合法性。刘邦、项羽联手打败秦王朝，然后刘邦又打败项羽，刘邦的谋士编造了更多的说法，来证明刘邦的所作所为都是皇天赐予。张春桥要搞一月革命总结，当然不会再搞“天意”那一套，而是从列宁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证明一月革命夺权的合法性。

张春桥引用列宁的话来表述一月革命虽然有些生搬硬套，但是萧木等三人听了以后，还是认为给“总结”点明了方向，他们又学习了列宁著作，把文章又改了几次，再次上送。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徐景贤安慰他们说：两位（指张春桥、姚文元）看是看了，只是还要研究一下。可是再接下去就更如泥牛入海，不再有任何音信。

张春桥因何会有事先积极组织，然后又悄然放弃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呢？事实上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全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上海一月革命期间和之后，毛泽东很乐观，以为全国到二、三、四月可以“看出眉目来”。²所谓眉目就是以上海一月革命为典型，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省、市一级革命委员会。但实际情况却是，不少省市在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造反派分裂为两派，派仗不断，全国陷入乱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再强调夺权问题，而是更为关注如何实现大联合，如何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张春桥提出的《一月革命总结》则是以夺权为中心，显然和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有些偏离，一月革命的夺权经验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也就无法标榜为东方巴黎公社了。

二是张春桥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经历了几个昼夜的艰难挣扎和生死抉择后，忽然听到仿佛来自天庭的“可以先斩后奏”、“总要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样的权威性裁定，他享受着真正胜利的喜悦。其后便是与姚文元一起以调查员身份——实际发挥的是“指挥员”的作用——受命来上海这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点”指挥一月革命。总体来说，这场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势如破竹，相当顺利。中间虽遇到一些波折，受到从中央高层到上海市民的质疑，但都因毛泽东的干预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2月12日受毛泽东接见，又一次吃了定心丸，有些春风得意，准备回上海再展鸿图。想不到在怀仁堂遇到了阻击战，领略了元老派力量的强大，而且是那样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

强大，恰如他的女儿张维维所说：他平时只是读书写文章，不大与人交往，不大了解高层相互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没有毛泽东当后台老板，他自知不是元老派的对手，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³

另外，张春桥还插手了青海“赵永夫事件”，这使他在军队的对立面就不仅是几位大闹怀仁堂的老帅，还有军队中的保守势力。青海两派对立，武斗不息，西宁市造反组织“八一八”等占据了《青海日报》社，还搞了打、砸、抢、抄、抓等野蛮行动。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带领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对峙，军队开了枪，进驻报社的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几百人，后来更有上万人受到株连，史称“二二三事件”。当天，赵永夫打电话向中央军委报告。叶剑英听了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⁴ 赵永夫当即被作为英雄接到北京。

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要求调查此事，并附上红卫兵的揭发材料。毛泽东于3月11日作出批示，经过各方面调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3月24日，周恩来在中央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的会上，宣读了中央决定，并宣布赵永夫、张晓川、王昭隔离审查。⁵ 就在这次会议上，赵永夫被捕。

青海的案子就这样翻过来了，这对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们，却又向悬崖跨了一大步。正是由于这几种因素，本来想通过《一月革命总结》作为个人丰碑的张春桥，已顾虑重重，这份《总结》也就胎死腹中了。

还有一件反映张春桥在一月革命之后心态变化的事情。一月革命以后不久，上海财贸系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原市委财贸委员会负责人李研吾是被市革会财贸组三结合的干部，他向张春桥报告，请他和姚文元出席会议。但张、姚都没有出席。开大会的那天，正遇李先念陪同外宾到上海，因他是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送走外宾后，李研吾请他出席大会。开会期间，有人递纸条要求李先念和群众见面，李先念便在李研吾及财贸组几位负责人的陪同下，一边挥手致意，一边绕会场兜了一圈，全场热烈鼓掌。隔日市革会开会，张春桥见到李研吾，冷嘲

热讽地说：“听说你们的会开得很不错呀！你知道李先念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吗？”姚文元在旁边添油加醋说：“绕场一周，史无前例。”⁶

李研吾在1976年10月24日写信给李先念和纪登奎，信中除了提到张春桥批评“李先念绕场一周”的事，还提到张春桥为林彪建别墅的事。⁷ 1967年10月2日，张春桥在市革会核心组会议上宣布要为林彪修建一处招待所，他的理由是，很多同志都希望林副主席能够经常到上海来，林副主席也想来，只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住。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和曹荻秋在虹桥路为刘少奇别墅建了三幢房子，已经完工80%。张春桥决定利用这个地方给林彪搞一个招待所，他布置市革会办公室负责抓这项工程。办公室负责人朱玉珮批了一张条子，要李研吾负责解决6,000公尺布料（有各种呢、绒、纱等）。李研吾不了解要这么多布做什么用，没有立即签字照办。1967年12月16日，张春桥在市委核心组会议上质问李：“为什么不签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⁸

后来，笔者在《文汇报》社也听到传达，张春桥在讲话中提及李先念在文化广场的事情，他说：还好意思绕场一周呢！他在怀仁堂攻我攻得那么凶，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群众还会相信他吗？我们两个（指他自己与姚文元）在上海，他有什么资格绕场一周？平时慎言的张春桥脱口而出，道出了真心话。他把自己领导的地方看作是自己的地盘，不许他人来这里显威风。这本是他内心的感受，却居然毫无顾忌地在会上流露了出来。

在家中，张春桥常说：“我一切听主席的，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不发话，我就不动。”⁹ 张春桥深知，他的定位完全取决于毛泽东。但如果从个人意愿、感情上来说，他更愿意留在北京直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但如今他面临着两大变化：一是毛泽东批准他担任上海党政主要领导。二是经历了怀仁堂那场政治大风波，亲身感受到他在中央高层不要说想有大的发展，就是找一方容身之地也十分艰难。从这时开始，他把自己定位在上海，他首先是一个地方官，其次才是京官，或者说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则进有据，退有援，可以从容应对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张春桥一回到上海，就身心放松，从容自如，谈笑自若。常在张春桥身边的徐景贤、萧木都感受到了。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过的话：“《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¹⁰这里的君指已故的君。一切成绩都是皇帝的，一切错误都是臣子的，张春桥也是这样，把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归于毛泽东，把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错误都归于自己的名下，毛泽东知道了当然会高兴的。这也可能是毛泽东赞赏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967年4月17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明确承担责任，说：我们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很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这段讲话有四层意思：第一，搞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是个影响很大的错误；第二，这个错误是群众提出来的，他同意的；第三，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方向和办法；第四，因为执行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年代参加军委扩大的，都应该是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的功臣宿将，他们对毛泽东提倡巴黎公社精神有着本能的抵触。本来赞成搞公社的毛泽东，可能听了老帅们的批评后改变了想法。毛的想法改变了，但张春桥并不知道，所以搞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新闻及公社宣言。到这个时候，上海人民公社是木已成舟，毛泽东只好批评陈伯达没有把他的想法传达给上海。张春桥在功臣宿将面前，不但为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的偏颇作了彻底洗刷，而且敢于承担，把责任揽在上海革命群众及自己身上，以报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真还有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风骨。

另一块心病

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其核心成员都没有陈丕显的位子，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些哗然，认为上海没有做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上报中央，中央迟迟没有指示，如何解决陈丕显的问题，也就成了张春桥另一块心病。

张春桥在处理陈丕显的问题上，起码有几条他不敢公开的秘密：一、1966年12月，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对“火烧陈丕显”的口号讲了“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了”。毛对陈没有打倒的意思，后来周恩来又要陈出来解决“三停”问题，还是寄望于陈丕显的。张春桥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对陈丕显拉一把的意向及时地向造反派传达？

二、毛泽东导演的一月革命是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两张传单为契机的，陈丕显不但是这两张传单的参与者，而且还是签发者。但张春桥宁愿背负欺君之罪，始终没有把陈丕显为毛泽东革命路线作出的贡献向毛泽东报告。

三、1967年1月下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要把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保护起来，华东地区要保护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是陈毅开的，名单中就有陈丕显。当时陈丕显还在二兵团耿金章那里。张春桥为什么不把这一信息通知陈丕显，却以找不到为由不让陈丕显去北京？

四、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派她去的，后来发表的讲话稿也是经过毛审改的，其中提到陈丕显，称他过去是个红小鬼。5月1日，毛泽东又让老帅们上了天安门，一起欢度五一劳动节。在庆祝活动时，毛又一次提到陈丕显，他把陈丕显的问题定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要他很好改造，希望他能回来工作。为什么张春桥不但不传达毛泽东对陈丕显的指示，而且对陈仍然咬住不放？

把陈丕显留在上海，如何安置陈丕显，始终是张春桥面对的一个难题。当时上海的党政权力既然成了张的禁脔，当然就不会再让陈恢复工作。但他又不愿意让陈丕显离开上海，一直把陈丕显控制在手中。既不把陈结合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让他出来工作，也不放陈离开上海，搞暗箱操作，由他摆布。但是张春桥能把陈整死吗？看来也难，因为决定权不在张手上，而在毛泽东手上。既放不得，也不敢整死，陈丕显反而成了张手上的一个烫手山芋。上海的许多矛盾，也多少与此有关。

对陈丕显在上海一月革命中种种好的表现，或者说功劳，张春桥隐瞒不报；中央对陈丕显的保护性的安排，张春桥以种种理由拒不执行；他还在大会上或小会上挑动干部对陈丕显的不满，借以消除陈丕显的影响，摧垮陈丕显在上海的群众基础。1967年2月24日宣布上海人民公

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谈到陈丕显、曹荻秋时，张春桥作了一番煽动性的讲话。他讲到上海干部起来造反只有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首先是陈丕显、曹荻秋应该负责，他们对干部欠了债，他们自己搞资反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陈、曹这样的人，欠债实在太多，不但对上海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对周围同志也欠了债。他们用内外有别、组织纪律、不能什么都讲等等所谓组织纪律为由，把干部都压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张春桥这样说，是为陈丕显定了调子，把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支持的错误态度，都算在陈丕显的头上。因此上海干部如果要想获得解放，三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必备的条件，就是在批斗陈、曹的会上亮相，以此表明与陈、曹划清界限。那么，陈丕显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错误的呢？他在批斗会上曾经作过两次比较系统的自我检查，一次是1967年3月间，一次在7月间，两次检查的内容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上海文革初期的一些重大事件是认了错，作了检讨的。

有了张春桥定的调子，陈丕显只好检查，他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总以为情况会转过来，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把路带错了，害得很多干部跟着我犯不同程度的错误。他既讲了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工交会议期间，围绕安亭事件与张春桥之间产生的矛盾等等事情的过程，也讲了自己当时的认识，可以说是放下第一书记的架子，向张春桥低头认错了。

在陈丕显作检讨之前的一次市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张春桥就透露，陈丕显写了一个检讨，并认为陈丕显是“假检讨进行反扑”，他给陈保留了一个反面教员的位置，是干部们亮相时批判斗争的对象和靶子。

更使张春桥耿耿于怀的是，造反派耿金章搞大联委时，要把陈丕显作为老干部结合进来，这说明造反派虽然起来造了陈丕显的反，虽然经过几次大批判，但在某些造反派的心目中，陈丕显仍然是个人物，即使把他调离，其影响仍然会留在上海。为了把陈丕显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张春桥既不把他结合进市革会的领导班子，也不放他离开上海，让他脱离社会、脱离社会和群众，让人们忘记他。

张春桥这样对待陈丕显，引起朝野的不满，特别是引起革命元老派的不满，毛泽东不能等闲视之了。为了堵住高级干部的嘴，不再发泄不满的声音，1967年4月14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让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介绍上海一月革命情况。谈到陈丕显，张春桥说：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就是他。张春桥还特别讲了陈丕显的生活奢侈，说陈和曹荻秋转移了财产，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转移到主席在上海住的地方，这是犯罪行为。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去，包括其他市领导，人走后，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他这个人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原来总觉得他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但到现在毫无结果。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上这样一番介绍，无非要表明陈丕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把他打倒是应该的，也是根本不能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这也算是对那些批评张春桥的人一个回答。

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张春桥还专门布置了一场在中苏友谊厅举行的批斗陈、曹的电视转播大会，会上给陈丕显安排了一个座位，这是演给毛泽东看的。毛观看电视转播后说，上海的斗争会还比较文明，没有喷气式什么的。

但是，张春桥不能化私为公正确处理陈丕显的问题，不只是影响着上海，在浙江、江苏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苏南地区，陈丕显曾在那里工作多年，那里有他的老朋友和老部下，他们为陈丕显在上海的遭遇鸣不平。原来在苏南地区工作的干部李顺之、戚拯，此时在常州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并以造反组织的名义支持上海市委，保护陈丕显，发言称“上海市委与工人阶级关系是母亲和儿子关系”，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陈丕显的旗子，对上海造反派表示不满。张春桥身在上海，又不能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处置李顺之和戚拯的问题，他就在上海组织写作力量，对李、戚二人进行批判。当时主持这个写作班子的市革会办事组负责人张竹奉命组织了朱敬禹等一批人写文章，《文汇报》评论组张哲永也参加了。¹¹开始，文稿在《文汇报》保密车间排字，张哲永带回张春桥用铅笔改的稿子，改得密密麻麻，笔者还记得文章开头是用了毛泽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词句。文章从李、戚的历史开始写起，

一一列举他们的现行活动，说上海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时候，他们“如丧考妣，痛哭流涕”，称他们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时发表《反对上海工总司宣言》，说他们在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丹阳、徐州等地闹派性，搞分裂，破坏铁路交通，还说他们冒充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到处招摇撞骗。总之，罗列了李、戚的许多罪名。

还是1967年9月底，张春桥随护毛泽东回到上海，在接见上海铁路系统代表讲话时，就公开对李、戚在常州成立造反组织，阻碍交通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说：“我说出来同志们会感到痛心，毛主席原计划坐火车从南京走，结果无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们不痛心吗？”游雪涛小组得知张春桥对李、戚的批评，很快搞了一份李、戚造反组织的情报。¹²朱敬禹告诉笔者：周总理也看到了这个材料，批示要把李、戚抓起来。没有周总理的批示，对江苏的事，张春桥也不敢采取这样大的动作。

张春桥的改定稿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三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68年1月10日在三报同时发表，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2016年5月25日，笔者访问了张竹，以后又采访了朱敬禹，他们都还记得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当时从各个报社抽调人员参加定作，写了好长时间，多次修改，张春桥都不满意，最后张春桥自己动手修改，几乎是把稿子重写。

张春桥对烫手山芋陈丕显，动足了心思，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打击，以消除他的影响。张春桥的作为使陈丕显加深了复仇的心态。“四人帮”垮台之后，以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来上海清查和“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工作顺利结束。这时身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之位的陈丕显绝不手软，向中央提出上海的清查右倾，清查不彻底，要重新补课。补课的结果又把一批人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三种人”，有的人又重新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被关进监狱。¹³如果让笔者以旁观者的立场来评论，这样未免有些恩恩怨怨恶性循环了。

1967年7、8、9三个月，毛泽东东南巡时讲到干部问题，特别提到陈丕显也应该算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而且没有投敌、叛变、自首行为。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始终对陈丕显抱有希望。

故1974年陈丕显给毛写信，9月17日毛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

平时自诩最听毛主席话的张春桥，此时对毛泽东的意图似乎一点也没有理解，对毛泽东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落实批示时，张春桥都另有考虑，他对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黄涛说：你回去告诉马、徐、王，对铁路局的老造反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还有小潘（即潘国平）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了，又神气起来了，而他的那些老对手还有一个一个地在下面劳动。这件事，在陈丕显出来之前就要办好，陈出来之后，知道一月革命时他的老对手，不仅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在，而且“两飞”、小潘也都还在。

1975年9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丕显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丕显深知，在张春桥主政的上海，他不会有出头之日，就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离开上海。在邓小平的安排下，经毛泽东同意，10月份陈丕显调离上海去中央另行安排工作。临行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原来陈丕显专案组的人员召集到一起，连续召开了两次对陈丕显的批判，才放他离开上海。

对曹荻秋的历史审查也是如此，专案组跑遍全国，逼供、诱供，最终还是拿不出曹荻秋“叛徒”的铁证。1973年9月18日，上海“市革委”仍然将《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央，中央专案组认为曹荻秋根本定不上叛徒，所以对上海市委的报告没有批复。

张春桥为什么要抓住陈丕显、曹荻秋不放？王洪文在一次对造反派的谈话时说：“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¹⁴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曹荻秋的，当然也包括陈丕显。在他们看来，陈丕显、曹荻秋出来工作，就是否定上海一月革命。不只是张春桥，就连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也是无法接受的。

“工总司这面旗子不能倒”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和上海工总司对立的除了耿金章的二兵团，还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和钢铁兵团。一兵团是工总司的另

一支队伍，安亭事件时，他们北上告状到南京受阻，张春桥和工总司签订了“五项要求”后，他们从南京回到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的戴祖祥就打出了兵团的旗子，名为一兵团。三兵团即是和徐美英一起，从上海北火车站出发步行到安亭火车站，支援拦火车的那支队伍，这个兵团人数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钢铁兵团的前身是工总司直属总队，虽然名称为钢铁兵团，其组成人员也不完全是钢铁工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系统的工人。由于经济上受工总司控制，各个兵团都想自立门户，钢铁兵团也脱离工总司，1967年1月7日宣布独立，改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工三司），钢铁兵团和工三司并存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野战兵团，是临时工组成的，在造反派中榜上无名，是一个空架子。

在造反派起家的过程中，无论是工总司，还是市委机关联络站，张春桥总是喜欢用“敌存祸灭，敌亡祸至”的话来告诫他们，要他们把矛头始终对准以陈丕显为首的走资派。所以当时斗争的矛头是针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工人赤卫队的，因此工总司的那个“总”字还能起到团结统一的作用。后来造反派掌权了，坐在权力的交椅之上，三个兵团和工总司之间即产生了矛盾。尤其是耿金章的二兵团，在成立权力机构期间，几起几落，最后张春桥用策略把耿金章纳入机构之中，但此前对他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兑现。耿金章不敢对张春桥说什么，和工总司的矛盾却在继续扩大。

在工人造反派中，耿金章是有名的草莽司令，人们称他是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式的人物。他粗壮矮短的身上，平时总是披着一件军大衣，手捧茶杯，踱着方步，像在思考什么。即使后来进了提篮桥监狱，还是手捏紫砂茶壶，眯着眼睛看太阳，不时啜饮。每当出动，便脚蹬高统皮靴，在寒风中奔来走去，大衣在风中飘动，有时身后跟着两个保镖。他是有意做出这种派头。在造反司令中，谁见到张春桥都是毕恭毕敬，亲切地喊着“春桥同志”，只有他直呼其名“张春桥”！即使当着张春桥的面也这样大大咧咧地喊着。

张春桥来上海后遇到的第二个谈判对手就是耿金章。在苏州，他在耿金章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以后，耿金章在康平路事件及挟持陈丕显搞了个《紧急通告》的行动中，都立下了功劳。由此，张春桥对他

另眼看待，王洪文等则警惕他潜伏着与工总司分庭抗礼搞分裂的苗头。

张春桥对工总司的态度很鲜明，坚决支持，而对工人造反派内部闹分裂，则和王洪文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策略。他明确表态，不赞成分裂，但也不怕。张春桥所以这样坚定支持工总司，因为安亭事件是他签的字，是毛泽东的支持把他和工总司拴在了一起，他必须扶持工总司，必须和工总司同呼吸共命运，他希望“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面旗帜能举起来，屹立不倒。工总司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

几个兵团对工总司的唯我独大、独吞胜利果实很不满，时不时地要给工总司制造出一些麻烦来。王洪文采取的是硬的一手，把三个“兵团”的司令戴祖祥、耿金章、范佐栋抓了起来，尽管他们都是工总司的常委。

张春桥得知消息后，批评王洪文就知道抓、砸，不会做思想工作，把耿金章等人抓起来的做法不妥当。如果一直这样蛮干下去，工总司一定会垮台的。经张春桥一再做工作，王洪文把耿金章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并按照张春桥的意见，把他安排在工总司总部工作。

6月1日，耿金章到工总司总部去报到，这天张春桥也恰好从北京回到上海，接见工总司负责人，耿金章也在。张春桥对他说：你出来了，你受委屈了！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不要拉山头，你那个山头越拉越大，最后搞分裂。我讲的话你都听不进，这次把你保护起来，是形势的需要，否则上海要大乱，不把你关起来，上海的新生政权就有被摧毁的危险。你们各搞各的，成了一盘散沙，怎么能管得住呀？这次允许你出来活动，是我的意见，你准备怎么活动？在这里，张春桥为王洪文打了个圆场。耿金章表示什么都不搞了。

张春桥安慰耿金章：你不拉山头了，上海就会太平了。¹⁵张春桥对工总司的负责人之一王秀珍也说过，安亭事件以后，工总司是靠二兵团撑市面，没有二兵团，工总司的存在也很危险。

张春桥私下里曾对秘书何秀文说：耿金章还是做了好事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我们找他谈话，他总算听了。如果当时不听，就以他为头，几十个小组织的人一下子闹起来，你又有什么办法？那还不是一直打内战，能有这样的形势？还不是和外地一样？这总算耿金章一功嘛！¹⁶

工总司最有实力的对立面就是二兵团，由于张春桥紧紧抓住了耿金

章，这个对立面始终没能发展起来，因之也没有发生大的分裂，使上海局势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局势一直有高度的评价，这也加重了张春桥在他心中的分量。张春桥是懂得这个大局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耿金章对此有功，一直不忘记他。在接见工总司负责人时，张春桥称他为“耿司令”，有时特地与他握手，显得特别亲热。对工总司反映耿金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张春桥说：耿金章年纪大了，水平比较低，没有培养前途，只能到此为止了，不可能再负什么重大责任了，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只好让他在生活中随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消失。这一类人不只耿金章一个。¹⁷

一兵团的人主要是反对王洪文，认为王洪文没有能力，做事不负责任。但一兵团并不像二兵团那样拉起队伍和工总司对着干，王洪文把戴祖祥抓了来，虽然只关了一个晚上，一兵团的队伍就土崩瓦解，归顺工总司了。

三兵团负责人范佐栋，也是工总司成立时的发起人之一，负责工总司秘书组，王洪文不在时，由他和潘国平主持工作。范佐栋因为不满意王洪文不大管工总司的事，曾扬言：王洪文再这样下去就把他开除出工总司，对王洪文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在开整风会议时，王洪文认为范佐栋几天前的决定是分裂工总司的宫廷政变，派人将范佐栋抓了起来，送进杨浦公安分局。

对王洪文以抓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来搞垮对方组织的行为，张春桥一直是持反对的态度。他要人传话给王洪文，工总司常委之间，不要抓来抓去。范佐栋被关了24天后，王洪文把他放了出来。

对工人造反组织各派之间的矛盾，张春桥采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工总司是张春桥手里的一面旗子，是一月革命的成果，可以说和他的政治生涯血肉相连。只要有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撑局面，上海就不会大乱。上海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设想都可以在这里比较有序地进行，用上海的实践来证明他发动文革的正确性、合理性及可行性。毛泽东能把上海的一些经验推向全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张春桥能在毛泽东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能做出符合其本意的阐释之外，他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从实践上支持了毛泽东，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造反派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在谈到工人造反派走上当权的地位时，毛泽东曾说：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较高的、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关系到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事，非常重要。经毛泽东点拨，张春桥开始考虑该如何带好工总司这支造反派队伍的问题。所以，张春桥在处理工人造反派内部矛盾时，不只是摆平矛盾，还要想法使工总司的这面旗子不倒，只有人不倒，才能保住旗子不倒。

耿金章的问题解决了，工总司就不再有分裂成两大派的危机，现在要加强工总司内部队伍的驯化。为了整顿这支队伍，张春桥向他们提出整风的问题。从安亭事件开始，张春桥就很喜欢王洪文率领的这支工人造反队伍。张春桥曾说：

看来上海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一个大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支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¹⁸

张春桥还在工总司常委会上提出：“打江山的人不一定就坐江山，造反派夺权后并不一定就要掌权。造反派要过三个关，地位关、入党关、婚姻关。造反派掌权后，工资还在原单位，按原来的待遇拿，要入党也须在原单位发展。”¹⁹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工总司于1967年4月2日至4日进行了两天的整风。造反派的整风是按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规则进行，先由张春桥、姚文元作动员报告，继之学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及毛泽东发现并推广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最后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²⁰

工总司核心成员在整风会上都作了检讨。王洪文检讨自己的问题：一、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有单纯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二、许多问题决定武断，独断独行，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三、阶级斗争右倾，如小潘（国平）开二次黑会要我交权，我曾想交权；让小潘靠边，我没有表态；让耿金章当常委，我没有坚持原则；……六、生活问题，在一月革命之前，没有车子，是经常步行的，后来有了车子，就不大想走了，在思想上有了变化。

接下来，潘国平、张宝林、陈阿大、黄金海、王秀珍、蒋周法、缪南生、康宁一等也都作了自我批评。²¹从他们每个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工总司的整风是按毛泽东的两个“务必”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是在坦诚中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潘国平、陈阿大这样的人物，对别人的批评也没有作强辞夺理的解释。

工总司整风临近结束，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参加会议，作了一番发言，他说：市革委会成立后，工总司的位置也起了变化，不当权成了当权派。徐景贤的讲话不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还多次提到张春桥对工总司如何如何。徐景贤的讲话激怒了工总司的核心成员，指责机关造反队在排挤工人组织，是想要瓦解工人造反派。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的矛盾在工总司庆祝成立半年大会时演进到白热化。

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年庆祝大会，开大会时工总司总部要求一定要举大旗，戴红袖章，以重振造反派军威。作为机关联络站的代表，徐景贤虽然不情愿，还是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他在另一次公开场合转述张春桥的话：“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情本身就是山头主义。”²²这样的话张春桥可以讲，徐景贤不能讲。但是徐景贤讲了，这就加剧了工总司和机关联络站的对立情绪。

5月11日，《文汇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刊登了《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大搞“半年”庆祝活动》一文，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半年庆祝活动。文章说：如果离开革命大联合去重振某一个组织的军威，就会助长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下惹恼了王洪文，他借此下令工总司代表一律不参加市革会的活动，他自己也回到国棉十七厂，不到市革会上班了。此外，还组织了千名造反派围攻《文汇报》社，说“文汇报决没有

好下场”！《文汇报》被工总司闹得无法出报。徐景贤没了主意，打电话给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也软了下来，说：怎么办？只好你自己出马，到他的十七厂请他出山。最后，徐景贤只好负荆请罪，向王洪文道歉，然后又调解工总司和《文汇报》的矛盾。

张春桥不希望工总司和《文汇报》唱对台戏，否则容易造成两败俱伤。张春桥手中一文一武两支队伍，对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支文的队伍，他能控制得住，很放心；对工总司这支武的队伍，他总是有所警惕。他所警惕的不是这支队伍背叛他，而是不知哪一天在什么事情上出事。所以对这支队伍，他总是摆出老头子架势，有强硬的训斥，也有温婉的劝说，为他们谋划，教他们一些谋略，如何对付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张春桥时刻都在关注着工总司，只有工总司这支队伍稳住了，上海的局势才能稳，才能对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影响，他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张春桥不只是十分关注上海工人造反派如何巩固一月革命夺权的成果，对全国造反派如何掌握所夺来的权力也很关心。1967年，全国各省市革委会普遍成立时，选举却不利于造反派，如天津市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出的代表“老保”占多数。以后又为迎接中共九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必然要选出席九大的代表及选举中央委员，张春桥、姚文元布置朱永嘉他们写一篇《从八大到九大》的文章，明确提出，文章要有现实性，不要迷信资产阶级搞的什么选举，结尾就是要写破除对选举的迷信。这篇借题发挥的文章由萧木执笔，改了36稿，就是结尾写不好，尾巴翘不上去，最后没有发表。

武斗：上海局势不安定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着一句话：中国文革看上海，上海文革看工人，工人文革看工总司，工总司则看王洪文。在这里不妨再加一句，王洪文的成长看张春桥。不要说王洪文，在工总司核心成员的眼中，张春桥是他们的领导、支持者，也是老师。后来升为工总司第二把手、上海市委副书记的王秀珍，始终称张春桥为“张老师”，直到1976年之后，她进

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后接受笔者访谈时，她仍然是一口一个“张老师”地称呼张春桥。谈到张春桥对工总司核心成员的教导，她仍然感激涕零。

张春桥对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的爱护，可谓是倾其心力。5月20日，他和工总司的核心成员面对面地促膝长谈。6月3日，张春桥又谈工总司问题：

今年一二月份说过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希望工总司的同志不做这种人。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们强调了，个别同志不理解，过去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从受压制的地位起来革命，不等于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

实际上从去年12月开始，造反派中已有分化，有昙花一现人物的下去了，挽救也救不了。口头上极左实际上是右的，也有坏的混进来。

你们要当心，不要因为你们犯错误，逼着我们出来批评你们，上海局面搞好，对华东、全国，影响很大。

关于昙花一现的问题。主席讲：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就是这样。凡是出风头的、露面的，到后期都垮了（陈独秀等），而李大钊、鲁迅都是成功的。

“一二·九”也是这样。²³

我们要从历史上得到教训，把工作搞得踏实一些，多联系群众。要注意到基层单位中有一批好同志，可能他们将来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要善于发现。²⁴

张春桥针对工总司反复讲昙花一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张春桥从和王洪文握手那一刻起，就不希望王洪文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有一段时间，王洪文的确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坐立不安。耿金章、戴祖祥、黄文海、范佐栋等各拉山头，各有打算，貌合神离。在张春桥的策划下，王洪文采取了镇压与分化、恐吓与封官，打一阵拉一阵等各种手段，这些组织最后被各个击破，为工总司争取了统一稳定的局面，控制着上海一月革命后的大趋势。没有张春桥的谋划与支持，工总司的代表不能这样顺利进入上海最高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夺权之后，上海武斗频起。有上海铁道学院红革会与红三司的武斗，各有背景的出版界的版司与版联之争，公安系统的公革会与消革会、义革会的大打出手，上体司和工体司、交运局造反派的武斗，普陀区一〇一厂武斗以及青浦武斗。

这些内讧和武斗，起因各有不同，有的要整倒对立面，自己独霸一方；有的因帮派之间的利益关系，相互摩擦；有的是头头之间的泄私愤，报私仇；也有的是在别人的策动和教唆下，充当炮灰和打手。但他们都举着毛泽东的小红书，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都自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都应该参加所属的权力机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主要关键问题，还是权力分配的问题。解决这些武斗问题，都要耗时、费力，还要动脑筋。为了让王洪文得到锻炼，提高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张春桥把自己放在“教父”的位子，凡事都让王洪文出面负责解决。

1967年初，上海柴油机厂（简称上柴厂）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另一个是“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兵团”（简称东方红）。后者挂钩于工总司，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们反对联司，并称联司是“走资派”操纵的老保组织。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向社会求援，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助教杨福坤（化名全向东）及上海汽车配件厂革委会主任陈卜昌等人的支持，组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1967年1月，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在厂内发生摩擦，联司抓了东方红的人。王洪文、王维国等派出有公安干警参加的两百余人冲进厂内砸了广播站，也抓了联司的人。²⁵联司包围了这些人，王洪文又增派三千人进行反包围。联司出动了工人和家属千余人，分乘十辆大卡车，身悬“我是反革命来自首”的牌子，到市公安局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4月，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王承龙等以政治指挥部的名义，派出上柴联司调查组，由陈阿大带队，蛮横地宣布解散联司，还抓了联司头头柏广山、卢国兴两人。27日，联司头头杨仲池带了两千余人在市公安局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卢二人；他们还成立了“接待站”，进行广泛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以杨福坤、陈卜昌为首串连了一百多个组织的支联站也积极开展声援活动。

6月3日，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看到事态扩大了，以市革会名义发出通告，谴责联司头头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联司就和支联站”在人广场召开誓师大会，驳斥市革会通告。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对市革会介入工总司打压上柴联司的行为不满，同情联司，因此支联站基层组织急剧增加，发展到627个，积极建立全市性的组织“支联总站”。对上柴厂联司问题，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也有记载：7月13日，春桥指示，文元来电：

关于联司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面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²⁶

此时，张春桥还是想以稳妥的方法，解决上柴厂两派的矛盾，消除上海局势不安定的因素。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这一事件，甚至影响到了整个文革的走向。

让毛泽东在武斗中认识王洪文

7月20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一部分解放军冲击东湖宾馆，其目的是揪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迫其回答关于他此前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问题。现场一片混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然而群情激愤的武汉军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此时正在武汉，而且恰恰正秘密下榻于东湖宾馆。毛泽东是不顾他人劝阻，满怀信心地前来武汉，打算解决日益激烈的军队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并重复一年前的壮举，再次横渡长江的，不料竟然就此身处险境。

消息传到北京，江青一听就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戚本禹马上通知周恩来，让他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所会合。到了林

彪那里，林彪已戎装整齐地坐在那里看地图。他听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平静地说：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现在还是要摸清那里的情况。接着，江青和毛泽东通了电话，她建议毛泽东离开武汉。但毛泽东执意不愿离开。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之后，又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的信去武汉劝毛泽东马上离开，并交待：你人在，这封信就要在。接着周恩来也去了武汉，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张春桥也从北京赶回上海，做迎接毛泽东的准备。7月21日凌晨，毛泽东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护送，乘飞机离开武汉。

在飞机上，毛泽东向杨成武了解陈再道的情况。²⁷又问：你对武汉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看来，毛泽东也有害怕的时候，害怕军事政变把他推翻。毛泽东对武汉发生的事情看得很严重，如同大唐盛世时期爆发的安史之乱，那时唐玄宗带着妃子仓皇离开长安，西逃入蜀，如今毛泽东在兵变形势中，冲出武汉，逃到上海，又怎能不严重呢？

人们把这天发生的事情称为“七·二〇事件”。在王力后来对中纪委的交待中，他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他和谢富治到水利学院大讲支持工人造反派组织钢工总、钢二司，而激起了有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等组织的强烈反弹，对他进行了绑架和揪斗，从而爆发了该事件。

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7月25日下午，江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江青、康生都对此表示支持。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要把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这是斗争大方向”。《红旗》杂志社论把“揪军内一小撮”推向高潮，使一些老帅受到冲击，引起军队的不满。

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之后弄清了武汉的情况，就同周恩来说：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他要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在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不要提“揪军内

一小撮”。8月16日，他通过接待外宾的讲话，明确提出要依靠解放军。他说，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毛泽东还向武汉军区发电报，称陈再道为同志。这明显是对军队做安抚工作，他在向军队表示让步。

但是，王力以英雄的姿态从武汉胜利归来，有点忘乎所以，跑到外交部去讲话，要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权。8月25日，毛泽东在虹桥宾馆听了根据周恩来所嘱，从北京回来的杨成武的报告，内容是《红旗》杂志社论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及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毛泽东说，这是“大，大，大毒草”，认为“揪军内一小撮”会搞乱军队的秩序和稳定，并提出“还我长城”，要周恩来把关锋、王力抓起来。不久，戚本禹也被抓。唐玄宗向军队让步，结果使自己的妃子杨玉环丧命马嵬坡，而毛泽东向军队让步，失去的是几支笔杆子。文革初期曾经炙手可热的王、关、戚，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毛泽东到了上海后，在虹桥宾馆住了很长时间，张春桥也就住在那里，时刻准备着听从召唤，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处理一些问题。余立金处理武汉问题之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张春桥也一起听了汇报。²⁸毛泽东又和张春桥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在谈话中特别谈到许世友问题，江苏省一个造反组织红总要“打倒许世友”。²⁹毛泽东说：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并批评江苏省另一个造反组织八二七提出的“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还要张春桥和许世友要搞好关系。

张春桥除了向毛泽东汇报上海情况，让毛泽东感到上海局势安定，放心得多了。但是，他此时还不知道上海局势也有不稳定的地方，那就是市革会已经卷进了上柴厂两派的斗争。

7月28日，在上柴厂两派斗争中，东方红派的工人解福喜被打死，上海市公安局出动，抓走了联司八人。王洪文等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会后组织上百辆卡车的人游行。联司又在人民广场多次组织辩论会，并在闹市区进行广播、宣传，对抗市革会支持工总司。人们还是同情联司，各单位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全市都搞起支联站，包括市革会机关都有秘密支联站，王洪文惊呼：“上海就要第二次大乱！”

张春桥本来是千方百计避免让毛泽东看到上海混乱的情景的。但形势的发展使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而同意王洪文工总司的要求，说：群众要动，就让他们砸吧！

8月4日，人民广场集中了二三十万人，近千辆卡车、吊车、消防车，一齐驶向上柴厂。黄浦江水面上有上体司、海运局、打捞局、船舶公司和江南造船厂造反派控制的炮艇、运输船、打捞船等二十余艘船只。工总司分水陆两路包围了上柴厂。

一开始，王洪文指挥队伍从大门进攻。在厂内的联司人员，一面进行反击，一面用高音喇叭喊叫“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工总司的人久攻不下，王洪文下令切断厂里的总电源，高音喇叭因断电而停播了。接着，王洪文等又派大吊车猛撞工厂的铁门，因联司防守严密久攻不进，于是最终拆毁了工厂的围墙冲了进去。他们先占领食堂，断掉水和粮的供给，再分割包围各大楼车间，用消防车架上云梯登上屋顶追打，双方在屋顶上混战。到下午4时，联司人员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的情况下，被迫投降。这些被俘人员，男的被迫脱去上衣，女的则被撕破上衣，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浑身血迹斑斑。聚集在厂房前的职工家属个个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现场指挥的工总司的头头跪下求情，回答他们的却是拳打脚踢和辱骂。

以上场面，都被现场的电影镜头纪录了下来。是上海市政法指挥部事先向上海电影制片厂及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下令，让他们分头到现场拍摄，把工总司砸联司的整个过程拍成纪录片，在全市各机关放映。这天，笔者曾跟随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车，到了拍摄地点，看到了一些武斗的场面。

后来，张春桥谈到，8月4日晚上9点多钟，他坐着汽车到了南京路，满街都是人，车子无法通过，街上的人也都是翘首等待着打联司的消息。这时，张春桥看到打联司回来的造反派队伍，那些人的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也很高兴。

毛泽东看了砸联司的纪录片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³⁰之后他还坐上装甲保险轿车到外滩巡视，

看到一群群文攻武卫战士头戴藤帽，手持长矛，守卫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口。³¹这使他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左右局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张春桥看到毛泽东很高兴，就请示如何重建民兵，毛泽东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请示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根棍子！”³²毛泽东从武汉仓皇离开，不回北京，也不去他喜欢的杭州，而是直接来上海，把自己的安危系于上海，足见他对张春桥的信任。

张春桥还要徐景贤在电视台安排了一些节目，实况转播了几场对原上海市负责人的批判会，批判会场放在文化广场和上海杂技场，全市各单位都可收看。张春桥陪毛泽东收看电视，适值王洪文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张春桥便乘机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注意与赏识，即从此刻开始。

毛泽东接受了王洪文，这使张春桥对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更加关注，即使一些细节也不放过。砸联司后的一天，张春桥到郊区去，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卡车，卡车上挤满了人，车上写着一个标语“在游泳中学游泳”，张春桥明白了，这是到淀山湖去游泳的。他随即数了一下，共有一百多辆。他后来了解到，还有的人居然开着卡车去杭州游山玩水，他认为这是给上海造反派丢脸。在市革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严肃地提出了批评，说：“这都是搞资产阶级一套，这样的搞法，我看用不到一两年时间就出问题。我们49年进城，50年、51年两年，我们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如果我们现在不警惕，资产阶级可以从这方面把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腐蚀了，瓦解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开展这样一个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要当大老虎。”³³

1967年国庆宴会，张春桥看到乘小汽车来参加宴会的人如此之多，非常吃惊。自1949年进入上海以来，他从未看到这样多的汽车，文化革命革出这样的局面来，使他感到忧心。后来，他和工总司头头谈话时，提到这件事，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要垮台。

毛泽东搭台他唱戏

1967年7月，也就是工人造反派夺权半年之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几天，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谈到军队要支持造反派，搞了个《十条》，《十条》中谈到“武装左派”的事情。毛泽东说：“‘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³⁴接着发生了“七·二〇事件”，毛泽东到了上海。7月22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发表，7月31日，张春桥趁毛泽东在上海之际就写信，要求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组织，提出：“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县）搞十万人左右”，“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³⁵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³⁶按照毛泽东批示的习惯，这表明他对张春桥的提议没有异议，也就是同意。

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许多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文攻武卫，上海工总司8月4日砸上柴厂联司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事件。打了联司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听了“八四”的情况，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就是革命不能没有武器。“八四”是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大事”。后来由姚文元打电话给王洪文传达张春桥的意见，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

起初，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设在外白渡桥的英国领事馆，英领馆曾被称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就撤走了，文攻武卫进驻了这幢花园别墅。它的所在地就在《文汇报》社的对面，报社的大门正对着它的后院。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在《文汇报》食堂搭伙吃饭，指挥部的头头张宝林、康正勤等吃过饭也会到报社编辑部办公室闲谈，或讨一些报纸带回去看看。他们都头戴安全帽，身穿背带装或工作服，冬天穿着再生棉的蓝色粗布大衣，胸佩文攻武卫的标牌，也有的胳膊上戴着文攻武卫的红袖章。

毛泽东住在上海的消息是绝密的。9月8日，空军在华东地区击落一架台湾美制U-2高空侦察机，没有向毛泽东报告。可能由于这件事情

很平常，自1962年9月以来，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共击落了台湾美制侦察机5架。新华社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给空军某部的嘉奖令，同时也报道了北京人民群众的庆贺活动。只是在一条综合消息中报道了上海的祝贺活动，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代表上海和华东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电话给空军某部，祝贺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保卫祖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伟大胜利。这件事情就这样平静过去了。

这时，毛泽东在上海还有些惊魂未定，不只是自己关注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在密切关注北京的林彪等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除了对王力、关锋作了严厉的处理批示，还要周恩来告诉林彪他们，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不要那么激烈。也许是“七·二〇事件”的教训，毛泽东在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事，他几次谈到：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9月16日，毛泽东要离开住了两个月的上海回北京了。他本来要走京沪线回北京，因南京、常州、无锡武斗，火车不能正常通行，他对这些地方的武斗提出了批评，才绕道南行，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回到北京。他给了张春桥特殊的待遇，要他随行。一路上毛泽东召见几个省的地方和部队领导谈话，也都要张春桥参加，并向他们介绍张春桥及上海的情况。

毛泽东在上海时，张春桥组织了一次对陈丕显、曹荻秋的批斗会，批斗时让陈、曹坐着，给毛泽东留下印象，他说：在上海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回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他再次讲到许世友，说：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³⁷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说：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老的也要照顾到，邓小平、贺龙要不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

9月19日到了武汉之后，毛泽东又乘上吉普车，带领张春桥等到街上看大字报，看到街上有许多宣传车，说：这不好，我很反感。谈到“七·二〇事件”，毛泽东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不先和部队商量，

做好工作，有偏向，支一派，打一派，捅了马蜂窝。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人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周恩来谈九大问题，他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空军击落台湾美制高空侦察机的事已经平静地过去多天，可是这时突然又热闹起来。9月28日，上海为空军立功部队举行庆功会，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庆功会的现场情况，只能从当时报纸的报道中获得一些信息。9月29日，北京《人民日报》及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对这次庆功会都作了报道，版面位置及标题高度统一。报道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张春桥这次出席会议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负责人。³⁸

张春桥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听了你们打下美制蒋匪帮U-2高空侦察机的报告，很高兴。张春桥还向大家报告了“最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力非常非常充沛，这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台湾U-2高空侦察机是南京空军打下来的，张春桥又是南京军区的政委，他出席庆功会，名正言顺。这一消息过去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这时听到了很高兴，也是在情理之中。唯独是向社会宣布毛泽东的健康的消息，令人感到突兀。毛泽东的健康是否出了问题，而以此来作掩饰？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心理：凡是讲最最健康，就意味着不太健康；凡是宣布最最团结，就意味着分裂。但即使需要为毛泽东的健康作掩饰，也应该由林彪、周恩来出面，也应该在更为重要的场合。叶剑英虽然也曾经说过“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20岁”，但由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和毛、林的关系，这话虽属捧场，人们听起来还是比较自然。谈毛泽东的健康，此时还轮不到张春桥，为什么在空军某一件事情的庆功会上，而又让张春桥出面宣布呢？

毛泽东真的健康出了问题？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8周年，上午10时，毛泽东和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北京市50万群众参加庆祝大会。林彪作了讲话，毛泽东一直站在旁边，以后他们又检阅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晚上9时，毛泽东还准时出席了

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晚会，直到深夜。10月2日，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10月1日，上海也举行了有五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春桥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说：不久前，毛主席就亲临上海，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是对上海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光荣。毛主席嘱咐我向上海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向上海同志问好！张春桥在讲话中没有再谈毛泽东的健康问题。

游行开始，由五千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文攻武卫队伍，手握步枪、冲锋枪，扛着机关枪，拉着高射炮等装备，以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大旗引路，经过人民广场检阅台，张春桥、王洪文等都站在检阅台上，张春桥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

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工作的四点指示》的文件，才算揭开张春桥在空军庆功会上讲毛泽东健康问题的内幕。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到了上海，由于高度保密，人们不知道毛泽东的行踪，引起境内外许多猜测，诸如毛泽东在武汉被吓病了，无法再工作；毛泽东躲到井冈山避难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还传出陈伯达已经动摇，中央文革小组解体了等消息。中央文件认为“谣言”和误传动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毛主席健康应积极宣传；二、坚决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谣言；三、最近传出毛主席不办公的消息是误传；四、禁止宣传和张贴“打倒刘邓陈（指陈毅）”的口号。

是谁向张春桥授权在空军庆功会上讲“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毛主席精力非常非常充沛”的？笔者分析，只能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各类传言会不攻自破，为什么还要在之前让张春桥宣布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宣布“毛主席非常非常健康”的事情是林彪的专利，这出戏一直是由林彪唱的。如今毛泽东搭台，让张春桥登台唱了这出戏，林彪会怎样想呢？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毛泽东为张春桥铺设了一个地位上升的台阶。毛泽东心中明白，他对陈伯达已不再信任，江青讲话有时不着边际，姚文元只能做些文字工作，经历了“七·二〇事件”，

只有张春桥能帮助他撑起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客观形势需要他提高张春桥的地位，加重张春桥在党内的分量。

游雪涛小组的兴灭

在上海，张春桥虽然有工总司及市委机关联络站两个造反组织的支持，可以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得到上上下下的各种信息，使他可以及时采取判断应策，但他还是不够十分自信，竟扶持起几乎为他一个人服务的情报组织，采用特务手法为他搜集情报。这个组织就是游雪涛小组。

1967年初，上海处于一月革命时期，各种造反组织蜂拥而出，都想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行表演。1月上旬，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游雪涛自发组织了一个游雪涛小组，标榜自己的组织是以“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即隐藏的敌人”为宗旨。

游雪涛小组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炮打张春桥的情报。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游雪涛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要摸清炮打来源。马上召集游雪涛小组成员布置任务，派出手下到各个造反组织、各个阶层之中收集各方面的炮打情报，编写成《扫雷简报》。1月27日第1期《扫雷简报》出笼，标题是《关于上海出现一股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的情况》，预报了“一·二八炮打”事件。1月30日出的第2期，标题是《反对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报告了复旦大学、电影局及团市委的炮打活动。诸如此类，连续编了好几期，通过徐景贤，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里，果然引起张、姚的重视。姚文元对游雪涛小组的做法有些不大赞同，张春桥却说：“扫雷这个组织我知道，他们写的材料我都看了，还是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北京那几个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么咬牙切齿地骂我们，我是看了《扫雷简报》后才知道。”³⁹以后，游雪涛小组就为张春桥提供各种各样的情况，不仅有“东方论坛”的情况，还有军队、华东老干部的情况，不只是在上海搞情况，还把手伸到南京、杭州等地。⁴⁰

游雪涛派人去上海警备区摸情况，警备区发觉后反映到张春桥那里，张春桥虽然对此有点顾虑，但还是肯定他们前一时期是做了不少工作。徐景贤对此表示担心，把游雪涛的事情告诉了朱永嘉等人。他们听后对徐景贤说：“我们研究过历史，历史上搞这种活动的人，结果都没有好下场，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⁴¹张春桥虽然对游雪涛小组有好的评价，但他也感到这是非正常行为，他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觉得还是归口好，便把游雪涛小组挂到市革会，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这就使他们收集情报活动合法化了。

市革会群运组属于王承龙分管，他把游雪涛小组安排在永福路244号，“244”就成了游雪涛小组的代号。室内安装了保密电话，建立了可以同张春桥等直接通话的热线；并配备了专用的汽车和摩托车，汽车均有民用和军用两套牌照，以便随时掉换伪装；还装备了袖珍录音机、手枪、照相机、刑讯工具等；同时还使用各种化名，联络暗号，建立了联络点。张春桥通过徐景贤向游雪涛小组不断下达指示，并提醒他们要注意保密，防备“人家也搞你的特务活动”，不要让坏人“钻到你们那里来”。

后来，游雪涛小组通过工总司核心人物，秘密搜集和反映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一些情况，被王洪文等人察觉，引起不满。王洪文等也向张春桥建议，要游雪涛那伙人尽快收摊。为了摆平内部的矛盾，同时更怕游雪涛活动的暴露，拖了一段时间后，张春桥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令撤销游雪涛小组。王洪文并未罢手，之后又派人搞了游雪涛的材料上报张春桥，张春桥感到游雪涛确实越走越远，最终批准了对游的隔离审查报告。

接纳并使用游雪涛小组，张春桥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他认为这只是在非常时期才使用的，这也表现出他当时无可奈何的处境。此时，张春桥虽是上海市的最高当权者，但公检法已经瘫痪了。情报系统失灵，当权者也就耳目失灵，张春桥的决策判断失去了依据，所以不得不使用游雪涛小组这样非法的情报组织。但不管有什么理由，张春桥搞游雪涛小组这样的特务组织，都是不光彩的事情，是他执政道路上的一个败笔。

注释

- 1 萧木：《尘埃与大地》，未刊稿，2011年。
- 2 周恩来1967年3月13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 3 2012年12月11日张维维接受笔采访时的谈话。
-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 5 张晓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05部队主任。王昭，时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长。
- 6 李研吾1976年10月24日写给李先念、纪登奎的信。李研吾之子李效朴向笔者提供此信底稿复印件。
- 7 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 8 李效朴向笔者提供此信底稿的复印件。
- 9 2012年12月11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0 朱永嘉、王知常：《新译春秋繁露》，台湾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890页。
- 11 朱敬禹，原在上海《党的工作》刊物任编辑，一月革命期间在上海市革会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0年代初期在上海科技大学创办新闻系。
- 12 游雪涛小组是文革初期由张春桥掌控的从事搜集情报等秘密活动的组织。
- 13 三种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整党，其重点之一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 1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387页。
- 15 耿金章1979年3月13日陈述。
- 16 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陈述。
- 17 同上。
- 18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4日。
- 19 叶昌明：《叶昌明工作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项目《上海文革研究资料汇编（1）》，第70页。
- 2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红旗》杂志发表了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短评说：“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

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人民日报》2月26日编者按：“今天，本报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刊登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大字报提出一边战斗、一边整风的号召。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当前存在的问题，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都讲得很好，很及时。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学习研究。”

- 21 缪南生，时为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人。康宁一，时任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负责人。
- 2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第101页。
- 23 原文如此，应为“一二·九”，指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 24 叶昌明：《叶昌明工作笔记》，第209—211页。
- 25 王维国，时任空军政治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 26 叶昌明：《叶昌明工作笔记》，第235页。
- 27 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 28 余立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
- 29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 31 文攻武卫，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导致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 32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67页。
- 3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0月16日。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104页。
- 35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2页。
- 36 张春桥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载《上海民兵斗争史料》，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第1502页。
- 37 韩先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 38 1967年5月，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16页。
- 40 东方论坛，上海锅炉厂一位化名“何是”的工人，因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便将这些看法抄成大字报，登在西藏中路的一个大字报专栏上，并取名“东方论坛”。
- 41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20页。

第十一章



1967年4月20日北京革委会成立大会
(左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王力、杨成武、姚文元、戚本禹、关峰)

第十二章

大批判：思想领域的夺权

批判《清宫秘史》

上一章我们主要是沿着工总司的发展轨迹，讲述了张春桥在文革中这一时段的夺权背景和历程，这一章再回过头来，从思想领域的斗争进行讲述。毛泽东认为只在组织上夺权还解决不了问题，而必须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这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¹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一月革命起，花三个月时间，在组织上解决夺权问题，也就是全国各省市完成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但运动的进展在各省市如何实现大联合的问题上就受阻了，毛泽东处于一直急于收尾，而又由于收不了尾被苦苦煎熬的日子中。毛泽东所说的“主题”、“正题”，就是从思想上夺权，在各个领域中肃清刘少奇的流毒，于是就出现了“刘毒”这样的新词汇。他是想把两派斗争的矛头引导到批判刘少奇的事情上来，通过批判刘少奇实现大联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第四阶段。

于是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便应运而生，成为第四阶段的标志，也是彻底打垮刘少奇的烈性炸药。²按照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他和刘少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看

法上，分歧由来已久，刘少奇称赞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他自己则说是卖国主义的。江青还在电影局任职时，也多次找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商量批判《清宫秘史》，但都没有开展起来。1954年，李希凡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毛泽东给予“小人物”关心和支持。³他在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他以后又提到这部电影没有受批评，欠债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是针对刘少奇的。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关锋、胡绳、艾思奇谈话时，又提到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在其中一条注释中提到《清宫秘史》，说“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毛泽东的批评虽然是暗指刘少奇，但刘少奇并不检讨，直到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在愤怒中仍然不承认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之类的话。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是怎样写出来的呢？1967年初，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老是搞运动，大批判呢？秀才们还是写些批判文章。”至于写什么题目，毛泽东并没有说。戚本禹选择了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王力、关锋选了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姚文元刚开始选了批判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觉得分量不够，又选择了批判邓小平。

戚本禹虽然自告奋勇地要写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但他对《清宫秘史》这部电影及其故事的历史背景并不了解，就请穆欣帮他找材料。穆欣从电影资料馆找来《清宫秘史》电影剧本，戚本禹把剧本铅印出来发给他周围的人看，讨论如何写这篇文章，闭门多日，终于把文章写了出来。他后来说为了写这篇文章，连元老派大闹怀仁堂那次重要的会议都没有参加。

3月23日，毛泽东审读了这篇文章后，首先赞扬文章“写得很好”，又在文章中增加了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

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⁴

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修改这篇文章。戚本禹本来是为《红旗》杂志写的，他想以《红旗》评论员的署名发表，周恩来则认为评论员或社论文章都是代表官方的，把刘少奇的名字一下子提出来不妥。所以他建议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代表是他个人的观点。

毛泽东可能知道他先前说江青不如慈禧的话，引起了江青的不高兴，所以在和戚本禹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时，专门谈了慈禧，他说：慈禧的政治能力可不一般，你看，咸丰死后，她才只有二十几岁，就能内联东宫外联亲王，把咸丰留下来的六个顾命大臣都杀了，并从此掌握了朝政。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她已经没有自己的主力部队了。军队大部分已掌握在汉人的手里了。但她照样能把掌握军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大臣玩弄在股掌之中。这是何等的政治能力啊。⁵毛泽东认为江青的政治能力不够强。但如果江青真的像慈禧那样，毛泽东又会怎样呢？是仍然和江青在政治上合作，还是把江青废了？这就很难说了。

戚本禹在文章中，第一次给刘少奇加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常以设问的方式加罪于人。戚本禹的文章也是这样，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八个“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并不是要刘少奇作回答，而是自己设问，自己回答，最后把八个为什么归结为：“你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指的是刘少奇。这八个“为什么”实质上给刘少奇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远远超过个人署名文章的范畴，后来戚本禹告诉朱永嘉：“这八个问题，都是总理（即周恩来）要加的。”⁶文章也点了邓小平，说他是“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刘少奇看了载有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报纸，掷之于地，踏之于脚下，高喊：“这是诬陷！”“什么时候说过影片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

在打倒刘少奇的事情上，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立下了头功，江青送他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作为酬谢。戚本禹说自己不会用，说他喜欢主席写的字。毛泽东便把过去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他。后来，戚本禹又请郭沫若把他自己的原词写了一幅字。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虽然不是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但在推波助澜上，《文汇报》却处于领先地位，除了用两个版面转载该文外，还发表了多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仅社论就发表了九篇。4月2日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进军号”。《人民日报》随即转载了这篇社论，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文汇报》还专门印了《清宫秘史》电影剧本及有关资料，报社人手一册，还发给作者和通讯员。

不过，《文汇情况》上也刊载了不同的声音。戚文发表后，记者立即去采访电影《清宫秘史》的副导演岑范，他说导演朱石麟是从帝妃之间的爱情、婆媳之间的纠纷出发，把话剧《清宫怨》改编成《清宫秘史》，主要是爱情戏。

光绪的扮演者舒适说：导演朱石麟是从噱头出发，尽搞一些婆媳关系，所以用“秘史”。当时对这部电影的认识，的确认为是爱国主义的，电影中最后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当时还觉得是讨共产党的欢心，因为蒋介石将要垮台，这话是批评蒋介石的。从参加电影拍摄的导演和演员的话来看，这部电影表现的纯粹是帝妃之间的爱情游戏，谈不上爱国或卖国。

《文汇报》记者还采访了音乐家蔡绍序，他不理解，用一部电影或一本书为由头怎么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电影演员季纬也认为，怎么能用十七年前拍的电影去批判刘少奇呢？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在讨论戚本禹的文章时提出：为什么要从《清宫秘史》这一问题打开缺口？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也提出，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刘少奇怎么敢反对毛主席呢？戚本禹文章中列举的观点，是否都是刘少奇说的？

刘少奇不承认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他的夫人王光美

也不承认刘少奇说过。刘少奇到底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上的批判事件，这个问题仍然会从人们头脑中泛起。如果刘少奇没有亲口说过，毛泽东对它的批评就不成立了，戚本禹的文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戚本禹在写回忆录时，曾和朱永嘉见过面，坚持认为刘少奇是讲过这句话的。

2007年10月27日，戚本禹和朱永嘉在谈话中，曾提到这一话题。戚本禹说：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诬陷刘少奇。可我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天津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拿出来的材料，都是复写纸或打字机打出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我的文章出来之后，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说他记得清清楚楚，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时正在靠边检查的谭震林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刘少奇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谭震林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毛主席看了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他是爱国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刘少奇平反后，他们还是承认刘少奇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解释的含义变了，说刘少奇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无须证明刘少奇到底有没有说过那些话，当今不是很流行对文革要“反思”的说法吗？但是人对一件事情的反思是很难的。戚本禹文章的大方向是毛泽东定的，责任应当归于毛泽东，但八个“为什么”应该是戚本禹的创意，即使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但“原创权”还应该归属戚本禹。如果说要反思，戚对这八个“为什么”应该有所反思。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戚本禹作了个人的反思，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王力、关锋合作写的，经陈伯达修改和毛泽东审阅，才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三次审阅这篇文章，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一——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

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⁷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入党之前还是入党之后的必读之物，在党员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加的这两段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作了他自己的阐述，其目的就是让共产党员分清理论上的“正确与错误”，消除刘少奇和这本书在以往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对刘少奇《修养》的批判，是毛泽东提出的在思想领域中夺权的重要部署。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国开展了大批判，把所谓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福利主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卖国主义”和“洋奴哲学”等等，进行上挂下联地批判。所谓“上挂”就是把这些罪名都挂在刘少奇头上，“下联”即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对基层干部进行批判。上海街头到处都是张贴大批判的大字报专栏。外滩从黄浦公园开始，沿着黄浦江一直到延安路，都是用大毛竹及芦苇编的席子搭成的大字报长廊，这也许是别处无法看到的一道风景线。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每个中共党员的必读之书，这本书受到批判，可以触及到每一个共产党员，他们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检讨自己受《修养》的影响，也就是自我批判。这比街头大字报还要深入，触及的人也更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没有进行过灵魂革命的人恐怕很少。

姚文元选择对邓小平的批判，也就是张春桥的选择。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两人当年在中央苏区曾同样挨批判，同样被冷落，但不管毛泽东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都是支持毛泽东的。毛泽东把邓小平看做是自己阵营中的人。1934年4、5月间，中央苏区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矛头对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史称“邓、毛、谢、古事件”。⁸在被批判的过程

中，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地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土地改革经济政策。邓小平在中央追随毛泽东的直接后果有四：一是被左倾的中央领导人撤销了职务，二是爱妻金维映被迫离开了他，三是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四是被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经常遭敌人骚扰，人身安全无多大保障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文革初期，毛泽东虽然批评邓小平装聋作哑，不听他的话，搞独立王国，随之又把刘、邓捆在一起，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刘邓路线”，称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但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有区别的，并不想把邓小平打倒，总是对邓小平加以保护，给他留下重新站出来工作的机会。

张春桥或姚文元，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了解不多，更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开来的策略，所以在戚本禹选择批刘少奇时，他们选择批邓小平，姚文元还要朱永嘉他们为他查资料。但批判意向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的意思是要集中批判，邓没有什么好批的，陶铸有些书，要组织批判。⁹这样，姚文元才调转笔头，开始写名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

《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出笼

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陶铸读书不多，更不精于马列主义的研究，可他偏偏生就一副诗人情怀。他热情似火，富有激情，特别钟情于文化人，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1960年代，在省委第一书记中，他和湖北省的王任重以文章著名于当世。陶铸所写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两本书，在干部中广为流传，在青年中尤有影响。特别是他那篇《松树的风格》，被许多青年当作座右铭，能背诵者颇多。他去农村作调查研究时，随行者写的《西行记谈》在新闻界也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搞了个换头术，也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活动报道，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

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要求新华社一定要设法让邓小平上镜头，于是他们就把邓小平的头像移到陈毅身上，成为轩然大波的换头术。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回忆文章中说：“胡耀邦曾经对我母亲说：其实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英雄主义的人。¹⁰具体解读就是主席不喜欢陶铸这样争强好胜的人。”

毛泽东对陶铸的不满，是从安亭事件引起的。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成立所采取的“三不”态度，陶铸是支持的。安亭事件发生后，他又站在陈丕显一边。张春桥和工总司签订五条协议，陈丕显首先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态度很明确，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的做法不合适，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件事惹恼了毛泽东，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陶铸的脾气很倔，不赞成闹革命成立跨行业的组织，又主张基层党组的领导，还要把王洪文的气焰压下去，这话被文革派抓住了。

戚本禹小组整了陶铸的材料，说陶铸把革命派压下去，保皇，形左实右，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传单四处散发。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又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报纸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可见，毛泽东早就对陶铸有意见了，打倒陶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所以他提出“陶铸有些书，要组织批判”就不是偶然的了。但毛泽东的提法很巧妙，不是直接批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而是从批判他的几本书入手。陶铸的几本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毛泽东应该是知道的，他选择陶铸的两本书批判，其用意在“教育”更多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姚文元文章的题目原来是《修正主义者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1967年8月20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稿时，建议“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真是文章高手，从他为姚文元改的《评“三家村”》到《评陶铸的两本书》，不只是题目短了，意思更鲜活，更令人过目难忘。

毛泽东在8月20日的批语中还说：“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竟如何，可与你的写作

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¹¹姚文元遵命，把他的文章送给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秀才们进行讨论。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回忆说：

1967年夏天，把我从农委调到姚文元办公室任秘书，姚文元正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刚来时，看到他的房间很乱，桌子上、地上摊的都是稿纸，我按文章的页码顺序理好，给他放好。那时文章的题目还不是这个题目。姚文元回来后，也没有和我说什么，就说：我的文章呢，马上找出来修改，我把文稿给他找了出来。他这篇文章写的时间很长。文稿写好之后，他又把文章送给写作班，要朱永嘉他们讨论。那时是夏天，大家就坐在阳台上，王知常最活跃，他要大家猜《评“三家村”》是打倒彭真，这篇文章是打倒谁？大家都认为既然是评陶铸的两本书，当然是打倒陶铸了，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了，这时剩下的没有几个人了，都不敢往下猜了。我把讨论的意见写了报告报给姚文元。他们没有好好讨论，我写的报告没有多少内容。¹²

朱永嘉回忆说：

记得在1967年8月间，姚文元通过徐景贤送来《评陶铸的两本书》一稿，要我们专题组讨论一下。我们认真讨论了这篇文章，以为这仅是草稿，文笔写得比较散，像一堆没有串起来的珍珠，又不知道批陶铸的背景是什么，对中央发生的争执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对文章提了一大通不同意见。姚的秘书胡鼎钧在一旁记录，他说：我还以为文章写完了，原来还可以有这样一些问题可讨论。但没过几天，姚文元在一次会议后对我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傻事！事后我们才知道，要写作组讨论这篇文章是毛的指示，而我们完全做反了。我们的意见传到毛那里，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韩非子有一篇《说难》，就讲了这个问题：¹³向君王陈说的难处，并不在于我能够认识事物的道理，也不在乎我把自己的本意辩说清楚，更不在于我敢于毫无顾忌地把个人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向君王陈说的难处，在于了解国君的想法，并适合他的要求。姚文元说我

“干了一件傻事”，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毛的想法，提了一些不能适应他的要求的意见。¹⁴

姚文元的文章讲了这样几层意思，他先说陶铸的两本书：

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196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灵活现地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也像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指控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谓“错误”一样，姚文元对陶铸的“错误”作了排比，加以批判，最后他给陶铸定性：

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

说陶铸所说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精神生活”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感情”是“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三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文章，以文体而论，是典型的“文革体”，都是从具体文章打开缺口，先以势压人，继之以设问论罪，最后给被批判者定性。

9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发表1966年一篇《炮轰陶铸》的大字报时，加按语，其中有云：“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陶斯亮在1978年12月11日发表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中写道：“那是1967年9月8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痛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指陶铸)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的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像是那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¹⁵

需要说明的是，1966年12月底，陶铸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局，不再参加政治局或常委的会议，1967年1月4日被公开打倒。所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写与不写或发表不发表，和打倒陶铸已经没有实际的关系。这篇文章除了肃清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外，还有一个核心目的，即毛泽东在审阅时加的关于“五·一六”的一段话。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又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当时中央高层领导也不摸底，使人猜测以为毛泽东又要开始新的发动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北京就出现了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他们以贯彻这个《通知》为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张贴、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

8月28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稿中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¹⁶这个组织后来很快被清查出来，为首者被公安局逮捕，问题基本解决。毛泽东的这段指示发表后，1968年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而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专题写作组和机关联络站的变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写作班的部分成员又分别成为市革会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这时，写作班就名存实亡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还没有发表，张春桥在上海就看到了样稿，他把朱永嘉找到他的住处兴国宾馆，把戚本禹的文章给他看，说这篇文章很好，你们看看，你们怎么不写文章呢？北京已经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班子写大批判文章，上海也应该集中力量写重点文章。此后，张春桥、姚文元又找徐景贤，专门谈组织人手写大批判文章的事。徐景贤与吴瑞武、朱永嘉商量，以原写作班骨干为基础，重新把写作班子拉起来。4月初，徐景贤将已经分散在市各处的一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了专题写作组，指定吴瑞武为组长，朱永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知常、陈冀德、萧木等，大多数是原写作班的人。从这时开始，原来的写作班经过重建，就叫写作组了。

专题写作组于5月上旬披挂上阵。他们学习毛泽东著述，搜集刘少奇资料，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写出七篇批判文章，称《七评刘少奇》。到7月底，七篇文章已大都写到了两三稿以上，其中一两篇已经成熟，他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杀青”。徐景贤也学北京“两报一刊”的做法，在《七评》发表时，以《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的名义发表。8月9日，《七评》第一篇《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与读者见面。很快传来喜讯，说是“伟大领袖读后认为不错”，要《人民日报》转载。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给刘少奇定的罪名是“篡党”，九年后，“四人帮”垮台，给他们定的罪名也是“篡党”，只不过比刘少奇的罪名多了夺权二字，叫做“篡党夺权”。

专题写作组的《七评》题目是：《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中国议会迷的破产》、《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在这7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中，有五篇由《人民日报》转载。《七评》主要执笔者萧木，经过十四年的牢狱的生活，出狱多年后，以平静的心情写了这样的回忆：

《七评》摆足架势，似乎要对刘少奇来一个全面批判，历经两三个月的日夜苦战，一篇篇文章终于得以见报，还产生了一点影响，特别是还获得了伟大领袖的赞许，那时全组工作人员不免稍稍得意过一阵子的。多年后，将那些泛黄的陈年旧报翻将出来一看，竟是满纸硝烟，且多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不堪卒读。其中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有的失之片面，有的过于绝对，大多经不起推敲。再说对一个已经处于逆境、又被剥夺了答辩权的人还要进行如此“口诛笔伐”，不仅有失公道，也违背道德。¹⁷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毁灭性的烈性炸药，萧木参与写作的《七评刘少奇》只能算迫击炮，两者的影响力不可相比。两文作者虽然都经受牢狱之苦，但在回忆往事时则有不同的感受。前者因得到毛泽东的好评，仍然有着“受宠若惊”的余味，后者虽然是承命而作，虽然也有毛泽东的好评，但却有着“违背道德”的自谴。

造反派掌权之后，张春桥虽对工总司这支队伍的整顿花了很多精力，把他们引向修成“正果”之路；但是他却忽略了在市革会这个权力中心，几个造反派代表人物在权力的角逐上而产生的矛盾。

一月革命以后，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徐景贤、王承龙和王洪文，三人都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以支配他人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威望和优越感。市革会内部许多事件都出自他们三人之间的权力角逐，而每次角逐的胜败都决定于张春桥把砝码压在哪一边。

市革会各部门的掌门人大都是出身于市委机关联络站，即使工总司的核心领导也感到进出市革会的大门不甚方便，认为机关联络站压迫工总司。在市革会七名核心成员中，徐景贤排名第三位，人们称他为“徐老三”，王洪文排在第七名，故被称为“王小七”。1967年4月，王洪文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联合发动市革会内部的群众组织，准备搞第二次夺权，斗争的矛头直指徐景贤和王承龙，这是王洪文为改变“王小七”地位的一次斗争。张春桥知道后，出面干预，私下里把王洪文大训一通，此事才算平息下去。

张春桥对王洪文的“第二次夺权”一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几次讲

话中都若明若暗地提到这件事。他说：

要在任何情况下紧跟毛主席，但是反对上海市革会，真像中央有些混蛋用各个击破方法，反对中央文革一样，但是上海先反对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现在看看不行了，就反对徐景贤，还替徐景贤起了个绰号叫“徐老三”。这是胡说八道，是流氓的语言。上海流行着“你算老几”这句话，这是青红帮才分老九的。《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去的晚才分到一个老九，在提到老九后才是座山雕的人。工人、农民、红卫兵小将算老九，毛主席就依靠这些不出名的干将来搞文化大革命的。当然，徐景贤同志有缺点可以批评，但有些就是别有用心地要把他搞得灰溜溜的，再搞王承龙。最后我与他们接触中，他们谈到这是意气用事，我希望他们是意气用事。¹⁸

张春桥这段话虽长，但态度明确，既支持徐景贤、王承龙，又给“意气用事”的王洪文一个转身的台阶。

第二次的权力之争是1967年“十一·十事件”，其经过是这样的：张春桥刚摆平了王洪文和徐景贤、王承龙的权力之争，接着徐景贤、王承龙之间的权力之争又白热化。他们二人都是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头头，所以人们把他们的权力之争称为“市委机关联络站心脏爆炸”。

专题写作组刚成立的时候，徐景贤就明确了它有两个任务，一是为市革会起草文件和决议，二是专门写一些文章。后来，市革会办公厅成立了办文小组，身为市革会常委的王承龙，分管办公厅的工作，办文小组也就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专题写作组因此就不再担负起草文件、写报告、编情况简报的任务，以致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小，上面布置一件，他们就被动地做一件，没事就闲着，时间久了，便游离在全市中心工作之外了。

情况简报组也设在市革会办公厅，由王承龙直接领导。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本来在专案组工作，但由于她的历史问题，不宜搞专案，就调到了情况简报组，专题写作组也就不好再插手简报工作。王承龙主管办公厅工作，背后又有文静的支持，他和张春桥的联系也就多了，在市革会成了实权人物。权力机构是一个大染缸。许多人原来也许并不坏，但进

入了权力中心以后，人就变了。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都是这样。人一旦成了权力的化身，谁要侵犯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就会像老虎一样吃人。

王承龙动辄训斥同事，得罪人太多，使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对他不满。当时主持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凌岩和王承龙在《支部生活》工作过，并一起造反，对王承龙也有看法。于是他和勤务组商量搞了一个《决议》，称领导干部也应该和普通群众一样，不能有特殊化，要平易近人，接受群众组织的监督；市革会领导成员每月要听取一次市委机关联络站各部门意见。意思很清楚，王承龙虽然进入市革会领导核心，还不能不受造反派内部的制约。王承龙拿到这份《决议》，自然不服，于是跑到王少庸那里告状。王少庸原是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曾一度被打倒，此时已被结合进市革会领导班子，被张春桥指定掌管政法和专案工作。二王对《决议》根本不予理睬。

凌岩见二王对他们不理不睬，就提出召开市委机关联络站整风会议，对结合进市革会的领导成员提意见。通知了王少庸、王承龙，他们也同意参加。但11月10日下午开会时，二王却不到会。凌岩等认为二王故意违背自己的诺言，避开整风会议。其时，二王在上海展览馆开另一个会议。几次联系，不作答复，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就冲进展览馆静坐，找二王质问。双方在现场唇枪舌剑地辩论起来，王少庸、王承龙愤然离去。事后，王承龙把这次事件定名为“十一·十事件”，并定性为“反对市革会事件”。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徐景贤向他汇报这次事件时，他认为王少庸的那伙人态度是有问题的。

市革会内部权力之争的发展，后来甚至连张春桥自己都卷了进去，这是由文静的历史问题引起的。市委机关联络站的核心人物中有一位叫程绮华，本来是市委党校教员，人们称她是徐景贤在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管家婆。文静在专案组搞专案时，市委组织部的人就向程绮华提出文静因历史问题，不宜搞专案。后来文静从专案组调出后，不知从哪里弄出一张程绮华和一个疑似帮会头子陆京土的人在一起拍的照片，就此对程绮华进行审查。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炮轰南京路事件”。当时南京路贴出过一张

大字报，说南京路上商业网点集中，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应该“炮轰南京路”，把南京路上的商业门店分散到全市各地，更好地为全市人民服务。张春桥对这张大字报持反对态度，事件没有发展就被制止了。《文汇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进行了批评。事情虽然平息了，但王洪文、王少庸、王承龙插手此事，提出张六吉是“炮轰南京路”的幕后支持者。张六吉是程绮华的丈夫，黄浦区副区长，曾当过国棉十七厂社教工作队队长，与王洪文发生过矛盾。王少庸、王承龙也想报在上海展览馆被市委机关联络站质问的一箭之仇，于是三王联手把张六吉抓起来立案审查，以此来讨好张春桥。张六吉后来从隔离室逃出，在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结论是“畏罪自杀”。程绮华被审查了很久，发现照片上那个人不是陆京士，最后宣布取消审查，撤销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的职务，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徐景贤的干将程绮华被搞得家破人亡。

写作组的另一位干将郭仁杰是老造反，曾经动员朱永嘉起来造反。他和红革会关系密切，是红革会的顾问。在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之后，郭仁杰也被冷落了起来，后来他又说了些支持联司的话。王承龙为了除掉郭仁杰，就由他控制的游雪涛小组对郭仁杰施以美人计。郭仁杰中了圈套，因此被公安局关了起来。郭仁杰感到丢尽面子，于是在因病住在医院里的时候跳楼自杀。写作组又损失了一员大将。朱永嘉在一月革命中极为活跃，也曾得到张春桥的赏识，但因为他的父亲是资本家，在台湾还有产业，生活费还是在台湾的产业供给的，以后就不让朱永嘉参加核心小组了。吴瑞武因为历史问题，也被王承龙这一派抓住了把柄，成为攻击的对象。

1968年6、7月间，王承龙进一步把目标锁定写作组，由他所掌控的调查组出面给专题写作组贴大字报，说他们在程绮华、郭仁杰的事情上态度不鲜明。王承龙还秘密审查吴瑞武的历史问题。王承龙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写作组的几位干将一个个地整倒。

这时，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总司派出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市革会各组办都有工人进驻。徐景贤的写作组也会有工宣队进来。有王洪文、王承龙联手，准备拿写作组开刀，如果派工宣

队进写作组，势必在写作组引起一场恶战。为了保存这支队伍，避其锋芒，徐景贤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让写作组的人下去参加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写作组解散了。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就风风火火的写作组，这时却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但这并不是它的结尾，过不多久，它仍然卷土重来，而且不战而胜，对王承龙也不手软。

《红旗》组稿小组：专题写作组的复活

张春桥、姚文元虽然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官，但他们还是有些文人情怀，而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还离不开耍笔杆子的人。1968年9月下旬，姚文元来到上海，对徐景贤说上海要有几个人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两人商量决定，立即把朱永嘉、王知常、萧木三人从工宣队召回做这项工作。于是，距专题写作组解散仅一个月的时间，以原来专题写作组的骨干为核心，经过一番披挂武装，成立了《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

起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朱永嘉小组，其组织关系挂在市革会办公室联络组党支部之下，联络组有一间办公室，但不受市革会办公室管辖，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掌控。这时文静正坐镇联络组，和《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一里一外两间办公室，朱永嘉他们进出办公，必须经过文静的办公室。此时，文静和王承龙还是站在一起的，这样的办公室不知是否由王承龙有意安排的。

当时身兼市革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承龙不承认有这个组，因此不让朱永嘉参加市革会的会议。1968年底，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张春桥在上海，看到出席名单中没有朱永嘉，就问王承龙，为什么没有朱永嘉参加？王承龙说：专题写作组已经撤销，朱永嘉就没有名份，没有代表性，所以没叫他参加。张春桥听后大为恼火，厉声责问王承龙：“朱永嘉是《红旗》组稿小组的成员，这就是他的名份，你有什么代表性？”王承龙不得不立即通知朱永嘉参加会议。从那时起，朱永嘉就参加了市革会的一切重要会议。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是碰不得的，写作组也同样是碰不得的。

这个小组的牵头人开始是徐景贤，他不仅审稿，并且在向张、姚报告时，由他领衔署名。但是朱永嘉也不是个书呆子，知道如何在张、姚那里扩大他们的影响。从1969年开始，就逐渐由朱永嘉直接向张、姚送稿写信，姚文元还令徐景贤把朱永嘉、王知常、萧木三人的“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写成单项材料报告，在毛泽东那里备了案之后，由姚文元起草了一个文件，以中央名义发下来，把朱、王、萧正式封为《红旗》上海组稿小组成员。

王承龙是店员出身，虽然在党刊工作过，但他毕竟不懂高层政治生活的规则，加之他拥权而不自重，所以常有越轨行为。毛泽东来上海时，下榻处是绝密的，王承龙得知后，竟然要闯宫见毛，受到警卫人员阻拦后，他不但不退，居然还亮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证。上海的事情，他不向张春桥报告，而是越级直接找康生。这都是犯了大忌。最后张春桥把他踢出市委机关，到下面做基层工作去了。

《红旗》杂志本来是陈伯达当总编辑，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为副总编辑。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陈伯达宣布编辑工作由姚文元、戚本禹帮助他看稿子。1968年初，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姚文元则协助陈伯达管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陈伯达不大喜欢姚文元，他干脆把《红旗》杂志停刊，长达半年之久未出版发行。毛泽东发火了，于是撤去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辑职务，由姚文元接任。姚文元后来说：“陈伯达破坏《红旗》是明显的，半年不出刊。毛主席让我管《红旗》，是夺了陈伯达的权。”¹⁹

姚文元给“《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规定的任务，大致有这样几方面：一、每月每期要给《红旗》输送一至二篇重头文章，二至三篇基层的调查报告或学习体会文章；二、通过这个组，以《红旗》名义，在上海各系统、各单位召开各种座谈会，并要及时地向张、姚书面汇报座谈情况，实际上是为张、姚搜集情报；三、根据张、姚直接布置的题目，起草一些重要文件或专题调查报告；四、协助徐景贤审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的版样，审查大中小学的教材，为张、姚、徐控制上海意识形态领域作参谋；五、以写稿为名，组织理论战线的人员，逐步形成分散性的各种“外围”写作单位，实际上是为张、姚扩大山头而物色写作人材。

上海组稿组给《红旗》的文章，《红旗》编辑不得随意改动，只有核对引文的权力。如有文字上的增删，必须写明一份是“标注稿”，经姚文元审定后才能算数。这是姚文元从接管《红旗》一开始就规定的纪律。这条纪律，表明了他把上海组稿组从来是看作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让这支“嫡系部队”凌驾于《红旗》的一般编辑之上，使人对上海望而生畏，这是他极力控制《红旗》的一个突出标志。

尽管上海组稿组的权力很大，但从控制《红旗》这一角度上说，毕竟京沪之间相隔迢迢千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姚文元极力从上海调人来控制，到了1971年，他自己点了两个人，一个是萧木，一个是胡锡涛。后来萧木去辅导王洪文读书了。

为什么姚文元指名要调萧木和胡锡涛呢？这是他自己考察和上海徐景贤、朱永嘉推荐的结果。调萧木，不仅因为萧木能说会写，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领会领导的意图快而准，而且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姚文元显然是准备把萧木放到《红旗》领导班子中去的。调胡锡涛，主要是因为在1964年姚与周谷城的一场论战中，胡曾为他写过一篇辩护文章，由此被他认为是可信任的人。

《红旗》组稿组干的几件事

从《红旗》组稿组开始，朱永嘉才真正成为张春桥的嫡系部队，张春桥对朱永嘉的信任渐渐地超过了徐景贤。张春桥、姚文元欣赏朱永嘉，说写作组早从参加《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就已经造反了。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刘少奇的反。一月革命时，朱永嘉自告奋勇，以市委机关注联络站的身份，参加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后来张春桥一再夸奖他说：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是不错呀！组建《红旗》组稿组时，有人认为朱永嘉的父亲是资本家，他在复旦大学“表现不好”，但张春桥认为，对朱永嘉个人的出身和情况是了解的，但还是要用。他当着朱永嘉的面说：我们是疑而不用，用而不疑。并宣布朱永嘉是《红旗》组稿组负责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姚进一步重

用朱永嘉了，给他各种名誉和地位，让他当市委委员、市革会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做主席团成员，最后还提拔他当市委列席常委。对于张、姚的提拔和重用，朱永嘉是感恩戴德的，他对张、姚也是知恩必报，更加忠心耿耿，拼死拼活去为他们效劳。

在《红旗》组稿组生存的日子，他们写了不少重点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其中有《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²⁰《谁是历史的创作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署名丁学雷、²¹《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²²《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²³（以上几篇都署名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还有未定稿《机会主义路线的招魂曲——评夏衍的反动电影〈革命家庭〉及其反动的艺术风格》、《评曲波小说〈桥隆飙〉》（该小说为王明路线翻案，美化流寇主义）等。²⁴这些批判，都以姚文元的文章为标准，乱扣帽子，牵强附会，而且是在政治环境不平等的情况下批判，有着文化专制主义色彩，只许我批判你，不准你申辩、反驳。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的一个青年技术员桑伟川，由于不同意丁学雷《评〈上海的早晨〉》一文的观点，写了一篇《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由此大祸临头，在一年半的时间被残酷游斗290余次，被拘留、抄家、逮捕，最后判刑7年。

对桑伟川的批判是张春桥直接策划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写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对资产阶级的各种人物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及心态的描写细致而真实，读者感到可信。1969年，徐景贤以丁学雷的笔名写了《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是在思想领域中夺权的代表作。桑伟川读了以后，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把这部小说一棍子打死，还加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罪名，深感不平，于是就写了《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投给《文汇报》。自1957年反右派之后，凡收到这样的重要文章，都先在《文汇报·内部参考》上发表，试探一下各方面的反应，然后再决定是否发表。9月8日，张春桥在《文汇报·内部参考》上看到桑伟川的文章，决定要以此作为典型，

打一场思想领域夺权斗争的仗。他指示市委写作组，先把桑伟川的文章印出来，发给一批积极分子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他又说，“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看看”。张春桥把一切完全布置好之后，才让《文汇报》发表桑伟川的文章，接下来就是对桑伟川的围攻，当时称之为“桑伟川反革命事件”。

《红旗》组稿组的利剑不只指向中国的权威，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外国的权威。有毛泽东的“不怕权威”的教导，有张春桥、姚文元为他们壮胆，他们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批判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批判世界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笔者问朱永嘉：你们胆子那样大，怎么能批到相对论呢？他说主要是对爱因斯坦世界观进行哲学批判。朱维铮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详见后文）后，就不宜放在《红旗》组稿组，而让他参加批判相对论去了。

《红旗》杂志组稿组不只是组稿、写稿，还编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69年11月14日，张春桥把朱永嘉召去布置编一份关于文革期间各种“反动思潮”的资料供大批判用。张春桥在谈话中列举了一些例子，特把所谓“二月逆流”列为资料的专题之一。于是，经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的策划，由历史组组长吴瑞武具体负责，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各地小报、传单等资料。文革以来各种思潮，如“血统论”、“一切为了九大”等，都在他搜集之列。其中有些思潮都是有所指的，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工作组”、“二月逆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革命经济主义”、“多中心即无中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裂主义”等。有的“思潮”和老一代革命干部挂上了号，直接点了名，初稿中收入了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聂荣臻、乌兰夫等人的讲话共40条。1970年1月，又编出二稿，增收了李先念、徐向前两人的讲话3条。同年2月对二稿再作修改，说“领导上认为编得太庞杂了”，吴瑞武私下透露：“叶剑英、李先念现在是政治局委员，不能再放进去。”于是又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资料简编》（三稿），作为专稿送给张春桥。在这一稿中，仍然收进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人的讲话，计有7条。

《红旗》组稿组不是一般的写作组织，而是官方的，有人称之为“御用组织”，这样说也不算过分。但编这个反动思潮资料，既不是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张春桥的个人行为，他又怎能不成为众矢之的呢？他这样做是极不策略、也是不被允许的，而且打击面太大，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除了毛泽东、江青，他得不到支持。

不放过三十年代

文革开始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阶级敌人，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强调要细致调查、区分矛盾、注意政策，但仍然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其中大批干部受到批判和审查，一些人甚至致死、致残。而上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除了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的清理常规进行外，还有其特殊性，即清理敌伪档案材料，亦即当时所说的“清档”。

1949年之前，作为有着国际大都市背景的上海，不只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可以说是政治中心，因此有着丰富的档案积累。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需要，已经作过一些清理，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体现了它的历史价值。虽然由于只靠档案，也害了一些人，搞了一些冤案，但是都没有遇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局面，各种力量都想要在上海市的档案遗存上做文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1967年2月，张春桥就提出“清查敌伪档案材料”，说是“为中央专案服务”。根据张春桥的意见，1967年11月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敌伪档案清查小组。接着各区、县局、大专院校中凡有敌伪档案的都相继成立了清档组。市革会清档组先后接管查封了市档案馆、公安局、人民法院、民政局等103家单位的敌伪档案，全市抽调了六千多人清查了187万余卷的敌伪档案材料。上海“清档”工作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配合“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各方面收集整理了“诬陷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材料上报中央专案组，为中央“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提供资料。

清查这些档案有几个特点，一、一些干部因当年的工作环境比较复杂，也就使他们的政治历史比较复杂，1949年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一审再审，已经有了结论，这次则要重新立案进行再审查；二、任何档案都有不真实的地方，特别是敌伪档案，当时根据工作需要，制作了一些假档案。对这些档案不经过鉴别真伪，却根据文革审查的要求，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为假案、冤案提供了依据。三、“清档”中要注意“防扩散”。所谓防扩散，即规定凡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人员的有关材料，要进行封存上交，具体内容一字一句不准向外扩散，有的材料要抽出转移，如江青在上海以蓝苹之名演电影《王老五》的文章，演话剧《娜拉》、《赛金花》的剧照，对张春桥的审干材料《关于张春桥入党问题和失掉关系的审查结论》，文静的“叛徒材料”，都抽出来转移到别处。四、“清档”和革命大批判相结合，利用干部的档案材料对其进行大批判。

由于上海在1930年代是中国文化的大本营，无论是历史的或是现实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清档”、“防扩散”的过程中，有关1930年代的人和事，张春桥都特别关注，以致酿成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有电影系统的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上海藏书楼事件案、抗战时期的演剧九队案。

上海是中国电影发源地，有许多电影演员和江青一样，远在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电影活动，以后经过汪伪政权及国民党时期，有些演员仍然活跃在电影银幕上，1949年后他们又参加了新中国的电影工作。在清档工作中，张春桥提出：

“中国电影厂”完全是国民党办的，他们的人都是些有军衔的，演剧队也有军衔，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控制这些人，而到解放时，除了去台湾、香港以外，统统跑到文艺界来了。那时我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周扬、夏衍则利用我们这一点发展了他们的势力，确实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专了我们的政。²⁵

有了张春桥的这个讲话，上海的天马、海燕两家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搞起了一个所谓“清队突击周”，对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轮番作战，日夜进行审查，逼供讯出一个“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

此案涉及到30余人，对其中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分子”的人隔离审查，办“集训班”，胁迫他们交待所谓“历史问题”。电影演员穆宏就是直接由此案被迫害致死；导演应云卫、电影制作人孟君谋在重病中还要接受批判和审查，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而去世。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同样因此案受到残酷迫害，后于1968年11月跳楼自杀身亡。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是1930年代报纸、杂志各种资料集中的地方。上海图书馆管理人员葛正慧就是从该馆藏的孤本《鲁迅先生轶事》中发现当年和鲁迅有过笔墨之争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懂历史的红卫兵在这里发现当年的电影明星蓝苹就是江青。文化大革命初期，叶群先动手指使江腾蛟，派一批干部子弟冒充红卫兵到了上海，从郑君里、赵丹家抄走了一些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有关材料。²⁶ 江青得知此事，经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由吴法宪去上海，抓捕江青历史的知情者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等，还有作家峻青以及江青过去的保姆秦桂贞。这些人中，郑君里、顾而已被迫害致死。这次搜集到的材料送往北京，由周恩来不拆封即转交江青。此后，又由杨成武负责成立专案组，去上海搜集饶漱石、杨帆案的所谓反革命材料，实际上是搜罗江青有关资料。专案组到上海，从警备区特别仓库及徐家汇藏书楼搜集到侦察档案及报刊上有关江青在上海的资料，送往北京，存京西宾馆，后由周恩来下令销毁。从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社会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拥向图书馆查1930年代的资料。

1968年4月，游雪涛小组侦察到北京电影学院及上海红旗（海燕）和东方红（天马）两家电影厂的一些人，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查江青1930年代的资料；上海图书馆也有人将此事告密，张春桥认为：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清档组”遵照张春桥的旨意，进行了所谓“藏书楼问题”的调查，用抄家、拘捕、隔离审查、办封闭式学习班等方式，要查出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反革命集团。查证出“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葛正慧被抄家、隔离审查并拘捕，一关就是5年，直到1975年4月才放出来。图书馆保管部工作人员袁嘉锡因讲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罪证”，被关押3年，精神失常。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主要领导，是抗战时期原演剧九队的地下党。

一月革命夺权后，造反派炮制了《伪演剧九队罪行录》、《演剧九队十一年是如何颠倒历史的》等文章，向全国各地散发，并举办了什么《演剧九队反动历史展览会》，大造舆论。1967年11月9日，江青在中直机关文艺会上点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名，说还是那些老家伙霸占着。1967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的讲话中说：“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样的人，1935年、1936年后就在南京张道藩控制下，演剧九队就通过这样一个手引到国民党去。”²⁷ 张春桥说：“人艺可以办个（国民党）尉官学习班”，要“有多少揪多少”。根据张春桥的讲话，同年12月16日《文汇报》刊登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抗敌演剧九队的反动真面目》一文，并发表了《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的社论。这两篇文章出笼后，在全国各地所有的抗敌演剧队的人都受到打击。数以千计的原演剧队成员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分子”、“文化特务”、“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等。上海因此案而受到“审查”的电影系统有徐桑楚、郑君里等23人，文化系统有18人。²⁸ 仅上海一地在此案中受迫害致死的就有7人，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高重实等。

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这个罪名下，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巴金、贺绿汀、周信芳、袁雪芬、丰子恺等都被批判为“老反革命”、“黑线人物”、“老右派”、“反动权威”，把他们列为“专政对象”，不准写作，不准演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信芳，除了历数他1930年代的罪名，还有他创作演出了《海瑞上疏》一事。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吴晗在《检讨》的注中点了这出戏，彭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海瑞上疏》即是附件之一。当时张春桥就有些紧张，于是他要市委写作组撰文批判《海瑞上疏》以作补救。但这些还不够，以后又对周信芳进行长期的批判，张春桥还亲自决定把周信芳“永远开除出党”。²⁹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

对巴金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类典型。1966年7月20日，巴金陪同亚非作家代表团访问结束，由杭州返回上海。8月10日，参加上海作家协会批判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大会，此时叶已经被迫害身亡。实际上在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已经张贴了一些批判巴金的大字报，其中有一

张大字报是批判他1962年在上海市第二次文化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作家协会还成立了“打巴小组”，并给巴金起了一个绰号叫“黑老K”，其意来自扑克牌，除了A，老K最大。巴金是被加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各种帽子的黑线人物，只能是黑老K了。徐景贤造反掌权之后，从打巴小组整理的各种资料中得知巴金的近况，就在《文汇情况》上批评巴金是黑老K，由此市委写作班文艺组的几个人就写了《彻底批判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把对巴金的批判推向高潮，除了在上海杂技场对他进行专场批斗，其他还有陪斗、游街、隔离审查。除了批判他的讲话，还批判他的作品及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批判他反对样板戏和姚文元。

张维维回忆，张春桥和巴金在工作上多有交往，她读了巴金的书，谈到对巴金的批判，张春桥说巴金是一位文化标志性的人物，批判归批判，还不能没有这样的人物。³⁰有的书中记载，张春桥对巴金的处理曾恶狠狠地说：对于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这话很能表明张春桥对巴金的态度。但是，在巴金故居建立纪念馆时，有关方面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多方查证，却暂时没有找到张春桥此话的出处，所以也没有把它作为一条史料放进巴金纪念馆里。

还有对贺绿汀的批判，也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可谓又猛又狠。但贺绿汀不服输，他始终以辩论者的姿态出现在批判会上，当时人们就称他为“砸不烂的铜豌豆”。

研究一下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就是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在演艺界还属有进步倾向。在文革期间，她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谈过自己的历史，谈了二三个小时，除了谈演戏、写文章，还谈了她和俞启威、唐讷的两次情感纠结，以及当时的文痞要占她的便宜等等。³¹及至后来在公审法庭上，她还答辩：我堂堂正正，有什么可遮掩的。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江青对1930年代的历史有着很矛盾的心情。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自己在政治上已取得很重要的地位，还被捧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害怕这些早已不是新闻的旧闻重提，影响她当旗手的形象，所以极力对了解她这段历史的人进行抄家、关押等政治迫害。但是，一旦她旗手的欲望膨胀起来，就要强烈表明她当旗手不只是

从搞现代京剧开始，而是要上溯到1930年代，那时她就是新文化的旗手了。这种时候，她又会大谈她在1930年代的“革命”历史了。

张春桥也吹捧说：“当时江青在上海，一直受他们迫害好几年。江青失掉党的关系，来上海接关系就是不给接。”³²张春桥实际上和1930年代的上海没有太大的恩怨，无非是以狄克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受到鲁迅的批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不知情的背景下，参加了没有被上级党组织承认的共产党。这件事党组织已经审查清楚并有了结论，并已将《有关张春桥入党问题和失掉关系的审查报告》连同他妻子文静变节自首的档案，转移到安徽黄山上海市档案后库。这些他都是知道的，按理说他不用再害怕，更不用对1930年代有什么仇恨了。然而此时的张春桥还是跟着江青跑，把1930年代的文艺界定为“黑线专政”，鼓吹江青是革命路线的代表，以江青所爱为己所爱，以江青所恨为己所恨。他指示凡有关江青的材料及《清档简报》都不得刊登，发现相关的每一张照片、每一页材料都立刻销毁，堵死所有的口子和泄密的可能性。

张春桥还留了一个心眼，担心江青倒打一耙，为了不引火烧身，但凡从上海发现有关江青的材料，他统统一字不看，原封不动地转送北京，交给江青或周恩来处理。如王承龙从上海革委会被踢出去后，查抄他办公室的人员发现有一袋有关江青的材料未上交，要上交张春桥处理，他拒绝接收。张春桥对和江青之间的利害关系很掌握分寸，从不越雷池一步。包括周恩来，收到江青1930年代的材料，自己绝不开封，而是当着江青的面拆封，并当场销毁。这都是聪明的做法。

也应当看到，江青1930年代的材料，特别是报纸上的文章，也有着许多添油加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的。如当时有的报纸就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说一丈青（江青）嫁了宋江（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江青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类文章。所以，不管青红皂白，只要涉及江青1930年代资料的人，都要加以迫害。江青1930年代资料大多是印刷物，不只是上海图书馆藏有，北京图书馆也有。有一次，戚本禹从北京图书馆收到一批江青1930年代的材料，让文艺组封存以免扩散。他把这事报告给江青，江青反而不高兴，说：为什么要防扩散，我有什么事情可扩散的。后经周恩来签字，把这批材料烧了。后来又有一批从上海收集的有

关江青的旧报刊送交给戚本禹，戚就没有把这件事向江青报告。然而江青是知道这件事的，等了几天也不见戚本禹向她报告，就找到办公室问戚本禹：上海送来的材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还是周恩来把材料交给谢富治烧掉。张春桥告诉戚本禹：你不把这些材料送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张春桥还和戚本禹讲了自己的经验：有些事就说是下面的人干的，你要先保护好自己，这样将来你还有机会可以为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

江青还真的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但她不动声色，请几位秘书看了电影《一仆二主》，还单独请戚本禹看了电影《黑桃皇后》，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想打听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看完电影之后，江青和戚本禹握了握手，拉长声音说：再见！戚本禹明白了，江青是在用这种方式和他告别。后来，1968年1月12日晚，汪东兴通知戚本禹到怀仁堂开会，宣布他请假检讨，以后就把他关进了秦城监狱。戚本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江青怀疑我是不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将来可以投靠别人，真的收集她的材料了。³³

共向东事件

196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上海街头出现了一张题为《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的传单，末尾的署名是共向东。传单中反映了大部分共产党员的特殊心情，说：“党组织活动目前暂不恢复，是由于形势的需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对每个共产党员严峻的党性考验。”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都要想想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否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传单中还向共产党员提出几个怎么办：一、由于受到蒙蔽，思想准备不足，站错队，走错了路怎么办？二、对运动评头论足，消极观望，处在逍遥派地位怎么办？三、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但别人不准，怎么办？四、对运动的事情看不惯，有抵触怀疑，发牢骚怎么办？应该说，这些问题，在当时都代表着不少共产党员的想法。

《公开信》对那些已经参加造反派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批评：挂上一块造反派的红袖章就心满意足了，事事都站在小组织的立场上，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参加打、砸、抢、抓，搞山头主义、风头主义，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些参加造反派的共产党员，争权夺利，打击别人，压制群众，摆威风，讲排场，代步非得有小汽车，生活要求特殊，进出有秘书、保镖，前呼后拥，滋长了只爱听恭维话，听不得一点批评的旧习气，个别人甚至演起了英雄美人的丑剧，生活上开始退化起来！

共向东的传单内容应当是说出了大多数人心里的话。当时党的组织停止活动，党员们不过组织生活，也不交党费，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这些长期被党性束缚的党员，一下没有组织，自己感到像无娘的孩子。共向东的传单得到社会的响应，他们就更加活跃，到处开座谈会，听取共产党员的意见，把座谈会得来的情况又以传单的形式发出去。从1967年6月30日到1967年11月24日，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撰写印发了九种共2,800份署名共向东的传单，进行了四五十次党员学习、讨论活动，并于1967年11月19日，举行了一次有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部分群众参加的“宣传系统部分共产党员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

共向东活动次数如此之多，宣传工作活跃而广泛却没有遭到制止，首先他们也是打着革命造反旗号，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揭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再一点就是他们利用了合法身份，共向东核心人物胡志宏、朱根富、闵孝思、吴敦宏等人，原来都是市委宣传部的人，但他们都没有参加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月革命时，市委宣传部被砸烂，他们就从市委宣传部机关转移到上海革命委员会宣传组，成了朱锡琪的部下。

共向东活动情况传到张春桥的耳朵里，他提出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朱锡琪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送给张春桥。材料送出后第三天，11月24日晚，宣传部造反队即开会要朱根富等交待共向东活动情况。会后，文艺界造反队把胡志宏、朱根富、闵孝思、吴敦宏等人关押在电影制片厂录音棚内，他们被迫接受审查批判，甚至遭到毒打。11月30日，共

向东问题调查小组正式成立，对以上人员进行了逼供讯的审查批判。

1967年12月5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讲话，第一次公开提出共向东的问题，他先讲了支联站的全向东，说：“他那个全向东实际上就是个全向西。”他接着又说：最近呀，又出来一个叫共向东，看到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人书》啊，从那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全部观点，他们的主要政治方向，是资产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方向，是保守的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不过他们的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伪装的，不知道包了几层红纸。要把这几层红纸剥开，剥开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里面资本主义是白的。³⁴

共向东核心人物之一的闵孝思后来说：张春桥1967年12月5日在工代会上的讲话，好像是电台直播的，电影厂里用喇叭播放，我们在隔离的房间里隐约听到张春桥讲共向东，但听不清楚，思想非常紧张。后来，造反派有人到房间里向我们传达，说：你们共向东几个坏头头，是一个反动组织。³⁵

1967年12月10日下午，张春桥在文艺界的会议上，又讲了共向东的问题，他说：共向东我是重视的，但我不赞成说他们有多大力量，像你们说的那样，要么没有，要么一大片，不要夸大他们的作用。比如那时支联站，这也是，那也是，联动也是这样，我就不信。³⁶共向东反映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保守势力活动，一方面是我们工作有缺点，如果老是压呀压呀，这样下去解决了一个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头脑要冷静想想，不能鲁莽从事，首先要考虑我们的问题，光是共向东也没那么多的本事。吴敦宏那个人我认识，他没有这样大本事，但如果是某种思潮代表，能量就大了，你们把工夫花在共向东上，倒不如冷静的思考它的策源地，不能把共向东的问题作为中心，这样我们的大方向就不知哪里去了！³⁷

显然，张春桥重视共向东的事，但也没有把此事看得多么不得了，他在提醒造反派，斗争的矛头还是要指向刘、邓、陈、曹，对准文艺界的田汉、夏衍、周扬。为就此事作一个求证，2013年8月26日，笔者把张春桥这篇讲话的全文复印了给闵孝思。他看后告诉笔者：张春桥讲的

吴敦宏，本来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的秘书，也当过副市长陈其五的秘书，张春桥的秘书不在时，他还暂代过张春桥的秘书。张春桥担任市委文艺部长时，胡志宏在文艺部工作，本来就是张春桥的部下。闵孝思自己是市委宣传部报刊处的，张春桥在《解放日报》任总编辑时，当时的新闻界领导人有个学习组，穆青、魏克明、徐铸成都参加的，张春桥是组长。每当传达文件时，张春桥总是说：“请闵孝思传达文件吧。”张春桥和他们都很熟。闵孝思在8月30日给笔者的回信中还说：“至于你寄给我的张春桥在文艺界出版界代表会上的讲话，我们始终没有听说过。”可以这样判断，关押闵孝思等4人的文艺界造反派没有向他们传达张春桥的这次讲话。闵孝思在信中还说，他们听到的，还是1968年4月4日，张春桥在“积代会”上的讲话的传达，他说：“这次讲到共向东是阶级敌人，使我们思想更加紧张，认为张春桥在给我定性了。”

1968年4月4日，张春桥在上海积代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讲话最后一部分讲到为二月逆流翻案，讲复辟回潮。这样讲了一大段之后，才说：“我们永远记住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管阶级敌人今天叫全向东也好，明天叫共向东也好，后天叫什么反复辟，但是他们所讲的‘东’，统统是西，他们讲‘反复辟’，实际是要复辟。”³⁸分析张春桥整个讲话的语境，其重点应该不在共向东，也没有把共向东定性为阶级敌人。但是徐景贤、王洪文及文艺界的造反派，对张春桥的讲话寻章摘句，把“不管阶级敌人”的话，变成为共向东是阶级敌人。笔者在2013年把张春桥讲话的全文复制送给闵孝思，想听听他读了之后的想法，8月30日，他在给笔者的信中说：看了张春桥的讲话和当时给我们的传达是不一样的。传达时就告诉我们：张春桥已经给我们定性为阶级敌人，是反革命。但读了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并没有把我们往死里整。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因为在1973年结案时，只给我们以党纪处分，并未判刑、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等，给我们以生路。我想当时我们所在单位五七干校，不可能作这样决定，一定是要上面点头才能作这样决定。

事实证明，是徐景贤、王洪文借着张春桥的讲话，把共向东的事情加温升级了。6月10日，徐景贤说：“不能停止对共向东反动思潮的批判和幕后操纵者的追查。”这样下面的人对共向东的迫害也有了进一步

升级。大小会批斗逼供，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们中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当场昏迷；有的被打伤后装进麻袋里，扬言要丢到黄浦江里去或拉到野外枪毙。还有一两个女干部被折磨得流产，或被打得下腹部血肿，还逼着喝冷水。此案上揪下扫，牵连到本市和外省市许多单位，从地方追到军队，从本人追到亲朋好友，许多干部被打成“共向东分子”、“共向东同情分子”、“共向东的黑后台”、“共向东的黑高参”、“不是共向东的共向东”等等。1971年6月，又借清查“五·一六”的机会，由王洪文出面，诬陷共向东是上海十个反革命大案之一，下令继续追查。搞了一年多，搞不出新材料来，1973年7月，专案组写了一份结案报告，报告称：“共向东散布不满情绪，对抗和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文攻武卫’口号进行诬蔑和歪曲”，说朱根富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纠集保守势力，企图搞反夺权”等。报告经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审查，批准同意由有关单位作出“适当处理”。结果，朱根富、胡志宏受到“严重错误”结论和党内警告处分。³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之习气，上面吹一点风，下面就雷雨大作，不但对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样，在共产党内，下级对上级的一点意见也是这样。张春桥对共向东只是借题发挥地作了讲话，徐景贤、王洪文就升温加码，下面的再把徐景贤、王洪文的指示升温加码，这样就酿成了全市性的共向东大事件。

注释

-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89页。
- 2 《清宫秘史》，1948年拍摄于香港的一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戊戌变法前后清光绪帝与珍妃的爱情悲剧。
- 3 俞平伯，作家、红学家。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和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起，被称为建国初期开展的三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是指1950年代中期，为了肃清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发起的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 5 2015年戚本禹写回忆录时和朱永嘉的谈话。
- 6 《戚本禹和朱永嘉谈话》，2007年10月20日，金光耀记录整理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变节自首，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77页。
- 8 罗明路线，1933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人把这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毛泽覃，毛泽东胞弟，时任中共中央苏区秘书长等职。谢唯俊，时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古柏，时任中央劳动部秘书长等职。他们和时任会（昌）、寻（乌）、安（远）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一起，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被严厉批判，后三人均在战斗中牺牲。
- 9 2013年8月5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0 胡耀邦，文革前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等职，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 12 2013年5月13日胡鼎钧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3 韩非子，即韩非，战国时期思想家。
- 14 2013年8月5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5 《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第403页。
- 17 萧木：《尘埃与大地》，未刊打印稿，2011年。
- 18 张春桥：《1967年11月25日谈上海形势》。
- 19 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打印稿。
- 20 丁学雷：《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人民日报》，1969年7月11日。
- 2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谁是历史的创作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红旗》杂志，1969年第9期。《兵临城下》是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以辽沈战役期间解放军围困及解放长春为原型的战争片。
- 2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红旗》杂志，1969年第11期。欧阳山，广东作家。《一代风流》，共五卷，主要讲述主人公周炳等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投身革命斗争的故事。
- 2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红旗》杂志，1970年第4期。
- 24 《革命家庭》，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共产党员家庭进行对敌地下斗争的故事。曲波，山东籍作家。《桥隆飙》讲述草莽英雄桥隆飙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的故事。
- 25 《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印参考资料《首长讲话》，1968年1月。
- 26 江腾蛟，时任空四军政委，后曾参与“571工程”策划密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郑君里，著名导演，电影理论家。赵丹，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 27 《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印参考资料《首长讲话》，1968年1月。张道藩，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 28 徐桑楚，电影事业家，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



- 29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打印稿，第427页。
- 30 2011年5月25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31 俞启威，即黄敬，江青早期的恋人，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58年去世。
- 32 《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印参考资料《首长讲话》，1968年1月。
- 3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 34 1967年12月5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印参考资料《首长讲话》，1968年1月。
- 35 闵孝思2013年8月30日写给笔者的信。
- 36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12月，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多数是高干子弟。
- 37 张春桥：《接见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2月10日。
- 38 张春桥：《在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4月4日。
- 39 闵孝思2013年8月30日写给笔者的信。

第十二章



1968年10月1日张春桥(右)与黄永胜(左)
在天安门城楼

第十三章

“四·一二炮打”和秋后算账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笔者所供职的《文汇报》，在文革中，和张春桥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曾直接引发了“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事情先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简称北办）说起。1949年初，《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等一批编辑记者从香港回来，把《文汇报》重新复刊出版。徐铸成此时雄心勃勃，要把《文汇报》办成世界性的大报，他提出：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他心中很清楚，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政治名流、学术名流都集中在这里，要实现他的办报宗旨，离开北京的支持是不行的。他在北京首先筹办办事处。何况解放前，《文汇报》就设有北京办事处，由副总编辑郭根驻京主持。如今要重新设立，和名流交往，没有名流主持也是不行的。徐铸成便请出著名女记者浦熙修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

浦熙修本是《新民报》记者，无论是在抗战的重庆，或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她都是纵横驰骋、饮誉报坛的人物。在重庆，她和另外一位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共同采访，分头发稿，人们称她们为“双姊妹”。周公馆常有她们的身影，下罗湾留下她们的足迹。在重庆珊瑚机场，身着男装的孔二小姐挽着母亲宋蔼龄走下飞机，身后跟着欢蹦乱跳的洋狗。¹

这个不为接机人注意的镜头，映入浦熙修的眼里，她很快写了《飞机与洋狗》的报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她和众记者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事后在给妹妹浦安修的信中，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她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她常进出重庆周公馆，又因为浦安修嫁给彭德怀，周恩来亲切地喊她“小浦”，邓颖超则说：“你是我家的亲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则喊她“浦二姨”、“浦二姐”。在浦家三姐妹中，她排行老二，大姐浦洁修是化工专家。在南京，她因报道“下关惨案”而遭国民党逮捕入狱。²解放后，毛泽东称她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1957年之初，因为北办引发知识分子的“鸣放”而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称她为“能干的女将”，但正因为如此，又使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从浦熙修到办事处的记者，都打成右派分子，全军覆没。

浦熙修主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只是拜访名家、组稿、写稿，没有写情况的任务。那时的《文汇报》还有些自由精神，独立自主，还没有什么为“上头”服务的“情况”之类内部刊物，任务很单纯，就是办报。

反右派以后，艾玲从《人民日报》调到《文汇报》，任编委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总编辑给北京办事处的任务仍然是组稿、写稿为主职，又增加了写“情况”的任务。那时的“情况”纯粹是为报纸自身服务，供报社领导、编辑、记者工作参考，并不外传。

艾玲回忆说：我出生在广东，当年在街头演出，夏衍看到后就把我介绍到演剧队，所以夏衍是我的老领导，老熟人。从1961、1962年起，我经常到夏衍家去打听文化部领导意图。石西民调到文化部后，我常去他家。我还向周扬、夏衍、钱俊瑞等要求参加文化部部长工作会议。³我想《文汇报》是文化类报纸，多了解些文化界领导意图，是为了办好报纸。陈虞孙很高兴，表扬我说：“只有你能弄到这些情况。”但我是单纯的任务观念，没有自己的东西，能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就心满意足了。

1964年，艾玲和张春桥相识。从此，张春桥直接掌控《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有时直接下达指示。艾玲回忆说：现在想想，北办出问题，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任务改变了，由原来的采写新闻、组织文章，

搞情况三项任务，变成单纯搞情况了，而情况主要是为“上头服务”。这大约是从1964年夏天，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开始，慢慢改变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艾玲认识了张春桥，张是上海带队的，当时陈虞孙要求北办这段时间的工作去问张春桥。艾玲感到在现代戏问题上，中央、上海不一样，中央强调“抢救遗产”，上海是“大写十三年”，报社怎么跟？张春桥则认为就是要不一样。听他的口气，中央那套是不可取的。艾玲立即把这些意图转达给陈虞孙。

江青搞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张春桥就主动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联系了。要《文汇报》宣传，把各方面意见能公开刊载的都见诸报端；不宜公开刊载的，就在《文汇情况》上刊载。江青、张春桥看了这些情况，认为可以为他们所用，就常指令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记者去采访他们所想了解的情况。这应该属于正常工作范围。从这时开始，江青、张春桥对《文汇情况》的关注可以说超过了报纸版面上的公开报道。

《文汇情况》真正为毛泽东、江青、张春桥所重视，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的。艾玲说：“海罢”讨论开始后，北办就完全转向搞情况了。张春桥当时说：凡是赞成姚文元文章的都是左派，凡是反对的都是右派。我问：了解情况是先去找左派，还是先找右派？张春桥回答：“见庙就进，见菩萨就拜。”他还说，我们摸的情况是送给毛主席看的。我就把这些话向北办的人员传达，大家都很高兴，都动足脑筋去搞情况。我当时想：没有情况怎么办好报纸呀。所以认为北办一心一意搞情况是很正常的，是我们应该做的。大家都干得很卖力。我们每天都忙于搞情况，连饭都顾不上吃，常常是吃碗炸酱面就接着干，真紧张啊！⁴

自此以后，上海市委很重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认为是重要信息来源，从这里可以得到官方得不到的消息。陈丕显曾派朱永嘉冒充北办的记者摸情况。张春桥得到上海市委也在利用北办，提供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动态的情况后，他干脆下令北办停止采访活动。

“一月革命”风暴之后，张春桥又主动提出要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采访活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北京办事处的控制，派了市委写作组的朱维铮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坐镇北京办事处，并参加

采访活动，他所得到的情况直接送给张春桥、徐景贤。朱维铮回忆说：毛主席说五大领袖（即北京的学生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不听他的话，他们在那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那时他能了解很多东西，于是毛泽东提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毛泽东讲话之后，张春桥就找了艾玲。⁵

艾玲当时刚“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有功劳，上海一月革命期间担任了《文汇报》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叫她重新恢复北办的工作，并提出工作方针：对北京天派、地派，不介入，不表态。⁶北办恢复后，张春桥管得多，姚文元不大过问。为了加强北办的力量，除《文汇报》派了几个人外，徐景贤又派了市委写作组核心人员朱维铮。朱维铮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可见在徐景贤那里，朱维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朱维铮回忆说：北办重新开始编《文汇情况》，送中央文革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文革的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革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委会，最早只送给由徐景贤指定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8月，王力、关锋出事以后，出了一种“白头”的情况，北京只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艾玲为此很担心地对朱维铮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⁷

炮打风潮在涌动

在一月革命期间，《文汇报》和市委机关联络站是亲密合作的伙伴，上海市革委成立后，《文汇报》又成为张春桥得心应手的工具，怎么会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呢？这里就要谈到朱锡琪了。

朱锡琪，上海松江人，共产党员，原是上海建工局下属一所业余学校教师。1960年柯庆施提出文化单位里要“掺沙子”，朱锡琪被选进报

刊编辑训练班，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文汇报》，在教卫部当体育记者，和笔者一个办公室，那时笔者是卫生记者。评《海瑞罢官》一开始，朱锡琪就被调到总编办公室，专门跑《海瑞》情况，按照张春桥的话是“老造反”了。一月革命前夕，他和邵传烈、周国荣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1月4日接管了《文汇报》，由此引发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朱锡琪被推为公社政宣组组长。2月下旬，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他是常委，又成了革委会政宣组组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朱锡琪作为新闻界造反派的代表成为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组长，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等人同为市革会核心成员。一开始，朱锡琪对张春桥是信服的，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后来，他对张春桥的印象改变了，一是认为张春桥是两面派，二是认为张春桥篡改毛泽东指示，这样的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很危险。

第一个改变印象是从张春桥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关系引起的。前面曾经说过，第二军医大学有红旗、红纵两个群众组织，其中廖政国支持的是红旗，张春桥支持的则是造反派红纵。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红纵在上海滩贴出大字报“揪出上海的陈再道”，矛头是对准廖政国的。廖政国以红纵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为由，写报告给张春桥，要求办红纵学习班，张春桥不同意。红旗获得这一消息后，组织了一百多人到康平路静坐，向张春桥提出抗议。张春桥很生气，说：你不要以为后台硬，我有这个呢（指着身上军装领章），你不承认我这个政委，我还有毛主席支持呢！

再一次是1968年春节，市革委会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张春桥在会上拉着廖政国的手，高呼军民团结的口号。朱锡琪也参加了这个大会。第二天，张春桥在兴国招待所请市革会核心组成员吃饭，喝茅台酒，张春桥几杯酒下肚，说：“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开是开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王洪文认为廖政国是保护陈丕显的铁杆，他把陈丕显保护在青浦军营里，不让群众批斗。张春桥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不站在我们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他们在报纸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

事情要端出来，只能自上而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朱锡琪向报社部分人员介绍这些情况时，说：“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很气愤，张春桥在大会上与廖政国两人举起手来拥军爱民，暗地里却要把他揪出来，这不是两面派吗？”后来他又说：“这一看法的产生与我后来参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有很大关系。”⁸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找交通大学红卫兵杨小兵谈话，谈到搞大联合要哪些条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讲条件嘛，搞无条件大联合。”张春桥把这当作毛泽东最新指示作了传达，《文汇报》负责人之一的周国荣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传达后，于9月25日，《文汇报》结合有关报道，把“无条件大联合”见诸报端。后来，江青在北京发难，不说毛泽东提出的“无条件大联合”不对，而是婉转地说：“上海搞大联合是对的，但是上海搞无条件大联合，北京不是这样，北京是在革命基础上的大联合。”这是话中有话，实际上是批评上海无条件大联合。后来，《人民日报》10月8日发表社论，把“无条件大联合”改为“在革命基础上实行大联合”。朱锡琪说：“这也是‘四·一二’事件中我们反对张春桥的一条重要依据，就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经毛主席审查就私自登出来，造成了原则性错误。后来，我们反对张春桥的‘十个为什么’里面有这一条：要听从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基础上的大联合。”其实，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江青。造反派中炮打张春桥的情绪，总是在猜测中表现出来。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北京军队干部大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处理的决定。⁹中央一些领导人及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连姚文元也出席了，但唯独张春桥缺席没有参加。中央文革专门通知艾玲去参加会议。

3月23日，江苏省革委会成立，3月24日，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张春桥都到会祝贺并讲话；但新华社发表的电讯中，只提张春桥是“上海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这引起人们的怀疑：张春桥遇到了麻烦。而人们不知道，新华社的电讯稿中写了张春桥的这两个头衔，是张春桥在审阅电讯稿时，自己把这两个头衔删去了。

4月1日，二军大红旗在市革会门口、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长征医院刷了大标语，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大家心里都明白，在上海街头贴出这样的横幅，当然是指张春桥。第二天，朱锡琪注意到横幅下面出现了一行毛笔写的小字：“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二军大红纵写的。又过了一天，下面又出现了一行小字：“请长期保留”，是红旗写的。

红旗的大标语使市革会坐不住了。4月3日，召开全市群众组织大会，马天水、王承龙在会上点名批评了红旗，这是保张春桥的。邵传烈参加大会，会后组织稿件时，写了“编者按”，不指名地批评红旗在制造政治谣言，刊载在4月5日《文汇报》上，目的也是保张春桥。

4月9日，市革会举行例会。张春桥走进会议室，一看廖政国坐在那里，还没有开会，就先开腔了：“你们警备区要做工作，二军大红旗到处都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二军大红纵是到处冲，有冲对的，也有冲错的，因此你们要做工作，让这两个组织坐下来谈谈。”廖政国当场发问：“什么冲对冲错，你说说哪一个是冲对的？”张春桥没有直接回答廖政国的发问，就对马天水说：你们不要保我。又对朱锡琪说：你们《文汇报》也不要保我。接着又说，我又不是曹荻秋，要人保干什么？朱锡琪说：“听了张春桥的口气就是这样，讲归讲，其实他还是要人保的。”¹⁰

在会上张春桥还说：这件事惊动了总理，昨天有人到二军大去冲红旗，总理昨天打电话问这件事。朱锡琪认为，在文革中，一个群众组织受到了冲击是家常便饭，又不很严重，总理怎么会知道的？朱锡琪认为红旗有背景，就叫笔者去调查二军大红旗里到底有什么人。笔者当时在《文汇报》是采访医药卫生的记者，对第二军医大学及附属的长海医院、长征医院去的较多，也认识了许多人。笔者了解的结果是，二军大红旗的头头是周恩来的养女龙舒雅。

朱锡琪所经历的这一连串事情，使他不再相信张春桥，产生了炮打的念头。1967年1月28日，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发动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称为“一·二八”事件。在毛泽东、江青的保护下，红革会的炮打行动被压了下去，救了张春桥，但是那股炮打由明处转向暗

处，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狄克就是张春桥”，以及据称是陕西省委霍士廉说的“我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像两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爆炸开来，把张春桥炸得粉身碎骨。

由这个传言又派生出一些别的传言来，如“中央两报一刊的记者在复旦大学开座谈会，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撤职了”、“张春桥已找（毛）主席承认自己有变节行为，主席听了很生气，已经决定撤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这些传言在不断发酵散播。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还不断有不利于张春桥的消息传到编辑部。艾玲的丈夫是总参二部副部长，是专门搞情报的，从他那里传出来消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文件的名单中本来是有张春桥的名字的，现在却没有了。有的记者从中央党校获得的消息说：张春桥是叛徒。北京办事处和朱锡琪、周国荣联络的情况，张春桥似乎有所觉察。在一次会议上，徐景贤问朱锡琪：你们《文汇报》周国荣和北京办事处打得火热，你看怎样？朱锡琪佯装不知，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张春桥说：《文汇报》有成绩，但不要自满，要当心摔跟斗。朱锡琪听了，感到事情严重，回报社后给周国荣说了，研究是谁把北办和编辑部联系的情况向徐景贤报告的。周国荣认为是朱维铮。朱锡琪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办事处周俊全，他外号叫“周大炮”，有什么话都藏不住。

周俊全在电话中说：“反右倾你们要好好搞，啥道理你们现在还不行动？”朱锡琪问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上海出了问题？周俊全压低声音说：“我老实跟你讲，康生那里有个张春桥专案组，外面传说很多，不过你不要跟其他人乱说。”朱锡琪追问清查出张春桥什么问题？周俊全不再多说。朱锡琪又直接问艾玲，艾玲回答得很有意思，她说：“对于张春桥的问题，在中央还没有表态之前，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艾玲的话，朱锡琪与周国荣经过一番议论，认为张春桥还是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¹¹笔者也是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话虽然是传来传去，但也感到张春桥处于四面楚歌中，大家有着共同的心态：都想把张春桥扳倒！

张春桥不是聋子，游雪涛小组早把侦探到的“叛徒”消息传到张春桥的耳朵里。1968年1月3日在市革会常委核心组扩大会上，张春桥说：

“说我是叛徒，我要整人的。说江青保我，那把我们党说成什么了？”2月26日市革会扩大会议，张春桥又说：“反对我是小事，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¹²后来又有一次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张春桥问前来参加会议的同济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最近社会有什么动向。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啊？”然后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再有谁讲这样的话，我就不容了。”但张春桥对自己历史的交底，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开炮

4月初，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召开。4月4日，张春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4月8日，王洪文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朱锡琪根本就没有听，而是在写传单。朱锡琪后来回忆说：所以后来有人说我是两面派，一边在开会，一边写反张春桥的口号。我一共写了十句口号，写的时候确定不点张春桥的名，这也是从“一·二八”事件吸取的经验，但是要上海广大军民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反对张春桥。会后，我将这些口号给周国荣、邵传烈看，周国荣说：“这个战斗队的名字很怪，怎么叫为什么战斗队？”我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每个共产党员做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口号就是提出问题，问几个为什么，让大家来回答。后来报社有个夜班编辑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我马上想到，我怎么连这么大的一件事都没有写上去。

4月10日晚，张春桥拉朱锡琪到家里去吃饭，对朱说他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并表白自己没有坐过牢，不知道坐牢的滋味，暗示朱锡琪不要炮打。¹³其实，张春桥这天晚上请吃饭的不只是朱锡琪一个人，还有市革会核心小组的成员。原来毛泽东要召张春桥回北京，张春桥是想在临行前以吃饭为名，把上海的工作做些安排。参加吃饭的人听张春桥说要回北京汇报工作，都很高兴，频频向他敬酒。朱锡琪不会喝酒，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由于对张的不信任，他首先想到的是张春桥自称回北京，

会不会是放烟幕弹。“三·二四”揪出杨、余、傅那样重要的会议他都没有回去，现在为什么要回去了？他又想起艾玲的那句话“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张春桥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次张春桥回去，中央会不会把他端出来？朱锡琪左想右想，难以确认，但他没有退路，箭已在弦上，只好射出去了。

4月11日，朱锡琪本来打算把他拟定的“十个为什么”在报社内部张贴的。这天中午，他在市革会政宣组把想法说了，当时宣传组的二十多人一听就知道矛头是针对张春桥的，大家情绪激昂，在会上高呼口号：谁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绝没有好下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宣传组的人都是文教系统代表，其所在单位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出版社等，他们回去就在自己的单位贴大字报，朱锡琪回到报社就开始印传单，但他觉得光靠传单还不够，报纸上也应该表个态，会造成全国影响。朱锡琪和邵传烈、周国荣商量，不点张春桥的名，要用正面口号，但让人家看后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是反对张春桥的。

那天晚上，正在印传单时，北办又传来信息，说《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很好，是不是可以转载。朱锡琪把那篇社论拿来看了，社论中明确提出批判二月逆流，说是“有人打着批判极左旗号干了很多坏事”，还提到有“小爬虫”，有“变色龙”，有些用词是周恩来、江青原话。朱锡琪认为这篇社论的矛头是指向上海的，张春桥就是“变色龙”。于是，朱锡琪打电话给徐景贤，说打算转载这篇社论。徐景贤先说可以，但不久又打电话来说，社论不要转载，还是我们自己写一篇吧。朱锡琪认为报社自己写不出这样的社论，还是主张转载，徐景贤则认为这个事情要向张春桥汇报。这么一来，朱锡琪觉得难办了，邵传烈也有些顾虑，认为还是慎重一点，即使张春桥有问题，中央会端出来的。

朱锡琪则认为，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没有自己的反应。我们造反夺权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周国荣也说：像这样的叛徒在毛主席身边行吗？如果中央表态说我们有错误，我们就做铺路石，那样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可以多了一个人。朱锡琪、周国荣的慷慨激昂、准备为炮

打张春桥而献身，是真诚的，这样，邵传烈也就不再坚持。然后他们又拟出四句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实际上表明他们和张春桥划清界线。

4月12日凌晨1时许，徐景贤打电话给报社，说他和张春桥都不同意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但4月12日的《文汇报》，却在第三版上半版用特大黑体字刊出五条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下半版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以及《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¹⁴

报纸开印以后，朱锡琪的心似乎没有沉淀下来，还要去发传单，由于笔者和红旗的一位头头认识，但电话联系不上，于是朱锡琪就率领几个人和笔者，带了一批传单，坐车到二军大给红旗送传单，既表示对红旗的支持，也希望红旗支持这次炮打张春桥。

我们到了二军大后，发现戒备森严，门口有人值班，办公楼前用一长排铁栅栏拦了起来。朱锡琪向值班人员说明来意。二军大红旗出来一个女生，说我们是军队，不跟地方串联，你们的传单我们不收。朱锡琪等只好回报社。途经同济大学，又给同济东方红送去一批传单。同济东方红是支持张春桥的。这时中央还没有表态，整整一个白天，朱锡琪、周国荣、邵传烈都在报社，等候中央文革表态的消息。

早上，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召集核心成员会议，打电话给张春桥说有紧急事情要汇报。得到张的许可后，他与王承龙马上前往张春桥处，徐景贤与马天水不久也赶到兴国路。张春桥此时一副镇定自若、谈笑风生的样子，众人向他汇报炮打动向，王少庸认为，别的都好办，就是有穿军装的刷炮打的大标语，很麻烦。估计是二军大的，还有国防科委的。王少庸建议给姚文元打电话，强调这次炮打有军队背景。姚文元接到电话显得吃惊，说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马上向江青汇报。一刻钟后，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张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谈这件事。”众人听说江青出面保张春

桥，都定心了。但徐景贤觉得只有江青和姚文元出面，力道似乎还嫌不够。他知道，此事由张春桥自己出面不太方便，于是建议是否向毛泽东和中央正式报告上海情况。张春桥没有反对。徐景贤当即起草电报，王少庸再一次关照要突出这次炮打有军队背景。电报起草好后，即让人送机要室火速发出。¹⁵张春桥明确关照：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¹⁶

电报发出后，王洪文匆匆赶来。徐景贤建议他赶快到总工会大楼悬挂大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徐景贤说，这样上海全市人民都可以看到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搞标语战，不搞反击。¹⁷

《文汇报》出版后，全上海都动起来了。南京路和外滩都是人，学生特别多；墙壁上、商店的橱窗上，到处是大标语，内容已经升级，指名道姓地直指张春桥“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等等；张春桥的名字被颠倒写，还被打上大叉叉。但是，复旦去年的那些炮打活跃分子，这次大都没有公开行动。全市各校的红革会头头们，“一·二八炮打”后的挨整还没结束，于是这次作壁上观，不敢贸然行动。南京路上到处是人，贴标语的、看热闹的、辩论的。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被堵在南京路上的车子排成了长队，快到西藏路的第一百货商店门口，公交车完全无法再开动。在南京路上也出现有写张春桥的妻子文静的大字报，揭发她的历史问题，围观的人很多。贴大字报的除了学生，主要是文教系统、上体司、上艺司、出版系统的群众。

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在街上看了大字报，马上赶到东湖招待所，向正在理发的张春桥报告大字报的情况，说：“有的大字报说你是叛徒。”张春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本来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还算不上是什么人物，谁能知道我呀，这次倒是帮我出了大名。”

叛徒问题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四·一二炮打”时目的很明确：揪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一·二八炮打”时，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来源据说出自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之口，“四·一二炮打”时，除了霍士廉的来源，还增加了中央党校的来源，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从那里听到的，但这一消息是谁传递出来的，当时及以后都不清楚。

传闻霍士廉用生命担保张春桥是叛徒，有没有根据呢？我们不妨略述一下霍士廉的经历。霍士廉是山西省忻县人，在中学时代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7年他和张春桥前后到了延安。张春桥去了陕北公学，霍士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霍士廉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就留在陕甘宁工作，张春桥则去了晋察冀边区。1938年，霍士廉随八路军进入山东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十年，1948年到华东局担任秘书处处长。张春桥一直留在晋察冀边区，后来到了石家庄，1949年进入上海，一直工作在上海。张春桥说根本不认识霍士廉，是真实的。后来，霍士廉去了浙江，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一直做到省委书记，1965年10月调往陕西省，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陕西省的干部中，霍士廉“亮相”较早。¹⁸成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时，准备把霍士廉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围绕着霍士廉能不能作为“三结合”干部的问题，造反派和各派组织意见不统一，由争论发展到武斗。为了不让霍士廉受造反派的批斗，解放军21军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把他藏在一个工程学院里。为了缓解陕西紧张局势，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省市委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名单中就有霍士廉。1967年7、8月间，由几个西北工业大学及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在陕西省四大群众组织的配合下，护送霍士廉到潼关，由那里渡黄河，经太原和石家庄到了北京。1970年，霍士廉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和许多省部级干部相比，霍士廉的生活还算

是比较平稳的。如果他真的向红卫兵提供了张春桥是叛徒的信息，张春桥绝不会放过他，早就要找他秋后算账了。何况是经历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庐山会议，张春桥政治地位上升走红的时候，他都没有提到过霍士廉的事。两次炮打时都说是霍士廉提供的信息，根据何在，至今都是一个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笔者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和李根蒂谈起“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之事，他说：霍士廉根本不认识张春桥，而且他为人做事都很慎重，根本不可能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李根蒂是老一辈记者，长笔者十多岁，他和霍士廉是延安党校同学。

据笔者调查，提出张春桥叛徒问题的还是部队系统。前文已表，1967年1月27日晚上，也就是“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前夕，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在上海外滩贴出了“揪出叛徒张春桥！”大幅标语，很快就被覆盖了。谁覆盖的，不得而知。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里的文章还在后面，邱会作有这样一段陈述：

上海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处理不好，小则给自己造成被动，大则要犯政治错误，甚至被打倒。因为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可是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¹⁹

对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周恩来持慎重的态度，以迂回的方式得到这一情况，转呈给毛泽东。邱会作都怕牵涉进去犯政治错误，而朱锡琪则敢用报纸这一工具炮打张春桥，只能表明这是《文汇报》的书生不懂政治，不知利害而产生的无畏行动。

邱会作会不会就是张春桥是叛徒消息的发源地？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就形成红旗和红纵两大派，红旗这个组织中有周恩来的养女龙舒雅，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后台老板是邱会作。红纵是军队中

的造反派，出面的头头是钱信莎。这个组织多次提出要去北京造总后勤部的反，由于受到邱会作的打压而未成。后来，钱信莎在上海找到张春桥，也可能是张春桥认为不便插手军队的事，没有多管，就把钱信莎介绍给江青。钱信莎进京和江青见面，诉说总后勤部对她们的压制，两人抱头痛哭，江青同意红纵进京造反。邱会作不但没有接见，还以养病为名躲到北京西山军事指挥所。红纵坚持要见邱会作，便发生三座门静坐事件。²⁰ 邱会作下山之后即遭到批斗，给他剃“鸳鸯头”，他的肋骨及肌肉断裂。²¹ 所以邱会作说：“1967年1月，红纵在张春桥的建议下，江青批准他们卷土重来，如同受了伤的老虎，特别凶残。”²² 林彪得知邱会作的情况后，下达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邱会作认为是张春桥送狼进京，由此和张春桥结怨。

叙述了邱会作与张春桥的恩怨，我们把话题回到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上来。邱会作是什么时候提出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的？1月21日晚，红纵押邱会作去“观看”一次批斗会；1月23日下午和24日上午，红纵在总司批斗邱会作；1月25日，在林彪、周恩来的保护下邱会作被接走；1月27日，红旗贴出“揪出叛徒张春桥”的大字报。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红旗有没有可能向邱会作提供张春桥是叛徒的信息？或是红旗有没有可能按照邱会作的旨意贴出张春桥是叛徒的大字报？再者，邱会作在西山“养病”期间就已经知道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了吗？张春桥的叛徒问题看似莫须有，实际上是事出有因，可能是由于他的党籍问题引发出来的。

1930年代，张春桥初到上海时，经人介绍参加左联活动。1936年2月，左联宣布解散，张春桥心中茫然起来，未免有些失落。4月底的一天，有一个叫老宋的人突然找到张春桥，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张春桥表示愿意。后来社联的林福生找他谈话，告诉他入党誓词，没几天就在杨树浦一个工人家里举行入党仪式，入党介绍人是吴成志和林福生。²³ 刚入党就让他负责党支部的宣传工作。而张春桥到了延安之后，党组织却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直到1938年8月，经陕北公学党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为半年。

原来张春桥在上海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承

认的党组织。张春桥的入党介绍人吴成志，原名宋振鼎，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到了上海。1936年4、5月间与也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林福生、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他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发现并派吴仲超找宋振鼎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张春桥并不知道实情，所以他到延安之后，还坚持认为自己的党龄是从1936年开始的。张春桥的党龄之争，一直延续到1955年10月，他在担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书记之后，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确认他的党龄从1936年算起。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向宋振鼎作了调查，最终没有同意张春桥的要求，而是维持他的党龄从1938年8月开始的原结论。

可能是由于张春桥曾参加的这个“党组织”是由叛变自首的几个人自己组建的，被中共党组织勒令解散，由此人们推断出张春桥是叛徒。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调查，但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张春桥叛徒问题的注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4月9日下午，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周恩来，他又把埋藏在心底的话告诉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²⁴这应该是周恩来对邓小平的郑重嘱咐，要邓不要放过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

毛泽东：“炮打无事”

4月12日傍晚，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下达三点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张春桥，军队不要卷入；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再传给上海市革会。紧接着，驻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也接到空军的通知，并向学生传达。复旦大学是这次炮打的中心之一，驻校军宣队的这个表态，对复旦的炮打起了阻止作用。接着，警备区和驻沪空军表态，布置下面部队不要参与炮打。²⁵

“一·二八炮打”是江青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下达指示救了张春桥，而“四·一二”炮打，江青为什么逼着李作鹏表态？整个“四·一二炮打”

过程，除了《文汇报》的独立行动外，和社会各种炮打张春桥力量没有发生联系，尤其是军队系统更没有直接联系。江青接到姚文元的汇报后，马上就找李作鹏，表明江青知道这次炮打有军队的背景，她这样做也是逼军队表态，张春桥说：“四·一二炮打”是林彪集团的人搞的，当时（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江青知道有部队的背景，就要叶群出面找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要他们向驻沪三军表态保张春桥。²⁶而文革后披露的史实也印证了“四·一二炮打”是由军队发起的。据时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后来回忆：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就布置秘书郭连凯替她把半年前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话找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张云生回忆了当时叶群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议论张春桥的话：有人反对你。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我不说名字，你也会知道他是谁。又过了一天，叶群在北京毛家湾林彪住所接见了从上海来的江腾蛟，做了长时间密谈。江腾蛟后来派人送到毛家湾一份揭发张春桥问题的材料。叶群亲自作了一些修改，退回江腾蛟重抄了一式两份。这两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了毛泽东，另一份给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后边的这一份，没通过林办保密员发出，而由叶群亲自送到了钓鱼台。这以后，上海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浪潮。尽管叶群遮遮掩掩，张云生还是看出这场闹剧的真正导演在北京。²⁷

但是这个“真正导演”究竟如何具体导演此次炮打，张云生的回忆还是没有说清楚。军队“四·一二炮打”来无影，去无踪，二军大红旗不和地方发生关系，一点也不透露自己的底牌，事后也无人再提此事，更增加了这次炮打的神秘性。

徐景贤接到李作鹏的三点指示后，4月13日通知朱锡琪和邵传烈、周国荣晚上到市革会礼堂开会。徐景贤、马天水、高志荣坐在台上，朱锡琪和《文汇报》的人坐在前排，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²⁸会上，就张春桥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反，徐景贤和朱锡琪展开了辩论。

朱锡琪认为自己站在真理一边，他发言慷慨激昂，话语咄咄逼人，说：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

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

因为有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作底气，还没等朱锡琪把话讲完，徐景贤拍案而起，指责朱锡琪散布谣言，并说明情况是，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时，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其次，张春桥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所以不用中央文革名义；第三，明明知道张春桥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还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还记述朱锡琪到康平路和他辩论的事：

4月12日上午9点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应的。我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

徐景贤接下来生动而具体地描写了一段他和朱锡琪见面的事。可是朱锡琪读后，对笔者说：徐景贤这个人夸夸其谈，本性难改。4月12日这天，他打电话找我，接电话的朱慧珠告诉他朱锡琪不在。我在报社一天，等中央文革表态，未出报社大门，怎么会跑到康平路和他辩论呢？

会议结束，朱锡琪回到报社，工总司已派了四个人在报社门口等他们，宣布代表市革会对朱锡琪、周国荣进行隔离审查，罪行是反对张春桥。朱锡琪和周国荣被关了起来。如此一来，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市革会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接受批判。这样，朱锡琪也就不能领导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而是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市革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此外，《文汇报》也不能再让朱锡琪负责。徐景贤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要邵传烈把《文汇报》类似总编辑的担子挑起来，并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以后，《文汇报》每天版面的定稿情况邵传烈都用机要电话“红机子”向徐景贤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接着，市革会在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徐景贤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还把“四·一二炮打”和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²⁹

正当徐景贤搞清查运动最起劲的时候，张春桥却表态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徐景贤不理解，张春桥的态度为什么来了个急转弯？尽管不理解，对朱锡琪的批判也只能草草收场，暂时停了下来。

对批判《文汇报》“四·一二炮打”急转弯之谜，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才解开。炮打的第二天，张春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其中谈到这次炮打的事，毛泽东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后来，徐景贤到《文汇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朱锡琪、周国荣作了检查后，徐景贤宣布，朱锡琪可以继续工作，由邵传烈主持报社工作。朱锡琪听了感到很突然。会议一结束，邵传烈马上找朱锡琪，让他再听一遍会议录音，然后去见张春桥。朱锡琪回忆说：当时我的确大吃一惊，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因为炮打他了嘛。但也觉得张春桥错误总归是有的，这次肯定是主席保护了他。现在要我去见张春桥，就是要我当面向他赔罪，我感到我没法做到，所以尽管邵传烈车子都准备好了，我还是没去。为此，张春桥气得不得了，有一次在全市万人大会上，他点朱锡琪的名，说：算我眼睛戳瞎，看错了人。

《文汇报》“四·一二炮打”两个多月后，7月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文艺晚会。主要节目是钢琴伴唱《红灯记》，艾玲应邀去参加了。艾玲有段回忆：我进入会场在后排坐下，就听到广播里喊：“京办的艾玲同志请到前排来。”我听成是“军办”的，就坐着没动。一会儿，一个男同志（后来知道是江青的秘书）找到我，说：叫你到前面去怎么还不去？快走吧！我跟着到了前排，江青见了我就跟我

握手，说：“谢谢你了，艾玲同志。”接着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艾玲同志。”这时，周恩来也过来跟我打招呼。我想应该是北办的情况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都看过了，也许曾经由我安排关锋、戚本禹二人到上海，所以才有这么一幕。³⁰

不过，张春桥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1968年11月7日，他下令《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停止业务，通知艾玲和北办的全体人员调回上海，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一年。北办也都搬运到上海。张春桥就此把《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给关闭了。

秋后算账

虽然毛泽东说过“炮打无事”，但在清查“五·一六”及“一打三反”运动中，1967年“一·二八”及1968年“四·一二”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都被列为上海文化大革命以来必须清查的十件大案中的两件重点大案。³¹张春桥不但直接批准了对“两件大案”的参与者的审查，而且对一些人和一些事直接下达过指示。

一、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1968年5月21日，张春桥在一次新闻界座谈会上讲话时，对广播电台施加压力，说：“‘四·一二炮打’时，你们广播台的声音都变了，就差没有点我的名，你们很带劲！”接着，他提了三个“怎么办”：如果有更大风浪，你们怎么办？你们电台如果被敌人占领了，怎么办？发表反革命宣言、传单，你们怎么办？”他说着就站起来责问：“‘四·一二’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你们军代表干什么去了？”“对电台我可不放心！”³²

张春桥对“四·一二”的态度一挑明，朱锡琪就被反反复复“翻烧饼”式的批斗。“四·一二炮打”后，徐景贤宣布他可继续工作，但只当了半年不到的记者，就被下放劳动。在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中，徐因“四·一二炮打”被重新审查，隔离了近十个月，查不出新问题，12月解除隔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³³1971年3月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他知道自己又会面临审查，于是从干校逃走，但到了浙江乍浦就

被揪了回来，又被隔离审查，还是查不出新问题。1972年办案人员打算解除隔离，但张春桥说了句“朱锡琪倒有点像‘五·一六’，不要解除隔离。”于是继续关押，直到1973年8月才被解除隔离，前后共被关押三年多。

“四·一二”之后，在处理艾玲的事情上，不重调查，出尔反尔的表现尤为突出。张春桥与艾玲认识得较早，艾玲接受张春桥的指示也较多，为毛泽东、江青、张春桥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在整个“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中，艾玲除了说张春桥在中央表态之前，“他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外，在当时对张春桥传说纷纭的情况下，艾玲的回答还是得体的，她无法作出力保张春桥的举动。除此之外，艾玲说她本人没有给朱锡琪提供任何情况。但事后，艾玲承担了领导者的责任，向中央文革写了检讨，受到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称赞。毛泽东表态“炮打无事”，虽然如此，艾玲仍被调回上海，送到上柴厂劳动，实际上是对她的审查。1969年，张春桥又突然提出要艾玲当九大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应该是更高层的意见，而不是张春桥个人的决定。

张春桥有没有抓捕艾玲的想法？张春桥坐牢之后，他的妻子文静有一个揭发，其中谈到：

1969年九大的时候，艾玲由于收集情况有功，被安排为九大代表。可是过了不久，有一次江青给张春桥一封“亲拆”的密信，张春桥看后放在抽屉里，我偷偷看了这封信，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把艾玲抓起来！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文静的揭发印证了张春桥和江青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江青依靠张春桥的参谋和支持，张春桥要依赖江青接近毛泽东。但有一点不可忽略，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知道上海市委有个张春桥，并对张表示了欣赏的态度。乃至文革后期，毛泽东不止一次谈话，要张春桥等疏远江青，不要和她搞在一起，这说明毛泽东对张春桥的爱护和欣赏，也不完全是因为江青的关系。

文静的话是否在为张春桥抓艾玲的事作开脱呢？笔者认为不会。整个文革十年，张春桥手里的大事很多，如果要为张春桥开脱，文静可以选择更大的事情为张春桥讲话。她叫丈夫和作为女人的江青“疏远点”，除了政治上的考虑，恐怕也不会没有作为妻子的特殊心态。

张春桥下令抓艾玲应该是执行江青的意思。因为毛泽东已经说话，就不好再以“四·一二炮打事件”为理由，而是认为艾玲和林彪集团中的王维国的关系密切，才抓她的。对此，艾玲有一个回应：

197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一次因大会时间长，中午无法赶回报社吃饭，报社军代表（空四军的）好意劝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食堂吃午饭。我便与军代表一起去了。吃饭时，我们那张小饭桌上，就我和军代表两人，没有第三者。后来此事被人传言成我和驻沪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一起吃饭，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王维国。但是，就由此捕风捉影说我与空四军挂上了钩，继而推论是与林彪集团挂上了钩。于是，张春桥就下令逮捕我。我被逮捕的第二天，一支近20人的专案组前来提审，为首的专案组长高声宣读了对我进行专案审查的决定，然后反复逼我供出与林彪、陈伯达、王维国的关系。开始每周几次，以后则半个月、一个月来一次，最后索性半年、一年几乎都不来一次。与此同时，我的老伴受到株连被关押审查，6个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1975年6月，专案组长拿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批示“艾玲顽固不交待，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交待”，命令我去干校。后来报社的同志同情我，给我办了医生证明，说我有肺炎，才免于去干校，也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监禁。后来，一直到1979年12月，才给我平反结论，里面还有一句话：“犯了路线错误。”我拒绝在上面签名。我的回答是：我搞的情况汇报，毛主席也看了，我不同意说那是江青背着毛主席搞的。如果毛主席错了，我就错了！³⁴

艾玲的自述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

二、算“一·二八炮打”的旧账。1966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复

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都是冲锋在前。1970年2月3日，“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徐景贤等人就找工宣队开会，把复旦大学及上海师范学院列为运动的重点，点了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十几个人的名，声称这些人组成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会上还宣布：这个案子归张春桥直接指挥。2月8日，开始抓与胡守钧有关的人，有一批被他们认为是“胡守钧小集团”的成员，已经毕业分配在外地的人，如邱励欧到乔司农场，中学生红鸥和海鹰已到兰考插队，都还把她们抓回上海。受隔离审查的达四十多人。张春桥说：猴子（胡守钧红卫兵组织名为“孙悟空战斗队”）的问题，六指导员（前文已提及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六位学生指导员）问题，一个一个抓。

听说复旦大学抓了许多人，笔者即前往看个究竟。被抓的人都关在一栋学生宿舍里。1956年笔者刚进复旦时就住在这栋楼，那时为5号楼。这时的学生宿舍5号楼的窗子都焊了钢棒，走廊到楼梯出入的地方也都装上了厚重的铁门，阴森肃杀，就像一座监狱。守门的是两位工宣队员。开始，笔者想进去看看胡守钧，他们不允许，说：我们都怕猴子（胡守钧）从谁的手下跑掉。笔者又提出和邱励欧认识，想进去看看她。两位看守的工宣队员还算好说话，其中一位把笔者带到关邱励欧的房间，他在门口把守。

邱励欧和胡守钧都是复旦物理系的学生，由于他们的组织叫“孙悟空战斗队”，就自称物理系是他们的花果山，在这个小集团里，邱励欧起着官家婆的角色。她会画画，擅长演说辩论，在复旦校园中是出了名的。她的政治抱负是做一名秋瑾式的女性。³⁵她的“自觉地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话，为红卫兵所接受。邱励欧见到笔者，开始时一愣，然后扶了扶眼镜，很镇定地说：你怎么进来了。笔者指指守在门口的工宣队员说，这位师傅陪我进来的。笔者没话找话地问她：你还画画吗？她把压在床单下的画拿出来，是用钢笔画的风景画，画面上有老虎和山羊。笔者表示看懂了她的画。邱励欧胆子很大，一点不避讳，她说：还有谁被抓？他们抓我时，把别人写给我的信都抄走了，其中有何穆的信，不知他们会不会受牵连。……刚说到这里，两位军宣队进来，把笔者赶了出去，还没收了采访笔记本。

第二天，复旦大学军宣队团部打来电话，要笔者去取回笔记本。到了那里，见到军宣队负责人方耀华，他告诉笔者，徐景贤批评他们，可以不让记者采访，但不能没收记者的笔记本。笔者向他提出，报纸工作的需要，还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把笔者带到工宣队团部。工宣队队长张扣发笔者也是认识的，商量的结果，他们同意笔者到工宣队团部看每天的情况汇报。这样，从3月2日开始，笔者就到复旦大学工宣队团部参加他们的汇报会。如今翻开发黄了的采访笔记，还留下了当年听汇报的记录。有的一天可以听到几个汇报，还参加过对清查对象的批判会。

3月16日，批斗会主席张扣发向笔者介绍了这天的斗争对象：核心组三人是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骨干分子十三人，其中有邱励欧所担心的何穆，有从兰考抓回来的红欧（侯美度），还有中文系教师吴中杰，他们称吴为“胡守钧小集团”的谋士，摇羽毛扇的人物。张扣发还介绍了胡、周、邱三人的家庭背景。在笔者的采访笔记中，除了记录被清查红卫兵的思想、言论，还记下了参加专案组工宣队的思想状况。工宣队对“胡守钧小集团”中重要人物都成立专案组。受审查的还有中文系美学教授蒋孔阳，专案组汇报说：他闭口不谈和胡守钧的关系。

市委写作班根据徐景贤的意见，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人处抄来的笔记、信件内容中搞了他们的言论摘录，还在旁加了批语，搞了注释，编印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材料》，认为“胡守钧小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团”，然而笔者当时就认为：经过“一·二八炮打”失败后，他们受到打压，这时又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偏激及对张春桥不满的情绪是有，哪里谈得上什么“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反革命小集团”。这本“小册子”还是经张春桥审定同意后，印刷了近20万册，向全市和全国发放。他们中为首的胡守钧被判处徒刑10年，周谷声、邱励欧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方式的处理。

上海军事科学研究院七〇八所和七一一所以及几所参与炮打事件的高等院校，也都是清查重点。1968年9月，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头头在王秀珍的支持下，于9月4日，带领工宣队在校内对许多人进行非法

搜查和抄家。他们翻箱倒柜，“上天”（捅穿天花板）“入地”（撬开地板），搜查所谓炮打的“黑材料”。张春桥对这次行动大为赞赏，说师院的行动干得好。市革会决定全市大专院校内都要这样搞。王秀珍到复旦大学工、军宣队队部，催促他们尽快行动。然后又赶到市革会一办召开各高校工宣队负责人会议，由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负责人介绍大搜查的“经验”，组织到会人员参观大搜查的“战果”展览会，又布置了9月5日、6日在25所大专院校进行大搜查的所谓“统一革命行动”。

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会议开始时他就说：“了解一下‘师院’（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师院’政史系的情况值得注意，我对这个系很担忧，昨日看了一份材料，一夜没有睡好。怎么革命大批判搞不起来呢？”³⁶张春桥看的那份材料是《文汇报》的简报《上海师院政史系无动于衷，死水一潭》，其中提到“政史系炮打情绪至今没有收敛”等情况，竟使张春桥彻夜未眠。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接连参加对师院政史系教师马洪林的批判会，最终马洪林被打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三、对上海音乐学院旧账新账一起算。在张春桥心中，上海音乐学院有两本账，一本是他和江青在搞样板戏时，上海音乐学院抵制过他们搞革命样板戏音乐，被扣上了炮打的帽子。以后调于会泳为样板戏作曲，又屡遭阻拦。1968年，上海音乐学院有的教师对江青搞的钢琴伴奏《红灯记》提出了不同意见，因而触怒了江青和张春桥。1968年8月5日，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就批评上海音乐学院：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摧毁，而且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两年来一直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有了张春桥定性，上海音乐学院有两位教师被隔离审查，后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另一本账，说该院有一位教师张昆平写诗，向江青、张春桥直接提出了批评，这位教师写的诗被称为“狂诗”。1970年1月13日、14日，张春桥几次谈到上海音乐学院，说：音乐学院本身就是炮打大本营，是革命样板戏的对立面，你们可以准备材料，抓几个，才能引起震动。1月15日，张昆平第一个被作为“五一六”分子被抓起来，经批斗，最后被逼疯。张春桥给音乐学院算的两笔账，使一批干部、师生被隔离审查，有的被逼死，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留有后遗症。

以权谋稿，贪天之功

对“四·一二炮打事件”，毛泽东虽然说过“炮打无事”，但此时身居上海最高领导地位的张春桥能放过《文汇报》吗？此时，《文汇报》造反派的三位领导人中，朱锡琪、周国荣都已离开报社领导岗位，只有邵传烈还在苦苦地支撑着，岌岌可危，不知哪一天也会落到和朱、周同样的命运。外界也普遍认为《文汇报》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搞不出能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文章了。如果毛泽东对《文汇报》失去兴趣，不能发挥他手中一颗棋子的作用，张春桥收拾《文汇报》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在邵传烈的主持下，《文汇报》于“四·一二炮打事件”过去三个月后，记者连续写了三个有关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使《文汇报》又重新回到毛泽东视线范围之内，也加重了张春桥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

1968年，采访部工业组记者方永南写了一篇《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队伍的情况和问题》的内部参考，发表在7月9日出的第172期《文汇报情况》上。方永南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曾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做中国留学生辅导员，因为算是吃过洋面包，所以大家都喊他“方面包”。这篇稿件对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作了分析：文化大革命前，留用的老年技术人员、“专家”、“权威”，在厂里“走资派”的包庇重用下，长期窃居工厂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设计师、研究所所长、主任、科长、组长等技术部门的领导职务，掌握工厂各级技术大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专家”的威风扫地已尽，相当一部分人在政治上被搞臭了。原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中“不吃香”的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青年技术员、革命干部掌握了技术大权，并成为科研的主人。1968年1月至4月，“三结合”战斗队搞出的新产品超过1966年的总和，现在是“三结合”战斗队采取集体领导来代替“权威”审批制。

由于有了这样的分析，结论是：老的专家、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不如从工厂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员。前者思想问题多，实际工作能力差；后者思想问题少，实际工作能力强。有两个年龄相同的技术员可为例证：一个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当了三年研究生，

接着又去苏联学习三年，取得副博士学位，1962年开始在机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在科研中没有突出成绩。另一个是从14岁开始当学徒，18岁由组织上保送到上海机械学院学习四年，1956年在磨床研究所任技术员，今年10月份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完成了一台超国际水平，我国军事工业急需的M7150A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大型平面磨床的空白。

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一直不满，耿耿于怀。自1964年以来，和毛远新、王海容谈话，对中国现行的教育提出了批评，应该说他是抓住了中国教育制度的要害，也一直在寻找解决的办法。³⁷《文汇报》这份内部情况恰好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典型，他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此事可作公开报道。但是，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张、姚并没有直接通知《文汇报》，而是先通知新华社上海分社，由他们再通知《文汇报》，两家新闻单位合作写一个调查报告。很清楚，《文汇报》三个月前的“四·一二炮打”在张春桥心中留下了阴影，他不想让《文汇报》再在毛泽东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上海机床厂的事件，谈了教育革命问题。

调查报告写成之后，署名“新华社记者、文汇报记者”，这样就把《文汇报》的作用降为次要地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看了新华社记者、文汇报记者署名的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后，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根据你的指示，我们组织新华社记者、文汇报记者就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加了一个编者按，引用了你的最新指示。现送上，请审阅、修改、批示！”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的最新指示原文是：“理工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择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篇调查报告及编者按于7月22日刊发于《人民日报》，《文汇报》作了转载。由于毛泽东定稿是7月21日，故把这个指示称之为“七·二一指示”。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中讲到的那位搞平面磨床的工人技术人员，就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经上海机械学院四年的培养又回到生产实践中的典型人物。《文汇报》负责人邵传烈凭自己的新闻敏感，立即派记者王鹤富、夏振飞去上海机械学院作采访调查，了解这所学校是怎样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写出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大学的教育革命》。这个调查报告介绍了机械学院的前身是上海机械专科学校，1952年创办，为了从劳动中培养技术人才，第一届招收学生2,181名。调查报告认为工农学员有三大优点：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学以致用。这个调查报告还讲了在办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如何走机床厂道路一节中，讲了原有的教师“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写成，也是首先在《文汇报》刊出的。本来，《文汇报》可以直送到毛泽东那里，但被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后扣压了下来，没有直送到毛泽东，只是让朱永嘉的市委写作班在文字上作一些修改，连《文汇报》的名字也从调查报告中消失了，瞒天过海，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直送到毛泽东那里。这样，《文汇报》就不会给毛泽东留下任何印象。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语中，提出对解放后培养出的知识分子，“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对旧知识分子，“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文汇报》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却不能以《文汇报》的名义发表，只好加以转载。张春桥不愿让《文汇报》给毛泽东留下印象的第三件事，就是农村医疗卫生的调查，写出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个调查报告是《文汇报》记者吴振标写的，写了一个乡村医生从上海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在上海郊区江镇公社卫生院行医，同时为农村培养“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就是生产大队的卫生员，一边种地，一边给农民治疗一些小毛小病，兼管农村卫生。“赤脚医生”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就有了。后来，毛泽东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时，上海已派了

名医专家下乡巡回医疗，有的医生下放到县级医院或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有的大医院在农村办了分院，以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和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一样，在《文汇报情况》刊登以后，也没有直接送给毛泽东，又被张春桥扣压下来，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又是极为欣赏，将原题修改成现在的题目，还写了一段按语：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那个医生。³⁸

这篇调查报告，也先由《红旗》杂志发表，然后由《文汇报》转载。在处理《文汇报》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张春桥的两手，《文汇报》是他手中的玩偶，需要用时，他对《文汇报》表现出关心或几分温情，不用时则弃之如敝屣，一旦得罪了他，则对《文汇报》大开杀戒。

具体实例，前文已经多有叙述，而从《文汇报》的两位正副总编辑陈虞孙、陆灏在文革中的遭遇，也能看出些端倪。1965年在《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可是到1966年6月，批判《海瑞罢官》告一段落，文化大革命正式登台，向深入发展的时候，张春桥在上海首先抛出的就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陈虞孙原是中共地下党，曾一度脱党，但他既不是叛徒，也不是变节自首分子。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陈虞孙任副总编辑；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部长，陈虞孙是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虞孙任《文汇报》总编辑。在两个人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尽管张春桥对陈虞孙有不少批评，陈虞孙一次又一次的作检讨，但他仍真诚地在张春桥指挥下，为批判《海瑞罢官》立下了功劳。即使如此，陈虞孙还是成了上海最早被张春桥抛出来的党政干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对《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的态度。

1966年，总编辑陈虞孙被张春桥抛出之后，副总编辑陆灏也不能工作了。张春桥把上海的干部分成搞工作的“小班子”及接受审查的“大班子”，陆灏被编进大班子，送到五七干校劳动。陆灏历史清白，工作能力强，《文汇报》造反派最早想“解放”的就是他，并要把他结合到领导班子中，让他主持报纸工作。写了报告上报给上海市革委会，迟迟得不到批复。后来，张春桥只在口头上对朱锡琪说：陆灏这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报复性很强，你们把他结合了，他会打击报复，你们会吃亏的。结果是最后把他赶出《文汇报》，安排到《解放日报》任办公室主任。

1976年张春桥被捕后，陆灏才回到《文汇报》。笔者在写《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时，请他谈谈批判《海瑞罢官》的事，他很有感慨地说：“受骗上当，被人利用，那是犯罪，有什么好谈的。”他始终没有和笔者谈及此事。后来，笔者问他：“你和张春桥有什么过节，他为什么不放过你？”陆灏说：“在上海新闻界，当年在《晋察冀日报》工作，又是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我是唯一的人。对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的情况及文静的历史，我有些了解。”说罢，只是淡然一笑，就不再多说什么。张春桥和江青一样，很不喜欢了解他过去历史的人。

拔旗

毛泽东借助《文汇报》的三篇调查报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政策。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提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工农兵中选择学生；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赤脚医生调查报告提出了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进行再教育。这几篇调查报告都是围绕教育改革、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的，体现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态度。但在当时，却是作为重大政策问题提出来的。这些调查报告虽然都是《文汇报》首创，但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提高了的是《红旗》杂志的声誉。此时毛泽东已经把宣传的大权由陈伯达转到张春桥、姚文元手中，由姚文元分管《人民日报》、新华社，还代替了陈伯达《红旗》杂

志总编辑的职务。这样做也是对二人的大力支持。

张春桥以前说陈丕显摘桃子，实际上他这次自己也是在摘桃子。《文汇报》的三个调查报告既未经他授意，也没有向他请示汇报，都是记者自发而为。先写了情况，毛泽东看到以后，《文汇报》记者深入采访加工，然后张春桥就把桃子摘去，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送到毛泽东那里，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再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三个调查报告虽然是代表着左的思潮，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为知识分子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上海机床厂、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开启了大学招生之门，使许多青年可以上大学；“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以及给出路的政策，使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境况有所改善。

在看到《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后，毛泽东曾经将调查报告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辑按语：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干部的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属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³⁹

张春桥在《文汇报》的调查报告上尝到了甜头以后，他才要上海市委写作班朱永嘉组织专人搞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1968年8月29日，由张春桥亲自写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于8月31日又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长长的按语，但

是这一篇调查报告及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却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9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真可谓春风得意。三个调查报告为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争了光，为了贯彻毛泽东为三个调查报告所作的一系列批示，对上海高等学校如何走机床厂道路也作了调查和布置。从此，张春桥似乎成了教育革命的权威，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总结一年来理工科学校教育革命的经验。参加座谈会的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五七公社、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校、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上海市的领导马天水、徐景贤和写作班的朱永嘉都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主持会议，张春桥在会中不断插话。张春桥提出招生问题：将来各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样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生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师，会碰到什么问题？学员进来以后怎么办？张春桥还提出，学生招进来，如何保证他们思想不受资产阶级的侵袭。1958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一个工人班，学下来思想变了。谈到用实践经验编教材问题，张春桥提出：还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经得住经不住。

座谈会结束后，由朱永嘉整理成《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张春桥指示朱永嘉，座谈会有些发言可以发表，这样《自然辩证法》杂志就应运而生。这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班办的第一个杂志。此后，姚文元又将这个《纪要》和清华大学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两份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审阅之后加了批示：两件均阅，很好。经过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与春桥同志商定。

张春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先在上海复旦大学搞了文科招生试点班，积累经验。文科试点班通过下乡、下厂、到基层单位为阶级斗争服务，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市委写作班以复旦大学党委名义写了《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

的调查报告》，刊发在1971年第六期《红旗》杂志上。

这样就有了1971年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1年4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一直到7月31日才告结束，可谓是一次马拉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8所高等学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代表共631人。会议结束后，由迟群执笔起草《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周恩来委托张春桥修改。⁴⁰

朱永嘉告诉笔者：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争论的焦点是“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为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永嘉、萧木、欧阳靖在复旦大学搞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⁴¹但是当时在复旦大学支左的空四军方耀华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教育战线是红线专政。但他们在报告中仍然写着是黑线专政。写作组的朱惠民带着这份报告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对黑线专政还是红线专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周恩来让张春桥修改。可能是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影响，这份《纪要》借用了“十七年文艺界黑线专政”的说法，吸收了上海调查中的观点，并没有改掉“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实行反革命专政”的说法，而是写到了第一部分中去。张春桥对这个《纪要》的估价是：“把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的旗子拔掉了！”⁴²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及“七·二一指示”是遥相呼应的，前者提出了他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后者是为了培养与他的理想社会相适应的人才。⁴³而这条培养途径就是通过“七·二一”式的大学。按照《圣经》教义的说法，上帝只是创造了人，而毛泽东超过了上帝，要创造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为了给那个理想的社会以生命活力，没有人是不行的，在他看来，上帝创造的人对他的理想社会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加以改造，把他们重塑成新的人。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毛泽东则是改造了人。张春桥的“拔旗”是实施毛泽东理想的第一步。

对毛泽东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建立他的理想社会，林彪是不支持的。关于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毛主席为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总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另外，林彪看

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这个公事之外，还有些私虑。他要按照他的理想行事，让人民解放军为其服务时，林总就消极怠工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背离了原来反修防修的宗旨。”⁴⁴

注释

- 1 孔二小姐，即孔令俊，又名孔令伟，为民国时期财政部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的次女。为人嚣张跋扈，屡生事端，经常成为各报报道的对象。
- 2 下关惨案，1946年6月，上海部分民间和学生团体为反对内战，联合发起组成上海和平请愿团，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当天上海各界群众及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即被预伏的大批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被打伤住院，酿成了下关惨案。
- 3 钱俊瑞，经济学家，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 4 艾玲谈话摘自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7页。
- 5 朱维铮口述、金光耀整理：《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炎黄春秋》，2013年第四期，第21页。
- 6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第549页。
- 7 朱维铮口述、金光耀整理：《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8 2013年11月，笔者和朱永嘉、胡鼎钧、金光耀去淮安拜访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他回忆朱锡琪说的张春桥请客吃饭及在饭桌上说的话，绝对是没有的事。
- 9 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余、傅三人一起，被以“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冲击中央文革”等罪名被处理免职，称为“杨、余、傅事件”。
- 10 朱锡琪口述，金光耀、金大陆访谈，孙路遥整理：《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九期，第55页。
- 11 同上，第54页。
- 1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287页。
- 13 同上，第290页。
- 14 “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如下：

1.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2. 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
3. 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永远紧跟毛主席司令部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4. 坚决打击右倾翻案风！打击右倾保守主义！打击右倾投降主义！
5. 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致敬！向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致敬！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
6. 二军大红旗、红纵都是革命派组织，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把红旗打成反革命就是错了！
7. 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坚决打倒杨、余、傅！誓死揪出黑后台！
8. 坚决打击阴谋家！坚决打倒个人野心家！坚决打倒一切反革命两派！
9. 妄图分裂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誓同一切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血战到底！
10.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的胜利成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4月11日

- 15 徐景贤1978年7月6日供词。
- 16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第144页。
- 17 同上，第144页。
- 18 “亮相”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用语，指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检讨自己的错误，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19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635页。
- 20 三座门静坐事件，三座门三号是全军文革办公室所在地，1967年1月29日，由红纵领头，总后各造反派组织派人到此处静坐，以对全军文革，实质是对中央军委施加压力，坚持要揪出邱会作。
- 21 文革初期，有的造反组织把被审查对象的头发剃去一半、留一半，称之为鸳鸯头。

- 2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501页。
- 23 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简称，是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团体，1936年宣布解散。
- 24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但《周恩来年谱》中1973年4月9日记载：“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未记谈话内容。
- 25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
- 2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293页。
- 27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 28 高志荣，时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文革中参加解放军部队上海市支左，任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
- 29 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事件”，指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的，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
- 30 艾玲口述、洪小文整理：《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炎黄春秋》，2011年第九期。
- 31 “一打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重心在于“打”。
- 3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297页。
- 33 五七干校，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以及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 34 艾玲口述、洪小文整理：《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35 秋瑾，著名女烈士，1907年因发动反清起义失败而被捕遇害。
- 3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1页。
- 37 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在外语学院进修英语，此时在外交部办公厅秘书组工作。文革后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7页。
- 39 同上，第550—551页。
- 40 迟群，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41 欧阳靖，时为复旦大学校革委会委员。

- 42 2003年4月19日朱永嘉和笔者谈教育革命。
- 43 “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后来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成为文革中办学的方针。
- 44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577页。

第十四章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投票现场(左起: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第十四章

九大前后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按照毛泽东的计划：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这一年应是扫尾，从大乱达到大治。但是事情并不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他认为打倒刘少奇，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是大局，其他都是小局，所以他希望以“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江青认为这样不行：进行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怎么能无原则地实现大联合呢？她利用毛泽东的影响，并征得毛泽东同意，改为“革命大联合”。这样，为谁是革命谁是不革命的问题，内战重起。造反派的双方都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不革命的，要联合必须对方举手投降，结果北京各大学武斗从3月一直打到7月，打了一百多天，对全国影响很大。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首都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髦的说法是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徒步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

这天上午9时，当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竟然向工人们开了枪。工宣队和军宣队本想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没想到此时政治失灵，蒯司令的团派要血战到底，导致工人死伤众多。消息传到

毛泽东那里，使他有所震动。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学生造反派领袖，提出要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蒯大富迟迟不敢露面，直到7点多钟才来。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就恸哭不已。江青也掉了泪。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装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¹他提出四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走”是指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到地方去）；四、继续打下去。²聂元梓等五人整理记录。然后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³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缴收枪支，抓捕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工作走上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因为有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反抗，进驻十分顺利。清华、北大的局势稳定了，8月底，工宣队进驻北京59所大专院校。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等上层建筑领域，和当年刘少奇派工作队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人员的成份不一样。仅仅两年时间，毛泽东发现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行了，于是又回到以往的老传统——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

毛泽东在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同时，让姚文元起草了一篇文章，文章原题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经毛泽东三次审阅和修改，将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姚文元的署名。这时停刊半年多的《红旗》杂志正准备复刊，毛泽东在8月23日审阅时批示说：“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⁴

姚文元在8月22日送审稿中写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写下了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

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⁵

毛泽东认为学校的斗、批、改，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不行，在现实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毛泽东在文章中加了一段：“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⁶工宣队进入教育领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然而单是这一命题就无法成立。因为它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向来的政治主张：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

张春桥就不大相信工人阶级能领导一切。笔者所在的上海《文汇报》及其他新闻单位也都进驻了工人宣传队，张春桥对报社的领导及工宣队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工宣队进驻报社，只能管运动，不能插手业务。报纸工作人员编报，写稿，开始时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还坐在旁边，时间长了也感到无趣，平时就不进办公室了。只有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时，才来实践“领导一切”的任务。

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并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斗、批、改”，而是执行了“斗、批、走”的方案。1968年12月，凡是到毕业期限的大学生，不是反革命，不是凶手的一律分配工作，分配方向是边疆、基层、农村、工厂，名曰“四个面向”。中学毕业生则是“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他们年龄最大的21、22岁，最小的才14、15岁，还不到法定的劳动年龄。

纵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先有“五七指示”，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旨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扫除通往理想社会的障碍。这其中就包括对干部的改造，即在思想领域中的夺权。接下来就是培养新一代的问题，高等教育是出人才的关口，要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办学的道路，要改造塑造新一代，只是办“七·二一”式大学还不够，这样“上山下乡”运动就随机而生，并给这一运动

披上了神圣纯洁的光环：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煅练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其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1950年代就是新鲜事物了，到1960年代也出现了知识青年的典型，不过那时的目标只是做社会主义新农民。在“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环笼罩下，毛泽东还在知识青年的脖子上套了一个时髦的枷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了再教育这一条，到农村去的接班人的命运还是要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不能因为是接班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在毛泽东的这个理想目标下，带来的实际效果，一是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学生赶到农村去，学校安静了，否则文革结束无期；二是社会效应，缓解知识青年升学就业的矛盾。对毛泽东倡导的上山下乡的目的，如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毛泽东平稳地实现了结束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部署。从此，红卫兵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他们从理想的天国，坠落在贫穷而坚实的土地上；从打倒别人的革命者，变为被改造的对象；以前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则是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改善和适应陌生而艰苦的生存条件而斗争。

新党章修改“一手包办”

1967年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一份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电报。24日，毛泽东审阅时对“可否恢复党的生活”一句话批注：“应当这样做。”26日，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份简要的资料，送给中

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却批评了张春桥的做法。27日，陈伯达起草的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的名义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繁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⁷

陈伯达起草的这份检讨报告，实际上是对张春桥的批评，这个批评对张春桥来说是很严重的。但毛泽东并没作更多的追究，只是把文革小组拟发给青海的稿件做了修改，题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请示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说：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⁸

张春桥后来解释说，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指由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不能像以前那样，乱七八糟的人都能入党。这样，党组织才能“朝气蓬勃”地领导群众与走资派进行战斗。否则，你不斗他，他就要来斗你。

1967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通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上海起草一个九大党章草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领导的一个修改党章小组，其中具体执笔修改的有邵传烈、赵元三、萧木等七八人，11月25日正式开始工作。市革会还抽调二百多人，在党章修改小组的领导下，组成40个调查组，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党章修改小组，这40个党章修改小组拿出了40个九大党章修改方案。另外由驻沪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些单位，发动群众，又提出了70多个党章修改方案。这样仅上海市党章修改小组就收到一百多个党章修改方案。

修改党章工作从组织发动到写作过程中，张春桥作了多次讲话。他说，七大党章是刘少奇搞的，八大党章是邓小平主持起草。九大党章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章。所谓修改党章就是对八大党章进行修改，张春桥认为，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原来的党纲该批判的批判，该保留的保留，但都必须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改。

在修改党章时，张春桥还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一、党究竟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代替？⁹二、党委、区委、市委要不要？将来要不要党支部的名称？建立了支部、车间革委会怎么办？厂要不要党委？¹⁰三、工会可以发号施令嘛，党组织不执行是错的，工会要对党组织起监督作用。¹¹

1968年1月4日，上海市党章修改小组办公室下发了《上海对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问题的意见》。从此，上海的整党工作全面铺开，张春桥亲自抓这项工作。在整党过程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党要改造（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要整顿、改造，有的甚至要重建）、群众整党（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组织恢复建立，以及发展新党员，都须经过群众的讨论同意）、群众评议和革命大批判相结合（群众评议不能和和平平，不痛不痒，要提倡斗争哲学，大批判要紧紧贯穿整个整党工作的始终）。

在整党过程中，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张春桥、姚文元，却把知识分子党员看作异己力量，认为他们没有一个够得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即使不是九类分子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死气沉沉的，经教育也不会有多大转变，完全是“二氧化碳党员”，对这种人，应大量劝退，少数开除。¹²于是，知识分子党员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必须在造反派面前三番五次地斗私批修，深挖思想根源，端正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许多党员过不了群众评议这一关，有的被作为“废料”清除出党，有的被“挂起来”，暂缓恢复组织生活，有的受到其他各种党纪处分。

对修改党章的内容，张春桥提出四点要求，强调新党章要“具有世界意义”；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提供“法律依据”；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会以多种形式出现；经济上要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按照张春桥这样的

要求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的只能是左倾路线，而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

在新修改的党章中，林彪作为接班人被明确写进了去。这究竟是谁决定的？据当年参加过党章修改小组的萧木对笔者说：“修改稿从初稿开始，就写上了林彪名字的，后来一直没有改动过。当然这样大的大事，我们具体执笔的七八个‘小八蜡子’是不敢自作主张的。我们的根据有两条，一条来自群众，还有一条更权威，来自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那时无论萧木他们到基层去开座谈会，还是下面40个调查组上报给市革会的材料，以及后来完成的修改稿，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九大意见的通报》第一条就提出：“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份《通报》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上报，毛泽东修改、审定，然后发向全国。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同年9月24日与周恩来等人讨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时，就已明确表态：“接班人当然是林彪。”¹³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把上海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删改了多处，其中就“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上海提出的修改党章完成后，上报中央党章修改小组。1968年3月间中央碰头会议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为修改党章起草小组。所以邱会作说：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上海帮一手包办的。1968年9月间，张春桥在北京主持新党章座谈会。他在会上介绍，大家看到的新党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体创作。完稿后，又在群众中广泛地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这个稿子。九大新起草的党章只有三千多字，恐怕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短的党章。

林彪看到新修改的党章草稿中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甚为吃惊。在新党章提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

论之前，林彪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赞成写入的呼声一边倒。¹⁴新党章修改小组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议讨论之后，将新党章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关于修改党章的事，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还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¹⁵

看来，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此时都是赞成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的，他们还不知道林彪系统有一个“反江青俱乐部”呢。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但林彪还是没有接受。对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¹⁶还是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到接班人问题时，他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本来，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提法又恰出现在毛和刘少奇的斗争期间，明显是针对刘的，同时也是对新的接班人提出的警告。刘少奇被彻底打倒，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到此围绕接班人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林彪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并不是他谦逊，而是担心接班人的命运也会像历史上的太子废立一样，

今天被立为太子，说不定过几天就被废了。林彪研究过中国王朝政变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更为现实的是刘少奇不也是作为法定的接班人吗，结果还是被培养他的人打倒。

为了九大，苦心经营

张春桥向来是以严肃、严格闻名的。在整党中他对原来的党员花了那样大的气力，提出了那么多的严格要求，是不是从纯洁党的队伍出发？可是在九大前后，各级党组织恢复了活动，从发展造反派入党事情来看，他又不完全是这样。

以前的党章规定，吸收新党员都有半年、一年甚至二年的预备期，考察他们入党后的表现或者有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张春桥搞的突击发展造反派入党，都是没有预备期的，入了党即可行使党员的权利，当选党组织的书记或党的代表。九大党章虽然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但上海发展造反派入党是在九大之前进行的，这是张春桥先斩后奏的又一实例。

整党一开始，张春桥就说：“老党员为什么没有朝气？这里可以提出一个结论，发展一批优秀造反派入党，他们就可以老实，如果不发展，他们一些人就会翘尾巴。”¹⁷为了使造反派真正掌权，张春桥认为要发展他们入党。造反派说得更明白，他们说：“党权是权中之权。没有党权，造反就白造了。”¹⁸在恢复各级党组织的同时，张春桥、王洪文等就开始“纳新”的工作，吸收造反派入党。首先被接纳的对象是那些因造反占据各组织“革委会”和“群众组织”领导岗位的头头们。他们虽然占据了领导岗位，但是有一部分人在群众中印象是不好的，被认为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有不少人在党员眼里他们连入党积极分子的条件都不具备，更不用说入党了。1968年10月，王洪文在工总司机关建立了文革中上海第一个党支部，他担任书记，追随他的戴立清说：“这下子，我们都可以入党了！”他们的理由是“造反就是最好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就要看在党的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戴立清是上海标准件一厂的工人，从1968年底就申请入党，但他所在的厂党支部认

为他在文革中曾搞过打砸抢，不同意他入党，于是王秀珍、金祖敏下令上海标准件一厂的上级组织限期发展他入党。¹⁹在这样的压力下，戴立清的入党问题还是拖了几年，直到1971年5月，党支部大会才通过戴立清入党。公司党委在批准决议上写明：“现按上级批示，戴立清入党。”

上海造反派中陈阿大最能搞笑，因此也最有名，大家都称他是“混世魔王”。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说：“我们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党员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发展党员，以后要长期掌权是掌不牢的。”²⁰为了让陈阿大入党的事，王洪文和徐景贤特意到良工阀门厂开会，王洪文明言：像你们这里陈阿大那样的，他在一月革命当中功劳很大，完全可以入党。

1968年10月10日，陈阿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19日，王秀珍和黄涛赶到良工阀门厂，指示陈阿大原来所在的金工车间召开党支部大会，表决通过陈阿大入党。²¹厂里党的核心小组很快就正式批准了陈阿大入党。不久，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陈阿大又成为中共九大的代表。从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成为九大代表，前后只有两个月时间，这完全是典型的“突击入党”。

在突击发展党员的过程中，类似陈阿大这样的情况有不少，甚至还搞出了许多新的花样，如“飞过海”、“压指标，消灭空白点”、“下任务，抠比例”、“先升官，后入党”、“领导压阵，限时限刻发展”等。所谓“飞过海”即是将基层党组织、本单位不同意发展入党的造反派，调到另一个单位，采用隐瞒错误，缩小问题，甚至抽去档案的办法，将其发展成为党员。这些五花八门的荒唐事，当然不是张春桥所为，也不一定是他想看到的，但不能否认，这些都是在他的言论影响下发生的。

张春桥在上海搞突击发展造反派入党，而且取消党员的预备期，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迎接九大的召开，争取多得一些选票。也有新入党的造反派说：“如果要预备期，就剥夺了我们做九大代表的权利。”²²张春桥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造反派是他们的阶级基础。如果要写一篇《论张春桥的阶级基础》的文章，这个基础只能是工人造反派了。

张春桥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已经四年了，究竟政权比较巩固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有多少？”“领导的问题，这个经验是需要我们经常记

住的，我们从没有政权到夺得政权，又部分地丧失政权，到这一次又重新夺回来，这个经验教训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主要的经验教训。”²³他认为，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必须做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可以说完成了“组织手续”，造反派掌权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所以张春桥说这次大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向走资派夺权”，是完成了“夺取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一次盛会。”

一月革命后的上海，是张春桥打下来的地盘，他是上海造反派的“老头子”，突击发展造反派入党，也不无做“老头子”的心态。在1968年初，他就说：“我和文元认为，如果比二月逆流更大的风浪来，我们怎么依靠？我们设想就是要把一批（不是一二个）最可靠、造反最早的先进单位发展成为红色的堡垒，这样风浪来了，我们就会有依靠了。”²⁴

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确定之后，徐景贤又重提1967年萧木、吴瑞武等编的《一月革命大事记》，他召集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等人，说：春桥、文元指示说，九大即将召开，上海代表多数来自基层，不了解上海一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开起会来人家一攻就没有办法了。要搞一份大事记一类的材料，给代表们武装一下。徐景贤还要求《大事记》要把一月革命中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是将来党史的珍贵材料，再不组织人搞，过几年就忘记了，真可惜。²⁵

但是，写作班的人此时都参加工宣队分散在基层，一时组织不起来，就由市革会办公室朱敬禹组织写作班子，编撰出长达六万字的《一月革命大事记》。为了核实各类材料，笔者采访了朱永嘉和萧木。他们都说《一月革命大事记》是朱敬禹主持编写的，市委写作组没有参与这件事。

2016年7月3日，笔者赴上海郊区嘉定，采访了朱敬禹。几十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说，你头发怎么全白了？他比笔者年长，但头上白发不多。谈起往事不免有许多感慨。他说：写《一月革命大事记》，一些史料都说是张春桥布置的。其实直接向我交待任务的是徐景贤，在编写的过程中都是徐景贤找我们谈话和讨论，没有听到过张春桥和姚文元有什么意见。当时从各单位抽调了二十多人，也有《文汇报》的人，集中在康平路办公室旁的荣昌路22号，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徐景贤改定之后，

送给张春桥。还有的材料说张春桥作了几次修改，这也不是实际情况，张春桥看了之后很不高兴，要求立即停止这项工作，并要徐景贤把排出的小样全部销毁。但是徐景贤没有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去做，私自留下清样，“四人帮”垮台后从他的抽屉里抄了出来，流传到社会上。你看到的手稿本复印件不是我们的手稿，不知是谁从清样上抄下来的。徐景贤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张春桥，也是为他参加的一月革命树碑立传，他这样做无疑是为反对张春桥的人提供炮弹，利用这个材料向他发动攻击。此时又是九大召开的前夕，所以张春桥很紧张。当时张春桥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们在市革会工作，感到他很谨慎。

朱敬禹还谈到，他们当时编了许多材料，如参加大闹怀仁堂几个领导人的材料，有关陈毅的言论材料，有的是从档案材料中来的，有的从各种文革小报上抄来的。朱敬禹说：现在还有传言张春桥说陈毅不会打仗，其实这不是张的话，他哪有资格这样说，他是传达毛泽东的话。关于有没有整理过《张春桥、姚文元1966年12月至1967年12月讲话记录摘要》，朱敬禹说已经没有印象了。朱敬禹认为当时的张春桥关心的是上海形势的大局，经过两次炮打及怀仁堂事件，张春桥担心上海发生大事，要稳定上海。不要给别人留下向他攻击的把柄。朱敬禹说：你还记得吧，他要王洪文代表市革会主持解决上海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写的总结材料，毛主席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向全国。

1967年8月，上海工总司砸了上柴厂联司之后，虽然没有再发生大的武斗，但还有四百多家工厂等基层单位没能实现大联合。造反派为了权力之争，内战不休，武斗不止，被张春桥视之为不安定因素，要在九大召开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并要王洪文出面主持这项工作。张春桥提出解决两派问题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一碗水端平，多做思想工作，用疏导的办法解决。市革会向报社抽调人员参加调查研究并写了报告。

《文汇报》当时的负责人邵传烈派笔者参加，并说再写一个让毛主席批示的报告。在此之前，《文汇报》记者写的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等三个调查报告，毛泽东都作了批示。这次参加调查的有朱敬禹、上海市公交组的顾澄海及笔者。我们除了随王洪文到基层单位了解老大难问题，还另外做了些调查，最后写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解

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于8月14日报上，毛泽东于8月16日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张春桥这样做，既稳定了上海局势，用他的话来说“让毛主席放心”，同时又向即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向全国推荐了王洪文。

堵住不同声音

上海就是张春桥的大本营，他必须苦心经营。可能是长期从事思想战线领导工作的缘故，或是出自谨慎，或是内心深处的脆弱，张春桥对群众中的思想动向特别敏感。像笔者这样生活在上海而又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也常常感到他是草木皆兵。特别是在九大前夕，他不允许上海有什么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反对他或反对工人造反派的声音，他要扫除一切干扰，使上海稳定下来。

文革初期，上海锅炉厂设计科技术员何志强，以“何是”为笔名，发起了一个东方学会，还主办了东方论坛，以“政治清道夫”、“红梅”等笔名，写了一些传单和油印刊物，在厂内散发。当时社会上提倡“忘我”精神，他写了《造“忘我”的反》、《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姚文元》，提出要“姚文元造张春桥的反”；报纸上说刘少奇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写了《论“吃小亏，占大便宜”》。总之，他对批判《海瑞罢官》提出不同意见，为批判刘少奇鸣不平，造反派掌权后，他又以“阶级关系的变化”理论为依据，对造反派提出警示和批评。张春桥发现了这一动向，一声令下要查，下面就行动起来，把何是的文章编集成册，冠以“反革命何是的一批毒草”之名，进行批判。1968年，也就是在九大前夕，干脆把何是拘留关押，直到1970年才放出来，定为反革命分子。

再一件事就是诗人闻捷之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诗人闻捷被视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送往五七干校，列专案审查。上海市委写作组戴厚英本来是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此时成为闻捷专案组组长，负责审查闻捷的历史问题。在审查中，戴厚英对闻捷的曲折一生有了较为

深入的了解，她又喜欢闻捷的诗，此前闻捷的妻子也被迫害致死，两个人就热恋起来了。闻、戴的好友陈冀德知道他俩相恋的事，就劝戴不要把爱情看得太纯洁，太诗意了，身为闻捷专案组组长，不太适合与其谈婚论嫁。既然彼此相爱，又何必在乎争这一朝一夕呢。但是在恋爱中的戴厚英听不进陈冀德的劝告。张春桥从一期《文汇情况》上看到这个消息，作了批示，意思是警惕文艺黑线人物对造反派的腐蚀。姚文元也有批示，意思是现在还有人崇拜“三名三高”的人。张、姚的批示其实也没有要把闻捷怎样，但有了这样的批示，可谓落笔成刀，闻、戴之恋也再难继续下去，又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运动以来闻捷一直挨批斗，成了惊弓之鸟，后在家开了煤气自杀身亡。

诗人间捷之死，当时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有人说，这是现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陈冀德则认为，酿成这杯苦酒的，一多半是闻、戴自己。他们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方、作出了不适当的选择。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种结局本是可以避免的。可人到情浓，智亦昏昏，最后留给人间的是凄凉的故事和永久的遗憾。写到这里，使人情不自禁地想问：像闻、戴这样的文人正常之恋，张春桥去批示干什么？而且是在九大前政治最为敏感的时期。闻捷之死，总是和他的批示有关。还有就是前文提到的“共向东事件”，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

张春桥对社会上的一些动向有一种本能反应：“阶级斗争新动向”。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他做出了许多错误判断，后果是：小事变大事，轻事变重事，没事变有事。不只是伤害了一些人，也使一部分人丧失了生命。

“一切为了九大”的口号是上海一个中学生组织中学生串联委员会提出来的。它成立于1967年秋，简称中串会，是一个以中学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参加者大多数是本市中学的红卫兵，少数是北京等外地的红卫兵。他们出版了一种油印和照相版的《红卫战报》。红上司（即红卫兵上海司令部）成立之后，即创办了《红卫战报》。他们倾注心血办了一年，于1967年9月被中学红代会接管。红上司当然不会甘心，被接管后的一个晚上，《红卫战报》的编辑杨志东把《红卫战报》的刊头盗出，和另一位编辑冯军合作办了一份油印的《红卫战报》，仍用原来的刊头。杨

和冯都是光明中学学生。油印《红卫战报》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办〈红卫战报〉油印版》，认为被接管的《红卫战报》是“庸夫当道”，“毫无生气”。以后又发表了《评〈关于中学运动串联会问题的联合声明〉》，《反对口头革命派》、《驳对前进的几个谬论》。原《红卫战报》是中串会的舆论平台，被接管后，中串会失去了舆论阵地，他们看了油印版《红卫战报》得到启发，认为应该正式办一张报纸，以发表中串会的声音。交大附中的魏威前往光明中学和杨志东联系，建立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上海中学的油印刊物《中学红卫兵》上刊登了毛兵的文章《论思潮斗争》。《中学红卫兵》的编辑宋永毅与中串会的观点比较接近。魏威就向毛兵约稿。毛兵原名戚伟堂，是上海中学高三学生，应约写了一篇《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发表在影印版《红卫战报》第一期上。这一期还发表了魏威写的《给张春桥同志的一封信》，但没有引起反响。于是毛兵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而奋斗》，后来改为《一切为了九大》，刊发于《红卫战报》影印版第二期上，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变动阶级关系的大革命”，“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文章还提出“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党干部会比党员干部好”。这篇文章中的论点似乎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用过的，如：“要把精力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旧班底上”、“砸烂旧班底，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要掌好党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焦点的焦点”、“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革命的暴风雨中，已经暴露出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他们容不得一点不同观点，不能有一点分歧，都得和我一模一样，否则就是‘右倾’，就是‘折衷’，‘机会主义者’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极右分子’”，如此等等。文中还有当时红卫兵报刊中屡见不鲜的豪言壮语，如：“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一场大决战正在面临集中爆发，要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疾风暴雨”，在九大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再一次交锋”。

在同一期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宁区文化革命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是针对张春桥2月22日在各区县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为了掩饰文章的指向，把原定在2月22日以后的出版日期提前，改为2月15日。可是红卫兵玩的这种小把戏，又怎能瞒得过张春桥呢？

中串会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编创演出了歌舞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总导演是交大附中高三学生彭正勇，编剧是复旦附中高一学生许锦根。徐景贤看后，勉强同意只准演出三场。但是这个舞剧不但在上海市区演出，还到郊区演出，前后演出90多场。在一次会议上，彭正勇、许锦根特意去见张春桥，邀请他看演出，张春桥很生气，说：“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去看你们的演出！”

《一切为了九大》所用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用来攻打走资派的响当当的语言，有的在徐景贤市委写作班造反宣言上也用过，此时这些话明明针对的是已经掌权了的造反派。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刚刚掌了权的造反派当然是不利的，戳了他们的脊梁，挖了他们的根基。因此，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说这是反动思潮。3月7日，徐景贤受命发表讲话，说《一切为了九大》“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切为了破坏九大”。于是，在一段时间内，除了报纸批判，还发动了一些造反组织对《一切为了九大》进行批判围剿，声讨这个反动思潮。

对有关人员办学习班进行批判，其中有向明中学的王毅捷、交大附中的金小锋、徐汇中学文贯中、舞剧《前进》导演彭正勇、编剧许锦根、编剧兼朗诵顾维萍，还有影印《红卫战报》的编辑或撰稿人张水荣、宋永毅等。除了这些学生，还要揪背后的黑手。写《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的文贯中，其父为国民政府的中将，是解放战争时期被俘人员，此时还在押，也以“黑手”为由拉来批斗，并把文贯中定为反动学生。被批斗的“黑手”的还有王毅捷的父亲，此时正靠边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以及曾担任过《中央日报》上海版副总编的学者胡道静，他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称赞过舞剧《前进》。毛兵、魏威、管春宁和红鸥，感到风声很紧，逃到外地，也被抓回来批斗。有的甚至被指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分子。

以当时的政治标准来看，中串会并没有越轨的言论，张春桥之所以不喜欢他们，并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其内在原因是中串会不赞同毛泽东肯定的“市六女中大联合”的经验，张春桥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上海局势的稳定不利，所以采用高压手段把他们压下去。

咽不下大闹怀仁堂这口气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卖国贼几顶大帽子，把他清除出党。已经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有意选择在他70岁生日这一天通知他有关决议内容。刘少奇受到巨大刺激，病情不断恶化，于1969年11月12日凄惨地死于河南开封，1980年才得到平反昭雪。会议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讨论了为迎接九大，党代表如何选举，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会上有不同意见。

元老派大闹怀仁堂时，毛泽东在气头上，把话说得太重，把元老派推得太远也不一定是好事，讨论九大代表的产生时，他给自己找到了转弯的机会，说老同志在党内发表不同意见还是允许的。他以后还为几位老将作了解脱，这可能是他考虑到老将们在军内的影响还在，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但张春桥不是轻易消气的人，总是在寻找机会进行还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老将们一个个检讨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支持、怀有怨气，于是张春桥向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发起了进攻。

10月15日，当李先念在小组会上检查自己17年来的错误时，张春桥还是不忘他在上海文化广场绕场一周的事，不断插话，逐句反驳，使李先念很狼狈。当朱德作检查时，张春桥更是不时地插话驳斥。朱德小心翼翼地问：“谭震林，还有这些元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张春桥不耐烦地打断：“你怎么同他们划清界线的？讲一讲！”朱德看到已成横竖被批的围剿之势，索性沉默不语。吴法宪质问：“你昨天发言，为什么

不提林副主席为当然代表？你对林副主席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不是不服气？”张春桥质问：“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会小组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一唱一和，对参加大闹怀仁堂的那几位元老进行批评，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元老派们唯唯诺诺，无法回答。尤其是对陈毅，张春桥举起火棍一顿狠打，以落花流水来形容也不为过。张春桥对陈毅所采取的批判，并不是什么革命行为，而是私人恩怨。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²⁶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材料小组，由王洪文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搜集材料：一是把参与二月逆流的那几位老革命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的机关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录有关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革命共过事的人，或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放过，动员他们揭发陈毅，戴罪立功。

九大材料小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人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他施加压力，让他写揭发陈毅的材料。有一位善于篆刻的国民党旧人，曾戴过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把儒将陈毅的诗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就下了聘书，聘请他为上海市文史馆员，按月发给馆员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就成了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多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

赶印了出来。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自1953至1966年间，在上海、北京等各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9个部分。小册子送审时，徐景贤把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再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印了80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外，张春桥还指定搜集参与二月逆流的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将的材料，共计76份，1,163页。

还未去北京之前，张春桥在上海就发动了对陈毅的批判。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得知陈毅挨整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上海的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言论；静安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判以后，难过得落下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很是不满，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主持并讲话。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陈毅。参加会议的人也跟着张春桥批判，说陈毅是“戴黑眼镜，结黑领带，说黑话的黑线人物，是一名炮口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大炮”，“对上海来说，对陈毅存在着迷信，因此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肃清他的流毒，要把他的一些假象剥去。”²⁷

不久，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80名，张春桥、姚文元、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一周后，陈毅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上海的九大代表选出后，张春桥指示：代表要集中集训，办学习班，统一思想。学习班结束之后，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代表，要他们预做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和陈毅“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张春桥拖长了声音说：“应当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张春桥在批判陈毅时，可谓是步步为营。一切布置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灯火辉煌。上海80名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到场，在主席台旁边给陈

毅留了一个空位置。陈毅走进会场，在《文汇报》的艾玲旁边坐了下来，帽子捏在手里，稀疏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艾玲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陈毅说：我在二七工厂劳动，工人生产热情很高，一时无法离开。艾玲说：今天会是批判你的，你赶快去报到吧。陈毅问：哪个是王洪文？艾玲说：那个站着讲话的就是王洪文。陈毅还在说：这个王洪文……艾玲说：你别说了，现在要批斗你，你赶快到前面去报到吧。²⁸

等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来，徐景贤作了开场白后，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交给陈毅，说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陈毅接过小册子，有点懵了。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小时才告结束。第二天上午，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京西宾馆，津津有味地听取批判会的汇报。特别是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的张春桥开怀大笑。

3月29日晚继续开会。按照张春桥的意见，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会议仍由王洪文主持。此时的陈毅神态镇定。他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说：自己当了九年上海市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评。接着他谈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四十多年来，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时思想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陈毅发言的时间很长。下面代表们已经不耐烦，有人中途喊叫起来，想打断他的发言。但陈毅并不理会，还是继续他的讲话，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军史，代表们也无法提出反驳。徐景贤发言讲到当年红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争论的历史，批判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当年，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陈毅的确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关于这段历史，中央早已作出了结论。陈毅没有想到，徐景贤会给他算历史旧账。批判会结束，陈毅缓缓站起来，捡起桌上那本言论集走了。

会议期间，陈毅收到了一封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的来信，信中表示拥护陈毅当选主席团成员，并述说了“张春桥同伙在上海血腥镇压群众的

罪行”。陈毅把信交给主席团，张春桥等知道后，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来信，借机又批判陈毅。4月12日，王洪文对代表们说：我们批陈毅，上柴厂反革命分子拥护陈毅当中央委员，他就代表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22日下午，又组织了一次批斗陈毅的所谓帮促会。围绕着这封来信，代表们纷纷地责问、训斥陈毅说：你是老右，上海柴油机厂来信的人就是你的社会基础，这种人捧你，可见你代表他们的利益。

后来，周恩来对上海批判陈毅进行了干预。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北京的途中，对张春桥等人谈到陈毅的问题时，说：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是要他来搞。²⁹自诩最听毛泽东话的张春桥，为什么这次偏偏听不进去呢？自元老派大闹怀仁堂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对立面不只是陈丕显，还有陈毅、谭震林等人，他被这些在革命战争中就形成的关系网包围。毛泽东把这张关系网都控在手里，纲举目张，听从他的摆布，而张春桥就不同了，他仿佛就生存在这张关系网的阴影中，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冲破这张网，这样他就绝不放过陈毅。同时，毛泽东虽然为陈毅讲了话，但陈毅在毛泽东心中也有一本放不下的账，这里也不能排除张春桥批陈毅一事中有毛泽东意思的可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认，张春桥敢这样做吗？

此时，张春桥没有弄懂一个最普通的道理：要取代前人在老百姓心中的位子和影响，你对老百姓的奉献就要超过前人。老百姓看到你的奉献，不是带领他们喊了多少口号，而是从你的施政中得到多少实际的利益。而让群众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恰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批判和反对的，也恰恰是张春桥所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做了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却缺少一种安定感，总是在防备中执政。

10月31日，全会闭幕。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一方面肯定了会上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一方面也指出，所谓“两个大闹”（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³⁰毛泽东认为对这些老同志，还是要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说他没有资格当九大代表。毛泽东说：我看你有资格，代表有左、中、右，你有右的方面资格。

矛盾：政治报告与选举

九大会议准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修改党章，一个是政治报告。对如何写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多次作了指示。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说：“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3月22日，毛泽东又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说：“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3月31日，讨论文件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³¹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九大之前，叶剑英就明确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是第二个里程碑；现在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第三个里程碑。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要不要体现第三个里程碑的思想。毛泽东几次表示不赞成在九大文件中写里程碑的问题。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对张春桥的另一个质疑，就是有关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事，说他和姚文元避开原定主持起草报告的陈伯达，起草了另一个九大政治报告。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开会时，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他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³²会议商定2月20日交稿，九大在3月15日开幕。陈伯达接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任务后，让秘书帮助找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的资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还到林彪那里谈了一次，听取林彪的意见，林表示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由他们三人代劳，内容由陈伯达决定。陈伯达写了政治报告的题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他文章的主题，他认为九大会议也应该以此为主题，不能再搞政治运动，要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了。陈伯达列出了几个小标题，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林彪同意后，陈伯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政治报告提纲呈送上去。毛泽东很快圈阅退

回，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陈伯达的写作提纲的。陈伯达开始了紧张工作，在他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张、姚打电话询问，他却以不让他们加入“私货”为由，避而不答。同时又因为他担心被张、姚抓住向他进攻的把柄，所以遣词用句都认真地推敲，导致写作进度很慢。

2月19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希望能在20号交卷。到了3月7日，报告还没有拿出，毛泽东表现出极大不满，就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3月12日，毛泽东提出换人的问题，指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各搞各的。这以后，九大政治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由于时间来不及了，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半个月的时间，开会时间推迟到4月1日。

张、姚二人从16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于3月31日完稿。九大期间，从改稿到送稿发表，毛泽东曾三次将报告送给林彪。中央开会让讨论张、姚的稿子时，周恩来也把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第一部分交给会议讨论。陈伯达很激动，抨击张、姚的稿子像伯恩斯坦所说的，只是搞运动，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会上争论激烈，陈伯达没有写完的报告当然被否定了。后来，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³³

林彪讲话不喜欢用别人为他写的稿子，更不愿意按照文稿照本宣科。他常常是要秘书为他写个讲话提纲，列出几个重点条目（他们习惯称之为“拉条子”），讲话时即兴发挥。所以，当陈伯达起草政治报告时，林彪的秘书就在叶群的指挥下为他“拉条子”。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批判是“唯生产力论”。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叶群回到毛家湾马上下令停止“拉条子”，陈伯达起草的文件稿也不能给林彪看。她知道林彪是同意陈伯达的观点的，担心林彪按照陈伯达的观点去讲，那不是出大问题了吗？

4月1日，九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幕。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只能一字不改地把报告读了一遍。张、姚起草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已经点明主题，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这个东

西，相当严重。”³⁴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九大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之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字，但林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签字才算了事。³⁵

现在，我们不需要判定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工作中谁是谁非，他们都是党内的笔杆子，又都是党内的高官，但作为知识分子仍然有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难题，都有着归属感，要有所依附。不能否认，此时的陈伯达依附的是林彪，而张春桥依附的是毛泽东。

在对待老帅的问题上，林彪系统和文革派是一致的。在选举前，由吴法宪召开秘密会议，邀请上海代表王洪文去参加。王洪文回来，向王秀珍、徐景贤传达吴法宪的话，“这次选举对一些老右不能满票，要刹刹老右们的威风。”张春桥也通过王洪文向上海代表传达：“对几位老帅，不能给满票，要刹刹他们的威风。”王洪文遵行江青、张春桥、吴法宪的旨意，还具体布置大家不要投朱德、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陈云、李富春、张云逸、肖劲光、邓子恢、陈奇涵、徐海东等十四人的票。³⁶

就九大选举中央委员的酝酿提名问题，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召到钓鱼台，授意他们在上海代表中做工作，把不是九大的代表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提名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向他们透露，这是征求了空军吴法宪的意见的。张春桥说：“王维国在浙江就是支左的，到上海继续从左的方面介入，是有贡献的。”³⁷王维国就这样被提名并被选上中央候补委员。事后，张春桥对妻子李文静说：“空四军空五军是林彪最喜欢的部队，我提王维国、陈励耘当候补中委，林彪一定很欢喜。”³⁸

再说江青。九大进行大会选举预选时，江青得了全票，她很得意，满心以为她可以全票当选，可是正式投票选举时，她没得全票，这使她极为不快。陈伯达回来后说：我没有投她的票。在各小组会上，有的人竟提出要追查在江青名字上打叉的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听说要追

查，陈伯达不安地给汪东兴打电话，问他们会不会查笔迹。³⁹陈伯达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没有想到你仍旧列入了名单。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的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这个意见。”⁴⁰

据当年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李根清回忆：林彪每天都在不停地思考，把他的思考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者记在书本里，或者写在卡片上，这些卡片由叶群保管，收在一只保险箱内，其中有不少是对毛泽东及为毛泽东所欣赏的人物评论。有一张卡片是由林彪口述、李根清记下来的：“忠庸，张春桥、柯庆施。”忠庸的“忠”字，李根清写成“中”，意思就是“中庸之道”的不偏不倚，也不能算是坏事。可是林彪在“中”字下面加了一“心”字，成了“忠庸”，意思就成了张、柯都是忠于毛泽东的平庸之辈，是一种盲目的愚忠。从中可以看出，林彪看不起张春桥和柯庆施，连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写出来了。

林彪看不起张春桥，在九大选举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之前就更加明确地表示出来，一次叶群在同吴法宪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小卒，现在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票少几张，不要让他们得全票，以刹一刹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后来，按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的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⁴¹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张春桥叛徒问题，在九大会议期间也突显出来，主要在军队系统。会议进入选举程序时，黄永胜告诉邱会作：“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显然，由邱会作策划的反映张春桥是叛徒的群众来信，已经由周恩来转递给毛泽东了。但毛泽东没有表态，所以他们说好像主席不重视这些材料，李作鹏说少提“眼镜”的事，因为“是香是臭我们说了不算”。邱会作等人认为“抓住眼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⁴²但是，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桥仍然榜上有名。毛泽东不表态，枪杆子们对笔杆子也无可奈何。

是军事官僚专政吗

无论在文官或武将眼里，张春桥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对此，张春桥也有深切的感受，他曾不止一次说：在北京，我是个小人物，谁能看得起我。1966年，红卫兵运动高潮时，张维维到了北京，谢富治带她到天安门城楼。后来她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到我爸爸就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父女的切身体会，都说明官场流行的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不是俏皮话，是官场的真实写照。

4月23日下午，大会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1,512人，正式选举时因有两人请假，当天有1,510人参加选举。选举的结果，江青只得1,502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和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这一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脸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脸色还要难看。当他们来到江苏省厅休息时，江青起哄了，对吴法宪等人说：“你们的票比我们的多啊！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望很高，老娘得的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发作，众人都默不作声。⁴³

大会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碰头会议也可以来大鸣大放、大批判。”康生、江青派中组部郭玉峰到大会秘书处查票。康生、江青、张春桥要查票的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就算最后结束了。⁴⁴

张春桥对上海造反派的培育花了很多的心血，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进权力中心，真是得瓜得豆，都取得了效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成为中央委员，张、姚二人还成为政治局委员，马天水、金祖敏、王维国、陈敢峰成为中央候补委员。5月1日，这些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觐见江青。江青拉着他们一起拍照，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我的根据地，是我们老家，

所以我看你们这么多人进入中央，我特别高兴”。张春桥说：“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高级干部了。各种力量都在争夺你们，不要被人争夺过去。”他认为：“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⁴⁵

九大选举，张春桥虽然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他培养的上海造反派有几个人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是他对没能得全票还是耿耿于怀。九大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一共是279名，其中军队干部占50%以上。在25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一半以上，军队的地位提升了。毛泽东虽然把刘少奇彻底打倒了，但权力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这样的结果，是毛所始料不及的。毛嘴上也调侃军政府作，其实他心中有疑虑，反而成为他的一块严重心病。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说到苏共攻击中共搞一元化，他说：

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人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所以叫“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⁴⁶

一如既往地轻松、风趣和大度，而且让人家去讲，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但是如此严峻的话题还能轻松得起来吗？在风趣、大度背后分明是深深的忧虑。毛泽东心中很清楚，不只是在中共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军人几乎占了近半，全国军人参政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从省、市、地区到县一级的政权机构中，当权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是军人。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这个当权的群体中，穿军装的几乎占82%以上，这违背了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宗旨。这种现象重复了历史上“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现象，潜在的军人专权的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九大之前，毛泽东是否看到这种危机了呢？他应该看到了，而且是比较早的看到了。可以说在1967年的“七·二〇”武汉事件中，他仓惶地到了上海时，就在想这件事了。“七·二〇”事件之后，他借用工人的力量，给工人造反派或民兵发枪，即建立第二武装，被粟裕发现。⁴⁷粟裕不一定知道搞第二武装有毛泽东的背景，而在军队中对此进行强力

反对，毛泽东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并实施过，可能考虑到这事关系太重大了，没正式付诸实施。另一件事就是在九大之前，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正式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宗旨，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以工宣队为主，军宣队退居为辅的地位，付诸实施后，对搞好斗、批、改和抑制军队似有作用，但收效也不大。

也是在这段时间，江青曾大批军国、军党。据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中邱的回忆，江青曾对黄永胜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国民党的党国，所以他垮台了。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时间并不长，却搞了一个军国，搞出了一个军党，这样也非垮台不行！这种思考和这番口气，令人不由去想：江青是否是从毛泽东那里听来的呢？还是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她的这种猜想？

毛泽东早就知道军队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早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和平谈判破裂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派军队攻打共产党时，毛泽东所领导的新闻媒体就在军队归属的问题上，向蒋介石发动攻势：军队要国家化，即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某个政党，某个派别或某个个人。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军队不应该介入政治斗争，成为某个政党、派别或个人的政治斗争工具。但是从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共产党的支部就建在连队上，枪杆子要受党的指挥。即使工农红军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中共政权确立之后，这一传统仍未改变，军队要绝对接受党的领导，军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升军队的地位，和林彪联手，先发制人，稳定局势。

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不会变，既不是军事官僚专政，也没有出现军人党，但是党中央的组织成分军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九大之后，毛泽东已把去军队化的问题放在自己的思考日程上，但时机还不成熟，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只是戏说了一番，仍然不动声色。

注释

- 1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革的目的提出来的。《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以后就被简称为“斗、批、改”。
-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235页。
- 3 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 5 同上，第526页。
- 6 同上，第530页。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6页。
- 8 同上，第136页。
- 9 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揭发。
- 10 张春桥1968年2月16日在上海电子管厂的讲话。
- 11 1968年底，张春桥接见部分工代会委员时的谈话。
- 12 九类分子，文革时期对坏分子的划分形式，其中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
- 13 2008年5月28日萧木和笔者谈话。
- 14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614页。
- 15 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202—203页。
- 16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614页。
- 17 1968年9月张春桥在一次整党座谈会上讲话。
- 1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598页。
- 19 金祖敏，上海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之一，原为上海电机厂工段长，当时在上海市委工业组、总工会、组织组参加复查工作。
- 20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98页。
- 21 黄涛，原任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时任市革会工业交通组负责人。
- 2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598页。

- 23 《张春桥在中共上海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1月4日。
- 2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27页。
- 25 同上，第604页。
- 26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第169页。
- 2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06页。
- 28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554页。
- 29 第三野战军司令，指陈毅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 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3页。
- 31 同上，第1542—1547页。
- 32 同上，第1545页。
- 33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359页。
- 3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46页。
- 35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42页。
- 3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09页。张云逸、肖劲光、徐海东都是解放军开国大将，陈奇涵为上将，其中张云逸、徐海东因年老多病，当时已经不担任具体职务；肖劲光建国后一直任海军司令员，然而此时已因受到批判而被剥夺了主持海军工作的权力；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 3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10页。
- 38 文静的揭发交待，见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10页。陈励耘，时任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 39 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60页。
- 40 同上，第361页。
- 41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44页。
- 4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635页。
- 43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第744页。
- 44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658—659页。
- 4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69年1月，第611—612页。
- 46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654页。
- 47 粟裕，时任中央军委常委。

第十五章



1971年5月1日张春桥陪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V. G. Wilcox）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灯火晚会

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用张春桥挑战林彪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评价说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而实际上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加大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其结果是周恩来支持林彪提出的发展生产力的路线，陈伯达更是从此完全倒向林彪。而林彪系统的军人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便企图用叛徒问题把张春桥搞倒。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张春桥还是顺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张春桥等起草了政治报告，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心中又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取消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的工作班子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社会秩序和党内有了一段时期的平静。其实毛泽东心里很清楚，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斗争还在继续。平时林彪对文革派就起着抑制作用，而九大把他作为法定接班人，他定会对文革派特别是对张春桥下手收拾。也可能是毛泽东为避开林彪的锋芒，才把张春桥放回上海，让他为整党建党工作做出一些经验来。

果不然，张春桥回上海之后，林彪就要他的几员干将向毛泽东告状，开始收拾江青了。林彪此时最大的合伙人是汪东兴。九大以后，汪

东兴了解到林彪系统有反对江青的情绪，就有意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接近，他们先后在汪东兴家中谈过两次话，在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也谈过话。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谈话内容主要是围绕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毛与江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汪的谈话使黄、吴、李、邱确信毛泽东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所以他们抵制江青就无所顾虑了。

由于汪东兴的误导，邱会作等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开始搜集江青在平时讲话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评攻击的话，他们要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林彪的支持。汪东兴立即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某晚7时到毛泽东处。他们大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攻击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话，但毛泽东对江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他认为江青是随便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告状未成，邱会作认为上了汪东兴的当。

从《毛泽东年谱》来看，林彪用自己的特殊语言对毛泽东大树特树，像崇拜天神那样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一开始对林彪的颂扬之词要么直接反对，要么作些修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而林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颂扬。林彪私下里在他的藏书《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是认识到毛泽东有个人崇拜的需要，所以他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条中写道：“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拥护的表示。”“最迅速地响应他每一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¹看来，林彪的“高举”、“紧跟”、“拥护”，都不是发自真心，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犯错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这种推崇和被推崇都是政治需要，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有伪装虚假的成份。毛泽东也可能看出林彪的违心之言，所以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就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以后又多次说：“名曰树我”，其实是“树他自己”。林彪虽然为自己立下座右铭“不为一号事

先”，可是他当了接班人之后，还是忍耐不住，想要试一试这个接班人是真还是假。

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当时关系相当紧张的中苏两国商定将进行副部长级外交谈判，而中共高层则担心，苏联会以谈判为烟雾，而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10月18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并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²周恩来把林彪的“紧急指示”传阅文件呈报给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的汪东兴拿到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立即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汪东兴说：“烧掉。”³实际上，后来苏联确实也没有借机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袭击。1970年4月，毛泽东由杭州转抵上海。离开上海回北京时路过苏州。这一天，毛泽东带着张春桥、马天水去见林彪。他们的谈话在专列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在谈到怎样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⁴

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回忆：那时毛泽东在上海，张春桥也就住在西郊宾馆。一天，何秀文和驾驶员李金发（本来给林彪开过车，后来给陈丕显开车，现在又给张春桥开车）急忙回来，带了几瓶汽油就走了。我知道他们要出远门了，但不知去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去了苏州。那时毛泽东在上海，要去苏州和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见面，叫张春桥、马天水一起去。汪东兴叫何秀文去苏州接张春桥回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苏州，林彪上了车。此时毛泽东还是要林彪和张春桥搞好关系。他对林彪说：苏州离上海那么近，不妨到上海去住住。林彪说：春桥同志在上海的目标大。毛泽东的专列开走后，何秀文看到林彪、张春桥站在车站上还谈了一阵，似乎在争论，彼此都有些不愉快。⁵

九大党章明确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向这位接班人提出“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样令林彪心悸的问题，并征询“你看小张怎样？”这不是在暗示要林彪提早让位，让张春桥接班吗？所以来有人批评张春桥抢班夺权，是不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呢？

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是在酝酿着一场更大风波的先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说：“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⁶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的意见。会后，汪东兴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坐。话题仍然在设国家主席上，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变成了“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汪东兴又一次对这些军队头头们误导，而他们又信以为真，吴法宪等人听了都感到兴奋，认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怀。

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是合乎他的心理的，因为他要退居二线，他认为当初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给他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于是就不打算设国家主席了。但他又把话说得很活络，并没有说一定不能设，而且说如果设，要林彪出来当国家主席，这是否是他放出的一个气球，想看看林彪的动态？

3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闻讯后，即让秘书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⁷毛泽东和林彪玩起了推手游戏。

4月11日夜，林彪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副主席问题，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第二天，周恩

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把这一意见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明确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站在林彪一边，康生和张春桥则站在毛泽东一边，争论的焦点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康生提出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得知这一消息表示高兴。

1970年8月14日下午，修改宪法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吴法宪、康生、张春桥。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吴法宪提出在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康生、张春桥都表示反对，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上。”张春桥接着又说：“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来的，就责问：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是“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⁸

第二天，吴法宪通过叶群把他和张春桥争论的情况向林彪报告。林彪让叶群给吴法宪打气：对康生和张春桥驳斥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林彪抓住了张春桥，把他和毛泽东的较量转移到张春桥身上，要拿张春桥开刀了。

8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估计会上要有一场唇枪舌剑。出乎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周恩来感到张春桥有些反常，林彪则说：此事没完，“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来”。⁹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因为这三个副词是他提出来加在毛泽东头上的，如果这三个副词去掉了，就等于把林彪否定了。为了保住接班人的地位，可以说三个副词是林的命根子。所以凡是由他提出来的吹捧毛泽东的“副词”，都要保留下来。

庐山惊魂

九届二中全会在8月23日举行。8月19日，各地代表就陆续起程奔向开会地点庐山了。被封了的庐山，虽然有几百位代表上了山，仍然是安静的，显现不出有什么热闹。看来，在斗争漩涡中的人物都是轻松的，谁也没有想到庐山上会风云突起。

林彪8月20日上午上山，下午就和陈伯达单独谈话，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的。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¹⁰

在上山之前，林彪是准备讲话的，叶群叫秘书为他准备讲话稿件。在起草讲话稿时，叶群提出要坚持天才的提法，因为张春桥反对称天才，所以打击张春桥的武器就是坚持天才论。林彪上山后，对讲不讲话曾一度有所犹豫，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¹¹

毛泽东得知林彪要讲话，就问讲什么？林彪说：最近听到吴法宪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构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说三个副词是讽刺。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怎样讲？林彪说：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第二是讲天才问题。毛泽东同意林彪发表以上的讲话内容。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提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彪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彪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会议结束，毛泽东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张春桥在会上有何表现呢？张春桥没有发言，但肯定能听懂林彪的讲话是对着他的。

邱会作有一段回忆：那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抖，拿着香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67年1月，他支持上海二军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¹²

尽管邱会作憎恨张春桥，但他描述的张春桥的紧张心态应是真实的。以张春桥的政治经验，林彪的讲话肯定和毛泽东商量过，他此时还摸不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但从康生的发言对林彪的尽力支持，表明原来和他站在一起的康生的态度变了。如果林彪的讲话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康生不会转变得那样彻底。张春桥知道自己背靠的就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支持林彪，自己靠山的态度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又怎能不紧张呢？

晚上9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不像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和周恩来并排坐着；江青、康生虽然坐在前面，江青总是吊着脸不说话，康生不停地抽着烟也不说话。陈伯达、吴法宪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在会场里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两种不同的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开小组会问题，没有别的议程。散会之后，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去谈天。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都是听众，主要听陈伯达谈。陈伯达认为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还好表现自己；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等等。他们一直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

林彪要打垮张春桥，并不是在会上讲了一番话就算了。又像在九大那样，他的几员大将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上下结合，准备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他本人并不出头露面，而是在后面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并叮嘱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几员大将除黄永胜留守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动员。

《第六号简报》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叶群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在西北组，李作鹏在中南组，他们都以林彪定下来的口径进行宣讲，鼓动为林彪抬轿子，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晚上讨论时，张春桥来参加了。他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还是很客气。许世友掌握华东组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来当“宣讲员”，二是作为组员的陈励耘、王维国虽知道一些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抢先出头。其他各省的中央委员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精神。上海小组的王洪文、徐景贤这时也迟钝起来，在林彪讲话以后，还没有和张春桥接触过，吃不透上头精神，搞不清林彪讲话指的是什么，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在华东组第一次讨论会上，张春桥静坐着，也没有发言。

8月25日一大早，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几乎每位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解学恭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¹³他在8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

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陈毅以极左面貌发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对设国家主席问题，会场鼓了几次掌。李雪峰同志主持会议，未发言。

6时休会，李雪峰留下几位副组长，对秘书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写出来，综合、如实反映。¹⁴

在整理的小组会议记录上，华北组组长李雪峰、解学恭、吴德都签了字。《简报》把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发言作了综合报道：华北组24日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看到《简报》，各组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急更高，几乎一边倒，攻击的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

8月25日早饭时间，王洪文拿到了《第六号简报》，马上找到徐景贤，立即向张春桥报告。此时张春桥从梦中醒来，看了《简报》立刻去找江青。江青看了《简报》，和张春桥立即要见周恩来，没有见到，他们就去见毛泽东。他们向毛泽东谈了什么？毛泽东又向他们谈了些什么？都没有记录可查。但从张春桥25日下午在华东组的表现来分析，可以判定当时毛泽东正准备睡觉，他们把《简报》交给毛泽东就退出了，在参加华东组会议之前，张春桥还不知道毛泽东对《第六号简报》的态度。

25日下午2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主持大组讨论会，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那份《第六号简报》。王维国抢先第一个发言，宣扬林彪讲话的重要，是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王维国发言时，张春桥听得很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另一位中央委员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陈励耘冲着张春桥大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但他还是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只顾猛吸香烟。华东组会议开到下午4点钟左右，有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进会场，把许世友叫走了。许世友一走，张春桥也走了。大约过了五十多分钟，许世友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大声嚷道：“不开了！不开了！散会！”他发现大家都没动，又挥挥手说：“不开了，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会！大家回去吧。”

原来，毛泽东看了《第六号简报》，感到事态严重，采取了断然措施，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请各大组长一起参加。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三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二、收回六号（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和林彪作了一次谈话，有关谈话内容，就笔者所见，有三部有关著作作了记录。¹⁵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许世友摸摸他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摸摸，我的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果断回答：“我听毛主席的。”¹⁶可见，这次庐山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

有多么严重，毕竟是老年人了，怎能经受得起这么大的刺激。

毛泽东了解了《第六号简报》的情况后，找陈伯达谈了一次话。但似乎没有提《简报》的事，只是责怪陈伯达最近很少见他，文章也写得少了，并向陈伯达打听李讷等人的近况。¹⁷

8月26日，九届二中全会全体休会，庐山一片肃静。

“你们能不能让我再看张春桥三年”

8月26日，毛泽东宣布休会。各大组都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关于26日、27日暂停会议的通知，宣布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白天游览庐山，晚上看电影和看戏。放映的电影是日本战争片《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

8月30日13时40分，黄永胜被召上山，到了毛泽东住处。在和黄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我确实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¹⁸毛泽东在和林彪等人的谈话中，都提到让他再看张春桥三年，这表明他对张还在观察中。

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做调查研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住所。夜间，庐山就像罩着雾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子只能徐徐前进。

经过几天调研，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了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

且彼此能够很好地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¹⁹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²⁰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周恩来深夜到毛泽东处取来《我的一点意见》给张春桥看，并同张春桥谈话。9月1日，周恩来、康生去林彪处，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处校对文稿，作个别文

字修改，然后付印。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作了保护的姿态。《我的一点意见》原文中有“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是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给全会前，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²¹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还特意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话当然有些不太实际，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林彪，减轻林彪的责任。

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要以批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建议文元连夜写出一个大纲来。”吴、李、邱除了表态拥护之外，没有再说别的话。江、康、张、姚对《我的一点意见》兴奋异常，他们召集华东地区造反派中的中央委员，在张春桥住处举行了庆祝会，茅台酒就喝了几瓶。

毛主席派张春桥到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他只说了两句话：“唯心主义大师是冯友兰（北大教授），党内蹩脚理论家陈伯达。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资格讲天才论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把会场秩序搞乱了，周恩来注意到张春桥的行为，就对他说：“回到华东组去。”毛主席听说此事后，哈哈大笑。²²

8月31日下午3时，也就是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公开之前，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说：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你们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批判、揭发陈伯达。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检讨说，自己犯了错误还连累了大家，搞“语录”欺骗大家，并主动提出大家不要和他再往来了。

8月31日晚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林彪主持。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先后发言，批判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张春桥发言时，只批判陈伯达，没有涉及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出于一片好心，给林彪递了条子，要林彪

表扬一下张春桥。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会议开到最后，林彪宣布让张春桥发言。张春桥发言很简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自己一定要加强学习，加深领会；二是表示坚决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他的发言避开了“揪人”一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思考得比较周密。

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会各组召集人也都参加。毛泽东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并点了陈伯达的名。当晚，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陈伯达的检讨基本是按康生授意、周恩来和康生修改的内容。陈伯达发言结束，张春桥就开始批判。吴法宪作检讨后，张春桥说：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9月2日，继续前一天的会议，林彪主持批判陈伯达。张春桥发了言。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伯达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彻底划清界限。²³会议至此，“庐山战火”就暂时平息了，会议转为原来的议题。

九届二中全会接近尾声了。毛泽东先后找了许世友和张春桥，叮嘱张春桥要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毛泽东知道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政委张春桥不和，有意作了这样安排。张春桥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宴席，让厨师做了几个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都是庐山的名菜。许世友欣然应邀赴宴。这桌宴席就两个人，没有陪客。两人都有好酒量，都是以喝茅台酒出名。这次在庐山，许、张二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大组分别搞了一次会餐。华东大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一幢俱乐部里，南京军区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的中央委员们济济一堂。许世友特地把张春桥请来，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饭吃到一半，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走到张春桥身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张春桥略带微笑，回答说我不在乎。两个人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9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

东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牌，和为贵”。庐山会议结束，清洁人员打扫会场，发现一张“打倒张春桥”的纸条扔在地上。

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张春桥受到的围攻，不只是说明林彪等人，也包括其他政治局的成员对他的看法。为了让张春桥避开锋芒，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让张春桥回到上海。张春桥对家人偶而提起庐山会议情况，说：我们的住处被安排在一个山坳里，四周住的都是部队，居高临下。林彪在庐山是要抓人的，如果不是主席发觉，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他还告诉女儿维维：林彪要揪人以后，我和江青一起先去找周总理。总理不见，说是休息了，我们才转道去找主席。主席接见，态度明确了，我们回来再去找总理，总理叫我们进去了。不知道总理是怎么一回事。

三十多年后，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陈永贵还是很有感触地谈起：²⁴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召集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开了一个会。毛泽东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春桥、文元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理论权威。毛泽东还要陈永贵“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互相学习嘛”！²⁵

林立果上山带来的新思考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就像太极推手，毛泽东和林彪都在发力，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而且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70年4月下旬，结束南方云游的毛泽东和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几乎是同时回到北京。

4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推手进入第三个回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

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作孙权。²⁶毛泽东说孙权要曹操称帝的事见《三国志·魏书》裴松之的注释：“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²⁷曹操虽然这样说，但他周围的人还是希望他称帝，尚书陈群、桓阶上奏曹操称帝是“此天人之应，异气同声”，大将夏侯惇也建议曹操当皇帝，说：“为天下所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对这些人的建议，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文王即商朝末年的西伯侯姬昌，他虽然已联络诸侯，准备反商，但还不敢称王，而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姬发自称为武王，才封他为文王。林彪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要他不要像孙权劝曹操称帝那样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二十五史中，毛泽东最熟悉的是《三国志》，他不会不知道曹操把自己比成文王的深意的。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此时他不敢当皇帝，“曹操终身不敢篡汉者，以吴蜀缀之，此乃战之力也”。曹操想篡汉而又不敢有所作为，有三个原因，赤壁战败所形成的三国鼎立局面，蜀、吴掣肘，一不敢也；二是除了刘表想称帝而没有好下场外，他还看到了袁术想称帝及董卓想篡汉称帝，都没有好的下场，此为二不敢也；三是他自认为“身为宰相，人臣之位已极”，何必背上一个篡汉的罪名呢？他还是为儿子铺平道路，让儿子当皇帝吧。曹操的魏王还是汉献帝刘协封的，建安十四年，曹操封长子曹丕为副丞相，就已经确立曹丕为接班人。曹操死后，曹丕继承的是父亲的王位，而不是刘家的帝位，后来篡夺了刘家的天下，以魏代汉才称帝。曹丕称帝，走的正是他老子曹操为他设计的路子。

历史不好比拟，但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引起后人的联想。庐山会议的一个细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林彪把自己的儿子“老虎”——林立果带上山了。吴法宪回忆说：在林彪处，他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他有点意外，便对他解释说：孩子没有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吴法宪说当时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²⁸不过吴法宪在走出秦城大狱，定居山东济南，静下心来写回忆录时，还能记得这样一个细节，这说明他对林立果上庐山并不是“没有放在心上”。而毛泽东有那样多的眼线，林立果上山，他不会不知道，而

且更是早已放在心上了。这次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上山之前林彪就预计会有一场斗争，林彪把儿子带在身边，不能说只是游山玩水，而没有别的用意。

有这样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管林彪有没有历史上曹操的心态，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而林彪则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可能是因为林认为自己刚当上接班人，毛泽东就不再当国家主席了，必然为天下所不容。他自感承担不了这样的骂名。再说，许多老帅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的军威还在，你林彪一旦把毛泽东放在一边，得不到毛泽东支持，老帅们还会听你林彪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毛泽东同意把“指导方针”、“三个副词”及设国家主席都写进《宪法》，一旦通过了，就标志着毛泽东向林彪就范。因为毛、林一直在“三个副词”上玩双簧式的较劲。如果这一步能使毛泽东就范，以后就可以让毛泽东步步就范，林彪也就可以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林彪的失策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抓住“三个副词”的问题向张春桥发起攻击，以至华北组提出“揪人”，真正触动了毛泽东。毛虽然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但此时还没有和林彪翻脸的意思，只不过是借着陈伯达来敲打林彪。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不同，林彪有儿子，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没有来得及接班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另一个儿子毛岸青身患精神疾病，恢复健康无望。毛的两位公主也不是搞政治的人才，夫人江青虽有着女皇梦，但不能理解他的政治策略，经常会破坏他的战略部署，在他眼里，她是一个干了许多“蠢事”的夫人，被毛泽东视之为政治能力不强的女人。所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目光总是投向周围的人，而不是自己的亲人，只要能对他的战略部署有所理解，并坚定贯彻执行的，对他忠心耿耿的，都可以入选为他的接班人。林彪有儿子，少年得志，而且表现出一些政治才能，林彪选择接班人的目光就落在儿子身上，未来的接班人非林立果莫属。所以无论怎样他都要保住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要保住这个合法的地位，他就必须让毛泽东“就范”，让毛泽东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毛泽东的。在林彪看来，这不是不可能的。他

知道毛泽东老了，搞文化大革命，得不到上层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孤立的。而当时高级领导层的人员结构，军人占了主要地位，林彪在军内有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其他如铁路交通、电台，都实行军事管制，省市以下掌握大权的都是军代表。正因有了这样的客观形势，所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才敢铤而走险，发表了那番讲话。

林立果也确实有政治头脑。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林立果大骂叶群出的馊主意，非要林彪出来讲话，现在翻了车，后果不堪收拾。林彪自己也说这次不该讲话。其实，林立果在庐山已参与了林彪的一些事情。吴法宪要作检讨，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去告诉他：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有问题要检讨，也要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以后，林立果又对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林立果对庐山会议的评价为：一次未来斗争的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可见，林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为的是让他体验一下高层的政治斗争，为他将来接班作一次预演。

毛泽东和林彪表面上是为当不当国家主席而发生了争论，内心深处都是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要林彪考虑他以后谁来接班，实际上是要走马换将；而林彪要力保自己接班人的地位，不只是为自己着想，也是在为儿子着想。毛泽东说到孙权让曹操当皇帝的故事，其用意不只是不想让别人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所以才向林彪发出警示的话：我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把林彪和陈伯达区别开来，一脚把陈伯达踢开了。“天才论”是一个理论、哲学问题，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古今中外都有，只凭陈伯达搞了几条“天才论”语录，无论怎样说，都没有理由把他打倒，而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扳倒林彪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先抛出陈伯达，既为今后抛弃林彪作些铺垫，又保护了张春桥，提升了张春桥的地位。对此，吴法宪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他们。这样实际上也救

不了他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但即使林彪不把陈伯达甩出去，他们还是捆绑在一起，也仍然是谁也救不了谁。开始，吴法宪还安慰陈伯达：“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可是，他后来作检讨比陈伯达还起劲。

催生《“571工程”纪要》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回到北京，呆的时间不长就回上海了。张维维说：“庐山会议结束后，爸爸回到上海，这次他住的时间很长，好像有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北京方面没有人找过他，也没有文件送给他。看到他有些孤单，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他们这次回上海住的时间长，考虑的都是上海的问题，他曾找王涛等商量南市区贫民窟改造的问题。南市是老城厢，居民住房条件特别差，他们想把南市的窝棚房子改建成八层楼，要王涛他们测算需要多少投资。”²⁹

张春桥住在上海期间，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1971年1月6日清晨，他看了刊载在《文汇报》上署名蔡康成的一篇文章《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战线上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示，由《文汇报》理论部记者郭志坤组织上海采矿机械厂工人程继尧撰写的。该文的主要论点有：“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掌握政权的人，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人们执行什么路线，又取决于一定的世界观”。张春桥认为其中有些观点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论点有些近似，他对姚文元说：“我看这篇文章有些问题，要查查写作背景。”³⁰当天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大厦开会，议论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事宜。胡鼎钧把写作组的王知常去找见了姚文元，姚要他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

此前林立果在广州空九师曾搞了一个安全训练经验总结。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大院空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即人们所说的讲用报告，当时在空军引起轰动。林彪曾把这个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成熟。”³¹1970年8月下旬，正当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闹得翻了天的时候，北京空军三代会也在热火朝天的

进行着，会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有油印的、铅印的、手抄的，就像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几乎人手一册。讨论时，称林立果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在空军机关还散布“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³²这些吹捧林立果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还是把林立果看成一个孩子，说：“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吹捧，这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³³蔡康成的文章中，有些提法和林立果讲用报告中的某些观点相接近，不少人就认为它有来头，全国多家报纸转载。张春桥批评《文汇报》标新立异，“放出一棵大毒草”，要《文汇报》检查。³⁴

朱永嘉派写作组的人调查的结果说，这篇文章和空四军写作组卫东鹰有关。其实，这是虚假的信息。郭志坤曾对笔者说：“蔡康成的文章和卫东鹰根本没有关系，是我和作者议论写成的，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没有关系。”郭志坤是《文汇报》理论部编辑，是此文的组稿者。

朱永嘉向徐景贤报告蔡康成的文章和卫东鹰有关，也就是说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有背景的联系，徐景贤认为问题不小，马上组织写作班的人写文章对蔡康成的文章进行批判。于是由写作班的高义龙执笔，以方岩梁为笔名写了《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徐景贤要求《文汇报》用刊登蔡康成的文章同样大小的标题、同样的位置于3月16日刊出。方岩梁的笔名取自毛泽东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林立果等读了这篇文章，紧张起来，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这就促使林立果加速了其密谋夺取最高权力的文件《“571工程”纪要》的策划。“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林立果最早关于《“571工程”纪要》的谈话是在1971年3月18日至21日期间，据李伟信后来在法庭上交待：³⁵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李伟信对这次密谈的印象是：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林立果还认为目前发展形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得先把文人势力搞掉，改变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枪杆子的方向，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危害毛泽东。他们的密谈提到的所谓“文人”是指张春桥。“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张春桥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1971年4月1日，林立果说：现在斗争是争夺接班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点舆论。张春桥和南京军区及上海警备区的关系紧张，上海的警卫工作就不用警备区的人，而由王维国领导的空四军承担。上海市委书记处的警卫工作是空四军派的，连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兴国招待所的警卫、护士也是空四军派遣的。上海的报社、电视台、电台、复旦大学的军宣队也都是空四军系统的。警卫部队要向空四军汇报上海市委的动向。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是在上海起草的，上海是他们控制的据点。他们如果真的搞政变，接管上海市委是很容易的。

促使林立果《“571工程”纪要》出笼的不仅是《文汇报》3月16日方岩梁的文章，使林彪、林立果心脏收紧的还有《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张春桥自己执笔写的，经毛泽东审阅，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编辑部署名发表，刊头照片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下面的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林彪却明知道这只不过是做文章而已。文章中提到《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里所指的当然不再是刘少奇。文章讲到要警惕“同那种自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矛头虽然是明确指向陈伯达的，但是林彪系统，特别是林立果周围的人分析认为，庐山的事情并没有完，这篇文章代表了毛泽东近期的意见，是向林彪发动攻势的信号。

1991年5月25日，张春桥在狱中给女儿写信，提到他1971年写《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时的情景，信中写到：

临近“七一”，使我回想起20年前的一件事。你还记得我寄给你一篇纪念“七一”五十周年的文章吗？那篇文章我写得极不痛快。庐山会议林彪发动政变未遂，事情并没解决，因而文章很难写。写出来一个初稿，印发中央会议讨论，人们却热衷于争取在文中提到与他(有)关的事，其余的一言不发。整个会议本来应当是批陈伯达的，兴趣却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他们明明知道这并不是

陈伯达的事，却在批陈的名义下干得十分热心。实际上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在这种情形下，有什么办法写好文章呢？只好不痛不痒。聪明的周恩来见我一句也没称颂林彪，就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稳了。就是在这种情绪下，我寄给你一份清样，并且要你在五十年以后，党的第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看看那时的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是想说，再过五十年，中国应当变得更加光明。十年、廿年、一百年，在历史都是很短暂的。当时，我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没想到，当时林彪已在策划新的政变，更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林彪就摔死了。现在，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反动派的猖狂，可能使革命遇到挫折，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新的革命高潮总会到来的。³⁶

在庐山，林彪和张春桥斗法，林彪输了，但他没有输给张春桥，而是输给了毛泽东。从张春桥给女儿的信中可以看出，林彪的影响还在，张春桥虽然是追随毛泽东的赢家，政治局的人还是不把他的文章——即使是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当作一回事，讨论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王顾左右而言他，言不及义，这是张春桥在二十年后还感到没能把文章写好的余痛。

1970年的“庐山事件”在当时还是保密的，只是在相当级别的干部中通气，一般干部和党员都不知道。1970年底，在内蒙古插队的知识青年陈克艰回上海探亲，通过他的老师从部队高级干部的秘书那里看到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第一次听到陈伯达的消息，感到很惊奇，经这位秘书的同意，他抄了一份。老师虽然一再叮嘱不得外传，陈克艰还是把这份保密文件传抄给在吉林插队的同学。这样传来传去，传到中串会红卫兵的手里。后来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知道这件事，马上立案调查，要查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最后查到陈克艰那里，各种消息都对得上，就只是简单的传抄，也没有很大范围的扩大，也就不了了之。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可以说明，毛林矛盾的焦点还是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毛泽东还不想把矛盾扩大，更没有准备和林彪决裂，所以

对林彪系统的人采取了又批又保的方针。毛泽东的这种决策也可以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看得出来。

张春桥在上海过的时间不短，后来就同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也就是批陈整风会议。写作班的萧木亦随他们前往北京，其任务是帮助王洪文、徐景贤写发言稿。王洪文的发言是批陈伯达在安亭事件时发的电报，徐景贤的发言是批陈伯达的天才论。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庐山会议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被林彪系统攻击的主要对象。可是在批陈整风会议上，张、姚的发言被吴法宪评为比较客观，调子亦不是很高。批陈整风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处起草会议总结。原来吴法宪等人的检讨调子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特别是张春桥，把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中的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吴法宪认为这是张春桥对他们表示友好。这个总结送给毛泽东后，毛批示“同意”。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讲话结束时，当时任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大家都跟着鼓掌，会议气氛一下子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在庐山会议上，张春桥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林彪的五员战将黄、吴、叶、李、邱是主攻手，大大地伤害了张春桥。这次会议，他们在检讨时，张春桥还能带着一颗委屈的心为他们修改检讨稿，把其中无限上纲自我批判的话删去，表现了张春桥的气度。张春桥所以能这样做，应该是他体会到毛泽东还要加强团结的愿望。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可是林彪不但坚持不讲话，甚至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

毛还在等待，林则尽量躲避。1971年五一劳动节晚上，林彪是被周恩来逼着，非常勉强地来到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在和西哈努克谈话，旁边分别是翻译齐宗华、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林彪一脸严肃，坐在毛泽东对面，毛泽东的一切举措都似乎与他无关，他也没有同毛说一句话，只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7月初，林彪在不作任何表示的情况下离开北京到北戴河去了。黄永胜、吴法宪等前往送行，林彪一句话也没讲。这当然使毛泽东非常失望。林彪为什么会这样？从他对毛泽东性格的了解，及他写在那些卡片上讲权术策略的话，以及他个人的智慧，应该还是有办法对付毛泽东的，起码不会和毛泽东搞成这样的僵局。林彪当时是怎样想的，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别人是无法猜到的。

林彪“折戟沉沙”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开始南巡活动。8月16日到达武汉，9月12日回京，历时29天，前后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十三次，即他所说的“吹风行动”，对林彪采取了“摔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行动。毛泽东沿途找人谈话，重提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事。认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九大路线”，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要夺权。”“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错误，改也难。”³⁷

毛泽东此次南巡，目的明显是要彻底解决林彪问题。一直以来，研究者们大都把毛的该行为说成是洞悉林彪准备篡党夺权的阴谋后，所采取的必要应对措施。但也有观点认为，毛泽东以党主席之尊，不通过召开党的会议的正常方式，而是用私下串联、谈话的非组织行为来行政治斗争，把林彪父子逼上了绝路，要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负上一定的责任。还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北京已经难以完全控制局势，他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迫不得已。毛泽东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外传，但是，谈话内容还是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被密报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这至少使得林立果认为，毛泽东马上就要动手。而他既然已经搞了个刺杀毛泽东的《“571工程”纪要》，走出了这一步，也已经没有退路。

9月8日，林彪下达了准备行动的手令。³⁸9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由于他察觉到一些异常情况，于是要汪东兴把专列立即从杭州转移到绍

兴支线，停留了36个小时，未见异样，但毛泽东仍然决定，专列立即前往杭州。9月10日13点40分，毛泽东专列由绍兴出发，14点50分钟到达杭州，而毛泽东又决定下午离开杭州去上海，晚18时许，专列到了上海。11日，时近中午，毛泽东再次决定，不同任何人打招呼，马上离开。13时左右，专列离开上海，直发北京。

毛泽东原来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9月底才回北京，林立果等也是据此时间表，策划在上海、苏州之间布置刺杀行动，但毛泽东以快打慢，神出鬼没，如金蝉脱壳一般，突然返回北京，使得刺杀没有来得及实施，就以失败告终。9月12日下午13时10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了北京丰台车站，他没有立刻进京，而是在列车上找人谈话，并调了三十八军的一个师到南口。一切布置结束，16时05分专列到北京，毛泽东即回中南海。

纵观毛泽东在此期间的行踪，似乎对林立果的刺杀方案了如指掌，处处有针对性，故有人分析说，在林立果身边，有可能隐藏着毛泽东的耳目，将刺杀计划全都密报给了他，这使得毛的一系列安排，有如神助，而惊险地躲过了刺杀。也有人说，其实林立果的刺杀计划破绽百出，而且还没有开始实施，毛泽东此时的反应有些草木皆兵，但错有错着，反而因此离开了险地。9月12日，毛泽东平安抵达北京。林立果与林彪、叶群已经无路可走，才选择了出逃，这一步最后的险棋。

在笔者看来，林彪是老夫少妻，其妇又是一个不太安本份的人，再说“儿大不由爹”，儿子和娘要叛逃，他这位做爹的又有什么办法？林彪毕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即使他不出逃，到即将举行九届三中全会时，毛泽东也会把他捋下来。也许林彪对此感到无所谓了，但是他不得不放弃元帅的军人情怀，像凡人百姓一样，担心妻子儿子会受到牵连，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儿子着想，他只好随妻儿一走了之。

1971年9月12日23时许，北戴河，林彪一家三口，与司机、秘书、警卫乘坐一辆红旗大轿车出逃。负责林彪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部队在事先没有任何确证的情况下，竟然向着他们应当拼死护卫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座车连开数枪。是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还是当时自发的行为？不得而知。红旗车冲过几道防线，驶向山海关机场。

9月13日0时22分，林彪一行的车驶到了山海关机场，他们来到事先被林立果安排停在那里的256三叉戟飞机前，仓皇狼狈地攀着软梯爬了上去，并在一半机组人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大问号般的轨迹之后，向北飞去。据说，林彪（或林立果）的本意是要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别有动作，但因飞机燃油不足等原因，南下的可能已被堵死，故而只有北逃一条路。

李作鹏后来表达了他的疑惑：其实那天若真想要阻拦林彪飞机起飞非常容易，林彪从住地出逃到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有一个营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辆车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他说自己想了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他不跑！林彪的飞机接近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时，有人请示要不要派飞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³⁹

9月13日凌晨2时25分，林彪一行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折戟沉沙，飞机上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及随行人员、机组成员在内的九人全部死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256号飞机迫降之时，机上还有足够飞行20分钟的燃油，而60公里外就有一个军用简易机场，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在草原上迫降？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除非公布记录失事前机内各项数据、录音的“黑匣子”内容，这一切才有可能得到解答。近年又有一种说法，飞机在飞到苏蒙边境，就要进入苏联境内的时候，突然掉头南返，一直飞到温都尔汗坠毁。有人分析，有可能是驻蒙苏军误认为这是入境进行军事侦察，完成任务后返航的飞机，故发射导弹，将其击落。但也有人根据当时驻蒙苏军的实际情况，认为该说法不足为据。笔者也无法证实其真伪，录此仅备读者参考。“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波谲云诡，疑雾重重的事件，有着很多的谜团，直到现在，这些谜团都没有能完全破解。

9月13日凌晨，在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上，周恩来简单地介绍了林彪出走的情况，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张春桥一直随着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下午一点多钟，周恩来、张春桥回到人民大会堂，布置政治局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民

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泽东。⁴⁰

9月15日下午3时，在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召集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姚文元，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下午5时，周恩来告诉他们，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失事，飞机上人员全部死亡。9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待。一直到9点钟，周恩来才从毛泽东那里过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主席请示，中央很快要发出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全党。”周恩来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了“九·一三事件”。⁴¹

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酒吧间，是供开会的人休息、喝茶、吃东西的地方。本来林彪军人派系和文革派阵线分明，每当会议休息，这两派的人都抢占这个地方，军队派人先抢到这个地方，文革派的人绝不会过去，反之也是如此。而此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临散会时，周恩来问：“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否觉得此时的张春桥对林彪之死心中特别高兴？张春桥马上说：“好。”即刻叫服务员拿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每人倒上一杯，大家碰杯，表示热烈祝贺。这时汪东兴从毛泽东住处过来，对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感谢林彪帮了大忙。”这时，张春桥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⁴²

按照周恩来平时的风格，应该是他请大家饮茅台酒，但他没有，而是让张春桥请大家喝酒，如果汪东兴所言非虚，毛泽东在中南海也与身边的人碰杯祝贺，这表明周恩来不只是了解张春桥的心情，而且深知毛泽东的内心感受，但他自己却不请大家喝酒。周恩来此时胸中的玄机不能不令人猜测，对林彪之死他是高兴，还是抱有一份同情之心？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黄永胜撕裂肺腑地喊了一声：“他妈的，跑什么跑！”⁴³黄大将军应该知道，林彪为妻子、为儿子，不能不跑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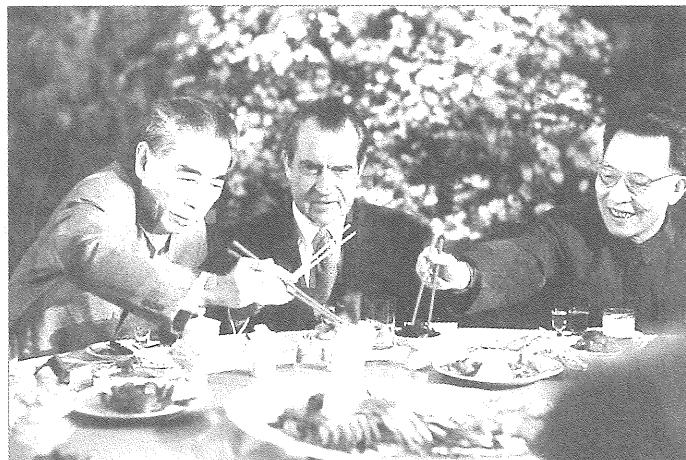
注释

- 1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8—49页。
- 2 另一种说法认为，林彪该命令的内容是在行使他国防部长的权力，是对军队战备工作的必要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字是时任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的阎仲川临时起的文件编号，并没有任何的政治含义，林彪也毫不知情。
- 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4页。
- 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 5 2013年5月13日胡鼎钧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6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 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5页。
- 8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1页。
- 9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784页。
- 10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 11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 1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695页。
- 13 解学恭，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此时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及华北组的讨论。
- 14 解学恭：《九届二中全会日记》，《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第65页。
- 15 见邵一海：《林彪913事件始末》，第78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03页；李少华、游湖：《林彪这一生》，第238页。
- 16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第216页。
- 17 李荣欣：《名将曾思玉》第518页记载：毛泽东拍着桌子骂陈伯达，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毛泽东还说：“国家主席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 18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717—718页。
- 19 “杞国无事忧天倾”，是李白《梁甫吟》中的诗句。毛所说的“一位古人”即指李白。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页。
- 2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9页。
- 2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719—720页。
- 23 同上，第721页。
- 24 陈永贵，原为山西昔阳县大寨党支部书记，时为九大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 25 秦楚：《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 27 陈寿：《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
- 28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第791页。
- 29 2011年5月25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30 2013年6月8日胡鼎钧和笔者的谈话，他当时在场。
- 31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第851页。
- 32 同上，第850页。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395页。
- 34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6页。
- 35 李伟信，林立果的生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他与周宇驰、于新野一起乘直升飞机企图越境逃跑，三人均为林立果秘密小团体联合舰队成员。这架直升机迫降时，三人约定自杀以殉。结果，周、于两人自杀，而李伟信是朝天开枪，没有死。周宇驰，曾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曾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
- 36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98页。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389页。
- 38 关于林彪在多大程度上对林立果等的“571工程”计划知情，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571工程”从一开始就是林彪授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571工程”是林立果联合舰队单独搞的，对此叶群或许知情，林彪则始终被蒙在鼓里，直至“九·一三”前一天。而《九八政变手令》上只有意义含糊的一句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并有横写和竖写两份，据推测，可能为林立果、周宇驰伪造。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05页。

- 40 李德生，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 41 林立衡，小名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林立果的姐姐。她认为是叶群和林立果要胁迫林彪乘飞机出逃，故于9月12日当天向周、汪做了报告，希望他们进行阻止。值得一提或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林立衡报告后，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部队负责人向她传达上面的指示，让她和未婚夫张清林跟着一起上飞机，被她拒绝，她因此成为林彪一家在“九·一三事件”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 4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798页。
- 43 黄正：《军人永胜》（下卷），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第十六章



1972年2月张春桥（右）与周恩来（左）
在欢送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宴会上

第十六章

对垒周恩来

毛泽东要周恩来读史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林彪系统的人马，有的成为他乡之鬼，有的成为阶下之囚，昔日的显赫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政治局常委中，毛泽东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康生卧病在床，只有周恩来仍然在以补天精神在修补残缺的中央政治局和破败不堪的文革。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林彪的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唯生产力”那一套，来改变他的“继续革命”的方向。在希望结束运动、发展生产的观点上，周恩来和林彪是一致的。如今，周恩来遇到麻烦，毛泽东在病中，对他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¹毛泽东的话不但没有让周恩来高兴，反而令他诚惶诚恐。在共产党内一直做第三把手的周恩来，如今突然升到第二位，对他这个和毛泽东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不知是福是祸，是吉是凶。周恩来有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不是帅才，只能作为管家而不能作为当家者，而且他自己多次在党内表示过。在政治上安分，对毛泽东恪守为臣之道，没有越位的非分之想，这才是真实的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把朱永嘉他们注的《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及《刘牢之传》给周恩来，要他和政治局常委们阅读。“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北方又有苏联大军压境，内外交困，和谢安出山时东晋的形势有点相似。谢安，字安石，东晋政治家。他从童年时就神色沉敏，风宇条畅。他一生喜爱音乐，善于弹琴，又精于书画鉴赏，是东晋最大的门阀势力之一谢氏家族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东晋名将桓彝的称赞，“此儿凤神秀彻，后将不减王东海”。²及长，官府召用，谢安称病不就，与王羲之、许询等交游。³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简文帝逝世之后，东晋局势不稳，形勢动荡，处在危急之际，众人请谢安出山，“安石不得出，将如苍生何？”谢安不得不出山执政。他出山之后，任中书令，也就是宰相，淝水一战，打败了北方前秦皇帝苻坚统领南下的雄兵百万，稳定了东晋的局势。而此时的毛泽东对周恩来也寄予很高的期望，毛让周读《谢安传》，既有安抚、又有称赞的意思，周恩来自然是很高兴的。

毛泽东让周恩来读《谢安传》的同时，又要他读《刘牢之传》。刘牢之是谢安的侄儿谢玄的部属，是一位善战的勇将，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功劳，后来成为京口北府兵的将领。但是，在东晋众多势力集团中间，他倒戈来倒戈去，结果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缢而亡。庐山会议时，陈伯达倒向林彪，毛泽东批评他，说“我这边船还没有沉，你就老鼠搬家”，并要他读《刘牢之传》。这次毛泽东又借助倒戈将军刘牢之这个典型，是要告诫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委员们，你们不要做刘牢之或陈伯达那样的倒戈将军，不会有好下场。这也正是毛泽东的厉害之所在。

再说桓伊，字叔夏，有军事才干。桓家也是东晋大家族之一。桓伊能文善战，在淝水之战中有功。但他秉性谦逊，虽有战功，而始终不改变。而且好音乐，善吹笛，为江南第一人。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行为不检点，引起谢安的厌恶。⁴“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引起孝武帝与谢安之间的矛盾，常弄得谢安局促不安。有一次，武帝于宫中举行宴会，谢安与桓伊都出席了，孝武帝要桓伊吹笛助兴。桓伊奏了一曲之后，便自我推荐还会弄筝，于是边弹边唱了一首《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

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唱得声情慷慨，俯仰可观。这是桓伊以音乐歌曲来借题发挥，有意调解孝武帝和谢安君臣之间的关系。当时谢安听了，泪下沾襟，孝武亦有愧色。这篇故事的意思是讲大家要善于调和君臣之间的关系。

从当时中国的局势来看，文革运动中是三驾马车在领导着中国，毛泽东总揽全局，林彪主管军队，周恩来处理国内外大事。林彪的出走，三驾马车失去了平衡，收拾中国的烂摊子，主要依靠周恩来。研究文革史的专家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是中共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难免有种种不协调之处，执行者对决策者的理解难免有差异，何况周恩来对文革有自己的保留看法，这一点毛泽东心中很清楚，也有所警惕。毛和周之间的矛盾，周恩来所受的委屈，不但没有吹笛人来为他们调解，反而有王国宝式的江青、张春桥从中作梗。为了统一意见，共度难关，毛泽东借助这个古代故事对周恩来表达出他的意图：我有我的难处，你有你的难处，但文革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在摩擦中走过来了，现在我们又都是风烛残年，还是在摩擦中携手前进吧。

毛泽东准备让邓小平出山，但又不直接安排，他让周恩来读经朱永嘉等注释的大字本《史记·汲黯列传》。这是西汉大臣汲黯和郑当时的合传。汲黯，字长孺，其祖先是战国时魏国君主，在汉景帝时便是太子洗马，是汉武帝的小兄弟。⁵在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只不过是小吏。⁶但公孙弘、张汤深得汉武帝的欢喜，升官很快，如同文革期间得到毛泽东赏识的王洪文等造反派，直升飞机一般，地位一下子提升上来，和汲黯同一级别，位列九卿。汲黯仗义和汉武帝有着小兄弟关系，就发牢骚：“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汉武帝默然。待汲黯退出，汉武帝说：“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意思是说汲黯这个人不好好学习，憨态愈发严重了，不能与时俱进。

郑当时，字子庄，其祖先为项羽的将领，项羽死后归汉。郑当时的先辈在汉初不得志，武帝时开始启用他，从地方官做起，以后与汲黯一起位列九卿。但他为人非常谦恭，“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即凡是客人来访，不论是贵是贱，都要及时通报，做到门口没有等候的人。“与

官属言，若恐伤人，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就是说他善于向汉武帝推荐人才，下面有好的建议，就立即向朝廷推荐。他很受人尊重，但是在朝中论事，常发表不合武帝之意的议论，结果被降级使用。郑当时和汲黯的命运一样，后被武帝罢了官，家贫，宾客也都散去，不再上门，死后家无余财。司马迁为此发了一通议论：“夫以汲、郑之贤，有则宾客十倍，无事则否，况众人乎。”他感慨地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的革命老干部都被罢黜了，过着和汲黯、郑当时一样的生活，受人冷落，门可罗雀。现在，毛泽东想让革命老干部出来帮助他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要周恩来去做解放干部及让邓小平出山的工作。对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洞若观火，马上便领会了此举所含用意。他抽空读完了《史记·汲郑列传》，并随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对太史公所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⁷其后，解决邓小平及老干部问题就加快了步伐。

以上几篇古文是张春桥、姚文元受命于毛泽东，要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的八十六篇古文中第一组的四篇。在周恩来临危受命之时，毛泽东要他和政治局的人读，其含义当还不只笔者作的这样浅显的解释，而有更深更广的意义。但毛泽东没说，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林彪是极右还是极左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在扭转文革的困局上，任何正本清源的做法都不是明智之举。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之后，他采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恩来机智而巧妙地未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是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的极左思潮上。

在清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错误时，周恩来不能不顺着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调整和松动。毛泽东要对选林彪作接班人有所交待，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总是为毛泽东作些

解释，绝口不提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词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⁸周恩来总是为毛泽东铺好台阶，使毛不会太难看。

毛泽东也是善于在政治上故作姿态，他安抚那些曾经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老军头。从1971年秋天开始，他就不断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要把文革中几位老帅们挨整的帐算在林彪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还有，“二月逆流”的主将陈毅病逝后，在病中的毛泽东穿着睡衣去参加追悼会，并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那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说：“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⁹周恩来抓住这些事，从解放干部的问题入手做文章。但这些人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政治对头。

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对老革命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时，江青、张春桥就发动攻势，每通过一个都是很不容易，双方争论激烈。会议一般从晚上7时开始，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往到深夜12点钟也结束不了，常常吃过夜宵后，再一直讨论到凌晨3点钟才结束。叶剑英对此深有感触，把这比作当年红军长征时牵着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河》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河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当时《文汇报》根据周恩来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除了转载周恩来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外，也紧锣密鼓地在报上发表落实干部政策的社论和报道。上海市委写作班朱永嘉下达指示说“对宣传老干部骨干作用要适当控制一下”，要把重点放在宣传“新干部培养上”。

1972年8月初，周恩来利用接见回国述职驻外大使的机会，在纵谈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告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周恩来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周恩来在报告中十分注意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

“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就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不使人抓住把柄，而且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内心的隐忧透露给张春桥和姚文元，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¹⁰毛泽东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却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周恩来继续批林彪的极左思潮，并把双方较量的空间留给了江青和张春桥。因此，围绕着是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在中央党内高层中很快就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是围绕着1972年国庆社论展开的。这年9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层面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者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

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吴冷西在行文中很谨慎，批左、批右兼顾，而且把批右放在前面。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在审查社论时注意到其中的提法，没有和周恩来打招呼，就把社论的核心思想“批判极左思潮”几个字删去了。不仅如此，张春桥、姚文元还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向《人民日报》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和周恩来唱起对台戏。

以周恩来的政治敏感，从张春桥、姚文元在此事上的强硬态度上，便知道来者不善，知道背后大有名堂。为了不把事情闹僵，于是避其锋芒，采取主动退让之策，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时，不再坚持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且把有关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¹¹毛泽东不作明确表态，双方的对垒都是心照不宣，只在文字上用功夫。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杨先生说我们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

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¹²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时，在谈话中又一次赞扬杨振宁的意见，并对陪同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¹³7月20日，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和科学的研究的建议》。

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的郭沫若、刘西尧、丁国珏、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及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¹⁴

此后，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写成了《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九期上。而原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周培源的《对综合性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送给《人民日报》后，姚文元即指令《人民日报》记者分别去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组织理科教师开座谈会讨论，统一认识，搞了一份反对周培源文章的“群众意见”。

8月15日，姚文元在给《人民日报》一个批示中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会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下令把周培源的文章转到《光明日报》发表。8月18日，姚文元来到上海。他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好不发，不发要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

徐景贤、朱永嘉对姚文元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上海的报纸上组织了一场笔战。仅在《文汇报》上，就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基础理论》、《这个问题提出是否妥当 对〈怎样编好基础教材？〉一文的质疑》、《显微镜下看不到的广阔天地》、《打什么基础理论》、《到实践中去求真知 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把基础理论和科学实践对立起来。毛泽东提倡走机床厂实践办学的道路，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理科大学的基础理论教学，两者显然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是周恩来提出要批左、毛泽东提出要批右的具体反映。

半路杀出个王若水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抓整顿，陷入步履维艰之中，即使他步步设防，仍然是步步踩雷。

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整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自8月中旬以来，周恩来多次指示要批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王若水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¹⁵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稿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组文章写好后，10月中旬趁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陆续在《人民日报》刊登出来，其中打头文章即是龙岩写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

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看了《人民日报》文章后立即作出反应，二人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¹⁶江青在北京相呼应，批《人民日报》时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江青还要追查文章“背景”，责令《人民日报》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向潮”运动。

张春桥、姚文元令上海市委写作班通过《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用工人的话来批判龙岩的文章。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发表在1972年11月4日的《文汇情况》上。之后《文汇情况》把各地报纸上的批极左思潮的提要一一摘出，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把矛头对着群众，是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接着，张春桥又指示《文汇报》组织文章，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姚文元还把《文汇情况》批给《人民日报》，要他们组织讨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样做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在毛泽东还没有直接出面干预前，他仍然耐着性子和他们周旋，不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11月30日，中联部、外交部发了一份《关于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张春桥看后，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¹⁷

王若水则没有周恩来这样的涵养，他看了《文汇情况》，即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架势，说：“我看了大吃一惊，心想，中央还没有这种提法，难道《文汇报》要领导批林批孔运动了？”¹⁸我又感到困惑，《文汇报》怎么会有那样大的胆子？”¹⁹于是，他于12月4日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的状。王若水的信反映了当时批左还是批右，即周恩来和张春桥的较量，摘录如下：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8月8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判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春桥同志为了说明批左中出现过头的问题，举了批“精神万能论”和批“唯意志论”的例子，说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不是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因为主席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11月4日，《文汇情况》第312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锐。这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第一次在内部情况上批评《人民日报》，而文元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同寻常，值得严肃地深思了。

对这份情况，我们感到很难讨论，因为是工人意见。就在我们讨论期间，《文汇报》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11月6日的一篇

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11月24日，《文汇报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的影响，其中包括某些地方报纸提出的有关论点。《文汇报情况》没有直接批评这些论点，但实际上是对他们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的。

中央所批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中，也是强调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因此，我认为批左是中央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毛泽东接到王若水的信，第二天即约见江青，要她把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阅批：“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²⁰ 12月15、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信中提出的问题。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谈到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是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就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林立果、林彪不要称为“贼”。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²¹

毛泽东批评了王若水的信之后，可能因为王若水是《人民日报》的，又讲了汉宣帝批评太子汉元帝的故事。这是毛泽东第二次针对《人民日报》讲这个故事了。第一次是1957年，还是在“鸣放”阶段，《人民日报》

落后于《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光明日报》，毛泽东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并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在当时，王若水写这样一封信，可谓是很有勇气。他所以敢这样，可能是因为毛泽东称赞过他写的哲学文章，特别是对他写的《桌子的哲学》评价很高，这就增加了他给毛泽东写信的底气。

半路杀出个王若水，使毛泽东站出来公开表态，不赞成周恩来批极左，使周恩来的整顿也停息了下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找王若水谈话。12月19日，《人民日报》几个领导和王若水，被通知晚上8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编辑鲁瑛知道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以为王若水可能要受重用了，在汽车里拍着他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人民日报》的事，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周恩来和蔼地和他们握手，王若水发现张、江、姚三人都绷着脸，怒形于色。王若水坐在靠近周恩来的方。周恩来看大家都已坐定，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和别人的文章，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右的问题。

周恩来讲了很长的话，其中谈到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出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要彼此通气。周恩来说的话，王若水觉得很散乱，缺乏条理性，也缺乏说服力。周恩来是卓越的演说家，但这次却似乎变得平庸了。实际上周恩来讲的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他是同意王若水的某些观点的，而这时逼着他说不赞成的话，使他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轮到王若水时，他又把信的内容大体讲了一遍。

接着，双方就为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舌战从19日晚上8时半开始，到20日凌晨2时结束，整整五个半小时。在讨论中，张春桥作了插话，对王若水提出批评，认为王若水在周恩来、姚文元和他之间找空子，在中央文件中找空子，在总理身上找根据，在中央文件中找根据，这都是不行的。张春桥认为林彪只是有些时候表现为极左，但从主要方面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吴冷西认为，鲁瑛的工

作很不容易，如果他来干，肯定会犯更多的错误。鲁瑛吞吞吐吐讲到了他的工作难做，干不了，处理稿子发生争论，他也顶不住。看到鲁瑛提出干不了的问题，张春桥感到不能不表态了。张春桥认为王若水和鲁瑛的精神状态不好。王若水既然向主席写了信，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可以讨论的，却提出不干了。张春桥又批评鲁瑛打退堂鼓。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势力，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贯彻这次舌战精神，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批判进行了几个月。

《新情况》再起风波

周恩来要批林彪的极左思潮，毛泽东则说林彪是极右。在共产党内常常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没有讨论的余地。周恩来作了检讨，由批左转向批右。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准备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启新的历程了，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外交部又弄出一个《新情况》，毛泽东节外生枝，对周恩来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十三个协定。周恩来认为如果苏美两个大国打破“冷战”状态，对中国不利，于是他和毛泽东紧急磋商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约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谈话。他对布鲁斯说：“我们对美苏签订核协定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不丧失立场。”

6月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十分赞同周恩来的表态，说：“这下腰杆硬，布鲁斯舒服了。”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向外交部提出“苏美关系是个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的要求，外交部写了一篇研究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

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认为这个分析有可取之处，值得一看，但并不代表他的外交主张。

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情况后，便履行职责，立即向毛泽东汇报。7月1日晚上，毛泽东看了《新情况》，认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跟着西方理论跑，和他的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不符，火气甚大。7月4日，他亲自召见负责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作了一番谈话：

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毛泽东最后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²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实际上通篇重点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但在要害处，语气很重，露出杀气，如“贼船”，“修正主义”的提法，都是能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单独接见张春桥、王洪文，也表明在十大时他们的政治地位会提高。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讲话”的内容。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刚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又像小媳妇一样连夜向毛泽东写检讨，并把在此前他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一并

找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是不依不饶，7月5日，对周恩来的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办法。”²³

接着，周恩来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事情起因还是在中美关系上。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作了四次正式会谈，三次单独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口径谈话的。11月12日，周恩来陪同基辛格会见了毛泽东，基辛格说苏联要摧毁中国的核能力，而美国“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基辛格想让美国替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这使一向强调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极为不快，他当场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的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保护。

11月14日凌晨，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商定了公报的措词。公报全文送毛泽东审定。会谈本已结束，基辛格也将在15日上午离开中国。但就在启程回国前几小时，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单独拜会周恩来，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周恩来马上用电话请示毛泽东，回答是主席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又觉得不见基辛格不好，就在译员唐闻生的陪同下与基辛格作了单独会谈。

会谈时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提出的问题，由于未及时请示毛泽东，所以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只是答复：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在基辛格后来写的《基辛格秘录》一书中，在会谈备忘录里也记下了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作为一国总理，这样回答并未丧失原则，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当场顶回去，同时在事后又没有把最后一轮单独会谈的情况补报毛泽东。谁知，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周恩来的重大罪责。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

政治局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周恩来的

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他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会址由钓鱼台转移到人民大会堂。²⁴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叶剑英陪绑，作了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为题的检讨。

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不发言。被扩大到会议中来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唯恐落后，对周恩来批得更凶。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也免不了这样的境遇。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更是冲锋陷阵，批周恩来是“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

发言几乎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是刚从江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他虽然列席会议，发言不多，但分量很重。1988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作了一个谈话纪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邓小平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却使在人们印象中周邓有着深厚友谊的神话彻底破灭了。毛泽东得知邓小平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长谈，因为当时已是深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²⁵

随王洪文去北京的萧木回忆：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王的秘书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泽东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看到周恩来整日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

了。他一生很注意修饰，这期间，却是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成天穿着一件淡蓝色条子的毛巾睡袍坐在办公室里。他不再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步履矫健，而失去了他特有的风范。

2006年，徐景贤从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耿飚女儿耿弘那里得到证明，在江青被捕、判刑之后，邓颖超向叶剑英提出要给周恩来平反，要求销毁批周档案。经中央同意之后，由赵炜和周恩来的警卫员当着邓颖超的面，把这批档案记录给烧了。徐景贤分析烧毁批周档案的原因：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

纵观和周恩来对垒的前前后后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戏，总导演是毛泽东，周恩来虽为主演，但却是一个反面角色；江青虽然在舞台上是个活跃角色，但她对总导演的意图领会不深，常把角色演得过火，失去控制，不得不用旁白的形式开导她。总导演给她的角色定位是“女文丑”。和周恩来演对手戏的是张春桥，每场戏演出之前，总导演都要给他讲戏，他对导演的意图领会得较为深刻，在演出时加上自己的创意，知道在什么地方该着力亮彩。不温不火的主角周恩来也还招架得了，在舞台上几个回合的交手也就过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纷纷扰扰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真正演大轴、压台戏的是头牌演员邓小平，登场亮相，台词不多，却有着画龙点睛的点题作用，把戏推向了高潮，使整个舞台亮了起来。这既在总导演的意料之中，又在总导演的意料之外，余味无穷，好戏还在后头呢。

蜗牛事件和批黑画

1974年，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考察彩色电视机显像管工艺。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代表团一只玻璃蜗牛制品。这是康宁公司作为礼品送给

来访客人的。代表团回国后，四机部一位技术人员觉得这是外商羞辱我们技术落后，而同行的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位技术员一气之下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那时正值批林批孔的时期，江青抓住这件事做文章，指责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对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就蜗牛事件先作调查，再作决定。《朝霞》编辑部闻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题材，就组织了一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当时读者对这篇小说反响较好，《朝霞》编辑部还拟撰文评介。然而外交部根据调查的结果写出的《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却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观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出的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此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²⁶

《朝霞》编辑部本拟作评介的文章也就此作罢。后来，《中国文学》感到这篇小说写得较好，准备转载，希望小说的作者段瑞夏能将蜗牛的细节删去或作些处理，但《朝霞》编辑部不同意删改，《中国文学》也就没有转载。萧木后来在《人民日报》署名方锣的文章《新人任树英》（小说的主人公）中带了一句：“个别的事例或提法可能不很确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可以说是对小说写蜗牛事件的一个交待。

1971年12月，根据对外形势发展需要，周恩来多次过问出口工艺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工作，提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平，要富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陈列国画。有关部门据此精神，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1972年9月，又组织了全国工艺展览会，先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及农业展览馆举办，展品一万余件。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提出以出口工艺品换取外汇，只要不是反动的、丑陋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²⁷为此，上海外贸系统为了做出口宣传，印了一本图录《中国画》。这本画册有山水、花鸟、人物以及仿古画三十七件，出版前都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他们点头

通过。这期间，黄永玉画了一幅《猫头鹰》，只画了一只眼睛。有一个画家打小报告揭发说，黄永玉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这就引起了中央文革的注意。江青还看到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编印的《中国画》，画册中有一帧陈大羽画的《公鸡》，尾巴翘得很高，就说这是好斗的公鸡，是黑画，并联系到周恩来关心的工艺品的展览，批评那个展览是复辟回潮，要以同样规模办黑画展览。张春桥予以支持，不但在北京办了黑画展览，在上海也办了黑画展览。徐景贤还要《文汇报》派记者去北京看画展，写批判文章。1974年3月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当时正在批判孔丘的“克己复礼”，以此文为开场戏，这场闹剧一直到5月才结束。

北京对批黑画这件事做得更奇绝。开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社会上找不到画家们的作品，更没有像上海印的那种画册，就把新北京饭店、外交人员俱乐部的布置用画收去。为了这些布置画，周恩来曾亲自过问，并指示是给外国人看的，不要画反动的、迷信的、黄色的东西，要画民族的东西。“批黑画”时就把这些花鸟、山水及人物画送到中国美术馆去展览，其中就有董寿平画的梅花、叶浅予画的鼓舞、黄胄画的新疆风情、黄永玉画的猎鹰、彦涵画的大榕树等。当时许多画家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不在北京，就从干校把他们召回来接受批判。

一开始没有和画家们讲实情，只告诉他们是看内部展览。文革期间，以批判为名的内部观摩、展览的事常有。画家们听说是内部展览，以为是画集画册内部观摩，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还颇为高兴，没想到走进展馆一看，全是画家们自己的作品，只彦涵一个人的作品就挂了四十多张。他们还以为要等中央首长来审查，走进去才看见大告示牌写着“黑画展览，供批判用”。他们来不及分辨，就被汽车拉到中央美术学院去接受批判。学校大院中贴满了大字报，批他们是“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动黑画家”。后来又把他们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万人大会的批判。黄胄因画毛驴出名，被批判成“驴贩子”，黄永玉因画的是比较新颖独特的小品，被批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刻骨仇恨”，彦涵画的大榕树则被批判为“表现盘根错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种种。

这批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批判之后，又被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去看了。江青问周恩来：这批画你看怎么样？意在将他的军。但周恩来没有搭理她。这批画中有的作品后来就成了人民大会堂的布置用画。

蜗牛事件及批黑画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闹到中央政治局，真如同猴子要老虎。文革小组的那几个人就像是猴子，周恩来执掌的国务院是老虎。尽管猴子如何戏耍，老虎不动声色，一旦老虎发威，一口就会把猴子吃掉。不过那几只猴子背后有太上老君的支持。毛泽东曾说自己身上既有猴性，也有虎性。文革小组、国务院正好是他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就看他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了。

《文汇报》一位记者在上海浦东野生动物园曾经拍摄到一张照片，一只猴子坐在老虎的脖子上，摆弄老虎耳朵，老虎不予理睬，卧在地上打瞌睡。笔者观此照片，便油然想到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和国务院周恩来等人的关系。

批林批孔的提出

1973年，中国历史似乎处处理下伏笔，风云变幻，诡谲莫测。3月9日，周恩来陪邓小平见毛泽东。之后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问题。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除了批评外交部第153期的《新情况》，毛泽东还谈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7月7日、8月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很快朱永嘉就接到了张春桥的电话：“杨荣国的文章看到没有，你们还不赶快动手写文章！”²⁸

7月17日，周恩来陪杨振宁见毛泽东，毛泽东向杨谈了法家的厚今薄古。杨谈到看到一些对秦始皇评价很高的文章，周恩来插了一句：对

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是法家。²⁹

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提出：历代有所作为、有成就的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念了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³⁰

江青认真地把这首诗记录了下来，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则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³¹

不久，姚文元来到上海，召见朱永嘉，给他看了毛泽东的这首诗。朱永嘉后来对笔者说：也就是8月份，姚文元曾在兴国路招待所，通过他在上海的秘书胡鼎钧打电话通知，让我看毛泽东用粗的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后的那首律诗，那时只让我看，要用脑子记，不让我抄，这个为难我了。事后，姚文元来电话要我组织文章。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姚的电话打到宿舍门房间的公用电话才找到我。此后，办公室才给我装了电话。那时，杨荣国到上海来做报告，我陪了谭其骧去浦江饭店看他，并请他来复旦大学做报告。³²

朱永嘉根据姚文元的意旨，组织王守稼等人写了《论尊儒反法》的长文，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刊出，姚文元即让《红旗》杂志转载。朱永嘉回忆说，十大刚刚开过，文章中我没有任何影射周恩来的意图，这篇文章在《红旗》转载后，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到上海考察工作。徐景贤不知道我们写文章的背景，批评了我们不好好宣传十大精神，怎么批起孔子来了？他为此经王洪文请示了周恩来，周说应该宣传十大精神。我又不能直说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布置的文章。批评归批评，因为从姚文元布置来的古文标点的篇目，也告诉我们这个意图来自毛泽东，总理对此不知情。以后我们写文章一直沿着这个思想走的。³³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过后批示：“同意转发。”³⁴18日，这个材料即作为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全国。

批林批孔的提出，不管是不是别有用意，其根本问题是能不能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人们不会忘记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从他的住地北京毛家湾抄出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几条孔子的语录来，这些都是林彪写给叶群的。当时中国一号人物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二号人物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是有恃无恐的人物。毛泽东对江青采取公开批评的方式，林彪对叶群则采取以名言警示的方式，都是要她们严格约束自己，不要超越、干扰或破坏他们的战略。仅从林彪写给叶群的几条孔子语录的条子，也许还不能够说明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真的崇信孔子学说。但是能说明林彪和孔孟之道关系的还有他奉行的策略。前文提到，周恩来批判林彪是极左，张春桥批判林彪是极右，毛泽东批评他是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关于策略，林彪在自制的卡片上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³⁵这是孔子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不左，不右，取乎中。林彪为什么要取乎中呢？他自己解释说：“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这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还是毛泽东评价林彪是“形左实右”有些道理。

林彪不只是在政治上和毛泽东保持距离，不同意毛的做法，在哲学理论上，他也持有和毛泽东不同的见解。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林彪则认为：“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以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有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纯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在中共中央高层中，在政治上和哲学理论上与毛泽东持不同见解

的，还是大有人在，但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好的结果，先后成为了牺牲品。唯林彪不只是保全了自己，而且曾一度获得毛泽东的欢心，被选作接班人，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林彪奉行的儒家从政的规则。林彪曾在纸片上写道：“古策：一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二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三主劳臣逸（视察之类）。”林彪写的这段话不是他的独创，语出《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在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法，谈到儒家时，说儒家是“以人主为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这是儒家处理君臣关系万世不变的原则，林彪则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能在一段时间内取悦毛泽东，但后来他身不由己，违背了儒家的这一原则，就“折戟沉沙”了。所以，毛泽东同意江青搞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并不牵强附会，而是顺理成章的。

1974年1月24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姚文元参加了这次大会。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议中，姚文元就林彪引用《三国演义》的“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插了两次话，说林彪的“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把“趋身”改成“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就是不打自招地告诉大家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栖身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

会上，迟群发表“抓大事”和“反复辟”的讲话，声称批林批孔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的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迟群所批评的走后门，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一定实有所指。但在激烈的斗争中，彼此都很敏感，叶剑英认为迟群的讲话是针对自己送一个儿子到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文的事情。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张春桥却没有参加。原来在这一天，他随周恩来去看望郭沫若了。

大会之后，1月30日，叶剑英经过思考，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给予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问题上的“错误”。信写好后，叶剑英没有经过中央办公会议，仍然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走了“后门”，

派自己的警卫人员连夜将信直接经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转给毛泽东。

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复信，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³⁶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给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江青看到后，虽然有几分不高兴，但仍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应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³⁷张春桥则认为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利用检讨告状，也是一大发明。

当代大儒是谁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江青继前一天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再次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部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叶剑英都参加了。迟群做了长篇发言，又再一次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的问题，说：党内“历次修正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是当前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于小事。江青、姚文元频频插话，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江青在会上点名批评了郭沫若。

1月31日，张春桥又随同江青去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送给郭沫若。这以后，江青又到处讲话，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研究文革史的一些学者认为，江青的讲话是针对周恩来的。这当然不完全是江青的个人行为，而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因为他对周恩来思想中的儒家精神是不满意的，也想借此机会敲打周恩来。

江青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组写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孔丘其人》等文章。³⁸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甘落后，先后写的文章有：康立《读〈封建论〉》、康立《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罗思鼎《秦

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这些文章都提出“批宰相”、“批折衷主义”、“批现代大儒”、“复辟与反复辟”，强调了评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当时读者的印象中，“折衷主义”、“儒家精神”都是代表周恩来的符号，读者认为几篇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周恩来的影射，引起了群众对张春桥等人的不满。

《孔丘其人》一文中有这样描写孔子的句子：“71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端着一只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去见鲁君”，这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影射周恩来的。该文作者范达人介绍此文写作经过时说：《孔丘其人》是江青建议，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写的，之后又经周恩来看过才发表的。江青认为，此文的缺点是没有引用原文，有编造的嫌疑。³⁹

康立写的《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一文中，有描写宰相田千秋的句子：“至于那个会议主持者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都不得罪。”此处虽然引用了原文，但解释时油腔滑调，这在当时也是被公认是影射周恩来。写作组的朱永嘉谈到此文写作过程，他说：从我与张春桥、姚文元接触的过程，他们从未向我们表明要批评周恩来。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没有任何要隐射周公的意图，说我批林批孔，是为了批周恩来，我是从来不认这笔帐的，因为没有这个事实。读者对文章的理解那又是另一回事了。⁴⁰粉碎“四人帮”后在专案审查时，朱永嘉也被立案审查，批判周恩来也是一个重要内容。经朱永嘉的申述及专案调查，他批判周恩来的这项罪名被否定了。

诸如这类文章，梁效写作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还有几篇，内容涉及到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读者都认为是影射周恩来的，而作者却说没有影射周恩来的意思。就此事，读者和作者双方的意见发生了抵牾，引起了读者的不满甚至愤怒。周恩来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他是否感到毛泽东、江青、两个写作组的文章以及全国性的评法批儒的矛头就是对着他的呢？1974年4月22日，周恩来接见日本自民党

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当川崎提到上一年8月间，西方一些报道认为中国开展批孔，牵涉到周总理，一些日本朋友感到担心时，周恩来说：

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⁴¹

周恩来这一番讲话，似乎比江青站得更高，并不认为批孔、批周公就是批他，并且表明他自己就是批孔队伍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从五四运动就开始批孔了；同时提升了批孔在全国的意义，法家是改革派，而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早就超过法家了。可以说，周恩来这番话不仅是对江青的还击，也是说给毛泽东听的，显示出周恩来软中有硬的性格。

受新文化熏陶的张春桥，对孔学持以批判的立场，批孔出自他的真实想法。早在批林批孔之前，1969年10月19日，他在康平路召开的一次大批判会议上就提出：孔子要批判，不能开一两炮就算了，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张春桥讲话后，朱永嘉马上安排历史组写文章。文章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写了很长时间，改了十七稿。姚文元阅后认为可以发表，但张春桥看后认为现实感不强，讲历史太多，社会主义时期讲得不充分，就没有发表。看来，张春桥批判孔子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在批林批孔的过程中形成的。

后来在秦城的铁窗内，他从报上看到对孔子的宣传，尊孔的浓厚空气，颇有感慨。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读到纪念五四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说到当前批孔的必要性。许多人谈话，倒说要崇拜孔夫子，攻击五四的批孔，应当如何继承孔夫子，似乎孔老二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孔夫子影响深远，并不是他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学问没人超过，适应千秋万代。”张春桥读了赵纪彬的《论语初探》，全书32万字，引经据典，读起来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读完了，给他留下的印象是，

孔夫子非批不可，“总得有人做下去，总不至于一千年以后还是孔夫子王国吧。”⁴²

张春桥在狱中还读了《论语》，说：“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容易。”他在信中还说：“说来似乎可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⁴³这说明他对以前所做的事，还在继续思考着。他入狱之后，仍在关注儒学在中国当代社会可能具有的命运，“经随术变”的儒家秉性可能又会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批林批孔的文章是否就是影射周恩来，读者说有，文章作者说无，周恩来自己则否认那个周公指的是他。历史过去将近四十年，像笔者这样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当时感到思想混乱，至今仍然理不清楚，更难说出一个是非来。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以史为鉴，借古喻今，这个说法大概始自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在魏征去世后，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以后的历史研究就为现实服务，成为现实斗争的一个工具，像美人一样，可以随意打扮。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来说明或解决现实问题，有时两者无法相符，反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不出漏子。

“把我们自己搞乱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之后，紧接着就是江青在北京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透露出北京大会精神，要上海市总工会抓好批林批孔的大事，市总工会要打头阵，可以召开万人大会，联系上海的实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月26日，张春桥打电话给马天水，讲了北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情况，特别说了北京大会批了走后门，并关照马天水“市委常委要检

查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如果有，要赶快解决，争取主动，不然运动一来，就被动了。”⁴⁴马天水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张春桥指示。一查，常委几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诸如送子女当兵、当工人、进农场，逃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张春桥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个女儿进了工厂，一个女儿被许世友接到南京军区当兵，一个女儿进了大学读书。特别是他的小女儿，按当时政策是应该到农村去的，经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的活动，被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后来又很快到空四军当兵，再后来又通过朱永嘉，被空四军推荐到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张春桥批示：送回农场。⁴⁵接着就是叶剑英以检讨的方式告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走后门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张春桥的小女儿也就继续留在复旦大学读书了。

2月2日，上海总工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深入批林批孔大会，号召各级工会发扬一月革命精神，批判右倾翻案、复辟回潮风，揭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生事物的“两个否定”的典型。

1974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工会干部会议，徐景贤在讲话时提出“要正确理解一月革命精神”，就当前的运动，“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在运动中新干部对自己也要一分为二，“新干部和老干部、干部和群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携手“对准复辟倒退思潮”。笔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报社就遵照报社领导意见，以鲍蔚文的笔名写了一篇《发扬革命精神，争当革命闯将》的评论员文章，发表在2月24日的《文汇报》上，在评论中传达了徐景贤的讲话内容。⁴⁶上海市总工会的头头们看到这篇文章，认为矛头是对着他们的。王秀珍马上召集他们开会，认为“鲍蔚文”在讲一月革命时，没有讲到夺权，他们认为一月革命的核心是夺权。他们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王洪文很恼火，批评《文汇报》，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点起来的火，被《文汇报》的文章压下去了。王洪文是借着批《文汇报》来批评徐景贤。

2月27日张春桥就给马天水写了一封信，《文汇报》社传达了这封信的内容：

文汇报的思想评论，我觉得写的很不好。特别是一月革命精神，解释得不对，抽掉了向走资派夺权的基本内容，还有什么一月革命风暴呢？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不然批林批孔、反复辟倒退干什么呢？

张春桥在信中还关照，他的意见不要印发，也不要登到报纸上去。马天水在市革会常委会上传达了张春桥信的内容，徐景贤在会上作了检查，《文汇报》领导承担了责任，向市革会写了例行公事的检查。

值得说一下的是：笔者写了这篇文章，虽然令张春桥、王洪文感到不满，引起了一场小风波，但笔者自己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连检查也没有做。因为《文汇报》一直有一个传统，除事实上的错误要记者承担责任，写检查之外，一般从上面来的东西，奉命之作，不会追求执笔者的责任。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一传统也仍然保留着。

其实，马天水、徐景贤本来认为，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使上海的局势不稳了，影响了生产和市民的情绪，所以想通过总工会会议降温。有了张春桥的信，马天水、徐景贤马上转变对总工会所持的质疑态度，转而和总工会一起发起基层的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和王秀珍等总工会的头头们一起，到基层工厂去发动群众，提出在运动中“重新站队”、“老造反要立新功”，造反派要“重振军威”等等。有的甚至提出批林批孔要“第二次夺权，把失去的权力再夺回来”。

马天水等顾虑重重，担心上海动乱，张春桥则认为出点乱子不要紧，可以在上海一个郊县搞试点，“如果乱了也才一个县”。他们还一再向王秀珍关照“上海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稳定了就好”。

有了张春桥他们的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军威真的重振起来了。他们首先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新干部、老造反派的问题；二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再夺权的问题，把得而复失的领导权再夺回来；三是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联系对一月革命的评价和态度，联系对造反派的培养、提拔和使用等问题。这样，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上海层层召开各级大会、揭矛盾大会、工会干部扩大会，到处抓复辟倒退事件，有的还

成立革命组织，有的已经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里的干部被批斗，有些单位连党委也怕工会。1974年，3、4、5三个月，上海出现了“第二次夺权”的高潮。上海总工会的行为很快影响到全国，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些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又开始串联上访，这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批林批孔不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以思想教育为主。

上海市委和市革会越来越控制不了局面，马天水急得没有办法，感到这样发展下去不行，就打电话向张春桥如实汇报上海的情况。张春桥回话说：“谁叫你们把自己搞乱的？”⁴⁷马天水说“我有责任”，“这是按照你2月来信精神搞的”，并说“总工会在里边起了不小作用”。听了马天水这样的解释，张春桥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提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时，杨浦区把市革会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张敬标揪回杨浦批判。张敬标本来是该区区委书记。张春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制止：这样搞下去，今天可以揪张敬标，明天就可以揪你王秀珍、徐景贤，后天就可以揪你马天水，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搞乱了吗？

周恩来敏感地发现了问题，4月7日，他在修改中央给湖南的电报稿时就加上了：在运动中“不应扩大打击面”，“注意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使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⁴⁸4月10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若干问题发出通知，规定：一、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二、原“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运动；⁴⁹三、各级党委应该认真加强领导，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中央通知还特别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这个文件体现了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精神。

1975年12月，正是批判邓小平时期，上海召开了干部大会，原来的上海工总司常委黄金海在小组会上发言，重提上海批林批孔运动，他一肚子牢骚，说批林批孔来个急刹车，搞成个夹生饭；市委在运动中左右摇摆，一会儿到处点火，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矛盾，一会儿又要转弯子。黄金海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上了简报，张春桥看后写了一段批示：批

林批孔来个急刹车，搞成夹生饭，我负责。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本来，张春桥要在上海创造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以向全国推广，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出现第二次大乱。还是周恩来出面干预，其声势才没有继续发展，否则，张春桥可能无法收场！

注释

-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 2 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期的第一名士。
- 3 王羲之，东晋乃至中国书法史上最杰出的书法家。许询，东晋文学家。
- 4 王坦之，东晋名臣。
- 5 官名，太子的侍从官。
- 6 九卿，古代中央部分行政长官的总称。
- 7 《周恩来致毛泽东信》（手稿），1973年3月26日，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05页。
- 8 《周恩来接见回国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纪要》，1972年8月1、2日。
- 9 《毛泽东对周恩来送审的陈毅悼词的批示》，1972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 10 王若水：《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1972年在批林批孔方针上的分歧》，《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五期。
- 1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87页。
-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杨振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13 同上，第536页。周培源，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 14 同上，第539页。谢静宜，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15 王若水，政治理论家，时为《人民日报》社编辑、理论部负责人。
-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559页。
- 17 同上，第565页。
- 18 原文如此。实际上批林批孔运动是从1974年初开始的，详见后文。
- 19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71页。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6页。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

- 社，2013年版，第458页。
- 22 同上，第485页。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页。
- 24 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协助周恩来主抓农业工作。
- 2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89页。
- 2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650页
- 27 “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最早由林彪1966年的“五·一八”讲话提出，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浩劫。
- 28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2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607页。
- 30 焚坑，指秦始皇“焚书坑儒”。祖龙，指秦始皇。十批，指郭沫若写于1943—45年间的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封建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一篇论述封建是过时制度的文章。子厚，柳宗元的字。文王：指周文王姬昌，以借代封建制。
- 3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610页。
- 32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
- 33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71页。
- 35 林彪卡片上记的格言均引自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 3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6页。
- 37 同上。
- 38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江青等人授意、组织，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些文史哲专家为主要成员的御用写作班子。
- 39 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
- 40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4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66页。
- 42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